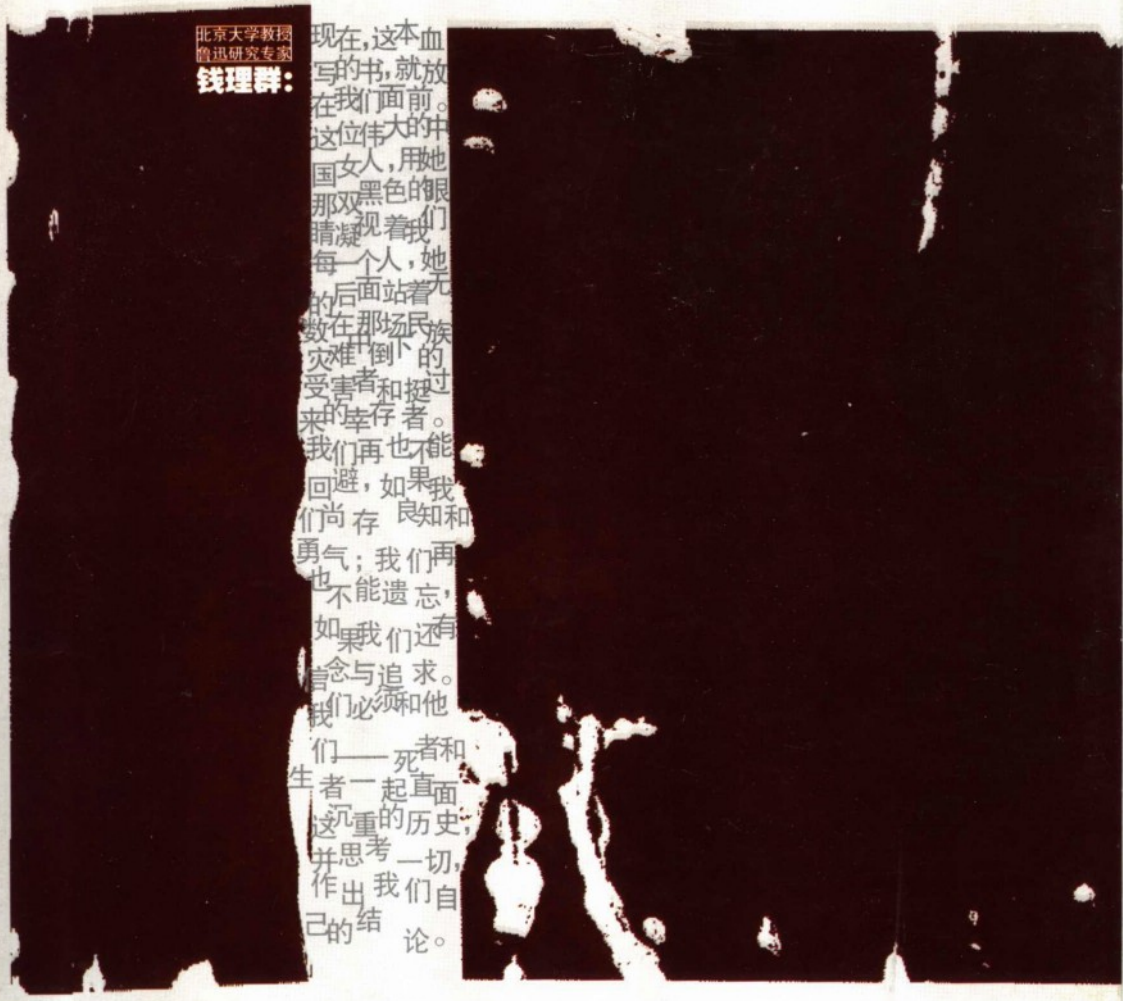


[修订版]

经历：我的1957年

和凤鸣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经历——我的1957年》于2001年3月份出版以来，越来越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得到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被学术界和读者誉为“这本书的历史地位，不会在《扬州十日记》等等之下。它不但是反右史，也是大跃进史，是后世史学家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必读书”，“这本书将成为传世之作”。这次修订再版，是作者在本书出版四年多以来，广泛地听取那场劫难的幸存者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对许多事实、人物、时间、地点等进行了更审慎的核实，并对2001版《经历》中有的章节进行了修改、删节后推出的更为准确的精华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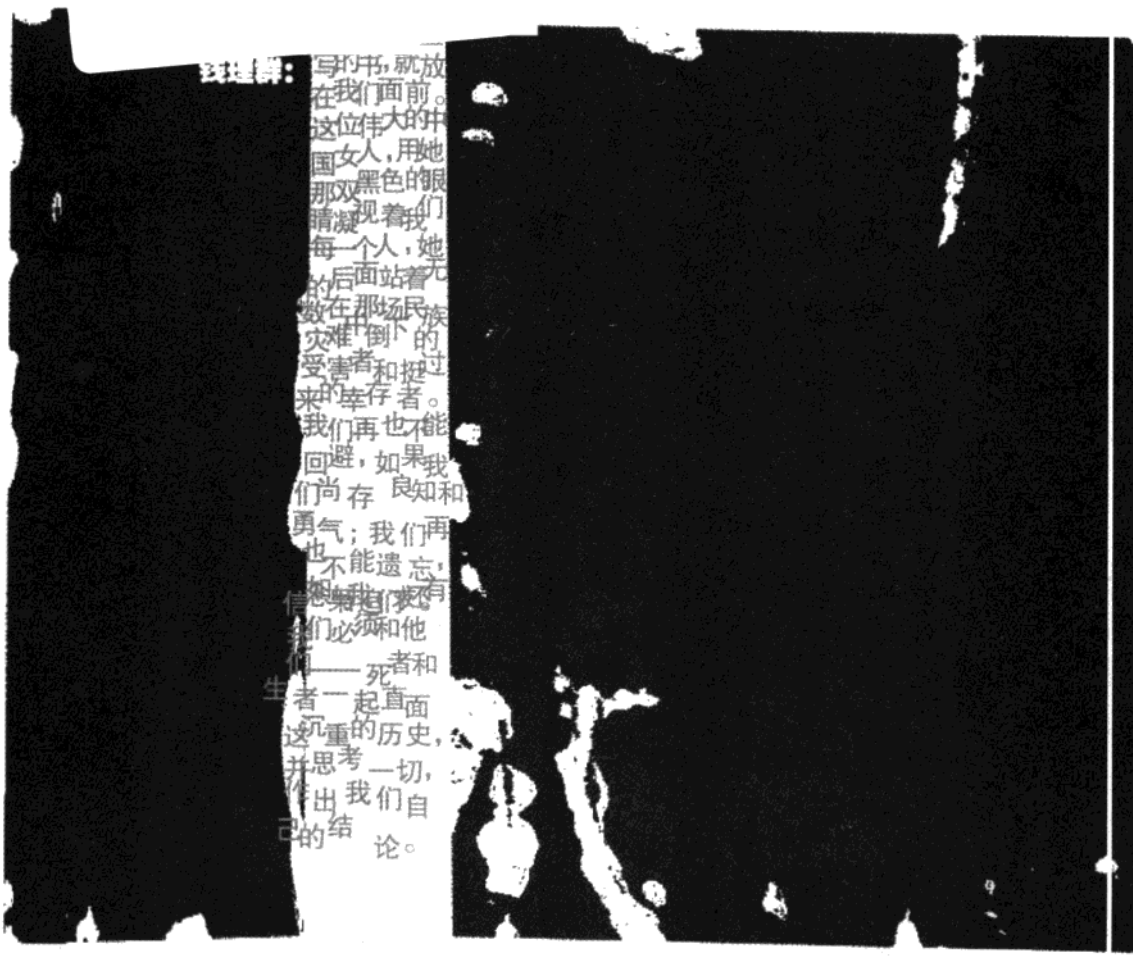
建议上架类别：历史纪实

ISBN 7-80587-568-5

9 787805 875682 01>

ISBN 7-80587-568-5 定价：29.00元

www.dhwycbs.com



[修订版]

经历：我的1957年

和凤鸣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 / 和凤鸣 著.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ISBN 7-80587-568-5

Ⅰ.经… Ⅱ.和… Ⅲ.和凤鸣-自传
Ⅳ.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8703号

书　名 经历——我的1957年

作　者 和凤鸣 著
责任编辑 赵金祥
封面设计 印象迪赛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网　址 www.dhwycbs.com E-mail gy@dhwycbs.com
邮购电话 (0931) 8773235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4.875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06年2月第2版 2006年2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3,001—8,000
书　号 ISBN 7-80587-568-5
定　价 29.00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现在，这本血写的书，就放在我们面前。这位伟大的中国女人，用她那双黑色的眼睛凝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她的后面站着无数在那场民族灾难中倒下的受害者和挺过来的幸存者。我们再也不能回避，如果我们尚存良知和勇气；我们再也不能遗忘，如果我们还有信念与追求。我们必须和他们——死者和生者一起直面这沉重的历史，并思考一切，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钱理群

和凤鸣与她的《经历——我的1957年》
——“1957年学”研究笔记之二(代序)

○钱理群

一、命 名

这是一个后人无法理解，却令当事人至今仍不寒而栗的细节：“‘右派右派，妖魔鬼怪!’这流行一时的歌曲，常常在街头巷尾，斗争会上由群众高歌，在广播和扩音器里响亮地播放，时不时地撞击撕扯着我们流血的心。曾几何时，我们都成了‘妖魔鬼怪’。在公众场所，在斗争会上，右派分子们还得做屏息凝神静听默思状，以表示自己真是‘妖魔鬼怪’，这个玩笑真是开得太大了。在1957年的中国，我们对自己被歌为‘妖魔鬼怪’，只能表示衷心悦服，个中的辛酸痛苦，真是一言难尽。”《经历》，18~19页）[①]

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反右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热闹红火不亦乐乎之时，有关美术编辑发生奇想，把全报社的右派分子集中在一幅大漫画里，有妖魔鬼怪的诸神形象丑化一番，标出在黑社头子王景超指挥下，群魔乱舞，正在兴高采烈地进行反共大合唱；其中的‘牛头’自然是牛华生了；杜绍宇因为身材短粗平日里大家对他就有‘狗熊’的戏称，在漫画里就变成了一头丑陋的狗熊；杜博智被丑化成挺着大肚子蹦跳着的大青蛙，旁边写上‘蛙将杜博智’。像这等大漫画，当时我只扫了一眼心里就痛楚不已。”（《经历》，92页）

问题是在共和国的历史大事件中，这样的细节却一再地出现。和凤鸣的回忆中，就提到文革一开始，《人民日报》的那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于是，

---

①文中引文所标注页码全部指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经历——我的1957年》。

2005年9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莅兰讲学时与和凤鸣交流

就有了“牛棚’，有了强迫每一个受害者高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

这是为什么？这样的“命名”有着怎样的历史功能？

最容易想到的，这是对受害者的人身侮辱，不仅是对其“革命者”的资格、身份，更是对其“人”的资格、身份的剥夺，正是要通过这样的命名仪式，使其在舆论眼里，更在其自我心理上“非人化”。我至今还不能忘怀大剧作家曹禺对“文革”中的心理迷乱的自述：“他们整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不但别人相信，甚至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曹禺与田本相的谈话，1986年10月18日》）。在我看来，“曹禺吃‘剥下的白薯皮’这一细节是特别惊心动魄的；它让人想起了老舍《骆驼祥子》的结尾：祥子‘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捡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活下去就是一切，什么也无须多想了’”（参看拙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人”就是这样在自我幻觉中变成了“狗”。

而“牛鬼蛇神”的命名，更是所谓“革命狂欢节”中必不可少的“节目”。不但在将迫害无辜的罪行戏谑化的过程中洗涤血污，而且减轻了民众参与时的心理负担，使这样的“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在狂欢气氛中成为全民性的迫害运动。和凤鸣对那幅“革命群众”自发、主动“创作”的漫画“痛楚不已”原因即在于此。

这样的命名法也非这些新式革命家所独创。鲁迅早已指出，“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

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原’，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准风月谈·“抄靶子”》）。——我们现在终于明白，命名法的老谱袭用，目的就是要通过将受迫害者非人化，来磨合其口头的“革命人道主义”与实际行为的“反人道”之间的矛盾，使迫害合法化，合道德化。有了这样的遮眼法，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甚至兴趣盎然地实施各种暴行了！

二、隔　离

在和凤鸣的记忆中，最难以忍受的是，当被宣布为右派，顷刻之间，所有的人都像逃避瘟疫一样，远离而去；“在原来十分熟悉，非常友好的同志们面前，自己忽然成为敌人，置于被审判的地位，垂手恭立，接受斗争批判”（《经历》，21页），这来自朋友、同志，有时更有亲人的陌生的、冷漠的，甚至仇恨的眼光，是真正令人恐惧的。——这正是当年“狂人”的感受：这死鱼般的“白而且硬”的眼睛，“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从顶上直冷到脚跟”！正像当年以“疯子”的罪名将反叛者逐出社会之外一样，现在又以“右派”的罪名将革命者逐出了。

处在社会隔离中的自我，只能躲避到小家庭里。和凤鸣和她的丈夫就是这样回到家里，“悄悄地述说外面的世界不允许说的话，倾吐冤屈，互诉衷肠”（《经历》，24页）。读到下面这段文字，人们无法不为之动容：“他用双臂围住了我，悲伤地柔声说：‘他们为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啊？为什么？’悲伤使他声音喑哑，我的心颤栗了”（《经历》，21页）。但应该说，和凤鸣和王景超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仍心心相印，相依为命；更可怕的是，有的家庭却或因社会压力太大，或因精神的迷乱，竟出现了夫妻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揭发私房话以示“划清界限”，这就最后地堵塞了人赖以躲避外在风浪的精神退路，在历次运动中，很多人就是在这最后的绝望中走向绝路的。因此，我说过，把革命引入家庭，将精神控制伸向床笫，强迫或诱使夫妻与骨肉相互划清界限，这是最无人道的，因为它逼迫人越过人之为人的最后底线。

对于和凤鸣与王景超这样的死命相守的夫妻则要强制他们分离。“两个在大灾大难中融合在一起的灵魂又生生被撕扯得鲜血淋漓，各自东西”（《经历》33页），这更是一种残酷。人们似乎还有一点退路：可以通过通信来慰藉两颗孤寂的灵魂。但这也是“革命”所不允许的。在经过了“万种柔肠焦急等待”以后，和凤鸣终于收到了心上人的来信：“这是一个小小的、揉得皱巴巴的信封，奇怪的是信封开着口，没粘，

里面装着一张薄薄的信纸，字写得歪歪斜斜，没有了他的来信中惯常对我的爱称，只是简单地说到他现在新添墩站，已开始劳动，主要是挖水渠，队里管伙食，每月发两三元零花。……”和凤鸣“反复读着这封被检查过的来信，想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什么，却什么也捕捉不到，干巴巴的字句，意思明确，连引起联想的可能都没有”。她突然明白：“惟一沟通和抚慰两个受难的灵魂的渠道已被堵死”，“我们在苦难中想要互诉衷肠、沟通心曲已无法做到，这种残忍的剥夺使我心颤不已”。（《经历》，64，67，65页）

于是，人只能回到自我倾诉：王景超正是这样坚持记日记，作为自己最后的精神防线。如今这已成了和凤鸣永远的记忆：“每天晚上，景超还用工整的笔迹写日记，写每天挨斗的情形，写他的委屈，他的痛苦，也写出那可悲的世相”（《经历》，24页）；到了劳改农场，他也还在写，并且劝难友记，说这些日记会很有意义，不仅是为了现实的精神在写，而且也是他的一个梦：总有一天，将这一切写出来，留给后人。可以说，记日记几乎成了王景超们身陷地狱以后，惟一能够证明自己“人”的存在、“思想”的存在，证明自我生命的意义的最后手段。但正如一位远比王景超现实、冷峻的难友所说，这是“在为自己准备绳索”，他也因此遭到了残酷的批斗与训斥：“王景超思想反动，现在还在记日记，你记日记想要干什么，你老实交代！”（《经历》，509页）而听了他的劝告也在记日记的难友，更是被同在罹难的右派“无限上纲”：“你记日记想干什么，是不是要给台湾的蒋介石送情报？”（《经历》，145页）尽管王景超冒着危险，奇迹般地写下了两本日记，作为生命的最后遗物留给了自己的妻子，但在十年浩劫中，知道在劫难逃的和凤鸣，仍将这些日记连同他写的小说底稿、信件，以及自己“守着孤独和心灵对话所记的日记”，全部付之一炬，所有的文字，都“烟飞灰灭，全部消灭”（《经历》，450页）。——这也正是发动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切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思想、生命，连同它的文字表达，都应该“全部消灭”。人也终于失去了自我倾诉的权利。

很多人在研究法西斯集中营时，都谈到了单独监禁的可怕：那是将人置于和外界严密隔绝的空间里，杜绝了一切交流的可能，陷入了绝对孤独的状态。著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人们无法想象，“这种办法是多么恶毒，对人的心理打击是多么致命”；他这样描写一个亲历者所受的精神磨难：“我真是形影相吊，成天孤零零地、一筹莫展地守着我自己的身体，以及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如桌子、床、窗户、洗脸盆；我就像潜水员一样，置身于寂静无声的漆黑大海里，甚至于模糊地意识到，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绳已经扯断，再也不会被人从这无声的深处拉回水面了……我的身边是一片虚无，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虚无之境，处处如此，一直如此……即使看上去无实无形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撑点，不然它们就开始毫无意义地围着自己转圈

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这空无一物的虚无之境……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象棋的故事》）中国的监狱自然少不了这样的被茨威格称为“阴险”的单独囚禁，但我们也有自己的特色的创造，即精神的隔绝：从表面看，你还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甚至是在一个相当拥挤的生存空间里，你和你的管教者，和你的难友朝夕相处，经常有身体的摩擦，但彼此精神上却是绝对隔离的。和凤鸣曾一度被安排在场部财务科协助工作，财务科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场所，场部的人有事无事都会到这里来转一圈，或者随意闲聊；但所有的人，眼见和凤鸣这样一个“大活人”坐在那里，却都视而不见，没有一个和她打招呼，闲聊时也绝不涉及她，仿佛她并不存在。（《经历》，246页）这样的被周围的人绝对孤立与空洞化的境遇，是可怕的，和凤鸣这样描述她内心的感受：“如果我独自一个人待在封闭的古墓里，面对那死去了的世界，我会焦灼不安，着急无望……而在这活人的世界，我自己就是一个大活人，却不能张嘴和他们之中任何人搭上一句半句话，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异类’。这种压抑，这无言的压迫，是我未尝经历过的，它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经历》，255页）与同一处境的难友之间的交流，也无可能；甚至，这样的交流是危险的，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和凤鸣就是因为给一个正在受批判的朋友送了一张小纸条，对方反戈一击，才横加“订攻守同盟”的罪名而被打成右派，最后家破人亡的。而当她忍受不住被周围的人空洞化的痛苦，极其谨慎地向同屋的女伴作了有限的宣泄时，竟立刻被打了“小报告”，又获得了“不安心改造”的罪名（《经历》，256页）。受害人之间的这类相互伤害，我们在下文还要再作讨论，这里只想强调一点：这与笼罩着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是直接相关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自己处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的控制之下，仿佛你不揭发检举，就会被检举揭发，这样的人人自危，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很容易越过道德的底线：保护自己成了惟一的欲求，即使因此而伤害了他人，也似乎顾不上了，人与人的关系成了狼与狼的关系。这样，尽管仍处于人群之中，但所有的他者，都成了具有显在或潜在危险的不可交流的对象，这是另一种形态的“空洞”的存在，“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这样的人群中的绝对隔绝与绝对孤独感，是真正令人恐惧的。

这是和凤鸣的回忆里，最不忍卒读的一页：当被派去“医院”烧炕时，她看见的是：所有的人“一个个蓬首垢面，面黄肌瘦，目光呆滞。他们立即全都看见了我，但全像没有看见一样，面部无任何表情，没有人同我打招呼。他们相互间也不作任何议论，没有一句话。作为病号，他们没有呻吟声，只是不知是谁，发出了几声沉闷的叹气声。这就是囚犯生活在他们身上形成的一切”。（《经历》，342页）——人本是社会的存在，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现在却用“革命”的名义，将右派从整个血缘关系、社会关系中隔离出来，成为一无依傍的绝对的孤独的存在，而且被

剥夺了情感倾诉、思想交流、言语自由表达的一切对象，一切手段，一切渠道，一切希望与可能。长期的绝望，最后连自身也仿佛失去这样的欲望，这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人的精神、人的生命的虚无化与空洞化，这样的非人化是具有一种内在的残酷性的。

三、革命紧箍咒

但“革命”似乎还要显示自己的仁慈，宣布要给右派以“出路”，据说这就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凤鸣和她的丈夫是曾经对此深信不疑的：“为了摘掉右派的帽子，从困境中走出，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我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具有百折不挠的毅力，靠自己非同寻常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我们在虚幻的梦境中游来荡去，沉湎于自己编织的梦境，只是由于我们已一无所有……”（《经历》，32~33页）

但这真是右派“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索”吗？

血的教训终于使和凤鸣们有了这样的觉醒：所谓“右派帽子”不过是戴在头上的“紧箍咒”，“四百年前的吴承恩让面目仁慈不明善恶的唐僧念动紧箍咒，驱使孙悟空在时不时抱头喊疼中仍忠心耿耿地保唐僧的驾赴西天取经，是因为孙悟空在要命的头疼的折磨中也还有个想头，他想的是保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自己才能成正果，取得自由之身……（我）心中却十分凄楚，为什么历史中的神话故事，竟同现实生活如此相似乃尔？这惊人的重复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扮演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路上的角色，竟是那样地有声有色而更其增添了许多悲壮许多惨烈。唐僧和孙悟空是一对一，而我们是几十万人，况且我们的队伍还在不断膨胀扩充。”（《经历》，204页）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革命的紧箍咒”为什么能够对当年的右派发生作用？它又在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

和凤鸣这样写到她拼命改造的心境与动力：“我拼命，是因为我承受着双重的苦难，我的和他的。我拼命，是为了争取早日改变目前的处境，好进一步帮他脱离苦海。然后，我们的两个孩子也才能得救，我们才能跟孩子在一起。可怜的孩子，他们原应该跟别的孩子们一样，有一个无忧无虑欢快活泼的童年，但他们小小年纪竟长久地连父母的面也见不到，让孩子们也苦熬苦度岁月，这虽也是我尽量不去想的，却又时时刻在心上。我痴痴呆呆地，一心只想着改造，改造，拼命，拼命！真是到了可笑而痴迷的地步。而在当时，这一切就是如此真实，沉重酷烈的苦难使我别无选择。”（《经历》，156页）

这“别无选择”四个字实在令人心酸。“革命”对这些不驯服的右派的惩罚，最

致命之处，不在惩罚落在他们自身——右派中并不乏能够承受苦难的硬汉，而且“一人做事一人担当”本也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而现在却要把惩罚加之于孩子，特别是和凤鸣、王景超这样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孩子更是无家可归，只能由年老病重的父母来承担本属于自己抚养的责任，而且按当时的血统论的“革命逻辑”，孩子也将和右派父母一样，成为被社会歧视、排斥的对象，葬送了一切前途：这样的惩罚才是真正不堪承受的。特别是因自己而让无辜的孩子受苦，这更会引起无止尽的心灵的自责：“孩子啊，孩子，你们受苦完全是由于我们的过错，在你们面前，我们是真正的罪人，我们罪不可恕。”（《经历》，35页）亲子血缘之情，这是人的本性、人的底线，也是人的情感中最神圣、最敏感，也最脆弱之处，可以说是人的精神的一个软肋；而现在反右运动的发动者却正是从这里捅刀，挥舞其“革命的惩罚之剑”，再硬的汉子也得屈服，并且承受永远除不去的罪恶感，真正“别无选择”。而对人的基本情感的这种蹂躏与利用，是残酷的。

和凤鸣还留下了这样一个可怕的记忆：一个右派，在极度的饥饿中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但他仍担心着妻子和儿女还要继续为自己“背黑锅，遭骂名”，于是，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写了一首颂歌，表示在即将饿死时，仍然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希望留下一个“正面的形象”，对妻子和孩子们或许会好一些，这几乎是他惟一能为家人做的事了。和凤鸣说：“这看似滑稽、矛盾之极的一幕，却包含了多少凄惨而令人痛断肝肠的内涵。”（《经历》，387页）使人感到对人的亲情的蹂躏与利用，不仅残酷，借用茨威格的说法，更是“恶毒”与“阴险”的。

说到茨威格，我们又记起了前面讨论过的精神隔离问题。我们已经说过，精神隔离的严重后果，就是对人的自由思考、言说、交流的权利的剥夺，欲望的压制，造成人的虚无化与空洞化；而这样的虚无与空洞，正可以使“革命的绝对权威”乘虚而入。和凤鸣对这些被虚无化、空洞化的右派的精神状态与选择的描述，同样令人心酸：“我们一个个不明不白地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获罪，在受苦受难中连做梦都想着如何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号召，在内心深处谁也没有想过可以打个问号，绝对地只是响应号召，绝对地只是跟着党走。这样，我们在劳动改造期间又成为‘总路线’、‘大跃进’的热情宣传者。功欤？过欤？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埋头劳动改造的人，是根本不去考虑的。……反右斗争期间对‘独立思考’大加挞伐，凡是曾经主张独立思考或有过此等表现的人先后都遭了难。我们当了右派后的处事原则只能是进一步唯命是从，‘但求无过’，谁还有兴致对这些国家大事用自己的脑瓜儿再去思考一番？”（《经历》，100~101页）这里所说的“绝对”响应与“绝对”服从，正是说明，当人陷入停止思考的虚无、空洞状态，就必然通向对专制强权的绝对顺从。这是另一种形态的对人的本性或基本弱点的

利用：人是有一种“皈依”的内在欲求的，人对父母、故乡、大地……的迷恋，都是这一欲求的外在表现。而当人处于一种非常状态，如右派所处的这种绝对孤独的，几乎是绝缘（一切联系，一切缘分）的状态，这样的皈依的本能就会以一种畸形的，又是极其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只要谁显得强大，有权威有权势，以不容置疑的充满自信的语言说话，就听命、依附于谁；而当时的“革命权威”正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绝对”响应，“绝对”服从，就不可避免。刚刚被“革命权威”打入地狱，就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革命权威”所发动的将给自己与整个民族带来新的灾难的新运动中去：后来者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奇迹”，就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确确实实地发生了。

这不仅是对人的本性、本能的利用，更有对革命者精神品格与气质的利用。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像和凤鸣、王景超这样的右派都是真诚的革命者。因此，当突然被自己以生命相许的“革命”打成“反革命”，他们就陷入了极度的困惑之中：一方面，他们相信自己即使烧成灰也不会反对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绝对难以想象，“革命”会犯根本性的错误，但他们又必须寻找某些说得过去的逻辑，来弥合这二者似乎是不可解的矛盾，勉强说服自己。和凤鸣在她的回忆中，这样谈到他们终于找到的逻辑：“当时无论他和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运动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怀疑，我们仍崇拜中国共产党……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我们，对于通过新闻渠道传播的整个运动的进展情况都深信不疑，绝对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虚假。诸如《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原国民党上将，在鸣放中说，‘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云云，我们绝对相信都是真的。我们想，北京出了‘章罗联盟’，像葛佩琦这样‘反动透顶’的人物都跳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不反击能行吗？”（《经历》，17页）。在为“反右运动”找到了合理性以后，自己犯了错误，也就顺理成章：至少是“客观上”帮了“葛佩琦之流”的忙了吧？但他们绝对没有料到，这竟是一个精心炮制的谎言：经过胡耀邦的亲自过问，现在已经查明，葛佩琦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受地下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这才成了“国民党上将”；而1957年的鸣放会上，他说的原话是：“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得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它。”但到了《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就变成了“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尽管葛佩琦立即去信指出这与事实不符，并声明自己的意思是“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但《人民日报》却不加理会，反而变本加厉，连续发表工农兵及各界人士的文章”，痛斥葛佩琦的‘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参看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问题是，《人民日报》这样做，是有理论根据的，即所谓“党性高于真实性”，为了“党的全局利益”，只要便于发动群众进行反右斗争，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采用，至于葛佩琦本人是

否受了冤屈，是否形成了对读者、群众的欺骗，都不在考虑之列。这背后，隐含着两个十分可怕的逻辑，一是“为了达到所谓‘崇高’的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卑劣的手段”，一是“为了所谓整体的、全局的利益，个人应作无条件的牺牲’。和凤鸣、王景超和无数天真、善良的革命者、普通百姓，在1957年就是这样落入了按上述“革命逻辑”编织的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的骗局中，和凤鸣、王景超这些右派还成了所谓“革命全局”祭坛上的牺牲品。

和凤鸣对当年接受改造的心理的描述、分析，还有一个方面也很值得注意：“由于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作用，我和我的难友们有时也觉得自己灵魂深处有不少污垢，遇到大风大浪未能站稳立场，所以才陷入了右派的泥坑，而劳动人民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确实也想诚心诚意地通过艰苦的劳动把自己改造成新人，改造成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人。”（《经历》，85页）“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的开篇语，此刻又撞击着我的心。这段话说：‘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我自己已被饥饿折磨得难以支撑，想的还是浸泡、蒸煮本身，让灵魂无比纯净的事。当时我崇拜伟大的作家，一种使自己的灵魂更为纯净的强烈愿望使我仍真诚地相信阿·托尔斯泰的这些话，在这种自我宽慰的梦幻里浮沉，精神上似乎获得了一些宁静。”（《经历》，343~344页）——这样的心理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很难理解，但这正是那一代革命者或向往革命的青年的共同特征：将劳动和劳动人民理想化、圣洁化，知识者天然有罪的民粹主义的信念，将苦难神圣化，在苦难中纯净灵魂，成为“新人”的“圣徒”情结，这里显然存在着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对这一代人的深刻影响。这样的信念与情结的道德自律的纯洁性，是无可怀疑的；但鲁迅早就警告过，“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是有可能导致“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现在，在和凤鸣、王景超这样的右派身上所发生的，正是对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却导致对专制的迫害的忍从的悲剧。从另一面说，那些“在劳动改造中求出路”的说教，就是对这些虔诚而幼稚的革命者的理想追求的蓄意践踏与利用，这是更令人憎恶的。

和凤鸣关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给右派“摘帽”的回忆，让人觉得既荒诞又悲凉；消息公布时，人们当作“最大的喜讯”相互转告；接着是“为思虑这次‘摘帽’自己是否有份”而“心慌意乱，坐卧不宁”——正如和凤鸣所说，“我们这些被划为阶级敌人已经两年的人，真是活得太可怜了，我们一个个都如堕入黑暗深渊奄奄一息又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哪怕明明看见是一根稻草，也要抢先抓到手里争先活命”；在急切等待中终于到来的国庆“盛典”上，却宣布只给两人“摘帽”，而且依然在农场劳动，一切并无变化。

这绝不只是人性的残酷，这更是体制使然，或者说这是维护“革命地狱”的秩序

的需要。和凤鸣有这样的痛苦的自省："地狱里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对自己同类大批死亡的无动于衷，竟于不知不觉间也影响了我，改变了我……被改造的人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与'我'无关的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才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我在'医院'为那些奄奄一息的病号烧炕时，油光满面的'职工'炊事员阻拦我为病号代发信件，我不是顺从地拒绝了为他们发信吗，现在让我感到万分羞愧内疚不已的事，当时竟认为理所当然。当时称之为'改造'的东西，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的异化，人的精神的可耻堕落，改造愈甚，要求愈严，异化愈甚，堕落愈甚。"（《经历》，423页）本来，将一群异己者聚集在一起，尽管严加管制，对统治者也有不安全的方面：如果他们由于境遇与利益的相同联合反抗，就将破坏地狱秩序的稳定。而现在却用"改造好了可以摘帽"的诱惑，将这些右派分割成单独地为自己"早日摘帽"这一虚幻目标奋斗的个体，形不成共同利益与意志，自然也就无法产生群体的抗争；所形成的却是和凤鸣所说的"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的与'我'无关的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的"行为准则"。而当每一个右派对同伴的苦难无动于衷，实际上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同伴的迫害：这才是真正可怕的。而且这样的参与，还会表现为主动的相互监督与告密。我们前面的分析中，谈到在劳改农场中普遍存在的右派间相互伤害，是无所不在的恐怖气氛所致；而"摘帽"的"革命紧箍咒"则将这样的相互伤害注入利益的动机：对他人的伤害正是自己"赎罪"的表现，更是"立功受奖"的机会。如上文所说，所谓"摘帽"不过是一个大骗局，但它却成功地在右派中灌输了一个理性的观念："为了自己活着，有一天能够摘帽，成为自由的公民，就必须不管他人死活，甚至要以他人的罪与死作为自己摘帽的筹码"，正如一位作者所说："正是理性地保护自己的生存的要求使得人对于他人的毁灭无动于衷，理性让受害者丧失了人性和道德，让他们相互仇恨而不是仇恨迫害者，理性使他们争着想成为旁观者，把人的生活降到自我保全的生存线上。"（于闽梅：《理性之下的杀与被杀——读〈现代性与大屠杀〉》，文载《随笔》，2003年3期）这样，这些受害者（当然不是受害者全体，反抗者仍大有人在）既是被迫地，又是自觉地（出于解脱自己的理性考虑）参与了迫害，成为无所不在的控制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革命地狱"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受害者理性地合作，这样的包括受害者自身在内的全民迫害，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它的罪恶之所在。

记得曾有朋友感叹中国没有"追随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妇女"（摩罗：《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但我读和凤鸣的回忆，特别是《地狱之行》那一章，却默默地对自己说：哦，我们有，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女人！写到这里，我的耳旁突然响起撕心裂肺的一声呼喊："我还是一个女人！天哪，天哪！"这是在那个月夜，和凤鸣向着"深邃寥廓的夜空"从心底发出的泣血的悲鸣（《经历》，201页）。世上有谁知道，有

谁想过，中国的女人，中国的右派的妻子，中国的无辜孩子的母亲，中国的女右派，背着怎样的重负，活得有多么的艰难？而她们又是以怎样的力量，承受着“由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无尽”的重压，挺住了一切！（《经历》，200页）和凤鸣开始了她的“地狱之行”：“啊，我来了。我从茫茫雪原中走来，从漆黑的夜幕下走来，从漫长死寂孤零零的小路上走来，从苦难重重的另一处走来。我疾步如飞地走向你。我的亲人，你如今在哪里？啊，亲人，我哭你喊你寻觅你，你可听见我肝肠寸断的呼唤？你究竟在哪里？你失去的我尚拥有，可它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你还在等我吗？我的亲人！”但寡妇的悲哭，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周围的人“无动于衷，一声不吭。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一句劝慰的话，也没有一个人对我的亲人的故世做任何说明性的介绍。我的亲人只不过是死了，饿死了，仅此而已。我坐在一个条凳上哭。他们沉默了一阵以后，继续做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也听我哭。痛哭的我仿佛同他们毫无干系。我也未向他们做任何发问，我敢向他们问明一切，让他们说个清楚吗？我不敢。”（《经历》，412~413页）。人的死亡因司空见惯而被冷漠待之，人的死因更是讳莫如深，这近乎麻木的沉默，正是那个年代中国政治生活最典型的表征。和凤鸣说，这“冰冷”了她“悲伤的心”（《经历》，415页），因此，她真正放声一哭，却要等到三十年后，1991年8月她再次来到这里时，“几十年来，为活活饿死的亲人痛哭，会认为是跟党记仇而不被允许，为极右分子的丈夫死去的痛哭，更被认为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会影响到我的生存、孩子们的生存。悲痛有罪！生离死别的痛楚，我一直苦苦地压抑着、强忍着。在自己家人面前，我还要忍耐、还要沉默地咽下这一切吗？不要阻止我的恸哭，不要阻止！”（《经历》，467~468页）。“不要阻止我的恸哭”，这一声呼号是惊心动魄的；在我看来，天下罪恶之大，莫过于禁止女人为自己蒙冤饿死的丈夫而哭泣。尽管本文中，一再使用“残酷”、“恐惧”这样的词语，——这是我读和凤鸣等人的著作最基本的感受，也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几代人最基本的生命体验；现在.我仍然忍不住要说，宣布“悲痛有罪”，连哭泣的权利也要剥夺，因为表示一点对亲人惨死的哀痛，就要危及自己的，以及孩子的生存，这都是把人性的残酷发挥到了极致，是真正令人恐惧的。但同时，这也正是一种极度虚弱的表现，反过来证明了中国女人的力量，她们的痛哭会动摇革命地狱的根基，那“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与寓言，使一切新老地狱的统治者永远不得安宁！

丈夫死了，妻子却活着。——我总觉得女人的生命力比男人更为坚韧。于是，中国的女人又有了“幸存者”的责任。和凤鸣的回忆中，多次使用“幸存者”这个词（《经历》，424页，458页，484页，488页，524页），她是深知“幸存者”这三个字的分量与责任的；牺牲者的生命及未及实现的生命理想，已经延伸到她的生命之中。但她更知道，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能听见并记住牺牲者和他们的亲人的“地狱里的哭

声”的（《经历》，424~425页），他们在自以为的“天堂”里活得如此的自在，已经觉得如果现在还要哭泣，就会破坏了他们的好心情，成为新的罪孽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健忘者，强迫遗忘者，和凤鸣这样的不肯、也不敢忘却的幸存者，就更感到了一种生命的重压。尽管丈夫的离去，“没能扶我一把”，她生活得十分的艰难，多少次发出“我好苦、好累哟”的呻吟（《经历》463页），尽管她甚至感到多年来的挣扎，“重新铸造”了自己的性格，早已是“铁石心肠”，很少动感情，很少流泪了（《经历》，465页），但她却永远不能把丈夫从她的生命中除去。她的景超留下了三样东西：“两套叠得平平整整的深灰色卡其布中山服，还有两件漂亮的带条的府绸衬衣”——他至死也期待着有一天“穿得体体面面，人模人样地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经历》，449页）；两本用他所特有的工整的笔迹写成的厚厚的日记——这是他生命的挣扎的忠实记录；还有他的对朋友，也是对妻子的最后嘱咐：“我出不去了”，“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一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写我们的“爱情”（《经历》，514页）。——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生命的，也是历史的命令。在“生死两茫茫”中，和凤鸣一刻也没有忘记，她的丈夫，所有的死难者，“在冥冥之中的召唤”。整整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她被梦魇般的记忆驱赶着，不停地写，“清泪如注，笔尖上流着滴滴鲜血”。她说，她要“把这一切如实的描述奉献给读者，是为了以我特殊的经历，让读者对这段沉重的历史有个较为深刻真切的感受。警示后人，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是我的最大愿望。”（《经历》，518页）

现在，这本血写的书，就放在我们面前。这位伟大的中国女人，用她那双黑色的眼睛凝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她的后面站着无数在那场民族灾难中倒下的受害者和挺过来的幸存者。我们再也不能回避，如果我们尚存良知和勇气；我们再也不能遗忘，如果我们还有信念与追求。我们必须和他们——死者和生者一起直面这沉重的历史，并思考一切，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2003年5月29日~6月4日

目录

钱理群□和凤鸣与她的《经历——我的1957年》
——“1957年学”研究笔记之二（代序）／001

现在，这本血写的书，就放在我们面前。这位伟大的中国女人，用她那双黑色的眼睛凝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她的后面站着无数在那场民族灾难中倒下的受害者和挺过来的幸存者。我们再也不能回避，如果我们尚存良知和勇气；我们再也不能遗忘，如果我们还有信念与追求。我们必须和他们——死者和生者一起直面这沉重的历史，并思考一切，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1.**获罪** ／001

1958年4月下旬，由兰州西去的一列火车上，乘坐着甘肃日报社新近被定为右派分子的6个人，他们原都是甘肃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其中一个年轻女性就是我了。

2.**初到农场** ／028

我在到农场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劳动，是到一个很大的羊圈里除粪，全部工作是把一个冬天积攒的羊粪铲起来，用木制的独轮小车推到羊圈外面，堆积起来做肥料。

3.**景超的来信** / 046

此次别离，我们互相叮咛，今后书信来往要密切些，一定要保持每星期一封，各自遇到了什么事情要在信上多说说，以后见面很难，心里的话只能在信上倾诉。但他的信一直没来。

4.**我们的演出活动及其他** / 060

这里没把我们当做打倒在地的阶级敌人对待，从当时全国的情况来说也许是一个特殊的例外，对我们蒙冤受屈的数百名右派分子来说，更是一种机遇。

5.**“瓜州”的瓜熟了** / 076

有一次，我伸展四肢躺在田间，眼望辽阔无际的蓝天，一轮红日当空，她望着我，我望着她，太阳好像俯身要和我单独说点什么，她面庞赤赧肥大，仿佛要听我诉说人世间亏欠我的一切，沟通点什么，抠出我心里的痛楚,抚平我的创伤，让我宁静快乐。

6.**狂热的安西** / 086

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十工农场声势造得很大，不仅在本场修建了小高炉群炼钢，不顾屡次的失败，仍以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继续大干……

7.**疏勒公社的出现** / 101

当了疏勒公社的副主任后，权大了，为了履行应尽的职责，他曾到小宛、双塔铺、九工等地蹲点检查工作，但他没有想到，不论走到哪里，呈现在他眼前的竟是一幅幅极为凄惨的景象……

8.**红火的演出与演出的夭折** / 117

排练日夜都进行，夜里便点上汽灯，大队部成了我们的排练场。

9.**我和小徐当了四大队的中队统计** / 130

又过了些日子，一件意外事情的出现，使我和小徐离开了畜牧组。一天，小徐告诉我，席组长行为不轨，他靠近她坐着，忽然把手放在了她的大腿上。席组长大概是试探性的，但小徐吓得不得了……

10.**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 142

来农场一年，我经历了的，都是以前所未尝经历过的，苦难的揉搓使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苦难也使我成熟。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凡在炼狱里受煎熬的，其苦熬苦度的酷烈程度，绝大部分都超过了十工农场的我们。直到数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此时的我们比起普天下的受难者来，真是太幸运了。

11.**1959年岁末的变迁** / 159

这只是一线曙光，这一线曙光因其人数太少而显得十分微弱，但总也是给闭合沉重的大幕掀开了一角。我的难友们谨慎而忐忑不安地注视着这一角里透进来

的有限的光亮，暂时还难以预料这有限的光亮会给我们这些受难者带来多少福祉。

12.**饥肠辘辘** / 173

她们最了解自己的男人，深知自己男人含冤受屈的痛苦。在当时的形势下，她们也只能企盼着有一天会苦尽甘来，自己的男人会重新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被称作“同志”，而不是什么“右派分子”。

13.**改造又升了级** / 186

从这平淡的字里行间，他一定是敏感地捉摸出这里的一切有了很大改变。

14.**第三次夏收时节** / 198

挨饿半年的难友，在麦田里都吃生麦子，站上的干部无法到每块地里监视，吃生麦子便成为不限量地补充食物的最好途径。

15.**我的亲人迁场到了高台明水** / 208

他属于在饥饿的煎熬之中既无外援，自身又毫无办法，仍保持着自尊心，不去偷偷摸摸，自寻生路的那种人，所以，他的处境至为悲惨。支撑着他活下来的，是他对未来尚抱有一线希望。

16.**口粮一减再减** / 218

此时，他们饥肠辘辘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而且更严峻的日子即将来临……鬼门关正在向每个人逼近。每个人都忧心忡忡，谁也不愿意等死！

17.**11月1日终于来临** / 233

有的人在饿死之前，还挨过管教干部的耳光。

18.**派我去“医院”烧炕** / 244

我肚子饥饿，已自顾不暇，但我不能忘怀我可怜的亲人，此刻的他肯定已处于更为悲惨的境地，他的状况怎样，我更不敢进一步去想。

19.**在最严峻的时刻（一）** / 259

如果当年把弟弟留在身边，留在水利部工作，他也不致在这个鬼地方送命。此时的傅作义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心中的悲伤真是述说不尽……这是他一生中干过的最追悔莫及而又无法挽回的一大憾事。

20.**在最严峻的时刻（二）** / 272

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一位老人的远途到来与死亡，惊动了全场的干部们。

21.**地狱之行** / 291

“死了！”这猛烈地轰击在心头的重击，立时使我觉得天昏地转。我嘴里喃喃着：“他死了，他死了！”半天竟哭不出来。

22.**回到兰州** / 309

大家看到我突然归来，都很高兴，但看到回来的只是我一人，心中已明白了大半。我哭着说出景超的噩耗，房子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

23.**三十年后的祭奠** / 331

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坟地里，我们寻寻觅觅，觅觅寻寻，翻起每一个可能写着死难者姓名的石头，看了又看。但30年的风风雨雨，30年岁月的剥蚀，已经消融了石头上的字迹，有些变得斑斑点点，有些踪迹全无。

24.**一次奇遇** / 353

这位难友的出现，无疑将会提供许多景超生前的、为我原来所不了解的新情况，这对于我真是太重要了。我真想立即见到他。

25.**尾声** / 365

我的难友们,不论从安西四工农场、玉门黄花农场回来的，还是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包括高台明水分站）回来的，我熟识与不熟识的，他们的右派问题后来全部改正，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回到人民的行列后，人人都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奋力拼搏，有的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有的则又在接踵而来的文革大革命中再次获罪，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附录 / 370

母亲的书就是对那段历史的回忆。尽管她选取的只是那个年代里的一个小小的画面，只是几亿中国人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可是她的书还是打动了许多读者的心，尤其是一些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或者没有她那种亲身经历的人，经常是边读边流泪，以至于泣不成声。

跋 / 372

读者的厚爱和鼓励，使我激动不已。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自述性报告文学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一个受苦受难、名不见经传的女右派，由此而有了知名度。

1 获　罪

1958年4月下旬，由兰州西去的一列火车上，乘坐着甘肃日报社新近被定为右派分子的6个人，他们原都是甘肃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其中一个年轻女性就是我了。我和我的丈夫王景超坐在一起，我们全都没有卧铺——确切地说，都已失去了享受卧铺的资格；火车长时间的颠簸，使每个人都十分疲惫。我紧紧地靠着他，斜倚在他的肩头上闭住了眼睛。在公众场所，我从未和他这样亲近过，现在，我还想跟他更亲近一些，因为我们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却将劳燕分飞。偶尔袭来的睡意总是瞬间就消退了，我哪能睡着呢。我们相聚的时间没有多少个小时了，到了酒泉，他就要下车，当时报社要他去劳动教养的地方是酒泉夹边沟农场。作为报社的头号大右派、极右分子，他已被开除公职，报社已与他一无干系。他将怎样走完他的人生之旅？我们将怎样从我们共同的苦难历程中拔步行进？此时，我们都没有想它，我们也很少说话，一切都在默默无言中。但我们是多么珍惜这最后相聚的20多个小时，如果我们知道这将是我们生命历程中相聚的最后20多个小时，我们将会怎样充分地使用这20多个小时的分分秒秒！啊，变幻莫测的人生，难以逆料的生离死别！

1957年春天的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

才刚过去的1957年夏天，风雨如晦，我们在未能逆料的政治风暴中遭了难，共同的罪名将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我为他蒙受的奇冤和屈辱痛苦得心都碎

了，他由于我是受他牵连被划为右派分子而悲叹不已，我们被打成了一个右派小集团，还被起了个不太美妙的名字——“黑社”，我被划入“黑社”，完全是由于我是他的妻子。

1957年5月下旬到6月初，我曾随甘肃代表团到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馆，全报社去了农村部的副主任曲鹤云和我两人。在那个年代能去北京很不容易，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所以能去，是因为那一时期我在工作上表现突出，我在《甘肃农民报》主持编二版，在农民报内部红旗竞赛中，二版屡得红旗，我个人也被评为先进，奖励了一支浪琴牌钢笔。《甘肃农民报》是甘肃日报社的一个部门，接受甘肃日报社编委会的统一领导。

我这是生平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心情格外激动。让我欣喜的是，景超1951年在庆阳报道土改时认识的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杨允文，也出现在代表团内，我们已是老熟人了。我们到了北京住在西苑大旅社后，第二天随团参观，开始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大开眼界。两三天后，虽觉得每个展室都有新套套，但心里急着想到北京有名的景点去玩玩看看。北京还有我兰州女中的几个同学，一定要见见面。而参观的日程安排很紧，几乎没有多少闲空，这样，后来便不得不放弃有些参观自由活动了。和我同来的农村部副主任曲鹤云，是才从县上调来不久的党员干部，我们原来接触极少，不熟，要自由活动得有个伴儿，最佳选择便只能是杨允文了。杨允文也是首次来北京，和他在一起，他口口声声说我是他“好友的妻子”，我们拿着北京游览图找故宫、天坛、颐和园，他总能很快找到，并弄清应坐哪路的公共汽车就能到达。在颐和园，我们租了小船，荡舟在昆明湖上，是他自由挥动着木桨，我们在岸边杨柳依依、风景如画的昆明湖上流连了两三个小时。我要找同学，有的同学住在胡同里，北京胡同如蛛网般，进了胡同，我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但他分得清，并能耐心地询问，帮我一定找到。记得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刘昆的宿舍，就是经他帮助找到的。刘昆的爱人束沛德出差在外，我在她家住了一夜，畅叙别情。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还一起到北海公园走了走。找到了在中央气象局工作的党贻，当晚她还带我找了住在附近的于沪生。于沪生在北师大俄语系毕业后，分配在马恩列斯理论编译局工作。当时，北京正有大量的荔枝上市，每斤三毛五，物美价廉，我平生第一次吃杨贵妃吃过的鲜荔枝，真是吃得惬意极了。党贻当时还没结婚，我和她在大宿舍同睡一床，第二天她上班，我自个儿回了西苑。

在北京，我们也和报社在京的二位同志见了面。第一位是副总编辑叶滨，当时他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听说我们在西苑大旅社住，他特意赶来同我们见了见面。第二位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的杜修文，他是工农干部出身，陕北人，是我和曲鹤云去学校找的他。当时已是晚上，林希翎正在什么地方发表演说，杜修文不屑地说及

此，显然很反感。当时，我们尚不清楚林希翎何许人也，没有说什么看法。

在参观农业展览馆期间，各省的代表团还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一起照相。我们得到这一信息，非常激动，一直在急切地等候安排。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上午通知大家不要外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要接见。10时左右，大家坐车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前，草坪上早已摆好了呈半圆形阶梯式的长凳。甘肃代表团因为有少数民族，我们的团长就是回民，是民政厅副厅长马淳靖，照相时受到优待被安排站在最中间，女同志站前排。我的前面就坐着周恩来，左侧前方是毛泽东的座椅。此时的中央领导人大都五六十岁，他们的面色红润健康，显得都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十分和蔼可亲。当周恩来来到我面前将坐未坐之时，我真想伸出手去和他握手，因接见前已有叮嘱而作罢。领队曾告诉大家，如果毛主席、周总理同每个人都握一下手，他们的手会握疼的，最好不要主动和他们握手，我就听话地没有伸出手去握。

在我们来北京之前，5月1日，中共中央已在报上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闻风而动，连续配发社论，鼓动知识分子及各民主党派帮助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我对这一运动，尚未在意，没放到心里去。及至到了北京，对整风这样的国家大事早已置诸脑后，报纸当然是不看的。到我们临离开北京时，《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已发表，中共中央已公开发出了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号召，我仍浑然不觉，根本没有意识到反右派跟自己会有啥关系。

从北京回来不久，报社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在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中，我都积极参与，对党的号召积极响应。此次领导上号召帮助党整风，我仍真诚地响应号召。此时，《甘肃农民报》的总编辑薛剑英、副总编辑流萤，我们原来相处都不错，工作上合作得比较协调。特别是流萤，他脾气好，我学画版样都是他手把着手教的；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愿意向他讨教，同他商量。可是，1954年，宁夏同甘肃合省，从宁夏来了个女同志×××，也被放在了副总编辑的位置。此人资格比流萤老，贫农出身，也曾是大学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她原来在宁夏一直搞妇联工作，不懂新闻，她的丈夫××，原为《宁夏日报》总编辑，来甘肃后，被任命为《甘肃日报》副总编辑。不知为什么，×××来甘肃后，愿意改行搞新闻，就安排到《甘肃农民报》当了副总编辑。我从1952年开始独立编版，已能独当一面。×××作为副总编辑，每期报纸的大样，她都要过目审阅。但是，作为新手，看大样时常常出错，通顺的句子，她会改得不通，有些政策问题的提法应十分确当，经她改动一两个字，就变得似是而非。我作为二版的负责人，对于由她审阅大样感到非常为难，对她改过的大样，我们如有不同意见，认为改错了或有不确当处，会与流萤改过的大样作出对比，向她提出："流萤在这儿没改"或"流萤的看法"如何如何，我们原本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

是想借流萤的名婉转表达自己的看法。谁知，不提流萤则已，一提流萤，她立即火冒三丈："那你们去找流萤，不要找我。"流萤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使她嫉恨不已。这样，两个副总编辑之间，就有了嫌隙。绝大多数人的同情都在流萤这边，她意识到此，心中就更不悦。在动员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的时候，我共写了5张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是《向×××同志进一言》。我认为×××与流萤的关系已影响到工作，举出一二事实，说明其责任主要在×××方面，×××本人应有所改进。第二张大字报题目是《请公开宣判》，这完全是一张替别人鸣不平的大字报。整风期间，农民报的王维新发牢骚说："老薛（指薛剑英）和我个别谈话时，说我反党反领导，我到底把谁反了？"陈雪鸥在整风前也曾一次流着眼泪私下和我说："领导上曾让我交代反党反人民的问题，我哪有这些问题，我又怎么能交代得出？"整风中我学习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我认为王维新、陈雪鸥都是好同志，他们怎么会"反党、反领导、反人民"呢？一定是农民报领导上"左"了，没把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精神吃透，王维新、陈雪鸥也可能因说话不注意，得罪了个别领导，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在这张大字报上我摘要引用了他们的原话，然后质问："他们到底反了谁，请农民报的领导公开宣判！"另外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和潘玉军合写，一张是王维新所写，我签了名，这两张大字报都是指名针对农民报个别党员工作或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写的。第五张大字报写了些什么内容，我已完全忘记，肯定无甚要紧。在鸣放的讨论会上，我发过一些言，至今仍认为很一般。但×××听取大家的意见很不冷静，强词夺理。我当时认为她很不虚心，心里不满。此时已到了6月下旬，×××作为××的妻子，对毛泽东、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已心中有数，而且清楚新闻单位是重点，所以，她没有必要表示虚心。可我一直浑然不觉，懵懵懂懂，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右派分子。

此时期的景超，在编辑部也备受尊重。在我去北京前，中共甘肃省委召开文教工作会议，由4月13日到22日，邀集党内外人士450余人热烈讨论谈心，传达毛泽东在2月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请大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了会议。报社根据会议要求，除了派文化部副主任杨康参加，也让非党的景超去报道。

景超在会上听了毛泽东在两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拿回了讲话原稿，在会上听了大家的讨论，很受教育，很受鼓舞。会议结束，他写了3000多字的会议消息，其中的小标题是：1.放得羞羞答答，鸣得吞吞吐吐；2.要在鸣和放中来比好坏，求真理；3.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只能以理服人；4.党外人士为何不能畅所欲言？5.克服党内外的宗派主义；6.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钥匙，去开人民内部矛盾的锁。

这篇会议报道，刊登在4月24日一版头条，并配发社论：《大胆地“放”，大胆地“鸣”》，社论由杨康写就。

这次会议对推动全省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意义重大。编辑部有些人认为，会议消息写得生动活泼，真正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我去北京后，报社领导上急于改变报纸的面貌跟上形势，特意找了些思想比较活跃、写作能力强的编辑记者谈话，动员他们写杂文，景超就是动员的对象。经一再动员，景超写出了第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此文正是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以尖锐犀利的文笔，对“经常靠‘行政手段’”制服人的种种现象，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发人深省。此文由文化部发到了总编室，值班副总编辑樊大畏读后大喜过望，三版编辑将文章加花边发头条，樊大畏仍嫌不够醒目，嫌标题用铅字排印不突出，让三版编辑找到景超用钢笔另写了标题制成锌版于第二天（5月26日）见报。此文见报后，首先在编辑部引起大家的关注，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认为杂文针砭时弊，说到了点子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总编室按甲等稿发了稿费。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促使他连续又写了两篇杂文：《为“三脱”干部叫屈》、《关于“抵触情绪”》（此篇未见报）。

此后，编辑部召集党外人士座谈，由副总编辑××主持，××满脸堆笑，一次又一次地口称“景超”，动员景超发言。此时，毛泽东关于“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指示，已在半个多月前向党内少数人通知。6月8日，毛泽东又再次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文中开宗明义地指示：“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同时表示要组织人们继续“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满脸堆笑动员景超发言，正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的意图。这就是“引蛇出洞”的决策。但，景超不知道。在省文教代表会议上，他对毛泽东的两次重要讲话深信不疑，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风向已经变了。所以，经××一再动员，他也畅快地说了说。其实，他的《为“三脱”干部叫屈》的杂文，于6月5日在报纸上发表时，就已内定为毒草，他浑然不觉。

7月中旬，我仍到武山县文家寺采访。这是我两年来常去的点。采访中，我心情愉快，发辫上系着从北京带来的漂亮发带，有个年轻技术员开玩笑说我：“洋气！”我不以为意，还高兴地辩解几句。下旬，接到领导要我回报社参加反右派斗争的来信，我立即搭火车回兰州，一路上也没有大祸临头的任何预感。

下了火车，回到家里已是深夜。景超已上床准备睡觉。一路坐火车我已很累了，也很快上了床。等我睡到身边，他才镇静地告诉我：“报社搞出了个右派集团，叫黑社，黑社

头子就是我。”这一晴天霹雳，把我吓懵了。我们彻夜未眠。

他详细地告诉我这些天开斗争会的情况。报社领导知道他性格刚强，能言善辩，绝不会轻易地束手就擒，一开始就召开全报社200多人的大会斗争他，而且一鼓作气，连续斗争，以后每天都是100多人的斗争大会要他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被认定的罪行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他写的三篇杂文都成了大毒草；二是他在报社动员鸣放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三是组织右派小集团“黑社”，身为“黑社”首领。

景超写杂文完全是由于领导上的动员。毛泽东大骂《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十一次扩大会议之后“无声音”，是“死人办报”。他的批评也是针对所有的省报的，并提倡写杂文，改进报纸文风。报社领导们紧紧跟上，为急于改变报纸面貌，改进报纸文风，才动员景超写杂文的。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杂文难写，写不了，景超知难而上，写出了当时具有轰动效应的杂文，放三版头条，发甲等稿费，而后才有了第二篇、第三篇。此时，三篇杂文却都成了大毒草，谁能想到？谁能想得通？这里单对未曾见报的《关于“抵触情绪”》一文先略作介绍。此文有一段写道：“前二年，某单位的党员负责同志，曾在大会上公开称：‘你们再不要说党员也有某种缺点，党员拔下一根汗毛，都比你们的腰粗！’试想，如果对这种狂妄自大、自吹自擂的宗派主义者，会不引起‘抵触情绪’，倒是难以理解了。”文章提到的事实，正是发生在甘肃日报社内，说此话的人在60年代已擢升为报社副总编辑。报社初创时期，景超曾同他大吵过一次。当时实行供给制，为照顾记者采访，给记者每人发了一支金星钢笔，不知何故，未给景超发。当时，他主管此事，景超找去问他，就争吵起来，闹了个不愉快。作为领导的他，此后就到处散布景超的坏话，影响到以后的职称评定及工资等问题。这位领导人，陕西人，文化素质较低，平日里说话总爱带上个“他妈的×!”亲近他同他气味相投的人对此不以为意，有时还会引起哄笑。编辑部的人对他就另有看法。且说景超在杂文里未指名揭出的事实，正是他一次在礼堂讲话时当众说过的话。此类事实，也正是毛泽东动员整风，要求大家揭发的内容。可是，这种证诸事实的杂文，因为景超成了右派，就也成了大毒草，其揭发出的事实便不再成其为事实了。

现把《略论“行政手段”》全文录之如下——

中国古语有云：以理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而经常靠“行政手段”以服人者，是不会不带点“霸”味的。

所谓“手段”者，欲达目的之方法也；而能够凭借行政手段以服人的，只能是一些行政领导人物。这里无意一概否定行政手段；所欲反对者，不过只是用以“服人”的行政手段而已。我没有作过调查，不知道爱用行政手段以服人的人，究竟基于什么原因，都是些何等类人？但推之于理，证之于耳闻目见之事实，这

种带着“霸”味的人，多半是傲于“资”，而又疏于“德”、“才”的！

说这些人傲于“资”，是因为这些人多半是专靠老资格吃饭的人。他们平日既懒于学习理论，又懒于钻研业务，觉得不管怎样，反正总有他们一碗饭吃，总有他们的“官”当，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刻苦学习呢？他们以党自居，觉得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他们自己也便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了；他们觉得党能领导一切，自己当然也能领导一切，服从是别人的义务，让别人服从是自己的权利，具体工作反正有被领导的人去作，自己只“掌握原则”、“发号施令”就对了！老资格使得他们心饱肚塞，几乎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用行政手段服人，当然也最适合这些人的身份！

说这些人疏于“德”，是因为这些人并不把党的事业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些，这主要表现在对群众的看法，和对待群众的意见的态度上。他们唯我独尊，当然不会承认群众有长于他们的地方，当然也不会承认群众能见到自己所不能见到的地方，所谓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在他们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遇到不同的意见，他们并不考虑对工作如何，对革命事业如何；考虑的只不过是看别人的意见是顺着自己还是逆着自己，是有益于自己的尊严还是有损于自己的尊严罢了；他们提倡“愚忠愚孝”思想，喜欢“愚忠愚孝”的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于是，品质恶劣的人乘机钻营，形成“君子封口，小人得势”的局面，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再找不到真正的是、非！他们总是以“片面性”责人，批评别人只看缺点、不看成绩，而他们也总是以片面性护己，因为他们自己永远是只看成绩、不看缺点的！他们不愿意理解发现并消除缺点，正是自己的责任，而唯恐别人湮没了他们的丰功伟绩。说这种人疏于“德”，亦不为过矣！

说这些人疏于“才”，也并非“恶语中伤”。所谓“才”者，不外乎指以马列主义知识处理工作的能力，即指业务能力也无不可。这些人既然以为有了“资格”，就可以换得在今天必须用劳动才能换得的一切，因而优哉游哉，蹉跎岁月，无所学而无所知！在他们的口袋里，除了几个老教条和几顶大帽子，别的本钱就不多了，以至遇真理而不辨，遇善言而不听。对于自己不喜欢的意见，欲说之而无词，只好继之以“压”，于是行政手段便出来了，这便是一大堆帽子，如“不尊重领导”、“骄傲自大”、“不按党的意图办事”等等。只此三言两语，便噎得提意见的人瞠目结舌，欲语无言！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爱用行政手段的人，多半是在自己的“德”、“才”不足以服人时，才搬出行政手段来的。对党的十六字方针，这些人会特别感到不舒服，因为这个方针迫使他们和同志采取平等的态度，迫使他们丢掉老教条和大帽子，认真去学点东西，动动脑筋，改变“光靠党的威信吃

饭”的没出息思想，丢掉“我即是党”的臭架子，踏踏实实地去做些工作。所以，这不仅对“老资格”有好处，即对于那些并没有什么老资格、而也有些“霸”味的新提拔起来的小领导者，也大有好处。因为老的苦学，新的也就不便于光指手画脚了！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在此形势下，许多社会弊端得以暴露，靠老资格发号施令，用行政手段以服人者，大有人在。朱正对此有一段鞭辟入里的评论，他说：“他们，是在战争、土地改革，各种秘密工作中获得足够的革命资历的，革命就把这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当做对他们过去功绩的酬劳，却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领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专业知识的训练。”“一个领导人应该懂得他所领导的专业，这应该说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而事实上，这些被安排在领导岗位上的党员，有不少并不具备应有的专业知识。”①

《略论“行政手段”》一文，指出这些“专靠老资格吃饭的人”，“他们平日既懒于学习理论，又懒于钻研业务，觉得不管怎样，反正总有他们一碗饭吃，总有他们的‘官’当，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刻苦学习呢？”“他们觉得党能领导一切，自己当然也能领导一切。”“老资格使得他们心饱肚塞，几乎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用行政手段服人，当然也最适合这些人的身份！”景超是满腔热情地从帮助党整风，期望党改进工作作风，让“专靠老资格吃饭的人”及“新提拔起来的小领导者”都刻苦学习，在领导的岗位上胜任工作，以适应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新要求。

但是，批判他的文章，却说他这是要求“靠党吃饭的下台”，“靠老资格吃饭的滚开”！断章取义如此，歪曲事实如此！一个被打趴在地的人根本无法作任何辩解。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官本位”、“论资排辈”大加挞伐，砸碎铁饭碗已在全国付诸实施。这一切的举措都说明靠老资格吃饭当官，已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现再把《为“三脱”干部叫屈！》全文录之于下——

所谓“三脱”，就是脱离组织、脱离领导、脱离群众。

没有一个同志（注意！这里说的是同志），是不想靠拢组织、接近领导的。但在不少单位，确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被视为“三脱”之类人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注意了。这些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些人呢？平心而论，他们只不过嘴上不大讨人喜

①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538页。

欢罢了。如果说他们“仗义执言”，未免夸之过分；但是，如果说他们是由于看不惯工作中或某些领导人身上的缺点，而偏爱“发发牢骚”、“提提意见”，却倒真是事实了。当然，这些人不可能不和一般人一样，自己身上也多多少少总有着某些缺点，如“偏激”、“片面”、“不讲究方式方法”、“小资产阶级情绪”等等，因而往往“言不中听”、“出语刺耳”，这就招了某些领导人之忌。在某些单位里，要求盲目服从领导的风气，是确确凿凿存在着的，这些领导人只承认一个“道德标准”，那就是“盲目服从”。凡是不合乎这个标准的人，便被列为“改造对象”，直到你合乎了那个标准！试想：百花尚野谷争艳，何况人乎？即历千秋万代，人们也不会合乎一个模子，更不会合乎“盲目服从”的模子，所以这“三脱”类人，实质上是被某些领导者当作“外人”而排斥的人！

或曰：“君何危言耸听耶?!”当然，这些话在某些人听来，是会感到刺耳的。但，刺耳由它刺耳，当说我自说之：在这次大鸣大放的民主浪潮里，许多党外同志对组织上、领导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许多意见就直接关系到这个问题。人事部门一般既代表组织，又代表领导；人事干部本来应该是革命同志倾心倒肚的知己，帮助、教育、团结党外同志的长上，但许多意见都说人事部门是个“特殊组织”、“独立王国”，令人心存戒意，敬而远之！何以党的威信齐天，而某些人事部门的威信却“平地”呢？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与那个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道德标准”不无关系吧？以一个模子要求人的人，是不可能不偏听偏信的，于是经过他们的手，终于画出了“亲生”与“后养”的界线。尽管“亲生”的未必个个争气，但他们是贯彻“领导意图”的依靠，是“领导威信”的维护者，思想“进步”，所以处处顺利，事事如意。“后养”的即便勤勤恳恳地做了工作，敢于本着革命良心，大胆提出工作中的弊病与改进工作的意见，但终因隔着一层肚皮，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拂灰尘，到头总难免不落：“从个人情绪出发”、“劳动态度不好”、“和领导上讲价钱”之类的责骂！于是，犹如风助火势，“亲生”排斥“后养”的现象，在下边便愈演愈烈；未必作了工作的人，可以指手画脚地骂人；而真正作了工作的人，倒忍气吞声地挨骂，哪里还能分出是非，辨明黑白？组织上这种不是“相引”实乃“相斥”的态度，让人怎么去“靠拢”呢?!

一旦被扣上了“脱离组织、脱离领导”的帽子，是急切翻不了身的！对组织上、领导上犹靠之不拢，遑论群众？领导上影响群众，让群众鄙视他、冷淡他，他们再也找不到知心人，听不到知心话，或由自卑而消沉，或由气恼而孤傲，被禁锢在精神囚牢里，岂能不脱离群众?!

应该说，这些同志绝不属于所谓“消极因素”，其所以外表消极者，盖因含

冤受屈故也。写到这里，我要“反话”“正说”了：这些同志并非真的脱离了组织和领导，而是组织和领导上脱离了他们！所以我才敢于为“三脱”干部叫屈，并吁请以“盲目服从”的道德标准要求人的领导者，抛弃这个标准，而以马列主义的是非观点对待所有的同志！

《为“三脱”干部叫屈》一文，指出有些领导人喜欢“盲目服从”。“凡是不合乎这个标准的人，便被列为‘改造对象’，直到你合乎了那个标准！试想：百花尚野谷争艳，何况人乎？即历千秋万代，人们也不会合乎一个模子，更不会合乎‘盲目服从’的模子，所以这‘三脱’类人，实质上是被某些领导者当作‘外人’而排斥的人！”

后面还提到人事部门工作中的问题，指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与那个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道德标准’不无关系吧”。

有些人“即便勤勤恳恳地做了工作，敢于本着革命良心，大胆提出工作中的弊病与改进工作的意见”，而“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拂灰尘，到头总难免不落：‘从个人情绪出发’、‘劳动态度不好’、‘和领导上讲价钱’之类的责骂！”

景超对“盲目服从”、“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拂灰尘”、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弊端的挞伐，文笔犀利，点到了要害处。就是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以上弊端仍以各种新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时对此文的批判，主要指出：“其主旨是为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喽啰争取合法地位，为他们争取群众，为他们打气撑腰，为他们‘控诉’，为他们向人民‘倒算’！”22年后，景超和众多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平反，此说当不攻自破。

敬爱的读者看了以上两篇杂文的全部内容，一定会认为两篇杂文是针砭时弊的好文章，文笔犀利，针对性强。就是放在当今社会，其针砭的意义仍不乏其应对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好文章，在反右斗争的形势下，竟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景超遭此诬陷，有口难辩，真是冤哉冤哉！

景超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在斗争会上，当然被认定为喷着毒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故作亲切，堆着满脸笑一再动员景超发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再说所谓的“黑社”，完全是总编室主任、编委委员×××一手制造出来的。总编室的杜绍宇，同景超1951年在庆阳地区报道土改时结识的挚友王思曾是小老乡，都是河南灵宝人。王思曾原来也是西北大学的学生，来甘肃后在青年团甘肃省委做秘书工作，此人对团省委书记×××的工作有看法，提意见很刺耳，说“我对×××的工作作风深恶痛绝”！×××对他自然认为可恶之极，在1955年肃反时搜罗“罪证”，将他定为坏分

子，并把他周围的一些人定了个落后集团。王思曾于1952年主持创办《甘肃青年报》，带了一帮人在《甘肃农民报》学习过，和我及农民报的有些人也非常熟悉。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个好同志，不是坏分子。到1957年鸣放开始后，王思曾另一个小老乡靳赞哲，和杜绍宇熟悉，对王思曾定为坏分子更是愤愤不平，他找到杜绍宇表示，即使他本人丢掉工作也在所不惜，他一定要为王思曾鸣冤叫屈，力争使王思曾定为坏分子之事得到解决。景超原来和杜绍宇来往不多，但杜绍宇知道景超和王思曾是挚友，对王思曾定为坏分子极表同情。在此时期，他们之间就有了些来往，杜绍宇还把靳赞哲带到我们家，商量如何为王思曾翻案，靳赞哲答应回去后先写材料。杜绍宇为王思曾翻案之事来我家几次之后，适值鸣放期间，也和景超一起对报社的有些事作过议论。反右斗争开始后，杜绍宇因为得罪了×××，先在总编室受到批斗，在交代问题中说到同景超有来往，×××立即敏锐地意识到大鱼是景超，而非杜绍宇，经过同总编室副主任××诱供逼供，硬是让杜绍宇供出了个“黑社”，网罗了编辑部5名右派分子。为坏分子王思曾翻案，成为杜绍宇、景超和我3人的共同罪行。

我奉召回到兰州的第二天早上，仍换上了雅致素净的裙装，穿上了从北京买来的浅黄色半高跟皮鞋，踏上宿舍不远处的大台阶，向南拐个弯，走向编辑部大楼。在一楼的过道里，我看到了向“黑社头子王景超猛烈开火”的好几张大字报，也看到一两张大字报要我揭发黑社头子王景超，指出我也有反党反领导的言行，必须低头认罪，还质问我在鸣放期间为什么同黑社头子王景超表现那么“一致”？此时的我，已经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只是想应如何面对现实，对付这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灾难。我仔细地逐一看完了批判景超和我的大字报。左一个“反动透顶”、右一个“猖狂向党进攻”的批判用语，令我目瞪口呆，我绝难接受如此的现实，心底涌出阵阵悲凉痛楚。

当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二楼的办公室里，办公室的墙上还贴着红旗竞赛的报表，二版的格内扎着好几个用大头针做的小红旗。这是对我的工作成绩的肯定。我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到四楼会议室开批判斗争会去了，斗争对象就是景超。

景超和我都无法改变这个冷酷的现实。

景超每天经受一二百人的批判斗争已经有些日子了，奇怪的谬论，无与伦比的谎言，被当做批判他的重型炮弹不断地猛轰。我坐在报社定做的考究的皮靠椅上，沮丧，难过，六神无主，耳边时不时地传来四楼会议室里发出的众多的喝骂声，叫喊声，虽说听不真切，集中猛烈的火力都是对准他一个人的。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准了无辜的他猛轰不止，他就是有一百张嘴也难以为自己辩护说清问题。天哪，这些天来他的精神一直在经受着怎样粗暴的蹂躏？

他曾顽强地据理力争，想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但这样的斗争会岂能允许他为自

己说话？全国在册的55万多右派分子又有哪个未曾试图为自己辩护过？但他们连张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啊！终于，一次次的狠批猛斗，使他脸色苍白无以答对，心神困顿到了极点，一二百人的吼叫詈骂，逼迫他不得不按照“组织上”和“群众”为他限定的思路编造低头认罪的谎话，说自己思想反动，干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径。不是因为软弱，更不是由于虚伪，他才违心地编造谎话，臭骂自己。他对于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万分委屈，根本无法接受。而当时无论他或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运动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怀疑，我们仍崇拜中国共产党，对于反右斗争在内心深处虽有不解之处，特别是对把自己打成右派根本想不通。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我们，对于通过新闻渠道传播的整个运动的进展情况都深信不疑，绝没有想到其中会有什么虚假。诸如《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原国民党少将，在鸣放中说，“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云云，我们绝对地相信都是真的。我们想，北京出现了“章罗联盟”，像葛佩琦这样“反动透顶”的人物都跳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不反击能行吗？哪里知晓，葛佩琦曾致函《人民日报》要求更正上述不实之词；哪里知晓，葛佩琦是1938年的老党员，解放战争期间，他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以国民党“少将督察”、“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出入虎穴，不断取得国民党军队的绝密情报，通过电波发往延安，功绩昭著。我们更无法预料，葛佩琦在反右后被判处无期徒刑，经历了18年的铁窗生涯，滑稽的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被特赦。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胡耀邦亲自批示，几经波折，到1983年沉冤也得以大白。[①]历史向葛佩琦开了一个残酷的政治玩笑，全国人民被愚弄，我们也成为被愚弄者。

一直有着党内“英才”之称的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按照中宣部的决定为复办《文汇报》奔波的原《文汇报》负责人徐铸成，曾几次向邓拓讨教，同邓拓一起对《文汇报》的办报方针进行磋商。徐铸成1989年在《国情研究》创刊号发表的《“阳谋”——1957》一文写到邓拓时还说：“他目光远大，着眼在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一位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进人物。”而我们已知，反右斗争的发端，始于《人民日报》6月8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两篇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先后发表，指导了运动的猛烈发展。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把邓拓和《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和编委找去，对于《人民日报》响应双百方针不力，曾予痛斥：“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过去我说

①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毛泽东还对邓拓说：“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①]彼时，邓拓只能接受毛泽东的批评，立即跟上。此时，多次受到毛泽东表扬的非党报纸，又经毛泽东认定其大方向是资产阶级的而被全盘否定，毛泽东对反右斗争的坚决态度，使邓拓又不得不再来个180度的高速大转弯，他仍只有服从的份儿。以1957年的大气候，邓拓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服从。

强大的政治压力，委屈自己的感情违心地承认已被认定的右派身份，又使我们痛苦莫名。

“右派右派，妖魔鬼怪!”这流行一时的歌曲，常常在街头巷尾、斗争会上由群众高歌，在广播和扩音器里响亮地播放，时不时地撞击撕扯着我们流血的心。曾几何时，我们都成了“妖魔鬼怪”。在公众场所，在斗争会上，右派分子们还得做屏息凝神静听默思状，以表示自己真是“妖魔鬼怪”，这个玩笑真是开得太大了。在1957年的中国，我们对自己被歌为“妖魔鬼怪”，只能表示衷心悦服，个中的辛酸痛苦，真是一言难尽。

是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此，他于1956年冬到1957年春，巡视游说于大江上下各大城市及京津等地。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均被召集济济一堂参加此会议，毛泽东亲自莅临作长篇报告，动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开幕了，其目的还是为了贯彻“双百”方针的实行。1957年“五一”前夕，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毛泽东召集了首都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及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开座谈会，他兴致甚好，谈笑风生地再一次动员在座的代表们参加党的整风运动，帮助党整风。毛泽东选择了这个时刻在天安门城楼上开导动员大家，也是对知识分子们优礼有加的又一次表示。这些知识分子们当然是积极响应的，把伟大领袖的心意带回去，影响于他们所能施加影响的阶层、范围，尽力扩散于亲朋好友之中（这种响应，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被认定为点火、放火）。

毛泽东运筹帷幄，很快在全国打开了局面，后来被他称之为“阳谋”的奏鸣曲，就这样在全国响起。

500万知识分子解除了各种思想顾虑，凭着一腔热血，满怀忠诚，参加到鸣放的行列里，帮助党整风了。但是，到5月15日，毛泽东已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迅速指出了右派的“猖狂进攻”，“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景超的第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发表于《甘肃日报》已是5月26日，毛泽东关于《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已下达，但只在极小范围内传阅，连

①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7~48页。

担任《甘肃日报》副总编辑的樊大畏亦不知晓！不然，他就不会兴奋地将此杂文放在醒目的三版头题当作针砭时弊的好文章予以披露。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此社论尚未充分表达出毛泽东此刻运筹于心中的全部谋略与内心情感，他情不可遏地连续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进一步将这场斗争迅速推向前进，在全国猛烈开展起来。社论声称："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这就是所说的"引蛇出洞"。在人民群众的队伍里采取如是手段，硬是多方动员人发言，然后以言定罪，找出一大帮（55万多）"牛鬼蛇神"坚决打倒，现在已成定论，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对的。在反右斗争中强迫右派分子"从思想上"承认自己就是"妖魔鬼怪"，就是"牛鬼蛇神"，才可以说是有了好的认罪态度，才有可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种对右派分子人格上虐杀，精神上残酷折磨所采取的手段，显然是违背中国共产党历来的宗旨的。据薄一波后来回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肃反"，"新式肃反"，是"清党清团的好机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①。所以，他虽也说过对右派分子"不予办罪"的话，到了反右斗争后期，不少地方不少单位还是逮捕法办了一批右派分子。

在甘肃张掖地区，一个在1943年就参加了甘南农民武装起义、担任起义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刘学琨，当时身背《矛盾论》、《实践论》手抄本，供起义军领导人刘鸣（他的六叔）阅读。起义失败后，他在1947年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接着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为了迎接解放，冒着生命危险，几次死里逃生，为党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反右斗争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判了刑。1961年4月27日死于安西十工农场。

话再说回来，在1957年的中国，毛泽东称右派分子为"牛鬼蛇神"，右派分子就得承认自己是"妖魔鬼怪"。1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刊出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信号，此时中国人民对"牛鬼蛇神"的用语已觉习惯。对于1957年的普通中国人民司空见惯的事，我们由于自己成了"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内心的痛苦难以用语言表述。

我挨斗是在回兰州一周之后了。在原来十分熟悉、非常友好的同志们面前，自己忽然成为敌人置于被审判的地位，垂手恭立，接受斗争批判，这种难堪、羞辱，这不许申辩的委屈，使我立时就想死在这些人的面前，作为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啊？当我固执地想着去死时，一闪念又想到，如果我死了，他一人孤零零地又如何承受这一切？俩孩子又怎么办？这是个规模不算大的斗争会，只有20多人参加。会上，对

①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向×××同志进一言》的大字报，批判说我是挑拨×××和流萤之间的关系，破坏团结。对《请公开宣判》的大字报，×××则愤怒地指出："陈雪鸥家庭出身反动透顶，她本人和家庭划不清界限，心理阴暗，领导上说她反党反人民，你为什么要替她说话，你这是和她站到了同样的反动立场，借整风之机，向党射出了进攻的毒箭。"以上两张大字报，是会上火力猛攻的重点。还有人发问："王景超的三篇杂文，表现出他多年来对党的刻骨仇恨，字字句句都喷溅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液！你在整风中时时处处都和王景超表现一致，你交代，王景超是怎样和你一同商量写那三篇杂文的？"景超写三篇杂文及杂文的刊出，都是我在北京参观期间发生的事，我当然无从交代。众人的吼叫，绝不讲理的说理斗争，经受这样的百般凌辱，活着真比死去还要难，难得没法比。

景超知道我挨斗以后，显得比我还要难过，因为他最知道挨斗的滋味。他年轻娇弱的妻子遭此横祸完全是受他株连，他怎能不心如刀割！他用双臂围住了我，悲伤地柔声说："他们为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啊？为什么？"悲伤使他声音喑哑，我的心颤栗了。从我们相爱直到婚后，他对我有过几个爱称，但从来没有亲昵地唤我"小娇娇"，这个呼唤说出了他对挨斗的妻子的无限怜惜、无限疼爱，他恨自己把亲爱的妻子拖入了痛苦的深渊，受尽凌辱，心中内疚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他想说出自己内心的愤怒和抗议，而对于外面那个严酷的世界，他又什么话都不能说，不能说！已被狂虐的政治风暴打倒在地的他，为自己无法保护妻子而痛苦不已，这痛苦胜过了他自己挨斗。

在挨批斗的最初的日子里，我不能不想起自己满怀革命激情参加工作的情景。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生于兰州。我从小爱读文学作品，读书多。到上高中三年级时，由于地下党和进步同学的影响，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革命书籍，如《大众哲学》、《社会发展简史》等，还读到了从解放区传来的赵树理的作品《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香港办的进步的文艺刊物，我们也传来传去地看。这些书籍使我大开眼界，我深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将无往而不胜，是解放人民大众，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

1949年6月高中毕业，7月高考，我报考了兰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外语系主任水天同亲自口试，我的5项成绩全是"优"，很轻易地就榜上有名了。

"8·26"兰州解放，我以兴奋无比的心情观看解放军的入城仪式。我和几位同学拥入兰州大学，找到几张歌页，如《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是灯塔》等等。我们对着简谱，很快就学会了这些歌曲，引吭高歌，抒发着我们的革命情怀。

这时，我对上大学已兴味索然。我觉得应把闪光的青春奉献给革命，人生才更有

1949年高中毕业时的和凤鸣

意义。恰在此时，我的已在甘肃日报社工作的堂叔和保鼎、堂兄和子午来到家中，说报社正在招收青年学生当编辑、记者。我在中学的作文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我认为新闻工作很适合我，当时还听同学说报社记者对革命理论、党的政策方针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水平很高。我对报社这个革命熔炉心向往之，就放弃了上兰州大学的机会，走进了甘肃日报社的大门，穿上了灰布制服，享受供给制待遇，成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在业余，我还到印报厂给工人教歌，当时教的歌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等，我激情满怀地教唱，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我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努力工作，刻苦钻研业务，很快就能独当一面完成任务。1957年我到北京参观农业展览馆，还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在我，一切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可是，反右斗争使我坠入黑暗的深渊，一下子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我又怎么能想得通啊！

经过几个回合的批斗之后，我又一次想去死。我想用死来解脱自己，只有死才能解脱我已无法承受的重负和痛苦，一个人活到了这等份儿上，为什么还要活着啊！我也觉得在这种时刻去死太自私，我怎能把所有的苦难都留给他一个人呢？但是，我实在受不了了，自私就自私吧，就让我做一个绝对自私的人。我在人世间既已无路可走，失掉了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一切，我已无可留恋，就让我到死亡之谷去寻找快乐去吧，一旦跨进了死亡之谷，一切就都解脱了，该有多好！

这是一个上午，我已被停止工作有些天了，我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全办公室已没有一个人理睬我，对我的要求是继续做检查交代罪行，我在沉默中却痛下了去死的决心。报社附近的酒泉路有个小药店，我决定从小药店买些安眠药结束生命。我匆匆走出报社的大门，走过中山林的公园时，托儿所的阿姨正带着孩子们在玩耍，3岁的小夏看到了我，大声喊：“妈妈，妈妈……”我头也不回，直奔药店而去。在这种时刻我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小药店只有个年轻的店员，我问：“有没有安眠药?”

他说："只有一种，三溴片。"我从来没有吃过安眠药，也不懂三溴片药性如何，问了问每次服用的剂量，就买了多于服用剂量十几倍的药片。年轻店员大概是看到我神色有异，有点担心地含笑向我一再叮嘱："这药可不能多吃，不能多吃！"他不放心地把我送到门口，看着我离去。我回到家里吞服了全部的药片，而反应只是头脑昏沉了几天，我没有死。这次和死神握了一次手之后，我又想了很多很多……

每天，只有在家里相聚，我们才能悄悄地述说外面的世界不允许说的话，倾吐冤屈，互诉衷肠。我们的斗室一时间又成了幸福的天堂。每天晚上，他都要伏在案头写人家逼他写的交代材料，写啊，写啊，总也写不完！那时，他在报社动员鸣放的会上提了的"宝贵"意见，他和别人私下随便说过的一两句话，他那受到热情赞誉的杂文，等等，统统被认为是喷溅着向中国共产党进攻的毒液，字字句句无不被认为是毒草，他怎能交代完呢？

我难以理解，一夜之间，他忽然成了罪大恶极的大右派，那么，原来的他呢？那个才华横溢、桀骜不驯，奋笔为党报写作了八九年的人，是报社从总编辑到每个普通工作人员都熟识和承认的，即使真成了妖怪，从魔瓶里飞出的那股妖气，也得有个变化的过程。是谁有那么大的能耐将他一下子变成了从魔瓶里飞出的妖气？况且，我们一直生活在报社的工作环境里，住在报社的职工宿舍，众目睽睽之下的他，又是怎样变化的呢？

每天晚上，景超还用工整的笔迹写日记，写每天挨斗的情形，写他的委屈，他的痛苦，也写出那可悲的世相。他的挚友王思曾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坏分子，曾对他说，运动对于被斗的人是考验，对于斗人的人也是个考验。在反右斗争中，他也有了自己真切的体会。报社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是反右斗争的重点，人人自危。有些人为了保全自己，不惜捏造罪名，把污水泼向已被众人踩在脚下的景超身上；有人善搞落井下石，得意愉快；有人作批判发言时，神色慌张，说话结巴，大汗淋漓，倒像是受批判的是他自

1949年冬天，和凤鸣在《甘肃日报》社院内

己……这些，他都如实地记在日记里，他想郑重地把这一页历史永远地保存下来。

1949年秋天，参与创办《甘肃日报》时的王景超

8月8日，甘肃省市新闻出版系统召开批判右派分子大会，就在报社礼堂举行。这是一次把新闻出版系统的反右派斗争推向高潮的大会。大会未开始前，革命群众就要求各单位的大右派“亮相”，让坐在前排的他们一个个站在方凳上，以便大家认识其嘴脸。景超是头一个站在方凳上让大家争睹的对象。后来，又有人喊道：“叫黑社头子王景超的老婆和凤鸣坐到前边来。”我本来坐在不引人注意的中间靠后的位置上，这时便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走到前边。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省上的王秉祥。1951年庆阳土改时，王秉祥是庆阳地委书记，景超作为报社挑选派去的记者，写了几篇好通讯，如《二十串麻钱》等，当年，王秉祥对景超也是熟悉的。现在，景超作为甘肃日报社的头号大右派站在方凳上让会场所有的人观瞻，此时的王秉祥对景超这样的大右派也许始料不及，但参加大会将他批倒批臭，似是理所当然。我心里仍替景超难过，他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开完大会，回到家里，我仍有些愤愤不平，说：“他们为什么要让你们站到凳子上？看一下你们的嘴脸，就能把批判引向深入？”然而，景超竟还宽解地说：“群众运动嘛，这有啥！”

《甘肃日报》8月9日在一版头条报道了此次会议。

两天后，省市新闻出版系统批判右派分子大会继续举行。《甘肃日报》仍在一版报道，消息指出：“以王景超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在今天的会议上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这个‘黑社’的头领王景超不得不承认这个集团的存在……但是，王景超却仍然抗拒交代这个反党集团的具体活动。王景超这种无耻抵赖，顽固蛮横的态度，引起全体同志的极大愤慨。”

此后，对“黑社”的追剿围攻，便又上了个新台阶。

景超在参加革命前，生活很苦。他生于1924年，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时，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将他逼出了老家河北省无极县苏村，18岁的大哥景衡带着13

岁的他为躲避战火，流落到四川等地。大哥后来参加了抗击日本鬼子的商震部队打日本鬼子去了，13岁的他生活无着，经老乡介绍，在伤兵医院当了看护兵，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伤兵医院吃不饱饭，小看护兵们为抢几口饭，常在饭篓子旁打架。后来，他从伤兵医院逃跑出来，在国民党为沦陷区学生办的国立中学从初中到高中先后上了三四年学。学校说是管伙食，肚子仍吃不饱。西安解放前两三年，经过刻苦学习，他考入西北大学。此时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他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西安解放，他很快报名参加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随军西进。

敌军仓皇西逃，沿路烧杀淫掠。景超他们走过的地方，处处满目疮痍，十室九空，炉灶被捣毁，炊具被砸烂。在一个镇口，一个老汉捂着刚被解放军包扎好的伤口，哭诉说："马家军（指马步芳的军队）把我全家杀光了，我活着有啥用？大军同志！请你们为我报仇哇！"这血泪的控诉，在景超和工作团全体同志的内心燃起了熊熊烈焰般的阶级仇恨，队伍里响起了《解放大西北》的嘹亮歌声。

在西进途中，景超热血沸腾，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行军驻扎到了张家川回民聚居地区，领导上向大家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告诉大家，回民喝水有讲究，我们喝河里的水，要到下游去取水，不能饮用村子附近河里的水。此时，经过一天的行军，人人都累得动不了了，景超拿起一个脸盆，独自跑到河水下游，舀起一脸盆（行军中无其他盛水的用具）水，端到屋内，供大家饮用。有一位同志不慎把手碰破，血流不止，围着几个人，都不知该咋办，景超看到，不多说话，把一条干净手帕拿给他，让他包扎，自己又去赶前面的队伍去了。

1956年的和凤鸣

西进的路上，领导上还组织大家学习革命理论，一次学了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让大家讨论。景超对该文后面的一段话感触很深，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作出如此英明的论断。这段话是："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

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他谈锋很利地说了说自己的深刻体会，当时就有点语惊四座。毛主席的这一段话也成为他处世做人的原则。

行军到兰州城外的东岗坡时，同行的徐列出了件危险事。当时，大队人马沿着盘山道顺利前进，有些年轻人乘着一股猛劲，从陡峭的山崖上往上爬，速度很快，徐列也从山崖上往上爬，走了一段路，却怎么也动不了了。稍有不慎，就会掉下悬崖。此时，左近前后都没有人，徐列正在紧张万分之时，已上了山崖的景超一回头看见了徐列，就慢慢退回，要拉徐列一把。山路很陡，走上去后，很难再走下来。最后，是徐列把背着的一杆“三八”式长枪递上去，景超拉住长枪，用力一拽，才使徐列脱离险境。50年过去了，徐列还记着当年那危险的一幕。

到“8·26”兰州解放，他随工作团进了兰州城。9月1日，《甘肃日报》创刊。他参与了《甘肃日报》的创办工作。在编辑部，他才华出众，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新闻和通讯，受到从总编辑到普通工作人员的瞩目。

曾几何时，他又成为“黑社”头子，成为对党抱有刻骨仇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受到全报社以至省市新闻系统多日来的猛烈批斗，还要他站在方凳上让大家观瞻。天啊！这瞬息变化的世道，让我怎么能接受呢，景超他自己又怎能接受呢？

过了几天，我下班后回到家里——当时的上班就是准时到办公室挨斗或写检查交代罪行，看见景超躺在床上，屋里一股浓烈的六六粉味。六六粉是数月前要来消灭臭虫的，此时，六六粉纸包已从床下取出打开了，我哭叫道：“你是不是吃了六六粉？是不是吃了？”他脸色煞白，心情沉重，看到我着急哭叫的样子，悲怆地说：“我刚才想吃下它，还没有吃……”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说得很吃力。多日来毫不停顿的狠批猛斗，他活着的勇气也已消蚀殆尽，刚强的他终于也想去死，用死来了结一切……我伏在他的胸前哽咽不已，此时此刻，我真害怕失去他。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吗？我们想要活下去真也太难太难！他冰凉的眼泪流到了我的头发上，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也是生平在我面前惟一的一次流泪。他告诉我，下午的斗争会上，要他交代“黑社”的黑纲领，“黑社”本来就是莫须有的事，哪有什么黑纲领，他无法编造，交代不出来，就骂他“耍死狗”、“放屁”。他沉重地喘着气说：“这日子可怎么熬下去！”在绝望中，我抽噎着哭成了一团。这天晚上，我们没吃晚饭，连灯都没开。在绝望的哭泣中，我们觉得彼此都无法离开，也感受到了大难之中相依为命的甜蜜，一种未曾经验过的甜蜜。

反右斗争将我们双双打倒在地，这真是我们来到人世间遭受的最冤屈最折磨人也最难以承受的苦难，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血迹斑斑，而两个受难的灵魂融合在了一起，又成为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我们的情更深，爱更坚。用血和泪浇灌的爱情之花

芳香美丽，它开放在我们被痛苦屈辱碾压过的心田，又使我们勇敢地共同肩起了苦难。

在这里，我要对同我一起去北京，一同参观农业展览馆，一同游览北京的名胜景点，并陪我寻访同学的那个人——杨允文，写上一笔。我万万没有想到，反右派斗争中，这个口口声声称我为“好友妻子”的人，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竟决定了我的政治命运。

杨允文原是兰州大学物理系学生，地下党员，他也是在庆阳参加土改时认识了景超，以后回兰州后进一步熟悉并逐渐成了密友的。解放后，杨允文在庆阳认识景超时，就在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在一个处里当干事。1957年仍在省委农村工作部，此人自恃才高，对工农干部出身的部长李培福，说过一些年迈能力差，胜任不了工作之类的坏话（具体内容已忘记），对几个处长，干脆骂他们是“一狼二狗三狐狸”。景超在他面前，也说一些在本单位不能说的心里话，比如，对挚友王思曾在肃反时定为坏分子，就认为是冤案，又感到无能为力。景超还提到报社的流萤、曹克己都是党员，和王思曾都极熟，他们作为党员都束手无策，没有想出什么办法，他这个非党员又能怎样？当时，正是满城争说《十五贯》的时候，人们对破了冤案的清官况钟非常佩服，杨允文当即激昂地说：“况钟也不是共产党员！”鼓动景超在王思曾的问题上应有所作为。说他是我们家的密友好友也不为过。杨允文是甘肃武山县人，他老婆也是武山县人，是在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的干部。

我们从北京回来后再没见过面，反右斗争中，景超和我先后陷入困境，他也受到批判。省委农村工作部来函要我们写材料揭发他，我和景超从内心里都不愿他也成为右派，写材料时只避重就轻地应付了一下。此后，报社的反右斗争仍如火如荼地紧张进行，我们因同他不在一个单位，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对他的命运不无担忧。我们不仅认为自己不是右派，也认为他不是右派，对他的处境也很同情。

到了9月，批判斗争我们的日子似乎已近尾声，一个星期日，我忽然想起，杨允文的父亲就住在小沟头，我的外祖父家离他家很近，此时已近中秋节，我们已有多日没去外祖父家了，不妨在去外祖父家时，抽空去杨允文父亲家问问他的情况。这天下午，我们到了外祖父家，外祖父已知道我们双双定了右派，对我们挨批斗很难过，我们只能说一些宽解的话安慰老人。在我和外祖父说话中间，景超抽空去了一趟杨家。吃完晚饭，从外祖父家走出，我就问他去杨家，同杨父谈话的情况。景超说：“他父亲说，杨允文对报社黑社的问题交代不下去，很为难！”我激动地说：“黑社没有他，报社也没有说他是黑社里的人，他们那里怎么让他交代同黑社的关系！”情急之下，我和景超再返杨家，写了个条子，告诉他黑社根本没有他，以及还应小心注意的几件事。条子很小，不到巴掌大，他写了几句，我也写了几句。

谁料想，景超一人去杨允文家，杨父就立即去向杨允文告知，而杨允文第二天（星期一）上午就让老婆向组织上作了汇报。省委农村工作部听了汇报，立即用电话

通知报社，当即把景超叫去训斥一顿。中午我回到家，景超神色慌乱地说："坏了，坏了，我们写的条子，他父亲一定会送到杨允文那里，再转回到报社来。"到下午，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写的条子果然被送回报社，我们既写检查，又对杨允文重新写了揭发材料，杨允文骂几个处长"一狼二狗三狐狸"，我只是在这次的揭发材料里才初次写出。我现在也不是埋怨他，他当时这样做，也是事出无奈。

如果事情只是到这一步也就罢了。后来，我们的"罪行"总算交代完了，杨允文最后也未能划入黑社。报社的男右派们被派到小西湖的二厂（现新华印刷厂）劳动去了，吃住都在二厂。报社怕景超走后，我单独在家想不开会出事，让李玉清、白素珍陪我住了几夜。李玉清告诉我，领导上原来并不准备给我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因为给杨允文写条子订攻守同盟，这才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定了，因为省上有规定，凡同右派分子订攻守同盟者，一律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来，人事科的冯文彬去银川找王思曾调查我们为其翻案的问题，也告诉王思曾，原来并不准备给我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因为跟杨允文订攻守同盟，才按规定给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看来，这已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这个我一直把他当好友对待，同情他，希望他在反右斗争中不要吃太大的苦，甚至在内心深处祝祷他能够不当右派，不惜一切冒着风险给他写条子的人，却在他反戈一击之下，彻底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虽经过批斗，原来可以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我，立即批准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落了个态度极其恶劣，加重处分的结果。

当我从李玉清的口中得知这一变故时，心中的悔恨使我非常痛苦。但，一切都已无可改变了。

我从7月下旬开始挨斗以来，一直被当作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对待，要求我"低头认罪、缴械投降"！而且火力越来越猛烈。到交代罪行告一段落，批斗会也暂停止以后，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告诉我，可以对我不以右派分子论处。如果有谁向我透露一丝口风，宽解我沉重的精神和思想压力，我将会徐缓地吐出积压胸口多日的闷气，感谢党，感谢组织上对我重新给予了信任。没有谁对我说这句话。我以右派分子之身委屈不已，便又做出了同情另一个右派分子的蠢事。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提到："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①此通知来得太晚，当报社反右斗争一哄而起，领导经过批斗查实，已考虑到可以对我不以右派分子来论处的时候，我已受尽委屈，却无人告诉我，你不是右派。类

①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507页。

似情况，在报社已有先例，文化部的黄权舆在写小说，景超从庆阳参加土改报道回来后，萌发了写长篇小说搞创作的打算。在刻苦写作的过程中，他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有时便一起交谈搞创作的甘苦。当景超被当作黑社头子进行批斗后，黄权舆也被株连进行批斗，批斗了几次没查出什么。每批斗一次，黄权舆的癫痫病就犯一次，以后对黄权舆的批斗便不了了之，结束了。或许，因为我是所谓的黑社头子王景超的妻子，谁也不愿意吐口说我就不是右派分子，而我不是右派分子，可能还意味着景超的罪行会减轻几分。

痛定思痛。如果当初对我不以右派分子论处，还我以自由之身，仅仅是景超一人赴酒泉夹边沟劳动教养，我可以去夹边沟看他，从而了解到他艰难的处境。如果不降级，当时我有102元的工资收入，我能够从经济上大力支援他，想方设法让他吃饱肚子，最后让他平安归来。

杨允文反戈一击造成的后果是血淋淋的，使我们家破人亡！

在这最后相聚的时刻里，别情依依，我们相依相靠，心心相印，安恬地憩息在一起。我们几乎是一直沉默着，什么也不再去想，什么也不必说了，该想的我们都已仔

1956年，和凤鸣、王景超与儿子伐夏、小夏

细认真地反复想过了，要说的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也都已在我们的小屋里倾诉过了。在列车前进的隆隆声中，车厢里别的旅客在谈笑，打扑克，随意走动，一切正常。我们的那几位伙伴背负着沉重的冤屈和家人离别，心里也十分凄凉，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和我们也不多话。我们对这一切全都视而不见，整个车厢里仿佛只有我俩，这个世界仿佛只为我俩才存在。

直到离别前，我们根本没有设想过未来还会有怎样的厄运在等待着我们，而且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遭受到的已经是灭顶之灾，今后只消经受艰苦劳动的磨炼，自己跌倒自己爬，不论经历怎样的苦难，我们总会吸取教训，重新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在细细地咀嚼了被打倒在地的痛苦以后，我们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一向高傲倔强的他，沉稳老练了许多；在别人眼里柔弱的我，变得十分坚强了。我们仍相信中国共产党对右派分子“给出路”的政策。为了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困境中走出，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我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具有百折不挠的毅力，靠自己非同寻常的努力，就能够达到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是乐观的。他还重新坚定信心，继续做起了他的作家梦，他用笔勤奋地编织了多年的梦……我却想着，三两年摘掉了右派帽子，这耻辱的印记被抹去后，我们应有一个农民的独家小院，简朴的小屋是洁净的，窗棂上糊着白纸，还贴着巧手的邻居为我剪的大红窗花，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在日子，自由的灵魂不再受到捆绑，更不再被撕扯抽打……当然，这一切也是为了他继续写作。我将会尽心竭力做一个好妻子。孩子们会背着小书包到村里的小学读书，我也会是一个好妈妈。此刻，我只渴望做一个称职的贤妻良母，因为这偌大的世界只有景超和孩子们才需要我。我编织的其实也只是个虚妄的梦，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梦幻。我们在虚幻的梦境里游来荡去，沉湎于自己编织的梦境，只是由于我们已一无所有。我们原该从梦境里惊醒的，沉湎于迷梦终于使我们铸成大错。

酒泉站到了，离别的时刻终于来临。原来默默的那几位伙伴热情地行动起来，他们麻利地把景超的箱子、行李、装着脸盆的网兜等什物连搬带提地送到车下，和景超一一握手，郑重道别。他们比起我俩又幸运多了，他们只是自己一人当了右派，每人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全家人对遭了厄运的亲人都格外关心，全家人也只牵挂着他一人。此时，他们不免也为双双落难的我们难过，内心很同情我俩。但大家都还挺天真，谁也没有想到，同行的伙伴后来有一半人先后匆匆告别了人世，未竟天年。我和我的伙伴们当时都头脑简单，愚不可及，都没有想到作为打倒在地的阶级敌人，每人的头顶上都有一把用头发丝悬挂着的达摩克利斯利剑，略有风吹草动，头发丝便会断裂，利剑便会从头顶上方落下。

我和景超最后一个握了手，止不住地黯然神伤……毕竟，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已使我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今日一别，天各一方。我们面前已

无坦途，我们各自只能挣扎着踽踽独行于悬崖、戈壁、丛莽之间，知冷知热相依相伴的人从此不得相见，两个在大灾大难中融合在一起的灵魂又生生被撕扯得鲜血淋漓，各自东西。这苦难的历程何时才是尽头？

列车又前进了，我从窗口看到他苍白着脸，孤独地站在站台上，只是痴痴地望着我为我送行，没有挥手，也没有微笑，我的心不禁颤抖了。

列车快到酒泉时，景超曾冒出一个念头，想送我们到安西的农场，再返回酒泉去夹边沟。他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要去的农场的情况，也想再送我一程。以我们的右派身份，前面的路途必定险象丛生，坎坷难行，让柔弱的妻子孤身前往，他难以放心，更舍不得让我去经受那难以逆料的磨难。送我们的人事干部蒲廷珍没有同意。

登上西行的列车前，我们心情最沉重的是将两个幼小的儿子抛在了兰州。我们的大儿子伐夏6岁多，小儿子小夏不足4岁，他们都应依傍在父母的身边，享受无尽的天伦之乐，快乐健康地成长。而今，我们被迫远离他们而去，他们见不到父母的面，得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照料，远远地离开了父母爱心的滋润。当别的孩子们喊着“爸爸”、“妈妈”，用小手臂勾住了爸爸妈妈的脖颈的时候，他们只能寂寞地走开，用小手掌抹去顺着脸颊流下的眼泪……他们童稚的心灵将会承受不应由他们承受的重负，他们还会缺吃少穿，前面的路上将有着怎样的艰辛在等待着幼小的他们呵！每想及这些，我们都难以自持。两三个月以前，我们自知厄运已定，为了准备去河西的行装需要一笔钱，就狠心地停了小夏的牛奶，当时，我直觉得这是抽去了他那胖乎乎的小脸上的红润。我们挨斗后，伐夏正在上西北新村幼儿园，为了不让他得知我们挨斗当了右派分子的情形，让他住在妈妈家就近上了女师附小幼儿园。小夏仍全托在报社托儿所，阿姨们怕刺伤孩子，也并不告诉他爸爸妈妈当了右派分子，每个星期六仍由我接他回家。

随着批判斗争水平的不断升级，我们的宿舍门框上面贴了“蛇窟”的横额，两条伸出了长舌的毒蛇弯曲着缠绕在“蛇窟”二字的四周，门上是我俩猖狂向党进攻的漫画，凶相毕露，十分丑恶。当时我梳的小辫，小辫是窝在耳后用发带扎起来的，美术编辑们发挥了可爱的创造力，发带画得又宽又大梳在耳后，上面零乱地画了很多像是花朵的“右”字，衬衣上也全是“右”字，不伦不类，恰足以显示我的“妖魔鬼怪”身份。门两边还贴有火药味很足的对联。贴这些漫画、对联的时候，我们已经灭灯上了床，听到纸张响动的沙沙声，便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美术编辑们深夜的革命行动可嘉之至。然而我们不能有任何表示，只能在沉默中吞咽难堪的凌辱与难言的痛楚。此后，我们开宿舍门时动作迅速，并立即闪身入内。无论怎样，我们总想和毒蛇拉开距离，即使暂时地将它们关到门外，视而不见，也是一种逃避。星期六下午，我从托儿所接小夏回来，正不知该向他怎样解释门上贴就了的这些无法向他说明的丑恶画面

时，只见他好奇地端详了一阵，竟高高兴兴地得出自己的结论："小白兔，小白兔！"蹦蹦跳跳笑着进了屋。3岁的他用自己的智慧解决了我的难题，却也多么令人心酸。我蹲在床前亲着他的脸蛋，不知该说什么好。

1958年4月初，我们的处分宣布以后，为了孩子，景超曾向领导请求把我留在兰州劳动。这在有的单位是可以准许的，按照中央的有关政策规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报社的领导们经研究后未同意。他们硬是强迫我们全家骨肉分离，4口人隔绝在3个地方，相距1000公里之外，使俩幼小的孩子失去父母的照料，这般的铁石心肠，这种对具有公民权的右派分子的过激做法，符合报社主持工作的几个副总编辑的心态。他们出于对自身情况的各种考虑，唯恐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右了宽了，个别人还有着说不出口的理由，不许我留在兰州。这样，苦了的是我们无辜的孩子，他们应享有的父母之爱全被剥夺了，而且他们的爸爸已被开除，没有了收入，我的工资降了5级之后每月只有58.24元，养活他们该有多艰难啊！孩子啊，孩子，你们受苦完全是由于我们的过错，在你们面前，我们是真正的罪人，我们罪不可恕。你们童稚的心灵受到的创伤，一生里也难以愈合，你们娇嫩的身体怎经得起风霜雨雪的摧打？小夏夏，你的小脸蛋还会红润起来吗？你如再看到那丑恶奇怪的漫画时，还会蹦着跳着快乐地呼叫"小白兔"吗？伐夏，你因为几个月没回自己的家曾闹个不休，如今爸爸妈妈将长久地和你们离别，你会哭叫着要回自己的家的吧，但是，我们哪还有自己的家？

最后，两个孩子都只得留给了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是个有历史问题，没有工作的人。我的母亲是个小学教员，患肠结核、胃下垂，在家卧病已两三年，3个妹妹正上中学和小学。原来，我们一直用自己的工资贴补家用，现在，谁养活谁，谁照顾谁呢？重病的妈妈被剥夺了养病的权利，两个待抚养的小外孙硬是推到了她的身边。

报社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时，我们每个人都奉命表态，景超发言时还说："我今后一定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尽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争取做一个好公民。"这些话确也表达了他内心的愿望。当时我们无论怎样"挖空心思"地设想，也无法把我们自己同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割裂开来，同祖国的前途分开来。我们被强制戴上的"桂冠"虽不妙，按照毛泽东的指令不予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对我们也多少是个安慰，不仅景超，我们每个人都尊重珍爱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惟一可称之为"荣誉"的身份，决心当一个好公民。但是这些被允许做公民，自己还在争取当一个好公民的人，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夫妻情、亲子爱都被残酷地践踏，原来赡养老母的我，倒让重病的妈妈来抚养自己幼小的孩子，一切都来了个颠倒。报社领导既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只能横下心来接受，咬着牙忍受。话说回来，我可怜的妈妈，幼小的孩子都是人民，而不是如我们一样的阶级敌人，他们今后的生活里会出现怎样的阴霾风暴，会经历怎样的艰难困苦，和我们会不一样些，所以，登上西行的列车以后，对

他们我也就不再去多想了。受难的灵魂在不堪重负的时候，也会自动调节排解，来略略平衡一下自己的。

现在，他独自一人留在了酒泉，留在了他将要接受改造和劳动教养的地方，留在了他将受苦受难的地方。他将永远地留在那里了。他没有挥手，没有向我微笑一下，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险恶处境担忧发愁，不是的，他自认为身强力壮，性格坚强。自从“七七”事变后随大哥逃难出来，颠沛流离，他什么苦都吃过。过去我的家境不算好，但从小肚子总是吃得饱饱的，而他曾多年挣扎于饥饿的困境。所以，他对于自己将要迎接的一切毫不畏惧。他无言地向我告别，心里正是对我有着万千的担忧牵挂，毕竟，我太娇弱，体重不到45公斤。我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17岁参加工作后，我们曾共享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以后做了年轻的妈妈，仍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去的安西条件极为艰苦，当时我们已得知那里号称“世界风库”。让娇弱的妻子只身经受暴风酷寒的袭击，在苦重的劳动中呻吟挣扎，遭受各种奚落侮辱——对我们来说，动辄的批判斗争是难免的，不许有怨言，不能向任何人诉说，这种种的苦况，他娇弱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吗？他还能再见到他亲爱的妻子吗？他一定是想到了这一切，当时他最害怕的就是再见不到亲爱的妻子，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吓得他脸色苍白，呆在了那里。此刻，妻子在他心中就是太阳，就是上帝，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男子汉的他如若一旦失去对妻子的皈依，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失去一切。妻子已离他而去，他却无法伴随妻子，无法送我一程。他的公民意识告诉他，他有权送妻子一程，但他已一贫如洗，火车票不会白送给他。万般苦痛啃噬着他重创的心，这一切又全都明白无误地写在他那忧伤的脸上，显现在他呆立的姿态上。他仿佛有些站立不稳，他的身影已模糊……似电击了一般，我迅即也感觉到离别对于我们真是苦不堪言的磨难。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公，我们难道还苦得不够吗？他是何等样的男子汉，为什么要遭此厄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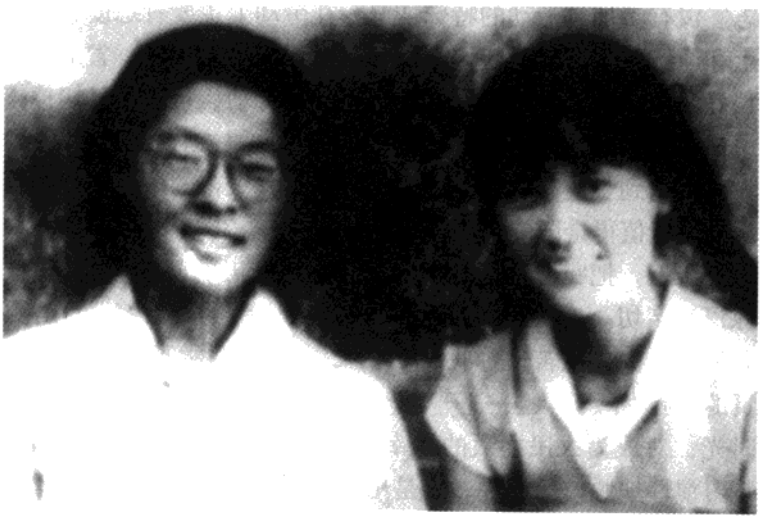
2. 初到农场

我们到达安西县城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天显得格外的高，格外的蓝，而且无风。号称世界风库的安西，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天气？我们不禁有些愉快。

我们要去的十工农场离县城有15公里。我们先在一个小旅店安顿了下来。第二天，杜博智从街上找到一个毛驴拉的架子车，人事干部蒲廷珍决定搭毛驴车先去农场，杜博智着急地也一同前往。我们其余的人在小旅店继续住了下来，等农场来车接。这是一个农舍似的大院，住房都是极简陋的单间平房，安着吱扭作响的单扇门，院中有一水井，很浅，四五尺长的井绳就可把水桶吊上来，吃用的水全取于此。

中午，大家到县城惟一的小饭馆吃饭，饭馆只有一间铺面，有一大圆桌，菜只一种——大葱炒肉片，兰州当时已有多种新鲜蔬菜上市，安西可吃的蔬菜只有过冬的大葱，菜价很贵，我们5人共要了一个大盘，主食米饭，一小碗要1角钱且沙石甚多，我们在报社花4分钱买的米饭比这强多了。这顿饭让我们知道了今后生活的艰难。

饭后，我们到附近散步，看见一段城墙，走出城外，只见细细的黄沙几乎将城墙埋没，我们踏着黄沙一直走到了城墙的堞墙处。可见世界风库之说绝非虚传。阳光灿烂，沙是温热的，我手抚堞墙，但见城里城外，除了我们几个右派，没有一个过往的行人。这段城墙只数十米长，不远处是坍塌了的城墙，已被黄沙埋没，大约由于坍塌的年代先后不同，留下了起伏不平绵长的遗迹，更远处，又有屹立于蔚蓝的天幕下的城墙出现。附近农田极少，一望无际的是苍黄色的茫茫戈壁。此时，我们都没有发思古之幽情，徜徉于空旷寂寥的边塞古城之上，天地悠悠无涯际，感触良深的却是我们自己的生存空间已十分狭小。我们都熟知甘肃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但还像过去一样，习惯性地认为这是旧社会对出关人的凄凉写照，也还不愿和我们自身作任何联系。真是可悲可叹又可笑的诸位右派啊！



1960年，和凤鸣与安西十工农场难友徐福莲在安西县城的合影

下午回到旅店，从离我们住房较远的房间里传来一男人大声喊疼的痛苦呻吟声，一声紧似一声。一打听，原来是一林场工人回河南老家探亲后返场的途中病倒在这里，经住在旅店的朝鲜族大夫诊断为肠梗阻。奇怪，这位朝鲜族大夫似乎是私人开业，夫妇俩都住在旅店，女人穿蓝丝绒的朝鲜族长袍，出进还背着个小孩，他们肯定是经过远途跋涉才来到此间。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兰州城里早已没有了私人开业的医生，可这位朝鲜族大夫竟还在这里开业，真让人不可理解。

工人无钱医病，又无法回到林场，只能辗转于旅店的床上，时不时地大声发出令人揪心的痛苦呻吟。如果在过去，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立即找县上的领导，请他们派人把病人接到县医院予以治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责无旁贷的事。但是此刻，作为阶级敌人，我们已无权过问此事。我们如去找县上，一说及身份，自己就有可能被轰出来。为等农场来车，我们在旅店住了两三夜，从早到晚，一直听着工人时轻时重的痛苦呻吟声，这呻吟，一声声击打着我们的心扉，更使每个人都思绪烦乱，心情沉重。但大家都无言，我们能说什么呢？后来，还是热情的杨骁自己花钱打电话将此事告知了几十里外的林场领导，也算是尽心尽力了。不过，直到我们离开，得肠梗阻的工人还住在旅店呻吟不止。这是我们来安西县后感受最深刻最沉重的第一件事。

杜博智终于坐着农场来县城办事的拖车来接我们，约1小时后，我们到了十工农场，那天依然风和日丽。人事干部蒲廷珍已将我们的基本情况向农场领导作了介绍。李文廷副场长和工会主席邹士杰还和我们开了个座谈会，主要是向我们介绍了农场的基本情况。大意是说，这个农场是全省勤俭办场的先进典型，最早的职工主要是复转军人，也陆续招收了许多农民，今春从省上和河西各专县来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大约有二三百人，还继续在来，对这些人的到来，我们是欢迎的。考虑到这些“同

志”没有参加过劳动的特殊情况，在劳动上主要看态度，该照顾的还要照顾，在生活上和原有职工一样对待，不歧视，对你们也是这样。省上早来的一批“同志”表现都很好，很能吃苦。希望你们在这里安心劳动，争取早日摘掉帽子。李副场长和邹士杰说话态度和蔼，都是陕北腔。他们所说的，在以后我们相处的几年里都是实现了的，大家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心情舒畅地劳动和生活，这样的处境值得全国的右派分子们羡慕。

会上，把我们这些右派称之为“犯错误的同志”。“同志”这个词，使我感到既惊讶又亲切。近一年来，已无人称我们为“同志”，我们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副总编辑樊大畏挖苦地称我们“右派先生”，我觉得特别不顺耳。苏联诗歌“同志/这宝贵的称呼/你一旦失去——”常萦回在脑际，提醒着我追忆有着“同志”称呼时的美好时光，对成为人民之敌的不幸，伤心不已。在这里，农场领导上称我们为“同志”，是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呢，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我们心里都有点纳闷，但是都感到有些宽慰，这里的政治空气与兰州似乎有些不同。

当时，领导上就宣布把我们5人分在3个大队，我和杨康分在了场部的三大队。

我们是吃过饭才到农场的。午饭时，我看到排队打饭的长队中，有一梳长辫的年轻姑娘，长得十分漂亮，脸晒成了绛红色，显然才从地里劳动回来，也是右派。另一年龄稍长的女同胞站得比较靠后，戴最新潮的琇琅架眼镜，穿深蓝色男式制服上衣，米色毛料长裤，绛红色的长脸略显得黑。长队中的男同胞也有几个戴眼镜的，大都是书生相，衣着破旧，烈日的曝晒已使他们破旧的衣裤发白，他们的脸色一律是城市里绝对见不到的绛红色和黑红色。他们也好奇地看我们，并议论一番。看来，他们都是先我们而来的右派难友。

我和两位女同胞住在了一个宿舍，这是一排坐南向北的平房中的一间，是个套间屋。里间屋有一米多深，有个可住一人的小炕，外间屋由南向北延伸是个大炕，两间屋的通道约一米宽，大炕前有一米多宽的空地。大炕靠墙的前面，有一个长平台，这是用一寸多粗的树枝支撑，高于炕，平面搭上木条、细树枝，再抹上泥，表面抹得光光的，成为一个一尺多宽的长平台，这便是我们的桌子。戈壁滩上木材奇缺，除了场部的办公室，所有的工人宿舍都只有这样的平台聊充桌子，放些日常用品，如碗筷、洗漱用具等。我们能享受到同工人一样的待遇，应该说已是一种优待了。

我们三人同住外间屋的大炕，三人并排睡，小徐靠墙睡，我睡中间，年龄稍长的石天爱睡在靠通道的那面。

小徐，名福莲，浙江金华人，只有二十岁，是地质勘探队145队的队员，但她已做了妈妈，也是夫妻俩都打成了右派。她3月份从勘探队驻地永昌县来农场时，硬是给生下才七八个月的小女孩断了奶，把小女孩狠心地交给婆婆，流泪不止，难割难舍

地离开了温馨的家。她这是第一次离家，年轻的她独个儿离开家来到农场，但全家人的苦难都重重地压在了她的心头。

石天爱有个有名的父亲——军阀、大汉奸石友三，母亲程竹溪原是唱京戏的艺人，是石友三的三房姨太太，只生了石天爱一个。石友三被卫立煌处死后，她们母女俩相依为命，一直住在天津过着富裕阔绰的生活。解放后，一个曾得到她母亲帮助的中医向她母亲传授了一种治疗关节炎的竹管疗法，她母亲便成为自食其力的医生。1956年，石天爱从天津志愿支援大西北，来到张掖市医药公司工作，才一年就当了右派。作为女人，她手上常夹着纸烟吞云吐雾，手指都熏黄了，在劳动和生活上肯定比别人更难适应，而且她是单身，还没结婚，这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议论。她比我大一岁，虚岁28岁，后来，右派难友们常戏谑地说她："年方二八！"

她俩都已没有了工资，因为她俩受的处分是监督劳动，是仅次于劳动教养的处分，只是还保留公职。她们从农场每月领取20元左右的生活费。报社给监督劳动处分的只有杜绍宇一人，他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大约是想自谋出路吧。这里专县来的右派普遍都是监督劳动，这反映出有的地方越是到基层执行政策越左，监督劳动可以省却本单位一笔工资支出，他们也觉得省事。她俩其实都没什么事，小徐跟我一样，也是由丈夫的问题而累及，她丈夫梁富杰原是她上地质学校时的老师，人年轻精干，业务过硬。此次地质队因工作需要没让小梁下来，可以到农场劳动的只能是小徐了，小徐其实是替丈夫受过。石天爱说她自己是"天生的右派"，并无右派言论就当上了右派。她一说我就能领会，兰州经过鸣放大抓右派的时候，地县还没开始鸣放，到动员大家鸣放时，人人噤若寒蝉。但右派按各单位人数的比例要抓够，抓不出足够的右派无法向上级交差，各单位便只能找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开刀。论家庭出身，全张掖地区要找出比石天爱更突出的怕是没有了，石天爱只能是首当其冲地当了右派。

如今我们都已当定了右派，回顾各自当右派的经历，都已是痛定思痛了。在这儿能够自由地交谈自己的痛苦经历，也是一种幸福。在原单位人家总认为我们认罪不够，立场转变得不彻底，没完没了地认罪，痛骂自己，我们已被扭曲了的灵魂每

安西十工农场劳教右派幸存者、大军阀石友三的女儿石天爱在1993年4月

天都要承受这不堪忍受的凌辱。现在，那种令人活不下去的氛围已不存在，它无法左右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了。

石天爱头枕在叠起来的被子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八分钱一盒的廉价烟，谈笑自若地说起挨斗的情形，倒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她打着哈哈说："哎呀，我的妈呀，我长这么大哪见过斗争会那阵势，可把我吓坏了，他们说什么，我都认了。他们说我反党，我就承认反党。不就行了吗？"由惊恐不已，到被迫承认一切，而后又玩世不恭，这一心路历程是由血和泪滴成的，我的右派难友很多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有些人在他的一生里都只吞咽委屈和痛苦，他们的性格和心性使他无法对人生开玩笑，直到了却了悲苦的一生。

小徐絮絮地说起自己的事来，仍不免心绪低沉。她问我："我们都是因为右派问题才受处分到这儿劳动的，可我到现在也没弄懂，右派到底是个啥问题，干了什么才叫右派，你是报社来的，你说说看！"我觉得她提这个问题有些好笑，便不经意地回答说："你真没弄懂吗？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我们都是因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才到这儿来改造思想的。"她的脸色竟陡地变了，喃喃地说："我们都是反动派……"我丝毫也没有料到，我的回答竟成为对她的沉重打击。她虽已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单位上只开过一个小型斗争会，对很多事还摸不着头脑。斗争她时，有个劳改过的工作人员为了立功赎罪表现自己，"揭发"说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观点，还有"教授治校"，等等。她那时生过小女儿不久，心都放在了小女儿身上，很少看报，不知道鸣放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党天下"、"教授治校"是怎么回事。一个普通的还是女性的地质勘探队队员的她，对这些哪会注意到呢？但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她，此时倒是受到国家大事的关注，用不着对证落实别人的"揭发"，也没怎么批判，就给她定了性。几天后，她被迫来到农场劳动。她记得十分清楚，她是3月18日来到十工农场的，属于来农场劳动的第一批难友，而她确实还没弄懂右派是干啥的。我的回答使她清醒了，从此，她才真正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常常一个人偷偷饮泣。

她说的最多的，还是小女儿的事。她来农场参加劳动前，不得已给才刚七八个月的小女儿断了奶。刚劳动时，奶水胀得乳房疼痛难忍，她常要跑到地边挤出奶水，可她的小女儿却没有奶吃。20世纪50年代，女犯人在哺乳期间尚可缓刑或在监外执行，没有触犯刑律、具有公民权的女右派却是别样对待。永昌是个小县城，无新鲜牛奶可买，奶粉、炼乳都难以买到。她一边挤奶，一边哭，心里在呼唤，为什么小女儿也要跟着自己遭罪？为什么？饿着肚子不断哭叫的小女儿的哭声，时时响起在她的耳际，撕扯着她做妈妈的心。她问我："兰州能不能买到奶粉？"我说："能买到。"她立即兴奋地想请送我们的人事干部蒲廷珍买几瓶寄给她的小女儿，说她来时带了些钱，买奶粉的钱还有。那时，蒲廷珍因无去县城的顺车，留在农场还没走。蒲廷珍为人憨

厚，可也不能为一素不相识的右派办事。此时，为了小女儿，她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或者说，她根本对右派分子作为阶级敌人的严重性没认识。但我不愿拂她的意，拂她做妈妈的心意——急不可待地要让小女儿吃饱肚子的热切感情，一副泪汪汪企求帮助的神态，使我不忍心说出此事难以办到。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犹豫，后来竟自己找到蒲廷珍要求代买奶粉，当然，未能如愿。

小徐和石天爱都是由县武装部派人押解到农场来的，坐大卡车一起来的还有当地的不少右派，送他们的县武装部的干部腰里都别着手枪。两三天后，我见到荷枪的解放军押送来农场劳动的右派，两三个背着行李的难友在前面急急赶路，荷枪的解放军跟在后面监视。他们大概只在场部办了一下手续，就分到了别的大队，未能在场部停留，就急急走了。这些难友的处境比我们可惨多了，我倒抽一口冷气，原来，所谓不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也可以如此执行。

我在到农场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劳动，是到一个很大的羊圈里除粪，全部工作是把一个冬天积攒的羊粪铲起来，用木制的独轮小车推到羊圈外面，堆积起来做肥料。有五六个人一起干，铲的铲，推的推。组长是个工人，发给我一把铁锹，他亲切地笑笑说："匀着劲干。"意思是不要拼命猛干，他看出我身体单薄、瘦弱没有力气，特意加以关照。我已脱去来农场时还穿在身上的浅咖啡色旧呢子上衣，换上了一件破旧的蓝平布上衣，戴了一顶新买的蓝平布无檐帽遮挡沙土。我提起铁锹就干了起来。羊粪是和垫圈的黄土、喂羊的麦草搅和在一起的，有半尺多厚，由于麦草很长且未腐烂，铲起来很费劲，干得很累。突然，一阵狂风刮来，用树枝搭成的圈顶虽也上过房泥，其空隙处刮进的风十分尖利，圈门口更是阵阵风尘，柴草、纸片、杂物乱飞，啪的一声，一根小木棍猛刮到了我的脸上，刚戴上的玻璃风镜被打碎，我心疼已打碎的风镜。这风镜是我们得知要来安西劳动时新买的，当时已听说安西号称"世界风库"，整个河西走廊风沙都很大已众所周知，所以报社的难友们每人都买了一副风镜，连同景超也不例外。谁承想第一次参加劳动就打碎了。但，我又为它保住了近视眼镜而庆幸，我是在狂风刮来时才急忙戴上风镜的，我还戴着一副600度的近视眼镜，是双层眼镜同时戴着的，风镜碎了，须臾离开不得的近视眼镜保住了，也算是万幸，不然，在小城安西是无法配新眼镜的。

人事干部蒲廷珍因等车无事可干，还走进羊圈看我们劳动。他拿起我的铁锹铲了一阵，关心地说："这么大的铁锹你哪能拿动？罢了换把小些的使！"他祖籍陕西，在兰州长大，操兰州口音。但他哪知道，农场是生产单位，同干部劳动锻炼大不一样，为了出活，农场就没有小些的铁锹。从这天起，我使着这种明光闪闪的方头大铁锹，一使便是几年。30年后，我在高台见到了曾在十工农场四大队一起劳动过的阎廷梁，他祖籍兰州，在四大队时听说我是兰州人，曾几次想和我攀谈几句，都因男性的

羞涩未能张口。当时，我和小徐在几百右派的男性王国里十分引人注目，他只是怀着年轻小伙子的亲切感情注意着我。后来他也到了四工农场，在场部遇到过我，但仍未和我说话，所以我是30年后才和他相识的。他说，他刚到农场时，队里发给他一张方头大铁锹，他一看到这张方头大铁锹，就禁不住地流下了眼泪，心想自己从小没有劳动过，这般大铁锹如何使得动？他，个头矮小，比较瘦弱，内心非常害怕劳动，按他自己的说法，劳动表现确实也不怎么样。他的坦率，使我了解到难友中的另一种类型。柔弱的我使用方头大铁锹并没有流泪，是因为心中还有另一种力量支撑着我，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右派，在这里劳动改造就是继续为革命而战斗。要竭尽全力尽快改变目前处境的天真想法，使我在劳动中不顾一切。使人受尽奇耻大辱的右派身份，我觉得太令人痛苦。为了改变它，什么样的苦我都吃得下，一切的一切只能是逆来顺受。

这天下午收工时，我累得路都走不动了。回到宿舍，小徐和石天爱都安慰我，说她们才来时也累得够呛，现在就好多了。石天爱还向我介绍经验，说推小车比铲土要轻松一点，让我学学推小车，她们这些天干的活都是平整土地，她俩都已学会推小车了。石天爱说："铲土是连续作业，每铲一锹土都挺累。铲满一小车，小车推走很快又转回来，你又得连续铲。推小车倒土，送出时累，回来时已是空车，拉着并不累，人家铲土时你还在休息，你说是不是比铲土要轻松一些？"她还说："平整土地时，把高处的土往低洼处推，推第一车土时地里都是软土，没车轮印儿，吃力，顺着别人第一次推时压下的车轮印儿，或按别人已推过几次的车轮印儿推，就好推。如果几个车都向一个方向推，地很快就压硬了，推起来就省劲。"她这些学问，当组长的工人是不说的，常年参加劳动的人也许倒还没有这种真切具体的体会。她还告诉我："在地里蹬锹铲土，光是腿脚上的劲不行，人的腿脚上有多少劲呢？你看那些工人们蹬铁锹挺有劲，那是把全身的劲都使上了，全身的劲都集中到一条腿上，一脚蹬下去自然有劲。"她一边说，还一边拿起立在墙角的铁锹，在屋内炕前的土地上，用分解动作，做出如何将全身的劲集中在右腿上蹬锹的示范，让我心中了然。她也做了做只用腿上的劲蹬锹就没劲的样子。她还告诉我，铲平地上的虚土，工人们弯着腰连续铲过去，速度很快。你绝干不了，只能是一下一下地慢慢铲。你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每铲一下，锹把都靠在左腿上，使左腿也使了劲，才使他不断前进，铲得很快。对这，她也做了一下示范动作。她热情耐心的讲解所传授的知识，对我都很有用。我蹬锹一向只知道用一条腿上的劲，蹬不动就干着急，没一点辙。铲地上的虚土如何才能铲得快，铲得平，我还没实践过顾不得去思索，去观察哩。她比我早来一个多月，多长了许多见识，这些宝贵体会对于我真是太重要了，这些方法以后我全都学会用上了。看来，她在劳动时挺有心眼，很动了些心计。这些学问，工人组长自然也没有告诉她，而都是她自己细心观察所得来。

记得我们住在县城的小旅店等场部来车接我们时，我曾遇到了1955年在天水公安处采访时认识的李德寰，没想到在安西相逢，我们都已成了右派。他当时在五大队当管理员，是进城来采购的，五大队是个开荒队，人员绝大部分都是由省级机关送来的右派难友。他是在省公安厅当的右派，他简略地谈了谈五大队的情况。他说，开荒队的活主要是用铁锹，男子汉们初来时也很不适应，其中也有个技术问题。他还说："咱们这些人表现都很好，很能吃苦，放水时，为了堵住水口子，有的人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堵在水口子上，防止了水流失，让工人都感到吃惊。"后来，又有人告诉我，原省服务厅的尚正，在一次开荒时受到一武威民工的奚落，嫌他干活没劲。好个尚正，当即对民工一顿迎头痛击："小伙子，不要盛气凌人，我下三个月的苦，绝不会亚于你，我给你三年的时间，你比不上我尚正的今天。"民工看不惯的书生们心气很盛。这位民工只图痛快批评人，并不懂得把使用铁锹的方法像石天爱那样教给书生们。这既是阶级的阻隔，更是一种文化上的阻隔。

多年后，我听到一位朋友对李德寰家庭情况的介绍：李德寰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他的一个叔父在20世纪30年代是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被捕后英勇不屈，牺牲于狱中。他的伯父是民革中央委员李兴中将军，曾任杨虎城将军的参谋长，参加了西安双十二事变。他和另一个兄弟在甘肃陇南参加了地下党，他的哥哥在西安参加了地下团。他的父亲是军校教官。解放前，他们弟兄都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反蒋活动，但相互间对自己的政治身份都保密，到解放后才知道彼此的身份。李德寰是怎样当上右派分子的呢？一次在学习会上，他读报念到有些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意见，自己也加了些议论，就这样划成了右派。他当然不服。他满门忠烈，以他从小在革命家庭受到的熏陶，以他参加了地下党后的表现，他一门心思为党为人民，说及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意见，也还是为了进一步搞好工作，其结果却为自己争来个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只能咽下满肚子的委屈，在劳动中重新塑造自我，开始他新的人生起点。

再说小徐在炕角放着一个装有丈夫照片的镜框，她丈夫梁富杰，是焦作工学院地质测量系53届毕业的高才生，大学毕业时才二十岁，已教了几年课。照片中的他，年轻英俊，一双大眼睛十分有神，正笑嘻嘻地望着这个让他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小徐拿照片给我看，眼神里流露的是苦苦的思念，几多眷恋，几多悲凉。我再仔细端详小徐，觉得她真是个美人儿，她脸上的线条、棱角像是雕塑家的创造，明朗，流畅，精美，无可挑剔，双眼皮下扑闪着的黑黑的大眼睛颇有些魅力，薄薄的红嘴唇，妩媚动人。这是多般配的一对恩爱夫妻，却又多么地不幸！命运对他们全家的安排，也不比我强多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我们，今后将如何在农场里度过我们苦难的生涯？为什么，为什么不公正的命运对我们三人造成如此的劫难？此时的我们对今后的一切其实都十分迷惘，对今后出现的很多事真是想也想不到啊！

我们的小屋里照明的是一盏用墨水瓶制作的小煤油灯，正如我过去下乡采访时农民家里用的那种小灯，灯捻冒着黑烟，忽闪忽闪地发出一小团暗红的光。安西的夜晚黑得迟，煤油又得节省，灯点得迟，三人睡定后就立即吹灭了。这晚入睡后，浑身的骨头都疼，辗转反侧，睡睡醒醒，却又梦魂萦绕，不得安宁。梦中，看见景超从远方的一个高坡上向我招手，急急地喊我。我着急地要奔向他，却腿脚发软，膝盖处生疼，总无法向他靠近。想喊他，又喊不出声来。我在哽咽中醒来，又立即睡去，过度疲劳的身体不容许我浪费一分钟的睡眠时间。沉睡中，景超又在朦胧中出现，我仍无法靠近他，无法跟他说上话……直到起床的钟声划破清晨的静谧唤醒了我们。我的心情仍十分沉重。

我和小徐听到起床的钟声时，第一个反应是连连呻吟，声调有高有低，轻重不一，长短各异的“哎哟”声不绝于耳。呻吟声说明我们都已醒来，而每个人头天的疲劳显然还都没恢复，都没睡够。喘着粗气的呻吟，从胸腔里发出的深长的一声声“哎哟”，似乎能稍稍缓解一下尚未恢复的疲劳，使我们从难以摆脱的瞌睡中逐渐清醒过来，转换情绪，去勇敢地迎接新的一天还要继续的苦重劳动。没几分钟，小徐就第一个爬起来迅速穿衣，接着是我。小徐告诉我，早晨上工切不可迟到，农活都是早晨才安排，一迟到，同组的人都下地走了，找也找不到。石天爱在我和小徐连续大声呻吟时似乎还在蒙头大睡，她起床最迟，只短促地呻吟几声就翻身坐了起来。但动作最快，我和小徐披上棉衣走出宿舍门时，她也急急忙忙走了。安西属大陆性气候，温差大，已是初夏，大家仍早晚披棉衣。大约由于考虑到我们的体力差，顶不上男劳力，我和她俩没分在一个组，干活不在一块儿。

这天，我也干上了平整土地的活。十工农场是个开办了没几年的新场，扩大土地面积在全部农活中举足轻重，因为新开垦的耕地只要种下去，浇上水，头一年每亩就会有150公斤小麦的产量，所以农场领导十分重视平整土地。我们所做的，就是在拖拉机已翻耕过的地里，在倾斜的、高低不平的块段，用小车推土，把它垫平，或用铁锹铲，把拖拉机深翻过的沟沟坎坎想法铲平，垫好。

我们全组十几人，工人、右派、民工都有。几位右派难友都是3月份来的，他们干活显得轻松自在，和工人闲谈起来，除了不谈政治，别的什么都说。原民乐县一位民政科长老牛，还是庄稼行里的“把式”，一块地是否整治平了，组长会征求他的意见。他和组长蹲在地里细眯着眼左看右看，指出哪里还应再推去若干车土，哪里还应再取土，哪里用花锹点挖就行，哪里还应取掉一两铁锹（指深度）的土。我们看见嫌高的地段，他说：“还低，再推十几车。”按照他的意见推够了土以后，再看，果然整块地都平整了。这种凭借肉眼测量的功夫，有时组长似乎还不及他。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小便时，只走出几步，转过身就尿，并不考虑同一块地里还有女性。

原在张掖县工商联工作的老任——他大概是个资本家吧，山西人，短粗的身材，

圆脸，40岁左右，劳动很踏实。他在来农场以前，就一直在农业社和县上的右派们一起劳动了。他听我说景超去了夹边沟，悄声对我说："听说夹边沟吃不饱饭，你爱人咋去了那儿？"顿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心，一阵狂跳……我希望这只是一种不真的传闻，不禁默默地在心里念叨：景超啊，景超，你从小吃不饱饭，在夹边沟可不能再挨饿，你挨着饿怎么劳动，怎么走出困境呢？

紧张苦重的劳动，又使我无暇多想及他。我心力交瘁，脑力和体力的全部总和应付每天必须支付的劳动总量，实际上已经处于透支状态。

几天后，在确实举不动铁锹的时候，按照石天爱的建议，我有点胆怯地学推小车。这是一种单轮的木制小车，车厢呈簸箕状，车厢里装了土，推到了地里的低洼处，一抬车把，土就能倒出。一上工，我先挑了个车厢小、装土少的小车。全组不论谁给我的小车铲土，都有意照顾，少装些土。大家见我主动推车，都认为是一种积极劳动的表现呢！因为没力气，没经验，开头，我无法掌握小车的平衡，小车摇晃着，我瘦弱单薄的身躯也摇晃着一直向前冲。推了一两个小时后，才大体掌握了平衡，这中间也还有些窍道。但我仍觉疲劳不堪。有时，我真想倒在地里沉沉睡去不再醒来，我祈求在沉睡中快乐地踏进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不再返回，我要逃避我无力承受的劳动。我要躲开这个令人太痛苦、太难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可是，心中又有另一种力量，另一种声音在呼唤："坚持，坚持，再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我无言地推车，面不改色地继续推车，挪了一步又一步，推了一车又一车！我仍坚定地认为我是跟着党干革命的人，我不能软弱，不能畏缩。况且，当了右派的人既无退路，前面又没有其他可行之路，畏缩后退，叫苦喊冤，只能带来更多的麻烦，更多的艰难。个别表现"不好"的难友在农场仍受到批判，开他的斗争会，我也听说过。石天爱就是其中的一个。石天爱自己虽没吭声，小徐曾悄悄地给我说过。她自己怎么吭声？吭声只能被认为是对改造不满的表现。那时，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上，走到哪里，都只认这一个理。

来农场前，我曾向往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上中学时国文老师魏剑生带领我们在教室里反复吟哦过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般的闲适自在，物我两忘，与我现在实际经历的真实生活是个绝对不协调的音符，而这些诗句有时仍会突然闯进脑际，流连一阵，又倏忽而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活得多么潇洒，真让人羡慕！我们到底干了什么，却要这般的饮泣吞声，强作欢颜，苦苦挣扎？

安西夏日的白昼特别长，每天日未出我们已急急奔向田野，坚持到"日入而息"，那漫长而苦重的劳动，使每个人的耐受力都受到冲击。中午有两小时的休息。每个人回到宿舍后的第一件事，都是急匆匆拿起饭碗到伙房外排队打饭。中午一般吃面条——兰州人称之为一锅子面，面条里如和些新葱、白菜，就很好吃了，无油——因

为农场不种植油料作物。从地里回来的人们，端起饭碗蹲在墙脚的阴凉处大吃面条很少细嚼，每个人嘴里发出的都是唏里呼噜的吞咽声。干罢重活后的饥饿催促他们快吃；吃完饭后还要倒头睡个午觉，更逼迫他们不得不快吃。我们同室的女伴吃饭也都很快，但从小吃惯了精细饭食的石天爱胃很小，无法把要吃的全部面条做一次性食用，她总要留下一碗面条带回宿舍，放在宿舍里用树枝泥巴做成的平台上，等午睡起来，把凉冷了的面条再迅速吃完。下午干活一般不太紧张，到四五点钟以后，包括工人组长在内，人人好像都在企盼着下工。下工又无钟点，回去早了还怕队里批评，于是，有些人不时向远处张望，看别的组是不是已经收工在往回走，看三大队的旗杆上标志着收工的红旗是否已飘在了旗杆顶端。那时，戴手表的只有极个别的难友，大家都无准确地记载着不住运行的时间进程的小小的精致好看的手表。在队部的旗杆上升起飘飞的红旗，可以使分散在田野里的所有人员抬头一望，欣喜地发现收工的时间已到，于是，便喜滋滋地立即打道回队。到快收工的时候，劳动的速度明显减慢，谝闲传的热烈了起来，我则连说话的劲儿也没了，只是焦灼地盼望快快收工。而灼热刺目的红日此刻像是钉到了半天，一动也不动。

这天，老牛和年轻工人小李，对一堆才长出细小叶子的草丛展开了围攻，这丛草似已长了多年，盘根错节，隆起二三尺见方的一个土堆。他俩先用铁锹挖草丛周围的土，遇到手指粗的草根就把铁锹提得高高的又猛剁下去，再蹬上一脚，锋利的锹刃一下就剁断了草根，满满一锹土随着就被扔向数尺外的低洼之处，草根被拣出堆在一旁。土堆快挖空时，铁锹遇到了主根，用铁锹剁已不济事，老牛说："小李，把镢头拿来！"小李拿着镢头过来，手一挥，要老牛走开，向两只手心连吐了两口唾沫，用镢头从横向向草根猛砍几下，只听"咔嚓"一声，主根断了。小李又用镢头在主根周围连刨几下，拽出一条茶杯粗、两三尺长的草根。老牛有意考我，问："和凤鸣，你知道这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他又问："这是什么草根？"在我确实回答不上来时，他才说："这是甘草根！"甘草作为中药我是熟悉的，过去在兰州见到的甘草都经过药店的加工，一般都是切成薄片，从切面看最粗也只有小指头粗。甘草在中药里用途广泛，谁能想到在这儿的荒野里竟出现了，长得如此粗壮，而且是粗壮得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在编《甘肃农民报》时，报纸上也介绍过农民挖药材搞副业增加收入的事。这一堆甘草如卖给药材公司至少会有几块钱吧，但药材公司不会到荒野里来收购，安西县城里也未必有收购药材的机构，这来自荒野的上好药材也只好又弃之荒野了。

工人组长在闲谝中对我这几日的劳动表示满意。他顺口对我同屋的两个女伴也进行评论："那个石天爱'滑稽'（意思是奸滑）得很，听说劳动的时候一转身就不见了，找来找去，一个人坐在僻背处偷偷地抽烟，再一问，说是小便去了，一个女同志，怎么是这么个的！"他宽厚地笑笑，也不再说更尖刻的话。如果在原单位，对石

天爱这种“表现”，坚持反动立场、不思悔改之类的批判，肯定就来了。也许，十工农场未经过反右斗争的暴风雨——全农场未定一个右派，这是个极特殊的例外。人们还不懂得，不习惯于对和自己一起劳动的人运用这样的批判用语。他又说：“徐福莲行哩，劳动能行！才来时恓惶得很，劳动一阵就到地埂埂上挤奶去了，奶憋得哭鼻子，家里还有个半岁的娃娃哩！”大家对徐福莲也不说同情的话，因为都知道不能同情右派。只听见有谁“唉”了一声。对石天爱看不惯的人就多了，小李就鄙夷地说：“我就没见过女人有那样抽烟的，手指头熏得黄成啥了，还是个丫头哩！”老牛立即打趣道：“小李，你不是没对象吗？把石天爱介绍给你怎么样？”小李竟当了真：“哼，我一辈子不结婚也不要她，谁要她！”有人又揶揄道：“石天爱好着哩，天都爱，你不爱吗？找上石天爱，还能领上你到天津拜望丈母娘哩！”于是小伙子红了脸，两人耍闹着厮打了起来。工人们都毫无例外地从做人、做一个女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在政治上对我们有其他苛求，这使我略感宽慰，劳动条件的严峻似也可以忍受了。

太阳渐渐偏西，终于下工了。浩瀚荒原上的落日景观未及出现，我们已回到了宿舍，其实我们已劳动了十二三个小时，饥肠辘辘的人们拿起饭碗就急急地向伙房走去。我步履艰难，回到宿舍先靠在炕边上喘了口气，稍稍休息了一下，才去吃饭。

一天，组长派两个武威民工领我和老任在已播种过的地边点种玉米、白兰瓜，这真是多日来最轻省的一次活路，拿小铲子铲个两寸左右的小坑，扔进一两个籽，再埋好就行。武威民工已和我熟惯了，我用过去采访时学会的几句武威话和他们开玩笑，我说：“听说你们武威人爱吃山药米棒（拌）面，[①]说是‘桑（三）天不吃米棒（拌）面，心里钢（干）焦钢（干）焦的’！是不是真是这样？”四方脸，有着络腮胡子的民工老张笑着说：“你的武威话怎么说得这么好？这话说得实实的，武威人的山药米棒（拌）面吃了是滋润的，就是好吃，桑（三）天不吃，心里火烧火燎的，不好受，这里光吃白面一点不香。我们武威不光米棒（拌）面好吃，啥啥都有，现在新葱、水萝卜、菠菜、小白菜哩，嘿，各种新菜都吃上了，这里要吃上新菜还早着哩，又有几样菜吃哩嘛！”原来，我的一席话竟也勾起了他们的思乡情。

突然，狂风骤起，铺天盖地的大风席卷而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两个武威民工喊了声：“趴下！”立时俯身在地埂下一动不动了。我学他们的样儿，两手抱头，双眼紧闭，立即也趴在了地埂下。只听见狂风如千军万马奔腾咆哮而来，又咆哮奔腾而去，强劲的风几乎要把趴在地埂下的人们掀翻，把穿在身上的棉衣撕扯起刮走。如是往复不已，耳边响起的分明已是军中的厮杀，干戈的撞击，两军对垒中决一死战的冲锋与后退，雄壮而凄厉的声声号角。好一阵，两军似在退却中，万马奔腾的咆哮声

①把洋芋和小米先在锅里煮烂，再下进面条煮熟后的一种吃法。武威人称洋芋为山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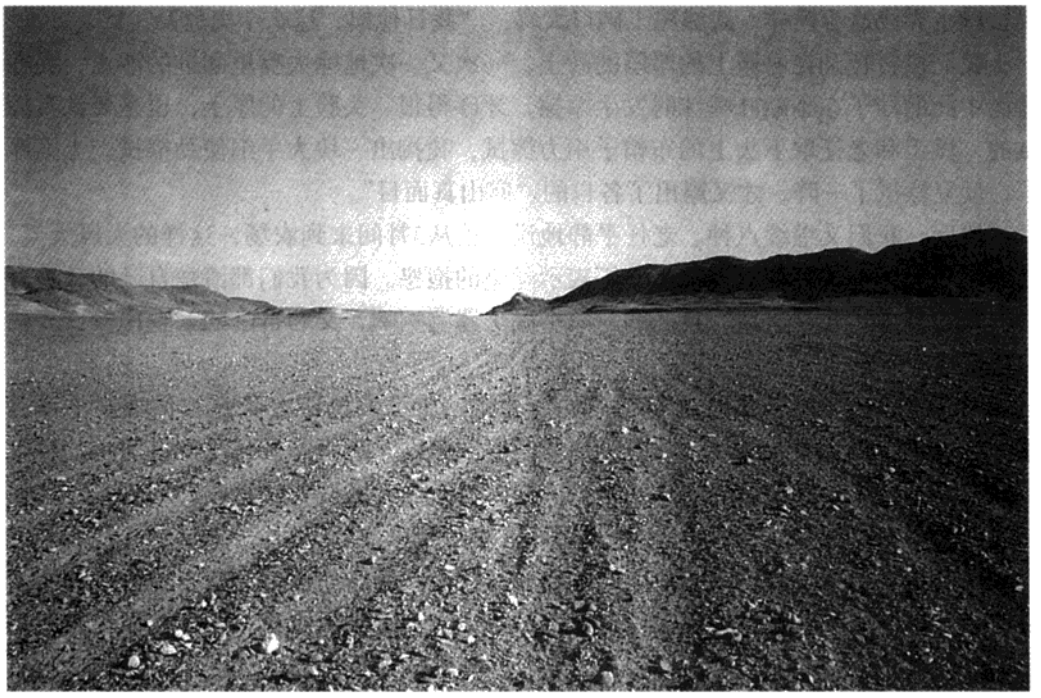
渐渐在隐去……忽然，狂风又似卷着巨浪，从半天里劈头盖脑地浇下，浇得人凉透冷透，隆隆的响声不断向远方散去，像是大海上滚滚波涛翻涌不已发出的巨响。我们似匍匐在被惊涛骇浪猛烈袭击的航船上，一次又一次地被半空里降下的挟着狂风的巨浪击打着，航船颠簸不已。我奋力挣扎着，身体紧贴地面，拼命靠近地埂，生怕自己被狂风巨浪席卷而去。风，主宰了一切，生命、意志、自由，一切的一切全都俯首听命，屈从于狂风的摆布，任凭狂风大施淫威！

匍匐在地的我，感觉到生命的脆弱。我趴在地上许久许久。清醒的意识，又使我觉得自己似乎随着大风高高飘起，乘风而远去。我飘到了妈妈的炕头前探望久病的妈妈。低水平的小学教员的生活，使妈妈只能居住于向私人租来的旧平房，全家人住一个大炕。我看见妈妈瘦削苍白的面庞又增添了几多皱纹，几多愁容。围绕在妈妈身旁的小夏少了许多欢快，许多活泼，外祖母的关怀，怎能替代父母之爱？他一定是因为想爸爸，想妈妈，变得寡言少语了，妈妈来了，快让妈妈好好看看你……我又飘呀飘，飘到了伐夏的课桌前，伐夏端坐着，眼睛明亮，正在大声朗读课文。我又轻轻飘荡了许久，仿佛飘到了似乎是夹边沟农场的地方。噢，那里也是狂风滚滚，灰黄苍茫的尘雾盖住了一切，我东找西寻，却怎么也看不到景超的踪影……他在哪儿？

有时，我又觉得自己是独自个儿被抛掷在茫茫的荒原上，正独自个儿经受着狂怒的暴风的作践，寂寞孤独，苦不堪言。从来没有宗教意识的我，不禁从心底里不断呼喊："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这样受苦？你还将怎样？还将怎样？"此时，我觉得只有上帝才能听到我的呼唤，而上帝究竟是仁慈的，还是残暴的？不断呼唤着上帝的我，心里并不清楚。但我还是呼唤着："上帝啊，上帝！"我紧紧匍匐在地，尽力挣扎着，真正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威力。啊，渺小的我，孤独无助的我！

就在这些日子里，出现在夹边沟的沙暴，其肆虐的程度，对生命的威胁破坏，也绝不下于我所经受的这场风暴。

1958年5月被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开除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王志——在去夹边沟之前他是团里的编导，多年后告诉我，他到农场没多少日子就遇到一场沙暴——顾名思义，沙暴的可怖与破坏力要更为严重。那天，大家正在劳动，领工的队长突然大喊："快趴到地埂下面，都趴下！"队长的话就是命令，不得违抗，于是，人人都立即服从地趴在地埂下，但心里并不明就里。这时，王志注意地看到西边天地相接之处出现了长长的窄窄的一道红色，红色上边的天空变成了浓重的黑色，而此刻他们劳动所在的上空依然湛蓝晴朗。但，十分钟后，沙暴便铺天盖地而来，飞沙走石，刮了个天昏地暗。他们个个紧紧地匍匐在地，被飞沙走石打得不敢动弹，还怕被沙暴掀得离开大地。尽管他们都是堂堂七尺之躯的男子汉，许多人原先也未曾有过如此的经历，他们远离故土亲人，以含冤受辱之身遭受沙暴的蹂躏，心中的万千悲苦和



当年右派们开垦的戈壁滩

伤感，用唐代诗人李益的诗来说，真是："故国关山无限路，风沙满眼堪断魂。"

无遮拦的沙暴还无情地刮走了出土不久的大片麦苗，埋下了饥饿的种子。这才是最可怖的，它直接威胁到仰仗土地的收成才能生存的两千多劳教分子的生命。沙暴在肆意地和受难者开着玩笑。它为什么不肆意呢？有人对它的肆意很赏识。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惩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当时甘肃省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一两个小时后，队长命令整队回宿舍休息。因为天依然昏黑，用王志的话说："像是日全食了一样。"为了防止逃跑，劳改犯不宜在暗无天日的情况下出工，劳教人员也依此管理。由于沙暴的出现而得以休息，王志感到很高兴，大家都庆幸能够休息半天。

还是再回到十工农场，说我自己吧，我们四人趴在地埂下，过了许久许久，风才渐渐住了。我们一个个翻身坐起，只见每个人都是蓬头垢面，头上脸上蒙了厚厚的一层沙土，牙齿和牙齿缝里填的是沙土，浑身上下的沙土随着身体的活动正簌簌地往下掉落。人，像是才从土窝里打了个滚出来。记得小时候，奶奶嫌我玩土弄脏了衣服，总说我："像个土贼一样！"那时，我对"土贼"一词十分不解，此刻，我突然明白了，"土贼"大概就是这般模样。以前我虽也经常下乡采访，和农民同吃同住，可从来不曾见过哪个贫苦农

民让沙土弄成这等模样。武威民工破口大骂：“我日他妈，这么个鬼尿天气!”

我们拍打掉刮在衣服上的厚厚的沙土，一次又一次地唾去嘴里刮进的沙土，夹在牙齿中间的沙子在不断吐唾沫时发生摩擦，牙碜得很。头脸上的厚土，也是要认真擦拭的，民工和老任取下头上的布帽子用力擦拭，我掏出一块大手绢使劲擦拭。土太厚了，反复擦拭了一阵，才又露出了各自的“庐山真面目”。

然后，我们又继续点种。老任平静地说，他从3月间来到农场，这样的大风天气，已遇着几次了。我俩都只笑笑，并不表示丝毫的抱怨。因为我们都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我们是来这儿“改造”自己的。两个民工骂骂咧咧，又和自己的家乡比较：“我们武威哪里有这么个鬼尿天气!”

我和老任应该平静。在这年春天的风暴里，十工农场四大队有一位难友不幸遇难。夜里正在田边放水的他，不懂得风暴狂烈的秉性，竟不幸被狂风刮进河水，没有了踪影。这位难友的姓名已无从知道。不知当时是怎样通知他家里的。比较而言，我和老任确实无可抱怨，今天的幸存者们都不必抱怨什么。

这天中午回到宿舍，铺上落了厚厚的一层沙土，像是涂抹了一层土黄色，因为铺不很平，低凹处颜色就重些，显得五抹六道的。我们吃午饭回来，用手大概抹去铺上

生长骆驼刺和芨芨草的盐碱地

茫茫戈壁滩

的沙土，头枕在靠墙叠起的被子上，仍跟往日一样立即沉沉大睡。我们已习惯于睡在不洁的炕上，我们的炕上从来就没有干净过。普通农民用自己扎就的笤帚把炕扫得干干净净，我们没有这种笤帚。只是这天落下的沙土较往日又多了些，多了又怎样，沙土多了照样睡觉，睡觉是无论如何也耽搁不得的。

没想到，过了没几天，老任就离开我们去了夹边沟农场。那是一天上午，我们全组都在地里平整土地，老任就在我身边拿把铁锹铲地。他，一向不多话，给人的印象是个老成憨厚的人，劳动已很在行。他默默地干活，并未料到即将到来的变故。在我注意到时，地边已站着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们是从张掖来找老任的。老任把铁锹插在地里走到他们面前，其中的一个说："原来对你的处分通知错了，应该是把你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你马上去收拾一下行李，跟我们一起走。"老任的脸刷地一下变得发白了，他没有和我们告别，嘴里应承了一声，就跟着那两人头也不回地走了。对此情景，我和难友们谁也不做任何议论，只是重新拿起了铁锹，继续干自己的活。心里都在捉摸：这是怎么回事？只有工人组长关切地说道："老任这是咋了，咋又去了夹边沟？在这里劳动得不是好好的嘛！"他有些不解，为老任还有些不平。老任有个胃疼的病，有时在劳动中犯了，就要蹲下休息一阵。有一次，组长关心地让

他到医务所去要点药吃，老任笑笑说："不要紧，我这胃病是肚子饿了就疼，春节前在农业社劳动时就犯过几回，那时候，我买一包点心一吃就好！"组长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因为当时灶上不存在吃不饱肚子的问题，老任只是在开饭前肚子饿了，到开饭时尽肚子吃饱也就行了。老任也是没有了工资的人，来农场后他已没钱随便买点心吃了，1956年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肯定已把他的家底贴进去了，老婆孩子原来都靠他养活，此时还不知怎样过活呢！他平时生活上十分节俭，一切开支就在那20元生活费之内，不多花一个钱。此时，这里已传闻夹边沟农场吃不饱肚子，他脸色一下变得煞白，是预料到不可抗拒的可怕的厄运再一次又降临到了自己头上，想到了他对景超有过的担心，我不禁对他今后的命运又想了好一阵。今后，他的胃疼一定是常要犯的吧。不知他到了夹边沟会不会见到我的亲人，同我的亲人分到一处？我倒是希望他能见到景超，把我在这里的一切情况都详细告诉他。

中午，我们下工回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老任，他走得何其匆匆，此后老任也就音讯杳无了。

到农场不久，有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头颇引人注目。老头近70岁了，每天的任务就是打扫场部的厕所。老头有点驼背，个子高大，常穿一身浅灰的旧布制服，头上顶一条颜色发灰发黄的毛巾，毛巾上又戴一顶旧了的布帽，毛巾的两头都从头上垂挂下来，露在帽子外面遮住了耳朵。老头大概只顾了遮挡风沙尘土，没有顾及仪表之类。他的劳动工具是一个独轮小车，用来向厕所里垫土除粪，一把铁锹，一个茏茏草做就的扫帚。打扫厕所工作虽是脏活，比起下地要轻省多了，每天打扫一次也就行了，农场的厕所比城里的公共厕所还干净，臭味不大。这是农场领导对这位老头的特殊优待。老头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农场领导认为他能干这些活就很可以了。老头态度特好，勤勤恳恳、本本分分地每天清扫厕所，毫不懈怠。

很快我就打听到，这位老头叫高天人，是原铁路局的工程师，学问大着呢，会几国的语言。有一次，我在老头的宿舍里待了一会，想和老头闲谈几句，但房子里还有别的人，人声嘈杂，老头的耳朵背，我问了几句话，他都听不清楚，我想和他简单地用笔交谈一下，就问他："有没有纸？"他仍没有听清。我就从已经遗忘的英语里拣起了个词，问他："paper？有没有paper？"他摇了摇头。我也不知他是没听清，还是没有纸。这次谈话便就此结束。此后再遇见老头，我们相互间都亲切地笑笑，算是打了招呼。

我的难友高仲君告诉我，高老头打扫完厕所，有时还到三大队的队部和他聊一会儿天。高仲君当时担任三大队统计。高老头告诉他的一家子高仲君，说他是30年代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高仲君说："那你的学问就很深厚了。"老头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不算啥。使我的学识大有长进的，是我回国后在上海广义书局当了十年的秘书长，这个职务要

审阅书局出版的全部著作，我在审阅各种门类的著作时，自己先要弄懂它们，这就大大地增长了我的见识学问。”

“你的名字为什么不叫高天仁，而叫高天人呢?”高仲君在肃然起敬中，又紧追不舍地问。他知道高老头平时也难得和别人交谈，不会着恼。

“‘仁’算个什么呢，‘人’才是最伟大的，有了人，才有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不叫‘天仁’，而叫‘天人’。”

高仲君只有唯唯称是。“天人”的名字虽取得好，一个对“人”这个尊贵的字眼信心十足满怀热情的人，自己却从高高的天际飘落到了大地母亲的胸膛上，每天在清扫厕所中进行创造。

样子滑稽可笑和蔼可亲的高老头受到我的尊敬，不仅因为他有渊博的学识，且是出版界老前辈，还由于我也曾服务于出版界。1952年年初，《甘肃农民报》编辑部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当时甘肃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读物，我们在编报之余，还要抽时间编些通俗的小册子。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街上到处都是横幅大标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著名的艺术家组成演出团来华访问演出。兰州有幸成为演出团访问的城市，我也有幸去看了演出。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表演了独舞，还有其他种种精彩的演出，使我眼花缭乱。就在此期间，我作为时事版的编辑，编了一本书名就叫《苏联老大哥》的小册子。是年秋冬之际，《甘肃农民报》又脱离出版社，我在出版社先后也只待了一年左右。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甘肃人民出版社扩大业务，到处招兵买马，新任副总编辑沈其东曾到北京等地招收人员。此人虽是老干部后来也成为出版社的大右派，而且居然也被划了个所谓的小集团。在甘肃省新闻出版系统声势浩大火力猛烈的批判右派的大会上，有人对沈其东招收人员的事作为右派罪状之一进行了揭发批判。但高天人那时并未进入沈其东的视野，将其收揽进出版社。如他早早地进了出版社，我们在此间就会因为是老相识而多一些交谈。不过对沈其东来说又会罪加一等，分明是“招降纳叛”嘛!

高仲君是个在反右派斗争中始终没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的人。他原是服务厅计划处的干部，业务处处长曹某是个老资格，文化低，工作能力差。鸣放时，高仲君说，曹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就不得了啦，说他攻击了党的领导，就是反党。高仲君坚决不承认是反党，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自己承认或不承认，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是戴定了。他同服务厅的一伙难友都来到了十工农场劳动改造，委屈不已的难友们常聚到他身边诉说冤情，高仲君说：“再别说了，这是在中国，才让咱们来劳动改造，如果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咱们都没命了，就在农场好好劳动，总会有个结果的。”难友们想想，觉得他说的也是，自己就是有再大的冤情，在劳动中听党的话，跟党一条心，是对自己的一切的最好证明。

景超的来信

我急切地盼望景超的来信。以前，他经常下乡采访，离家后总是每星期来封信，寄来他的情，寄来他的爱。我也是每信必复，不让他焦急等待。小夏断奶后我也下乡采访，每到一地立即写信，以后便是每星期一封了。这已是多年来的习惯。此次别离，我们互相叮咛，今后书信来往要密切些，一定要保持每星期一封，各自遇到了什么事情要在信上多说说，以后见面很难，心里的话只能在信上倾诉。但他的信一直没来。

每天劳动之余，到了晚上，我和小徐、石天爱在昏暗的冒着黑烟的小煤油灯光下闲话一阵，都为思念亲人的痛苦所折磨，都在等家信。小徐的口头语是："盼星星，盼月亮，只盼家中来封信。"石天爱一开口就来了气，她粗声粗气，连连发着脾气说："老太太不知怎么回事，怎么就连信也不来了，她就不知道她女儿在农场劳动吗？她这辈子哪受过这样的苦，她就不知道我为什么受这苦，就不管了，可恨不可恨！"她在妈妈眼里还是惟一可亲可爱的娇女儿，现在，她有权发脾气的对象只有妈妈一人了，远在天津的老人能听见女儿的呼唤吗？

景超的处境令人担忧，几个难友都告诉我，夹边沟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这里，劳动重，吃不饱。有人还说："你为什么不让他来这里？我们这里来劳动的也有开除公职的，这里农场的领导好，把我们对待得好，在这里思想上没压力，只要愿意留下劳动的，场里都要。"可我们哪想到会有这种可能，记得报社人事科长常有德在向我们宣布处分时就说："听说王景超、和凤鸣要求到一个农场劳动，这不行，处分不一样，怎么能在一个农场劳动。"事实上，我们当时并未提此要求。景超曾向分工管文化部的副总编辑樊大畏正式提出，为了照顾孩子，请求让我留在兰州劳动。此话由樊大畏转告后，竟变成我们要求在一个农场劳动。意思明确的话转告后为什么变了样，

1950年秋天的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

我一直不解。后来才得知，樊大畏的妻子在省总工会也划了右派，她并未离开兰州去农场劳动，因为她既要照顾当高干的丈夫的生活，当然也要照顾孩子。樊大畏本人就可以向省总工会领导上提出此要求，而以他省报副总编辑的地位，一旦提出，省总工会便不会不予考虑。所以，同样是右派分子的她，因为有个当副总编辑的丈夫，与我却是两样对待。也许，正是由于这两件事有些联系，景超要樊大畏转告的话才变了样，反正，当时景超也不可能再找樊大畏去对质。话说回来，常有德在大会上公开声明，坚决拒绝了的事，在这里只消自己表个态提出要求，就能实现。我们如果早想到这种可能，景超就不会去夹边沟了，景超如能送我们到十工农场，他肯定就留下了。但是，一切都晚了。

我无法写信给他，因为夹边沟肯定也是个大农场，我不知他分在哪个队。

我忧心忡忡，焦虑万分地等待他的来信。

小徐以万种柔肠焦急地等待丈夫的来信；石天爱骂着娘等待妈妈的来信；为等景超的来信，我觉得日子十分难熬，不知他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精神简直濒于崩溃。

终于，在分别十数日后，景超的信总算是来了，我捧着这封日思夜盼，盼了多日

的来信，心不禁咚咚咚地一阵狂跳。这是一个小小的、揉得皱巴巴的信封，奇怪的是信封开着口，没粘，里面装着一张薄薄的信纸，字写得歪歪斜斜，没有了他的来信中惯常对我的爱称，只是简单地说到他现在新添墩站，已开始劳动，主要是挖水渠，队里管伙食，每月发两三元的零花钱。问我现在的劳动和生活情况，让我详细告诉他，还说，他们规定每月只能发两封家信，让我以后每月也给他写两封信。

这就是我盼望的来信吗？他从未写过如此简单冷淡干巴的信给我，如果不是他的字迹，我真不相信这会是他写给我的信，但这又确实是他写的信，真是他写的信。过去他的来信在末尾总要附上“吻你!”这封信也没写。过去写上“吻你!”我也并不在意，认为这是于情于理必定要写的；这封让我盼望了多日的信少了“吻你”二字，既让我失望，也引发了我感情上无法遏制的渴望。此时此地，我是多么地需要他，我需要在他男子汉的臂弯里静静地憩息，我有多少肺腑之言要向他诉说，心里积蓄了多少痛苦要尽情地向他倾吐，而且只能向他倾吐。但是，这一切都已不可能了。回忆起以

和凤鸣、王景超与大儿子伐夏

往他曾写给我的一封封充满柔情厚爱的来信，我的心里更是痛楚难忍。

过去，我总认为我们从热恋到婚后的书信来往都是生活中最正常的事，不以为意，一般也不保存，那时，我们视革命为重，出现在他的日记里的是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也很喜欢这首诗，只是在我们的心目中，"自由"二字已改为"革命"。但是，当我们沐浴在爱河之中自由浮沉之时，一切又全都变得毫无羁绊。1950年夏天，在我们开始不久的热恋之中，他要去平凉采访，分别没几天，我就收到了他长达16页的来信，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厚厚的来信，思念之苦在渐渐消融。他仿佛就在我的耳边依然说着缠缠绵绵的情话，诉说着他剪不断的离情别绪，他温柔地不断轻声呼唤着我，呼唤着他从心底喊出的惟有他才能呼唤的对我的爱称，轻轻敲打在我甜蜜蜜的心扉上。这时苦涩的离愁又变得别有一番滋味。他信上的字字句句，恰似一弯清泉，丁丁冬冬，在我纷乱的心绪里注入了甘甜、宁静、快乐，这世界真美好！我立即写信给他。

几度没完没了地读信，我的神情引起了同屋女伴边绥的注意。她是复旦新闻系的，没毕业就参加了工作，比我大几岁，我们一向友好，坦诚相处。一天，我又收到了景超的信，她竟开口说想看看景超的来信，我有点羞涩，哪有把情书拿给别人看的！但她又执意要求，以我们之间的情谊，觉得看了也无妨，就让她看了这封。她靠在单人床的被子上含笑而读，仿佛颇有些触动，看完说："你真幸福，他真的非常非常爱你！"我笑了，沉浸在爱情的迷醉与快乐之中。

现在，从他的来信看，我们在苦难中想要互诉衷肠、沟通心曲已无法做到，这种残忍的剥夺使我的心震颤不已。因为我立刻也就明白了一切，他的通信自由已被剥夺。信，是经过检查才发出的。检查信的人居然认为劳教人员的家信可以不封口，信封里装的信件丢失了也无所谓。寄出不封口的信件，在全世界大概也只有酒泉夹边沟农场这个独特的所在。这奇特的寄信方式，只是进一步提醒我，惟一沟通和抚慰两个受难的灵魂的渠道已被堵死。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是他所始料未及的。我们原都认为不能劳动生活在一起，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心曲通过书信往来，即便不能尽情表述，精神上的联结，感情上的互补与互勉，将支撑我们渡过难关走出困境，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泡影。

可怜而可叹的右派分子的公民权，被戏弄、被蹂躏的公民权！

令人追悔不已的，这竟是景超自己的选择，人事科通知对他的处理时，另一位科长王毅还告诉他，开除公职后，也可以自谋出路，譬如，可以回老家劳动，或自找其他生活出路，如果不愿自谋出路，就去农场劳动教养，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他那么痴，那么傻，竟仍然以一腔虔诚完全相信了这番话。他也过分自信，中国人有句老话："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自认为他自己

就是在逆境中将要获得新生命的人。他性格倔强，不屈不挠。一次，报社领导找他谈话，一顿猛批后，说他态度恶劣，破坏运动，自绝于人民，继续顽抗下去，就该进劳改队了。他回到家中，神情有些黯然，还说道："真要让我进劳改队我也不怕，我就要写劳改事业在新中国的胜利！"真是天真而可笑的迷梦哟！他那纯真的童心依然未改初衷，没有丝毫的泯灭。他认为，为混口饭吃去自谋出路太窝囊，他认真想的就是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早日走出困境，把自己的迷梦再继续下去。他已没有了公职，谁还会对他耕耘的笔横加干预呢？实现自己的梦幻也许倒是有了一抹玫瑰色的霞光！他幼稚地这样想。

风云变幻的1957年使我们成为"罪人"，负罪后的孤独、寂寞、痛楚、求索，又使我们的思维模式有了些转换，我们眼睛里的世界也另有一番变化，单色调隐匿了，一目了然的线条退出了视野，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新的画图，色彩纷繁，景色奇丽，阴晴无常，诡谲多变，光明与黑暗同在，红日在迷雾中冉冉升起。他宽阔的胸腔里燃烧着滚滚烈焰，他再一次跪拜在文艺之神的圣殿里默默祈祷，他要用自己并不笨拙的笔义无反顾地去表现他才刚认识、才刚了解到的一切。才刚出现在眼前的那个陌生世界给了他从未有过的撕心裂肺、痛彻骨髓的经历，他觉得这世道无比险恶，太不公正。内心深处，则出现了一种无可扼制的坚强力量，要他把自己身心受到的残酷伤害诉诸世人。这痛苦是他个人的，是我们家的，他也已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它是时代的悲剧。

可叹他太天真太善良了，多年来他囿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诲，思维模式依然刻板单调。反右斗争后期，报纸重新刊出王实味20世纪40年代的杂文《野百合花》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作为大毒草教育大家。他读后十分感慨地说："既然这些杂文都是大毒草，我还写什么杂文呢，我早先没读过。"那时，他依然头脑单纯幼稚。他哪里知道，毛泽东以他的雄图大略，倡导"双百"方针，游说于大江上下，在2月最高国务会议及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长篇报告，动员知识界大胆进言。而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全国出现不久，风乍起，到5月15日，毛泽东已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迅速指出了右派的"猖狂进攻"。此时，全国人民还被蒙在鼓里。当年读过与未读过《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的人们，都会重蹈覆辙，毛泽东动员鸣放太动人、太具诱惑力了。在此新形势下，他提倡写杂文，还说："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指《人民日报》）写一些文章。"[①]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想要写的文章，普通的知识分子不用辞职就可以写，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可是，在"双百"方针的鼓动下写了杂文的，后来许多人未能幸免于当

①转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9页。

右派。

人事科长和他谈话，说去劳动教养有利于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就幼稚地认定是这么个“理”。他决定去酒泉夹边沟农场，就是考虑到去那里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有利些，特别是他还想重新拿起笔，他想只有摘了右派分子帽子才有可能。所以，再艰苦他也认了。当然，他再也想不到，设若一切按他的理想实现，更大的文字狱还在以后，更残酷的迫害他将无法幸免。

但是，由痛苦浸泡过的虔诚所作出的选择，却迅即惩罚了他自己，惩罚了我们。

我反复读着这封被检查过的来信，想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些什么，却什么也捕捉不到，干巴巴的字句，意思明确，连引起联想的可能都没有。歪歪斜斜的字迹，说明他是趴在炕头，或在腿上垫了本书写就这封信的。

无论如何，我还得提起精神给他写回信。我知道，此时他等待我的回信，一定也是等得焦急万分。应该说，我来十工农场以后，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已够满意的了，农场领导和工人们在政治上不但对我们不加歧视，常常感受到的倒是同情和厚爱。第一次听到农场领导上称我们为“同志”，曾使我惊讶，后来，所有的人都这样称呼。作为新闻工作者特具的政治敏感，我知道这种称呼在当时犯禁，是个政治性的“错误”，但，这个称呼使我们大家都感到自在亲切，敌我矛盾的界线无形中消除了，这个称呼更唤醒了每个人的自尊心，挨斗时受到的百般凌辱以及由之而来的委屈自卑情绪得以逐渐转换，大家自重自爱，在生活和劳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都努力克服自身的弱点和各种困难，劳动上抢先，使自己的形象有个人模人样。我们的工人组长是战士出身的复转军人，一开起生活会来，开场白总是说：“同志们犯了些小小不然的错误，到这里参加劳动表现都很好，我这当组长的对大家关心不够，有不到的地方，大家要及时提出来，不要隐瞒，不要等日子长了，才说我这个组长咋样咋样的，到时候影响了工作就不好了。”每次先做检查的倒总是他自己。对这一切，我感到很知足，很满意了。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据说，当时农场领导曾向各大队下达指示，对我们这些落难士人不能歧视，不能直呼右派分子，要称同志或下放人员。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能下达这样的指示的农场在全国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多年后我回忆起当年我们在十工农场的境遇，仍觉感激不尽，在中国右派分子的“改造”史上，我们曾经有过最幸运的几年好时光。

后来曾是我的演出伙伴的侍峒山，初到农场不久，因为有个年轻工人喊他“右派分子”，曾大动肝火。当时还有几个一起劳动的难友，侍峒山就大骂此人：“你喊我们右派分子，你看爷爷们哪一个哪一点不如你！你比我们强在哪里？你说，你自己说！”侍峒山对把自己划为右派分子从内心深处就从未服气过，他替所有的右派难友说了话，借机把年轻工人骂了一顿。一起劳动的难友嘴里没说什么，心里自然也是对

年轻工人称“右派分子”不悦。后来，年轻工人向组长说到自己在地里挨骂的情形，组长也批评了他，怪怨他不对。从此，再也无人敢直呼右派分子了，侍峒山理直气壮地奋力劳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拔尖，打土坯，他一天能完成1000多块，双手摘棉花动作极快，一天能摘52公斤，全大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他用实际行动，在在证明自己原本就是个一心向党的好干部。到1959年年底，场里为他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侍峒山是民勤人，民勤在河西走廊是个苦地方，当时就有“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的说法，意思是民勤地方太苦，当地人多出外讨生活，外地人很少有在民勤留下的。在农场我接触到的很多民勤人都很能吃苦耐劳。侍峒山就是一个突出代表。

应该说，几百名落难者心情愉快地在这里甩开膀子劳动，对于农场的大丰收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不仅如此，落难者在财务、统计、农艺、管理、教学诸多方面学有专长者大有人在，可谓人才济济。农场领导根据工作需要，不断把各方面的人才充实到各级的各种工作岗位上，十工农场便有了一个从全省来说也是班底过硬、作风正派的业务骨干网络，这个网络由场部自上而下，直到大队和生产队、组，都充分发挥了落难者的积极作用。说实在的，这里的落难者在反右斗争中被迫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每个人心里都委屈万分。他们来到农场，在这特殊的境遇里，人人都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仍是革命者。同时，为了摘掉头上沉重的政治帽子，大家都严格要求自己，说大家作风正派，绝对地都能站住脚跟。

景超短短来信的字里行间，使我意识到他经历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受到的是另一种对待——一种我难以设想的非人的对待。两个农场“两重天”。我在这里享有的一切，在他已是不可能企求到的了。唉，唉，我的亲人，一切的不幸与不公，为什么竟然全都压到了你的身上？

他的来信写得很短，语句生硬干巴，大约也是一种暗示，让我知道，信是经过检查才发出的。他没有必要在管教干部面前展览自己的情感，说出自己真实的思想活动，流露一丁点儿的不满。他没有傻到再去获罪。反右斗争时一直标榜不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而我们家就被运动办公室派人抄了，还抄到了我父母家里，家里每一张小纸片都被认真翻阅检查过，我上中学时的作文、周记，和同学的通信，都被一一仔细检查了一遍。说真的，在这方面，我们都已有了足够的经验，上当的时光早过了。

但是，我的信是写给我的亲人的，发出时没人检查，该说的话，我要随自己的意说个够，说个没完没了，来农场后劳动生活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同屋两个女伴姓甚名谁，从何处来的，相处如何，我都不吝笔墨，一一写明告知。我知道，这封信写得越长越详细，他对我在农场的一切也就放了心。当然，我写得也极有分寸，农场领导和工人们称我们“同志”的事，我绝口不提，写了，就等于对农场领导的出卖，农场领

导对我们这些落难之人可是恩重如山啊。看得出来，那些管教干部“左”得可爱，什么事也干得出来。这里对我们宽一点，他们也许会浑身不自在。写信不慎，他们会告发我们的农场领导的。信末，我竟忍不住地仍写了“吻你!”要检查就检查去吧。我就是要吻我的亲人，用我热烈的亲吻去抚慰他那重创的心，去暖热他受难的灵魂。你们想阻拦吗？你们能阻拦得住吗？我还故作糊涂地问道：“上次的来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

景超的第二封信像是向我示威，依然没有封口，后来他的信大多数都没封口送到了我的手里。多年来，谁也没有告诉我，夹边沟农场为什么要把没封口的信寄出。我只能得出自己的分析结论，那些管教干部视右派分子如猪狗，检查信件的手续决不省略，至于检查后封口的事就要视他们的高兴了，高兴时随便粘一下，不高兴时敞口交给邮局寄走也就完事了。他们的头脑里只有阶级斗争。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个个认为自己的“家书抵万金”，在他们只看做毫无意义的纸片，他们在检查后付诸邮寄，已是对右派分子的莫大恩惠。

景超的第二封信仍然写得很简短，写得长了，也许会招来管教干部的责骂的吧！信中说了说劳动的情况，然后写道：“我现在饭量很大，你大约想不到，今天发了津贴，吃过饭买了一斤饼干，一下子就全吃光了。我大概瘦了，因为我觉得眼镜嫌大了……”

这些话证明了原来的传闻，他在挨饿。

心情万分沉重，两腿无力，我不知该怎么办。心里只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呼喊：他不能挨饿，他不应再挨饿!

少年的他就在挨饿。卢沟桥日寇侵略的炮声，把他和大哥逼出了家门。大哥参加商震的部队打日本鬼子去了。13岁的他，由一位老乡说情，在四川的一个伤兵医院当了看护兵。“名为看护兵，实际上是个小勤务兵，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亲眼看到和亲身感受到了社会上最黑暗的东西。”他曾回忆说，“在21医院时，经常吃不饱，在饭篓子旁边打架的事时常发生。搬家时我也必须和那些成年人一样的背、抬家具，并受大兵们的欺凌。1939年夏天，曾因和司药室班长打架，一气之下和其他几个小看护兵从云阳逃到了万县，准备另谋生路。因为营养不良，体质很坏，我曾在酷暑中昏厥……”（以上引号内的文字引自景超自传）

读书的强烈愿望使他几次外逃，终于离开伤兵医院，于1943年春考上了为沦陷区流亡学生办的国立六中。当时这类中学管饭，不交伙食费。但是，“学生生活也很苦，也是经常吃不饱，又没有经济来源，各方面都非常困难，但比过去当小看护兵时，精神上却是进了福地了……”景超回忆说，“自此又开始了快乐的学生生活。”（以上文字仍引自景超自传）

我无法想象他和小伙伴们为争一口饭在饭篓子旁打架的更细致更具体的情景，因为他从未向我描述过这些事。他曾说，上国立六中在饥饿难挨时，常和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地里偷挖地瓜吃，他还回味无穷地说："地瓜洗洗就能吃，吃起来又脆又甜，你还没吃过呢！"无论是在饭篓子旁打架也好，偷挖农民的地瓜吃也好，那时候，他毕竟没有现在的特殊身份——一个举国声讨，称之为右派分子、丧失了通信自由、作为人的一切已被剥夺殆尽的人。现在，他不能为抢吃一口饭和别人打架，更不能因饥饿而偷窃，他所能做的就是规规矩矩地劳动改造。我们都已成为不许"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每日里，他只能饿着肚子，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面向黄土背朝天，劳动不已，挣扎不已……

突然，我感到一阵恐怖，他能够经得住这一切吗？

我能够为他做的，就是寄去了10元钱，告诉他，今后每季度我将寄10元去，望他买些吃的。他一定也知道，这个数目在我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初到农场的一两年，农场小卖部有时尚有食品卖，一斤粗劣的饼干不到一元就可以买到，不要粮票，可惜我能够寄出的钱太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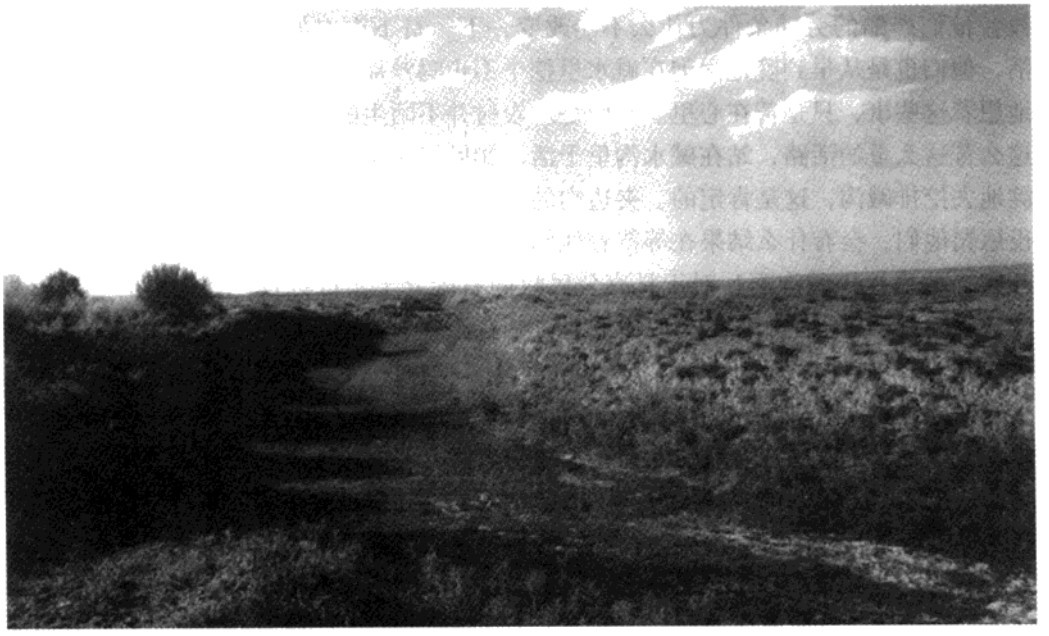
写这封回信时，一种复杂的心态，已使我无法在信末写上"吻你"二字。此后，"吻你！"在我们的通信中永远地消失了。

景超在那里忍饥挨饿，使我对那个农场从心里萌生了敌意，管教干部一次又一次地把检查后不封口的信寄出，更使我不能不产生想法，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反右派斗争粉碎了我们彩色的梦，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我们感喟不已，已不再感喟了。但是，我们坚贞的爱情是圣洁的、高尚的，紧紧封闭在内心，为我独有、为我珍藏的这份感情，又使我觉得十分富有。我在上封给景超的信里炫耀了我们的爱情，对于那些管教干部，只一次也就够了。我蔑视那种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继续窥测我们的感情轨迹，使我们忠诚的爱情受到亵渎呢？

既然，他们把景超和我隔绝在异地，用枪杆子威慑我那无辜的亲人——几位右派难友被解放军用枪杆子押解来十工农场的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他们还用饥饿折磨他们不应折磨的众多难友，也折磨我的亲人。我跟他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我满腔悲愤，只想对着浩渺无际的上苍控诉，呼喊！

但，我只能沉默下来。沉默，对于我们这些落难之人，是安抚无以认罪、躁动不安的灵魂，使自己理智起来、得以自控的一个过程。保持沉默，将检验一个人的自控能力，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免出现非常的举动和语言，从而进一步检点自己，保护自己，所以，沉默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品格，一种落难之人必须具备的品格。我一向谈笑不拘，性格活泼，在这个特殊环境的特殊际遇里，我学会了沉默。

景超的第三封信里，说他们在挖排碱沟，每天站在碱水沟里干活，腿脚都被碱水



夹边沟劳改农场的右派们当年挖的排碱沟

蚀破了，疼痛难忍，一块儿劳动的人有的有长筒雨靴，防止了碱水浸泡，很解决问题。为了更好地劳动，希望我设法在酒泉托人为他买一双长筒雨靴送去，买一双需20元。

夹边沟劳动条件的严酷，显然是以前我们闻所未闻的。我们离开报社时尚有50元的积蓄，他让我带去以备意外之需，这是我俩的全部财产了。他正是知道有这笔钱，所以才提出买长筒雨靴，不然，他是不会开口的。有个难友关维智原是省委组织部的干部，我们平时都叫他小关，家在酒泉。我立即去找他，请求他的帮助。小关热情地一口答应，说可以让她妹妹办此事，并立即给妹妹写了信。长筒雨靴由小关的妹妹买到后很快送到了景超的手中。我至今铭记小关的难友情谊，对小关的妹妹不怕政治上担风险，星期日亲往数十里外的夹边沟送雨靴感念不忘。我和小关分别也已30多年，小关已成了老关，不知这30多年他是怎样走过来的？1991年8月下旬，我在河西之行中途经酒泉，才和他再次重逢。此时，他已担任酒泉行署文化处处长，因为年轻，还正在任内，我们畅叙别情。在四工农场，他曾被派去采矿，不幸炸掉半个指头，看见他那残指不禁仍令人心酸。

再说，办妥给景超买雨靴的事，我心里略略有些宽慰，有了这双长筒雨靴，他可以免受碱水浸泡皮开肉绽之苦，是可以“更好地劳动”了。可那些没有长筒雨靴的

人，他们还要从早到晚浸泡在碱水里继续忍受皮肉之苦，为什么他们竟要经受这等苦役？他们严酷的劳动条件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贫下中农如果遇到这种挖排碱沟的活，他们也是从早到晚地浸泡在碱水里挖个不止吗？那么劳改队呢？我翻来覆去苦苦地想着这些事，只是苦在心里。我曾是对农村并不陌生的女记者，我从未见过农民干这么苦这么重的活路，站在碱水沟里干活。20世纪50年代翻身解放的农民不会皮开肉绽地去挖排碱沟，这是肯定的。夹边沟的难友们为什么不能得到更人道的待遇？用苦役惩罚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在等待着他们呢？就是对待劳改犯们，也没听说让他们皮开肉绽地去挖排碱沟啊！对于具有公民权的右派分子实行劳教，其惩罚的方式、程度，竟超过了对触犯刑律的劳改犯的对待，右派分子就更可恨吗？我怀疑，右派分子们具有的文化素质，原来的社会地位，等等，在当时一定是触犯了那些管教干部们的某一根神经。我后来转到四工农场，发现那些管刑满释放人员的干部们，包括场长在内，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文化低，个别还是文盲，他们对于反右派斗争并没有直接经验，从报纸上了解到的经夸大渲染了的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使他们对于右派分子有着本能的特殊反感。在他们的心目中，右派分子凶恶的反动本性是无法令人容忍的，右派分子都是知识分子，原来都是干部，待遇不错嘛，他们竟然乘党整风之机，跳出来猖狂向党进攻，真是罪恶滔天。景超和众多的难友们一到夹边沟便陷入无法忍受的苦境，受到当时的政策规定所不允许的恶劣对待，同这些管教干部的感情用事，不能说没有关系。

两年之后，我到了四工农场。四工农场机修厂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姓王，刑满后仍不准许回家，在机修厂当了“职工”，是个技术骨干。一次，他和我攀谈起来，问我：“你爱人现在哪里?”我说：“夹边沟。”他立即吃惊地说：“哎呀！你爱人怎么去了夹边沟，以前劳改队里调皮捣蛋管不了的，才往夹边沟送，劳改犯们最害怕去夹边沟，一听说往夹边沟送，先就吓软了。唉！那个农场可不是人待的地方。”他连连摇头叹息，对景超的处境表示极为担心。他的话进一步证明，夹边沟名为劳教农场，事实上对右派分子们实行的是管劳改犯的一套办法，而且自有其更严厉的一套惩罚手段。省劳改局把全省惟一的、主要接纳右派分子的劳教农场选中在夹边沟，对其施政方针肯定早有指示，早就做了安排，这样，景超和两千多难友的悲惨命运便可想而知了，以后酿成大惨案的前提，在农场改为劳教单位时就已形成。而当时我们都既愚又傻，对这一切不仅毫无所知，连想都没想过，景超天真地自投罗网，作为妻子的我更没想过应该劝阻。

在此期间，我在十工农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已有很多改善。场部开办鸡兔饲养，我和小徐被调去养鸡兔，在畜牧师的指导下，我们尽心尽力地喂养，力所能及，心理上消失了压抑感，我每天记饲养日记，运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训练鸡们听哨音吃食。喂食前，我一吹哨子，鸡们便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我觉得乐在其中。

我们才到农场时，由于春耕尚未结束，很多日子没有休息，我们本来就难以支撑、疲累不堪的身体很受不了，但是，工人、民工也和我们一样没休息，我们无话可说。后来实现了双周休息一次，每当休息日来临，我们也欢快非常。

在第一个休息日，我们先自在地睡了一下懒觉，然后洗头洗衣服。我们每天和土打交道，又常遇到风暴的肆虐，尽管每人都用布帽子把头发全塞了进去，头发里还是积了很多沙土。下工后取下帽子，头发表面落上的沙土还一层，低下头用手拂打，能打掉一些；把手指插到头皮上，还能摸到一层沙土和汗水搅和在一起的污垢，这是无法拂打掉的，使劲在满头乱搔一阵，也能稍稍舒服一点。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女性，原来都以修饰自己的头发为乐事，如今美丽的头发变成了这般模样，飞蓬乎？鸡窝乎？说什么都行。真是几多无奈，几多不快！不过，跟头上的右派帽子相比，这又算不得什么了。如今头发成了飞蓬、鸡窝，是为了最终取掉那个更令人无奈、更令人苦恼不堪的右派帽子，所以，平日里，谁也不说什么，因为说了也毫无用处。在休息日，我们洗去头发上的污垢和沙土，洗头水都变成了黄泥汤。互相看看，明亮蓬松的秀发又重新出现在每个人的头上，三人又都散发出青春的光彩！小徐身后垂着两条明光可鉴、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回眸一笑，长辫轻轻摆动，妩媚可爱；石天爱的头发有点自来弯，显出几分潇洒，几分倜傥；石天爱还帮我剪去小辫，把我的头发精心修剪成城里正流行的式样，说我："像是变了个人！"我笑了。她又说："我就喜欢你笑的这个样儿，你怎么会是兰州人呢？"她心目中的兰州人，跟京津一带的女性大概大有差别。作为女性爱美的天性，就是把我们发配到荒漠孤岛上，怕也是改不了。

小徐是个勤快人，洗完衣服，又坐在铺位上缝缝补补，把带来的大提包里的衣物整理一番。不知何时，她把装有丈夫照片的镜框拿出来仔细端详，看个没完，一会儿，又把照片从镜框里拿出来，看了正面，又看背面。我侧过头去一看，原来背面有些钢笔写的字，大概是小梁为她写的临别题词。她把我当作了互诉心曲之人，无言地把照片背面写的字拿给我看。我拿起照片一看，果然是她亲人的题词，写的是：

莲：

我的爱，勇敢些，勇往直前地去吧！

爱你的杰　58.3

她满脸凄楚，依然沉默无语，已是断肠之态！这有限的字，已让她洒了多少伤心泪，又勾起多少离恨别愁！

丈夫要她"勇敢些"，"勇往直前"！那是因为她年纪轻轻别夫抛雏、忍辱负重到

遥远荒僻的农场劳动改造，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敢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应该说，她是在按丈夫的嘱咐努力去做，她的一切表现已经够勇敢够坚强的了，20岁的青春年华，在别的许多女孩子们还正是编织美丽梦幻、享受人生最美好时光的年纪，而她已在政治上蒙受不白之冤，随之而有了目前的种种不幸。她有冤，她有苦，还得强作欢笑强忍受，她已经在这样做，我们也都在这样做。因为我们都知道，如若怨尤，如若反抗，只会使自己陷于更悲惨的境地。但，要她剪断这离恨别愁可是太难太难了。此恨悠悠，何时方休！

石天爱看到小徐看亲人照片时凄苦缠绵的痴态，也不多话，把她和妈妈的合影拿给我看，这是她七八岁时的照片，她妈妈三十一二岁年纪，长得端庄清秀，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她自己完全是男孩打扮，一身西装，打着领带，皮鞋锃亮，挺神气，只是没有妈妈好看。她刚接到妈妈的信，她妈妈说是寄来了肉松和一些日用品，所以她兴致极好，连连说："天津'吉士林'的肉松，特棒！老太太给我寄，只能寄'吉士林'的，她不会买别处的，寄来了你们都尝尝。"肉松还没收到，她好像已经吃进了嘴，舌头在嘴里动来动去，仿佛品到了肉松的香味。石天爱平日里极少伤感之态，从不流泪。28岁的人还没有心上人，也许她早就悲愁过了，一切都想得开。她一说家常，就说她们母女俩一起生活的种种情景。她爱谈论有关吃的事，特别喜欢精神会餐一番，不过也挺克制，说到她家的吃喝，只是说到她怎么和妈妈一起包饺子，吃麻酱面要再来点黄瓜丝之类，普通人家难以吃到的讲究饭菜，她从不提起，因为她知道不能说，也许，在批斗她时，她已为说这些话吃够了苦头。

这天，我们还从饲养组买到一茶缸牛奶，三人分喝，石天爱喝牛奶的那个馋样儿，真像是喝到了天上的琼浆玉液，一面连连赞叹说："真香，真香，真香哎——"一面不无遗憾地说："没麦片，有麦片煮一煮就好了！"

大灶上也大改善，中午吃苜蓿韭菜包子，苜蓿是从农场的苜蓿地里采摘的嫩芽儿，韭菜头一天就派人去县城买来了，馅里有一星半点的肉，一个包子要半斤粮票，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吃过这么大的包子。我们狼吞虎咽，吃得香极了。

但是，景超的来信在我心灵深处罩上的阴影，是无法拂去的。当我吞咽味美无比的大包子，把肚子撑得圆鼓鼓的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他因饥饿而瘦削了的面庞，眼镜耷拉在鼻梁下方……当我唱着歌儿和可爱的兔子、鸡们为伴，热心喂养它们的时候，他在烈日的曝晒下站在碱水沟里挥动沉重的铁锹挣扎不已的身影，竟不离我的左右，随时出现在我的身旁，只是他已穿上了一双长筒雨靴……我和周围的许多人随意谈笑，颇有些自在，颇有些自得的时候，我深知，那些蛮横不讲理的管教干部就巡视在他的周遭……他失掉的太多太多，而一切都已无法挽回，无法补救了。

这年春夏之交，张掖地委书记安振与水利局副局长、副总工程师张守宽在酒泉谈

工作，张守宽听说夹边沟农场劳动很重，在那里劳教的知识分子很苦，就说："反右派斗争时，一直说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夹边沟劳教的右派我听说苦得很啊，这合适吗?"安振说："你不懂政治，没有读懂《联共党史》，如果在斯大林时代，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枪毙的。我们让他们来劳动改造，就是给了他们最好的出路。政治是残酷的、无情的，你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你不懂。"这些话给张守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夹边沟右派们经受的苦难，当时的领导早就定下了调，认为是"最好的出路"，右派分子们哪还会有什么指望。

使我追悔不已，痛苦不已的，这竟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演出活动及其他

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七一”快到了，我们对这个节日的到来不是不想，而是没有资格去想它。原因很简单，我们都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怎能去参加庆祝活动呢？

没想到，有一天工会主席邹士杰特意找到我，告诉说：“七一”那天，全场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要奖励先进工作者，还要举办全场性的文艺会演。因为女同志少，我和小徐一定要出个节目，干不了别的，唱个歌也行。邹士杰是专门找我谈这件事的，意思是非出个节目不可。为了给节日增添一点气氛，这已是义不容辞的了。

这可难坏了小徐和我，小徐说她根本唱不了，我虽从小喜欢唱歌跳舞，参加正式演出极少，一紧张干脆就唱不出声音，不演吧，既辜负了邹士杰的一片盛情，又怕说我们架子大。我们心里不禁也有点好笑，右派分子怎么能参加庆祝党的生日的会演？这可有点阴差阳错。但是，领导上让演，我们也不便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后来，我和小徐一起，在宿舍前的空地上排练了个俄罗斯双人舞，到时候就凑个热闹吧！我来农场时带了两件从北京买的时髦衬衣，还带了一块蓝棉绸，小徐也有一块布料，我们就用两块布料粗粗地缝成两条长裙，穿上漂亮衬衣，就是我们的舞衣。

当然，我和小徐都没有想到，我们竟然要在农场正式演出，而且是在庆祝“七一”的文艺会演中演出，我一想到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就忍俊不禁，生活真不知在跟我们开什么玩笑！不管怎么着，我还得感谢这个玩笑，跳舞总是令人惬意而愉快的。

“七一”这天，也是个难得的休息日，大家都脱去劳动时的破旧衣衫，穿着整洁漂亮，高高兴兴地去参加庆祝大会。我们同组的工人们大都穿上了崭新的蓝卡其布制服。全场各队的人都来了，获奖和参加演出的人更都是兴冲冲地来了。场部临时在空旷的场地搭起了戏台，拉上篷布，挂起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七周年”的横

幅，显得庄严红火。台前放了些建筑用的长横木，就是台下人们的座位了。因为全场的人都要来开会，有的大队离场部二十来里路，步行来很费时间，大会开始已近中午。先是庆祝党的生日暨发奖大会，右派分子们劳动表现好的，和工人们不分彼此，同样获得了应有的奖励。个人获奖的奖品，我记得是一面纸做的红旗，农场条件差，意思到了就十分难得。我印象深刻的是省人民银行的一位难友李正华也获了奖，他坐在获奖者的行列里，因为天气热，只穿着背心，表情庄重，魁伟的身体，肩膀宽宽的，发达的胸肌线条分明地隆起，十分英武。我想，这位难友来到农场才几个月，劳动上就取得突出成绩，他一定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本来就是好样的，心中无愧。他那坦诚庄重的神情，也在向大家表明，自己本来就是党的好干部。尽管当时我还不认识他们，我仍然为我的难友获奖感到欢喜自豪，因为他们的获奖，说明农场领导确实把我们当人，和工人们一样对待，他们作为我们之中的佼佼者为大家争得了荣光，我怎能不兴奋愉快呢？今天的读者对于这种感受很难理解，知识分子得到了和工人同样的对待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在当时，我们是以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身份同国家主人翁、充当领导阶级成员的工人坐在了一条板凳上，这里没把我们当做打倒在地的阶级敌人对待，从当时全国的情况来说也许是一个特殊的例外，对我们蒙冤受屈的数百名右派分子来说，更是一种机遇。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土上，右派分子们有这种幸运的角落并不多。多年之后，我依然把十工农场当作我心灵上的乐土，是在这时就有了深切的感受。也许，“山高皇帝远”，才使这里有可能把我们当做普通人来对待。

下午的文艺会演节目十分精彩，成为全场文艺人才的大检阅。原省人民银行学校冯士伟和武威步兵学校曾芳煜的独唱，铁路文工团郑文义的小提琴独奏，李佐亭的山东快书，徐保安、赵芝贵自编自演的相声，等等，都颇具水平，五大队的难友们还演出了秦腔折子戏。我和小徐的双人舞，乐曲只是简单的重复，到演出时已是一个小乐队在伴奏了。这些演员，有些原来就是专业文工团体中的佼佼者，如郑文义的小提琴独奏，据说在西北五省（区）是第一把；有些人原来经常参加业余演出，如冯士伟的独唱、周至德拉手风琴绝不低于专业文工团的水平。符文虎是原省公安厅的乐队队长，会多种中国乐器，他曾多次带领他的乐队到甘肃日报社为舞会伴奏，他曾注意到我，原来我们只是不相识罢了。相比之下，我和小徐的双人舞真算不得什么了，我们只是作为惟一由年轻女性演出的节目而受到大家的注目。

这次演出，使我结识了众多多才多艺的难友。农场领导一定是向县上汇报了我们会演的盛况，得到县上的鼓励支持。不久，就又从全场把会演中出现的人才集中起来，增添了新的节目，紧张排练，决定到县上隆重演出。新增加的节目有：大联唱《歌唱安西好地方》，用绣金匾的调子配的歌唱总路线的大合唱，还有个活报剧。《歌

唱安西好地方》的词曲都由部队文工团出身的曾芳煜编成。曾芳煜当右派前在文工团是吹黑管的，来农场后没有黑管可吹，倒是发挥了他多方面的才能，他嗓子好，唱男高音很受欢迎，还能指挥大合唱，吹笛子、拉胡琴也行，乐队人手不够时也能凑个数，特别是他临时编个歌的本事，尽管歌词十分粗糙，但听上去好听，又能顺应当时的形势，我们的演出就很需要他这么个人才。《歌唱安西好地方》的朗诵词，由说山东快书的李佐亭朗诵，曾芳煜指挥，大合唱全体队员都参加，可惜女声只有小徐和我两人。总路线的大合唱，由曾芳煜和我轮流领唱，开始我十分胆怯，试唱了几次，因为天天练唱，嗓子唱开了，胆子也大了，效果还行。小徐、我，还有一个河西来的小伙子，还一起排练了当时十分时兴的《采茶捕蝶》舞，采茶姑娘只有两人，舞台画面很差劲，不过也算是尽我们的努力换了个花样。在排这个舞时，石天爱说，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时，天津资本家的妻子们兴高采烈，就排练了这个节目演出，服装都是特制的，非常漂亮，参加演出的有几个人她都认识，后来，她们演出的照片还在《人民画报》上刊出。我听了，很有些感慨，我们原来都是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如今落此下场，连“人民”都不是。我们的演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实际上都不准许，对这，我心里非常清楚，不免又觉得十分凄凉，而这感觉也只能埋在自己心中。

我们只紧张排练了三四天，就去县城演出。白天，先在街头演出活报剧等小节目，我们的《采茶捕蝶》舞，也在街头演出。场部的秘书姚璈还拍了几张照片。晚上在大礼堂演出，结果是轰动了全县城，能容800多人的礼堂挤得满满的。

我相信，为浩瀚戈壁所包围的安西，号称世界风库终年为暴风肆虐荒僻已极的安西，远离现代文明落后贫穷的安西，在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热情地歌唱之前，不曾有谁歌颂过她。我们引吭高歌，配以优美的音乐，再加上李佐亭慷慨激昂、热情奔放的朗诵，其内容虽不免也具有那个年代特有的矫饰之词，也使观众们大为倾倒。说实在的，我们唱出了对安西的美好感情，还是由于十工农场以宽厚的胸怀接受了我们，庇护了我们，还给我们以人的尊严，使得我们能够以正常人的感情看待安西的一切，从内心深处爱上了这里的人民和土地，愿意以积极的创造把自己的感受奉献给这里的观众。被伤害、被凌辱的灵魂就是做戏也难以表现出根本不存在的感情，真诚的微笑是假装不出来的。

我们的乐队阵容十分强大，由数十人组成，各种乐器齐备，拉小提琴、手风琴等主要乐器的都是高手，有几人都是一专多能，如周至德拉手风琴是一把好手，打洋琴、拉二胡、吹笛子也都很在行，只是为劳动方便剃成了光头，演出时外观有点不雅，他哪里会想到来农场后又有了演出的机会？郑文义拉起小提琴来风度翩翩，俨然一副音乐家的派头，在他那神奇的弓弦下流动着的美妙旋律，格外地引发着人们美好

的遐想，有时在陶醉中又不禁涌出丝丝伤感凄迷。古人有“琵琶弦上说相思”的诗句，毕竟，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之人，远离亲人的孤寂，被打倒在地的屈辱之感，时而袭扰着每个人难以宁静的心。

我在紧张的排练与演出活动中，时不时地想起在酒泉夹边沟受苦挨饿的景超，在万般无奈中又只能强迫自己尽力排除对他的记挂……兰州来的家信，对孩子们的情况总是说着让我安心的话，妈妈的肠结核、胃下垂经气功治疗大有好转，已经上了班，等等，对这些，我就不去多想了，令人忧愁的家事，每一个让我记挂的亲人，我哪能件件桩桩一一都去想个周全呢。来十工农场以来，即使在较为轻松的排练与演出活动中，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的，在日常的劳动中，一切就更不待说，每天的生活都像一根紧绷的弓弦。我很累很累，顾不得去想去思索什么。多年后我才知道，在我和景超来河西以后，妈妈虽勉强去教课，而久病的身体已不允许她再工作，她曾多次昏厥在讲台上人事不省……

县上对我们演出的认可，使我们略感宽慰，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十工农场给予我们的对待，至少是得到县委的默许的，我们除了不能回到原单位工作，其他各方面都和农场职工一样，这对于我们已是一种难得的礼遇和幸福。多年后我才得知，这次到县上演出，农场领导并未将我们真实的政治身份向县委说清楚，县上对演出的认可也许只是故作糊涂。

夏收开始后，曾在部队当过连指导员的邹士杰，根据他在部队搞政治工作的经验，又组织了个精悍的不到20人的演出队，到田间地头演出，激发大家的劳动热情来完成夏收任务。同时，还办了个油印小报：《夏收快讯》，和我们同来的杨康——他原是《甘肃日报》文化部副主任，景超的顶头上司——担任主编。小报及时向全场各大队发下去供大家阅读鼓舞情绪。我们的演出队正如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乌兰牧骑，受到全场工人的热烈欢迎，也受到我的难友们的欢迎——难友们欢迎我们的演出，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看演出时可以休息一下。

割麦是全年里最重的农活。十工农场有个颇具规模的机耕队，土地的翻耕、播种都用拖拉机，虽然也有苏联进口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因为收割的麦茬高，浪费大，一般不使用。为了精收细打，颗粒归仓，大面积的麦田基本上都用人工收割，全场夏收任务很重，有的队先后要用一个多月才能收割完。我的难友们大都是第一次参加夏收，用镰刀割麦又是技术活，还有个技术过关的问题。为了抢收抢打，不使到口的粮食受损失，每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这种弯着腰身连续挥动镰刀抢收抢割的劳动，比拿着铁锹平整土地还累。在一块地里，每人占四行麦垅向前赶着割，还具有比赛的性质。技术不熟练，体力不济，手脚不麻利，就会被甩在后面。别人抢先已割到了地头，自己被拉下一大截子，此时即使想赶也往往赶不上了。有时候，所有割麦的人都

1959年夏收后，和难友们在安西县十工农场留影，左第二人为陈××，次年也在十工农场的大饥馑中死去

已转移到另一块地里去了，割得慢的人还在那孤零零地留下的几行麦垅里挥汗如雨。此人不仅觉得脸面上不好看，想到这也许会影响今后的摘帽子，心里更是十分着急。在我们去演出的地头，我就看到了这种情形：所有割麦的人都已放下了镰刀聚到了地头，在另一块已大体收割得光净的地里，还有人在留下的几行麦垅里孤身奋战，他是想连演出也不看了，抓紧这点时间赶快割完留下的几行麦子。此时，由于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作用，我和我的难友们有时也真觉得自己灵魂深处有不少污垢，遇到大风大浪未能站稳立场，所以才陷入了右派的泥坑，而劳动人民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确实也想诚心诚意地通过艰苦的劳动把自己改造成新人，改造成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人。那位难友最后是在组长的命令下才走出了收割的地里。

工人们都具有娴熟的割麦技艺，他们没有任何精神压力，在麦地里显得就自在多了，但他们同样也觉得非常劳累。

我们演出时，大家都可以轻松地坐在地里缓一口气，在紧张劳动之际愉快地享受

一下歌舞音乐，转换一下情绪。他们都挺高兴。

当时，全场共有四个大队，在邹士杰的率领下，我们有幸去了三个大队演出，四大队因为离场部有二十来里，当天无法返回，未能去成。

五大队是个由省级机关来的难友们为主组建的开荒队，也种了小麦。我在县城里见到的李德寰，还有符文虎、冯士伟、周至德等人都在此队，原省人民银行的难友李正华在“七一”得了奖，也正在此队。我们步行十一二里路到达队部时，大家还正在地里割麦，队长干脆下达命令，让全队的人都休息一下，到队部来看演出。我们先休息，等待他们返回。

这个大队各方面的条件都远不如场部，难友们初来时不少人住的还是地窝子——一种在地面上下挖三四尺，四周用土坯垒起低矮的墙，顶上稀稀拉拉放几根椽子，再搭上用树枝编就如篱笆状的长方形筏子，用芦草和泥巴盖顶以遮风雨。这种住室同后来大庆人住的干打垒有相似之处，但更为简陋，室内没有热炕，没有门窗，在人出进的地方，只有用茓茓草编成的门帘。但是，经过数月艰苦的劳动，书生们已经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新房子，现在已全部住进了新房子。安西县常年无雨，房子都是土墙，用土坯砌就，房顶也比较简陋，不用瓦，稀稀拉拉放几根椽子，盖上筏子、树枝、芦草，用麦草或麦衣和的稀泥盖住顶抹平就行了。我这些被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内心极为痛苦的难友们，他们来到开荒队后，在拼命劳动中排遣心中的愁闷，同时，也都用拼命劳动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当然，他们还是认真听党的话，通过劳动来积极改造思想。此时，他们大多都是二三十岁年纪，经过一段奋力拼搏，习惯了劳动以后，浑身都是劲，盖起这些房子并不难。但，无论如何，这个速度也够快的了。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的住房都十分整洁，地扫得干干净净，通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只是有些人大约是怕弄脏床铺，把褥子一股脑儿地卷起在叠起的被子上，空下来的地方只铺着灰色的棉毯或报纸，躺下或坐着休息不会弄脏衣服。作为女性，我觉得十分惭愧，我们的住室远没有他们这里整洁，我们都没有精力，也没那份心思拾掇自己的住室和睡铺。每个人晚上只是倒头便睡，早晨起来又忙碌不已，整天劳累已极，谁还顾上管这些个呢！男子汉们终究不同于女流。

来五大队之前，邹士杰就介绍过，这儿的难友们一来就开荒，大家都尽力干，活重，吃得多，每人每天要吃3斤粮，1月就是90斤，管理员觉得超过了定量不好办，到场部请示，领导上说：“能吃能干，咱们这儿是出粮食的地方，还能限制同志们的口粮吗？”邹士杰是笑着说这番话的，却又勾起我的忧思，夹边沟也是生产粮食的农场，为什么景超和那儿的难友们却要挨饿呢？尽管当时我还料想不到长此下去，将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我的心头仍浮起层层阴云，翻滚不已。唉，景超在被打倒在地以后，为什么还要遭此厄运饿肚子？但愿这种情况不要继续得太久。夏收期间，全场的

伙食都有改善，每天都有白白的大馍，随大家尽饱吃，夹边沟那儿呢？景超是不是也能吃饱？

难友们在欢声笑语中很快都集中到队部前的空地上，我们只演了几个短小精悍的小节目，总共也只半个多小时就演完了，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大概是怕“曲高和寡”吧，郑文义此次没有表演小提琴独奏，而是来了个二胡独奏《百鸟朝凤》，也备受欢迎。难友们一定要他重奏一次，他高兴地又演奏了一次。在这“大漠孤烟直”的辽阔荒野，大家有如此的雅兴对一位被世人冷落抛弃的音乐家表示热烈真挚的尊崇，郑文义自是很受感动。

郑文义自带的小提琴是意大利造，用弓随便拉一下，音响都十分优美好听。作为音乐家，他多年来受西方音乐的熏陶。在演出间隙及行路中，我常听到他小声哼唱着外国名曲，我上中学时深深挚爱过的《圣母颂》也从他的唇间轻轻流出。那圣洁、崇高、无与伦比的丰富而又单纯真诚的爱的宣泄，我已久违了，此时听来是那样亲切而又陌生。在我上兰州女中的时候，音乐老师教我们唱过《圣母颂》，我在学校礼堂听有名的管喻宜萱独唱过《圣母颂》——当时大家都称她管夫人。后来，学校还借来在当时非常少见的音量宏大的音箱，在礼堂办了一次世界名曲欣赏会，放了不少不知由谁珍藏的唱片，其中仍有《圣母颂》。那时，我只有十五六岁，说不上有什么欣赏能力。几位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大师们谱写的风格迥异的《圣母颂》常使我感动不已，我陶醉于其中而流连忘返，幼稚而朴拙的我，似乎感到了灵魂的净化与升华。如今，听着从郑文义唇间轻轻流出的旋律，我觉得那仿佛是从天外飞来的阵阵颤音，和我所处的现实世界竟是那样遥远，我经历了诸多痛苦的心境同天真烂漫的少女时候已有了极大的改变。以往，《圣母颂》激越高亢的爱的宣泄，那深邃凄婉丰富多变的旋律，宛如灿烂阳光照耀下一条金色宽阔的河流，它喧腾着奔涌而下，以它神圣而凡俗、伟大而坦荡的胸怀慰藉充盈着人们干涸的心田，曾给人世间涂抹了多少真诚的情、纯净的爱。而此刻我自己的存在就是个不协调的音符，《圣母颂》在我心底勾起的竟是阵阵悲凉凄迷。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我寂寞地回味着飘逝而去的我少女时代的梦幻，一副痴态。别了，那充满美丽梦幻的岁月，永别了！

冯士伟每次在宣传队的出现，常引起人们的注目。冯士伟以歌唱炊事员的一支歌：《哎，俺心里乐得不得了！》饮誉全农场以至安西县城。冯士伟是上海人，地下党员，原省人民银行学校的干部，业务能力甚强。1952年在支援大西北的热潮中，他由繁华热闹的大上海志愿来到兰州。从外表来说，他不像是个江南水乡来的清秀书生，圆脸，络腮胡子，粗眉大眼，短粗的身材，倒真有炊事员的风度，特别是他那肥大的裤子，裤腿老是提得一高一低，常引起宣传队员们的嬉笑。小徐就曾指着他一高一低的裤腿，笑得前仰后合地告诉我：“老冯的裤腿，永远是那个样子！”冯士伟不

以为意，倒是走过来同我们攀谈一阵。冯士伟说，他在队里曾担任采购，常赶着一辆牛车到县城拉运灶上需用的各种食品。有一次，他到县城采购回来晚了，夜里赶着牛车在戈壁滩上转悠着慢慢往回走。忽然，他发现有几双发着绿光的眼睛追随车后，不紧不慢，一直跟着走，他一下明白过来，这是几只野狼在追踪着他，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赶着牛车跑一阵，狼们也跟着跑；他赶车慢了，狼们也慢慢走。可是饥饿的野狼对赶着牛车的他还是有点怯火，追踪他一夜，到底也没有扑上身来撕扯着吃了他。这场面还真有点惊险呢，他在上海的银行里做财会工作时，做梦也想不到会在戈壁滩上和狼群打上交道。对于在戈壁滩上和狼群打上交道，他终能坦然处之。原共产党员的他，认为来农场“改造”，是党对自己的严重考验。在这个特殊的境遇里，他将进行积极的战斗。冯士伟说，当他和拉车的牛独处时，还常和牛一起说说话。他说，不跟牛说话，再没有个絮叨的对象。他还说：“过去看小说，小说上说‘公牛般的眼睛’，我无法理喻，现在才知道，牛的眼睛眼睫毛毛茸茸的，眼皮的轮廓层次分明，眼珠又黑又亮，实在漂亮！”想不到冯士伟竟还是个内秀之人，他感情细腻，柔肠缠绵，同牛结伴仍自得其乐。后来我才得知，其时，他正压抑着内心的巨大悲痛，他年轻美丽的妻子在他当右派后患脑瘤死去，使他更经历了非同寻常的不幸！他和牛说了的许多话，兴许也只能向牛倾诉。

邹士杰是个二十岁出头的陕北人，在夏收中带领我们出来演出，他头戴一顶白帆布阔边帽，像个地质队队员，潇洒地穿行在演出队伍中，常常谈笑风生。看到路边丛生的骆驼刺，他笑着说：“你们知道这种草为什么叫骆驼刺吗，骆驼最爱吃它，吃了肯上膘。”我说：“骆驼刺那么扎，骆驼就不怕扎坏吗?”邹士杰说：“不怕，骆驼的嘴看起来软乎乎的，骆驼刺一点也扎不着它！”这真不可思议！我对骆驼并不陌生，小时候，兰州城里常有成队的骆驼由骆驼客牵着从城里走过，我曾像《城南旧事》中的小英子，仔细看过骆驼细细地嚼咬草料的神态。骆驼宽厚松软的大脚掌踏在厚厚的虚土路上留下的印迹，骆驼的小小的圆粪蛋蛋，我都觉得十分有趣。到了夏天骆驼脱毛时，结成片片的驼毛不断从骆驼身上蜕下，骆驼光光的身躯和屁股上兴许只留下几片驼毛，连弯弯的脖颈也成了光秃秃的。有一次，我看见一匹脱毛的小骆驼，残留在它身上的驼毛片片光洁柔软，毛茸茸的，颜色发白，非常好看，我真想撕下一片来玩玩，却又不敢动手。在我长得大些以后，骆驼在兰州就很少见了。谁知来安西后，竟意外地又见到了骆驼。我第一次见到骆驼，不是高耸的双峰上驮着重物的骆驼队，而是拉着胶轮大车的单个骆驼，在沙石铺就的公路上，倨傲地抬起软软的大脚掌不慌不忙地向前行进，它庄重地目不斜视，对公路上来往的人们不屑一顾，倒像是在它自己的庄园里自在地散步。如今得知它喜吃骆驼刺，靠吃骆驼刺上膘长力气，我心目中的骆驼好像又有了另一种神韵，别具一种我还不了解的性格。

说起安西的大风，邹士杰更有他独特的体会，他朗声地笑着说："嗨，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从县里回农场，半路上迎面猛地刮来了大风，我骑在自行车上，连人带车被风吹得倒退了一小截路，人才从车上摔下，这样的风，你们经见过没有？哈哈，那么大的风，怕是九级十级都不止呢！"我领教过的狂风四起猛刮不止的景象，跟他描述的又是另一码事。我和我的难友们来安西以来经历过的刮风天气，使每个人对"世界风库"都有了自己真切的体会，每遇到这种气候，人人都觉得沮丧不快，以至忧伤不已。出外参加演出以来，夏季的风和日丽使我们心情愉快，听到邹士杰笑语连连的描述，暴风的肆虐给每个人心头留下的阴影便一扫而光。风暴既然是这里的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免的小插曲，大家就都觉得可以不在乎了。

在二大队演出后，我见到了报社和我们同来农场的杨骁，还有稍晚些时候来的韩卫之。杨骁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真羡慕你们的演出。"他疲累已极，为不能参加演出而遗憾。杨骁是兰州人，原来家境贫寒，解放前一两年挣扎着到了西安，在西北大学当了旁听生。西安解放后，他报名参加了甘肃工作团，和一伙大学生们——也包括景超，徒步行军到了兰州。"8·26"兰州解放，他们成为创办《甘肃日报》的骨干力量。杨骁是个热情人，好激动，中国共产党号召鸣放期间，他参加了甘肃日报社动员鸣放的座谈会，畅所欲言，谈了一大通意见。因为对《甘肃日报》的现状感到不满意，他借读者的话，说"甘报"是"干报"，干巴巴，无人爱看。还说，他为此感到担心、揪心、痛心、忧心、寒心、灰心，一口气连续说了六七个贬义词的"×心"，开完会，作记录的人让他看记录稿，他又着意润色一番。谁料想，反右斗争开始后，他的发言恰恰成为恶毒攻击党报的典型言论。他倒好，立即来了个"缴械投降"，又成为右派分子里认罪最好的典型，使他少挨许多批斗，处分时相应地也有些照顾。

来十工农场后，他分在了二大队，离场部有八九里路。有一次中午，他来场部小卖部购物，我和杨康正在吃午饭，他一见面就诉苦不已，说他们正在修水渠，一次干活时风很大，他蹲了一阵，就受到工人的喝骂。还说他们吃不饱饭，到吃饭时一个个都跟"饿狼"一般。当时，他形容憔悴，情绪不佳，完全变了个样。这顿饭我们吃的有红枣小米稀饭，量多，我们都用饭盆盛着，我和杨康就都分了些让他吃了。这次演出时见面，他心情甚好，说队长对他很信任，似乎他已成为队长的左右手。大概，队里的领导已改变了原来过激的做法，这种改变还是来自场部领导的意图。

我们的日子，比起在全国各地受苦受难的右派朋友们，自然是够好的了，说农场对我们"优礼有加"也不为过。

二大队招待我们吃了顿饭，有炒菜、甜果酱做的包子。二大队的食堂管理员也是我们的难友。临离开之前，他把小徐和我叫到他的库房里，问我们需要什么，可以送点给我们，小徐和我都说"给点果酱最好了"，他就给了我们每人一小瓶果酱。这是

他对我俩的一点特殊的优待。

又过了些日子，此人来场部办事，路遇小徐，他告诉小徐说，杨骁在二大队受到批斗，日子很不好过。详细情况我无法问及，因为我没见到他。我觉得，杨骁在当了右派分子以后，快速地“缴械投降”，表现特别好，他不仅自我感觉一直良好，还天真地把“缴械投降”后的自己等同于“人民”，在处境略有改善之际，便自觉地站在党的“立场”，去“改造”难友。他特殊的不幸和悲剧正是根源于此。这一点我在同他来安西的旅途上就有察觉。记得我们已住到安西县城的小旅店以后，为些许琐事，他对杜博智看不惯，转过身就对着我和杨康说：“‘蛙将’嘛，只能是坐井观天!”还得意地将此话重复了几次。杜博智大概没听见，竟浑然不觉。“蛙将”是反右期间人家对杜博智的侮辱性称呼。在反右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热闹红火不亦乐乎之时，有个美术编辑发生奇想，把全报社的右派分子集中在一幅大漫画里，用妖魔鬼怪的诸种形象丑化一番，标出在黑社头子王景超的指挥下，群魔乱舞，正在兴高采烈地进行反共大合唱：其中的“牛头”自然是牛华生了；杜绍宇因为身材短粗平日里大家对他就有“狗熊”的戏称，在漫画里就变成了一头丑陋的狗熊；杜博智被丑化成挺着大肚子蹦跳着的大青蛙，旁边写上“蛙将杜博智”。像这等大漫画，当时我只扫了一眼心里就痛楚不已，如今在千里之外，由于离开了灵魂被百般凌辱过的所在，总还觉得有些庆幸。谁承想，杨骁竟然重提“蛙将”去伤害杜博智，这种心态真是难以理解。这已是数月前的事了。而今，我推测，他在得到队长的信任以后，大概是把自己也摆到了领导的位置上，对如何“改造”和要求自己的难友献计献策，还可能对难友们盛气凌人，甚或整治别人，以致引起难友们的反感。别的难友们要想整他也很容易，因为他毕竟也是“一路货色”。队长一般都是党员，起码也是部队转业的军人，极易接受已挨了整的右派分子们的挑唆。因为那种挑唆都具有堂而皇之的理由。杨骁在队长面前搞的那一套，任何一个因为杨骁的作为而受到委屈或挨了整的难友，只要他自己不愿意心甘情愿地忍受下去，便会想些法子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委屈再反弹回去。

反右斗争使中国的全体人民都受到教育，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懂得并学会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实际运用。古代的帝王权贵们为争权夺利殚精竭虑创造的这一整治人的恶行，在1957年的中国被大规模地、群体性地用来对付55万多右派分子。全国各地的右派分子们被玩得眼仁发白欲哭无泪欲死不能欲活还休，直到天旋地转真真体味了“脱胎换骨”的磨难。然后，他们在被送去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生存，有时也略试身手，玩一玩加罪于别人的手段。杨骁整了别人，自己也吃到了同样的苦果。

韩卫之原在《甘肃日报》担任时事编辑，业务能力强，工作一贯踏实肯干，他来

农场比我们迟两三个月，是因为他不是右派分子。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右派斗争，对55万多右派分子进行处理以后，对有“历史问题”或有其他“错误”的人，认为也不应放过，政策的执行继续向“左”转，于是韩卫之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送到十工农场监督劳动，自然是没有了工资。我们平日里相见的机会很少，此次见面，也觉得十分亲热。韩卫之在农场劳动期间，一如他的为人，沉稳踏实，平稳地度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20年后，“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否定。

当时，由省级机关及河西地区送到十工农场劳动改造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右派分子，还有历史反革命、坏分子，也还有虽有“错误”但未戴任何帽子的下放人员。那些戴了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的人，都觉得脸上更无光，常自称为“右派”，甚至在农场几次发下登记表，要每人填写履历时，不惜做假填成“右派”，以蒙混一时。他们反正也知道，填写这些表格对于改变自己的境遇无任何关系。

三大队就在场部所在地。我们的演出深入到各个地头。报社的杜绍宇、汪志英比我们迟来两三个月，此刻都在地里割麦子。

杜绍宇，原是兰州的中学生，1952年到报社工作。1957年在总编室编一版。他是所谓“黑社”的主要成员。“黑社”，就是他在被逼不过时“交代”出来的。杜绍宇对自己的顶头上司编委委员、总编室主任×××有看法。鸣放开始，在总编室开会时，他就坦率地说：“我不敢鸣放，我怕提了意见，老×会打击报复。”×××本人当时也头脑“发热”。上夜班在总编室随便议论时，竟说：“咱们国家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了算，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议会制，参众两院，各说各的，要多数人赞成才算数，我看人家还是讲民主。”杜绍宇在和景超闲谈中把这些话告诉了景超，景超随口就丢了一句：“×××这不是赞成资产阶级民主嘛!”

反右开始后，总编室的斗争对象是杜绍宇、杜博智。开头，杜绍宇自己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杜绍宇被追问到与景超的交往时，×××敏感地意识到从杜绍宇身上也许可以找到攻破景超的突破口，就口气和缓地说：“我知道你这个人心里也没啥，你嘴里一滑，随便啥话就都说出来了，王景超那个人，和你有本质上的不同，你要端正态度，改变立场，和王景超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你自己到底有些啥问题，我还不清楚吗?”这些话使杜绍宇真以为自己没啥问题了，开始，他还把这些话告诉景超。随着对他的批斗继续升温，火力不断加强，情况便有了变化。景超在被迫交代同杜绍宇的关系时，写了经杜绍宇之口所说的×××对西方国家议会制的议论。按当时的标准，仅此一句，×××就足够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了，这是把矛头直接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罪行。而且，×××在值夜班时随意散布的“右派”言行还不止此。但，无人对此进行任何追究，滑稽的是×××一直还充当了报社反右斗

争的急先锋。1990年，我为别的事找过×××，此时的×××倒也说了实话："在报社反右派斗争中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年，×××仅仅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也非把景超打倒不可，而且认为仅仅打倒景超还不够，只有使我也闭住了嘴，他那些右派言行才会无人再提起，或提起也不起作用。经过软硬兼施，诱供逼供，画框框，定调子，硬是逼迫杜绍宇扯出了个"黑社"，他才心满意足。甘肃日报社有名的右派集团"黑社"，不是由文化部揭露出来，而是首先在总编室发难，然后波及到文化部（文化部共揪出三个"黑社"成员）及《甘肃农民报》（我一人）。×××作为总编室主任、编委委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言自明。我们在当时挨整似乎也属正常，但3年后其血淋淋的后果却是谁也不曾料到的。×××会因此而内疚吗？

后来，杜绍宇意识到扯出"黑社"对自己只是加重了问题的性质，又推翻原来的交代，不承认"黑社"。但此时此案已报省委，在《甘肃日报》上已公开披露予以批判，泼出的水已收不回了。杜绍宇推翻原来揭发交代的"罪行"，属于态度恶劣不老实之列，最后落了个仅次于景超的处分：取消工资，监督劳动。他原本打算自谋出路，所以没有和我们同行。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所以，过了两个多月才姗姗而来。

汪志英，甘肃渭源人，是个地下党员。他在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形势下，就《甘肃日报》的新闻报道、专栏设置、编辑人员的使用及上下班制度等方面写了个《意见书》交编委会。他到报社时间不长，写成后，让文化部的有些人看了一下。景超当时在文化部受到大家瞩目，是有一定影响的人，汪志英就一定要景超帮他修改。在难以推辞的情况下，景超勉强帮他改了一下，为了节省他搞创作的时间，还让我代抄了几页。但汪志英向编委会交的东西，又经他本人改过并重新抄写，景超再未过目。鸣放时，汪志英的《意见书》交到编委会已几个月，汪志英因《意见书》受到编委会的冷落，在开会时曾发言表示不满。反右斗争开始后，压在编委会办公室抽屉里的《意见书》，从反右斗争的角度重新加以审查，并打印出来供全社职工讨论，从而被确认为"黑社"的黑纲领。汪志英被迫交代写《意见书》的经过。汪志英做梦也想不到，近半年前的一纸《意见书》，会成为反右期间凭空冒出来的"黑社"的黑纲领。景超更是有苦难言。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批斗汪志英时，汪志英显然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而在批斗自己由汪志英出面作证时，汪志英又变成了由景超任意摆弄的十足的白痴。唉，唉，那个时候，哪个右派分子又不是被任意摆布的可怜虫。

汪志英倒是有些先见之明，宣布处分之后，他就不准备来农场劳动，而且把户口转到了当时还很荒凉的兰州市西固区，打算另谋出路。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妇女干部得知他是右派分子后常找他的麻烦，使他难以安身，逼得他不得不也到农场来，所以比我们晚来几个月。

"黑社"的另一成员牛华生，宁夏人，回族。1954年宁夏同甘肃省合并，原《宁

夏日报》总编辑张源来《甘肃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带过来几个人，牛华生是其中之一。牛华生是回族中的进步分子，他曾是《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在《大公报》上曾著文指名道姓地大骂蒋介石。鸣放期间，牛华生的著名“言论”是写了一副对联，对两位担任中层领导的党员表现了不满，对联原文是：“萧俊德德不俊何为俊德，杜修文文不修怎称修文”，并征求横额。当即有梁军欣然命笔，加了“唯资而已”四个字。梁军后来也未能逃脱右派分子的厄运，只是比我们晚了一年，所以未来安西。牛华生的另一张大字报，是对报社为高干们修的新宿舍楼有些看法，同他们所住的平房作了比较，题为：《高干楼、低干院》。景超同牛华生无其他瓜葛，在当右派之前，我和牛华生从未说过一句话。牛华生只是因为也看过汪志英的《意见书》而成为“黑社”的一名成员。最初，牛华生听说杜绍宇交代出了个“黑社”时，曾在文化部的办公室里惊呼：“莫名其妙!”办公室里的十来个人全都默不作声。这突如其来的信息乍一传开，使那些没有陷入右派泥坑的编辑们都感到难以置信，惊恐不安，所以都谨慎地闭住了嘴。而当初惊呼“莫名其妙”的牛华生，到后来还是按照领导既定的意图，以“黑社”成员的罪名“认罪悔罪”。因为“认罪”态度好，问题也比较简单，对他的处分最轻，只给了个行政降两级的处分。作为回民，他提出去农场劳动吃饭问题无法解决而留在了报社印刷厂劳动。他在铸字车间干上了最重的活，每天把用过的铅字化为铅锭，一直干了三四年。

我的这些难友们，个个都经历了残酷无情的批斗。残酷无情的批斗，使每个挨斗的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意志不敢稍有违抗。参加批斗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党的意志的执行者。为了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们在斗争会上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穷追狠批，种种不堪入耳的詈骂脱口而出。诸如：“耍死狗!”“背着牛头不认赃!”“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决心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等等，等等，随时都会劈头盖脑地抛掷过来。挨斗的人不论内心多么委屈，灵魂经受着怎样的凌迟，也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并按照会上的要求“转变立场”，痛骂自己思想反动，站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把自己的真知灼见，披肝沥胆向党提过的宝贵意见和一些极平常的看法，通通都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每个被认定为右派分子的人都在这场残酷的闹剧中扮演了不幸的悲剧角色。像这样在同一个时间段里，由于同一个虚设的原因，对55万多知识分子采取同样的手段，使55万多忠诚无辜的人经受灵魂的凌迟，它不是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而是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国土上，人类历史将如何评价它？“阳谋”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绝不仅仅是55万多无辜灵魂的沉沦。500万知识分子中既然出现了55万多猖狂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那么，工人、农民呢？反右斗争的余波也扩及到工厂、农村。报社的印刷厂就对轮转车间的陈培清进行了批斗，陈培清一定也是有些出了“格”的言论。我曾听到厂部办公室里传出批斗陈培清

的怒骂、叱喝声，其火力绝不亚于对我等的批斗。陈培清站着交代“罪行”，其委靡状也绝不下于我等。不过，报社还算严格按照当时的政策界限办事，对陈培清的批斗，只是进行“教育”，没给他戴什么帽子。在其他地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下达以后，报社曾开全社大会让我们每个人自己表态，让已被打得趴倒在地的反动派们再一次地表示认罪悔罪。然后，由领导上做出对我们每个人的处分决定，上报省委宣传部批准。就在我们等待省委批复处分的时候，又通知我们到资料室帮助清理新华社发来的新闻图片。这些新闻图片因为无专人管理乱得一塌糊涂，有些有图片，无说明，一旦需要就无法使用。而我在清理中竟意外地发现了新华社的一则通知，通知说，今后对赵桂兰的新闻图片一律不得见报。赵桂兰何许人也，20世纪50年代的人都知道，她是东北某工厂的年轻女工，一次她在抱着某种烈性炸药行走时，因妇科病突发出现晕眩，当时，她完全可以把炸药扔远保护住自己，但是，她为了保护厂房没有扔出炸药，结果炸掉了自己的一只手，这在全国曾极为轰动。赵桂兰治好伤后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当时有一幅名画画的是中央领导人接见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的情景，赵桂兰就站在周恩来总理的身旁，周总理的神态显出对赵桂兰十分疼爱关心的样子。而现在，根据通知赵桂兰的新闻图片一律不得见报。我立即意识到赵桂兰也许是在鸣放中出了问题。从此，她永远地消失了。

杜绍宇、汪志英先后来到农场后，和我同在三大队，常见面。汪志英从来不提反右斗争期间的事，守口如瓶。杜绍宇对于扯出“黑社”，在来农场前就一再说悔恨已晚，对于景超和我都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和亲近，我们也不再说什么，一切也就逐渐释然了，毕竟，我们都落到如此的处境，主要并不是他个人的原因。在地头演出时和他相遇，我们随意说笑几句，亲切自然。

在邹士杰的示意下，我们还在三大队的伙房里，为炊事员们作即兴表演，为炊事员唱了几支歌，其中有歌唱大跃进的歌，记得有两句歌词是：

“跃进哟嗬，跃进哟嗬，大跃进哟嗬！

快马加鞭向前进，向前进！”

炊事员们大受感动，以后我们去打饭就备受照顾。

此次夏收期间，我们未能去慰问演出的在全场只有四大队了。四大队是个年产六七十万斤小麦的单位，夏收任务很重。全大队2/3的劳动力都是我的难友，夏收这一关，使他们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从收割、拉运、打碾到入仓，他们都承担了下来。我的难友中有许多人在农村长大，从小有劳动习惯，也是劳动里手呢，有老工人的带领，他们样样都行，干得很欢。这中间，也出过危险，如原高台县税务局的陈增荣，站在大车上装麦捆时，一只脚没站稳，就曾一个倒栽葱栽下。安西县因为风沙大，旧式大车为了便于在沙窝里行走，车轮特别高大，直径要一米七，陈增荣一个倒栽葱栽

下时，一只脚踝夹在上面的木制车辐条里，鲜血直流，头已掉到地上，头发被压在车轮下，动弹不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一起干活的难友眼明手快，死死拉住了套车的大马，车纹丝未动，陈增荣才幸免于难。陈增荣在多年后想起这件事仍觉有些后怕。有些没拿过镰刀的书生们，在割麦中间伤了手脚的也大有人在，累得躺倒在地里便不再想爬起来的就更多了。

三大队在夏收结束后，立即组织100多精壮劳力去西湖收撞田[①]小麦。西湖在十工农场的正西方，距离五六十公里。那里收割小麦的人住帐篷，因系抢收，劳动的时间也要长一些。场里安排组织劳动力的时候，就强调要派去身体健康的精壮劳动力，身体差的不能派。此时，原服务厅的会计韩冬柏，解放前西北大学毕业，已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患肺结核。当他听到宣布的名单里有自己时，就向三大队的队长权志英提出，自己有病，请求不要派自己去西湖参加抢收。当大队人马去西湖后，权志英对留下的韩冬柏就猛批一气，说："你个右派，让你去西湖你不去，你还想干啥？你今天就去翻地，一天翻三亩地，翻不完三亩地，不准你吃饭。"站在一旁的大队统计高仲君听他这样猛批韩冬柏，心中有气，当面也不好说什么。韩冬柏和他原是一个单位，他知道韩冬柏是肺结核患者，如此不让吃饭翻地，他怕韩冬柏累倒在地里。到吃中午饭时，就将自己打来的两个馍送到地边让韩冬柏吃，并说："一天翻三亩地，不要说人了，就是套上牛犁地，一天也犁不了三亩，你慢慢干，能翻多少就翻多少，不要挣坏了身体。"这样宽解了几句，韩冬柏才减轻了思想负担。

谁知，权志英知道高仲君送馍给韩冬柏吃，竟大发脾气，在队部批评高仲君说："你的权也太大了，你管得也太宽了，韩冬柏表现不好，我扣他的饭，你为啥要给他送馍！"高仲君也火冒三丈，回嘴说："韩冬柏没犯死罪，犯死罪就不会送农场来了。他是劳动改造来的，你扣他的饭，不让他吃饭，他还怎么劳动？他是个病人累得躺倒了，你权队长先脱不了干系。我是为你权队长好，才给他送的馍。"正争吵中间，吴玉璋场长来到了队部，听到他们的争吵，就问高仲君："你怎么知道他有病？"高仲君说："我们是一个单位，他有肺结核，大家都知道。"吴场长就对高仲君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高仲君跟着吴场长来到他的办公室，吴场长才语重心长地说："你说韩冬柏没犯死罪，话也太硬了些，权队长他怎么会接受？同样的意思，换一种说法，让他心平气和地听取你的意见，不是更好嘛。你和权队长相处中间，说话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

高仲君说："权队长说我的权太大了，我有啥权？我就是给了他两个馍，这算啥

①撞田：即在远处的荒地里种上庄稼，不再管理，到收获季节再去收割，碰到气候条件适宜，就能有收获；撞不上，也就无收获。

权!”吴场长回答：“中国的法律就没有不许给人吃饭的一条，权队长不让韩冬柏吃饭肯定不对，当然要纠正。”

过后，吴场长又找权志英做工作，纠正了他的过激做法，让韩冬柏回到组里参加劳动去了。

自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宣布，中国要在15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首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吹响了“大跃进”运动的号角。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我们一个个不明不白地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获罪，在受苦受难中连做梦都想着如何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号召，在内心深处谁也没想过可以打个问号，绝对地只是响应号召，绝对地只是跟着党走。这样，我们在劳动改造期间又成为“总路线”、“大跃进”的热情宣传者。功欤？过欤？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埋头劳动改造的人，是根本不去考虑的。以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用自己的思维去想，也无法把这些事情想清楚。反右斗争期间对“独立思考”大加挞伐，凡是曾经主张独立思考或有过此等表现的人先后都遭了难。我们当了右派后的处世原则只能是进一步地唯命是从，“但求无过”，谁还有兴致对这些国家大事用自己的脑袋瓜儿再去思考一番？

景超在夹边沟挨饿常使我担忧，而此时的我还认为这只是出现在夹边沟农场的个别特殊的情形。我尚无法得知，远在天涯海角富庶极了的海南岛，及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这一年里竟已出现饿死人的事。“大跃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多么响亮而辉煌的口号！但，辽阔苍茫的中国大地上的生灵们已有多少因而开始了痛苦的挣扎？悄无声息地埋在心底的深沉呼号已通过生物电波震荡在中国的天宇，而且不断扩展！

5. “瓜州”的瓜熟了

安西的太阳最温暖最壮丽最灿烂最辉煌最多情也最动人心魄！

我们初到农场每天在田野里劳动时，太阳温情脉脉地对每个人的注视，使我白皙的面孔很快变得红扑扑，继而满面绛红，只是由于塑料眼镜框的遮挡，才在脸上部留下了几道白印印，劳动的双手变得黑黑的，粗糙而有力。我和早两月来的书生们变得一模一样了。有时，田间小憩，我倒头便睡在地边，棉袄盖在身上，每当这种时刻，太阳便热烘烘地抚慰我，和我说着悄悄话，送我在一半分钟之内进入梦乡。我睡得极安适、极快乐。也许，一觉只睡了十来分钟，耳畔已响起组长的喊声：“起身了，干吧！”醒来的我浑身热热的，血脉的流动极畅达，每一个毛孔都是熨帖的。在此之前，我真不知道人世间短暂至十几分钟的睡眠竟会如此惬意、如此幸福！设若太阳也像世人那样对我们另眼相看，我躺在冰冷坚硬的地头就不会有这样的福气了。

天气渐热。太阳的光芒直射大地，无数金色的线穿透空气，唰唰作响进入大地，拔节猛长的麦子长饱了籽粒，由青转黄，然后被收割个精光。光着上身挥动臂膀在田间劳作的书生们汗水直流，晒成了黑人，脊背上的皮成片地蜕下来。书生们戏谑地说：“这是‘脱皮（胎）换骨’。”一次下工后，我曾从一个小伙子的背上撕下几张两寸见方的皮，问他：“疼不？”小伙子笑笑说：“现在不疼，正晒的时候像针扎似的。”书生们对“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想得很认真，一切都向劳动人民看齐，殊不知，烈日暴晒下的安西农民也从不光着脊梁劳动。

有一次，我伸展四肢躺在田间，眼望辽阔无际的蓝天，一轮红日当空，她望着我，我望着她，太阳好像俯身要和我单独说点什么，她面庞赤赧肥大，仿佛要听我诉说絮叨人世间亏欠我的一切，沟通点什么，抠出我心里的痛楚,抚平我的创伤，让我宁静快乐。周遭几个正在说话的人，水渠，田地，似乎都从身边渐渐隐去，明净深远的

蓝天之下，就只有一个我，我的脑际突然涌出李白“天地一腐儒”的诗句。记得有位中学同学曾拍了张照片，在浩渺无际的穹隆之下，别的什么一概没有，只有她的上半身身影，她眼睛深邃明亮，不知对这个世界正在思索些什么。她在照片后面就题写了“天地一腐儒”5个字。我觉得她的奇想是一种智慧，很佩服她的聪明。可如今，我能说自己是个“腐儒”吗？我算是个什么样的“腐儒”哟，我不禁好笑，更觉得心酸。如果我有权把握自己，潇潇洒洒地活人，我真正属于我自己，一切该有多好，但我分明不能够。

尽管我受苦不像景超在那边那样无法言说，不可名状，可我连一丁点儿的自由也没有啊。茫茫尘世，苦海无边，我内心深处涌动着的只是寂寞孤独无奈，我渴望得到党的理解，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堂堂正正地做人，这一切都无法向谁诉说。然而，此时此刻，挂在湛蓝天空的太阳是属于我的，她依然亲热地俯身向我，对我说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热人肺腑的话儿。太阳创造并给予了我热烘烘的氛围，温馨可人，我的头脸上渐渐渗出了汗珠，我独自个儿咀嚼消融着连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的内心复杂激荡的一切。

有一次，我偶然来到了夏收后的田野。此时，地里已一片光净，只残留着尚未运走散落各处的少量麦捆，地埂、渠边及未来及平整耕种的田边小块高地，都长起了半人深的芦草。由绿色划分的土黄色方阵，伸展得很远很远，再远处，则是未开垦的荒野，更是一片苍翠。极目望去，田边长满芦草的小小高地像是一片片丛林，远处无际的苍翠海子，不时涌起阵阵波涛，闪着忽明忽暗的光波。已近黄昏，西坠的太阳大极了也红极了，涌动的苍翠波涛倏忽间抹上了鲜明的火焰，太阳在火焰上跳跃滚动，灿烂无比，瑰丽无比！这落日的景观，使我心头发热，觉得有许多话噎着，一下却又说不出。刹那间，太空中似“噗”然有声，跳动的红太阳忽然不见了，苍翠波涛上的火焰又烧了一阵，便也渐渐熄灭。荒野的风兀自忽紧忽慢地吹着。

就在这时候，安西的瓜熟了。

安西旧称“瓜州”，因为地方荒僻，生活苦，据闻过去连当县长也少有人问津。但是，凡在这儿当过县长的人，都对这儿盛产的美味的瓜赞不绝口。我生在号称“瓜果城”的兰州，从小吃惯了各种各样的瓜，初到安西，对安西的瓜尚无真切的认识。我第一次从一位工人的手中接过来切开的甜瓜品尝时，只觉很甜，味道甚好，思绪却飞到了生我养我的兰州去了，飞到了兰州的瓜市上去了。

小时候，每到六七月，兰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小贩的叫卖声：“瓜哟，瓜哟，香加脆的瓜哟！金塔寺的瓜哟！”“金蛤蟆，金蛤蟆，便宜卖，便宜卖的瓜哟！”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从上午摆出瓜摊便喊起，到黄昏时分更是响成一片，漫步街头的行人，往往被喊声吸引到摊前驻足不前，打量一阵，进而讨价还价讲定了价钱，挑选一

两个带回家去，和家人共享。早先，卖瓜从不上秤，瓜贩们的经济头脑尚未达到掂斤算两斤斤计较的精明度。这种先声夺人的叫卖声只是告诉人们："甜瓜上市了！"

再过些天，别具特色的醉瓜又上市了，醉瓜外观是粗糙的麻皮，直径半尺多点，圆形，其瓤有醇厚的酒香味，瓜摊前酒香扑鼻，大吃一通，满嘴都是香甜的酒味，像是才吃了酒似的，真是瓜不醉人人自醉。

以后，白兰瓜、铁蛋、西瓜等各类瓜又接连上市了，价廉物美，普通人家在整个夏季都能吃个尽意，一直吃到深秋。过去，兰州的西瓜个儿大，从八九斤、一二十斤直到二三十斤的都有，挑着西瓜沿大街小巷叫卖的小贩，用的都是柳条编就带个稍稍隆起的圆边的平底筐，每筐最多放三四个西瓜，大西瓜只放两个，小贩用一根光溜溜的扁担将两个平筐担起，扁担闪呀闪的，装在平筐里的西瓜一览无余，闪着油绿、浅绿及深浅两种绿色相间的美丽光泽。在小贩悠长嘹亮的叫卖声里，一担担西瓜从人们的眼前流泻而过。小贩每卖掉一个西瓜，从平底筐里取出十分便当，小贩的肩上减轻了负担，心中喜欢，扁担闪得更欢，吆喝声便更悠长更有韵味了。

摆在街面上的西瓜摊，都备有一个低低的小桌，挑出最好的西瓜切开来卖。切瓜用的刀有一寸多宽，长一尺多，略呈弯形，一个西瓜先切成四大块，再一一横切成"牙子"。每一"牙子"都很便宜，站着或蹲着吃几"牙子"既解暑又解渴。瓜摊主人的吆喝极尽对出售的瓜炫耀夸张之能事，什么"赛冰糖的瓜哟——""门扇大的瓜牙子哟！"等等，等等。过去，兰州人把铜板或每分硬币习惯简称为"大"，瓜摊主人也吆喝出每"牙"瓜的价钱，"五大一块，五大一块"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在家里，全家人围成一圈吃瓜，则更有一番情趣。记忆中，我们家吃瓜都是在房内当地放一炕桌，在炕桌上切瓜，老人和大人坐在椅子或炕边上吃瓜，娃娃们多蹲在炕桌周围吃。娃娃们吃瓜，常常是一边吃一边放松裤带，让馋人的瓜瓤毫不受阻地塞进肚子，塞满胃肠。大人们见到，也只笑笑，并不责怪，让娃娃们继续吃，吃个够，吃个饱。我小时候肠胃不好，吃瓜却从未受到大人的限制，每次总要吃得弯不下腰来，方算吃够。

我在千里之外的"瓜州"回忆起兰州的瓜季，那伴随着我儿时和青少年时代的一个个瓜季，心里生出无尽的惆怅……我的生命，我的血脉里，曾一直流动着瓜季的甜蜜和快乐，现如今，在我生命里出现过的兰州瓜季，仿佛只是一个个遥远而美丽的梦境，我远距离地刻骨铭心地观望着它们，直觉得那些梦境离我愈来愈远，远不可及。

在我的一生中，只有在1957年的夏天，我没沾过瓜的边儿，完全忘记了吃瓜的事。7月开始的反右斗争，把我们推向绝望的深渊，欲死不能，欲活还休，我震颤的灵魂被整治得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吃瓜是生活愉快的人们的享受，吃瓜的至大至美无法言喻的乐趣，同我们已无缘。我们忘了吃瓜。到10月后，我们交代"罪行"终于

告一段落。当我们各自被通知参加劳动时，这才发现，从夏到秋我们没吃过一口瓜。瓜的季节已经过去了。我心中有过的甘甜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安西的瓜比兰州的成熟略晚，种类更多，论质还更上。因为是农场自产，多数人都到地里去吃去买。我从小熟悉了的叫卖声，在1956年以后的兰州已渐次少了，此时也只能在梦里去寻觅。而处于经济拮据中的难友，到地里掏钱买瓜吃的其实很少很少。思绪烦乱愁闷不已的书生们都喜欢狂吸猛抽一通8分一包的廉价烟，也就没有多少钱去买瓜吃了。

又过了些日子，我生平第一次吃到了一种叫“可可齐”的瓜。那天，我到三大队的菜地里给鸡兔弄饲料，就是把莴笋的叶子剥下来几层，装入麻袋，背到饲养场去。我和小徐每天轮流到菜地弄饲料已两三个月了，开始每次只能背二十斤左右回去，以后每天自觉地加码，到此时已能背六七十斤回去了，饲养场离菜地有一二里路，不算很远。种植瓜菜有个专门的园艺组，负责人叫张经国，张掖人。他原来是学园艺的，也是个难友。因为园艺组活路比较轻，小张主要带了一帮子家属一起干活，我们几个女右派没资格同她们一起干轻活。这天，正好食堂管理员陈明也到菜地来拉菜。陈明是从武威步校来的原军官，同曾芳煜一个单位，靖远人。陈明调三大队食堂当管理员以来，我们的伙食大有改观。他经常要到县城去采购，因为农场无邮局不能汇款，我还托他给景超寄过钱。他知道我58元的微薄工资每月要养活俩孩子，还要省出一点寄景超，曾感叹地说：“难能可贵，难能可贵！”所以，我们彼此已很熟悉。没想到，这天小张双手捧来一个“可可齐”，让我和陈明品尝，说是：“新疆来的品种。”可可齐呈椭圆形，两头略尖，一尺左右长，油绿色皮，瓜瓤白如玉，脆而甜，真的甜似冰糖。小张也许是对自己的种植技艺感到骄傲自豪，为了向我们显示，才特意摘来要我们品尝的罢。我和陈明咬嚼着脆生生的瓜瓤，那白玉似的瓜瓤不断溢出冰糖般的甜汁沁人心脾。陈明乐呵呵地笑着说：“这比兰州的冬果梨还好吃，冬果梨哪有这么甜这么好吃！”他也不忘记借此安慰我，说：“小和，如果不来安西，你哪能吃上这么好的瓜！”也是聊以解嘲吧。

一个休息日，石天爱去小卖部买烟时，回来告诉我：“原来你们组的两个工人拉着架子车在场部卖白兰瓜呢，他们让我叫你去买。”我说：“你买了没有？你咋不买？”她只简单地回答说：“我不买。”我知道她每月只有20元的生活费，除了吃饭，还要和男士们一样省下钱来抽廉价烟，就再什么话也没说，拿了点钱自己去买瓜。卖瓜的原来是长着络腮胡子的武威民工老张及青年工人小李，他们见到我，亲热地怪怨说：“把你就等不来嘛，你怎么不来嗄！是石天爱叫了你，你才来的，是不是？”我笑笑说：“这不是来了吗！”一问5分1斤，比兰州只便宜1分。在兰州时，我觉得6分1斤的白兰瓜很便宜，在这儿，我觉得5分1斤很贵，原因是现在我每月的收入也就是全家人的收入，比过去减少了四分之三，我不能不精打细算。他们俩帮我挑来挑去，我只买

了一个，花了1毛多钱。我拿了瓜要走，小李又塞给我一个瓜，说："这个送给你，拿去吃吧！"我有些不好意思，觉得应公私分明，不能白拿——我时刻不忘记来农场的任务：改造思想。长络腮胡子的武威民工老张热情地说："拿上，拿走吧，这瓜还是我们一起在刮大风的那天种的，你忘了吗？熟了以后你还没吃过呢！"原来，我们在暴风肆虐的那天上午点种的白兰瓜已成熟了，他们车上拉的，卖给和送给我的两个瓜，都是我自己种的白兰瓜。啊，我觉得真可以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啦！

在号称"瓜果城"的兰州长大的我，从小就听说种瓜作务十分精细，讲究甚多，有许多我不懂也记不住的工序。

记得我上小学时曾坐木船过黄河去雁滩旅行。雁滩是黄河中心的一个小岛，有许多农田，是兰州的蔬菜瓜果供应地。平日里，雁滩的农民过黄河乘坐的都是羊皮筏子，运送蔬菜瓜果到城里都用羊皮筏子，把城里人的粪便运回做肥料也是用羊皮筏子，到城里购物走亲戚自然也是乘坐羊皮筏子。羊皮筏子一次可乘坐七八个人，是城里和雁滩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我小时候也曾多次乘坐过羊皮筏子，特别高兴。这次由学校组织去雁滩旅行，坐羊皮筏子人太多，怕会有小学生不慎掉入河中。所以学校让大家坐大木船过黄河。

到了雁滩，正是花红柳绿时节，良田碧绿，风景正好。我们在种着西瓜的地边游玩，看到瓜地里铺着厚厚的小卵石，地边摞着许多烧制粗糙的大碗，每摞有三四尺高，摞了一大堆呢，有些就堆放在看瓜人住的小屋边。长大后我才知道，这些大碗，是在瓜苗小时，为了保温于晚上扣在瓜苗上的，其作用正如现在的塑料棚，真不知是哪个聪明人的创造。兰州阿干镇一带素有烧制陶器的传统，其出产的"砂锅"很有些名气，让陶制的大碗充分发挥效益，用到了瓜类的栽培上，这大概也是兰州人的一大发现。再说每天晚上要在整块地里的每个瓜苗上都扣上大碗，到早晨天放晴时再一一取掉，光这一项，费工就十分浩大，由此可见瓜果城的农民，为栽培瓜类，真也是费尽了心血。

地里铺着厚厚的小卵石的田地，叫沙田。兰州人知道，最甜最"沙"的"旱沙瓜"，就是沙田里种的。沙田地里的小卵石，都是种田人从新砂源处采挖，用背篼一背篼一背篼地背到地里的。沙田保墒好，具有积蓄白天日照的热量，在夜间释放出来保温的作用，且能充分利用土地肥力。一亩新沙田能充分发挥效益三四十年，所以，过去有"挣死老子，富了儿子，饿死孙子"的说法。

来农场后，根据每天下地劳作的经验，我觉得这里耕地面积宽广，作务十分粗放。当时，我想像我们那样随便在地边点种了瓜子，以后多日便不会再去那块地，点种下去的瓜子会长成瓜吗？我对于以后能不能吃上瓜十分怀疑。谁知，现在架子车上堆放的，正是我们那天点种后长成的白兰瓜。从形状的大小、白里透黄的颜色看，这

些白兰瓜同兰州所产毫无二致。我虽然只是在暴风肆虐的天气里，用小铲子在地边轻巧地铲了许多小坑种下了瓜子，此刻，收获的喜悦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我竟然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白兰瓜，这里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质条件真是太好了。我真高兴。

我抱着两个白兰瓜回到宿舍，和石天爱、小徐及后来同居一屋的老殷一起分享。这白兰瓜当然是兰州的种子，但比起兰州的白兰瓜来更甜，绿莹莹的瓜瓤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香甜的汁儿，一直甜透在心间。我们吃得高兴极了，一会儿就风扫残云，把两个瓜吃了个精光。兰州种白兰瓜的历史我十分清楚。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作为同盟国的使者来兰州访问，因为兰州早享有“瓜果城”的美誉，所以华莱士特意把美国产的一种名瓜的种子带来送给兰州人。当时，听说华莱士喜爱观赏排球比赛，兰州女中还特意派出球队下午到兰园赛场打球，全校同学都去观战助威，我也去了，不知什么原因，华莱士那天下午却一直未露面。近年，我查阅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看了书中《记农学家张心一》一文的有关记载，又进一步对白兰瓜的来历有了了解。张心一是甘肃籍20年代的留美生，在美国时，与美国农学界有交往，有不少朋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兰州访问时，张心一任建设厅厅长，华莱士也是学农的，受罗德明博士委托，带给张心一一些蜜露甜瓜种子和92种抗旱牧草种子及锄草器等。华莱士带来的蜜露甜瓜种子在兰州的农科所种了以后，很快就有了收获上市了。为了纪念华莱士给兰州人带来的珍贵的情谊，当时就将此瓜取名为“华莱士”。这种瓜大小和醉瓜相差无几，白皮，无醉瓜的酒香味，但更加甘甜，而且个个“保甜”，因而受到兰州人的特别青睐。

我对农学家张心一，心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的夫人张全平，是我中学时的英语老师。当时，他们的府邸就在兰州中街子的一个四合院里。我们那时就知道，她是黄炎培的女儿，因过继给了姑母，才改姓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全家离开兰州，从此音讯中断。前几年，我在北京的几位同学，又同张全平老师有了联系。1997年10月26日，是张全平老师90华诞，同学们特意上门庆贺，在老师家吃了寿面，和老师一起合影留念，刘昆还把她们同老师的合影寄了一张给我。在这封信中，刘昆告诉我：张老师在1957年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她本来也没啥可以上纲的“右派”言论，因单位上右派的比例没抓够，才补划为右派。在此期间，她一度只靠业余为几家医院教英语有点收入，生活清贫。我真是再也想不到，张老师在1957年竟也遭此劫难。近日读《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书中说到张老师的胞弟黄万里，留学美国的水工专家，对北京马路翻浆、三门峡工程的论证问题提出了正确意见，竟也被定为右派分子。1960年三门峡大坝建成开始蓄水，库尾泥沙迅速淤积并迅速向上游延伸，威胁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况的严重性超过了黄万里的预言。1964年周恩来主持治黄会议，确定了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恰好就是当年被否定的黄万里的

意见。[①]姐弟都定为右派分子的悲剧，竟在老师家里出现，且冤情如此，令人感叹不已。

还是回到“华莱士”的话题上来。解放后，“华莱士”的瓜名被认为有崇美媚美色彩，便改为白兰瓜。白兰瓜被迅速推广到全省各地，在河西走廊推广的结果，发现它生长更好，瓜质更上。以安西来说，日照时间很长，夏季要到晚10时天才黑尽，早6时左右，红日又喷薄而出，日夜温差大，土壤沙质成分多，这种气候土质条件是兰州不具备的，而更适宜瓜类的生长。能在这里吃上更甜更香的白兰瓜，真也是我们的福分呢。

再说，我们吃完了两个白兰瓜，石天爱才慢条斯理地说：“那两个武威民工在地里吃瓜时，常念叨你呢，说你们在刮大风的天气如何种的瓜，说你赶上了种瓜，没赶上吃瓜的时节。”看来，他们在地里吃瓜不用掏钱。后来我才弄清楚，原来在地边种瓜，主要就为了自己队里的人吃，不许声张，也不许拿回队里去吃，这在“一切为公”的形势下，也说得过去。用这种方式为本队搞点福利，让大家不花钱都能吃上瓜，天时地利造就了这种机会，倒真是个好主意！

这天，他们拉着架子车到场部卖瓜，是为了给队里搞点小积累，准备买些文具纸张，以后办墙报搞竞赛时写战报画图表时用。十工农场作为全省勤俭办场的先进典型，生产大队办公费用之少，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我还吃上了农场自产的哈密瓜。

我从小就在兰州吃过哈密瓜干。当时，兰州市区中心的中央广场附近，从新疆来的维吾尔族商人开了些门面很小的商店，出售新疆特产葡萄干、包仁杏、哈密瓜干，也卖如大白馒头般洗衣用的圆圆的胰子——兰州人那时把肥皂都叫胰子。这些新疆来的维吾尔族商人，兰州人叫他们“缠头回回”，因为他们多数人头上缠着长长的布，把整个头都裹了起来。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和回民的生活习俗一样，不吃大肉。这几种果品中，最甜的是哈密瓜干，用手指拈一块来吃，瓜干上蜜汁似的黏液会把手指弄得很黏。善于种瓜的兰州人吃了哈密瓜干，也从迢迢数千里外的哈密设法带来哈密瓜子自己试种，因为气候水土条件都大不一样，种出的瓜个头不大，到底也没啥味道。

农场出产的哈密瓜有一尺多长，似椭圆形，杏黄色的瓜瓤很厚，一口咬下去，甜蜜蜜的，水汁很多，淋漓非常，真是好吃极了。请我吃哈密瓜的难友，名叫王洪勤，也是武威步校来的原军官，山东人，农民出身。我问：“为什么当了右派？”他说：“我家里人给我来信，说粮食一征购，就不够吃了，我在鸣放时说了说，就成了右派。”他是笑着说这番话的，心中的苦涩又哪能从挂在脸上的笑容里透露清楚？

---

①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137页。

我相信，把这种哈密瓜晒干，一定能晒成维吾尔族商人出售的那种瓜干。问了问，原来安西离哈密只有300多公里的路程，我童年的梦里遥远得无法想象的哈密，原来离我现在所在之地只有一天的路程，哈密气候水土各方面的条件，肯定同这里相差无几。几年前，听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女演员唱《走西口》，歌儿里年轻的姑娘倾诉了送别情人的一腔缠绵悱恻的哀愁，令人肠断；男子汉走西口漫长旅途生涯的孤独凄苦，尽在不言中。歌中的走西口，描述的是山西的汉子出去绥远闯生活的情景。而今，我作为年轻的妻子和母亲，为了“脱胎换骨”，离开生我养我的兰州，远离所有的亲人，独自走出嘉峪关外，已经很远很远了。

不论怎样，我在农场的生活每增添一分自在快乐，我对远在夹边沟的景超的忧思也相应地增添不已。经常挨饿的人每日每时都处于怎样的苦况，我无法想象，也无法想得很具体。但我敢肯定，那些不让他们吃饱肚子的人，在各个方面对待他们一定极为严苛，如狼似虎。景超一向是个极为自尊的人，他如何能承受那把人当做猪狗似的对待！唉，唉，我的亲人，为什么你在蒙冤受屈，一败涂地之后，竟然陷入了这等绝境？我该为你做点什么？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我暗自焦急，并一直苦苦思索着。一天，我想到在演出活动中和邹士杰已很熟悉，突然，一个闪念使我打定了主意。我觉得，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一个转机也许会到来。

这是一闪念之中冒出的主意，我决心试试。

我鼓足了勇气，找到邹士杰家里，向邹士杰提出请求，请农场领导设法把景超从夹边沟农场要到十工农场来，为照顾夫妻关系，让夹边沟农场准许景超到十工农场劳动改造。我向邹士杰说明景超去夹边沟前后的实际情况，既然原来去夹边沟是出于景超的自愿，现在他愿意来十工农场，应该也是允许的。我认为，景超如能来十工农场，是当时摆脱困境惟一可行的途径。为了促使邹士杰及农场领导积极办妥此事，我还诚恳表示：“如能把王景超要来，我们全家就在农场长期落户，以后把孩子们也从兰州接来。我们再不走了。”邹士杰满面笑容，满口答应：“那太好了，我们马上去函联系，争取把你爱人要来。”

我立即给景超去信，告诉他这边的领导已同意向那边要人，为照顾夫妻关系要他来十工农场好好劳动改造，并问他的意见如何。景超很快来了回信，说只要他们那边的领导同意，他是愿意来十工农场的。他当然很愿意来这儿，几个月的书信往来，他对于我在十工农场生活状况的方方面面——包括演出活动，都有了深切了解，知道我作为右派分子生活得比较自在，最最重要的是还不挨饿——他在夹边沟能吃上可可齐、白兰瓜吗？怕是无法吃到的。而且，分别后刻骨铭心的思念之苦已折磨得我们几乎要七窍出血，我们在各自经历了这几个月不同寻常的生活之后，如果能很快再相聚在一起，那该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到那时，最丰富生动的语言也难以描述我们相见

时的激动快乐，我们将有多少心里话要互相诉说，我们将会在倾吐痛苦中得到满足，因为敞开心怀倾诉痛苦，毫不犹豫地承受相互的痛苦，会使痛苦变为一种享受。我们虽然无法从不可抗拒的深重苦难中走出，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会毫无怨尤，勇敢而坚定地共同迎接将要到来的一切。最最宝贵的相互理解与相互支持，将会凝聚成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它是热，是光，是电，今后的路上不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会相视而笑，相互扶持着跨越而过……我想得很多，不免思绪万千，十分兴奋。应该说，他信上的语气比较冷静，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激动。这使我意识到办成此事是有难度的。

果然，夹边沟农场不同意放人。理由是景超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是由省公安厅批准办的手续，现在要离开夹边沟，仍需公安厅批准，他们无权。我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我能够做的惟一的一次营救活动失败了。

邹士杰告诉我夹边沟农场的答复时，一定是立即看出了我的失望和沮丧，完全失态的失望和沮丧……

参加演出活动以来，外在的我完全是另一副样子。我和小徐是队里仅有的女性，难友们对我们倍加照顾，有时在演出间隙中，我们也抓紧时间在别人的铺上休息一下，因疲劳已极不觉睡着了，醒来时身上已搭上了一件棉大衣。那时，大家的经济都十分拮据，水果糖之类都是奢侈品，我和小徐常能得到难友的赠品，尽管只是有限的几块。性格活泼、爱开玩笑的“演员们”，因为有了两个年轻女性的出现和合作，都显得彬彬有礼而又十分活跃。这种氛围也影响了我，感染了我，有时我也喜欢随口抛出几句轻松的玩笑话。以前景超常说我“尖嘴利舌”，就是指我说起俏皮话来跟他也旗鼓相当。反右斗争之后，我沉默了很久，不会开玩笑了。到十工农场以后，由于境遇的改变，性格才恢复了一些开朗活泼。但我心里的苦，对父母、景超和孩子们的思念挂虑，依然都紧紧地封闭在心灵深处，无法向难友们说及。还在兰州时，在反右斗争期间及以后等待处分的日子里，报社领导上一直设法鼓励挑拨右派分子们互相揭发，立功赎罪。这曾使我们都吃了苦头，来农场后环境变了，同兰州大不一样了，我仍不能不有所防备，因为有些右派分子们乐此不疲，尽管农场领导并无整人之心，有些人总认为已被打倒在地的人只有互相揭发、互相整才正常——这也是他们在反右斗争期间接受的教育，党组织就一直这样要求他们，所以，在农场里，你整我、我整你的情况仍有发生，正如杨骁经历的那样。我不能天真地再挨整。于是，我常用沉默来掩盖内心的辛酸痛苦，我表现出的开朗活泼，也并不妨碍我掩盖内心的真实。

夹边沟农场作出拒绝放人的答复，使我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一切，能够改变景超命运的美好希冀已化为泡影，多日来等待见面的种种梦幻顷刻间变为一片空白，面前的路将怎样继续走下去，都是我独自个儿的事了，我要孤独寂寞地一直走下去，走下

去，不论今后的日子里还会出现怎样的阴霾风暴雷霆闪电……天哪，天哪，这该有多难啊！他的苦日子又将怎样熬下去？这劳而无功的营救，徒徒使我们空欢喜一场，又徒徒使我们增添了烦恼，各自悲叹嗟伤。

现在，在邹士杰面前，我仍然什么话也不能说，而只能沉默……但是，我忧伤沉思的神情一定是深深地触动了邹士杰。

几个月来，他熟悉的是引吭高歌、舞姿活泼的我；他曾让我利用午间工休给家属们办扫盲班，他看到的是和家属们亲密无间、笑语连连的我——他的妻子就在扫盲班里专注地学习着；他也看到我吹着哨子，鸡们欢快地向我奔跑而来，我愉快地撒食，脚步匆忙地查看鸡们进食的情况；在演出的行进途中，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很少看到愁眉苦脸的我。应该说，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在苦雾笼罩、命运多舛的境遇里，我一般尚能自持，而此时，他看到的我完全被悲伤所击倒，我绛红色的脸颊一定是失去了血色，我觉得两手冰凉，简直有些支撑不住……为了安慰我，他连连说：“我们以后再找机会，再争取。”此时，他已由工会主席升为副场长，他还说：“以后如果开场长联席会，我还可以跟他们的场长说一下，再争取争取。”但，我无言。我知道，一切已无可挽回，再也争取不来了。被打倒在地的阶级敌人，怎么可能去改变公安厅批准的决定呢？

6. 狂热的安西

邹士杰是个热情奔放的领导，过了些日子，场部和三大队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由他传达中央文件，他声音嘹亮，激动地宣布："我给大家报告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宣布我们国家将第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我才知道，党中央从来没有这样宣布过。1958年8月中下旬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要产钢1070万吨。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大概邹士杰的讲话就是他自己对以上决议的解释。记得20世纪50年代在报社时，经过党支部吸收我听党课，我曾激动地递上了入党申请书。到1957年批斗我时，申请入党似乎也有了罪，我给农民报副总编辑×××写过的大字报：《向×××同志进一言》，触到了她的痛处。×××在批斗我时，就声色俱厉地说："你申请入党就是为了反党！"这一奇妙的逻辑使我无以答对。在斗争右派分子的大小会上，又有哪个右派分子能为自己辩护呢？此时的我，对于邹士杰的报告只有傻听的份儿，也不去多想，但心中仍不免一动，我想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我虽被划为右派分子，我们国家如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也应该为之高兴！

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确实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一下子响彻了中国大地。据《中国"左祸"》一书披露：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徐水视察。县委书记张国忠不断把他的宏伟目标报告给毛泽东听：徐水县计划亩产20000斤的谷子卫星，计划亩产100万斤的山药卫星。毛泽东问秋季预产情况，张国忠答："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2000斤，总产计划拿到12亿斤。"毛泽东惊讶地说："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毛泽东又说："一天吃五顿也行。"此时，举

国上下都像疯了着魔了，在这种情况下，十工农场也积极行动了起来。

三大队在场部所在地，积极行动便首当其冲。三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复转军人小吴，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从县上开会回来，就要求三大队组织40个强劳力搞试验田。小吴脑袋瓜很灵，跟形势很紧，满嘴的豪言壮语，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报纸上每亩小麦10多万斤的产量都出现了，我们为啥不搞试验？我作为十工农场的青年代表，向县上自报了亩产小麦17万斤的指标。"小吴从县上回来，先见到了在三大队搞统计工作的我的难友高仲君。高仲君问："每亩17万斤的产量你的科学根据是什么？"小吴说："劳动能创造奇迹就是根据，通过实践就能证明。"噎得高仲君无话说。况且，高仲君记得，邹士杰作为副场长，在开大会时也慷慨激昂地说过："是要敢想敢干呀，谁如果有能耐把棉花务得长成树那么大，我就奖他一万元！"在那个年代，一万元可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个大数目。

形势逼人。身为右派分子的高仲君觉得自己不敢有抵触情绪，便去向三大队的队长转达了小吴的要求，商量怎么办。队长对县上的指示精神认为也不能违拗，就回答说："那就搞嘛！"为了慎重起见，他们一起商量好先搞5亩试验田，劳动力从棉花试验站调来，但只有十几个人。这些强劳力都是武威步校被开除了军籍的原军官们，已是秋季，就先从深翻地做起，要求深翻一丈。小吴的口头禅是："毛主席说了，'粮食要增产，还是要深翻。'"

没有了军籍的军官们只得遵命执行。

这5亩试验田就在场部跟前。一次，我从试验田的地边走过，只见他们十几人一字排开正在翻地，且已翻得很深了。说他们在翻地，倒更像是在挖沟，因为为了达到一丈深的深度，他们正站在一人深的沟里一面继续深挖，一面把挖起的松土用铁锹向高出头顶的地面上猛扔。站在地沟里的靳清义笑着和我打招呼："小和，下来，下来，下来和我们比试比试！"靳清义是原武威步校的政治教员，人长得清瘦秀气，白白净净，完全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气质，他原是天津杨柳青的农家孩子，十二三岁时就作为儿童团员打击日本鬼子，稍长，即成为八路军战士。后来又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后在政治理论方面进行了深造。此时还只有二十八岁，是个单身汉。靳清义一向傲气，当了右派后，仍常和别人辩论一些理论问题，一次曾同当过机要秘书现任食堂管理员的陈明辩论某个理论问题，靳清义竟鄙薄地笑了笑，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辩论这样的问题？"此刻曾芳煜、王洪勤、徐保安他们都在深沟里狠挖猛扬，个个都有点英雄气概。

为了支援他们日夜大干，陈明还在食堂安排炊事员为他们做夜餐，把夜餐送到地头，让他们吃饱喝好，大干再大干。

这天夜里，高仲君到深翻的试验田去看，他跳下去想知道到底挖了有多深，不料

那挖下去的深沟竟已一人多深，站在沟底，地面离头顶还一尺多，大高个子的他几乎难以从沟里爬出，早就超过了两米的深度了。

在深翻中间，还加足了肥料，马厩里的肥料全部提前清除拉到了试验田地边，场上的麦衣也拉运到地边。从试验田的底部便开始施肥，一层马粪，一层麦衣，中间用土隔开压好，以便经过一个冬天把肥料沤熟沤烂。浇冬水时足足用了四天四夜，才把五亩地浇了个透。

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大队的领导、技术人员和全国许多人一样，都热昏了头，他们不仅仅是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天真的他们也动了很多脑子，想在这五亩试验田里放出个高产特大卫星。

为了把这则不是笑话的笑话说完，我们不妨超越一下时间，且把日历先翻到1959年的春季。翻年春播时，因为五亩地的地块不大，队里先决定用畜力播种，种成棉花。谁知试验田深翻后，地表深处的生土经过浇灌，板结得如同石头一般坚硬瓷实，用畜力拉，犁铧根本无法把地皮划开，无法下种。后来只得改用拖拉机播种，坚硬的地表果然被毫不费力地划开了，但是，坚硬的地表被划开后，下面竟是沼泽地似的烂泥塘，拖拉机深陷泥塘，动弹不得。最后，请来了机耕队孟队长调来两辆拖拉机用钢丝绳共同牵引，才把陷入泥塘的拖拉机拉了出来。

谁料想，这一年五亩棉花试验田里只长出稀稀拉拉的几十棵苗苗，全无收成。

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以后，一切为“钢铁元帅”让路。当宋庆龄上海居所美丽幽雅的大院里也建起了小高炉，她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了炼钢，昼夜大干之时，像十工农场这样偏远的所在，再不紧紧跟上便为当时的形势所绝不允许了。据闻，当时全国要完成1070万吨钢的指标下达各省后，在大跃进的年代正红得发紫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向全省各县分配指标时就阴沉着脸，杀气腾腾地表示：“各县的炼钢任务少完成一公斤，我就要你县委书记的头！下面该怎么办，你们自己考虑去吧！”此传闻确否，已无从查证。从全省各县来看，大家都不顾一切，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所有的工作几乎都陷于停顿，动员了一切的力量，不惜财力物力，迅速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建起了土高炉群，炉火熊熊，黑烟滚滚，大炼钢铁，人们是在恐怖中奋力拼搏着。在那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不寻常的年代，什么不寻常的事不会出现呢？

靳清义他们作为强劳力，又被集中起来，到场部附近的马家庄修建小高炉炼钢去了。另外，还从各大队抽调了大批人员参加了全县的炼钢大军。

但是，靳清义、曾芳煜、徐保安他们出师不利，在马家庄修建的土高炉一连炼了三炉，都没炼出钢来。邹士杰当时担任着县上炼钢指挥部的副指挥，对他们的汇报极为不满，在场部和三大队开大会时一顿猛批。他情绪激愤地说：“炼了3炉没出钢，

炼30炉、300炉行不行？六六粉不是试验了666次才成功的嘛！右倾思想就是要不得嘛！”此处，他把西药“六〇六”的试制成功的过程，误以为是六六粉了，所以作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那些原军官们。不知为什么，他还把“右倾”的“倾”字念做“啃”，会场上的书生们听到，对他这种奇怪的读音，都装作没听出来。邹士杰不仅有力地驳斥右倾思想，还拿出一块从县上带来的黑色硬块，在桌子上用力敲打着，声音响亮，慷慨激昂地说：“有些阶级敌人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说我们炼不出钢来，这不是钢是什么？你们说，这不是钢是什么？”会上，大家对他手里的黑色硬块都无鉴别能力，而且谁也没有胆子说它就不是钢。邹士杰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连指导员，做宣传鼓动工作很有一套。在这些场合，他应对如流，显得很有气派。当时，十工农场的正场长吴玉璋，不论从那一方面来说，都退居于次要的位置，出头露面没他的事。吴玉璋原来的地位、资历都在邹士杰之上。在此时期，他曾当着邹士杰的面不客气地直言不讳，说：“你是那‘解放式’的干部嘛！”口气完全是一派挖苦讽刺调侃的腔调。邹士杰并不生他的气，只管笑笑，也不作任何辩解。

邹士杰跟吴玉璋确实不是一种类型的干部。吴玉璋正派厚道，一切按党的优良传统及政策规定办事，一心扑在农垦事业上。邹士杰灵活机动，他能够自如地顺应大跃进的时代潮流，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胡说一气，把人“耍”扎了。当山丹县已开始饿死人之时，他随地区检查团4次到山丹，县委书记刘逢皞为了掩盖真相，招待检查团每天吃的海参鱿鱼酒席，邹士杰也吃了个美。当时他就注意到，出了县城，饥民把榆树、沙枣树皮都剥完吃光了，为了掩盖真相，剥去树皮的树干上还抹上了泥。山丹县是当时河西地区标榜的大跃进的先进县，地区领导4次到该县组织开现场会，就是号召各县向山丹县的做法学习，推广山丹县的先进经验。邹士杰就是个邹士杰，他也只能顺潮流而行，绝不能逆潮流而动。面对在全国范围内涌动着的历史大潮，谁敢非议？谁能阻挡？十工农场当时如果缺少这么一个人来支撑场面，呼风唤雨，胡吹冒聊，把这种明摆着是糊弄老百姓的所谓的群众运动推波助澜地引向高潮，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又怎能交得了差呢？十工农场在安西县是首屈一指的大农场，其实，邹士杰也未必同意这样做，只是不得不这样做罢了。

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十工农场声势造得很大，不仅在本场修建了小高炉群炼钢，不顾屡次的失败，仍以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继续大干——这只要作为县炼钢指挥部副指挥的邹士杰随意地向上汇报就是了，作为副场长，他对本场只能“上天言好事”，况且，不论他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上面都绝对相信。再说，农场还派出了大批人马参加县上及大泉的炼钢点大炼钢铁去了。

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农业是个大丰收，而农村的青壮劳动力（包括妇女）在秋收时都被强制参加大炼钢铁去了。彭德怀视察湖南时，一个老红军递给他一张条子，

要他向中央“鼓咙呼”的事，就是指丰收了的稻谷因缺少劳力无法从地里收回，这位老红军认定大家要饿肚子。

甘肃的情况也是如此。甘肃的特殊之处是当时还搞了个“引洮工程”。此工程由新华社记者顾雷写了《银河落人间》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大加宣扬，被誉为“伟大的共产主义工程”。现根据《炎黄春秋》历史风云栏目中的《引洮上山：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荒诞事》一文，对此工程略作介绍。此工程在1958年6月17日隆重举行开工典礼。被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称为“共产主义创举的引洮上山”工程，是要将洮河引过海拔2130米的华家岭，灌溉甘肃中部、东部干旱地区的2000万亩土地，总干渠要跨越大小山沟880余条，全长1400公里。单是总干渠的长度就比世界上驰名的苏伊士运河长6倍多，比巴拿马运河长13倍多，而且在两年内要完成。

从开工之日起，引洮工程几乎一直是在“反保守”、“反右倾”的批判、斗争中进行的。

几十万农民分布在岷县、临洮、渭源、陇西、定西、通渭、秦安、庄浪、平凉等十几个县漫长的工程线上，用简陋的工具逢山凿洞，过河架桥，最后要把洮河引上庆阳地区的董志塬。全国大跃进的狂热过去之后，“引洮工程”也被迫下马，结论是劳民伤财，仅耗费的劳力达6000万个，一亩地没浇上。

大炼钢铁和“引洮工程”两项，白白耗费了全省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其最严重的直接后果，就是把当年丰收了的即将到口的粮食，即人们所说的“宝中之宝”，在许多地方都糟蹋在地里，未能收回。

彭德怀在视察湖南之前，也到甘肃视察过，他早就亲眼目睹了大片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的情况。当时，甘肃一直吹嘘要把河西走廊建设成为全省的粮棉基地，彭德怀既然到了甘肃，当然要到河西走廊看看。“一天，在去武威步校的路上，他发现大片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便立刻命令停车，叫警卫参谋景希珍去找当地的干部来询问情况。过了很长时间，才来了一位拄拐杖的老人。他问彭德怀：‘你是个大官吧，有啥事情找我吗?’

“‘老人家，这庄稼都烂在地里了，怎么没收啊?’彭德怀问。

“‘是啊，咋不来人收吗?’老人用拐杖捣着地问。

“‘人呢? 都干什么去了?’

“‘都炼钢铁去了，壮劳力不够，妇女孩子都去了。这是上头定的，不去不行，区上要求放啥卫星哩!’

“‘唉呀，庄稼收不回来，来年大家吃什么? 总不能啃钢铁啊!’彭德怀焦急地喊起来。

“老人直直地盯着他，好大一会才说：‘我可不敢说这话，除非北京来个大官下

道令旨……’”①

我的难友从武威步校送来的原军官有十多个，我知道他们之中有几人都是因为鸣放时说到粮食统购后农民吃不饱才被打成右派的，如山东的王洪勤、河南的徐保安，也许还有别的人，可他们再也想不到，在他们成为右派之后，大片的庄稼会烂在地里，而且就在去武威步校的路上。大饥馑的瘟疫已难以脱逃了。

安西县的棉花纤维长，属优质棉。即便是编造《天方夜谭》，谁也不会想到，安西县城附近的棉花田里，上好的棉花开了白花花的一片，因为无人收摘，竟然成了牧场。放羊人把羊群赶进棉花地，让羊群大嚼盛开的棉花，棉花的味道一定比青草嚼着更香，棉子油的营养更佳，羊们大嚼之时，口角流出浅黄的涎水，十分惬意。这般的美食，羊们从未享用过，它们一边大嚼，一边愉快地发出“咩、咩”的叫声。

这天，高仲君进城办事，见到如此稀罕的景致，不禁大为惊奇，大惑不解。他问放羊人：“羊吃棉花吃不坏吗?”

“吃不坏，肯上膘得很!”放羊人答。

用地里成熟了的上好棉花喂羊，这在全世界也属创举，其奢侈浪费之惊人，就是古代最为奢靡的帝王也会为之咋舌称奇。

当大炼钢铁紧张红火之际，某些领导人说实在的也没完全忘记粮食，但是他们以所谓大跃进的高速度，要求在三几日内地净场光，收获完毕。当时农村留下的老弱妇孺人数极少，根本无法在三几日内完成此一任务。于是，谁完不成任务就认为是阶级敌人在破坏，用对付阶级敌人的手段进行批斗，直到捆绑殴打，美其名曰：“拔白旗”。当时的口号是：“插红旗寸土不让，拔白旗一个不留。”农民怕挨打批斗，也学奸了，他们只得自欺欺人，例如，有不少地方收洋芋时只弯下腰把洋芋蔓拔净，就算完成了任务，最后洋芋全部冻坏烂光在地里。

从古到今，可曾有过农民如此欺骗自己，把到口的粮食扔在地里的先例?何况此时，在全国各地包括河西走廊及甘肃有些县区，不少农民已在挨饿，饿死人的事已经出现。可怕啊，可怕的“政治”。我过去办农民报时，记得农谚就说：“人不哄地，地不哄人。”作为编辑，我曾以此教育农民要精耕细作。现在，农民被迫所采取的自欺欺人的行径，最后必然要惩罚到自己身上。

当时，十工农场的情况应该说相当好，大炼钢铁前，小麦已全部收割打碾完毕，共收入300多万斤（其中包括从西湖抢收的20多万斤撞田小麦），生产没乱套，小麦是个特大丰收，棉花的生产也没受到影响，共收获六七十万斤。受到影响的主要是瓜的销售，城关的炼钢点，抽去了场里的7辆大拖车用车上的发动机带动鼓风机，原计划

①引自《国防部长浮沉记》。

外运青海柴达木的瓜，因未能及时运出，经济上受到损失。后来，炼钢点情况略有松动，邹士杰立即让7辆拖车夜间偷偷回了场里。当然，场部的汽车等运输工具为大炼钢铁运输焦炭矿石也是出了大力的。——说到这里，我想起，邹士杰还曾带领我们演出队的部分人，到一个炼焦炭的点上慰问演出，记得我参加演出了个小眉户剧。演出结束后，我们有些人还下到简陋的矿井体验了矿井工人的生活。

十工农场直接受省农垦局领导，每年向省农垦局上缴100万斤小麦就完成了任务，对此，省农垦局无可挑剔，在其他方面，省农垦局因鞭长莫及，施加影响有限。而县上对这个全县首屈一指的大农场无权乱加干涉。这种种条件，造就了农场在大跃进的年代，生产经营依然一派良好的态势。

不要只看到邹士杰开大会说起阶级敌人的破坏行动声色俱厉，义愤填膺，痛斥右倾思想有理有据十分得力。面对十工农场劳动和生活着的具体的右派分子们，也就是我等之辈，他却心地善良，柔情似水。这，我自己就有切身体会，他对景超营救的积极热情的态度，其全过程我在前面已描述介绍过了。此时，从全国来说，阶级斗争的弦仍拉得很紧，报纸和文件上常出现这样的语句："地富反坏右，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处处要同党和人民为敌到底。"邹士杰传达文件念到这些地方，常有意地把"地富反坏右"中的"右"字省去不念。这一个"右"字的省略，使我的右派难友们心里涌动着的热流奔突不已……上自毛泽东、党中央，下至全国各地直到基层，右派分子在人们眼中早已是一堆臭狗屎。他们时时处处受到敲打，各种凌辱不断袭来。惟独在这一片特殊的土地上，我们依然是堂堂正正的"人"。也有人认为，邹士杰人极聪明，通过半年多的实践，右派们在各项工作及生产第一线上，都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言语不慎影响了我等的情绪，明年全农场的各项工作及收成就要受到影响，要保持农场的荣誉，在大跃进的年代不滑坡，尊重我等，调动我等的积极性，实乃上等之良策也。此话也不无道理。何况，那时的我等都还有个为积极争取摘掉右派帽子的傻劲，对此傻劲，鼓励总比打击为好。真所谓："气可鼓而不可泄也。"

无独有偶。此时省畜牧厅来了一驻场蹲点的干部（姓名已忘记），我们在开大会或有演出活动时遇见，常含笑寒暄一阵。他态度和蔼，同报社那些与我们严格划界限的人绝不一样。此人肚中有点文才，还曾在农场的小报上撰小诗一首登出，记得有几句是："戈壁春雷吼，山河齐发抖，天公俯首看，人民显身手。"此人在开大会念文件时，只要出现"地富反坏右"5个字，"右"字他也绝对省去不念。我心中有点纳闷，究竟是邹士杰的神经使他受到了感应，还是他的神经受到了邹士杰的感应？看来，他们二人内心深处对我等并无仇恨，或许倒有同情，上面阶级斗争的弦拉得再紧，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农场，他们我行我素，念中央文件有意地把"地富反坏右"中的"右"字略去不念，或许倒是反映出了他们的心声。

〖〇九二〗

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有天晚上，我和小徐被畜牧组的人叫去加班，具体工作是用石块砸碎破缸片，要砸得细如沙粒，说是炼钢要用。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砸细了的破缸片对炼钢有何用。一起砸的是畜牧组的全体人员，有几个工人，还有一两个男难友。我们都坐在地上一直砸，到天快亮时也没砸细多少，每个人都瞌睡得东倒西歪的。后来，工人们也受不了啦，有个工人喊了声："睡走吧！"大家立即响应，都跑回宿舍睡觉，只睡了一两个小时就又上工了。因为砸好的成品极少，我以为还要砸几个通宵呢，但不知为什么，第二天再没让去砸。

三十多年后，1991年8月30日，我去酒泉在邹士杰的家里再见到他时，我仍没忘记问起这件事。此时的邹士杰已离休，他是从酒泉地区农垦局副局长的职位上离休的。他回答说："把砸碎了的细沙粒涂到土高炉的内壁上，才能炼成钢。"我心里暗笑："真能炼成钢吗？"嗨，当年我们瞌睡得东倒西歪通宵达旦地砸破缸片，说不定正就是他的指示呢。他还说："当时县秦剧团的女演员什么也干不了，就让她们拉个架子车，到各家各户收集破缸片，破铁锅，各种铁器烂铜。"我听到仍觉得十分新鲜，"食堂化"结束之后，安西县的普通老百姓不仅没有了做饭的铁锅，连盛水的缸也没有了。真是一场悲剧。

我是和侍峒山、伐夏，特意去拜访邹士杰全家的，我感谢十工农场在三十多年前对我们这些落难者优礼有加、平等对待的深情厚谊。我更没忘记邹士杰为营救景超、争取把景超调到十工农场做过的努力。

我让伐夏买了一条烟送给邹士杰。因为我听说他尽管有严重的肺气肿，仍嗜烟如命。我们谈话时，我看见他不断地抽烟，但不深咽，只是轻轻地吸进，便立即吐出，他还是害怕烟气对肺气肿的危害。邹士杰的妻子已不是过去在农场时的模样，她烫着发，穿着也讲究。她还记得我在扫盲班上为她们讲课的情景，说："你还是我的老师哩！"记得我给她们上课是在高大的种子库房里，上第一次课时，邹士杰就蹲在门外，一直把一节课听完，才满意放心地先走了。原先他对于我能不能胜任工作，还心中无数哩！她妻子热情地沏茶倒水，留我们吃了午饭。

1961年我回到兰州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工作后，平静了几年。1966年，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各种不堪忍受的厄运时，我常在心里默默地回忆起在十工农场曾经度过的好时光。在那阶级斗争常抓不懈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十工农场曾是我心灵深处的一方乐土，它常引起我种种温馨的回忆。当然，作为一个受难者，在那里我曾经有过欢笑，更有过悲苦。那时，我青春年少，在受难中尽管对未来依然有着憧憬，认定自己迟早会回到人民的怀抱，重现我革命者的风貌，而含冤受屈，同亲人们生生分离，又常常使我陷入不能自拔的悲伤与凄苦之中。现如今回首往事，我真愿意把那丝丝缕缕、点点滴滴早已失落了的故事全都重新拣起，在心里再细细地过一遍。毕竟，因为

年代久远而失落了的故事，不论它欢快温馨也罢，凄迷伤感也罢，它们都失落在我一生最美好最令人神往的青春年华里。受难的青春依然闪光。尽管青春一去不复返，而我仍愿咀嚼个中特殊的人生六味，再再咀嚼，再再消受。

再说，报社和我们同来的赵秉仁、杜博智，原来都分到了四大队，此时也都参加了县上的炼钢大军。这支炼钢大军的主战场设在安西县西北方叫作大泉的地方，离星星峡不远，已接近新疆。参加者近千人，有县上的干部职工，从全县各地抽调来的农民，河南、四川等省来的盲流人员、支边青年，再就是从十工农场去的工人及我的难友们。

大泉炼钢的全过程，杜博智都参加了。炼钢所在地是苍茫的荒野戈壁，没有房屋。他们9月初去时住在帐篷里，先用一尺多高的坩锅炼铁，因产量太少，很快又决定建造土高炉。他们的工作先是打土坯，每天早晨，先在沼泽地边选好做土坯的场地，从沼泽地里用铁锹挖出一大堆泥，堆好，在模子里铲进泥，抹平，端着模子快速奔跑，脚下发出“噔、噔、噔”的响声，把模子里的泥坯倒出，放在远处一行行排列整齐。每个人每天要完成五六百土坯的定额，十分辛苦劳累。此时，安西的骄阳还十分炙人，打好的土坯晒上两三日也就干了，可以码在一起备用。杜博智是陕西蒲城的农家子弟，从小就有劳动习惯，我们坐火车来安西的路上，景超在酒泉下车后，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曾谈笑风生，用他那陕西高腔慷慨激昂地表示：“再过三年，也许我们会评成劳动模范，再坐上这列火车，回兰州去参加省上的劳模代表会呢！”真是天真之态可掬。

说起杜博智当右派也有他自己的特殊经历。

杜博智是在他的家乡陕西蒲城1949年春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他是农家子弟，家境比较困难，但他学习刻苦努力，一直是班上的好学生。家乡解放的那年，他才是个初中生，16岁。参加工作时，他的初衷还是继续上学，招收他们的干部也说可以继续上学。他1949年5月17日离开蒲城县中赴大荔干校学习。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入学的第二天就到大荔新华支社当上了机要员，8月由大荔而入了西安城，成为中共西北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工作人员。兰州解放后，他也到了甘肃日报社，任机要员、电讯组副组长、机要秘书，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为总编室的时事编辑。他年纪轻轻，职务一般，却曾是报社非常活跃的人物。他是共青团的支部委员。1953年6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印象中，他工作积极，很健谈。20世纪50年代初期，编辑部总共人数只几十人，编辑部开大会时，杜博智也参加。当时的民谚云：“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甘肃日报》作为甘肃省委的喉舌，对工作人员在政治思想、政策水平方面的要求很严格，通过学习讨论，来提高大家的政策和理论思想水平自然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在学习讨论会上，杜博智经常无视编辑部众多的编辑记者，会

被打成右派前的杜博智

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讲一通符合当时形势需要的大道理及有关的政策问题，等等，说得头头是道，表现出跟党跟得很紧。到1957年鸣放开始时，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总编辑阮迪民工作和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写了几张小字报。此时，阮迪民已调甘肃省委任宣传部长，总编辑是兼职，平日不在报社上班。杜博智在题为《情中情因情袒爱妻　错里错以错斥恶徒》的小字报上，还批评了××袒护妻子××、×××自己说错了话反而训斥杜博智的问题。1957年5月25日，在总编室整风学习会上，总编室主任×××启发说："谁有啥问题不明白，也可提出来讨论。"杜博智当即响应，说："机关党团支部领导是选举的，但行政领导却不是选举的，不知为啥。如果行政领导叫选举的话，那些脱离群众、不按党的政策办事的人就选不上。"这样的话题在会上当时并未引起别人的注意，说过了也就罢了，谁也没有因此而说什么。可是，到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总编室主任×××、副主任××，为了向阮迪民献媚并泄私愤，就歪曲事实向上面汇报，说杜博智在小字报上攻击了阮迪民。如果仅此而已，他们也知道要把杜博智打趴在地上并不容易。杜博智在整风会上提出的问题竟被××汇报成"杜博智提出选举总编辑"。在批判他的会上，由××发难，说："杜博智主张选举报社总编辑。党报是省委的喉舌，总编辑只能由省委任命，选举总编辑，就是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要办同仁报。"从全国来说，新闻界有人提出办同仁报的意见已作为典型的右派言论而受到猛烈的抨击。××的发难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将杜博智打倒在地的重型炮弹。在此前后，搞人事工作的××的妻子××写了张揭发杜博智的大字报，上面说："右派野心家杜博智说：'再过六十年，我比毛主席还伟大。'"杜博智当时不仅没有对××说过此话，也没有对任何别的人说过此话。××毕竟心虚，在大字报上就没敢署名，也没写杜博智说此话的时间地点，向何人说过此话。但杜博智认识××的笔迹。这张没有署名毫无根据的虚假大字报，就把杜博智的罪名进一步加大了码子。后来，《甘肃日报》上公开揭露批判杜博智，仍以××夫妇提供的虚假材料作为"事实根据"。经过×××、××的推波助澜，不到10

人的总编室一下揪出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是杜博智，另一个是杜绍宇。××还给杜博智、杜绍宇赠送了“二杜反共联盟”的桂冠。所谓“二杜反共联盟”的内容是：一次，杜绍宇躺在办公室沙发上哭，杜博智问：“你哭什么？”杜绍宇说：“×××说话不算数，前边说后边就不承认了。我不敢给×××提意见。”杜博智说：“这有什么怕的，会上人多，又有人作记录，怕什么！”××把这件事说成是：“杜博智和杜绍宇合谋故意引逗×××说错话，由杜博智作记录，反过来再整×××。”据此，××写大字报，称作“二杜反共联盟”云云。真可谓战功显赫。×××、××二人的头上便添加了耀目的光环。反右斗争结束后，××、××调新华社总社，他二人原都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员，调回北京，也遂了心愿。×××在大跃进的年代成为省上出名的显耀人物，很受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器重，所谓“大旱大增产，无雨大丰收”的口号，就出自他的手笔。

让我们再回到炼钢的话题上。大泉炼钢工地上的土坯打好以后，便立即修建土高炉群，这工作技术性强，活也很重。但是，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轰轰烈烈，还向其他炼钢工地发出挑战书。上过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赵秉仁，作为笔杆子让去写挑战书。挑战书写得洋洋洒洒，说不尽的豪言壮语，其中有“宁肯少活二十年，不叫城关超大泉”的语句，正体现了那个年代奋不顾身的豪迈气概。当时，城关也是县上的炼钢重点。

炼钢需要燃料，杜博智又被派去烧木炭。戈壁荒原上有一种叫梭梭的灌木，多年生的主干有胳膊粗，木质十分坚硬，被选来做木炭的原料。于是，戈壁深处的梭梭林被砍烧殆尽。炼钢工地选在大泉，大概正是因为这里有可资利用的燃料。顾名思义，大泉原来一定是个泉水如注、风景如画的好去处，成为荒原后再长起密密的梭梭林，也是大自然多年来的造化之功。一场大炼钢铁，斑驳的绿色从荒原上褪去了。

天气渐寒，杜博智他们动手为自己挖了地窝子以挡风寒，门上挂着用芨芨草编成的门帘。杜博智铺上了从兰州带来的狗皮褥子，单身汉的他还盖着绿缎面的被子，显得比别人要阔气一些。然而，一场风雪，早晨起身，绿缎面被子上又是沙土，又是雪花。年轻的他也并不为意。当许多热昏了头脑的同胞们都在为1070万吨钢铁拼命大干的时候，天寒地冻又算什么，“我们的热劲比天高！”从内心里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右派的原共产党员杜博智干得比谁都玩命！

大泉地处铁路沿线，铁矿石是从火车上运来的，或许因为没给火车司机说清楚，装铁矿石的几个车皮没拉到该卸的地方就停下了。已修建好的土高炉群正准备装料点火，万事齐备，只等来矿石。在那“东风压倒西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关键时刻，已经拉来的矿石绝不能让它在车皮里过夜！于是，经过动员，数十人奔向装矿石的车皮，一阵呐喊，挤的，推的，拱的，硬是把装了数十吨矿石的几个车皮推着前进了一二百米，流着热汗的杜博智兴奋地大喊：“人常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

推的'，今天，咱们不是把火车推得前进了嘛！”

装矿石的车皮推到了汽车可以拉运的地方，便立即卸了下来，由汽车拉到土高炉所在之处。土高炉很快点火。为了放出特大卫星，全体炼钢人员大干三个通宵，三天三夜不睡觉。杜博智一面拉风箱烧火，一面扯起了鼾声；一面走路，一面也扯着鼾声。在睡睡醒醒之中，一旦坠入黑甜乡里的他，依然做着光怪陆离色彩纷呈美丽无比的梦。他就这样迷迷瞪瞪糊里糊涂地在昏天黑地之中消磨着一年来练就的好力气。

最后，大泉的土高炉群同全国各地放出的“卫星”一样，都取得了一致的成果：炼出的都是似铁非钢，似渣非渣的废料。在城市里，很多金属制造的精品，都消熔到这些废渣里去了。1961年初我回到兰州，发现外祖父家的铜脸盆、铜灯盏、铜火盆、铜火炉、锡酒壶等等，全都在大炼钢铁中“捐献”一空。这些器皿平日里都被外祖母擦得亮晶晶的，十分好看，就这样踪影全无。大泉炼钢大军的好汉们在春节前全部打道回府，“胜利”归去。杜博智说的“牛皮不是吹的”还回响在人们的耳际，而此刻，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到处都出现了前无古人的大吹牛皮的壮举，却很少有人公开为此汗颜，为此扼腕而叹。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使全国人民紧闭了自己的嘴，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地说真话，“指鹿为马”的新传奇奇怪地在全国遍地开花。

1958年10月7日，我从《甘肃日报》上看到诗人闻捷写的歌颂安西大炼钢铁的诗，才知道闻捷到了安西。毛泽东要求诗人作家深入生活，诗人闻捷于1958年4月间来到甘肃，担任了《甘肃日报》的编委，深入生活来了。他的诗作，不断出现在《甘肃日报》的报头或刊登在一版的显著地位。

现将闻捷的这首诗录之于下——

安西人心比火热

——夜观安西全民大炼铁而作

月下打从安西过，
只见西关千炉火，
火焰飞腾天地红，
安西城里无黑夜。

穆桂英连砸矿石，
一锤一拍有起落，
杨宗保营拉风箱，

边说边笑唱山歌。

不唱三皇和五帝，
单唱当代英雄多，
劳动号子如雷响，
安西人心比火热。

一人领唱众人和，
英雄欢唱英雄歌，
人人争做多面手，
不断革命大炼铁。

炼得北斗七星转，
炼得日出东方白，
炼得铁树开红花，
炼得铁水流成河。

英雄人民英雄胆，
万重难关全攻破，
逼得指标插翅飞，
换得铁山献祖国。

今夜路过安西城，
只闻歌声动山岳，
快步如飞绕城走，
兴致勃勃观炼铁。
想吟小诗赞英雄，
千言万语无声色，
为给高炉添把火，
且随英雄唱山歌。

1958.9.14深夜于安西

名诗人闻捷自称为“山歌”的小诗，《甘肃日报》把它与毛泽东《送瘟神》的手迹，放在同一日第三版发表，小诗同毛泽东《送瘟神》手迹放在并排，在手迹的右侧，其位置之显赫可略见一斑。这样做，无非是看中了闻捷在大炼钢铁的高潮中为之擂鼓助威的政治意义。闻捷在搜索枯肠凑成这样的篇什时，诗人的灵感未能爆出一星半点的火花。浪漫诗人只不过是兴之所至，他未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取生活。

就在闻捷诗兴大发，发表《安西人心比火热》之际，就在同一地点，安西城关的炼钢点上发生过失足人跌入土高炉的惨剧。这一天，高仲君去县城办事，他看到高炉群都修建在城墙的一侧，准确地说，土高炉就挖在城墙上，安西县不知什么人出了高招，独出心裁，充分利用了城墙厚厚的土壁，这样，就免去了用土坯从平地上砌土高炉的繁重工序，多快好省地出现了土高炉群。城墙上，炼钢的人也在不断穿行。此时，炉火熊熊，黑烟滚滚，一切都干得红红火火，热闹非凡。突然，一声惊叫，一个行走在城墙上的人，因一时不慎或疲劳过度掉入了熊熊烈焰的土高炉里，所有看见这一惨象的人全都吓得愣住了。土高炉无法立即熄灭，任何抢救措施都会毫无效果，舍己为人的英雄行为也绝对地救不了已在土高炉的烈焰中燃烧的失足人。这惨烈的一幕，不会有人去告诉闻捷。失足人的惨死，也死得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了。

说到闻捷的妻子，我曾有一面之识，实际上是我见过她，人家并不认识我。1958年4月间，闻捷和她已到了兰州。一个星期日，我去报社水房洗衣服，看到一陌生的年轻女同志也在洗衣服。她，人长得清秀漂亮，优雅可爱，两条长辫子弯过来扎在耳后成半环状，正是那个年代最时兴的样式。她是谁？右派身份使我不能和她搭话。只是因为左近有两个已和我划清界限不说话了的女同志小声议论，我才知道她是闻捷的妻子，和我同龄。我心中不禁有许多感慨。我这位同龄人是多么幸福，多么可爱！她这会儿还只在粉红色的梦幻里徜徉，她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险恶的政治风暴，叵测的人心，何以命运对人竟是如此的不公？我是她的同龄人，我也善良可爱，为什么，为什么我只求做一个普通人而不得，硬是被强制归入另册，被叫做反动派？漫漫前程，迷雾茫茫，我的路将怎样走下去？怎样走下去？

闻捷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自戕后，我听到心中自是悲凉。闻捷是著名诗人，我为诗坛上陨落了一颗璀璨之星而痛惜。然而，他陶醉于情歌的年代太久了，他那脍炙人口的《吐鲁番情歌》，当年我也很喜欢。但是，政治不是诗，更不是情歌。诗人天真地忠诚于为政治服务，最后终究被政治所杀，并连带了妻子。

正当安西县大炼钢铁红火热闹之际，我收到了父亲从兰州写来的信，信里说了说兰州家中的情况，特别提出在大跃进的新形势下，他感到特别受鼓舞，想把伐夏、小夏的名字改为超英、超美，向我征求意见。这个想法令我吃惊不已，我怎么也想不到，他怎么会有这样奇特的考虑，须知他是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他的思维甚至已超越

了普通人。同时，我还有点不快，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我和景超共同起的，没有什么不好，他为什么想改掉？父亲想要紧跟形势、紧跟时代的心态，让我觉得不可理解。我拒绝了他的建议。

这封信又勾起了我对孩子们的思念，两个孩子的面庞身影又出现在眼前……伐夏上幼儿园时，从小朋友那里学来了一首不知由谁编成的儿歌。一次，伐夏在玩耍时不经意地用清脆的童音朗声吟唱，这首全部用地道的兰州话吟唱的儿歌，我和景超听了，不禁都笑得前仰后合。

这首儿歌的全文是——

美国大鼻子，
想吃中（用唇齿音读）国的酿（读rá ng）皮子，
辣子水（读fé i）水（读fèi）灌了一鼻子，
跑到黄河边上洗鼻子，
骆驼过来踏了一蹄子，
哎呀，我的大鼻子！

伐夏清脆的童音朗声说着这首儿歌时，他顽皮的样儿多可爱！3岁的小夏看见我们大笑，也傻乎乎地笑了起来。

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全国人民对美国侵略者同仇敌忾，美国人的大鼻子也成为嘲弄的对象，不知何人顺应形势来了点创造编了这么个歌谣，倒还有点兰州的民俗特色。如今追忆起伐夏清脆的童音朗声说着这首歌谣的情景，竟像是遥远的梦境！孩子啊，孩子，我是多么想你们啊，我和你们的爸爸如果此刻能够看到你们甜甜的笑脸，听到你们朗朗的笑声，该是多么幸福啊，我们会感谢生活对我们的赏赐！然而，此刻我心上流淌的只是苦涩辛酸的眼泪……我见不到你们，更见不到境况更苦的你们的爸爸。

7 疏勒公社的出现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三大队先是组织我们学习了有关文件，讨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性质，称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桥梁。我在学习会上按照文件精神发言，也表示自己对出现在共和国地平线上的这一新生事物有正确认识。既然，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我们毫无疑问地只能说：“人民公社就是好！”此时的我心里对人民公社其实十分迷茫。我在《甘肃农民报》当编辑时，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常用的顺口溜是：“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我们所在的农场，属社会主义的国营性质，比普通农村要先进一些，也只实现了“耕地不用牛”，点灯仍用煤油，而且也同农民一样，用的是墨水瓶改制不断冒黑烟的那种简陋的小灯，只有办公室才用有灯罩的正规煤油灯，其他一概都没有。把农业社合并成“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就能过渡到共产主义？我心中是纳闷的，但并不说出。所有参加学习的人也都是按照文件精神说几句，谁也不说出心中的疑窦，在这种场合说真话才真是大傻瓜呢。反正，过场一定要走到，学习会也是表现每个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的场合，不发言不行。此时，全国及省上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昏话，在十工农场似乎未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效应，没听说农场哪里出了类似的特大“卫星”，十工农场到底还是全省勤俭办场的先进典型，她以往昔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过硬作风，没有走得太远。

但是，疏勒公社还是应时而出现了。十工农场的农田全部靠祁连山的雪水灌溉，从遥远的雪山涌流而至的疏勒河穿过场部向西奔流而去。疏勒河水是农场的生命之水。当公社成立之时，十工农场取名疏勒公社亦顺理成章。公社要大，十工农场便合并了小宛、双塔铺、九工等农业社及近边的小农场。而小宛、双塔铺、九工几个农业社，当时因高征购已缺了粮，几近断炊。疏勒公社成立后，他们立即伸手向十工农场

要粮吃，疏勒公社的副主任是邹士杰，此刻的他热情很高，本着公社“有饭大家吃”的原则，慷慨大度，无偿地支援这几个农业社六七十万斤小麦。他能以作出这样的决断，也不仅仅出于一时的革命热情。当了疏勒公社的副主任后，权大了，为了履行应尽的职责，他曾到小宛、双塔铺、九工等地蹲点检查工作，但他没有想到，不论走到哪里，呈现在他眼前的竟是一幅幅极为凄惨的景象，每个农户家里，只有炕上铺着的烂席笆一如既往，铁锅被砸碎炼钢去了，案板被食堂搬去支上几根腿当桌子去了，除了吃饭的碗筷和身上的破皮褂子，家家都穷得一干二净，大人娃娃一个个面黄肌瘦，冻得唏唏呵呵的。解放前的贫苦农民穷到这份儿上，该也到顶了吧！邹士杰在农场传达文件时常常慷慨陈词，很容易激动，记得有一次当说到我国将首先进入共产主义时，他竟激动得不能自已，他的激动情绪也感染了会场的许多人。此时此刻，面对穷得啥都没有、面黄肌瘦的一户户农民，他哑然，毕竟，他也是农家子弟出身，不禁阵阵悲凉袭上心头。蹲点，使他面对了实际。“有饭大家吃”的决断，便在胸中形成。这样，便出现了成为公社社员的附近农民赶着胶轮大车，每天到场部拉运小麦的风景，车把式们一个个春风满面，喜气洋洋，是“共产风”使他们又有了饭吃。

这年，十工农场是个大丰收，支援农业社六七十万斤小麦后，全场粮食吃用仍绰绰有余。

农场按公社原则实现“食堂化”，也曾使大家“皆大欢喜”。此时，场部所在地的三大队已经建设起宽敞的新饭厅，饭厅的设计者是有历史问题从铁路上下来劳动改造的一位姓李的工程师，河南人。设计施工建设个食堂，在他只是小菜一碟。十工农场领导让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他不仅是食堂工程的设计师，修建中又负责施工兼做技工，抹洋灰等技术性强的活，都由他一手操持，并指导别人操作，把好质量关。食堂炉灶设计极合理，便于炊事员操作。砌炉灶更是他的拿手活，他指名要关维智等二人当下手，干了一夜，第二天炉灶就点火使用，一座新饭厅便拔地而起。新饭厅宽敞漂亮，水泥铺地光洁平滑，当时的安西县上还没有这等水平的大饭厅呢。场部人员和三大队的人都在此饭厅吃饭。“食堂化”就是吃饭不要钱，“各取所需”。这可乐坏了带家属的工人干部及我的难友们。县上许多难友的家属原来都没有工作，靠丈夫养活。丈夫落难后，她们生活无着，只好跟着丈夫来农场也参加劳动挣些生活费。农场的活重，许多农活她们又干不了，如平田整地推小车之类我和小徐、石天爱到农场就干的活，她们都不干。不是干不了，是没人逼她们干，尽管她们有些人原来就是农村妇女。这样，可挣的钱就很有限了，维持一日三餐十分艰难。秋后地里已没啥活路了，她们正愁冬日里吃啥。食堂化后吃饭不要钱，她们一个个笑逐颜开，高兴得不得了。

食堂管理员陈明在“食堂化”时挑了大梁。陈明当管理员已几个月了，他和炊事

员们相处都好，一次在烧火时就朗声说道："如今的世道颠倒颠，一个秘书把火添。"他原来在武威步校做机要秘书工作，炊事员们听了哈哈大笑。正巧，副队长穆国泰走进伙房也听见了，大声喝问："陈明，你说的啥?"陈明笑着回答说："我这是开玩笑哩！说说笑笑，大家干活热闹！"穆国泰笑了笑，不再说什么，也并不计较。穆国泰是个转业军人，他对部队来的陈明当管理员是满意的，什么右派不右派，在他脑子里不占多少位置，他对这位"犯错误"的原战友，兴许还有些同情呢。在实行"食堂化"的日子里，食堂要显示公社的优越性，吃的就要比以往有明显改善，食堂的卫生状况也要改进，要让已成为公社社员的大家伙吃得高高兴兴。掌管全盘的陈明在这个大转变的关头忙了个不亦乐乎。此时食堂出现的新气象有：每周公布食谱，过去少有变化的饭食得来点新花样，由于条件有限，炒萝卜丝变成了萝卜片，也算是变了花样，开饭前，新建的饭厅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在实行食堂化的第一天，真是个喜庆的日子，吃饭的钟声敲响以后，场部及三大队的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赶来，欢笑着一拥而入，那些家属们堂堂正正地进食堂吃饭，还颇有些自豪得意。以往，她们哪有机会进食堂吃饭？因食堂无桌凳，开饭时，就八九个人围一圈，蹲在干净光洁的水泥地上吃，中间的盘子里有共用的菜，大家用筷子搛着吃。在欢声笑语中，大家乐乐呵呵，吃得挺热闹挺香。因为食堂的工作量大了，有几个家属被吸收到食堂工作，这份工作在她们是求之不得。

在这些日子里，我的饭量大增。一次吃炸酱面——我没想到面酱在这里还是个稀罕物，很贵，炸酱里和了很多粉芡。但这是来农场第一次吃炸酱面，我吃得香极了，也饱极了，吃完后腰都弯不下来。下午饭常吃白白的大馍，我能吃四个大馍，同桌的工人张班长也只吃这么多，大家对我的饭量很惊奇。办农民报时，常用的一句俗话是："人是铁，饭是钢。"饭量不断增加，我觉得身体确实壮实多了，消瘦的脸变圆了，脸上的肉摸上去很瓷实。弱不禁风的我从此来了个大改观。这是我原来未曾想到的，改变得好快呀！

在国庆节，我们的伙食还有过一次大改善，简直像酒席，头一道菜是一个大拼盘：有鸡蛋、熟肉、凉拌菜、粉条等等的，后面还有几个肉菜。这顿丰盛的晚饭，简直使我们忘记了这是在农场的一顿会餐。陈明真是个好管理员，他不辞辛劳，想尽了办法，让人人都吃得满意。

我很喜欢壮实了的自己，以前在报社坐办公桌，这可是无法做到的。此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劳动能治百病。"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我小时候有关节炎，两腿膝盖处常疼，影响走路，后来用针灸治好了。参加工作后，两个胳膊又常疼，因为疼得不是太厉害，也就没治过。来农场后，无论拿铁锹整地或用锄头锄草，我常常在挥汗如雨中拼命猛干，数月后，胳膊疼的毛病再没犯过，好像被根治了。再说，我过去一向饭

量很小，到了夏季天热，吃饭少都让我发愁，体重会下降到连45公斤都不到。来农场劳动后，使我饭量大增，特别到秋后，越来越能吃，所以才有了如今壮实的身体。路漫漫，艰难的跋涉，需要壮实的身体；身体壮实，才能坚定地迎接未来。对于我来说，今后各种难以预料的不测都会出现，这是一定的。

再说此时的食堂，不仅场部和三大队的工作人员及家属都在此吃饭，公社“一大二公”的性质，还使它接纳了全农场的人员，谁来场部办事都随便进食堂吃饭，县上及外地来人也随便进食堂吃饭，分文不付，只留个白条子，写明吃饭一顿，拿馍三个，签上名字就行。这样，不到两个月，光留下的白条子累计就值一万多元，食堂压得喘不过气来，挪不动步子。“吃饭不要钱”的好日子只得急急收场，食堂的亏损最后只好向场部财务科报销了事。一场短暂的“共产主义”的试验就此宣告结束。

当时，领导上还传达上面的文件精神说，今后，大家都住集体宿舍，男女有别，各住各的，集体劳动，都吃食堂，小娃娃们进托儿所，夫妻星期六才能住在一起，实行“星期六制”。[①]这些乌托邦式的奇谈妙论，因为根本无条件实行，连“实验”一下也办不到，说了说也就被风刮走了。不然，还不知会闹出怎样的笑话。

这就是“共产主义”吗？我心里直觉得好笑。

在县上，步子迈得更大，奇闻不断出现。为了说明由于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我国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已有了极大提高，安西县人民银行在营业部门口，设置了个无人兑钞亭，放了些零钱，让需要零钱的人，用整票自己去换，15天内，放出的零钱和兑回的整票相差140多元。有人说：“这不是无人兑钞亭，而是伸手取钞亭。”县百货公司见银行设置了个无人兑钞亭，也急起直追，搞了个无人售货亭，10天过去，只有人取货，无人交款，只好收拾了摊子。

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又先后增加了三个女伴。第一个来的是殷淑芳，她一来就住到了我们宿舍的里间。她已三十六七岁，短发，黑脸，不好看的一双大眼睛，衣着朴素，还有些土气。她原在酒泉某单位搞财会工作，是中午休息时来的，我们问她：“什么问题？”她说一口山西话，毫不隐讳地说：“历史反革命。”如果在过去，我会对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另有看法，现在我们都已是“一丘之貉”，在感情上也就没什么隔阂了。第二天，老殷就参加劳动去了。她不叫苦，从地里收工回来，显得苍老的黑脸晒得通红，满脸的汗珠晶莹发亮，她只是举起搪瓷茶缸大喝一通水就迈开大步吃饭去了。她个子大，抬脚举步像个男人，脚下发出“嗵、嗵、嗵”的响声。相处了一段日子后，老殷才告诉我们，她已和丈夫离婚，丈夫是个叛徒，解放后判了刑。她的一儿一女在山西老家由她母亲照顾，都已十几岁了，原来她每月发了工资往老家寄生活

①延安时期，因居住条件所限，许多夫妇每周只在星期六才能住在一起，故名“星期六制”。

费。现在她自己没有了工资，就没啥寄了。老殷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是因为她在阎锡山统治时期参加过什么组织，她说："参加过这种组织的在山西啥事也没有，在这里就成了反革命。"我们也只是听听，对这种事做不出什么判断。

接着来的女伴叫李秀珍，是安西县上的干部，原天津来的支边青年，年龄刚二十出头。据说她是生活作风上出了点毛病，她自己当然不说，我们也不好问。她没有住我们的宿舍，但仍一起劳动过，我觉得她拿起铁锹干活很利索。她带了个歌本，休息时，照着歌本，我们曾一起学了几个歌子，如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还有《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等等。

第三个女伴叫王桂芳，是安西县的原小学教员，最年轻，只有18岁。她年纪最轻，却已被判过20年的徒刑，因为她拼命上告，后来刑事处分被撤销。她是从监狱里来到农场的女右派，自然也是取消了工资。她是安西当地人。虽然她年纪最轻，由于已经尝过了囹圄之苦，对于如今来到农场劳动觉得已十分不易，她的嘴很紧，不说自己为什么定了右派，在监狱里受的苦也绝口不提，为什么原先被判处20年徒刑，后来又被撤销，这些我们都在关注的事，她都闭住了嘴。

有一次，提起普选，她说："单位上公布选民名单，没有我的名字，我跑去问，'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你们为什么要剥夺我的选举权？'领导上说，'你还不到18周岁，怎么有选举权？你没资格。'我说：'我不到18周岁，为什么要定我的右派？当右派我就有资格了吗？'问得领导没话说。"这是她情绪激动时，冒出来的几句话。她还真是个小右派。又过了些天，有个安西口音的小伙子来看她，一问，原来正是她丈夫赵振荣。她小小年纪已经结婚，而且也是夫妇俩都定了右派，她丈夫早就在十工农场劳动了。幸运的是他们没孩子，他们俩原来都是小学教员，为什么他们夫妇俩都定了右派，她仍然一点也不透露。她，个子略矮，圆圆的大脸，两个小辫窝在耳后，模样憨憨的，可她心中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很难知道。她紧紧地封闭了自己，也许正是动荡莫测的政治风云教育了她。政治，像个胸怀叵测的妖妇，说变脸就变脸，她不到18岁就受到人生旅程中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而后又坠入更为可怕的生命的低谷，开始了监牢的苦难历程，而且有20年长长的年头在等待她。经过拼死的奋争，她总算又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在农场，她亲爱的丈夫就在身边不远处，她慎之又慎，是为了保持住目前还算是比较安宁的生活。千万千万，再不要出什么差错。

安西县还搞出了个反党集团，头子是县长徐廉身，山西人。此人是"三八"式老干部，他是举家搬迁到十工农场的，场里给了他一间住房。他们的反党集团成员，就近全分到十工农场改造，有些人被分到其他大队。徐廉身全家留在场部也有照顾的意思，场部在生活上到底方便一些。我和徐廉身在一起劳动过，他具有老干部的风度，劳动上尽力而为，语言谨慎，让别人无法再找他的岔子。

有一天，新华书店的营业员坐着农场的卡车带了一批书来农场销售。小营业员卸下书后，对正在路边的杜绍宇说："去叫两个右派来，叫他们把这些书搬到那边的种子库里，我要在那里卖书！"在十工农场，张口右派、闭口右派的情况已少见了，谁也不习惯听到这种称呼，杜绍宇当时就火了，质问："你是干啥的？"小营业员开始口气还很硬，说："我是来卖书的！"杜绍宇反唇相讥，毫不退让："你才是个卖书的嘛，你如果是个再干啥的，还得有个给你提皮包的。"杜绍宇还指着周围的人说："我们都是右派，我也是右派，你看，你能支使谁去给你搬书，你就支使！"小营业员左看右看，从神态上确实看不出哪一个可以由他支使，只好自己去搬书了。当时站在路边围观的众右派对杜绍宇数落小营业员内心十分赞赏，看到小营业员终于狼狈地自己去搬书非常得意。但是，敢于像杜绍宇那样拾掇营业员的极少。杜绍宇是瞅准机会，把当了右派在报社受到的窝囊气，发泄到了小营业员身上，还让小营业员没有回嘴的余地。当然当时此等事也只有在十工农场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才会出现。高仲君见此情景，曾问原县长徐廉身："你敢不敢这么说？"原县长徐廉身连声说："那我不敢，不敢！"此话正应了寻常百姓说的："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小营业员对原县长徐廉身当然是认识的，他说话出了格，小营业员一定会反映到县上，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以徐廉身为首的反党集团到1961年经甄别就已平反。

当然，杜绍宇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宿舍，说队里开了他的批斗会。那时，我和小徐已到了畜牧组。来农场后，他曾告诉我，景超曾一再叮嘱，要他记日记，说这些日记会很有意义。我很理解，景超依然做着他的作家梦，他希望今后情况好转后，从难友的日记里多了解些各自的情况，积累生活素材。我来农场后一直断断续续地记着日记，也是景超的要求。杜绍宇因扯出黑社，内心有愧，对景超的话便也依从了，来农场后也记日记。在批斗杜绍宇的会上，有的右派竟尖锐地指出："杜绍宇来农场以后天天记日记，你记日记想干什么？是不是要给台湾的蒋介石送情报？"当时，社会舆论对右派分子的定性不断加码子，已认定是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在国内的代理人，敏感的右派提出这样的指责也不无道理。当队长的其实绝无此心计，也想不到那些地方去。我的右派朋友们如果要互相整起来，招数还是不少。杜绍宇告诉我这件事，不过是表示，今后他不能记日记了。但我的日记仍照记不误。此时，我觉得和大家相处都不错，我还另记了养鸡兔的工作日记呢，有谁会出头来整我？

到初冬时，公社还迎来了一批上海移民。

那是个上午，阳光和煦。我正在饲养室里喂兔子。我喂养的兔子有青紫兰、安哥拉等洋品种。按照科学的方法，兔子都应在竹片做成的笼子里喂养。但这些笼子都是购买兔子时从火车上运来装载兔子的，每个笼子里原来装的兔子就很拥挤，经过几个月的繁殖，原有的笼子早就装不下全部的兔子了，又无法添置新的笼子。有些兔子无

处安置，便在用矮墙隔成的一两平方米的小屋里地上打了洞，跑出跑进，过起了自由自在的日子。还有些兔子仍关在笼子里，分笼喂养，按时喂吃喂喝，我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笼养的兔子身上。

兔子可爱善良，母性极强。母兔在生小兔子前，自己不吃不喝，疯了似的用嘴拼命拔肚子上的毛，直到肚皮上成了光光的一片，拔下毛来是为了温暖它才生下的小宝宝，保住它的小宝宝出生后不致冻坏。如发现有母兔生仔，为了使它顺利生育，我一般也不去打扰。早上去上班，我都要逐笼先把兔子看一遍，此时，就会发现有的母兔已生育完毕，正安详幸福地蹲在笼子里，五六个无毛的红扑扑的小兔紧闭双眼依偎在母兔怀里，它们小声地吱吱叫着，一边吃奶，一边转动着胖乎乎的小小的身子，间或还互相换一下奶头，再继续吃。吃饱了，它们便会挺着圆鼓鼓的肚子酣然睡去，其憨态可爱至极。母兔只是静静注视着我，它认识我，知道我不会伤害它们母子。有时，也会有一两只小兔离开妈妈爬到一边去，它们的眼睛还没睁开哪，有的冻得冰冷，有的会因此而冻僵冻死。我曾把冻僵的两寸左右长，肉囊囊软乎乎的小兔捏在手心，两只手合拢来焐它，或一只手捏着它靠在脸蛋上焐，直到焐得小身子暖和过来动了起来，再放回母兔的怀里，让它立即噙住一个奶头。刚生育过的母兔，要立即加饲料加水。它会大口饮水，当时给兔子喂食用一种陶制的粗笨钵头，它直上直下，略大于饭碗，放在笼里地上都不易弄翻。刚生育过的母兔会一口气喝完大半钵头的水。

这天上午，我发现一只灰色的大母兔从笼中跑出，笼子附近有两只才生下的小兔，个头特大，体长近三寸，胖乎乎的，都已冻死了，其余的小兔踪影全无。母兔分娩一次，起码生五六只。这只母兔在分娩前（或分娩后）从笼中跑出，小兔已全部死亡无疑，我心里很不安，也很难受。小兔的毛色和母兔一样，如果活下来一定非常好看，十分可爱，但它们竟一只不剩，全死了。小兔的死亡，我也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我头天注意到母兔的异常情况，把笼门特意关得紧一些，使它无法跑出，小兔便不至于冻死，肯定它们现在会全部都趴在母兔的怀里吃奶呢。当然，在我下班前它或许还未出现任何异常，这也是可能的。那些天，小徐在办公室搞其他工作，没有整天和我在一起。

我们喂养鸡兔已经半年了，当初选定我和小徐饲养鸡兔，领导上是考虑了我们劳动上的表现，也有照顾我们让搞些轻工作的意思。我们尽心尽力，只想把鸡兔饲养好，记得饲养室才修好，还没安上门时，兽医张果突然从外地买来一批鸡兔就放进了饲养室。怕夜里出事，我和小徐就在饲养室的过道里铺了地铺，守护鸡兔，工人们都未必会这么操心。但安西天气寒冷，日夜温差大，无防寒设备，防疫措施跟不上，饲料又差，一次次地买进的鸡兔，无法制止其死亡。特别是鸡，不仅从兰州买来才孵化的小鸡大批死亡，就是后来购进的莱亨鸡成鸡，在入冬后也不断死亡。兔子如何繁殖

发展，眼看也无条件，自己打洞，从洞穴里自由出进的兔子，因为乱交配，小兔暂时虽无冻死之虞，其经济价值已谈不上了。

领导上对我和小徐虽无责备，我们心里都觉不安，我们考虑的是饲养鸡兔做不出成绩，将来怎么摘帽子。说到底，我们来农场劳动是为了摘掉那可恨的右派帽子，工作做不出成绩，右派帽子摘不掉可怎么办？入冬以来，这已成为我们时常考虑，无法解脱的一种思想负担了。

一窝长得特别大毛色特好看的小兔全部死亡，在我心头又罩上了一团阴影。以现有的设备来说，这是今后也难以防止出现的，我该怎么办？长此下去，我觉得前景不妙，我该怎样向领导上说明一切？

正在忐忑不安、心神不定的时候，席组长突然走进饲养室，告诉我：农场来了一批上海移民，让我结束一下工作，到场部和有些人集合后去欢迎。

“一大二公”的疏勒公社张开热情的臂膀欢迎从迢迢数千公里之外而来的上海移民，这是一种伟大的壮举。成立公社之前，农场就曾接纳了数百名右派分子，那些落魄的右派分子在这儿的表现可嘉之至，他们是劳动中的一支生力军。毛泽东给公社定的性质是“一大二公”，接纳上海移民便更是义不容辞。大上海的居民不远数千公里之遥，来到戈壁深处的疏勒公社安家落户，开垦边疆，这也是在“人民公社万岁”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事物。当时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为了显示甘肃大跃进的形势好于其他省，人民公社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人手，竟然张口向上海要人。要把河西走廊建设成为全省的粮棉基地的宣传声势浩大，《人民日报》都用整版的篇幅发了照片予以报道。这样，柯庆施便慷慨大度地来了一次非同寻常的移民行动。

疏勒公社的领导对上海移民来到之后会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欢迎他们的到来必须是热情而坚定的。于是，组织了欢迎的队伍。我们坐了一辆大卡车，在曾芳煜的指挥下，鼓擂得山响——他本人就是擂鼓的，锣声喤喤，夹钹嚓嚓，红红火火热闹非凡地向鱼贯而来缓缓行驶坐满了上海移民的数辆解放牌大卡车表示了疏勒公社最诚挚最热烈的欢迎。我们是坐着大卡车一直行驶到场部西边的公路上去迎接的。返回来时，沿途到达公社的居住区，乘坐上海移民的大卡车便会停下一二辆，车上的上海人纷纷下车。我们便会奔到车前，扶老弱妇幼下车，和他们热情握手，连连道辛苦。队上来欢迎的人还帮他们搬下携带的行李及少量的用具。这样，他们便在疏勒公社有了一个新家。

这些上海移民从外表上看不是太富裕，但穿着打扮比农场的干部工人及我等就要时髦漂亮得多。当然，他们都保持了大城市里人们整洁的外观。好些人都穿着蓝卡其布的“棉猴”，这种带棉帽的棉大衣当时风行一时，来到戈壁深处的这里穿上一件很实用，也很好看。从风度外貌及衣着看，这些上海移民似乎各色人等都有，知识分

子、小市民、普通劳动者、中小学生、家庭妇女等等，都有，男女老幼，身强力壮，病残体弱者，也都有，他们大部分是举家而来，也有些是形单影只孤身一人前来的。

上海人被热烈欢迎的场面所感动。

在这些上海移民面前，当热情欢迎他们的时候，我自惭形秽：鼻梁上的一副近视眼镜，说明我不是农场工人，不是农场工人而又具有一副劳动者的外观，只能透露出我有着不光彩的政治身份。为了抵挡风沙寒冷围上去的深蓝方头巾，使我很像个农妇，我的棉袄上套的深蓝平布罩衣很不洁净，上面有不少掉落的面汤结成的白色干渍，卡其布的裤子腿面上已补了两大块对称的大补丁，屁股上也补了一大块。劳动真费，我的两条裤子都补上了大补丁，没有补补丁的，已是我的礼服了，只有在休假或外出时才穿一下。今天因为在上工时临时通知欢迎上海移民，换一下衣服都来不及，我便只能以这般的尊容充当了迎接移民的使者角色。我不知那些上海移民会怎样看待我，他们一定会有多种猜测的吧！

把大部分上海移民迎接到场部，我们就完成了任务。这天食堂的伙食也有改善，算是对上海移民的热情接待。

当然，他们不是如我等之类的人，一般头上都没有“帽子”。在以后的几天内，上海移民都在家休息。有时，大家就聚在房前的空地上，表演些小节目，也是联欢的意思，有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很大方，先唱了周璇在《马路天使》里唱过的《四季歌》，一个40多岁穿中式棉衣的中年男人拉二胡给她伴奏，女孩子不擅长唱歌，嗓子不行，唱的也是老掉了牙的老歌，但她很不在乎地唱了起来。一曲唱罢，大家都鼓掌，那中年男人鼓励她再唱，她便又唱了一两首歌，都不是什么新歌。那年夏天，农场演了新电影：《柳堡的故事》，电影的插曲《九九艳阳天》在全农场都唱遍了，凡是会唱歌的人，几乎是没有不会唱这支歌的，看来她在上海并没学会唱这首歌，但，他们俩一拉一唱，兴致极好，使大家都感到愉快。不幸的是，这女孩子腿有残疾，一条长，一条短，她穿的黑色高鞠皮鞋是特制的，一只鞋底特别厚，就这样，走起路来还有点跛。女孩子是孤身一人来农场的，那拉胡琴的中年男人，跟她只是一路上才相识的。为什么她会来到了这里？后来，我又结识了更多的上海女孩，才知道，唱歌的女孩姓许，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四年级，学有专长，很快就要大学毕业，只是因为她有一个在监狱里服刑的做过工贼的母亲，她接到通知辍学后就随大批移民来到了这里。她原来已有了男友，来安西之前，男友也跟她吹了。也许，农场热烈欢迎的场面改变了她凄凉孤独的心境？也许，她只是在唱歌中排遣她无法解脱的愁闷烦恼？也许，她对明天还存有渺茫幼稚的向往……她同20世纪50年代的普通中国青年一样，此时还料想不到今后会发生的许多事。未来将会是一个怎样凄迷的梦，天真的她空有迷茫。

我们的隔壁住了一户三口之家的上海移民。两夫妇都是近40岁的中年人了，原来

都在上海的中学当教师，还都是教语文的，有个10岁的独子。他俩都是北京人，已在上海定居多年。同我们说话时，他们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上海人说起话来，又是满嘴的上海腔，“阿拉”之声不绝于耳。他们文质彬彬，从不叫苦，也从来不说自己为什么随着移民大军来到了这里，我们也不好问。我后来熟识的上海移民也没人说起过他们的政治情况。不久，他们就双双下地劳动了，那时，地里只有平田整地的活，对于大半生生活在大城市，啃惯了书本，靠教书维持生计的中年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平田整地之苦之重，是很难消受很难支撑的，但他们情绪尚好，那位女教师收工回来，虽然满头满脸满身厚厚的土，变得面目全非，也还是笑呵呵的。20世纪50年代，兰州出现了一批上海迁兰的企业，如：信大祥绸布店、红花女子服装店、王荣康服装店、泰昌百货公司、佛慈制药厂、美高皮鞋厂等等，这些企业以优质的服务，高超的工艺，赢得了兰州人的赞誉。上海人越来越多地在兰州站稳了脚跟。兰州人戏谑地把上海人称做“上海鸭子”，或简称“鸭子”，因为上海人最喜欢水，不仅洗脸、洗头、洗脚、洗澡比西北人多，还特爱洗衣服，女同志常在洗衣盆里搓洗个不停，哪怕是深更半夜，都要把当天换下的衣服洗完。在这里，上海人喜欢洗浴的习惯已无法维持，他们自己无法烧水，房间里没有火，从食堂打来的开水十分有限。女教师回到家中，先在房门前拍打刷掉浑身上下的厚土，用干毛巾把头脸大概擦拭一下，再用热水蘸湿毛巾擦一把脸——上海人说是“打打脸”，就完成了全日的卫生大事。他们来这里似乎很匆忙，在大跃进的年代，用了大跃进的速度，准备很不足，就没有带来下地劳动该穿的衣着。也许，他们就不懂应该置备一些耐穿的衣着，不知道劳动多费衣服。女教师的蓝平布罩衣下面是漂亮的织锦缎棉袄，夫妇俩都当中学教师，只抚养一个孩子，他们原来过的是比较宽裕的日子。参加劳动不到一月，虽有罩衣的遮挡，女教师织锦缎棉袄的下摆及两边开叉处，便破得吊串串，裂开的丝织物成绺儿挂在了棉衣下面，真可惜了那么漂亮的衣服。但女教师很无所谓，她大概觉得已失却了的一切，比这织锦缎棉袄更重要更值价，值价得没法比。女教师眼里也有流露出忧虑的时候，此时，便是她为丈夫的身体担忧，劝丈夫休息一两天的时候。

原来，那位男教师患有肺结核，她怕丈夫会因劳累而一病不起。我们最初听说她丈夫患有肺结核都大吃一惊，农场如此的生活条件、伙食水平，还要参加劳动，怎么得了呵！我们也就一起帮她劝说，要他休息，但男教师倒很坦然，说他知道自己的病，在劳动中该怎么出力使劲，他能掌握，让大家不要担心。有时候，他也听大家的劝说，休息一两天。后来，男教师出工渐次少了，常常是女教师一人出工。安西冬日的太阳很暖和，中午男教师常坐在屋前晒太阳，这对他就是一种重要的治疗，场部的医务所药物甚少，哪能有充足的药物给他。再说，他们的伙食虽有保证，都在食堂吃饭，食堂冬季的蔬菜只有胡萝卜、洋芋，在非节假日平时无油也无肉，对于一个肺结

核病人，这样的伙食水平实在太差了。他的头上似乎并无什么沉重的帽子，事实上又无劳动能力，为什么要作为移民来到这里？女教师和他的奉献应该是在中学的教室里。

我结识的另一户上海移民，女主人名叫黄玉华，是个小学教师。她，人瘦瘦小小，身体单薄却是带着5个孩子来的，最大的女儿也只有十五六岁。她说，她的丈夫姓蓝，是个右派分子，到安徽芜湖劳改去了，她只得带领孩子们到这儿来。她说的“劳改”，我的理解是判了刑，右派分子只要不触犯刑律，一般都不判刑，她丈夫为什么被判了刑？但我也不好深问。凭一个小学教员的工资收入，她是无法把5个孩子都养活住的，来到“一大二公”的疏勒公社，各方面的条件虽艰苦，全家人的吃饭问题总算解决了，开饭时全家人拿着饭碗进食堂就行了。而且，黄老师还干本行，继续在农场小学教书。领导上对她全家的困难照顾得相当不错。后来，公社向上海移民发放冬季补助，让大家添置棉衣和铺盖，上海人的被子又薄又小，让西北人看来就不是被子，在这儿根本过不了冬，黄老师全家理所当然地领到了补助费，添置了棉衣被子。记得当时她全家就住在小学的空教室里。大批上海移民的到来，使农场的住宿条件骤然紧张，住小学的空教室也是一种应急的措施。

我还遇到一位五六十岁的移民大妈，她穿一身黑衣黑裤，显得十分整洁利落。她也是孤身一人来到疏勒公社的。我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说，她丈夫因为是历史反革命判了10年刑，刑期还没满。街道上的居民委员会动员她来这里时曾表示，如果她和丈夫离婚，就可以不走，如果不离婚，就非走不可。她和丈夫感情甚好，不愿离婚，就迁移到了这里。这么大岁数一个人来到荒僻的戈壁深处，她的勇气真够可以的。但她已不是建设者的年纪了。疏勒公社有限的生产能力能够无偿地养活她吗？还有更多的其他人？

从以上几家人的情况，大体也可以估摸出这些上海移民的全貌，他们或本人或家庭在政治上都具有被认为是不干不净的因素，他们不是根正苗红的左派。上海市委决定把他们迁出上海，送到遥远的西北边陲，让新生的、无所不包的人民公社把他们接纳下来开发边疆，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把大上海建设成一个纯之又纯的先进城市，名扬全国。说真的，他们干的是一件清除城市“垃圾”的工作，是为了净化城市开展的工作。被有些人说成是最忠于毛泽东、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对开展这项工作，毫无疑问是首肯的，但这位好学生也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透。这项清除“垃圾”的工作最终彻底失败。3年后，大饥馑扫荡了全国，甘肃尤甚，据说当时在全国排名第二——为受“自然灾害”的严重省份。对于上海移民来说，竟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那时，他们已随原十工农场的全体职工迁场到了玉门县，农场改名为玉门黄花农场，疏勒公社已不复存在。上海移民在自己洒下汗水血泪播种收获了粮食的农场挨饿，他

们觉得已无法再忍受。于是，便开始有人卖光了所有能卖掉的需用的及不需用的衣物家什，凑够了去上海的火车票钱，便举家逃离农场。最早行动的人家，立即被全体移民认同是一种大智慧，是摆脱苦难的惟一最佳途径。于是，除少数人外，在短短的十数天内，上海移民迅速掀起了一次大逃亡的潮流，互相帮助，扶老携幼，历经千辛万苦，逃离农场。小学教员黄玉华也带着她的5个孩子逃离了农场。当他们先先后后回到上海后，已不是原先听了政府的动员报告便听话驯顺地举家动身去大西北的普通老百姓了，他们经受了的苦难，他们有过的血泪，使他们变得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既已回到了全家人曾经安居乐业的上海，在那里，他们的亲友依然过着一如既往的正常人的生活，他们为什么就不能？他们绝无反悔，绝不能再回到移民的噩梦里去了。对于这些在戈壁深处吃够了苦头的上海人，他们口袋里装着户口迁移证，上海的公安机关也无可奈何，况且，他们也是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关于抢救人命的决定，回到上海要求庇护来的啊！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以后，公安局最后又全部恢复了他们的户口。尽管已一贫如洗，这些移民仍欢天喜地地又开始了上海人的生活。

来农场的第一个冬季已经来临，严寒的步步威逼，使我们进一步知道了生存的艰难。

我和几个女伴的手指——特别是拇指和食指的弯曲处，都裂了深深的血口子，像是小孩的嘴，手背上是不计其数的小口子，疼痛非常。我有个竹壳的五磅暖水瓶，此时派上了大用场，晚上睡觉前，把暖水瓶里的开水倒出一点，大家都烫烫手，擦上厚厚的凡士林，让裂满口子的双手养息一夜，就是最好的治疗。

我和小徐在饲养室准备饲料，清洗鸡兔的食具，都要接触冷水，冰冷的饲养室不生火，干一阵活，大大小小的血口子就又裂开了，流着血的大口子一张一合，倒真像小孩红红的嘴唇，疼得我们不住地吸冷气，呻吟不已。小时候，我曾听说，农村里的人冬天用小男孩的尿洗手，洗了就手不裂口子且绵软光滑。以前我对此是真是假持怀疑态度，反正我的手很少裂口子，也不去多想它。记得在我上中学以前，兰州城里的普通人家冬季都是用蜂蜜搽手脸，早晨洗完脸后，用右手食指从用过的雪花膏瓶子里挖出一点蜂蜜放到左手心里，再用右手食指蘸一点洗脸水，两个手心相对摩擦一阵把蜂蜜和洗脸水调匀，然后搽到脸面和手上就行了。我们家里用甘油和凡士林搽脸，已是抗日战争胜利前了。那时，大家都认为甘油比凡士林更好，所以，我们家用甘油较多。而此时，我真恨不能搞到小男孩的尿，每天用尿洗手，只要手不裂口子就好。我还问家在农村的老殷："用小男孩的尿洗手，是不是手就不裂口子？"老殷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她抬起头，用她那双并不好看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我——她眼角的皱纹已明显地增多了，认真地回答说："那谁知道？反正我也没洗过。"老殷说话做事都挺认真，很少开玩笑，这也许是她多年做财会工作的职业习惯。

为了保护经常渗出鲜血的双手，我们实在也疼得受不了啦！后来，我和小徐只好放弃了对鸡兔食具的清洗工作，每天清理了鸡兔头天吃剩的饲料，用干抹布把食具擦拭一番，放进新饲料，全天放三四次，也就算了。这样，手裂口子的状况略有改善。严寒的威逼，此时自然也进一步威胁到鸡兔的生存，死亡增加了。我们忧心忡忡。

石天爱毕竟是搞医的，她后来发现小卖部有卖小卷橡皮膏的，每卷1毛多钱，就告诉我们去买，用来贴手上裂了的口子。石天爱是我们之中跑小卖部最勤的一个，因为她常去小卖部买8分钱一包的廉价香烟，别的什么倒是一概不买。数月前，她母亲从天津给她寄来的包裹里，除了有她称道不已的吉士林的牛肉肉松，有几件内衣内裤，还有用大红布手工制作的绵绵软软的卫生带，慈母的心真是把什么都想到了也做到了，她毋须再买什么了。她的经济能力也不允许她再买什么。石天爱曾慷慨地把肉松给我和小徐都送了一点，是用她吃饭的大调匙舀的，还特意给我多舀了一两勺。她对小徐有些小意见，多给我一些，是表示一种特别的友好。这种肉松对于我们经常不见荤腥的人来说，无异是天外来的美食佳肴，味道好极了。再说我和小徐听到小卖部有橡皮膏可买，便立即去买。我想到景超手一定也裂了，他们那里未必能买到橡皮膏，就多买了两卷。小卖部还有卖的深蓝色帆布手套，很结实，冬季戴上干活可以抵挡寒风的吹刮，少裂些口子，就买了两双。他们在冬季不会停止劳动，这是一定的。前些天，我还从小卖部给他买了一件雁塔布的白衬衣，价廉物美，只两元钱一件，正适合他现在穿。另外，我还买了些凡士林、针线之类，就这样零七碎八凑了个包裹，给他寄去了。在严寒来临之际，我能够为他做的只能是这些了。

我强制自己不去多想他。时日长了，便也逐渐习惯于不想他，想他，除了徒徒地增加许多悲戚无奈，徒徒地苦恼自己，又能怎样呢？在大跃进的年代，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如何在“改造”自己的问题上多下功夫，想得很实在，确实也在争分夺秒地表现自己，在劳动上狠下功夫，狠出力气，做出非凡的努力。天冷以后，记得有一次让大家突击翻整一块地，我也参加了。我已多日没干过拿铁锹的活了，便甩开膀子大干了起来，穿着棉衣的我，一会儿便大汗淋漓，解开了棉衣的全部纽扣。再看看周围的男士，有些也并不如我那样拼命。我拼命，是因为我承受着双重的苦难，我的和他的。我拼命，是为了争取早日改变目前的处境，好进一步帮他脱离苦海。然后，我们的俩孩子也才能得救，我们才能跟孩子们在一起。可怜的孩子，他们原应该跟别的孩子们一样，有一个无忧无虑欢快活泼的童年，但他们小小年纪长久地连父母的面也见不到，让孩子们也苦熬苦度岁月，这虽也是我尽量不去想的，却又时时刻在心上。我痴痴呆呆地，一心只想着改造，改造，拼命，拼命！真是到了可笑而痴迷的地步。而在当时，这一切就是如此真实，沉重酷烈的苦难使我别无其他选择。

用橡皮膏贴血口子，果然不错，特别是手指上的大口子，用橡皮膏缠上一圈，伤

口不接触风寒冷冻，很快就愈合了。如果再裂开，就再贴，减少了许多疼痛。

到10月下旬，我们的冬装就全部上身了。在来农场前，我拆洗了旧棉衣，把原来6两棉花的薄棉衣，絮得厚厚的。做缝纫工人的四表姐苏佩琳替我做了一条厚棉裤，用了3斤棉花。棉裤送来时，我惊讶不已，因为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厚的棉裤，更不用说穿了。但四表姐极肯定地说："你不要嫌厚，就要这么厚才不受冻。"现在我穿上了絮了3斤棉花的棉裤，手放在裤子上大腿部分，一把都捏不透，手指接触不到大腿上。穿上这么厚的棉裤，真是浑身都觉得暖和。俗话说："人暖腿，狗暖嘴"嘛。小徐和石天爱她们没有我这么厚的棉裤，在棉裤里又加穿了绒裤。此外，我们都有短大衣。单薄低劣的方头巾已不足以御寒，我买了两条儿童用小毛巾缝在一起，衬在方头巾里面围在头上，倒也解决了问题。

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我们冰窖似的宿舍里，既无火炉，又不烧炕，睡一夜，人的体温始终无法把被窝褥子暖热。我的厚厚的被子上盖着皮大衣，棉褥上还有一张狗皮褥子，怎奈这些皮的、棉的铺盖，都同室内温度保持一致，据说安西冬季的最低气温为零下30摄氏度左右，仅仅依仗我们三十六七摄氏度的体温，反差如此之大，又怎能把铺盖暖热呢？每夜，我都忍着彻骨的冰冷，打着冷战钻进被窝。进了被窝后，最难放置的是一双脚，伸展腿一直放下去吧，冰冷的脚还要吸收厚厚的铺盖里反射过来的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寒冷，真像受刑似的。两只脚就那么大，铺盖的体积大多了，反射过来的寒冷量相应就大得多，可怜的脚，它们怎能经受得住？这种冷冻的痛苦，很难忍受，我只是浅尝辄止，略伸出腿一试便立即收回作罢。为了缩小身体与零下几十摄氏度的铺盖的接触面，我经常采取的睡姿是用一只手抱住膝盖，两只脚尽量靠近屁股——是两只早就不脱厚棉线袜子的冰冷的脚，身体蜷曲如虾米状。就这样，还要在战栗中苦苦挣扎，上下牙齿磕打得咯咯响，在牙齿的磕打声中喘息呻吟，像是在忍受鞭子抽打的痛楚，好久好久，才能慢慢安静下来，通夜还只能保持这样的睡姿，一动也不动。因为动一下，就意味着大面积彻骨冰冷的再度袭击。刀割似的彻骨冷冻，令人再次呻吟战栗。睡觉真成了受罪。到天亮时，不仅浑身不觉得暖和，因为整夜一动不动，还全身这儿那儿的疼痛不止。初到农场时睡觉的香甜幸福，已远离我们而去！

痛苦的睡觉，睡觉的痛苦，这又是一种新的磨难，一种谁也未尝经历过的磨难。但，否极泰来，我们到底还是想出了对付的办法：干脆，和衣而卧，袜子当然也不脱。这样，白天穿在身上的棉衣棉裤本来就保持了一定的温度，它们阻隔了铺盖的寒冷，使不能直接传导到身体上，倒是使之发挥了防寒保暖的作用，我们才又暖暖和和地自在地睡上了囫囵觉。到天亮时，一觉醒来，下了炕，全身还热热和和的，只觉舒适非常，而无感冒之虞。谁会晓得，在安西酷寒的日子里应该如此睡觉，真是想也想不到啊！以前我下乡采访时，最穷苦的农民冬天也有热炕睡，没有热炕睡的农户就没

有，因为没有热炕就过不了冬。疏勒公社对此却未做任何安排。从此，在整个冬天，我们再也无法换洗衬衣衬裤。每个人身上长满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虱子。在痒痒得难受时，临睡前，我们只好解开衣襟，在昏黄的小煤油灯前捕杀一番。好笑的是石天爱，她觉得身上痒，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说长了虱子，让她解开衣襟，帮她找出虱子给她看，她大吃一惊，连声说："我的妈呀，衣服上怎么会长出虱子，这可怎么办呀！"原来，她和母亲从小在天津过着豪华富裕的生活，有佣人服侍，衣服、被单都每天换洗，她根本不知道衣服里还会长出虱子，也从未见过虱子。老殷对于我们外屋里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也不吭声。石天爱曾经有过的阔绰生活，她如同我们一样，连边也没沾过，大概也很看不上。她是个充分接受了共产党思想熏陶的历史反革命。记得夏天有个工人家属来我们宿舍闲聊，天很热，石天爱热情地问："要不要喝点凉白开？"工人家属不知所云，石天爱又接连问："你要不要喝点凉白开？"工人家属仍瞠目不知所以，便说："啥？你说的啥。"小徐听不下去了，有点急躁地接上说："你就说是冷开水不就行了嘛，人家就不知道什么是凉白开，你就不能改一下说法吗？"石天爱于是又再一次地问："你喝不喝冷开水？"究竟是石天爱故意拿腔拿调地为了表示她大城市里人的身份，才一口一声地把冷开水说成是凉白开呢，还是她不了解这里的普通人就不懂什么是"凉白开"？在这种场合，老殷虽不说什么，从她的眼神里透露出的是看不惯及无法说出的反感：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谁会和普通的劳动妇女这样说话呢？

在这个寒冬，灶上有些日子常有羊肉炖胡萝卜，每人一份，价廉物美，很解馋。后来才知道，这羊肉，是黄羊肉，是我的演出伙伴、说相声的徐保安，从荒原上狩猎打来的野物。徐保安是原武威步校教射击的军官，我们在演出活动中就得知，他几次在北京的全国射击比赛中都独占鳌头，后来还成为国际射击比赛的裁判。他戴一只瑞士劳莱士的手表，说这只表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挑选时就经受住了考验，他在拿表时没小心失手把表掉在了坚硬的水磨石地上，从地上拣起表来一看不仅没有一点外伤，秒钟的"噌噌"声仍不绝于耳，一切正常。这只表当是他在北京参加射击比赛时购得的。邹士杰是个极善于在我们这伙人中"调动积极因素"的领导，在演出活动中得知徐保安是个神枪手，当时就议论过让徐保安冬天打黄羊，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到了冬天，便立即付诸实践。徐保安也是个被开除了军籍的右派分子、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让阶级敌人掌握武器去打黄羊，从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及国内的政治形势来说，都是绝对不允许的。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从人民的行列中被排除在外的右派分子，是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把枪支交给他，按照既定的逻辑，他就会把枪口对准人民，射出仇恨的子弹。而徐保安例外地受到了信任。保卫部长也是个陕北人，把一支长枪发给了他，徐保安提出，在平坦广阔的旷野，黄羊奔跑很快，要坐在大卡车

上追赶射击，才能射中。场里立即配备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司机很年轻，对开车追杀黄羊特别来劲。这是一个初冬的中午，徐保安就坐在司机旁边，摇下车门上的玻璃，把枪口伸向窗外。保卫部长和三大队的统计高仲君坐在敞篷车上，跟随前往。来了，来了，前方出现三四只黄羊奋蹄飞奔，徐保安在奔驰的汽车上瞄准其中的一只扣动扳机，只听“叭”的一声，一只黄羊应声倒地。车上的三人都激动地大喊：“打中了，打中了!”徐保安只笑了笑，并不说什么。在他脑海里飞过的，还是在北京体育馆射击场上激动人心时刻的情景。在国内的射击比赛场上，他曾多次独占鳌头，站在飘荡的五星红旗下，在国歌声中心情无比激动地领奖。作为国际裁判，对苏联和东欧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运动员们作出裁决英俊潇洒的姿态，还浮现在他自己眼前。但，那些场面那些情景尽管还历历如在眼前，却都已过去了，永远不会再出现……现在，他射击的对象只是黄羊，而没有一个比赛对手。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他愿意多多地射杀黄羊，而当年一个驰骋国际射击赛场的裁判，一个多次在国内的射击场上独占鳌头的名射手，如今只能把黄羊作为靶子来射杀，又是怎样的悲哀，——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猎手罢了，他的心头掠过阵阵酸楚，笑容很快就褪去了。年轻司机在胜利的欢呼中脚踩油门把车飞速开向黄羊倒地的地方。车刚停住，高仲君和保卫部长就跳下车去，两人抬起流血的黄羊扔进车厢。然后，开着汽车继续寻找黄羊的踪迹，再追杀。大半天，他们先后共猎获7只黄羊。

7只黄羊都送到了伙房。炊事员们在剥皮开剖黄羊的时候，高仲君走进去细看，不禁为徐保安高超的枪法惊叹不已：射中7只黄羊的子弹，个个都是从肩胛骨穿进，射中心脏，每只黄羊都如此毙命，无一例外。徐保安弹无虚发，真是每一颗子弹都射中了一只黄羊，并使其立即毙命。炊事员们一面剥皮开剖黄羊，也因为发现了徐保安高超的枪法而赞叹不已：“人才啊，人才，好人才！到哪里找这样的人才去哩!”

原共产党员徐保安的右派言论，据说主要是只强调自己的勤学苦练，不承认党的培养教育，从而构成了反党，他常说：“培训班100多人，都是党培养教育的，为啥就我一人拔了尖，到北京比赛还是我得的第一名，别人咋上不去？不就是因为我勤学苦练，比别人下的功夫深、功夫大!”他把党的培养教育，只放到了次要的地位。这绝对不行。40年后，在本书定稿之际，高仲君还评论说：“徐保安不仅是勤学苦练，他还是有相当天分的人，多次在全国射击比赛中得第一名，没有天分，仅仅靠勤学苦练也达不到。”再则，鸣放前夕，他正好回到河南老家探亲，看到家乡人民因为统购过头缺粮吃，回到部队上就向领导作了反映。到鸣放时，就大胆说：“家里人饿得嗷嗷叫!”这两条，就使他落到了目前的处境。

8 红火的演出与演出的夭折

元旦时，全场又有过一次文艺会演。会演前，在全国风行一时、以东北民歌为基调的小演唱《小拜年》的脚本传到了十工农场。曾芳煜他们看到后非常高兴，立即紧张排练，在元旦演出。曾芳煜演上丈母娘家拜年的姑爷，小徐演女儿，我则演丈母娘。另有10多个伴唱的群众演员，班底很硬。我哪知道演唱中的老太婆是怎么扮演的？好在曾芳煜、李佐亭他们设计了一些动作，还教给我农村老太婆走路的姿势，等等。到演出时，也就胜任了角色，我唱着："丈母娘呀迎出门儿呵，哎哟哟哟哟哟哎哟哟！"在群众演员的伴唱声中走出时，立即引起台下观众的哄堂大笑。他们怎么能不笑呢，平时大家极熟悉的年轻的我，突然自称"丈母娘"，着农村老太婆的黑衣黑裤，脸上有了皱纹，腰腿不很灵便地出现在台上，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如果自己是观众，我也会大笑不止的。这个小演唱很热闹，气氛很活泼，在元旦演出这个节目真是太妙了。

此外，我们还排了个俄罗斯舞，除了我和小徐，还吸收了四五个上海移民中的女孩，阵容就够大的了，乐曲选用优美动听的俄罗斯民歌，这比起我和小徐在"七一"演出的双人舞，就更上一层楼了。整个舞蹈场面花哨好看热烈动人，我为演出队伍增加了生力军而感到高兴。

但，引起观众强烈反响的还是小演唱《小拜年》，我卸妆后走到观众中，迎来的是人们惊喜的目光和赞扬声，靳清义特意走到我面前笑着说："小和真行，风度真好！"我为自己首次饰演老太婆获得成功而高兴！

有意思的是，元旦后，公社还组织我们到县上又进行了一次演出活动。县上刚结束了征兵工作，有一批新兵刚刚入伍，这台晚会是为欢迎新兵特意举办的。

演出的主要剧目，有话剧《妇女代表》，主角妇女代表由机耕队的工作人员韩淑

霞扮演，我演思想守旧、不许媳妇参加社会活动的婆婆，石天爱也同台演出，演多嘴多舌、挑拨婆媳关系的邻居老奶奶。这位老奶奶到邻居家串门，坐在炕头，还拿着有把的旱烟锅子抽旱烟，倒正是石天爱该演的角色。思想进步的农村姑娘翠兰，由上海移民陆明华扮演。说山东快书的李佐亭既当导演又演儿子。

石天爱演戏很认真，还给我说戏。帮助我深入角色。原来，她母亲作为老艺人几年前就在天津演出过评剧《妇女代表》中的婆婆，她看过母亲的排练及演出，对我这个角色早就熟悉。

因为是欢迎新兵的晚会，曾芳煜还赶着编了个送子参军的短眉户剧，曾芳煜本人扮演儿子，母亲和儿媳，经李佐亭建议，我演儿媳，韩淑霞演母亲。话剧中的老少角色，在此剧中作了调换。李佐亭有丰富的演出经验，此举大概是为了引发观众的新奇感。

此外，小节目中，有曾芳煜的独唱《真是乐死人》——这是歌唱一个新兵在欢迎的晚会上抒发自己参军的欢乐心情的，已不是新歌，但在安西县肯定还没人独唱过，与晚会欢迎新兵的主题正切合，选它作为重头节目，非常正确。男声小演唱有：《大实话》、《公社姑娘》。《公社姑娘》的原歌词大意是说，在我们工厂有个好姑娘，她不爱工厂的伙伴，爱上了一位战斗在边疆的战士。为了适应公社化的新形势，演员们把“在我们工厂”改为“在我们公社”，整个小演唱幽默风趣，歌颂了公社姑娘对战斗在边疆的战士的热烈爱情，同晚会的主题也很吻合。

在男声小演唱中，又新添了一位从四大队来的小伙子，名叫韩书谦。他是个业余爱好者，声音浑厚宽阔，唱男中音。同时，他还独唱了新疆民歌：《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他是原古浪县银行的干部，高高的个子，戴一顶很考究很时髦的驼色卷毛皮帽，圆脸，有点络腮胡子，颇有风度，脚上的高靿皮靴，使他走路时显得特别精神，脸上常露着和善的笑容。他初次亮相，便成为演出队不可或缺的成员。

在这次排练过程中，我和韩淑霞发生了些小矛盾。韩淑霞是机耕队队长孟某的妻子，人长得漂漂亮亮、苗苗条条的，短发的样式修剪得很时髦，河南灵宝人。大概是由于丈夫在十工农场或是到十工农场谋职的原因，她才来到了这里。十工农场无一女干部，她究竟是干部呢，还是后来所说的以工代干呢？反正在场部显得颇有些显眼突出。我作为女右派得罪了她，这就不得了了，以至由场部秘书姚瑯主持，对我开了个批判会。我估计韩淑霞可能摆出姿态，不批判我，她就拒绝演出。全体演出人员都参加了会，火力也够猛的，曾芳煜、李佐亭的发言都咄咄逼人，说凭我这个态度还如何进行改造，如何摘帽子，云云。我镇静自若，没有说出过分的无地自容的所谓检讨，主要听大家开火。因为我心中有数，我和韩淑霞发生的小矛盾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的倨傲发火，不过是凭她女干部或女工人的身份，

自认为高人一头，嫌我在她面前谦卑得不够，不像有些男右派那样，有意地恭维巴结她，奉承话说个没完。她在会下得不到的，在会上仍然得不到。我料定凭她韩淑霞的本事，除了可以撺掇别人开这么个批判会，也不能将我怎样。最后，姚瑯做总结时说话还是公允的。他说，我和韩淑霞发生的纠纷，开会解决一下是对的，有利于节目的继续排练，但这牵涉不到改造态度的问题，更不影响摘帽子。我心里就更平静了。我庆幸自己总算来到了一个还算尊重我们的农场。

这次演出，又是一次轰动。

演出结束后，部队领导还邀请我们全体演员座谈。其实，就是准备了些糖果瓜子花生之类请我们大嚼，部队领导简单说了些对演出的赞扬肯定表示感谢的话，我们无一人发言，作为阶级敌人的身份，使我们无法说话。能遇到这样可以大嚼糖果花生瓜子之类的机会很不易，他们热情地把这些食品堆在每个人的面前请大家吃，我们就不停地吃。为了助兴，不知经谁的建议，还让我和曾芳煜清唱了《小拜年》，此时，我尚未卸装，还是年轻媳妇的扮相，却又唱起了丈母娘的唱词，很有意思。曾芳煜又重唱了一次《真是乐死人》。这两个助兴演出，又都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夜深了，我们才坐车返回农场。

这次演出，郑文义无法再表演小提琴独奏了，他那有着轰动效应的表演永远地在安西消失了，原因是数月前他逃跑了一次，回到了西安的家中，回来时没把小提琴带来。当时，农场立即派三大队的赵队长追到他西安的家中，用手铐将其抓回。十工农场用手铐抓人，这是我听说惟一的一次，我是听赵队长的老婆私下悄悄说的。也许，这是因为农场变成了疏勒公社后，政社合一的缘故。郑文义抓回来后，我见到时已是在批判会上了。这次批判会，参加的以演出人员为主，总共有20多人吧，发言的人事先大约有布置，曾芳煜头一个发言，侃侃而谈，说郑文义过去为蒋介石效劳，到现在还与人民为敌，不老老实实改造，心怀叵测，不知要干什么，并大声喝问："你老实交代，你偷偷跑回家，是要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你的反动本性为什么就得不到改造？"发言的也就三五个人吧，别人的火力还不及曾芳煜猛烈。会前没有人对我有过安排，我乐得一言不发，心里还暗自为郑文义庆幸，逃跑可不是等闲的小事，迎接他的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批判会，场部无一人参加，邹士杰、姚瑯这些常和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未露面，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领导上并不想让郑文义太难堪，是事不得已，走走过场罢了。此事如果发生在兰州的任何一个单位，都不可能就此罢休，可他为什么要逃跑呢？

记得头年7月我们第一次进县城演出前，邹士杰曾动员大家修理"门面"，让男士们刮胡子、理发，穿上整洁漂亮的服装。郑文义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换去了补过大补丁的长裤，他的黑发有些稀疏卷曲，留得较长，有些耷拉在额前，显得不同于别

人。邹士杰一见，就开玩笑地说："啊呀，老郑这不是很漂亮，很有风度嘛！"曾几何时，他又成了出现在批判会上的逃跑人员。郑文义的检查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也过关了，批判只是"草草收兵"。郑文义从西安家里被抓回来后少了一样东西，就是他心爱的意大利造小提琴。多了一样东西，是入冬后他常披在身上的崭新蓝卡其棉猴。这棉猴显然是他妻子的，因为尺寸较小，他根本无法穿。大概是妻子在分别时无以安慰他，就以自己新做的棉猴来温暖丈夫受苦的心。在凄迷坎坷的人生旅程中，他们相伴已多年了。所以从西安家中抓回来的郑文义，再也无法表演小提琴独奏了，普通的小提琴，显示不出他高超的演奏技艺，安西人和农场的我们，从此再也听不到那悠扬动听令人心醉神迷的琴声了。多年后我才悟到，郑文义那次逃跑回家，其主要目的恐怕就是为了把小提琴送到家里保护起来，这把小提琴就是他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一旦失去或遭到破坏，他的音乐生命也就完结了。有一次，在演出间隙，郑文义不无担心地说："安西气候这么干燥，我担心小提琴会裂口子。"我当时听了也没当做一回事。仔细回想起来，安西作为大陆性气候，就是常年无雨。我在安西两三年，只遇到一两次下雨。他的小提琴如果不带回西安，最终肯定要完蛋。他甘冒逃跑的政治风险把小提琴带回西安家中，是绝对地做对了。但这些理由在批斗会上是无法说的。

本书初版之后，有读者李耀斌打电话问我："书中的郑文义是不是广东人？"我说："是，是广东人。"李耀斌说："如果是广东人，他就是当年我上西安师范时的音乐教师，他还教我弹过钢琴呢！"接着，他介绍说，当时郑文义是西北民主青年社的成员，积极参与组织了"先声乐团"，在西安市多次演出革命进步歌曲，有一次演出被国民党特务打砸破坏。到1947年冬，他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从此便与郑文义老师失去了联系。说实在的，本书初版时，我的书中虽记述了郑文义，当时郑文义是否还健在以及其他种种情况，我一概不知，我只知道1959年迁移时郑文义没去四工农场，他不是右派。他在年轻时期的革命进步活动，我是第一次听李耀斌说起。转眼四五年过去了，本书有了再版的机会，我想，再版时，我应把郑文义当年的革命进步活动补充进来，还郑文义以原来真实的面目。

电话打过去，李耀斌说，郑文义还健在，现在西安。他于2003年还给郑老师写过信。他再一次强调，民主青年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群众组织，朱镕基、彭珮云早年都是其成员，郑老师当年参加"民青"，他就是介绍人，属单线联系。现在政策规定，凡当年参加"民青"进行了革命活动的，从参加"民青"之日起，就是参加了革命。过了两天，细心的他还把他写给老师的信的底稿，以及郑文一对于参加西北民主青年社写给领导的报告的复印件寄给了我。我这才知道，原来我把"郑文一"错写为"郑文义"了。在李耀斌写给老师的信里，他动情地写道："我们分别已半个多

世纪了，在这漫长的离别岁月里，当我听到《离歌》、《国际歌》、《黄河大合唱》等歌声时，你的形象就闪现在我眼前，久久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他还写道：“当你教我们演唱《国际歌》（四部合声，我唱三部）时，我从歌声中了解到你是一位热爱民主、思想进步的老师，1946年下半年，经“民青”组织研究同意发展你加入“民青”成为“民青”成员，由我通知了你。”在1946年的国统区，作为音乐教师的郑文一组织学生教唱《国际歌》进行演出，这需要怎样的革命激情和大无畏的精神，他挺身而出，积极参与，无怨无悔！在批判他逃跑的会上，曾芳煜说他：“过去为蒋介石效劳，到现在还与人民为敌，心怀叵测”等等，这大概同装进他的档案袋里的“材料”有些关系。这与郑文一当年的革命活动对比之下，真正是颠倒了黑白，在那个年代，革命者会变戏法似的被转换成为“为蒋介石效劳”。这或许同“政治”的需要有关，也或许同某个领导的好恶有关，也或许同某种人事纠葛有关，这样，郑文一就被发落到农场劳动改造，被剥夺了他为音乐献身的权利和机会。这是多么残酷的剥夺！一个当年享誉西北五省（区）的大音乐家、解放前在国统区组织革命的歌咏演出受到迫害的人，竟然被剥夺了为音乐献身的权利和机会。郑文一，广东陆丰县人，1918年生，早年毕业于广州音乐学院，抗日战争开始后，才辗转来到西安。

我收到李耀斌寄来的材料后，立即和远在西安的郑文一通了电话，他已进入耄耋之年，听说我是和他曾在十工农场劳动并一起演出过的难友，情绪很是激动，说他和原来在农场一起的难友多年来已没有联系，说他流浪了二十多年，老伴怕他影响孩子和他离了婚，孩子们都改了姓，很少上他的门，他多年来没个工作，现在总算安定了下来，近年才又找了个老伴。这个电话，让我欣慰。欣慰的是经过落实政策，他总算安定了下来，重新建立了家庭。更使我感到很是辛酸，一位半个世纪前就享誉西北五省（区）的大音乐家，解放前组织学生进行革命的歌咏演出受到迫害的人，又再次蒙受不白之冤，不仅被残酷地剥夺为音乐献身的权利，流浪二十多年，而且遭到了妻离子散的家庭悲剧。漫长的凄苦岁月，郑文一虽不是右派，他失掉的太多太多，已进入耄耋之年的他，还会有什么作为吗？他没提到，我想也只能如此，过个平安的晚年罢了。

放下电话，我立即写了封长信，并将《经历》寄他。《经历》对他虽无贬损，但只是以我当时受限的视角描述了他，对他作为革命者的革命活动不可能提及，现今略作补充，也多多少少消解一下我心中的愧疚。

再说元旦会演，四大队演出的眉户剧《雌雄花》，表现了推行玉米杂交新技术过程中，农村两代人之间新旧思想的冲突，中间还穿插了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情节。这个剧目很受场部领导的赏识，四大队排这个节目也是花了大气力。只是大家认为扮演女主角的工人家属虽嗓子亮，表情太呆板，未能演出人物的内心活动。此时，农场还

准备参加春节后张掖地区的文艺会演，经有关人员交换了意见，决定由我换下工人家属，演女主角，并加强了导演和乐队。按照领导的意图，眉户剧《雌雄花》将是农场参加张掖地区文艺会演的重头戏。

我在县上参加演出了欢迎新兵入伍的晚会回来，由于眉户剧《雌雄花》剧组的演员大部分都在四大队，便被临时抽调到四大队排练《雌雄花》。四大队的队长陈德位特别爱好并支持演出，他自己就在《雌雄花》中担任队长的角色。

排练日夜都进行，夜里便点上汽灯，大队部成了我们的排练场。我过去也学过几个眉户的曲调，此次在《雌雄花》的排练中，多采用流行一时的《梁秋燕》中的曲谱，这些曲谱已经过再创造，活泼、悦耳，十分好听。剧中的男青年由原安西县干部陕西人王昭扮演，老经验由民勤人侍峒山扮演，陈德位演队长，群众演员有武威人李熙元等。此时已是农闲，我们排练时围观的人很多。戏中女主角小红上台时，手握一束玉米花。每次排练前，王昭就从大队部门外的玉米秆上摘下一束，让我拿上。

眉户剧《雌雄花》虽比较粗糙，而我的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原省文化局的田禾担任导演，他很懂行。他的弟弟田季章，原省文联的，我在兰州时就认识，后来才得知也是个右派，但田禾一直没说。眉户剧中的念、唱、做，田禾都仔细地指点。我从戏里用碎步子跑圆场学起，学得很用心。特别是地方戏里“做”戏的种种招式，我过去都没接触过，田禾都能一一点到，让我心领神会。排练过程中的艺术创造活动，我觉得是一种陶冶人的心性，追求艺术美，使美的意境不断升华的过程，这使我能暂时忘却许多苦恼。沉醉于排练中的艺术追求，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在排练《雌雄花》的过程中，曾芳煜还初步构思了个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歌颂公社化后队长请一对老夫妻进敬老院的事，两老伴开头还推辞不愿去，一个舍不得饲养的肥猪娃，一个舍不得托儿所的胖娃娃，最后在队长劝告后双双进了敬老院。这个小演唱在创作过程中，我帮助改了改词，加了些风趣有意思的内容。在排练中，我和侍峒山演两老伴，陈德位演队长，群众演员主要由工人和难友的家属担任，都是女演员。李佐亭在导演中有突破，群众伴唱有动作，队列还有变化，对她们的表情也有很高的要求。应该说，这个小演唱，从编导到演出在当时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这次在四大队还与杜博智久别重逢。侍峒山在我到来后就给他捎了个条子：“你的好朋友和凤鸣要来看你。”见面后，我们自然都很高兴，说了许多别后各自的情况。

春节前，排练结束，我们又回到场部。

大年初一晚上，食堂里搭起了戏台，拉起幕布，点上了汽灯，一台隆重的春节晚会开演了。

眉户剧《雌雄花》再次出台，使观众大为倾倒。眉户原本是西北人喜闻乐见的一个剧种，在各地农村及市井小巷，会哼着眉户调唱几曲的大有人在。记得小时候在兰

州，有一对卖唱的盲人夫妇走街串巷，如有人家留他们唱几曲，他们便会坐在条凳上，男人弹三弦，女人手敲铃铛，一唱一和，唱了起来，唱的便是眉户调。在农村，眉户更是妇孺皆知、人人喜爱的一种曲调。但是，把眉户剧搬上正规的舞台，有阵容强大的乐队配乐，班底很不错的演员，出演反映当前农村技术改革、新旧思想冲突的新事物，在安西这样的小县肯定还未出现过。所以，此剧的再次出台，面目一新，引起观众的极大轰动。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在编导上都有很多创新，特别是群众演员唱得很认真，表情欢快，队列的变化、配合的一些动作，都有新意，也很受欢迎。

我们在四大队时，场部由一位上海移民做编导，排练了一出以黄梅戏《夫妻观灯》的调子和形式，表现一对年轻夫妻在观看公社化后的新气象的情景的小歌舞，有歌有舞，活泼有趣，也大受欢迎。女演员由小徐担任，男演员也是一位难友，河南人，名叫钟贵祥。

此外，男声小演唱《公社姑娘》、《大实话》，等等，也都在晚会上演出。

总之，这台晚会内容丰富多彩，总体水平比半年前的“七一”会演，已有了很大提高。凡是看了晚会的人，都皆大欢喜。

小徐告诉我：“二大队有个南方人，原来最烦眉户剧，说看了你的演出，才喜欢上了眉户剧，很爱看呢！”这位南方人当然是难友了，我听到后十分高兴。

三大队新建的饭厅水泥地十分光滑，春节时还在这里举办了盛大的舞会。阵容强大的乐队很能引发人们的舞兴。农场基本上是男性王国，来跳舞的绝大部分是我的难友，像我这样的舞伴便很令人注目了，常有人邀请，几乎每场都不空。我的舞伴中，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二大队的，人很年轻，穿一件黑色礼服呢上衣，谈吐文雅，舞步轻盈，他用手轻轻地揽着我的腰，我随着他在全场舞动旋转，感到非常轻松愉快，我认定他是一位舞场上的高手。他向我介绍了自己，说他原在金塔县银行工作，通报了姓名，说他叫沈潮，听口音是江浙一带的人。后来我才得知，他正是看了我的演出，才喜欢上眉户剧的那位难友。但他当面并不曾提起这些。我用不着介绍自己，因为我已是全农场久负盛名的女演员了，谁都知道我的姓名和来历。我和他连跳了两场。此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

石天爱一向不上舞场，但她从小受过正规的训练，舞技十分娴熟，年前天热时，她常在我们宿舍门前的平地上，带我和小徐跳，什么“伦巴”、“探戈”，她跳得都很有味道，很有特色。此时的石天爱，从外观上看，就更不雅了，因为她那最新潮的琇琅架近视眼镜劳动时摔了一次，一只眼镜腿用白胶布裹了裹还勉强可用，另一只眼镜腿断成了几截，只好扔掉，用一根粗白线绑住眼镜框挂在耳朵上。说相声的赵芝贵和她都是天津人，认老乡，开玩笑说她这是：“一线希望。”谁听了都笑得不得了。因为无论谁听了，都会和石天爱作为老姑娘没找上对象，要联系在一起来想。石天爱心

中无奈，嘴里不好说什么，也只能笑笑算完事。再说，入冬以来，石天爱一直身穿一黑棉袄，上面还套一类似棉猴的灰中透绿的大衣，大衣的式样颜色仍属新潮。但是，她的黑棉袄是对襟的，有两三个纽袢先后都断了，也许，她根本就不懂断了的纽袢可以缝一下再连接起来，为了把棉袄裹紧暖和一点，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半截麻绳，干脆在腰里一系。请设想一下吧，如此仪表的石天爱，还能够莅临农场里可谓大雅之堂的舞场去跳舞么？出现在舞会上的男士们不仅彬彬有礼，很多人还着装整洁漂亮，他们很愿意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显示一下自己昔日的风采。

春节期间，我们的歌唱家冯士伟还请了一次客，客人都是我们这些演出伙伴。他买了几斤糕点糖果，让大家分享。他原来也是行政十八级，当右派后降了五级，前后的级别都跟我一样，还能拿到58.24元。他宣布请客的原因是，他妻子死后，他已还清了债务，所以跟大伙一起稍稍庆贺一下。我为他在当右派之时又失去爱妻叹息不已，很难理解他怎么能承受那样巨大的不幸，所以曾几次对着他叹气："真是太不幸了，太不幸了！"然而，他一般尚能自持。现在他在还清了丧妻后的债务以后，还请大家吃一顿，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大家在经济拮据的状况下能够享受一顿糕点糖果，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也无人提起令人不愉快的话头。

在到县上举行会演前夕，风云骤变。陈德位队长突然宣布：他本人工作忙，必须立即回四大队去，无法参加演出，《雌雄花》就不演了。我一听就知道，这是陈德位为了顾全我们这些右派们的面子，考虑出的一种婉转的说法。《雌雄花》的停演，一定是政治上的原因。其实我早就想到了，以我们这些人的政治身份，又如何能参加县上或地区的文艺会演呢，这次县上肯定明确了一下，我们这些人没资格参加会演。果然，不仅《雌雄花》不能演出，小徐和钟贵祥的黄梅戏也不能演出，《两老伴进天堂》里的我和侍峒山都被换了下来，因为我俩都是右派分子。接我的角色的是个男性上海移民，他个头小，可以冒充老太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个右派。此人多才多艺，小徐他们演出的黄梅戏就是由他创意编导的，由于他的右派身份县上不知道，就以上海移民的头衔参加会演了。

红红火火的演出，由于我们是右派分子而被取消停演，我倒也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因为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阶级斗争的弦，未曾有丝毫的放松，以如此的政治形势，我们作为阶级敌人哪还能上台参加会演。所以，我主动给那位上海移民说戏，耐心地帮助他熟悉角色，希望他把小演唱演好。侍峒山火冒三丈，说不让演，立即就转身走了，他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他的角色后来由谁接替的，已记不清了。

后来，农场只能以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先参加县上的会演，也只有这样一个节目在换了主角后可以参加会演。领导上大概为了照顾，还让我随演出队到县上，

帮忙干些如包管服装之类的杂务，也就得便看了会演的全部节目。当时的四工农场——一个由下放干部参加劳动的农场，也有个自编自演的节目，全部由女演员演出。她们在院子里排练时，我就看到了。这是一个带有民间舞似的小演唱，六七个女演员各手拿一个活动的竹板，挥动着竹板变换队形，唱着歌唱大跃进、总路线的歌儿，夹带一些舞蹈动作，唱了几段，便结束了。他们的乐队也只有简单的几样乐器，跟我们那阵容强大、高手云集的乐队，就没法比。在我看来，他们的这个节目只能说是很一般，我们原来排练过的无论是哪个节目也比他们的强。然而，他们是人民，我们是阶级敌人，只能被取消演出资格。

中午，我们到县城的小饭馆吃饭，经济拮据的难友们只能吃上一碗臊子面略作改善。我是惟一的女性，他们硬是不让我掏钱，我是惟一吃请的人。记得同桌吃饭的有许登浩、王昭等人，他们肯定都是自掏腰包，我不知是谁付了我的饭钱。

下午在排练中间，我们乐队中的难友主动为四工农场的节目伴奏，大大加强了他们的乐队阵容，他们原来的器乐伴奏，变得微不足道。演出前李佐亭又主动为四工农场的女演员们化装。李佐亭原为铁路文工团的演员，一专多能，化装术特别高明，速度快，他把四工农场的女演员们一个个化装得像是换了个人似的漂亮，用黑油彩描唇线，在那个年代尚不多见，他运用得恰到好处，给每个女演员增添了特殊的美。四工农场的女演员都高兴极了，感激在心。出现在舞台上的女演员个个光彩照人，平添了许多丽色，每个人心里都惊喜不已，须知她们此时正青春年少，有些人还是妙龄少女，她们很看重自己在舞台上的形象，甚至想把自己美丽动人的舞台形象永远留住……

我心中十分感慨。唉，唉，人才济济的阶级敌人，令人刮目相看的阶级敌人，你们为什么是阶级敌人呢？20年后，我们这些阶级敌人问题全部平反。

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后来还参加了张掖地区的文艺会演。据说观众认为节目中的群众演员唱做俱佳，热情奔放，而主角不怎么样，对此表示不解。亲爱的观众，你们怎么会想到其中政治风云的变化呢？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切都是政治标准第一，何况是文艺会演，阶级敌人如若参与了进去，领导上就会惹祸在身。我们是临时撤下阵来，又换上的新演员，这种匆忙的变化，主角是无法胜任角色的。

春节期间的种种情况，我都详细地写信告诉了景超。我们的演出活动，吃了些什么，冯士伟的请客，我的心情如何，等等，我都一一在信中说及，只是未说及会演被换下的情况。景超的回信照例很短，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说："真羡慕你。"当时，我未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凄楚意味。因为多半年来，我的处境跟他的距离还在继续拉开。他无法在信中向我诉说他痛苦的境遇；我以自己的境况又无法想象他苦到了何种地步，他的许多艰难困顿，我都无法凭想象力便能设想得清楚。比如，我怎么也想不

到，在生产粮食的农场，我的亲人及难友们会长期挨饿；我更设想不出过春节他们吃的是什么，过年还能吃不饱饭吗？唉，唉，如果那时我能把他的境遇想得更接近实际一点，知道了他活下去已很艰难，此时的我也许会千方百计从吃的方面尽力接济他，尽管办法很少，但也不是毫无办法。

这里，我要插入1991年4月9日罗舒群对他们初到夹边沟农场时的情况的介绍。他是幸存者，他的介绍正可以补充当年我从景超的来信无法了解到的情况。

罗舒群是我1950年8月在《甘肃日报》编辑部财贸组工作时的组长，他原也是西北大学经济系的学生，1949年5月西安解放不久，在6月就入了团，同景超一起参加了甘肃工作团，从西安行军到兰州，属参与了创办《甘肃日报》的工作骨干。罗舒群性格孤傲，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报社得罪了些人，被开除团籍，调出报社。反右时，他在张掖地委宣传部工作，也被打成了极右分子。罗舒群在鸣放中没发言。他有一本工作日记就放在办公桌上，其中也夹杂着记了些生活上的事情。当时他的顶头上司宣传部副部长是从小学教员岗位上才提上来的，论水平，当然比大学生出身，在省报曾是工作骨干的他要差一截子，在共事中常遇到掣肘的事，产生不快。一次，罗舒群随意把《红楼梦》里黛玉《葬花词》中的两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抄在了工作日记上，无非是发泄心中的郁闷。哪承想，那位副部长想抓他的右派把柄，私翻他放在办公桌上的工作日记找出了这两句诗，就给他定了性。在动员大家揭发时，当然又揭出了些“问题”。罗舒群拒不认错，没有留下任何检查罪行的文字材料，属于态度极其恶劣者。中央对右派分子处理的正式文件尚未下达，他就被划为极右分子，于1957年12月6日，被武装押解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开始了他的劳教生涯。

罗舒群说，初到农场时，伙食虽低劣，吃饭不限量，有白面馍吃，因为大家才刚去身体底子好，也不觉得饿。但活很重，寒冬腊月，地冻三尺，在农民已是休闲的日子，他们还要翻地整地，抡起铁锤敲打钢钎使冻土裂开，再用铁锹翻起冻土加以平整，有些人手上的虎口震得裂开了口子，鲜血淋漓，严寒使大家的手脚都冻破了。就是劳改犯人，也未曾在严冬去干这么苦这么重的活，因为原来的劳改政策，也只允许犯人去干常人所能承受的劳动。自从劳改农场改为劳教农场，开始接纳在反右斗争中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极右分子以后，农场的领导重新调整政策，转换做法，迎接劳教分子们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严酷无情的日子。

已往被判了刑的罪犯们，在服完刑后，转过身来就用另一副面孔，向陆续到来的劳教分子们作威作福。没有触犯刑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①]的人们，在夹边沟农场

①引自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要受制于前罪犯，由前罪犯们吆喝着去干各种体力不支的重劳动，对他们的惩罚绝对地超过了服刑期间的前罪犯。

几个月后，吃饭开始限量，主食全成了杂粮，豆面糊糊是最受大家欢迎的饭，糜面不去糠，麸皮也算粮。每天下地劳动回来，每人都要带些苦苦菜、榆树叶、沙枣叶之类回来，交到灶上，由炊事班做熟，和在饭里吃。沙枣叶又苦又涩，最难吃。平常日子里，野菜树叶就顶了蔬菜，当然无油无肉。每个人都挨饿，还不能说肚子饿，说肚子饿就上纲上线认为是对国家的粮食政策不满。有些人家里寄粮票来，只要一旦发现立即全部没收，由国家印制发放，个人之间原本可以随意互通有无，市场上自由流通的粮票，对劳教分子们来说，便成了违禁品。既不给吃饱，又不许动用家里寄来的粮票，这种残忍的做法，实际上成为勒在每个劳教分子的脖颈上的致人死命的绳子。

罗舒群当时就把所谓的改造看得很透，把个人的生存摆在了应有的位置上来对待。他想尽一切办法来填充饥肠辘辘的肚子，一切可以充饥平时根本无法下咽的东西，都作为美食佳肴进过他的肚子。种洋芋时，他背着洋芋子走在最后，看见一个低洼的坑坑，就把洋芋子倒出一些来放进坑里，用土虚虚盖住，收工后每天拿几块，放在茶缸子里煮熟吃。芦草根、苦苦菜、榆树叶、老鼠、麻雀、蚂蚱，等等等等，凡是可以充饥的，都曾是他尽力采摘、捕捉，送入腹中之物，过去他并不知道，烧熟的蚂蚱还很香。一次，他正在房里用茶缸煮野菜，管教干部赵来苟进屋发现，把茶缸一脚踢翻，怒骂不止，还踏扁了茶缸——他维持生命的重要工具被破坏，只有面对饥饿者还要断人活路的人才会这样干。

秋后，胡萝卜成熟了，饥饿的他偷吃了干部蔬菜地里种的一个胡萝卜，被别人发现告发，批斗了一顿。在批斗他时，景超并未发言。但后来景超再见到他时，见旁边无人，竟态度严肃认真地指责他说："你怎么也成了这号人！"话虽不多，却重重地刺在了罗舒群的心上。罗舒群见他迂到了此等地步，自然什么话也不能和他说了。就因为吃了一个胡萝卜，他被关进"严管班"受到惩罚。

罗舒群记得，1958年国庆节时，他们吃的大烩菜有点肉。晚上，还让大家到场部看电影，电影放映了不到一半，有些人已躺倒在地上梦周公去了，又饿又累，疲乏已极的劳教分子们生存维艰，已没有了享受精神食粮的能耐和兴致。管教干部们过去也带领劳改犯们到场部看电影，从来也没出现过劳改犯们不看电影，在放映电影的场地沉沉大睡、鼾声大作的情形。看见劳教分子们如此不识抬举，有的管教干部还骂骂咧咧的，"狗日的们睡死了！"诸如此类的脏话，脱口而出。

到春节时，菜里出现了一点老驴肉之类，每个人的肚子里依然饥肠辘辘，他们在忍饥挨饿中熬过了大年初一。唉，唉，我的亲人竟然把忍饥挨饿也当做了对待改造的态度问题，就在那个正常人难以生存，不许人活下去的鬼地方，他规规矩矩地忍饥挨

饿，还对别人尽一切努力求生存的手段从内心里不能容忍，他正直的秉性何以竟变得如此顽冥，如此的不可救药！

在新添墩时，罗舒群和他曾同住一屋，夹边沟森严的专政气氛，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各种训话或戒规，不允许他们倾心交谈，掏心里话。景超初到农场时，戴一顶小檐草帽，无论劳动或回到住屋，都沉默寡言，有时间就记日记。罗舒群曾告诉他：“我就是因为写日记才当了右派，你还记日记干啥？”景超只淡淡地笑笑，不作任何辩解，仍照记不误。他一时还无法从作家梦里醒悟，对未来仍抱有憧憬。并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洁癖，每天收工回来，不论多劳累，都要洗脸洗脚刷牙搞完例行的卫生大事，然后才拿起日记本去记日记。他衣着破旧，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比别的难友显得更整洁些。

罗舒群也说到挖排碱沟的情形。他说，夹边沟的土地盐碱很重，不排碱，庄稼就难以收获。他们就挖过排碱沟。排碱沟宽七八米，深三米多，一边挖，地里的碱水就顺沟而下，从低处流过。大家就站在碱水中挥锨挖泥，皮肉被碱水蚀破，疼痛非常，可还要在饥饿中坚持到收工。而此时的挖排碱沟仅仅是小打小闹。

身在十工农场的我，哪里能把这种种的艰辛，这种种的非人待遇，想个明白呢？即使我具有非凡的想像力，也难以把这一切都想到，因为人的想像力都来自生活，而我经历的实际生活，同他们那出了格的严酷生活相差太远了。

20世纪60年代，我在杨康家里见到了刘彦璋，他和杨康是延安大学的同学，也是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回来的难友，而且曾和景超同在新添墩劳动。他也是妈妈的学生王秀莲的丈夫，曾和我的父母同住黄河沿前街。当杨康向他介绍我正是景超的妻子时，他先对景超大声作了评价：“哎，好同志！”

谈话中间，说到曾在新添墩劳教的傅作恭。傅作恭本人是个水利专家，是起义将领、当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来到新添墩后，因饥饿难耐，劳动条件太严酷，曾设法给哥哥傅作义写了封信，向当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求援。傅作义收到信后不相信他说的话，还回信义正辞严地批评教育了他。这样，就招来了站上对傅作恭的一场批斗。

傅作义不相信弟弟来信上的话，我无法想象他们那出了格的严酷生活，同样都是悲剧。

傅作恭是留学美国，已在美国定居多年的水利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曾多次动员他回来报效祖国，20世纪50年代初，他听了哥哥的话，回到北京，在水利部任职。后来，邓宝珊出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给傅作义写信说甘肃很苦很落后，打算在甘肃修几个大水库，改变甘肃落后贫穷的面貌，希望助他一臂之力，从人才上给予支援。傅作义接到信后，就动员傅作恭来兰州。抗战期间，兰州是大后方，傅作恭和

他母亲在兰州住过几年，对兰州也有感情。经哥哥略作动员，就慨然应允，于1953年2月来到兰州。谁想到，他以慷慨的爱国热情回到祖国，为了支援甘肃的水利建设，又从首都北京来到兰州。当他为改变甘肃贫穷落后的面貌奋力拼搏之时，一场反右派斗争，将他划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一米八以上的个头，身材魁梧，国字脸，浓眉大眼，一表人才。大高个儿的他，消耗也大，一到夹边沟，粗劣的伙食就使他饥饿难耐，繁重的劳动使他体力不支，此时，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大半生没下过苦的人，如何能承受这样严酷的生活。可傅作义不相信他信上说的，为此反使他招来一顿批斗，此时的傅作恭真是绝望极了。

9 我和小徐当了四大队的中队统计

又过了些日子，一件意外事情的出现，使我和小徐离开了畜牧组。一天，小徐告诉我，席组长行为不轨，他靠近她坐着，忽然把手放在了她的大腿上。席组长大概是试探性的，但小徐吓得不得了，问我该怎么办？我说，这只能向领导说明情况，由领导上解决。在那个年代，我认为只能如此。后来，向邹士杰副场长反映了此一情况，我和小徐便同时调出了畜牧组。我们对调出畜牧组是高兴的，因为经过半年多的实践，鸡兔的死亡使大家束手无策，我们担心长此下去交不了差，影响摘帽子。

我们从畜牧组调出，先是在三大队劳动了些日子，平田整地。干这类活，在我们已是熟路旧辙，已不感到吃力。此次在三大队平田整地，有几个难友的家属为挣些工分，也同我们一块干。其中有个才从四川来的黎淑莲，她的丈夫赵贵春，原是张掖航空技校的教员，划为右派后，根据他的专长在十工农场机耕队工作。黎淑莲原是赵贵春的学生，赵贵春当了右派后，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她觉得处处抬不起头，就于1958年回到了四川岳池县老家，在家中生了个男孩，仍觉得很难呆下去，又于1959年初来到了十工农场。

黎淑莲，人长得很标致，细高挑儿，很惹人喜欢。在平田整地中，她奇怪地发现，我和小徐都会推着独轮小车干活，初来乍到的她，只会吃力地向小车里装土，看见我们的劳动强度很大，在铲土时就尽量少装些土，而此时，我们推车已很熟稔，还想努力表现得积极，多干活，看见她铲土少，就要她："再铲，再铲！"只要能甩开膀子干活，我们觉得已是幸福，因为它反映出的正是我们原来的精神风貌。在田间休息时，我还给她们几个家属教歌，教的歌是：《毛主席来到咱农庄》，这首歌当时风行一时，很快大家就都唱熟了。

又过了些日子，场部正式通知，调我和小徐去四大队。据场部秘书姚瑯后来说，

场部想给我们调个轻工作照顾一下，三大队就在场部，省上及县上的干部来来往往，人多眼杂，怕有人说长道短。另一种说法是，四大队的陈德位队长特别爱好文艺，从春节会演的情况看，我们今后不可能出外演出了，他打算把四大队办成个文艺演出活动的中心，以后在大队搞些经常性的活动。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这样，1959年4月，我和小徐就同时到了四大队，一起调去的还有曾芳煜、周至德等人。原在四大队的杜博智已被派去兔葫芦割野麻，后再未返回四大队。

小徐在二中队当了统计，我在一中队当了统计。统计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统计全中队5个组的劳动出勤情况、工作进度，办黑板报，每月发一次全队的工资，参加队务会议，做个简单的记录，有时还给队长写个发言提纲，等等。中队部的办公室也是我的卧室，支了一张窄窄的床，另有一张二屉桌。做完了以上工作，便可以自由到各组参加劳动，时间不限。一中队的正队长叫赵金恒、副队长叫刘鸿年。我来之前，中队统计由一位名叫刘文彬的难友担任，我来之后，刘文彬去一组劳动，确实是照顾了我。

一中队全队6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我的难友，在我来之前纯属男性王国。当我第一次出现在全队人的面前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大家全都亲切地注目看着我，眼睛里漾着笑意，嘴角挂着笑，有些人干脆张开了笑口。大家似乎都很高兴我的到来。我笑眯眯地站在旁边，用微笑向大家致意。

一中队队部的隔壁是三组的宿舍，三组组长是个工人，姓裴带家属，住在家属宿舍。全体组员几乎都是我的难友，记得他们是：王昭、田禾、叶得善、张全国、蔡南海、关维智（他在我和小徐来四大队之前调来）、刘名、蒲克仁、陈××（可惜我已忘记他的名字）等。我的这些右派朋友们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已适应了这里的劳动生活，他们个个体魄健壮，红光满面，情绪甚好。反右斗争时的痛苦经历已被他们置诸九霄云外，这也是一种无奈罢，反正这里的朋友们个个半斤八两，

1959年夏，和凤鸣与徐福莲在安西十工农场

都是一路货色，谁也不小看谁。这个中队的另一特色是大家都喜读书，学习空气很浓。在适应了劳动之后，许多人往往还挑灯夜读，喜读文学作品的人不少。有人买来了在那个年代出版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等等，在全队传来传去地读。这些难友虽当了右派，他们的革命情怀仍同过去一样，所以这些文学作品对他们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认真阅读，仔细品味，不仅把这些书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在逆境中，还从中汲取精神营养，获取新的力量。有些人还把自己在劳动中的体会诉诸笔端，写成诗歌、小文投稿，我尽量把它们登在黑板报上。记得原安西县委的宣传部长刘名，跟徐廉身是一个反党集团，就善写诗，曾写过一首有关锄地的诗，我很欣赏，不仅登在了黑板报上，还抄录下来，后来带回了兰州。现在只记得其中有“银锄翻飞光闪闪”之句。1961年，徐廉身反党集团彻底平反。刘名从此改行做教学行政工作，先后担任安西中学校长、酒泉中学校长等职务。后又创办酒泉工业学校，做出了突出成绩。到1989年11月，甘肃省委授予他“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我来农场一年，只是应付每天的劳动就已精殚力竭，除了碰在手边的报纸曾略略翻过一些以外，没读过一本书，像《林海雪原》那样的大部头书，见都没见过。为这，几乎还闹了笑话。有一次，我到三组的宿舍里去，陈××亲昵地说：“我们的小白鸽来了!”他指的是《林海雪原》里的女卫生员小白鸽，我不知其所云，还着急地辩解了几句。当然，以我的右派身份，说我是小白鸽并不妥，而他们对我有了那份感情，就不管其妥与不妥了。

我来一中队第一次下地，是同王昭几人补种断了行未曾出齐苗的小麦，活很轻。几人说说笑笑，不觉就到了工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一起走到了地边，王昭因为我是女性，又是他的演出伙伴——演员们开玩笑称他是我的“小伴儿”，称侍峒山为“老伴儿”，急忙拿来一条空麻袋要我垫着坐上，其实我早已躺在地上休息了。一年来我和土地一直打交道，有时还会在坚硬的地上梦一回周公，甜蜜非常。现在，我又回到了生产队，这里的各种气氛令人愉快，我还会在乎身上沾土吗?

一中队有个一组住在离队部一二里之遥的东边，组长刘志俊，是个老成厚道的老工人，就是安西当地人，也带有家属、孩子。其余的，绝大部分都是我的难友，他们的名字能记住的有：李永龙、罗惠湘、曹宗华、王永、许登浩、张稔年、陶杰、刘文彬等。有时候，我也走一二里路，到一组去参加劳动。自从我当了中队统计，有意思的是无论工人或难友，他们喊我名字的极少，大部分人都客气地称我“统计”，好像“统计”也算个什么职务似的，一组的难友也都非常热情。一次，在一组劳动时，看见尚未长出禾苗的地里隆起一个包，陶杰说：“那是蘑菇。”走过去用手指一刨，果然刨出两个直径近两寸肥肥大大的蘑菇。在兰州时，有时在雨后的树下或其他潮湿的地方，也会长出像似蘑菇的东西，小时候听大人说，那是“狗尿臺”，有毒不能吃。

这肥肥大大的蘑菇颜色没有“狗尿臺”白净，真是蘑菇吗？并不潮湿的地里怎么会长出蘑菇？我心里好生奇怪。陶杰见我态度犹豫，又肯定地说：“这就是蘑菇，能吃，有时地里还不少呢！”这天上午，我一直注意地里隆起的包，后来竟又找到几个。中午，我在一组灶上吃的饭，陶杰用茶缸把蘑菇煮熟给我一个人吃。虽然没一点油，才从地里捡回的蘑菇用盐水煮熟后味道鲜美极了，我让陶杰和别人也吃，陶杰说：“你没吃过，就一个人好好地吃罢！”

王永过去常给报社写稿，是个积极的通讯员，因为我原来也是报社的，从感情上似乎就有点近乎，喜欢和我议论政治上的一些事。他常说：“我们算是什么右派，如果在京沪的大机关里，像《光明日报》、《文汇报》那些单位，我们什么都不是，也许还是反右的积极分子哩！”我向他介绍了王桂芳被判处20年徒刑，经上告撤销了刑事处分，来农场劳动的情形。他说：“王桂芳胆子就大，现在逮捕后凡是上告不服的，都给加刑。不过，人家还是做对了。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他告诉我，报纸上登了，在苏联，小偷服完刑以后找不到工作，有个小偷曾为此写信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答，应该给他们安排工作，不然，他们还会再去偷。说到这件事，是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处境，长此劳动下去，出路安在？这其实也是每个人心中忧虑的事。王永和陶杰都是武威人。王永来农场前在武威工作，陶杰则是张掖讲师团的。

罗惠湘是湖南人，原张掖航校的技术人员。罗惠湘喜欢唱歌，有一次听他唱苏联电影《区委书记》的插曲、俄罗斯民歌《马车夫之歌》，其悲凉的情调动人心弦，我让他把歌词抄下来，自己哼哼着也就学会了。这首歌述说的是一个马车夫在临死之前仍然忠实于爱情的故事：

草原大无边，
路途遥又远，
有个马车夫，
将死在路边。
……
爱情我带走，
请她莫伤怀，
找个知心人，
结婚永相爱。

我喜欢的歌儿，我总是十次八次地唱，而且要带上感情，用心去唱。当时我自己的处境比较而言已够好的了，而心底里仍然蕴积了太多的悲哀。歌的情调同我的心境

是这样的相近，我一遍又一遍地唱它，是一种尽情的宣泄。我在中学受的是西洋声乐的教育，唱俄罗斯民歌，我觉得也很合我原来的爱好。况且，平日里无法说出和难以表达的种种情愫，谁也不能禁止我在歌声里唱出。我唱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教会我以后，罗惠湘也很爱听我唱这首歌。这悲凉的情调，谁又能说和他自己的心境不一致？

许登浩年龄略大，在眉户剧《雌雄花》里，他在伴奏中拉胡琴，我们是在排练中熟悉的。此人为人老成，踏实能干。

一组年龄最小的是曹宗华，此人体力特好，劳动上经常受表扬，性格热情，喜穿红色线衣，夏天则穿白边大红的背心。他也是不到18岁就戴了帽子，我常开玩笑叫他“小右派”。后来才得知，他戴的帽子是阶级异己分子。

来一中队后，劳动已不是那么刻板，而是有了相当的随意性，我仍注意尽量多参加劳动，需要我坐在办公桌前做的工作其实就那么一点，待在队部也没什么意思。我对自己的政治身份很清楚，领导上再照顾，我仍然是个右派分子，是来改造思想，在劳动中脱胎换骨的。在一中队，我不论到那个组劳动，大家都挺欢迎，何况我已适应了各种劳动，并不以劳动为苦，在劳动中和大家说说笑笑，也是一种乐趣。

到5月，我们的伙食突然有了变化，每月的定量减成了30多斤，每顿都吃汤面，里面和了不少苦苦菜。虽然都能吃饱，饭量小的也可把粮票让给别人，因为汤水多，很多人都把肚子吃得圆鼓鼓的。记得王昭的饭量大，他的衬衣又是放在裤子里边的，才吃完饭时，他的裤带就放开了许多，腰很粗，肚子也挺着。谁都知道，去年农场大丰收，为什么粮食定量却减了呢？

后来才得知，原来，毛泽东发表了“4·29”指示。他以个人名义写了题为《党内通信》的信，是写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的。信上讲到了“节约粮食问题”，信上说：“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①]十工农场作为生产粮食的单位，对毛泽东如此重要的指示，当然要作出反响，坚决执行。于是白面馍不见了，尚不是大忙季节，只能降低定量，改吃面条。农场因为气温低，尚无蔬菜，苦苦菜代替了瓜菜。

毛泽东似已意识到将要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面临饥饿。

此信还讲到了“讲真话问题”。信上说道：“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他告诫大家：“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

①引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

害自己。”①

就在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发表一个多月之后，“在北京，有两位睿智敏感的伟人，对此进行了议论。他们是彭德怀、张闻天。此二人原来并非密友。此前，彭德怀刚刚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及蒙古国回来，张闻天去看望他。他们都觉得，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向全国发出4月29日的《党内通信》，这是‘树立了个人作风’。联想到毛泽东在3月的上海会议上强调权力集中，意思无非是由他自己说了算。这样下去，集体领导原则还怎么坚持？岂不是重复斯大林晚年的个人崇拜吗？”② 谁能想到，这一番议论，竟为两位开国元勋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要求全国人民“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全国人民都字字句句照办了，连丰收的十工农场也毫无例外地改吃干为吃稀的，用苦苦菜代替了瓜菜。毛泽东告诫大家不要说假话，只是说给他的属下和百姓们听听的。他有句名言：“从全面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以后的无数事实证明，无论是谁说话都要限定在这句名言的框架内，不然，他就认为有损于他的崇高威望以及他所推行的治国政策。斯大林晚年的悲剧，其实在他身上已经表现出来了。

再说此时的我，对于农场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吃得差一些觉得也过得去，只是想起在三大队吃过的好饭菜，就有些馋涎欲滴。那些家在农村，特别是家在河西农村的难友很多，此时他们从家信中得知的情况肯定就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他们已在忧心忡忡，但不敢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别人。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就因为在粮食问题上说了实话，来农场前家里已缺吃少喝，此时就更焦虑了。但是，他们已身不由己，不能解救家人，不能对家里有任何帮助了。

有一天，三组的裴组长喊我：“统计，你到我家里来一下。”我跟着到了他家里。原来，他们家在改善伙食，他老婆用从小卖部买来的甜果酱包了些饺子，他特意留了一些给我吃。用果酱包饺子，我还是第一次吃，我喜吃甜食，自然是吃得非常高兴。在农场艰苦的环境里，他挣钱不多，老婆又是家属，做点好吃的也不易，他还特意邀我去吃，这真是吃在肚里，甜在心上。在工人组长中，裴组长一直对我特别亲昵，关照颇多。

夏收前，我们在四大队又有过一次外出的演出活动。这时，县上已不能去了，但小宛农场邀我们去演出。原来合并到疏勒公社的小宛农场，从疏勒公社又分出去了，场长李学福是原十工农场的副场长，我虽和他没多接触过，感觉他为人厚道正派。此次邀我们去演出，肯定是他的主意。他对于我们这些演员的阵容实力，当然是了解的，所以才

①引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
②引自《国防部长浮沉记》第24~25页。

盛情邀请。

这是我在十工农场最愉快最成功也是最后一次的外出演出活动。

我们是坐着马车去小宛的。这次演出，主要节目是眉户剧《雌雄花》，所以《雌雄花》的演职员全都去了，此外还演了些小节目。

群众演员李熙元和我同坐一辆车。李熙元岁数小，胖乎乎的圆脸，武威人，一直和我说说笑笑。谈笑间，他也流露出怅惘迷茫。问我："咱们今后怎么办？日子还长着呢！"我当时心情尚可，就背了普希金的一段诗安慰他：

假若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
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
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就要来临！

这段诗其实连我自己也安慰不了，我们的"快乐的日子"在哪儿？我比他更迷茫。提起今后怎么办，我心里比他更沉重，但我愿意安慰开导他，因为他比我岁数小，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开导他。他听了我的背诵，不好再说什么，便默默的了。

小宛临时搭了个高大宽敞的戏台，让我们演出。此次演出因为是在大白天，台下观众欢喜专注的神情，热情的笑脸，都反射到了戏台上，我都感觉到了，所以情绪特好。我认为演《雌雄花》以来，这是演得最好的一次。

让我们觉得特别高兴的是，小宛还特意宰了一只羊，吃饭时，我们每人面前有一碗羊肉，吃羊肉泡馍。我们已是数月"不知肉味"了，每天吃苦苦菜面条真也吃烦了。能够吃上这么一顿美餐，一定是李学福场长的安排。不论外面的世界有了怎样的改变，政治气候如何反复无常，他依然认为我们是"好样的"。小宛的工人、农民，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心里是滋润的。对他们来说，我们送上门的是精神食粮的上品。许多人身居戈壁深处，人老几辈子也没见识过如此的演出。所以他们把我们当作贵宾接待，内心无比高兴。

我们非常感动。

我没有想到，因为数月"不知肉味"，我的胃肠对羊肉的消化功能都减退了，面前的一碗羊肉，数量不算很多，但我无法吃完，就搛给了坐在身边的王昭几块。我的"小伴儿"演戏很有几分才华，作为陕西人，他在道白、唱腔、咬字吐音方面，眉户味儿很足。他个儿不算很高，浓浓的剑眉下，一双眼睛又大又黑，还有些深沉，仿佛

总在思考什么深奥的问题，但他笑口一开嘴一张，给人的感觉是爽朗坦率，眼睛里什么秘密也没有了。他的长相，也正适合他在《雌雄花》里扮演的角色。劳动上他是一把好手。我们在演出上合作得很好。

王昭家里是农民，解放前进城找工作，先在一家工厂干活，后来觉得工厂里的工作太苦，经人介绍，在宪兵队混了几月。一个农家子弟为了讨一口饭吃，在宪兵队混了几月，也没干啥坏事，这也不算啥，当地一解放他就立即参加了工作。原来，领导上谁也没有认为他在政治历史上有什么问题，他的原工作单位是安西县公安局，进这种单位，一般都经过严格的政治上的审查。谁能想到，反右派斗争后，对他虽未发现新的问题，他人又不可靠了，而作为历史反革命被送到农场监督劳动。在一中队，同他一样，有类似情况的还有几人。反右斗争之后政策的继续向左转，使他们也蒙受了不白之冤。1979年后，他们经过落实政策，先后又都成了人民、成了国家干部。

我们的中队长赵金恒，是个复转军人，共产党员，张掖人。他对我的工作和劳动表现都比较满意。我在一中队工作了一段，全场对所有的下放人员评级，根据每个人的劳动表现评为四个级别，最高者四级，最低一级。劳动报酬也略有提高，四级每月的收入可拿到近40元。我的工资由原单位发，同评级不挂钩，但仍参加了评级，评级也是政治表现的标志，后经大队统一研究后宣布，给我评了个四级，这无疑意味着是一种鼓励。

赵金恒闲时也和我聊一阵天，说些家常。有一次，他说："我们这些下放的同志表现确实好，来了一年多了，农活熟悉了，多重的劳动都能完成，以后我们就要根据党的政策，该抹（ma）帽子的就要给抹，我们这里是留不住你们的。和桑子，你们将来还是要回兰州，回你们单位上去的。"我在三大队时，杨康、杜绍宇他们仍用我曾经用过的笔名"和桑"喊我，两个字的名字喊起来便当一些，也比较亲切。反右派斗争之前，报社上上下下的人都喊我"和桑"，在反右斗争中，革命群众为了同我划清界限，表示出对右派分子的蔑视与革命义愤，我的名字"和凤鸣"在斗争会及一切公开的场合被呼来喝去，曾用过的笔名不再有人称呼。来农场后，人事干部办交接手续，当然仍用"和凤鸣"三字，所以大家都只知道我的名字。杨康他们喊我"和桑"，引起了小徐的注意，她问明了原委。以后我的女伴们便都叫我"和桑"，后来这称呼又扩大到了"演员"队伍里。来四大队后，赵队长听小徐他们喊我"和桑"，问清楚缘故后，大概觉得叫起来还有些不顺口，就在"和桑"后面又加了个"子"，所以，我又成了"和桑子"。赵队长情绪好的时候，还当众亲昵地称我："我们的和桑子！"不过，在全中队也只有他一人这样叫我。"和桑子"成了赵队长对我的专用称呼。

赵队长对于给我们"抹帽子"的事十分关心，不仅私下和我谈，在全中队开会的时候，也常说起。他在全中队讲话的时候，口气还是部队里首长对下级的态度，以表

扬和鼓励为主，充满了期望。他常说的口头禅是："我们希望同志们在这里一个个很快地把帽子抹掉，你们都是有单位的嘛，你们还会回到原单位去的嘛！"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全国对于给右派分子摘帽子还毫无动静，右派分子们今后出路究竟如何，从中央的有关文件到新闻媒介，都还看不出一点眉目。所以，尽管他言恳意切，侃侃而谈，这也是我们内心里最关心的大事，我们一个个都是洗耳恭听的样子，内心里当时其实都画了个问号。而赵队长的这番话，真正是他的心声。复转军人的他，同我们这些右派相处已一两年，他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是怎样把我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但他相信我们这些人有文化有本事，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并无反对仇视之心。他说这番话经过深思熟虑，并非脱口而出，这标志着一种社会的良心。

我们这些右派通过一年多的劳动，处处听党的话，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战天斗地，着实也使赵队长深受感动。他说上面那些话时诚恳激动的神态，滚烫的话语，是由于眼前他所熟悉的我们这些右派，个个都向他提供了足够的生活依据，他相信眼前的事实。他甚至有点想不通，为什么把这些表现确实好的同志划成了右派。我们心里的委屈，他暗自也在心里琢磨过，有时竟不免和当右派的我们想到了一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把它说成是一种社会的良心十分确当。他反反复复地向我们说这些滚烫的话，也有点情不自禁。

赵队长和我闲聊时，有一次，也来了点"忆苦思甜"。他说："现在，个别的同志还嫌我们这里苦，几年前，我们复员下来刚到十工的时候，哪里有个农场的影影子呢，面前只是一大片荒滩，大风一刮起来，飞沙走石，天昏地暗，连个避风的墙角角子都没有，趴在荒滩上，我们中间好些人都哭开鼻子了！"说到这里，他笑出了声音。他一定是想起那些复员的战友们哭鼻子的样子十分可笑，毕竟那已是几年前的事了，辛酸已成为过去。我心里暗想："赵队长，你哭鼻子了没有？"但终于没好意思问出口来。

赵队长笑了一阵，才不无自豪地又接着说："那叫啥？那才叫艰苦哩！现在的这算啥苦！"

一年多来，我在劳动中备尝艰辛，也深深地体会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劳动的艰辛，曾使我想要躲避开这不堪承受的重负，甚至不惜走进另一个世界，永远躲开这可憎恨的一切。

这时候，我听赵队长介绍他们当年创业的艰辛，内心里又增加了对当年创业者的尊敬。是的，他们作为开拓者，是吃了大苦，流了许多汗水的。农场有了如今的规模和局面，我们不应忘记开拓者们曾经做出的奉献。

这里要提一笔的，是四大队也有十来户上海移民。这些移民文化层次都比较低，看来基本上都属劳动人民。个别的上海移民还在这里喜结良缘，扎下了根。

这位喜结良缘的姑娘，苏北人，姓氏不详，大家都叫他"大毛"。当时在食堂当

炊事员。同她一起来到农场的还有她的母亲和一个妹妹。大毛皮肤很白，细皮嫩肉的，身体粗粗壮壮，正是炊事员的那种体型，说不上好看。她的新婚丈夫是大队统计崔国俭，民勤人，我的右派难友。我和小徐调到四大队时，他们已经结婚。同许多上海移民中的女孩子相比较，至少在外形上大毛并不是那么可爱，但是他们小夫妻俩倒是十分恩爱。

一中队的几个上海移民，年龄都比较大。其中一人是理发员，也是苏北人。他是孤身一人来到农场的。也许，他也有些忌讳，从不谈为什么孤身一人来到农场的，老家还有些什么人，如何维持生计的，等等，对这些我已印象毫无。我只记得当阳光和煦、天气好的时候，他就在一中队队部门前放个凳子，拿出装了简单的理发工具的木箱，给大家理发，理发也不用给钱，只给他记上工分。这种分配制度，又退回到了农业社。这位苏北人脾气好，我们有时也闲聊一阵。

赵队长对几位移民老汉安排劳动时尽力照顾，没让干重活，他们大约也和我一样，劳动带有随意性。他们属老弱病残，就是不干活，农场还发给每人每月十三四元的生活费。

一中队属粮食队，全部种小麦。一天，赵队长突然说："我们也找一块地把瓜种上，大家好吃！"刘队长立即响应。我更没话说。我已有了三大队时在地边点种瓜的经验，知道自己种了的瓜，到时候不用掏钱，只要摘来吃就行，我为什么不同意呢？

二位队长一商量，说干就干。他们立即选定在队部附近路边的一块地里种瓜，还说这块地边堆着一堆粪土，正好用来种瓜。一边说着，刘队长推来了一个独轮小木车，上面放了一把铁锹，我和赵队长都各自扛上了自己的铁锹，就出发了。这是闲置的一块地，最多也就是二三分地吧，农场土地宽广，闲置几分地不算什么。这次，我们是正规的种瓜，不是在地边随便铲个小坑坑放个瓜子就算完事。在我，当然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们先把地边的粪堆铲起装上小车，再推到地里扬开。在二位队长面前，他们认为我是妇女，没让我推车，这块地不很平，推车还得有些力气。我只使铁锹。下一道工序，就是用铁锹把地里的土铲起，堆成一尺多高底宽两尺多的条状垄，垄上面用铁锹拍平，垄的两侧呈倾斜状，也用铁锹拍平，垄与垄之间距离也就是一尺左右。这样，整地就完成了。过了几天，赵队长又找了些瓜子，我们一起把瓜子点种在地垄两侧较靠上的斜面上。以后，赵队长又在队里浇水时，安排人给这块瓜地浇足了水。再后来，瓜地里便是绿茵茵的一片，瓜蔓上长着大大小小边缘弯弯曲曲的绿叶，铺得满垄都是。在安西的农场，种瓜就如此简单。看见那一垄垄被青翠欲滴的叶片和瓜蔓笼罩得如一条条飞龙，简直要腾空而起的景致，我只有感叹大自然的造化之功了，而我这双劳动的手也曾为它的出现做过贡献，这是多么奇妙，多么令人愉快！

一中队有些人有自制的小凳，可以用它坐在房门前晒太阳，天热时也可以坐上它纳

凉。我也想有这么个小凳，问了问别人，说是："你找王俊文去，让他给你也做一个。"

"他会给我也做一个吗？"

"没问题，你去找他吧！"

原来，王俊文是原民勤县公安局的干部，会些木匠手艺，来四大队后，就当上了木匠。做个小木凳，也就是用些边角碎料，只要他高兴，一般都会应允。我找到木匠坊的门口，听见木匠坊里还有别人，他们正在闲谈，不知说到了什么事情上，只听王俊文朗声说道："现在我们嘛，一个个都成了童男子，真正的童男子！"我不禁听得一呆，脚步也停在了门口。王俊文听到响动，问道："谁？进来嘛！"我应声只好进去，说："你能不能给我做个小凳子？"王俊文果然爽快地回答说："没问题，过一两天你拿来，我给你做一个！"

因为他们谈论的是有关"童男子"的事，我无法插话，心里也有些好笑，说完话便立即退了出来。在好笑中又觉得有些凄凉，我们离家都已一年多了，归期安在？男子汉们都在思念妻子，思念儿女，对"童男子"的生活发出了怨声，可见思念之苦也在折磨着这里的每一个男子汉。当了右派还要经历把一家人活活拆散的痛苦，这是原来谁也没有想到的。生离死别，天各一方，这种对数十万右派分子感情和心灵上的挞伐，往往比政治上的沉重打击更难适应更为撕心裂肺。因为政治上的沉重打击猛烈地砸到每一个人头上的时候，虽然一时都也经受不住，但经过岁月的流逝，会逐渐习惯性地承受下来。哪怕是麻木不仁，也会逐渐地习惯下来。但是夫妻情、亲子爱，对于身处逆境的难友们来说却是须臾隔离不得的，快刀可以斩乱麻，同家人的缕缕情爱之丝，愈是相距千里之遥，愈是时日不断延续，其韧性与强烈只能与日俱增，谁也无法将其淡化扯断。男子汉们每个人的心都在滴着血呢！王俊文慨叹："现在我们嘛，一个个都成了童男子，真正的童男子！"正是对这里每一个男子汉心里积蓄了许久的郁闷愁苦的倾吐。

王俊文在说到"童男子"的话题时，声音响亮热辣辣的，这是他男子汉的风格，也是因为他性格坦荡。有些男子汉们即便心里有万般苦衷，也不会这样说话，把内心最隐密感情上最难耐的寂寞苦楚，坦率地说给伙伴听，这他绝对做不到。不要看这些男子汉白天干起活来如生龙活虎，能干得很！每当黑夜来临，妻子儿女来到了梦中，他会泪流满面，哽咽着倾诉苦衷，恳求妻子的宽恕，寻求短暂而又虚幻的欢情……

两天后，我拿到了王俊文为我做的小板凳。

再说，我和小徐到了四大队后，各自在一、二中队当了统计，工作性质一样，都住在中队部，随本中队工作活动，同一年前同住一屋，朝夕相处，就有了很大不同。平时，我们之间来往甚少。但是，在我俩的周围，又都出现了一批新朋友。我的新朋友，在本章已陆续述及。小徐的新朋友，有些也是我的老相识，如侍峒山、韩书谦等

人，跟她都是二中队的，来往自然就多些。一中队三组的蒲克仁、关维智、陈××等，因为住的离二中队队部近，有时晚上也到她那儿聊一阵天。此外，还有王杰生夫妇。王杰生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原是省化工原料公司搞物价的，妻子张露玲是公司营业部的出纳。1958年2月2日，王杰生作为光荣的下放干部带着大红花由单位上欢送着上了火车。最初是在安西四工农场作为下放锻炼，劳动了一个多月。突然，到3月30日，一纸公文下来，说给他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原工资待遇立即取消，改为监督劳动。十多天后，由四工农场改送到十工农场四大队劳动改造。不久，张露玲也被精简，失去了工作。全家人立即陷入困境。无奈中，两口子商量好把大的两个男孩送给王杰生在宁夏吴忠的哥哥，张露玲带着小三（也是个男孩），在当年中秋节前夕，风尘仆仆地从兰州来到十工农场四大队，全家人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小徐和张露玲相识不久，就为共同的不幸相嗟叹，同诉心曲，有着说不完的话，成了好朋友。

二中队种植的作物有小麦、棉花，三中队是蔬菜队，也种瓜。小徐和王杰生他们上地时路过三中队的瓜地，就一路用目光搜索，看到有熟了的瓜，趁别人不注意，一脚就把瓜蔓扯断，把瓜踢进地边的水渠里，然后再拾起扔进对面的棉花地。上工时，从棉花地里拾起瓜，几人享用。这年，小徐吃的瓜可比在场部吃的多多了。

一中队不种瓜，种的地与瓜地也不连畔，所以，我吃瓜就比小徐少多了。我和二位队长种的瓜，夏收时没派人看守，后来被过路的人吃得一个不剩，下章我还会写到。

此时期，在酒泉夹边沟农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挖排碱沟工程。此工程从新添墩挖起，经场部夹边沟，自西向东延伸，经20公里，最后将碱水排入鸳鸯池。排碱沟顶宽约七八米，深约三米多，渠边呈坡状，每六人为一组，包挖五米。此次挖排碱沟，还叫打擂台，各个组之间在进行比赛。边挖，碱水即顺沟而下，在挖到一米多深时，碱水淹到人的脚踝处，挖到二米深处，碱水就淹到膝盖处。由于前边挖得慢，碱水被阻隔，后边碱水就淹至腰部以上。沟里的淤泥，因沟宽，一次无法抛到渠上，在靠近渠边挖了二层台地，由沟底的人先用铁锹将淤泥抛到二层台地，再由站在二层台地上的人将淤泥转到渠上，渠上面两人用芨芨草编的抬筐装进淤泥，再用二米长的抬杠，将淤泥抬至五米外的地方。在这次挖排碱沟打擂台活动中，活重又十分紧张，每天都有人受伤，但无任何医药治疗。傅作恭在挖排碱沟时曾建议用杠杆原理:竖一高杆，搭上杠杆，杠杆一头放一铁筒或者大抬筐，一头系上石块，铁筒或大抬筐从低凹处取淤泥，压石块将铁筒或大抬筐轻松地送到沟上面，倒出淤泥，再将铁筒或大抬筐送至沟底，再取淤泥，再送至沟上面。这样会节省很多劳力。但没有文化的管教干部拒绝了他的建议，骂骂咧咧地说：“你们来这里就是脱胎换骨，改造自己的，还想啥省力气的办法，不行!”他因个头高，别人都无法和他一起用抬筐抬淤泥，在挖沟时只能泡在水里挖淤泥，坚持苦干。

10. 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四大队土地宽广，大田的建设整齐划一。当新绿的柔弱的麦苗将要遮盖住地面之时，无涯的大田里绿蒙蒙的，已不再强劲的和风轻轻掠过，飘荡起的是阵阵迷蒙的绿雾，越过经纬分明隆起在大田里恰似土黄色方阵的条条地埂，直向远方飘散而去。这情景，单纯，宁静，悠远，仿佛在述说着一个美丽的梦幻。我很愿忘记一切，沉醉在这不可捉摸的梦幻里，让绿色的温柔抚平心头的种种伤痛。

来农场一年，我经历了的，都是以前所未尝经历过的，苦难的揉搓使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苦难也使我成熟。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凡在炼狱里受煎熬的，其苦熬苦度的酷烈程度，绝大部分都超过了十工农场的我们。直到数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此时的我们比起普天下的受难者来，真是太幸运了。

去年此时，我在三大队还参加了麦田锄草。锄草前一天，大家先到库房每人领取了一个长把的锄头。有经验的人，在一堆锄头里，翻来覆去挑拣好使的，找锄刃锋利、锄头弯过来安装木把的部分的角度恰到好处，用起来才顺手。我对此毫无所知，有位工人小伙子代我挑了个锄刃锋利又轻巧的锄头。此时的我已深深懂得古人的教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平整土地时，一把锋利轻巧的铁锹会省多少气力。而且我也知道爱护工具，每天收工时，我也学别人的样，用地里拣到的石片、短树枝，把铁锹沾上发潮的土擦拭得干干净净。不仅我，我的几个女伴从地里扛回的铁锹都明光锃亮。

锄草比拿铁锹平整土地要轻多了，开始锄草时，因为手不顺，干一阵胳膊就疼得不得了。干了几天以后，甩动锄头灵活自如，胳膊也就不怎么疼了。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又出现了。这里农田周围的草丛里生长着一种蚊子，个头大，叮人很凶。我们锄地时，蚊子便成群结队而来，肆无忌惮地袭击正在挥汗劳动的人，每一个人的头脸胳

膊直到手和脚背，都是蚊子袭击的目标，蚊子将它尖利的针形口器插进皮肤时有刺痛感，你旋即注目看刺痛处，蚊子的肚里已灌满了鲜血，变成了殷红色，如你迅速拍去一巴掌，手下便会出现一小团血迹，用你自己的鲜血染红了的血迹，蚊子已丧生。而在大跃进的年代正大干苦干抢速度争时间的我们锄地是顶要紧的，驱除蚊子不能影响锄地的进度，这就很受苦了。

我最怕蚊子叮咬。记得1955年在天水农村采访时，那里蚊子多，我的皮肤对蚊子特别敏感，有一次蚊子在手腕上咬了一口，很快就肿起了一个粉红色的大疙瘩，竟大如手腕一般粗。有个农村医生大约因为我是记者，还特意打了一针青霉素消炎。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是，在天水田家庄采访时，夜里常有蝎子在房顶和墙上爬行，有时还会掉在床上，使我胆战心惊。那时，我和一位毕业于农业学校的年轻姑娘同居一室，她来自江苏，每天奔忙于田间地头。她推广玉米异株授粉，我还和她一起干过，眉户剧《雌雄花》里推广的技术，那时我就很熟悉了。这位姑娘工作上泼辣肯干，真想不到是位南国来的姑娘。我们同居一室，屋内支了两张单人床。这间小屋就在农家院内。头天夜里，我们都已上床，熄了灯。我听到墙上有窸窸窣窣不知什么虫子在爬行的声音，她听到后立即警觉地用手电筒照，啊呀，这一照我立刻看到了一只大蝎子！她利索地用一把长把的扫地笤帚把蝎子扫在地下，用脚踩死。蝎子用有毒的尾巴蜇人真是怕死人，这夜我心惊胆战，一直怕得睡不好。以后几天，也一直睡不好。有一夜，从房顶上降落及从墙上捕捉到的蝎子多达5只，有一只就落到了我的床上。每次捕捉踩死蝎子，都是那位姑娘干的，我显得很无能。

此一时彼一时。在三大队锄田时经受蚊子的袭击，凡是蚊子叮咬过的地方，都肿起了一个个的大疙瘩，胳膊手腕上的大疙瘩都连成了一片，又痒又疼，非常难受。我再也想不到人世间还会有这等苦楚，对蚊子的围攻竟莫可奈何。

有些男同胞们用纱布毛巾围在脖子和脸面上抵挡蚊子的叮咬，我把袖口紧紧扎住衣领翻起，也算是一种抵挡，可这样的抵挡又顶多少用呢？每天收工后，身体的疲劳已容易恢复，被蚊子叮咬后又痒又疼火辣辣的难受劲，令人心烦意乱。好在不久，我和小徐被调到畜牧组养鸡兔，才躲过了被蚊子叮咬的苦楚，再未遭罪。

来四大队后，我未参加过锄草。四大队一中队以种麦子为主，凭靠人力锄草不顶啥用，多次深翻过的麦田，除了骆驼刺，杂草很少。所以锄草在农事活动中无甚要紧。

在麦子齐刷刷地挺直了腰杆，大田里绿油油的麦浪不时泛起波涛之时，麦子已开始孕穗。为了让麦穗灌饱浆子实粒大，一中队组织强壮劳力进行收割前的最后一次浇水。我对于自己没干过的活有些好奇，在三组浇水时就讨了一份差事，给地里连续浇水不能回来吃饭的人送馍去。浇水是苦活，日夜连续干，有时也很紧张。食堂里做了

大大的白馍，按人数数个儿让我送去，自然我也有一份。

我找到了王昭他们浇水的地头，只见潺潺流水正向低矮的地埂围成的一方方麦田里流去，流满一方，便把地埂铲开一个小口，再向下一方浇灌。王昭告诉我，当流水徐缓地向麦田里流去时，要到处巡视，看地里是否有流水急速旋转，直向地下流去的情形，如有，就说明地里有窟窿，在流水旋转的地方急速用铁锹往下捣几下，把窟窿堵住。我下地时提着用炊事员的围裙包着的十来个大馍，也扛了一把铁锹。按照王昭的吩咐，我便在地边巡视着，发现流水旋转直下的地方，学王昭的样儿，立即用铁锹猛捣几下。大部分时间，我都和王昭一起巡视，边干活，边聊天。这活除出现意外的紧急情况，一般可以说是不紧不慢。此时，气候正宜人，不冷不热，时而有微风徐来。设若我们的思维还如两年前那样，稚嫩，单纯，无忧无虑，一无挂牵，这该是一幅绝好的田园风情画。然而，我们久经压抑的心境终究难以豁然开朗；由于我们对不可知的未来还有所期冀，又使我们无法游戏人生。尽管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总也聊得不是那么开心。

我们面前一方方的麦田终于自近而远都灌足了水，大渠里的水要改道，这就要把流向这边地里的水口子堵住。由大渠流向地里的水口子大，必须用铁锹铲起三四铁锹的厚土快速堵到水口子上，方能堵住。这需要猛劲，王昭自然一个人就干了，不需我动手。

当火红的太阳将坠未坠之时，满天彩霞。绿油油的麦田里一片灿烂，灌水的田里泛起了金光，被麦子婆娑的叶秆明明暗暗遮蔽着的水面上，到处都是美丽无比流动着的图案。这画中，也流动着我们珍贵的青春年华。

我乘兴而来，在这美丽的画儿里劳作沉吟，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黄昏，暮霭从天上轻轻撒落，先落到了麦田里，麦田变得暗淡了，绿油油的光泽在渐渐隐去，只有潺潺流水仍在不住地低语，如幽如怨如泣如诉。流水啊，农场的各种作物都靠你滋润补养，延续生命；你是一首不朽的乐章，为什么在你悠悠的生命历程里也会出现令人叹息伤悲的长调？古代的文人墨客常为“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而慷慨悲歌，在潺潺流水的低语中，我感知的，似乎是一种更深沉、更悲壮的内容。我忽然悟到了些什么。

在暮霭的飘落中，我独自扛着铁锹，从田间小路转到了行驶大车的土路上疾步而行。极目远望，天际还有一抹灰白色的亮光。

我想极力摆脱方才纷繁的思绪，连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也不愿去想得很清楚的那些纷繁复杂的思绪。人啊人，人为什么不能简单一些地去思维；人世间发生的一切，为什么就不能由人们自己把它想个透彻呢？

我还是尽量控制自己，不让乱如飞絮的思绪自由飘散，因为此时的我，深知在农

场已拥有的自由是何等的可贵，而这种自由也是绝对地有限度的。我要保护自己，最重要的还是思绪要定格，不能越雷池一步。我平静自己，心里却响起了一首歌：

在遥远的地方，
那里云雾在荡漾，
微风轻轻吹来，
飘起一片麦浪。
我是每日每夜里，
永远不断地盼望，
盼望远方的友人，
带来珍贵信息。

理智可以使我把握自由飘散的思绪让它凝滞，情感却不是任自己随意驱使的奴婢，这不是，它以一首歌儿的旋律回荡在心头，使我禁不住地也低声吟唱，悲凉哀婉的情调，由节节高亢的尽情抒发，到最终坠落在低低的叹息声里。这叹息无穷无尽，没有了休止符。我沉浸在这悲凉的氛围里，在暮色渐浓中，忽然觉得所有对亲人的思念，都化成了由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无尽暮霭飘落而下，使我沉重得喘不过气来。我真愿在这无尽的暮霭里失落自己……这世界为什么硬是给了我一个生存空间？万般无奈，万般痛苦！啊，渺小的我，我将怎样苦苦地挣扎下去哟！

刚才那首歌，是我初到农场不久时学会的。20世纪50年代的我，既做了年轻的母亲，又忙于工作，连学歌的时间都很少。到农场后，最初听武威步校徐保安、靳清义他们唱这首歌，觉得也能抒发些自己的离情别绪，跟着他们哼了几遍，也就学会了。他们在武威步校时，一个个青春年少，原来都是共产党员，在年轻人里属于拔尖人物，各方面都很称心，正意气风发时节，唱歌也很能抒发他们的军人情怀。十工农场接纳了他们以后，也许只有这首歌最能抒发他们孤独寂寞的心情，他们拣起了它，反复吟唱，而心境已和过去完全不同了。一场反右斗争的风暴使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友人，不会有哪个友人寄书信给他们。不过，他们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亲人，仍然情切切地日夜挂念着在农场受苦的他们。他们的亲人大都文化不高，不会用抒情之笔详细地写出他们的思虑担忧的心迹，写出他们无以言表的相思之情。此时我已得知，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是共产党员，党组织理所当然地要她和右派分子的丈夫在政治上划清界限，而她自己心里明镜儿似的，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受了大委屈，仍然把丈夫当做依靠，当做贴心人。在简短的书信往来中，她倾吐心曲，也只是表现在对丈夫的无微不至的关怀，问丈夫劳动能不能支持，需要什么不。她在信里讲的最大的“政治”，就

是提起那个年代对丈夫常用的一句套话："安心劳动，争取早一日摘掉帽子。"靳清义的言论，主要是说党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正如人的肌体上长了瘤子应动手术割掉，我们的党才能大踏步地继续前进。到反右斗争中，他的这些言论被歪曲为政治工作犹如人身上的瘤子应予割除。靳清义本人就是政治教员，原来的言论被歪曲得翻了个个儿，他有口难辩，就这样当上了右派。靳清义是独子，他无法向家在农村的高堂老母从信上把这一切说清楚，就只得向母亲隐瞒了真情，母亲压根儿没想到儿子会成为右派。那时下放农场劳动已为全国人民所知晓，老太太以为儿子只是下放劳动，虽隐隐约约觉得内中有些蹊跷，心里想这或许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儿子不提说，她也不能问，也不好往坏处想。对于20多岁就当了上尉军官的儿子，她心里只有骄傲和敬重，从来不向儿子提说什么，包括儿子的婚事。当了上尉军官的儿子的婚事还需她这个待在农村的娘操心么？

这天晚上，我摆脱纷乱的思绪仍很快入睡了。半夜里被尿憋醒。厕所在队部后面，要走过三组的宿舍，经过一个狭长的过道。我怕遇上男同胞，急急地把上衣长裤都穿整齐，才奔出房门。可一走出房门，就见地上月光似水，深蓝的夜空飘着大片大片像棉絮似的白云，这白云又似被一支大毛笔刷了几下，变得丝丝缕缕，由南到北飘散而去。我忽然觉得心里酸楚万分，疼痛不已。我远方的亲人，你们可知道，此时此刻，孤独的我是在怎样的痛苦中思念着你们。在深邃寥廓的夜空那一方，那个更寂寞更孤独的灵魂，一定也是在想着我的，男子汉的他，此时此刻，心里一定也很苦很苦，比我更苦……命运之神，你为什么如此残酷地撕裂我们流血的心？我不禁驻足而立，望着天上明亮的大半个月亮，心里发起狠来：月亮月亮，你如没有了光华，天上地下都是一片黑暗，每个受难者心里都混沌一团，该有多好！人如果倒退到猿，我们肯定就不会有如今的痛苦了。让我变做猿猴，变做戈壁滩上冰冷的石头！为什么我竟是个有感情、有思维的人，我还是个女人！天哪，天哪！

这瞬间的痛苦和思绪，是一泡尿引起来的，我又急急地奔向厕所……月光掩映下的厕所黑黢黢的，我一点没有惧怕，一边解着裤带，一边冲了进去。尿完尿，心绪似乎又有点安然，我躺倒在床上兀自又沉沉地睡去。来农场之后，生活之弓弦一直绷得很紧很紧，即使是愁肠万结，心绪再烦再坏，似乎也没有多少时间供我自由地支使，去自由地想啊想。人的生命意识竟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只要活着就行，只要活着有个既定目标就行。我就这样活着，我身边的难友大都也这样活着。现在清醒地回忆往昔的日子，我认为，其实这正是人的品质中应称之为坚强的那种东西。

夏收很快就要开始了，赵金恒向全队做了动员报告，宣布放假一天，让大家休息一下，做些准备工作。

去年夏收时，我参加了宣传队，到各队的地头唱歌跳舞，慰问参加夏收的全体人

员，也算是鼓舞斗志吧，受到大家的欢迎，也被有些难友羡慕。因为四大队离场部远，惟独没有到四大队来过。今年，形势变化很大，场里已不能组织宣传队进行田间鼓动。我们原宣传队的成员一个个都得参加紧张的夏收了。

在夏收前的这个假日里，每人都领到了一把镰刀。几个难友帮我挑镰刀，挑了一把最好使的。院子里放了一个长条磨石，有人帮我把镰刀磨得十分锋利。因为我既未用过镰刀，就更不会磨镰刀了。

我到三组的宿舍里转了转，看他们做些什么，只见他们多数人都在找出最破最旧的衣裤在缝缝补补，说是夏收最费衣服，穿好些的衣服就烂成破条条了。陈××还找出一双千补百衲的破鞋，在上面继续加补丁，说是夏收时千万不能穿好鞋，再结实的鞋夏收时也会让骆驼刺全剐破了。陈××补好了补丁，还把一双补了几种颜色碎布块的破布鞋穿在脚上试了试，看加了新补丁的破鞋是否还合脚。他担心因为补丁补得不平整又反复补过，影响鞋帮变形走路会夹脚。试的结果还可以。

“夏收时你最好在衣服上别上一苗针带上。”陈××又叮嘱我。

“带针干啥?”我十分不解。

“带针是为了挑刺，麦田里骆驼刺很多，防不胜防，每个人的手上都会扎上刺，带上针，随时都可以把扎上的刺挑掉。”

随时把扎在手上的刺挑掉，我对手上扎刺没有多少体会，只记得小时候妈妈的手上不知怎的从木头的门帮上扎了一根大刺，刺扎得很深，妈妈用针挑呀挑的，手上用针挑出了一个血糊糊的小洞，刺还未挑出，我看着妈妈吸着冷气龇着牙继续往血肉深处用针尖剜来剜去找刺的神气，真觉得太疼了。骆驼刺扎在手上大概不会有那么疼吧？但我仍不觉冒出了一句：

“哎呀，那多疼呀!”

屋里几个人都笑了。

王昭又接着给我上课。

“现在天很热，但不能穿短袖衣服，因为收割时麦芒不断在胳膊上刷来刷去，麦芒那东西十分尖利，不穿长袖衣服，一天下来，胳膊就让刷破了，疼得不得了。”

他还说：“明天，磨石要带到地里，镰刀割上一个小时左右就老了，再继续割就费劲了。你不会磨镰刀，如果看到我们谁在磨镰刀，你就赶快凑过去，我们就替你磨了。”

他的心真细，想得真周到。

第二天拂晓，上工的哨子吹响了，全中队除一组外，几十号人马都沿着通向东边大地的车路走去，队伍浩浩荡荡，队里的家属们三三两两走在一起，也加入到夏收的队伍中来了。“麦黄一时，绣女下床。”我突然记起编《甘肃农民报》时用过的一句

农谚。此时，家属如若待在自己家里不出工，真的就很没脸面了。

到了东边大地的地头，才看到一组的人已全部在地里，地里尘土沸沸扬扬，麦子已割倒了一片。手快的已割到了前边，身子脸面都被两边发黄了的麦秆遮挡得影影糊糊的，从地头只能看到他正在迅速前进的后背，留在他身后割过的麦茬整整齐齐不断向前延伸。留在稍后边的人，有前有后，也都在紧张地往前赶，没有人站起来伸一下懒腰。看到大队人马的到来，只有两三个人回过头来笑笑，说一声："你们来了！"说这话时，手中的镰刀仍在挥舞。

夏收是一场战斗，也是一场比武。我的难友们心里都装满了前途未卜的沉重，每个人仍愿意听中国共产党的话，在夏收中一显身手，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宽宥，从而得以被松开头上的"金箍"。我把头上的右派帽子称之为"金箍"，这是对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大不敬。然而，写到这儿，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景超的杂文《关于"抵触情绪"》一文中有一段说到"紧箍咒"，在反右的批判会上被认为"恶毒之极"，是"对党具有刻骨仇恨"的表现。而我们现在的受苦受难，比之杂文上被斥之为因"抵触情绪"而受冤屈者，不知又超过了多少倍。我们的痛苦，不正是有人随意地念动了"紧箍咒"的结果么？我拣来景超杂文中的一个词语，在几十年后描述我们当时的处境，心里仍酸楚不已。我只是觉得这个词语，比之官方语言所谓的"右派帽子"更切合我们的实际，更生动更逼真更通俗更大众化。四百年前的吴承恩让面目仁慈不明善恶的唐僧念动紧箍咒，驱使孙悟空在时不时地抱头喊疼中仍忠心耿耿地保唐僧的驾赴西天取经，是因为孙悟空在要命的头疼的折磨中也还有个想头，他想的是保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自己才能成正果，取得个自由之身，还回到花果山和众猴儿过他的逍遥自在的美猴王生涯去么。我真佩服吴承恩的大智大慧及其高招儿。心中却十分凄楚，为什么历史中的神话故事，竟同现实生活如此相似乃尔？这惊人的重复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扮演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路上的角色，竟是那样地有声有色而更其增添了许多悲壮，许多凄烈。唐僧和孙悟空是一对一，而我们是几十万人，况且我们的队伍还在不断膨胀扩充。

割麦子，我得从头学。

一开始，记得是王昭教我割麦。从队部来的几十号人马，很快就在几块地里摆开了阵势，每个人各占四行麦垄挥镰收割。我傍着王昭也占了四行麦垄。王昭用分解动作教我。他告诉我，割麦时，要先由右手用镰刀钩住麦垄里的一束麦，乘势用左手把这束麦拢住，然后，右手把镰刀略略向前放开接近地面，再使劲向怀中一拉，麦子就割倒了。右手在割麦时，要平平地向怀里拉，把麦茬割得低低的，尽量不掉麦穗。方法虽很快掌握了，因为手生，力气也不足，仍无法赶上王昭的速度。王昭干脆一人甩开膀子割了六行，只留两行让我割。他还叮嘱我："不要急，先掌握方法，手熟了自

然就快了！”王昭一向劳动上抢先，现时一人割六行麦，仍割在前面，我只割两行还觉得吃力，特别是膝盖生疼生疼。王昭一面割，一面继续教我，看见麦垄边一丛骆驼刺，他说：“对付这种骆驼刺，你只消用镰刀尖先把它割倒剜出，就不扎你手了。”说着，一个快速利落的示范动作使我立即心领神会，一目了然。遇到骆驼刺长在麦秆中间，夹在麦行里无法单独割倒取出的情况，他也自有其高招儿，先割几把没有骆驼刺的麦秆抓在左手中，用左手里的麦秆遮挡夹有骆驼刺的麦秆再割，骆驼刺还是扎不到手上。这样，我的手上始终没扎上刺。陈××让我带上一苗针挑刺，用王昭教我的方法，根本不用挑刺。

这一块大地真长，我望眼欲穿地看着前头，直想赶快割到地头喘口气，活动一下疼得不得了的腰腿。然而，几次抬眼望去，眼前都是一片金黄色，涛涛麦浪翻滚不已……我只割着两行麦子心里有些愧疚，总得尽力而为。头脸上的汗水随着镰刀的挥动滴滴嗒嗒地注入了黄土地，一滴大的汗珠会把黄土砸下一个深眼儿，眼镜片儿因汗水的不断蒸发而蒙上了一层雾气，浑身上下都被热汗蒸腾得燥热难耐。

大约20多分钟后，才割到了地头上，当人们先后伸直了腰，由蹲着改变为站立着的身姿时，一大块地里光光净净，只有两三个人仍留在地里匆匆忙忙地用芨芨草拧成的草要子扎捆刚割倒的麦子，并把它们大致收拢，摞成堆。

在走向旁边的第二块大地时，我和裴组长的老婆割在了一处。有了和王昭在一起收割的经验，她已毋须教我什么。但我的手仍笨拙，动作也麻利不了，她一定是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笨拙窘困，同王昭一样，便毫不犹豫地也替我割了两行，我仍然只割两行，同她一起前进。

到中午时分，我觉得疲劳已极，拖着两条疼痛的腿，同大家一起回到一组宿舍门前的小院里。大大的白馍冒着热气已盛在圆圆的大笸箩里摆在当院，每人一大碗葫芦烩菜。河西人把番瓜叫葫芦，而且是长得又老又大的葫芦，我从小最不爱吃这种菜。但重劳动后的辘辘饥肠，使我早就没有了挑食的毛病，吃什么都觉得香，夏收期间吃馍不限量，更使大家在狼吞虎咽中充分享受到填饱肚子的愉悦舒坦，蠕动在胃肠里的饭食滋润着无数根通往大脑的神经，使人们在这短暂的憩息中，脸上都绽开了笑容，心里乐开了花。有些人在咬嚼饭菜时随着嘴的开合不断发出响亮的“吧吧”声，有些人嘴里响声不大，咬进嘴里的大块馍在舌头的搅动中不时在左边的腮帮上凸起个大圆疙瘩，很快又滚动到右边的腮帮上，在舌头搅拌得吃力时，便稀里哗啦喝几口葫芦汤，喉结动了动，嘴里的饭菜便一下全吞进了肚里。这“吃”的交响乐，在默不作声只顾吞咽的大伙儿中间，又增添了几分热闹欢快。

突然，我发现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也在吃饭，他的吃相完全没有狼吞虎咽的气势，而是斯斯文文，不急不忙的样子。一问，才知道是来找谁搞“外调”的。

此人倒也是一副满脸欢喜的样子，我听到他对旁边的人不断地说："这里的生活真好，这里的生活真好！"竟是连声的赞叹！

我立即就理解了，他所说的"生活真好"，其中"生活"二字，只界定在"伙食"的范围，并无其他更宽泛的意义。而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心中还有点惊讶。一年后，当饥饿的触角已深入到全民族的每个家庭中时，"生活怎么样？"已成为人们相互间询问肚子是否能够吃饱的代用语，它作为那个年代特殊而又普及的问候语言，而存留在中国的历史中。

但，我对此人所说"这里的生活真好"，并未当做一个重要的信息而对待。后来我才明白，他的连声赞叹不正是告诉我们，其他许多地方的"生活"同这里大不一样，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我身处封闭的农场环境，在参加夏收中面对即将到来的又一个大丰收，要通过我们的双手即将获得的大丰收，真是再也想不到外面的世界又有了何等巨大的变化！景超在夹边沟农场忍饥挨饿曾使我痛苦莫名，此时，我想只是为了把到口的粮食抢收回来，那边农场一定也要让他们把肚子吃得饱饱的，就是地主老财也会这么做的。我哪里知道，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若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我麻木不仁，一点儿也没有从那位干部的口风里想得多一些，全民性的饥馑已悄然逼近，我的执迷愚蠢竟使我在那时仍未能把此情况看到想透。

我吃饭慢了一点，当我走到分配给女同胞们午休的房间时，只见大炕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的家属和小孩们都已沉沉大睡。一组刘志俊组长的小的孩子只有两岁左右，是由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带着的。孩子们的妈妈是个泼辣能干的女人，当然也参加了收割。只见他们母子三人都已沉沉睡去，两岁的孩子嘴半张着，身体斜斜地横着，一条腿还搭在妈妈的腿上。显然，她们一个个都疲累已极。我看着她们的睡姿，从心底涌出一种滚烫的感情，十分感动。她们都是多好的人啊，赵金恒动员夏收的报告，她们自己并未去听，只是自己的男人回到家中简单说了几句，她们就毫不犹豫全身心地投入了进来，还带上自己的小孩。当然，她们原都是农民，夏收意味着对全年辛劳的肯定，夏收绝对是一场战斗，她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在这种时刻只让男子汉们去流大汗出大力，她们于心不忍。她们即便仅仅是出于维护自己男人脸面的心思，也得全力投入。

午休后，收割的节奏依然紧张快速。才是第一天的收割，谁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整块地里，到处都是一片割麦的"嚓嚓"声，别的声息都被"嚓嚓"声淹没了。我拼上了命往前赶，却总也难以跟上旁边的人，好在很多人都帮我一把，有的人见我

落后了，便从前边把我割的四行麦捎带割去，我割到断行处，便空手走几步，再蹲下去忍住膝盖的疼痛继续往前赶，有的人和我同时往前赶着割，仍像王昭、裴组长的老婆那样，帮我割上两行，我并无落后之虞，有时一起还能说上几句话。

到下午收工前一个小时，赵金恒和刘鸿年把我叫去，一同去统计各组当天的收割成绩。我们一行三人到各组先根据割过的地块算出收割的总亩数，有些缺行断垄占一定面积的，要从总亩数中扣除。赵金恒手里还拿着一根约一米长的细棍子，在收割过的大田里随便扔出去，在木棍落处一米见方的地方数一数共掉了多少个麦穗，便是收割质量的参照系。我把各组的成绩都记下来，第二天还要在黑板报上公布，原来挂在队部的黑板报已挪到了一组的小院里。

当金黄色的麦田里已不再发出耀人眼目的光泽，沉甸甸的麦穗开始出现阴影，尚未完全褪尽绿色的长长的叶片以及麦秆杂乱的影随着镰刀的起落，已显得黯淡如丛丛野草，此时，收工的哨子才响了。

我回到一组的小院里，许多行动快捷的人已在大口吞咽着晚餐，一个个其乐无穷的样子。小院里燃烧着一堆冒着黑烟的野草，原来这里也有蚊子的侵扰，特别是到了夜间，烧野草冒出的黑烟是用来驱赶蚊子的。

这天晚上，除家属外，大家都挤在一组的宿舍里睡了，谁也没有回队部的宿舍去。我一人睡在地铺上。

第二天凌晨4时多，上工的哨子就响了。人们拥成一堆睡眼惺忪地向麦田走去，地上还残留着一抹月亮的清辉，天边的月亮只露着小半个脸儿。地上的坑坑洼洼沟沟坎坎都无法看得很分明。在田间刚走了一小段路，我便摔了一跤。我立即轻捷地爬起来再急急地走，就是走路也不能落到后面呀，走路慢了几步，到开始收割时就会差别人一截子距离呢。

这天中午，我提前半小时回到一组的小院里，在黑板报上公布头天的“战果”。我用白粉笔写出各组的成绩和受表扬的个人，还用彩色粉笔点缀上图案，画上花边，把版面安排得引人注目，大方好看。写好了黑板报，我才拿出盥洗用具，开始刷牙。这时，大家都收工回来了。一组的人拿出他们各自的脸盆舀了洗脸水，人们就三五个人成堆地蹲着围住一脸盆水，快速地用手撩起盆中的凉水在头脸上胡乱搓洗一顿，再使劲洗去手上黑绿色的泥垢。有的人用自己的毛巾擦拭头脸和双手，有的人连毛巾也没带，就着别人的毛巾抹一把也就罢了。此刻，脸盆里污黑的水已所剩无几，在院子里就地一泼，人们就又开始了午餐的饕餮，一曲快乐的就餐交响乐重又响起。

我慢条斯理认真地刷牙，引起了赵金恒的注意，只听他哈哈笑着说：“嗨，我们的和桑子的卫生讲得认真得很呀！”我抬眼望去，可不，全院子里，只有我一人在刷牙，紧张的夏收活动，已使男同胞们都免去了刷牙这一着。当然，赵金恒的调笑，并

不意味着我刷牙犯禁。我觉得不刷牙嘴里的味道最难耐，我仍刷我的牙，和最后的三几个人共用一脸盆水草草地洗了脸，用自己的毛巾擦了手脸。然后立即加入了午餐的队列。

紧张繁重的夏收，继续了一天又一天。膝盖疼痛逐渐减轻，以至不疼了。但体力的不支，却不像初到农场时由不适应而逐渐变得应付自如，长时间超负荷的重劳动，使我清晨听到上工的哨子声时不由得犹豫胆怯，心里七上八下，发愁新的一天的劳动将怎样收场。

二十多天后，酷暑使我的双脚生了脚气病，两只脚肿得像发面馒头，脚趾间烂得一塌糊涂，疼得厉害。有天夜里疼得觉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清早上工的哨子吹响以后，我坐在地铺上忍不住掉开了眼泪，赵队长见状，关心地走过来问："怎么了？"看见我的双脚肿成了那样，脚趾也烂了，我仍不住地掉眼泪，就催促我到大队部医务所去看看。

在这种大忙的时节请病假，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赵队长一再催促，我才起身回大队部。大队部的医生有两三个，此刻大都也下地收割去了，不知在何处。留守在医务所的医生叫薛明璜，是个年轻小伙子，也是我的难友，看见我一副疲累不堪的模样，他连声说："累坏了吧，一定累坏了，治脚气没啥药，只能补充一点维生素。"三十多年后，我在兰州自己家里，从电视屏幕上多次看到"脚癣一次净"的广告，声称30分钟就可以治好脚气，电视屏幕上起先不断发出痛苦的"哎哟"之声的汉子，一会儿把脚浸泡在药水里，立即变得喜笑颜开的形象，使我感慨万端。当时，我忍受痛苦已许多天了，每天还在酷暑中紧张夏收。"脚癣一次净"的发明却是在30年之后。那时，此药即使已经发明推广，也不可能出现在戈壁深处十工农场四大队的医务所。"脚气"算什么病？经费短缺简陋的大队医务所不会准备这种药。我只能忍受脚气的疼痛，拖着一双浮肿的脚继续走我自己的路。

薛明璜穿一件浅色的短袖衬衣，干净利落地坐在医务室里，等待有限的病人上门，过的完全是另一种清闲潇洒的日子。此时，我不禁有些羡慕他，正如去年夏收去二大队演出时，自己受到杨骁的羡慕一般。薛明璜用小纸片包了些维生素给我，还说："徐福莲也来开过药，说是病了，有什么病？不就是累了。"我觉得此人说话的语气刻薄，有揭短的意思。他对我们承受的劳动之沉重紧张缺少体会，所以才会轻松地断定小徐没什么病。

此后，我参加夏收便是断断续续的了，赵、刘二位队长对我的脚疼认为应该治疗养息，全队的工人、难友们看见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也是有点怜惜同情吧，都没人为难。这样，以后十几天的收割，我断断续续参加一些，到扫尾的几天，干脆就没下地了。

每个人挥汗如雨耗尽了全身的气力和精神劲儿。到后来，每当收工时最壮实攒劲的男子汉们也只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歪歪斜斜缓缓慢慢地走回住地，连欢声笑语也少见了时，历时四十多天的收割终于结束了。

前后四十多天的收割，大家都累垮了。过去办农民报时，听说陕西关中一带夏收都要求三天地净场光，收割打碾在三天内都要全部结束，所以每年夏收时甘肃很多“麦客”都要到关中去赶麦场挣钱。像十工农场这样连续大干苦干四十多天毫无歇息一味攻坚的做法，怕是那些最攒劲的“麦客”也承受不起。但，大家伙就这样干了下来。当时，安西县委有个领导张应虎到农场看了看情况，认为四十多天一点不休息太苦了，因为那时的政治口号已由“一天等于二十年”、“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如何如何，改为较缓和的“有劳有逸，劳逸结合”。大跃进的有些过火做法开始有了松动。而农场领导不以为意，总不能把到口的粮食抛撒在地里吧！

在此期间，一中队最大的损失是，我和赵、刘二位队长种的一畦瓜尚未成熟，就被过路的人摘吃了个光净，赵队长后悔不已地说：“错了，错了，我们原该留下两个上海移民老汉照看瓜田的，移民老汉割麦子不行，保住一畦瓜田，咱们大家不就都有吃的瓜了吗？那么好的一畦瓜，一个都没给我们留下，可惜可惜！”长势甚好的一畦瓜田最后竟没见到一个瓜，我也觉得遗憾至极。

在夏收的日子里，许多上海移民的孩子们都到地里去拾麦穗，他们拾来的麦穗不是交公，而是拿回到自己家里。在当时“一切为公”的形势下，自然有些不妥。但是，队上已没有人力可以有组织地去拾麦穗。对他们这种行为只好宽容地予以认可。这样，到了晚上，大凡上海移民的家里都出现了不绝于耳的“嘭嘭”声，这是他们无师自通地把麦粒从麦穗上敲击下来的声音。个别移民家庭在离开上海时，还挺有心计地带来了小小的手摇粉碎机，可以把麦粒粉碎成面粉。一天，我听赵队长说：“移民们能干得很，谁谁家（自然三十多年后我已无法记得他的姓名）有个东西能把麦子磨成面。”我好奇地跑去看，果然见到一个小小的铁物件，放进麦子用手不断摇动把手，磨出的面粉就缓慢地充塞在约一寸多见方的斗里向外溢出。像这样小巧的机械玩意儿，我在兰州不仅未曾见到，也闻所未闻。我不禁惊叹先进的工业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好处。这些上海人在上海过着怎样的生活啊，他们怎么会安心在这里扎下根来呢？

夏收后不久，二中队的上海移民中，竟出现了一桩惨绝人寰的事件，在全农场震动很大。有个叫陈尔云的上海移民，妻子滕菊英，他们共有五个孩子。他们从鱼米之乡来到戈壁深处的十工农场，自然觉得苦不堪言，在痛苦中竟做出了冒险的抉择，打定主意全家人都逃回老家去。他们只想到夏天气候热，无冻馁之虞。谁料全家逃出四大队的地面进入茫茫戈壁滩后，一望无际的戈壁使他们迷了路，带的水早已喝完，从戈壁滩上再也走不出来了。在酷热干渴中挣扎了两三天，滕菊英和孩子们都奄奄一

息。陈尔云在无奈中总算找路回到四大队，向领导说明一切请求救援。队上立即派人分头去找，可是等找到滕菊英及孩子们时，他们一个个早已死去。七口之家，一下子只留下了陈尔云凄凄惨惨孑然一人。20世纪90年代初，我和徐福莲回忆这一事件，徐福莲记忆犹新。她说："我陪着陈尔云流了不少眼泪！"当时，她的小女儿随婆婆已去了广东，她那曾是印尼华侨的婆婆是广东人，对故土有着特别的依恋，原先不远万里来到甘肃追随惟一的也是她认为儿女中最有出息的儿子，是想在儿子儿媳身边过上安稳的生活。反右斗争使儿子儿媳双双划为右派，老人无法再在永昌安住下去，只得回老家依傍女儿们去了。所以小徐陪陈尔云流泪是哭他人的难肠，内心里暗自悲伤的真正是小女儿已去万里之外的广东，自己前程未卜，对小女儿无论怎样牵肠挂肚也难以见上一面了。这种母女被活活拆散不得见面的痛苦，比之已隔绝在另一个世界同亲人永别了从而留给亲人的痛苦，究竟哪一种更加令人痛断肝肠？

再说，陈尔云一家那时只知道戈壁深处人们生存的艰难，生活的严酷，却根本不晓得将人们圈在这里的戈壁滩凶残暴烈的秉性。从古到今，它曾无情地吞噬了多少活泼泼的生命，已是无以计数了。

这一惨剧给所有的上海移民的心头都罩上了撕不开抹不去的巨大阴影。这也是我来农场后遇到的第一桩触目惊心的暴死事件。许多日子，我的心里老是翻来搅去的，难以恢复平静，孩子们的惨死，让人无论怎么想也觉得太可怜，因为我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9月，《甘肃日报》发了一条给全省首批右派分子摘帽子的新闻，字数不多，摘帽的人数也不多。我只记得其中有我中学的英语老师李端严，此时他在兰州大学任教。这条发在一版不甚醒目的短新闻，在我的难友中，俨然如一声春雷滚动在每个人的心头。人人争相传阅这张报纸，并当做最大的喜讯，互相转告。"摘帽"毕竟有希望了，回到人民的行列已指日可待！

农场肯定已收到有关的文件，不久后就要求对下放人员一一进行鉴定。这自然是一次非同小可的鉴定，它关乎"摘帽"。鉴定在各组进行，然后集中到中队进行平衡及文字上的修正定夺。

我对于首批"摘帽"未抱什么奢望。首先，我衡量了一下自己，从劳动上来说，男同胞们绝大多数都比我强，我虽也尽了力，总的来比较只是一般过得去。其次，我当右派是受景超的株连，作为夫妇右派，领导上按照当时的释义只会考虑其"反动"的性质要更为严重，因而会把我们的问题连带在一起，继续株连，绝不会优先考虑把我一人先解脱。所以，我在思想上比较冷静，没有太多的波动。再次，我也想到省上首批"摘帽"的人数极有限，农场步其后尘，人数也不会多，所以轮不到自己头上。

有些人并没有如我这般冷静，特别是有的人自认为劳动上拔尖，又是原共产党

员——比我等非党员要清白一等的人，为思虑这次“摘帽”自己是否有份，变得心慌意乱，坐卧不宁。一组的王永就属这种情况。一个休息日，他特意到队部和我谈心——大概和本组的难友坦诚地说话有某种不便吧，他的困扰全摆在了脸上。过分的希冀使他兴奋不已，害怕希望落空又使他忧心忡忡，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折磨得他十分痛苦。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划为阶级敌人已经两年的人，真是活得太可怜了，我们一个个都如坠入黑暗深渊奄奄一息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人，哪怕明明看见是一根稻草，也想抢先抓到自己手里争先活命。我只得从大局方面开导他，说这次“摘帽”的人数不会多，他年纪轻（比我小一两岁）劳动表现好，经常受到队上的表扬，估计此次优先“摘帽”的可能是有的，但人数既然少，不摘的可能也存在。农场“摘帽”的决定会在国庆节宣布，也没几天了，就安心等待吧！反正着急也没用。像王永这样内心着急、坐卧不宁的人，肯定还有不少。这是关乎我们每个人前程命运的大事，是领导上要求的“跌倒了要再爬起来”的标志，只有“摘帽”才能从屈辱的“阶级敌人”重新进入人民的行列，从而被称作“同志”，一切又将重新开始！真的，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儿，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毕竟有了一线曙光，谁又会对此无动于衷？

1959年的国庆节终于来临。这一天，我的难友们都以急切的心情，等待在庆祝会的盛典上宣布摘帽的决定。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宣布摘帽的在全大队只有两人，一中队的李永龙，二中队的一人，名字已忘记。李永龙是原民勤县公安局的干部，劳动上比较踏实，但不属于拔尖人物，所以他作为首批“摘帽”的人，很出人意外。当时，我的难友们都还抱着在较短的时期内争取摘帽的想法，语言比较谨慎，故对此也不多做评论。在全中队四五十个右派分子里只给一人“摘帽”，似乎只有象征性的意义，给大家兴奋的意绪泼了凉水。

场部所在的三大队，此次也只给两人摘了帽：一人是陈明，他从武威步校来农场不久，就来到场部三大队当伙食管理员，无论是大跃进的食堂化时期，还是此前此后，他都工作得勤勤恳恳，想了许多办法，把场部及三大队的食堂办得有声有色，伙食大为改观，这是有目共睹的。此食堂吃饭的人在千人以上，伙食办得好，还被评为全场的“红旗食堂”。陈明首批摘了右派帽子，这是情理中的事。但陈明对此反应平淡。他对自己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未服气过，从未承认自己反党。原共产党员的他，于1958年5月下旬送到十工农场后不久，立即给原单位领导写申诉书，提出充分肯定的种种理由，说明自己是一个正直正派的共产党员，从未同党有过二心。对农场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他尽心竭力一定干好干出突出成绩，是由于他认识到这是在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经受一场特殊的考验。他仍然凭着共产党员的良心和热情，任劳任怨地做出自己应有的奉献。对于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淡然处之，嘴里不说什么，

心里清清楚楚，他相信逆境会进一步转好，自己听毛主席和党的话没错。他就是要以共产党员坚定的步伐，把革命的路走到底。另一个是马思聪，他与大音乐家马思聪同名同姓，但却是土得掉渣儿的陕北人。他到十工农场后在汽车队开车。开车，不像我们下地那样苦重，手握方向盘驰骋在满世界，又是自由度多么大的工作呀！在三大队时，我和马思聪只有过遇面，从未交谈过，只听说他原来是张掖地区某运输公司的干部。就是这个马思聪，在领导上宣布摘掉其右派分子的帽子时，竟直言不讳地大发牢骚："我本来就不是右派分子，摘的什么右派帽子！"别人求之不得的"摘帽"，在他竟嗤之以鼻。又有哪个右派分子从内心里就承认自己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时，被首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在数十万右派分子中属凤毛麟角，人人只有庆幸的份儿，谁敢把内心深处的秘密公开道出！马思聪敢于说出内心的真话，也只是在他认为同样与他受冤屈的难友面前。他到农场以来，自由惯了，没有谁敲打过他，他觉得说出真话痛快，便痛快地说了出来。

当时，只有"摘帽"的指示，对"摘帽"后相应的对待，如工资等最实际最直接的关乎到本人生活及家庭的问题应如何跟上，并无具体措施，所以，直到我于1960年1月离开十工农场，摘掉右派帽子的李永龙还是李永龙，工资还是按30多元的生活费由我每月造表发给，数额并无任何改变。其他一切也没什么变化，他仍留在一组和大家一起劳动。

收割后的农事活动，主要是用大车把麦捆子拉到场上摞好。这来农场后的又一个大丰收，使或圆或长的大麦摞，一个接着一个，光是在一组东边的场上就有近二十个。我曾同场上劳动的人一起摞起一个个的麦摞，在摞麦摞的底层时，一手提一个麦捆按照既定的形状摆好就行，摆到一定的高度时，有人站在麦摞上指挥，下面的人用长柄木杈把麦捆送到需要的地方，由上面的人接住放好。此时，站在上面的人是有技术的"把式"，既要把麦摞摞稳防止歪斜坍塌，还要把麦摞摞得进不去雨水，有了雨水要顺顺当当地流下来。这种工作有相当的灵活性，不像割麦时要赶趟子，所以我能够胜任愉快。以后，摊场、碾场、扬场的全过程，我都参加了下来。以前，我下乡时听说扬场的技术性很强，还见到农民扬场是用特制的木锨来扬。这里根本没有木锨，大家全都用铁锨扬场，我学大家的样也用铁锨扬场，未曾料想还得到陶杰的一声赞誉："我发现统计扬场的姿势好看得很！"陶杰从我劳动的身姿发现了"好看"，还坦率地说了出来，使我十分高兴，毕竟我是正当青春年华的女性。我一面继续扬场，一面心里想道："原来，劳动着的自己还'好看得很'，陶杰你怎么就发现了别人所没有看见的，还要说出来！"我喜欢陶杰的坦率热诚。

后来，全队的人马又一起转悠在沙枣树林里，用了两三天的时间采摘成熟了的沙枣。采摘沙枣是为了收集沙枣子，为明年种植沙枣做准备。这是县上安排的任务。干

这种活，真如度假一般，大家说说笑笑，逍遥自在。略带涩味的沙枣，嚼在嘴里有几分甘甜，这对于一向无零食可吃的我们，也多少可以解解馋。收集回来的沙枣，队里用碾子碾过，取出子儿上缴，碾碎的沙枣泥，交给伙房夹在面团的夹层里蒸馍，自有一种酸甜的特殊味道，十分可口。我生平第一次吃上了这种用沙枣泥做的馍。

这个金秋的尾声，在我记忆里十分鲜活的，就是在采摘沙枣中手指间曾不断滚动着黄澄澄的沙枣，嘴里不停地吃着黄熟了的个大滚圆的沙枣。有时遇到沙枣味儿特别甘甜的一枝，左近的人还关心地互相让品尝比较，顷刻间便把缀有沙枣的枝条扯个精光。

就在本书完稿之前，我得知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有两个饥饿的难友在这一年里被残酷整死的事。第一个难友名叫郭斟玉，1959年3月，站上组织大队人马去酒泉城附近背头年晒干的草筏子以改良土壤。当时，早晨五点半起床时天还没全亮，站上用夹着谷糠的小米熬了许多稀米汤，不限量供大家吃喝。因米汤太稀，喝了不顶用，后来就有人想了办法。在地上挖个小坑，放上毛巾，把用饭盆端来的稀米汤倒在毛巾上，汤里的水分渗走了，小米和谷糠留在毛巾上。把滤过的小米取出，放在另外的地方，再端米汤倒在毛巾上，再滤出小米。这样倒几次米汤之后，就能滤出没有水分的小米，吃进肚里还顶点用。这种做法很快被管教干部发现，就将倒了几次米汤的郭斟玉抓住了，从他放在地上的短大衣里搜查出一堆滤出的小米。此时背草筏子的劳教分子尚未出发，当即将郭斟玉吊到了一间房子的房梁上示众。六小时后，吊郭斟玉的绳子断了，郭斟玉人掉到了地上，头颅变成了褐色，两个眼球被吊得突出，已气绝身亡。

第二件事发生在冬天。有个难友，因饥饿，从菜窖里偷了一个老番瓜、几个洋芋，晚上在屋后偷着煮，被到站上来的场长刘振宇发现，刘振宇大骂："像你这样偷，窖里储存的菜就叫你偷光了。"这个难友说："我就是偷了一个番瓜、几个洋芋，再没偷过。"刘振宇说："你还嘴硬，都像你这样偷，站上的菜窖还有窖的菜吗？"当即命令下边的管教干部脱去他的棉衣，只剩下身上的衬衣，用麻绳把这个难友捆结实，扔进一个空房子。然后，刘振宇扬长而去，回了场部。第二天，站上的管教干部心想他也就是偷了点菜和洋芋的问题，应将他放出算了。但是，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在一夜之间已将他冻成了冰棍，他哪里还能活着出来？

这两则令人发指的残酷罪行，当我们在丰收的日子里，放开肚子吃着白白的大馒头，连来此外调的干部都赞叹不已，认为"这里的生活真好"的时候，当我们游荡在沙枣树林里，自由地采摘并随意地吃着黄澄澄的沙枣的时候，我真是再也想不到在我亲人劳教的新添墩，竟然会连续出现把饥饿的难友用如此残酷的手段置之于死地的事件！这真是太出格了，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了，用"草菅人命"说明此事件最确切不

过。我的亲人挣扎于如此严酷的生存环境里，真是太难太难了。

有个原省监察院干部张雨沛，二十多岁，对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食不果腹，感到苦不堪言，常说怪话。管他的小队长姓孟，也是个劳教人员，常向上面汇报张雨沛为自己立功，并组织一起的劳教人员连续多次批斗张雨沛，使张雨沛感到前途无望，气恨已急。有天夜里，张雨沛拿起铁锹，把同室的六七个人在头上猛击之后逃跑。后被抓回，经酒泉县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个受冤屈的人，劳教中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逆反心理使他仇恨批斗他的人，拿起铁锹实施报复以至造成如此的结局，真是可悲可叹！

11. 1959年岁末的变迁

“十一”国庆节十工农场给个别人“摘帽”的举措，可说是给这个金秋留了个光明的尾巴。这只是一线曙光，这一线曙光因其人数太少而显得十分微弱，但总也是给闭合沉重的大幕掀开了一角。我的难友们谨慎而忐忑不安地注视着这一角里透进来的有限的光亮，暂时还难以预料这有限的光亮会给我们这些受难者带来多少福祉。我心里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怅惘，不断琢磨着这一角的光亮即使再加以扩展，对我们这些受难者又会出现怎样的前景？这几年政治风云的骤变与不可捉摸，使天真如我的心境不禁也阴云密布，我自然而然地从坏处去揣测不已……摘了帽子会让我们干什么？会让我们回兰州么？我会和亲爱的久别了的俩儿子生活在一起吗？噢，当然，我不会再去办报纸，伏案写稿，沿着农村的弯曲小路去寻访采访对象，在农家小院里和笑声朗朗的男男女女随意地说笑。那已是一个极遥远极遥远的梦了，它已永远地消失……真如俗语所说：“身在福中不知福。”当我以女记者的身份不断深入农村采访，同时，也有机会出入于兰州饭店的会议大厅，周旋于甘肃省委的书记、部长和甘肃的省长以及兰州的市长之间时，我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很平常，那只是我的工作，一切都是为了工作。我在工作上表现出色，表现突出，正因为如此，我才能作为《甘肃农民报》的代表赴北京参观，还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而今，我已是阶级敌人，所谓的右派分子，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不会再重现。记得在报社反右斗争后期的一天，我和与我同是“黑社”成员的牛华生一起劳动。牛华生无限感慨地喟叹说：“谁会想到我们能成为阶下囚？”据说全国解放前，他曾在《大公报》上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此种作为后来被认为是“小骂大帮忙”，而他毕竟“小骂”过。在鸣放期间，他对中国当权者并无微词，倒成了货真价实的阶下囚。如今我们成为阶下囚已两年过去了，我们两年来一切的努力，都是为

了摘掉帽子，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可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前景？眼前的现实步步进逼，使我无法对自己的处境作出西洋景式的幻想。

国庆节过后不久，四大队领导就宣布：我们的农场要迁到玉门县去。玉门县饮马二场要换到十工农场来，玉门县饮马三场则迁到原四工农场，原四工农场也迁到玉门县。饮马二场和三场都属劳改系统，是改造罪犯的农场。这次大换场，主要是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当时，中国的核建设和导弹基地向全世界保密。三十多年后，中国人民被告知，酒泉附近的导弹基地于是年秋开始建设，一条为导弹基地服务的专用铁路线也于此时开始秘密铺设。核建设和导弹基地的建设属国家最高机密，这样，对于酒泉附近的劳改农场里关押着的数千名犯人，就被迁了出去。为了保密，领导上就断然采取措施，决定对上述的几个农场来一次大的行动——换场。

饮马二场的人数、规模、耕地、财物等同十工农场大体相当，就决定同十工农场对换。十工农场的全体干部、工人、家属、上海移民及下放人员，还有农机具、车马、粮食和其他财产，全部由本农场组织运输，送到原饮马二场所在地。饮马二场的在押犯人、各色人等及农场的各种农机具及其他财物，则由他们农场负责运送。

在反右派斗争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①。按照新的统一部署，十工农场的右派分子，必须全部迁往安西四工农场所在地，原安西四工农场为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此次奉命也迁往玉门县，迁入饮马三场。饮马三场原是个罪犯刑满释放后就业的农场，人数、规模不算大，迁入四工农场。当权者认为将我等归置到刑满就业人员的农场最合适不过，我们的命运就被重新做了安排。

十工农场的领导接到迁场的指示时，最犯踌躇的就是如何安置好我们这些人。按照当时领导的统一部署，凡是右派分子一律迁往安西四工农场，同刑满释放了的前罪犯归置到一个农场。但是，此时十工农场从省上及河西走廊各县接纳的右派分子及其他戴了各种帽子的人员原来都是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根据本人的专长补充到场部及各大队担任了相应的工作，已成为农场不可或缺的干部人才，如场部的财务科，我的难友在其中工作的就有冯士伟（原省人民银行学校教师）、陆季智（原省劳改局会计）、汴国梁（原河西某县银行职员）、赵芝贵，还有马维琪——此人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了甘肃省农垦工商联合企业公司的总经理，《甘肃日报》曾以显著版面作为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突出报道。这些人按照决定如若都划归安西四工农场，场部财务科的大半边天就得掉下来。再以生产第一线来说，两年来我的难友们都已成为生产上的重要力量，其中有些人如我等的工资仍由原单位付给，十工农场只是无偿地使用其劳动

①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67页。

力为农场提供财富。再说我们这些人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具体情况，也都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此时，把我们这些人造个名单再转手交给劳改系统的农场，十工农场领导于心不甘，也于心不忍。当时，他们对劳改系统农场的情况比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迁去后没有好日子过。所以，迁场的文件在10月中旬就已下达，各方面的交接手续却迟迟地拖延了下来。

迁场决定在我们这些受难者之中的思想上也掀起了巨澜，议论纷纭。大家对国庆节只给少数人象征性地摘了帽子，绝大多数人各方面的情况一切依然如旧，心里有多种想法。有些人天真地说："公安部门是执法机关，我们转过去后，在'摘帽'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或许会有些好处，不会打折扣。"这种幼稚的想法，在当时就属不攻自破之列。当时，象征性地给极少数右派分子"摘帽"，不过是一个姿态，是为了表示他们说话算数，对右派分子还是宽宏大量的。1959年的国庆又是十年大庆，为了表示我们国家的强大，给少数右派分子摘帽也没有坏处。至于基层干部只有遵命执行的份儿，谁能打折扣，谁又能放宽摘帽的尺度？

又过了些日子，当首批劳改犯人在荷枪实弹的战士押解下，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那些劳改犯一个个形容枯槁的模样，令人吃惊。而此时，依然有人说着宽解的话："人家每月的定量四十七八斤，比我们还高呢！"听的人心里即便有疑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因为我们都是"祸从口出"，才落得如今的下场。对要我们去的那个农场，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我们还是不要忙着说它不好，以免到了那边又成为把柄，给自己招来麻烦。

就在这当儿，我来农场后第一次感冒发高烧。赵队长知道后，先到大队部找来了我的难友当医生的陈立荣，他来队部量了我的体温，给我打了一针青霉素，并给了些药片。这时已是下午了，我喝了药片，睡了。下午饭一口也不想吃，没吃。晚上，赵队长进屋来，帮我点亮了煤油灯，问我："怎么样？好些没有？"又说："不吃饭怎么行，干脆，叫灶上给你做些酸拌汤。"一会儿，酸拌汤端来了，我挣扎着坐起，喝了半碗，就再也喝不下去了。赵队长说："不想喝就算了，算了，早些休息，好好睡上一觉。"看我睡好后，他又把队里准备救济上海移民的灰色棉毯拿来一条，盖在我的被子上，然后，熄灭了煤油灯，拉住了门，走了。在当时的条件下，赵队长在得知我发烧后，立即找来医生为我打针服药，在我未吃晚饭时，又让灶上为我做酸拌汤——即把面粉做成疙瘩状，下成稠汤后调些醋，病了的人在胃口不开的时候愿意吃带酸味的，他想得都很周到。这事已过去了四十年，我仍铭记在心，清晰地记住了他照料病中的我的情景。第二天，烧退了，我的病奇迹似的康复了。

一中队第一批去玉门的，记得是一组马车队的。那一天，秋高气爽，天气晴朗，曹宗华身穿一件大红绒衣，路经中队部扬鞭启程时，情绪甚是高昂。他用长长的鞭子

打响鞭时，只在空中绕一圈，并不真的落在他的大白马的背脊上，他和大白马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们这些马车夫已训练有素，有的人打响鞭时，会最后轻轻地把鞭梢儿落在马的耳尖上，予以象征性的惩罚，让马儿心领神会。曹宗华的白马的耳尖是浅棕色的，十分好看，就是鞭梢儿他也不忍心落在马儿的耳朵尖上，他绝不让无辜的马儿忍受疼痛。和他同车走的，还有王永、罗惠湘、张稔年等难友。

终于，全中队的人分期分批各自出发了，有些人去了安西四工农场，有些人去了玉门。去玉门的是同饮马二场的劳改犯进行对调。据说在饮马二场附近有个村子叫黄花营子，十工农场迁到玉门后，便改名为玉门黄花农场。

我成为一中队最后的留守人员之一。

当赵、刘二位队长即将去玉门的前一天，我向二位队长交结了简单的经济手续。然后，搬出中队部，同徐福莲一起，搬进了大队部西头南面第一排的一间家属宿舍里。这间宿舍同我们原在三大队住的房子结构一样，外间有个不大的炕，我和小徐就住在这个炕上。里间较小，住进了一家难友。难友名叫路毓亭，山东人，原是高台县邮局的干部，他不是右派分子，不知因什么问题被送到十工农场的。他来农场后，妻子因为生活无靠，也来农场劳动，和他生活在一起，他俩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儿，全家三口人便住在里间。此时，全大队的主要人员都已去了玉门和四工农场，财产大体也已运走。我和小徐作为留守人员的任务，主要是向原饮马二场移交四大队的粮食。

原来，两个农场在迁场的双向运输中，后来认识到粮食的运输意思不大，把各自场里的粮食就地移交给对方，会省下一大笔运输费用和人力。我和小徐所做的事，就是把四大队库存的粮食用磅秤一秤秤称过后，记下累计的数目，作为向饮马二场移交的根据。

这样，我们就同饮马二场的人员打上了交道。饮马二场也派出两个人，同我们一起过秤。这两人都是劳改犯，其中一人有四十岁左右，说话带河南口音，有点多嘴多舌。另一人比较年轻，棉袄上套着毛蓝布的中山服罩衣，话少。另有两个罪犯是劳动力，他们把麻袋里的小麦一袋袋抬到库房里的磅秤上，称过后，由我们双方记下数量，再就近抬在库房里倒出粮食，腾出麻袋。这活当然很重。40岁的罪犯在这两个劳动力来了之后就交代："每天给你们加两个馍！"我心里想："活这么重，两个馍顶啥用？"可是，看那两个罪犯的样子，倒像是很乐意似的。半年之后我才有了体会，罪犯们乐意干这种活，是因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偷小麦。饥饿的劳改生涯，已教会他们在同粮食打交道的时候，学会偷窃粮食。强烈的生存意识，使得他们不得不这样干。这次在背粮食过秤的过程中，他们肯定偷了不少小麦。

我们的任务只是记下每次过磅的数目，自然就悠闲得很。那位多嘴多舌的四十岁罪犯告诉我们，他的那位年轻伙伴是上海人，因为诱奸幼女判的刑，他不无同情地

说："本来他也可以不判刑，说是幼女，其实也是大姑娘了。他是小学教师，学得好，在学校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喜欢上了自己的女学生出了事。关键问题是他得罪了校长，校长放不过他，原来可以不判刑的，结果就判了刑。"这位上海人语言谨慎，对他的伙伴情况始终没说一个字。

我们干这活虽不出力气，在一袋袋的小麦倒进库房之际，尘土满库房飞扬，弄得每个人都蓬头垢面，浑身都落了厚厚的土，真是脏极了，但也只有受着。

1961年，邹士杰副场长回陕北老家途经兰州，见到我和杨康、杜博智时就说过，迁场前，怕农场职工挨饿，向上级瞒了产。三十多年后，我听说，十工农场在此次迁场过程中，向上级隐瞒小麦达100吨之多，这就是邹士杰的聪明了。那时，他在安西县混得很红，有机会到各县参观，参与了一些评比学习活动，从而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眼见不少地方农民把树皮都剥吃了，一个个瘦骨嶙峋，面有菜色，这使他意识到严重的饥荒已在逼近。作为农民的儿子，如今的十工农场副场长，他认为不采取断然措施，自己农场的职工也会有挨饿的一天。所以经过领导班子的秘密磋商，统一了认识，在1959年的夏收前就秘密下达指示，让有关的队把相当数量的小麦不要上报入库，先秘密窖藏起来。以四大队一中队来说，就在夏收期间挖了深坑窖藏了几十吨小麦，这个深坑就在一中队东边一组附近。在迁场中，曾从玉门派来六七辆大卡车，于夜间开到窖藏小麦的地方，连续运了几天才运完。王培义当时就负责装车。曹宗华说，运到最后，坑底的小麦里和了土，他人已到了玉门，还返回来和赵队长一起用簸箕簸过小麦里的土。我作为一中队的统计，对这些情况竟全然不知晓。当然，从挖深坑，到从一组的场上将小麦拉运到深坑进行窖藏，这些活动我都不必参加，瞒住我是必要的。这100吨小麦到了第二年就比黄金还珍贵，因为它救了不少人的命。俗话说："粮食是宝中之宝。"而在通常年景，就是农民也难以认识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十工农场的这一举措无疑十分大胆，其重大意义要在一年后才见分晓。

在罪犯们到来之前，我们原来的宿舍都做了改建，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号子，原来的窗子都砌了高二尺左右的土坯，屋内的土炕肯定也是作了改建，使每间屋里能关更多的罪犯。每天上午，罪犯们排着队去农田干活，由荷枪实弹的警卫押解。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就这样近在咫尺地看着罪犯们去上工。

小徐在晚上工作结束以后，竟然还有心思到警卫部队的房子里去转悠闲谈。有一天她从警卫部队的房子里转回来告诉我："这儿警卫队的队长是从兰州来的，他说认识你哥哥，也认识你。"我在兰州的哥哥是个亲叔伯哥哥，名叫和温，比我大两岁，原来在兰州中学（后来的一中）上高中。1948年的暑假，哥哥有个同学找了辆大卡车邀同学们去榆中县兴隆山游玩，我也去了。在一天的游玩中，我和哥哥的同学有了接触，他们也认识了我。这位当队长的肯定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会是谁呢？我不知他的

姓名，以我现在右派分子的身份，当然我也不愿意去结识他。在这荒僻的农场里，整天同罪犯打交道的警卫们，见到两个从城市里来的年轻漂亮女性，一定很稀罕，也知道了我们的身份。而他们见到小徐仍忍不住热情地问这问那，以礼相待，以至那位队长竟说出他是从兰州来的，并认定我是他同学的妹妹。那时我容颜姣好，同做女孩时没有大的改变，他如瞥见过我，就不会看错，小徐主动去串门，他问个究竟是很自然的了。当然，直到离开四大队，我未去找过他。已是两个营垒里的人了，我如去找他，我认为太没意思。

此时，大队部也有少数留守人员。我们演眉户剧《雌雄花》时拉胡琴的许登浩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十工农场四大队搬迁中最后的留守人员，负责把大队应该装车运走的物资全部运走。当时同饮马二场达成协议，从饮马二场押解运送来的犯人下车后，由四大队利用原车装运本队的财产物资返回玉门。老许说第一批押解运送来的犯人有六卡车，每车大约三十人，车上用篷布搭在高高的框架上，盖得很严实，是夜里送来的。下车时，很多人都是从车上被推下来的，有些人被重推在地，身体沉重地倒在地上，不断地发出“妈呀”、“哎呀”的叫喊声！少数人还是戴着镣铐从车上推下来的，倒在地上时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发出的叫喊声就更是惨不忍听了。老许来十工农场近两年，哪里见过这等场面，直看得他心惊肉跳，庆幸自己总算没有落到此等地步。当时，他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两顶帽子，再前进一步同那些罪犯们归置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可能。在那个年月，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再说那些犯人们下车后，只要能走动的，都立即奔向附近的垃圾堆，从垃圾堆上拾起各种丢弃了的瓜皮，不嫌上面沾了土、苍蝇爬过无数次，立即就塞进嘴里大嚼，还有其他像烂菜叶菜根之类，只要他们能拣到的可食之物，都立即塞进嘴里填了肚子。这种饿疯了的吃相，使老许吃惊不已。

有一天夜里，还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犯人们都已下车，老许把四大队的财物往车上装，有一桶清漆约有一百公斤重，他一人无法抬上车，正准备找人帮助，留守人员中的刘多荣——此人是个青年小伙子、工人，在另一辆车那儿喊他，他就把清漆桶靠在墙边，走了过去。等老许到刘多荣那儿办完了事，再回到放清漆桶的墙边时，竟发现一桶清漆被犯人们用茶缸舀着喝完了。他大吃一惊，心里非常害怕，心想清漆有毒，喝后死了人咋办？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他找到劳改队的干事崔建国说明情况，首先告诉他犯人喝了清漆如果中毒致死怎么办？谁知那姓崔的不在乎地说：“死人没关系，管他呢！”老许又问：“一桶清漆没有了，我们没法上账怎么办？”姓崔的说：“这我请示一下大队的领导，明天早上告诉你！”老许因为怕犯人们喝了清漆后中毒出人命，夜里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老许去找姓崔的，一见面就着急地问：“昨晚死人了没有？”姓崔的很不在乎，轻轻松松地说：“死了两个。”老许又

问："是不是因为喝了清漆中毒死的?"姓崔的仍说："管他呢，反正是死了两个。"

崔建国犯了个错误，他把老许当成了同他一样的"同志"，对老许四五岁的小女儿特别喜欢。有时候，他还领上老许的小女儿到伙房里转悠。小女儿在伙房里跟着崔叔叔转上一圈以后，就把所见所闻向爸爸妈妈描述一番。小女儿说："给犯人们做的饭，和猪食一样，莲花菜的皮皮根子全剁碎了煮在大锅里，再和上杂粮面，做成糊糊，难吃得很!"小女儿其实并未吃过犯人的饭，她是只从视觉里感觉到，认为犯人的饭难以下咽。

老许看见，犯人们每天上午都是每人一个糜谷面做成的窝头，糠壳都和在窝头里，窝头显得十分粗糙。吃饭时，少数身强力壮的犯人还抢体弱无力没法保住自己饭食的犯人，体弱者连这和了糠壳的糜谷面窝头也吃不到。怪不得，垃圾堆上丢弃多日的瓜皮、烂菜都被他们拣去当做了美食佳肴。

此时，四大队的家属和职工宿舍先后都改建成了号子。有一天上午，老许看见从号子里先后抬出了五具死尸。死尸都裹着死者的被子，用草绳在尸体上中下的部位各捆了一圈，用一条长绳在脚上捆紧以后，由四个犯人拉到河滩的空地去埋掉。等老许最后离开四大队时，河滩上已成了一片坟地。

而我是在三十多年后才耳闻这些悲惨可怖的事。

我和小徐终于完成了向饮马二场移交粮食的任务。12月底，我们把全部的被褥行李箱子等包扎停当，冒着严寒，坐上了去玉门黄花农场的大卡车，在玉门镇的小旅店里住了一宿，然后又驱车三四十里路，直达原四大队在黄花农场的所在地。

没想到，先我们而来的工人、难友，都对这里的一切叫苦不迭。首先是气候严寒，比十工农场冷多了，人人都叫喊"这里是干冷干冷"，见了我们说话时都有点唏唏呵呵的；其次是水土不服，这里只有井水，井水带咸涩味，凡是来的人都有一段拉肚子的经历；第三，这里的伙食大不如前，在十工农场时，每到秋冬之际，各大队都要窖藏大量的冬菜。迁场是几百里路的长途跋涉，无法把冬菜运来。黄花营子的农民只储备自己过冬的蔬菜，对这样大量迁入的人员的蔬菜需要无法供应，即使有少量出售的蔬菜，价钱贵得也非我们的食堂所能承受，这样，食堂只有少吃菜或不吃菜，油和肉的来源几乎没有，伙食只能降低标准。我和小徐初来乍到，自然感觉更是明显。

已是冬闲时节，我们被告知，休息几天再说。

第二天，我拿出在四大队时就裁剪好的棉上衣用手工缝制。这是一件绿底大黑格子布面的对襟棉袄，面料是在四大队时步行三四十里路在县城买的，我觉得很雅致。我小时候学过一点针线活，在偏远的农场，找裁缝制作又得花好几块钱，而且未必就能裁剪合身。这样，我就自己动手裁剪，在四大队买了一斤多棉花，来这里没别的事就自己动手缝了起来。我从兰州带来的旧棉袄是花棉绸的，已经又穿了两个冬天，得

换一件新的了。

就在我坐在男同胞们的大炕上缝棉袄时，杜博智突然来访。他在另一个大队，先我们来黄花农场已好多天了。他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听说我已到达，就利用休息日立即来访。我们都喜出望外，叙谈了分别近一年来的各自情况。当然，我一直未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杜博智回去后，灶上饭已吃过。炊事员为一些未吃饭的人重做饭时，杜博智也学着切萝卜，不慎伤了左手食指梢，至今伤痕仍清晰可见。我应留他吃饭，到四工农场后曾向他表示过歉意。

谁知，两三天后，杜博智、小徐、我，还有其他几人，突然被通知，做好去四工农场的准备。

我们只能遵命。暂时还无法知道此去吉凶如何。新迁农场的严寒、水土不服、伙食水平下降等等，使我对此处不留人也觉得无所留恋。

30年后，我再次见到邹士杰。邹士杰说，当时他们已决定把小徐和我都留在黄花农场，但四工农场领导上听说有两个女右派在安西县城几次演出，我俩的名单在送去的花名册上经查找没有，便紧追不舍，黄花农场最后只得放人，在我俩已到黄花农场之后再送往四工农场。谁也想不到，我俩几次上县城演出，最后竟落得这样的结果。

此次再返安西，我们同车只坐了不到十人，大卡车上装了许多要运往四工农场的乱七八糟的物件，人们稀稀拉拉地坐在凹凸不平的各种物件的空档处。已是“三九”的严寒季节，一路上茫茫大雪，使气温又骤然降低了许多。深夜，大卡车还顶风冒雪在戈壁滩的沙石公路上行驶，后来偏偏车又出故障抛了锚。气温大约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车厢上蒙着厚帆布的篷布，车厢里的我们，一个个都冻得蜷缩成团。我紧紧地裹着皮大衣仍觉得寒冷难当。小徐又找出一件御寒的衣物盖在俩人的腿脚上，腿脚仍冻僵了。而同车还有一位难友的家属和她两三岁的小孩——他们衣着更单薄，没有皮大衣，我真不知道在这风雪之夜的严寒里，他们母子是怎样苦熬苦度着这难耐的分分秒秒。在深夜的严寒中，大家都无法安静下来，一声声的长吁短叹，不断的呻吟，弥漫在整个车厢里，但无一人说话，无一人叫苦，因为叫苦就是对改造不满。有好几辆夜行车从我们的车身边呼啸而过，每当此时，大家都抱着希望呼喊求救，请过往的车辆把我们的车带上一程，但得不到回应。过了大约一两个小时后，总算有一位司机停下车来。他也许是听到车上有小孩，再加我们男男女女的求救声中已带着绝望和哭腔，车上的人会冻死在戈壁滩上的悲惨前景，终于触动了他的恻隐和同情之心。他停下车后，我们的司机立即要车上的人找出一条粗粗的大麻绳拴在了那辆车的车尾。

车，才又前进了。夜宿玉门。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我们抵达四工农场。大卡车停下来以后，我和小徐冻僵了的腿脚既疼痛又麻木，无法从车厢里站起来，坐着活动了好一阵，才勉强下了车。在

场部报到后，杜博智分到了一站，我和小徐分到了二站。场部为我和小徐找到一辆小毛驴拉的架子车拉运行李和箱子，我和小徐跟在车后踏着厚雪走了约二里路，便到了二站队部。二站的队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陕西人，名叫王智礼，人们以王队长称呼他。

小徐和我的临时住房是个库房，里面堆放着难友们除被褥、饭盆、洗漱用品以外的财物，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箱子、提包、包袱等。看来，这里的居住条件比十工农场差。在十工农场，难友们的这些东西都放在各自的宿舍里，取用都很方便。

小徐和我在这里临时居住，似乎受到了一点优待，库房里腾出地方支了两张木板床，还在窄窄的通道里，安了一个小小的铁皮火炉，炉子的烟筒直直地从屋顶的草笆子上伸出。

我们原在十工农场三大队的二位女伴：石天爱和王桂芳，此时又在何处？我们不得而知。老殷和小李都不是右派分子，按此次迁场的政策规定，她们不必来四工农场。

过了几天，先是来了王桂芳。原来，此次十工农场借迁场的机会，让有些右派分子回家探亲，王桂芳回安西县城的家自然十分方便，就回家住去了。石天爱则请假直奔天津，去天津看望她日夜思念的母亲去了。因为路途遥远，到王桂芳来四工农场时尚未归来。

初到二站时，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由于我们的居室堆放了难友们的箱子等物，地上连插脚的地方都很紧张。一次，我一抬脚竟没注意到把小火炉弄翻了，火炉一翻倒，连在上面的铁皮烟筒也从房顶上落下，摔成了两三截。我费了很大劲才将火炉重新安好。此时，我对四工农场的一切，还以在十工农场的眼光看待。后来，我随意地将此事笑嘻嘻地向王智礼说出，王智礼的脸上也挂着笑，但他说出的话却使我吃惊不小，冷彻骨髓。他说："你如果把这库房点着了，我要判你十年徒刑！"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把判徒刑跟自己连在一起加以评说。原来，这就是四工农场！

过了两天，我和小徐都参加了劳动。活，依然是平田整地。所不同的，这里使用的都是圆头铁锹，木头把很长，没有了独轮小车，需要推土时，用架子车代替。活不紧不慢，小徐和我都已应付自如。在这儿一起劳动的，都是清一色的右派难友，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同在十工农场时的气氛也差不多。难友中也有被任命为小队长来管理劳动的，记得其中有欧阳夏、尚正。欧阳夏是原省劳改局的干部，尚正是原服务厅的。尚正正是初到十工农场时，一武威民工嫌他干活没劲数说于他，反被他予以一顿痛斥之人。他当时心气很盛，说年轻工人："小伙子，你的那一套，我半年就能赶上，我尚正的本事，你三年也学不会。"现在，他被任命为小队长，肯定，在十工农场时劳动上已拔尖。我和小徐都是女性，在劳动中多少受到一些照顾。

只是这里的伙食，同十工农场就没法比，差得太多了。面条很粗糙，可以看出和的有麸皮，蒸的馍馍很大，样子有点像如今的长形大面包，麸皮更多。一次，我同在十工农场一起演出过的兰生玉说话，不经意地说了声“麸子馍”，兰生玉竟连忙纠正：“我们说话还是注意点好，以后再不要说‘麸子馍’了。”兰生玉是武威定的右派，善演秦腔里的青衣。他这么谨小慎微，对我是个提醒。1991年秋，我重访高台县，遇到了原在十工农场和四工农场的难友阎廷梁，无意间打问起兰生玉的下落。阎廷梁说，兰生玉在1960年曾同他一起迁到高台县碱泉子劳改农场，当年大饥馑已在全国蔓延，到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做出“抢救人命”的决定，因为各种原因送农场劳动的人员，全部“抢救”回原单位。阎廷梁由于家和原单位都在高台，工资没取消，生活条件略略好于别人。他用高价向劳改犯买了个饼子去看望兰生玉，而兰生玉已在几天前住进“病号”室，把门的不许阎廷梁进去，阎廷梁只得遗憾地走开了。

过了些日子，石天爱终于姗姗而来。她这次回到天津，仍没有告诉母亲她当了右派，她母亲最操心的还是她的婚姻大事，还托人为她介绍对象，找了个某单位的人事干部同她见了面，俩人还一起走了走，最后被她托词回绝。她和表姐妹说起反右派斗争来，她故意问：“如果我是右派分子，你们会怎么样?”回答是：“坚决同你划清界限!”当时，反右派斗争的余威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被蒙在鼓里，她的表姐妹当属此种情况。

石天爱一身褴褛回到母亲身边，一定使母亲伤心万分，所以在此次返回农场之前，她母亲特意为她置备了足够的御寒服装，她已装备一新。新做的丝棉黑布面棉袄宽宽大大——这是为了适应农场艰苦的劳动生活，棉袄里面，则是真丝深蓝织锦缎面的狐皮背心。光是上衣，应付安西的酷寒就很可以了。她那断了腿的琇琅架眼镜，想必一到天津就换上了新的。

我和小徐在十工农场一向受到照顾，此次换场，我们作为留守人员移交粮食远离场部，却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探亲机会。当时，场部的有些难友都获准回了一次家，如杨康回到兰州，还到我父母家里看了看。在四大队，这一程序却一律免去。当然，我在十工农场一直没考虑过去兰州探亲，其主要原因是我的经济状况无购买来往火车票的能力。在玉门期间，离酒泉只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去一趟搭顺车也能办到，可我竟然也没动过去酒泉看望景超的念头。据说当时四工农场不断向黄花农场要人，四工农场曾指出我们的名单还未送过去，催促不已。黄花农场被催不过，只好答应将我俩一并送往四工农场。可我们已到了黄花农场，对这些情况不明就里。适值严冬，我人已到了黄花农场，根本也没想过还会离开这里，也不知道有些难友回家探亲的情况。唉，唉，我真傻，真傻，如果我那时能见上景超一面，对他的艰难悲惨的境遇有了真实的了解，知道他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我会想到有一天他那脆弱的生命会难以继续

……当时，我如果见了他一面，知道了这些，我会不惜一切为挽救他的生命想尽办法的。说实在的，这是直到三十多年后我才具有的清醒意识。我好悔啊！

春节后不久，我们见到了一位重要的远方来客，他是小徐的丈夫梁富杰。梁富杰是1959年秋第一批摘了帽子的。他人极聪明，专业上是尖子，当了右派后，由于工作需要，已调到了兰州，在省煤炭局。领导上考虑到他头上有顶右派分子帽子，使用起来到底也不怎么方便，况且他还具有华侨身份，他父亲此时还在印尼，这种种因素，促使单位领导早早地给他摘了帽子。这样，他就立即请假来到分别已近两年的爱妻身边。小梁头一天先到二站，在站部办公室的单人床上住了一宿。第二天，小徐工作调场部，他们便一起搬走了。

而他俩到场部后的境况极为凄惨。场部为了照顾他们的夫妻关系，说是有一间空屋让他俩住，他俩去一看，原来是一间空马棚，地上潮湿不堪，屋内马粪尿臭气扑鼻，地上用砖块低低地搭了一个大门扇，看来就是为他俩准备的床。小徐见状不由得掉开了眼泪。当时她的顶头上司杨振英也在场，有些看不过眼，后来就打发来几个在场部干杂活的刑满就业人员——那时美其名曰“职工”，把马棚又认真打扫了一番，小徐两口子才算安顿了下来。他俩吃饭也在“职工”灶，场部干部和正式工人另起灶。以我们在二站的经历就可想见他俩当时伙食的恶劣，小徐已习惯于这种恶劣的伙食，梁富杰一直在机关工作，哪见过这样的伙食，不禁为妻子经历的苦难之深重难过万分。俗话说“久别胜新婚”。他俩相见时的欢愉，因了这几日经见的种种都出乎意外而变了味。特别是那些遇见的场部“职工”个个瘦骨嶙峋、面容枯槁的样子，更使梁富杰意识到妻子处境的险恶。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过了几日，场部有人意识到摘了右派帽子的梁富杰毕竟是国家干部，应该区别对待。这样，才准许小徐到干部灶打饭吃，他俩才吃上了像样的饭菜。

梁富杰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他带来不少食品，也送给石天爱、王桂芳和我每人几块糕点。这在当时就是很稀罕贵重的了。

小徐调场部后，就传下话来，说是二站男女混杂，要把我们几个女右派都调到场部。这所谓的“男女混杂”之说，我听了就觉着反感，我们在十工农场近两年，都和男同胞劳动生活在一起，大家亲密无间，谁也没说过“男女混杂”之类的混账话，怎么到了这儿就成了问题呢？当然，我也已意识到去了场部政治上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当王智礼说起要调我们去场部时，我谨慎地表示：“还是留我在二站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没有立即服从命令去场部。

还在梁富杰来农场前，王智礼就曾拿来一本眉户剧《梁秋燕》的脚本，让我抄写，说是准备排练。其实四工农场的领导上早就摸清了我的底细，知道我在安西县城几次演出，还演过眉户剧，也清楚原十工农场我的难友们人才济济、文艺演出班底很

厚。他们向黄花农场追要我和小徐时，可能就考虑过今后安排文艺演出活动。四工农场的刑满就业人员纯系男性，没有女性是无法组织文艺演出活动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省劳改局曾把在押的犯人中的京剧名角挑选出一部分，组织正规的演出。为此，还专门在省劳改局附近修建了一个名为新兴剧院的剧场，曾多次举办专场演出，在兰州市引起轰动。记得我也曾去看过一次呢。四工农场属劳改系统，干部们对此事想必更清楚。他们不指望别的，在农场内部组织演出，活跃一下文艺生活，向上级汇报上去，也可以算作一项工作成绩。所以，我到二站不久，王智礼就布置抄写眉户剧《梁秋燕》，并宣布该剧要准备排练和演出。这当然不是作为队长的王智礼所能决定的，他只是执行人。

由于排练眉户剧《梁秋燕》，我们在二站又继续住了些日子。20世纪50年代，眉户剧《梁秋燕》曾风云一时，陕西人曾有“不看《梁秋燕》，枉在世间站”之说。全剧是描述一对农村青年男女冲破封建买卖婚姻的桎梏，喜结良缘的故事。对眉户原来已有的各种曲调大都作了创新改造，全剧格调清新，旋律优美，地方特色很浓，反映了那个年代农村的新人新事新生活。我还在甘肃日报社工作时，有一年春节过后，记得报社曾邀请兰州郊区雁滩的农民业余剧团演过一折眉户剧《梁秋燕》，剧中的主人公梁秋燕与同她相爱的小伙子春生都同时出台。我对这个农村业余剧团的演出水平很赞赏，觉得演梁秋燕的农村姑娘和那位小伙子都有些才气。

没想到，现在我在当了右派之后，竟有了饰演梁秋燕的机会，而且是演出全本的《梁秋燕》。我在抄写了《梁秋燕》中几个主要角色的唱词及对白后，告诉王智礼抄写完毕。然后，场里摸了一下情况，指定仍由田禾担任导演，演出班子很快就定了下来，几个主要演员都由我的难友饰演。我理所当然地饰演梁秋燕，春生由省劳改局的王全禄饰演。王全禄是庆阳人，庆阳与陕西接壤，当地人说话同陕西近似，王全禄本来也善唱秦腔，只能由他饰演春生了。我那小伴儿王昭因不是右派，此次未能来四工农场。梁秋燕思想守旧的父亲，由省供销社的柳新民饰演。他原是15级的干部，在难友中级别较突出，岁数也较大。他是陕西人，念唱俱佳，看来他人很聪明。饰演为梁秋燕、春生作主，支持他俩婚姻自主的地方干部，也是原省供销社的干部。其他群众演员，都由三、四站的就业人员担任，他们大都是陕西人。有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还扮演了个年轻妇女。他说，他哥哥在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是我认识的一个熟人，他是因为打人被判处二年徒刑才刚刑满不久。这小伙子虽然眉清目秀，岁数也小，毕竟是男子汉，唱腔对白声音很粗，一亮相就认出不是妇女。同他相伴的还有个二嫂子，我看王桂芳可以出演，就建议让王桂芳担任。小徐因为是浙江金华人，眉户剧跟她不沾边，所以此次演出没有她。

角色大体定下来以后，我们就紧锣密鼓地排练起来了。

我虽然原来就饰演过眉户剧《雌雄花》中的主角，《雌雄花》毕竟是为适应形势需要粗制滥造的脚本，创造角色发挥的余地不大，但是在排练过程中，我学到不少东西，如戏剧里的走台步，念、唱、做的种种招式，在田禾的指点下，我已有点掌握。《梁秋燕》在全国已是很有影响的名剧。由我来饰演梁秋燕，我同田禾的合作已是第二次了，我们配合默契，我沉浸在饰演梁秋燕的艺术创造中，得到很多乐趣。我觉得饰演春生的王全禄尽管念唱做都行，但在感情的表达上没有完全进入角色，感情交流不够。田禾也说："王全禄赶不上你的小伴儿（指王昭）。"确实如此。

田禾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时，他住在队部隔壁的三组宿舍，我们就很熟。有一天晚上，他来到队部和我闲谈，闲谈了一阵，他声音低沉痛苦地说道："就是把我的骨头榨成油，也找不出反党的成分。"他是把我视为知己，才这样表明心迹的。但我为了谨慎起见，没敢对他的话作出回应。我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有反党的一丝一毫？这我自己清楚。那时，田禾发挥他善写美术字的才能，写了好几条标语口号式形状各异的装饰字画，贴在三组的墙上，以激励大家的干劲和革命热情，其中有一幅呈椭圆形的字画，上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时，三组宿舍住的全都是右派难友，墙上贴如此的字画，"风流人物"何所指？显然不是指外面世界的什么人，而正是指这些难友。在他的心目中，右派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来农场后的冲天干劲，更是对他们自身的最好说明。难友们受到激励，心中自是高兴，而并不加以议论。

再说四工农场的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陕西人，他们的家属也多是陕西人。当然，他们知道《梁秋燕》的魅力。他们在向黄花农场紧追不舍索要我和小徐的时候，就已打定主意要我们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为他们演出，也许，那时就已决定要排演《梁秋燕》，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县上演过眉户剧。这些干部平时一个个威风凛凛，而管教劳改犯及就业人员的工作单调刻板，他们也会感到寂寞乏味无聊，他们的业余生活需要调剂。现在，一台全本的《梁秋燕》就要演出，他们其实也很高兴。

说话间已到了春节，我们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场部的会议室里，这只是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房间的一头搭起了幕布，我们就在幕布后面相连的一间办公室里化装换衣服。我们的原化妆师李佐亭因历史问题留在了黄花农场，我们得自己化装，效果就差多了。时值隆冬，办公室有火炉，倒也不觉得冷，因为剧中的季节是春夏之交，我们全换上了单衣。

不必说我自己，全体演员都卖力地演，经过多日的排练，大家都认为这是展示自己才艺的一天。凡是进入演员队伍的，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爱好和才能，谁也不愿把戏演砸了。《梁秋燕》演完后，小徐和她的搭档钟贵祥又演出了他们去年在十工农场用黄梅戏《夫妻观灯》形式改编的歌颂公社化后新气象的小歌舞。

然而，这是一次最冷落最窝囊的演出。观众主要是场部的干部和家属，他们安排了这次演出，只是想调剂一下自己乏味无聊的业余生活，可他们仍牢牢记住要跟作演员的我们划清政治界线，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一个个做出一副至尊至贵的姿态，不屑于对演出表示欣赏，直到演出结束也没有人鼓一下掌，只是转身就走，作鸟兽散。我们一个个卖命地演，最后只是自我欣赏罢了，心里自然是不痛快极了，可是还不能说什么。我们真像是旧社会被迫在权贵们面前演了一出堂会，这种场面以前只是在电影戏剧小说里见到，而今，我自己竟然真实地扮演了这个角色。过去演一次堂会，演员通常会得到赏赐，而我们尽管肚子饥饿，连一顿夜餐也没有，演完，只是默默地各自打点行装走几里或十几里路回自己的宿舍。

这次演出的遭遇，也使我再一次清醒了一下头脑：这就是在四工农场，前两年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1960年3月，一幕惨剧又在酒泉夹边沟新添墩发生了。此时，新添墩组织劳教人员到酒泉城附近背头年晒干的草筏子，早晨五点半就起床，用芨芨草编的背篼去背。背到第五天，傅作恭因拉稀背不动了，后来成为著名美学家的劳教分子高尔泰平日里给管教干部赵来苟的娃娃补过课，能说上话，就给赵来苟说："傅作恭是不是真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黑屎！"赵来苟说："我拉的也是黑屎！谁叫他当右派，他如果不是右派，就到北京住在他哥哥傅作义的公馆里，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能管到他头上！傅作义与人民为敌，杀了不知多少人。他从国外回来，也不是个好东西。"傅作恭挣扎着走了十几里路实在走不动了，就说："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事还允许申辩嘛！"赵来苟听了大怒，骂道："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傅作恭腿软没劲，寸步难行，只好站住了。赵来苟大骂："这狗日的真还把我整住了。"当然，他有的是招数，当下就叫别的劳教分子用芨芨草拧成绳子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围了一圈，前边绑半截绳子，后边也绑半截绳子。傅作恭仍背着草筏子，前边的人牵着绳子拽着他向前走。傅作恭往前走时因腿软跪在了地上，后边的人就往后一拉绳子，将他拉起继续向前走。三天后，傅作恭挣扎着走到了背草筏子的地方，却再也站不起来了。领工的让找来一个用芨芨草编成的长草笆子，把傅作恭抬到草笆子上，由劳教分子用绳子拉着，一路颠簸，硬是把他拉回新添墩，有个劳教分子的医生把放置在草笆子上的傅作恭看了看，说："已经死了两三个小时了。"

12. 饥肠辘辘

小徐调场部已有些天了。春节前，我听王智礼说要把我们几人都调场部，曾委婉地向王智礼表示："希望继续留在二站劳动改造。"我认为自己是以极好的态度向王智礼说这些话的——愿意在重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有什么不好？王智礼一定是把我的话向场部转告了，这些一贯在劳改犯面前颐指气使、威风凛凛、说一不二的场部干部便大动肝火。有一天，我同小徐邂逅，小徐神色紧张地说："你赶快到场部来报到，×场长在我们办公室说了，那个二站的女右派再不来场部，就用绳子把她捆来。"这可吓坏了我，劳改队捆人是常事，当场长的说要捆我，就是一句话的事。我不能违拗他的意志，招来捆绑之苦。这样，第二天，我立即收拾行李、箱子等各种随身带的东西，同石天爱、王桂芳一起到场部报到。

我虽不是被捆绑到场部报到的，笼罩在心头的乌云似铅块般沉重，这压力比起两年前作为右派挨批斗时也轻不了多少。但，我还得强作平静，强装笑颜，先去接受分配的工作。

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杨振英。场部有个修配厂，主要修理全农场的农机具。还有个负责农场物资运输的汽车队，有7辆大卡车，大多是4吨位的解放牌车。此外，还有个供全农场七八百人吃饭的机磨坊，专门磨面粉，石天爱和王桂芳就分配在机磨坊干些体力活。这三个机构都由杨振英统管。杨振英作为干部的角色也就是个普通干事而已，而在劳改系统，凡具有干部身份者，为了使其在劳改犯面前显示威慑力，劳改犯都得称其为"股长"。四工农场属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的农场，而其旧制并未改变，劳改犯释放后对其威慑力必须继续保持。所以我们到场部后，只能依此旧规，称杨振英为杨股长，对其他具有干部身份者，也一律称股长。对书记、场长、科长之类有一定官阶者，则按官阶称之，更不得有误。

小徐先我们一步来了场部，主要是接过了杨振英的一部分工作。修配厂需用的零配件有个库房，原来由杨振英管理，那时还属大跃进的年代，有些拖拉机和其他农机具出了故障，要连夜检修好，不得过夜，以免影响第二天的运作。夜里检修时需用的零配件，就得找杨振英从库房里领出。杨振英有时得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到库房去拿零配件。杨振英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在严冬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并不好受，所以他通过场部急急地先把小徐调到身边之后，就立即把库房的工作交给了小徐。小徐虽说丢了铁锹把，在半夜里从热被窝里叫起来去库房取零配件的事，其实并不比下地强，杨振英夜里从库房发了零配件，第二天还可作为理由多睡一会儿，而小徐则不能，第二天她必须按时起床，按时到办公室。

开始，分给我的工作是汽车队的统计。司机们每次出车回来，都要由我登记他们行驶的吨公里，汽车用的油料也由我发放登记。有一个可放二三十桶汽油和其他润滑油的油库，也就是一间极普通的平房，平房下有一个可驶进一辆汽车的低凹的坑，是为了便于大卡车运来汽油桶入库。装卸油桶，自有场部几个干杂活的“职工”动手，我只消把他们喊来就是。大卡车领取汽油时只要把车开到低凹的坑内，放下后车厢，从库房里搬出油桶再搬上车厢内也不费力，一般由司机自己动手就行。库房的大铁锁——几乎有我的多半个手掌大——和钥匙都交给了我。此外，拖拉机队的油料也由我发放，场部有一个储存几十吨柴油的大油罐，竖在东北方的空旷处。罐子下方有一个管子和龙头就是出油口。我向拖拉机手发放柴油，一般都是拖拉机手把拖拉机开到油罐旁，用一种特制的油桶在油管的龙头下面接油。根据需要加几桶就记几桶，每桶大约是十二三公斤。

我一向受不了汽油味，有晕车的毛病。记得1955年报社有四五对同事要举行集体结婚典礼，让我坐小卧车去接新娘，我只接了两个新娘就晕晕乎乎的了，汽油味熏得我呕吐了起来，最后连人家的结婚典礼也没参加成。现在可倒好，要整日里跟汽油柴油打交道，而无任何回旋的余地。

工作本身比起下地倒真是轻多了，难闻的汽油味儿过了些天也就习惯了适应了，柴油味似乎比汽油味好适应些。但是，我没想到柴油的特性是沾上身就挥发不了，发油时免不了衣裤都会沾上，柴油落上灰尘就跟清油似的，灰黄的油渍一大片，看上去十分不洁，而我的罩衣、罩裤只有一两件，无法换洗，准确地说，是换下来没有时间洗，气候寒冷，没有热水就无法洗，洗了也干不了。所以到场部工作没几天，我就浑身上下满是灰黄的油渍，比那些拖拉机手脏多了——他们都有工作服，换洗没问题，洗衣服有充足的时间。我浑身上下灰黄油腻肮脏的衣着，场部的干部们看了也觉十分碍眼。有个名叫王明的干部，一向对我们还算客气，他有个十来岁的女孩，他对女孩说起我们，还称我们“你姨姨”，这就是莫大的尊重了。一次，他看见我衣着肮脏极

了，笑着说了句："看把衣裳'动'的（意为弄脏）!"这个农场的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陕西人，下面还有几个字他怕我难为情，再没说出来，我现在回想，那咽下去的几个字，应该是："脏得太!"

小徐丈夫梁富杰来时，那间原马棚当了一阵子他俩的"新房"，在我和石天爱、王桂芳到场部后，便又成了我们的新居。马棚狭长，刚好搭下我们的四张床。四工农场惟一好于十工农场的条件，就是让我们告别了土炕。住在这间新居里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就是有天凌晨三四点钟，汽车队的王师傅从外地拉来一卡车汽油，他把车开到我们的宿舍前，大声喊我的名字，把我从沉沉大睡中喊醒。我急忙穿衣起床出了门，才知道是让我清点拉来的汽油桶数。在凛冽的寒风中，我睡眼惺忪，冷得发抖。他说了汽油的桶数，我清点了一下，和他所说的相符，他立即转身睡觉去了。他当然也很辛苦，开车大半夜，这一睡就要补足大半夜的瞌睡，也许连午饭都不会去吃。可我，到早晨七点以前还得按时起床，不得有误。场部上下工都敲挂起来的半截钢轨，"当当当"的声音特别响亮刺耳。后来，我才得知，这位王师傅是从刑满释放人员中选拔出来的，他也是陕西人，做事谨慎有余，是同他的身份有关。我至今还记得，汽车队的队长叫刘兴汉，河北人，共产党员，三十七八岁的年纪。此人不胡来，显出很有原则性的样子。另有两个杨师傅：大杨师傅约摸三十岁的样子，听口音像是甘肃平凉一带的人；小杨师傅二十岁刚过一点，也是陕西人。再就是这位王师傅。其他几人我已印象模糊了。

我瞌睡得要死，在清点汽油桶时一直睡眼惺忪，是因为调场部后一直睡眠不足。初到场部时，我仍和小徐一样，同在杨振英的办公室上班，晚上有事没事也仍坐在办公室里，晚上十点钟过后，杨振英说一声："休息吧!"我们就回到马棚里，在自己的床上倒头便睡，直到清晨刺耳的敲钢轨声"当当当"地响起。

没几天，场部财务科便把我叫了去，说是让我帮助会计王积义记账。王会计问我："你会不会打算盘?"我说："上小学时学过一点，多年来没用过，早忘了。"王会计说："加减法没啥问题吧?"我说："加法会，乘除法忘光了。"王会计说："加法会就行，乘除法记账一般也用不上。晚上七点钟你就来这里上班。"来场部时小徐就说过："场部财务科的贺科长问我，你会不会打算盘，财务科少个记账的人，他们好像要调你去记账。"果然，这就交代了工作。晚上七点左右，我就到了财务科。这里晚上上班要用煤油灯，我先把煤油灯灯罩擦得明光锃亮。我认为这种活今后只会由我来干，这是我分内该干的。大约过了七点钟，王会计来了，他拿出十几个账本、一沓子凭单，教给我把这些凭单上支出的款项，逐项分类记在账本上，记完一页时，用算盘把全页的数字加到一起，记在最后一行上。他就坐在我对面的写字台上，写字台很大，不比我在报社的写字台小，但不如报社的写字台精致美观。报社的写字台木料

很好，是用本色的桐油漆过的，木料的美丽木纹清晰可见，很气派，当时在兰州是少见的办公用桌。这里的写字台大，是实用的需要，木料肯定也差，只是用常见的深咖啡色油漆油过，已很旧了。王会计用一把极考究的大算盘，给我的也同样考究，我上小学学珠算时，哪见过这样的算盘？算盘珠子可能是红木的，光亮而有分量，拨拉起来声音极好听，如泉水的丁冬声。记账这工作，其实很简单，只要细心一些，不要把凭单上的数字记错，累计时不要算错就行。一开始，我觉得很新鲜，只是一个劲儿地认真地记，到需要计算时拨动算盘珠子，听着算盘珠子上上下下清脆悦耳“噼哩啪啦”作响的声音，还有点心旷神怡。这些账本原来大概都是王会计记的，项目栏内的文字说明写得工整悦目，我写的字比之也不差，但后面的阿拉伯数字，我怎么用心写也写不好，王会计肯定已当了多年的会计，记在账本上的阿拉伯数字飘逸娟秀，还十分整齐地略略向右斜着，非常好看。这有限的阿拉伯数字学写并不难，我注意观察，找出王会计写每个数字的特点，认真模仿，第一个夜晚就学得有点像了。

看来，场部的干部晚上都上班。尽管王会计一直认真工作着，财务科时不时地有人出出进进。进来的人有的搭讪着和王会计说几句闲话也就出去了。有的进来只和财务科的另一个出差回来的张股长闲谝——他名叫张振英，张股长的职务好像是农场的采购，经常外出。他们一起东拉西扯，对没听清楚或有疑问的事情，往往来个疑问短句：“得（音dé i）是?”对方便会再详细地把事情的原委来一番解说，或对刚才说过的话来一番肯定：“是哩!”过去我虽然也同众多的陕西人打过交道，我的难友杜博智也是陕西人，我从来没听谁说过“得是”这样的疑问短句，从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说，倒是极精炼而富有特色的。我在《甘肃农民报》工作时，曾经认真地学习农民的语言，为报纸的通俗化、大众化下过一番工夫，对“得是”这个疑问短句，我既然仍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姿态习惯地进行了推敲，便永远地记住了它。

我在有点心旷神怡中记账已两三个小时，后来便不断地有睡意袭来，而我这是第一次去财务科记账，我怎能显出疲劳之态呢？在十工农场我在劳动上一贯表现比我的女伴们强，到了四工农场，我应坚持再坚持。去年“十一”十工农场曾对个别人摘帽，小徐丈夫就因为摘了帽才能迢迢数千里路来这儿同妻子团聚，总是有了一线曙光在前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得好好表现自己。为了摘去头上那道可恨的“金箍”，我也得像孙悟空那样，事事顺着唐僧。而我面前的“唐僧”就多了，包括那个要用绳子捆我来场部的×场长——后来我才得知他是个副场长，还有杨振英、张振英、王会计，以及来到财务科闲谝的所有的股长们，我都得在他们面前低眉顺眼，显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在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我动手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为当时我人格和灵魂的扭曲，还真想大哭一场。而那时，我所作的是竭力表现自己，让那些改造我的人们无懈可击，无刺可挑。由于我心中有了那线“曙光”，企盼有朝一日那线“曙光”早

些来临，阵阵来袭的睡意，都一次又一次被我用意志力驱赶跑了，大约到了子夜时分，才听得王会计说了声“休息”。我知道，这就是命令，便匆匆收拾了该收拾的一切，准备回宿舍，细心的王会计看到我没把墨水瓶的盖子盖上，便帮我盖上，记账都用蘸水钢笔。此后，每次深夜下班，我都记住了盖墨水瓶盖。

此时，原在财务科闲逛的两三个人早已不知去向。

在我记账的四五个小时里，王会计除在开始向我交代了记账的方法和要求以后，便埋头干他的工作去了，再一直没和我说过一句话，直到最后不得不交代的“休息”二字，为我第一夜在财务科的工作画上了句号。至于那些随意进来闲逛或转一圈又走了的这个或那个股长，他们眼见一个大活人坐在王会计对面的桌子后面工作，却视而不见，没有一个人同我打招呼，他们在闲逛时也绝不涉及我。当然，他们心照不宣。他们有兴趣观赏眉户剧中的梁秋燕，对“梁秋燕”在财务科低头记账的模样，也许更喜欢作近距离的注目。×副场长大骂要捆我来场部的事，他们肯定也都清楚。现在，我卑贱地低头认真记账的情形，他们都看在眼里。也许，他们还为我这样一个年轻女性——当年省报的记者，如今由他们掌握任其自由摆布而洋洋自得。

自从晚上到财务科记账，我就永远地处于睡眠不足之中，那位王师傅在凌晨三四点钟还把我叫起来清点汽油桶数，我的懊丧和瞌睡都达到了痛苦的地步，但我敢不起来吗？

来到场部以后，精神委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伙食太差，吃不饱。场部的干部及机耕队的职工，在场部另起灶，吃的是精细的饭菜。有时我路过他们的伙房，里面飘出用油炝葱花烹调炒菜的各种香味，使我馋涎欲滴。这种香味，在我们的“职工”灶上，永远也不会出现。我见到他们的馍都是精粉做的，颜色雪白鲜亮，看着也馋人。他们吃的面条肯定也是精粉擀的，这我就无法见到了，只能作推理式的判断。而我们的“职工”灶，吃饭的以机修厂、机磨坊的刑满释放人员为主，在场部统称“职工”，这个称谓有别于汽车队、机耕队正宗的工人阶级的职工，在场部的领导们认为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尊称，其实质内容则是一种区别、一种蔑视。我们四个女右派及机修厂的男右派赵贵春，理所当然地在“职工”灶吃饭，我们吃的面条可以清晰地看到麸子片，面条擀得很厚，切得又宽，一锅煮出来仍变成了疙瘩加糊糊，吃的馍仍是兰生玉提醒我，不让我说的“麸子馍”，而且量不够。蔬菜几乎没有，油肉之类根本见不到。这儿的伙食同我们来此之前，在玉门黄花农场四大队的又没法比，那儿的馍还是又白又大，跟在十工农场一样，基本不限量，只是迁场后菜少油少，伙食费比过去贵了些。我和小徐午饭都在杨股长的办公室吃，记得有一次，每人打了麸皮较少小小的一个馍，我那直径26厘米的饭盆里则满满当当地打了一盆好像是干萝卜缨子煮的颜色发黑的所谓的菜，很难吃。萝卜缨子，在十工农场是鸡兔的饲料，大灶上从未

吃过。小徐吃了一小半就吃不下去了。我的饭量一向比她大，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又把她剩下的都吃光了。我肚子饿呀，再难吃的东西，只要能填满胃口，吃下去总比胃里空着好受！试想，我们这些吃着不够量的麸子馍，肠胃里经常填充着干萝卜缨子的人们，会有多少精神和力气去认真工作。一年多来在十工农场从劳动中增添的体力，已变得十分壮实的身体，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消耗着，消耗着……暂时，由于我和小徐都不下地劳动了，体力的消耗毕竟少得多，我们一时还想不到饥饿对体力的长期消耗，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这时，有些难友们的妻子带着孩子也一同迁到了四工农场。她们已习惯于十工农场的一切：在那里，她们在生活和劳动上受到各种照顾，眼见自己的男人在原单位挨批斗时的愁苦无奈已烟消云散，只是在艰苦的劳动中逐渐适应着周围的新生活，她们便也安然放心了。传统的中国妇女的美德，使她们心甘情愿地同自己的男人同甘共苦。去年“十一”对少数人的摘帽，也使她们的心中升起了希望。她们最了解自己的男人，深知自己男人含冤受屈的痛苦。在当时的形势下，她们也只能企盼着有一天会苦尽甘来，自己的男人会重新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被称作“同志”，而不是什么“右派分子”。

来到四工农场后，情况大变。以王杰生的妻子张露玲来说，他们全家三口来到四工农场后，住在一个小小的地窝子里。除夕之夜，王杰生被派到踏实出外干活去了。她和两三岁的小儿子小三孤单地住在地窝子里。半夜里，暴风骤起，地窝子上面是用篷布盖着，四个角都用两三人抱不动的大石头压着，篷布上还盖了些草笆子之类。当暴风骤起之时，篷布三个角上的大石头滚到了一边，篷布和草笆子全都压到了她母子俩的身上，动弹不得。到天亮后，二站的人看见他们这个地窝子的顶盖塌了，看不见她母子俩，在外面议论说话，不知是咋回事。张露玲费力地拉起篷布的一角喊了起来，大家才知道她母子还在地窝子里，才将她母子从地窝子里救出。直到几十年后，张露玲还心有余悸地说：“当时，奇怪的是就靠近我们母子俩的那一角的大石头没滚动，如果那块大石头滚落到地窝子里，我们母子就完了。”这天夜里，王杰生和数十个难友由汽车拉到了踏实的旷野，住在帐篷里，他和王洪勤、刘开邦住在一起，半夜里帐篷也被暴风刮倒，他和难友们在篷布的遮盖下，倒也没觉得冷。初一天亮起来后，才知道他们的任务是挖地基，准备在这里盖房子。但天寒地冻，地硬似铁，铁锹蹬下去只是个白印印。于是，又用汽车把他们拉了回来。

王杰生全家三口人在四工农场的第一个大年夜和春节初一，就是这样度过的。

此时，不少难友都是和家属一起来到四工农场的，如：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赵贵春的妻子黎淑莲等。记得1959年春，在我和小徐调四大队当中队统计之前，徐保安当时在场部就张罗着卖他的劳莱士瑞士表，估计他是为了凑些路费，把河南老家里的

妻子杨爱珍接来。我和小徐后来去了十工农场四大队。当我们再次在四工农场同徐保安相逢时，杨爱珍已在他身边，他俩作为一个家庭来到了四工农场。还有王洪勤的妻子王玉芬和他也一起到了四工农场。赵贵春的妻子黎淑莲，我和小徐在三大队时还和她一块平田整地，在休息时和她一起唱过歌。此时，他俩也一同到了四工农场，还带着个一岁多的小男孩。这些家属有一二十个，她们是和自己落难的男人一起同甘共苦来了，但也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苦衷。

以黎淑莲来说，她原是赵贵春在张掖航校的学生。当年，年轻的赵贵春讲飞机结构，把一门死板机械的专业课讲得生动活泼、形象有趣，无意中竟获得了聪明漂亮的女学生黎淑莲的心，俩人很快坠入爱河，然后就结了婚。幸福美满的一对爱侣人人称羡。到1957年动员鸣放之时，赵贵春看到街上从河南来的要饭的很多，就说："我们党应加强对农村的工作，农村建设好了，这些农民就不会从农村往城里跑了。"这种对"我们党"的建设性意见，到了反右斗争开展后，竟作为恶毒挑拨工农关系的右派言论进行批判。赵贵春被划为右派分子。张掖航校对黎淑莲还区别对待，打算安排她到张掖地区工会工作，但黎淑莲觉得亲人含冤受屈当了右派，自己在当地工作面目无光，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也抬不起头来，就于1958年初回了老家——四川岳池县农村，在当年4月份生了个男孩。她哪里知道，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的老家，此时农民已食不果腹，她的一个叔伯哥哥在1958年已活活饿死，她那在重庆当干部的二哥饿得浮肿了。她一回到老家就挨饿，她过去哪里尝过挨饿的滋味？做了年轻母亲的她，奶水少，小男孩也挨饿，更使她心如刀绞。再说赵贵春到安西十工农场后，根据他的专长，分在机耕队工作。十工农场对右派分子称"同志"，生活虽艰苦，但能吃饱饭，无挨饿之虞。这样，黎淑莲就带着小男孩，从天府之国的四川老家数千里跋涉，于1959年初来到了安西十工农场，同丈夫团聚在一起，同甘共苦。可她哪里料到，在十工农场待了不到一年，来了个换场，他们全家三口人，又到了四工农场。初到四工农场，她就立即感到，这里的政治压力比起原张掖航校有过之而无不及，她面对的又是新的生存难题。

再说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她先来到十工农场，那时我和小徐已调四大队，所以和她没接触过。等我们都来到四工农场后，我们虽知道她也来了，因为没和家属一起劳动过，不久我们又先后调到场部，对她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多年后当我知道河南省在大饥馑的年代死人很多，特别是有个信阳地区死人最多。我就想到，徐保安的家不知是否在信阳地区，徐保安的妻子或许是被老家的饥饿逼到安西十工农场来的。徐保安当年就是因为鸣放中说到家乡的农民"饿得嗷嗷叫"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反右斗争之后，一切工作继续向"左"转，农村吃粮肯定更趋紧张，杨爱珍在农村饿得受不了啦，听徐保安信上说十工农场能吃饱肚子，她便下决心投奔到已当了右派分子的丈夫

身边，图个吃饱肚子，同时对受难的丈夫也有个照应。就这样，夫妇俩在十工农场过了半年同甘共苦的好日子。现在，他俩又一同来到了四工农场，在四工农场他俩面临的又是什么样的生存难题呢？但不论是怎样的生存难题，他们都已毫无退路，别无选择，只能面对了。

这些带家属的难友，都有自己的“窝”，开始都住在地窝子和窑洞里。王杰生和张露玲的地窝子由于暴风的肆虐在除夕之夜塌了，就给他家另找了住处，别人的都没塌，就继续住在地窝子和窑洞里。有了自己的窝，便自己做饭吃，各家都有个粮本。她们第一次到场部去买面粉，令她们大吃一惊的，卖给她们的竟也是带有麸皮的面粉。自己的男人在大灶上吃麸子面，她们有理也无处讲，让自己和孩子也吃麸子面，同当了右派分子的男人一样对待，她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不仅是个吃面的问题，也是个政治待遇问题。自己的男人犯了“错误”，自己是个家属，可是啥事也没有的呀！俗话说：“三个婆娘一面锣！”在四工农场，她们的男人是右派分子，比起那些干部工人家属，自己自然也是矮了一头，响锣一时无法敲起来。到四工农场后，她们的男人吃着大灶上粗劣的饭菜已在挨饿，她们正想把家里的伙食调理得好一些，让饥饿的男人在家里得到些补充，可她们打来的麸子面，挡不住自己和孩子的饥饿，又怎样帮助男人哩？当然，她们一到四工农场就看到场部的家属和孩子们都吃着雪白发亮、精粉做的馍，打面时也看到人家用同样的钱打着精粉，自己付出同样的钱，打回的却是麸子面。她们已学会了忍受，眼眶里打转转的泪水直往肚子里咽。而当她们悄悄地聚在一起时，她们就像亲姐妹一样倾吐了肚中的苦水。自己的男人受委屈吃不饱那是没法的事，自己和孩子没犯错误，为什么也要吃麸子面，受到这样的对待？她们和自己的孩子不是来改造的呀！“锣”终于敲响了。十几个人一合计，决定找四工农场的刘生贵书记去说理。刘书记是农场的一把手，只要他说句话就算数。家属们相信，目前的恶劣对待，找了他会得到解决；不找他，同下面打面的干部谈是有理也说不清，因为他本人就无权对此作出改变。

据张露玲在三十多年后回忆，找刘书记她也去了，她们共去了十来个人，同去的还有徐保安的家属杨爱珍及一个镇江口音的家属，等等。

她们找到刘生贵的办公室，十来个人一拥而入。刘生贵看到她们，起先还弄不清她们是来干啥的。当着十来个右派分子的家属说话，她们要吵起来总不大方便，他就要求她们先都出去，一个个按次序进办公室，跟他个别交谈。个别谈就个别谈，为了争得她们自身的权利，她们既已挺身而出，便一个个毫无畏惧。

第一个进去和刘生贵谈的是一个约摸三四十岁，年纪较大，镇江口音的家属（因年代久远，张露玲已记不得她的名字）。这位家属张口就说：“当年他参军打国民党披红挂彩，是我送走的。现在他犯了错误。我又赶来帮助他改造，这是党对我们当家

属的要求，我这么做是符合党的要求的不是？可我们到了这里，打面只给掺着麸子的面，好像我们也犯了错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不是这样，不对头嘛，我们来农场帮助自己的男人改造有啥错？共产党的干部无论在哪里，办事总是要按照政策来，不执行政策，我们走哪里也能说上理。”这位家属理直气壮地说完，走出刘生贵的办公室，又把她刚才说过的话，向等候在外面的家属重复了一遍，张露玲觉得这位大姐嘴巴子很利，给大家鼓了劲。

不等她说完，杨爱珍已进了办公室。她首先声明：“我是党员！”接着就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说出一番道理来。她说：“我们不能用同样的钱买麸子面吃，我们没犯错误，我们是来帮助自己的爱人改造的，凭什么要给我们打麸子面！”刘生贵作为农场一把手从未遇到过如此棘手的事，他更没有想到右派分子中，居然还有党员的老婆。在杨爱珍之后，还有两三个家属，也声明了自己的党员身份。

刘生贵耐心地和十几个家属谈完话后，当即作出决定，对这些右派分子的家属，今后不得再供应麸子面，而要和干部、工人家属同等对待，纠正了原来的错误作法。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我的这些难友的家属们大获全胜。此后，她们从场部买回来的也是精粉。

说话间，天气已渐暖。有一天，一站、二站的部分难友们都来到场部附近干活，大概是给场部干部的自留地翻地种洋芋。所谓的自留地，就是按场部干部人数统一划出大片土地，统一耕种，秋后再将收获物分给每个干部。在甘肃农村，1958年大炼钢铁之后，省上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原来分到每家每户的自留地，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而在四工农场，场部可以随意调遣右派分子们无偿地为他们耕作，收获物全部归场部干部所得，倒真是具有剥削的性质。而我的难友们都是来劳动改造的，一个个都是不能说话的工具，管教干部指到哪里，就干到哪里。他们连想都不用想，这些土地的收获物同自己有什么关系。

这天，在劳动结束之际，他们意外地发现，场部“职工”灶在改善伙食，每个打饭的“职工”的饭盆子里都有4个包子，没掺麸皮的包子！所有看见包子的人都馋涎欲滴，却只得无望地转身就走。这时已是午饭时节，回到站上不论好坏，总是有饭菜等着自己。而有的难友终究经不住包子的诱惑……

我和小徐已打来了包子，刚开口要吃，就进来了原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陈××。他是兰州人，原在省邮局工作，是搞财务工作的，当了右派分子后老婆跟他离婚走了，他是孑然一身。他原来就住在一中队隔壁，同王昭都是三组的。他多才多艺，相声说得挺有味儿。在三组的宿舍里，他还开玩笑地叫我：“我们的小白鸽！”所以我们是很熟的。这天，他作为不速之客进了我们的办公室，一进门就双手连连作揖，立即提出请求：“饿坏了，饿坏了，给个包子吧！”这包子其实就是包了些煮熟

的糖萝卜，但对于多日来饥饿难耐的我们和难友来说，已不啻珍馐佳肴，我和小徐正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口福，让胃肠也舒适一点。而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他那凄楚饥饿的神态，说出的话，都使我俩无法拒绝。小徐和他也很熟，她知道我的饭量大，就从她的饭盆子里拿出一个包子给了他，老陈连声说着谢谢立即转身走了。这一位前脚刚出去，杜博智又进了门。不等他说啥，我看他面黄肌瘦，便主动地从自己的饭盆子里拿出一个包子给了他。他吃着香甜的包子，我们还寒暄了几句。这两个包子的给予，一直深深地嵌刻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无法忘记。这二位不速之客后来命运殊异。二站的老陈在冬季更为严酷的日子里活活饿死，钻了沙包（意即死后埋在沙包里）；一站站长王志玉和杜博智同是陕西蒲城人，念及“乡党”情谊，在5月就将他调到伙房当了炊事员，所以在农场每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时日里，杜博智没有挨饿，身体健康，安全地回到甘肃日报社。1990年，杜博智荣获甘肃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天气更暖以后，有一天，杨振英要我和小徐把办公室前边的一小块地翻一下，没说翻后干什么。我们每人手持一长把圆头铁锹就干了起来。这是一块微不足道的狭长小块地，连一分都不到。如果在十工农场，不论是我或小徐，都会毫不含糊地一个人就很快翻完了。可是，这当儿，我拿起铁锹用脚蹬下去，却感到腿脚无力，很费劲。小徐当然也一样。这使我才真正意识到近半年的饥肠辘辘，对我们的体力消耗是实实在在的。过去办农民报时，常用的一句农谚是：“人是铁，饭是钢。”我们刚到四工农场在二站平整土地时，还没有如今这样乏力，那时我们的身体壮实，有在十工农场打好的底子。如果我们还留在二站，整天下地干体力活，肯定饿得更厉害，就成了老陈、杜博智那样，恐怕就更苦了。此时，我俩慢慢翻着地，嘴里不说什么，心中又暗暗庆幸总算来到了场部。

再说，王杰生、张露玲两口子自从地窝子塌了以后，全家人才搬进队长们和家属住的小院子，有了一小间平房住了下来。一天，张露玲在家待着，原十工农场四大队二中队的韩书谦走了进来，他们两家都是河北老乡，韩书谦一进门就跌坐在了地上，说：“弟妹，我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张露玲一端详，看见韩书谦原来黑红圆实的脸瘦了一圈，脸上出现了许多皱纹，她知道老韩这是饿的，心里不禁非常难过。她记得，当王杰生划为右派分子，接着不久，她又被单位上裁减下来，全家人生活无着，她带着小三迢迢千里，到安西十工农场投奔遭难的丈夫来时，正是中秋节前夕。王杰生从四大队启程去县上接她母子俩，是坐着马车去的，回来的路上，韩书谦和中队的有些人正在地里摘瓜，看见他们全家人坐车过来，就往他们的车上送瓜，一路上，他们的麻袋里装了有多半麻袋的甜瓜。第二天是中秋节，大灶上做了很多月饼，人人有份。韩书谦把自己的那份月饼全给了小三，说是：“弟妹，孩子从兰州到了这儿，够受苦的了，我这份就给小侄儿吃吧。”曾几何时，热情慷慨的他竟饿得瘦成这

般模样，乏得坐到了地上。想起韩书谦在十工农场四大队时对她全家人的情分，张露玲真想从家里找出点可吃的东西让他吃。可这天，她家里确实没有一点吃的，无法对他作出一丁点儿的接济，这使她愧疚不已……韩书谦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无话可说，又挣扎着起来，慢慢走了。张露玲曾尽力帮助过她能够给予帮助的人。但对韩书谦这次就一点忙也没帮上，这使她一想起来就觉得心中有愧。有个安西县的小学教员陈世杰一次拿了点钱，求张露玲帮他买些咸菜，张露玲家中正好有咸菜，是用萝卜缨腌的，就捞了些给了他，只见陈世杰手捧咸萝卜缨立即放进嘴中咬嚼起来。张露玲大喊："这使不得，不干净，太咸，你用水洗洗再吃！"可是，陈世杰不管不顾，只是一路上咬嚼着咸菜走了。陈世杰当了右派来农场劳动后，妻子和一个小女儿回了娘家，同他岳父母住在一起，岳父在县上有点权势，陈世杰在饥饿难耐之时，也曾托张露玲进城时到他岳父家看看，说明自己的困难，看岳父家会不会给些吃的。张露玲受人之托，进城时找到了他岳父家，希望他岳父会给点帮助。但希望落了空，面目森严的岳父严格划清政治界限，啥也不给，他妻子什么话也没说，张露玲只得空手而回。

我每天晚上在财务科记账，在办公室常见到场部的领导和干部们，包括刘书记、×副场长、贺科长及这样那样的股长们出出进进，他们不经意地也会扫我一眼。从我第一次进财务科的那天晚上起，除了王会计交代工作，从来没有任何人和我说过一句话。在办公室里有时也会出现一种熙熙攘攘、说说笑笑的场面，但我永远只能紧紧闭住自己的嘴。如果我独自一人待在封闭的古墓里，面对那死去了的世界，我会焦灼不安，着急无望……而在这个活人的世界，我自己就是个大活人，却不能张嘴和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搭上一句半句话，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异类"。这种压抑，这无言的压迫，是我未尝经验过的，它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原来惧怕来场部会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但我未料到我所惧怕的压力会以这种形式出现在面前。在几位女伴面前，我流露了在财务科的遭遇，及我沮丧不已的心情。在十工农场或四工农场，我从来未向领导上"汇报"过任何一位难友，包括几位女伴，我把"改造"主要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还是原来的我，而一向痛恨打小报告。在这个艰难时期，我仍然坚持一贯的做人原则，从不打小报告，对几位女伴，我从未有过靠打小报告抬高自己的考虑。当然，我也没有想过要提防她们。我的痛苦和懊恼，当时惟一可以说说的对象也只有几位女伴了。我没有想过要对她们隐瞒什么，直性子的我，也无法隐瞒。毕竟，背着场部的干部们向女伴们吐露真情也只是一种谨慎而有限的宣泄。但是，不久，贺科长就找我谈话，指出我不安心改造，如何等情。这种指责会影响今后的摘帽，我很不安，只得默认。再后来，石天爱竟当着我的面，承认是她打了小报告。她还说，事情是你自己说出来的，那些话你是说过嘛！多年后我见到王桂芳时，王桂芳说："石天爱当时很羡慕你和小徐坐办公室。"由羡慕而嫉

恨，这就是她打小报告的动因。

小徐当时在杨振英面前表现很积极，有一次，她主动向杨振英汇报思想，谈完后显得很轻松，对我说："我已谈过了，现在你可以找杨股长谈了。"我当时并没有找杨振英汇报自己思想的意思，所以没有去找杨振英，当时没有，以后也一直没找过。在杨振英眼里，我跟他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同为坐办公室的两个女右派，却大不相同：一个愿意和他靠近乎，一个却永远是远距离。

写到这儿，我想把和我同台演出《梁秋燕》的伙伴王全禄也提上一笔。王全禄是庆阳人，原在劳改系统工作。在剧中，他是和我同争婚姻自主的一对情侣，在排练过程中，自然非常熟悉，也可以说有点亲密。我来场部后，他也到了场部，只是我并不清楚他的具体工作是干什么。我在办公室曾几次见到他，当时办公室里都有场部干部，他熟谙这里的规矩，从来没和我打招呼，说一句话。我也只能以陌生者的态度不理他。后来，财务科发给我一套新的深蓝色的工作服，场部干部都看到我浑身油渍，污浊不堪，就根据我的工作性质，发了我一套工作服。刚穿上的几天，还未沾上油渍，倒也显得干净精神。在院子里我迎面碰见了他，当时左近无人，他满面笑容，开玩笑说："哟，成了工人阶级啦！"我辛酸地一笑，说："真要是工人阶级就好了！"然后，我们也不再多话，就各自走了。此后在办公室再见面，我们仍然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心照不宣，对这里的干部我们必须低眉顺眼。当初演《梁秋燕》是他们的需要，如今两个男女演员互相间不说话、不理睬，也正是他们心目中认为的最恰当的交往方式。我们在当了右派分子之后，按照当时的理论和政策脚踏实地地认真改造自己，任宝贵的青春年华在受苦受难中蹉跎复蹉跎。唉，唉，青春宝贵年华的抛掷，是无法追回的。在无奈中，我感到刻骨铭心的痛楚。

每晚饥肠辘辘地到财务科在煤油灯下记账，我明显地感到视力迅速下降。我14岁上高中一年级时就戴上了近视眼镜，1949年到甘肃日报社从事编辑工作，因用视力较多，到来农场前近视程度已增至600度，用医学的观点来说，已是高度近视了。记得在十工农场，一次在演出过程中不慎打碎了眼镜，安西县城没有眼镜商店，我急忙给兰州的家中写信让配一副新的，而配一副新眼镜得好些天，配好后寄来又得好几天。我们的领队邹士杰知道后，将他的一副300多度的近视眼镜借给我先用。聊胜于无。我戴着他的眼镜好些天，直到新眼镜从兰州寄来。

在财务科记账，我心里想的也还是要表现自己，争取早一日摘帽子，回到人民的怀抱。不论视力迅速下降到何种程度，我只是低下头来，把眼睛尽力贴近桌子上的账本和凭单，每晚每晚都一丝不苟地认真记下去，我记在账本上的阿拉伯数字，很快就飘逸娟秀得如同王会计手写的一样，我自己认为已到了乱真的水平。王会计肯定对我的记账工作是满意的，但他言语谨慎，从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满意。后来小徐告诉

我，王会计是富农出身，会计业务过硬，但至今尚未入党。在四工农场这样的专政机构里，没有入党就比别人矮了一头，在言语行动上只能是慎之又慎了。他主要是凭过硬的财会业务在农场显示他存在的价值，从书记、场长、直到贺科长对他都客客气气的，因为在全农场无一人能在财会业务上替代他。

十工农场的财务科，在我们离开前几乎全让我那些业务娴熟作风过硬的难友把持着。原来的财务科长姓张，河北人，长着满腮帮的圈脸胡子，我们平时就开玩笑叫他张大胡子。我们到四工农场后，为财务上的事，他还来过一次四工农场。我见到他时，当着这里场部的干部，不敢再叫他张大胡子，他仍一如既往，笑嘻嘻地问了我几句话，我像是见到了亲人，满心的欢喜自然也是流露到了脸上。但也只能是仅此而已。

后来，我们的难友汴国梁也为财务上的事，出差到四工农场，在财务科先见到了我。汴国梁是上海人，中等个儿，人长得白白净净，端端正正的圆脸庞。他原在河西地区某县银行工作，业务过硬。此次来到四工农场，他俨然一副干部派头，场部干部对他客客气气，公事公办。他瞅空子问了我们的宿舍在哪儿，傍黑时还到我们的宿舍看了看。我们也不敢向他说什么，因为都知道说了也无济于事，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他和小徐都是江浙人，过去就比较亲密，他还把自己上海家里的地址告诉了小徐，大概有一种渺茫的后会有期的意味。我们心里都有些凄楚，真是，同是右派分子，由于不在一个农场，我们同他的境遇，就有了天渊之别。

临走，他还送给小徐一盒百雀灵的搽脸油，也是对小徐的抚慰吧。

18. 改造又升了级

现在回想起来，景超接到我从四工农场发出的信后，知道了我所在农场的性质——属劳改系统，他只能把心头的沉重深深地埋在心底。他写给我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检查才能寄出，从他的来信我无法知道他的担心和忧虑。我写信给他对日常劳动工作和生活的描述更不能流露些许不满，信写得平平淡淡。从这平淡的字里行间，他一定是敏感地捉摸出这里的一切有了很大改变。当然，尚可安慰的，他知道我不下地了，现在的全部工作都比较轻省，是受到了照顾。沉重的政治压力，我是一个字也不敢说的，即使我不说，他肯定也是想了许多，可他无能为力……三年前，他得知我也被定为右派分子挨批斗的时候，他还可以在我们的斗室里发出无力无奈的叹息："他们为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呵！"那时，我伏在他的胸膛前真想在他的臂弯里嘤嘤哭泣，却一滴泪也流不出，我默默地听着他的叹息，对我们的孤苦无告求助无门，绝望到了极点。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他有节奏的心跳，一下一下。仿佛是回应，我也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现在，我若是还能伏在他的胸前，在他的臂弯里听他心跳的声音，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然而，这幸福已远离我们而去。我们已天各一方，永远也无法在受难中互诉衷肠，互表心曲。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已逐渐习惯了在我俩分离的日子里守着孤独。可那时，我的身边已渐次又有了一个温暖的港湾：十工农场领导上的"右"，在当时的大环境里以极特殊极个别的一整套做法保护了我们数百名含冤受屈的受难者。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写给景超的信虽被限制在每月两封，在每封信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把许多令人高兴的事告诉他，所以也引起他的感叹："真羡慕你！"可来到四工农场后，我向女伴们诉说了的苦恼会立即反映到领导上，我在信上又无法告诉他。我能在信上告诉他，二站的王智礼说是要判我十年徒刑，×副场长说要把我用绳子捆到场部，场部的干部们只向我布置工作，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一句话

……我能这样写吗？如果写了，夹边沟的管教干部在检查信件时，毫无疑问会认为我这是不服改造，把自己的位置没摆正确。当然，如果他们不嫌麻烦的话，还会把信转回来，通知四工农场，都是一个劳改系统，互相沟通一下所管右派分子的情况顺理成章。这样，我写给景超的信便也越来越简略干巴。从我简略干巴的信，他一定想了很多很多。

当然，每季度寄10元给他，我仍及时寄出。这有限的10元，对他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支柱，是支撑他在艰难困苦中迈出脚步颠踬前进的动力。四工农场场部有个一人看守的小邮局，可以寄信寄钱物，倒是比在十工农场时方便多了，不必为给他寄钱再求人。

有一天，接到他的信，问我能不能设法买些干辣椒寄给他，我当然要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可到哪里去买干辣椒呢？就是在县城也未必能买到干辣椒啊！着急中，我突然想到三站经常来场部赶马车拉柴油的两个人或许能设法弄到。四工农场共有四个站，三站、四站全都是劳改后就业的，离场部有一二十里路，这两个站用的柴油、吃的面粉，都从场部用马车拉回。赶大车的把式自然也都是就业人员，他们技术娴熟，赶大车的时间长了，逐渐得到了领导的信任，赶车的活具有相当的自由，这些车把式也就具有了他们特殊的地位，优越于站上别的就业人员。我想到的这两个车把式，一个仍是陕西人，一口地道的陕西口音，显得非常健壮，圆圆的脸，脸上的肉非常瓷实，白里透红；另一个车把式是甘肃河西口音，瘦削的脸显得有些阴沉。奇怪的是他的一只脚有毛病，走路瘸得厉害，真不知道站上的领导怎么竟挑中他这么个瘸子当车把式。我想到这两个车把式是因为给他们发过柴油，看出他们那特殊的地位或许能帮上这个忙。他俩又来领柴油了——每次都领三四大桶柴油。我问："你们站上有没有干辣椒？能不能卖给我两三斤？"没想到我问个正着，他们一口答应，下次来场部就带来。过了几天，他们再次来场部时果真带来了干辣椒，每斤七八毛，价钱也合适。我喜出望外，第二天就从场部的小邮局寄给了景超。他们办事这么痛快，我很感激。

我们的宿舍又搬了一次，由马棚搬到了机修厂内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有正规的木制门窗，比马棚略略宽敞一点。我和小徐的床面对面，头顶靠窗，王桂芳和石天爱的床也是面对面，进门便是。王桂芳的床在小徐的脚下，我的脚下正是石天爱的床。我们的四张床在室内放置的格局便是如此。现在想来，让我们搬进这个宿舍，完全是由于领导上从管理劳改犯人的经验出发，考虑到孤零零的马棚四面不着边，让我们四个女右派住着，我们整日都要同那些男"职工"们打交道，"男女混杂"，依然有个安全问题，这样的考虑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现在我们的宿舍，就在杨振英和小徐办公室的后边，隔壁是焊铆车间，面积同我们的宿舍一样大，对面就是机修厂最大的主车间，里面有几个车床。王桂芳和石天爱去机磨坊上工也很近，只消跨越杨振英办公室

前不宽的一段黄土路面，就进了机磨坊的院子。可以说，我们的宿舍整日暴露在这一地带上班的干部、工人及“职工”们眼睛的监视下，成了禁地，没有人敢闯进来。而在当时我们都没想到这些。我们服从指令搬进这间宿舍，只觉得比马棚要好些而高兴。

不久，出现了一件让我们及场部的“职工”们皆大欢喜的事。杨振英突然宣布，原来我们吃饭的那个伙房同场部的伙房合并，从第二天起，我们全部到场部的干部灶就餐，这真是个大喜讯！因为这意味着从此我们就告别了麸子面。

我们第一天到场部的干部灶吃饭就尝到了甜头：吃的面条白白的、很筋，不是几十人的面条一锅煮出来，而是一次煮几个人的。面汤里还飘着少量的花生米。当时市面上根本无花生米可买，我们已几年没吃过花生米，那些“职工”当然更是多年没碰过花生米，在面条里吃上了花生米，在反复咀嚼之中的那个香呀，真是舍不得咽下去。后来才听说，这些花生米是由上级拨下来的子种，让在农场试验推广种植的。也许是由于场部的干部对试验种植花生的前景持怀疑态度，也许是考虑到即使试种成功，不等成熟，花生就会被“职工”及我的难友们偷吃，他们干脆把花生当作美餐交给了食堂。肯定，在我们的伙房未合并前，他们已吃了许久了，或许每个干部都分了些，因为有些带家属的干部在家吃饭，如杨振英。

我们的伙房为什么竟然会合并到场部的干部伙房？杨振英未说明。多年后我考虑，一定是有胆子大的“职工”把四工农场告到了酒泉劳改分局或省上。上级有了批文，具体指示，不能给就业人员另办食堂。四工农场对执行上级指示一向不折不扣，所以才出现了当今的局面。这位告状的人充分运用了自己享有的有限的权利，为自己的生存进行了斗争。当然，这也仅仅是我推理式的猜测。再一个可能是，上级领导机关或许派人来农场检查工作，他们当然要在场部就餐，发现“职工”及右派分子们另有食堂，为什么要分开办食堂？这中间肯定有问题。从上级机关下来的人也许只是个小小的干事，他既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场部就得立即改正。不然，他会把意见带到上面，由领导机关出面纠正。这样，对书记、场长都不利，会造成难堪，所以，他们干脆采取主动改成统一的食堂，他们自己其实无亏可吃。领导机关即使再来检查，也无话可说。

我和我的难友们坐享其结果。我们是没有胆量上告的，因为大家都为摘去头上沉重的帽子而左顾右盼，为这个可怜的愿望而活着。实在说，大家过上这种阶下囚的苦日子，不就是由于头上有了那被迫戴上的可恨的标记才开始的吗？这个残酷现实逼迫许多人天真地具有了一种不摘帽子誓不为人的气概。不怕读者见笑，当时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呆子。殊不知威胁我们生存的魔影已在逼近，它比那可恨的右派帽子更具威慑力，只是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到场部食堂吃饭不久后的一天中午，我同“职工”们一起排队打了饭，端着饭盆走出食堂没几步，忽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一时间，黄色的沙尘竟形成一道遮挡在眼前无边的昏暗屏障，使方向难辨，我竟认不得回宿舍的路了。在原地转了几圈，有一阵子，才从昏暗的黄沙屏障薄弱的缝隙间慢慢辨明方向，一面吃力地继续辨认，一面在狂风的卷动中费劲地挪动脚步，慢慢走回宿舍。

这场大风，比起初到十工农场，我和两个武威民工及老任在地边点种白兰瓜、包谷时刮的大风，更显得威力无边。唐代大历年间十才子中的李益，为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人，正是1000多年后那两个武威民工的老乡，记得有个武威民工在风暴过后曾破口大骂：“我日他妈，这么个鬼厥天气！”有过十多年戍边生涯的李益，在鞍马之间常“横槊赋诗”，其中就有“风沙满眼欲断魂”之句。他对征战的将士面对风沙的肆虐心中的悲苦因亲身经历体会至深，比起民工的破口大骂来，诗句深沉有力，所表达的内涵丰富多了。我们这些含冤受屈在苦难中跋涉的右派们，遇到这样的风暴，既不能像武威民工破口大骂，又不可像后来官至礼部尚书的李益用笔墨宣泄心中的忧思愁绪。我们的心境又岂是“欲断魂”三字所能尽述的！

后来我才听说，这次风暴在全农场将许多才下种不久的小麦刮走了，各站又补种了一次。在一站的院里，有四五个空汽油桶被刮得腾空而起，无影无踪。原十工农场三大队的统计高仲君，来到四工农场一站后，劳动了些日子，后来又当了一站的统计。二站的劳动成员都是我的难友，我的难友却无一人有此荣幸当统计。二站的统计是个刑满就业的“职工”，听口音是陕南人，此人从未同我的难友们一起下地劳动，而是独自行动，他似乎懂得些测绘技术，每天独往独来，早出晚归，好像是为二站的土地进行测绘规划什么的。王智礼对此人当然很信任，有时为了表示他的阶级立场，也骂骂嗒嗒地说他是判过十年徒刑的劳改犯。对此人，我心中有许多疑惑，但不能问他本人，更不能问王智礼。就业人员在二站能当统计，我的难友则不能，由此也可看出一站与二站执行政策的不同。

且说高仲君当了一站的统计后，有时也带人出工。在这场风暴中，他正带了四十多个难友去地里浇春水。暴风一来，空旷的田野里黄沙骤起，更是立即变得昏天黑地，不要说浇地，四十多个人在躲避风暴中都走散了，互相间谁也找不到谁。高仲君就近躲进了干渠中段的指挥所，干脆把带来的被子拉开盖住全身，把脑袋用被子包得紧紧的，遮挡风沙的袭击。小小指挥所只是个极简陋的土屋，在遮天蔽日的风暴中几乎要拔地而起，在暴风如虎狼般的吼叫声中战栗着。

县上的水利指挥部对付风暴已积累了多年的经验，风暴骤起，立即电话通知上游关闭了闸门，所以大渠立即阻断未造成水的浪费。

高仲君是带领人员来放水的，干渠指挥所就是他的住所，他不仅带了铺盖，还带

了几斤面粉，准备三几日内吃住都在指挥所。在风暴的袭击下，他只能不住地狠劲用手把被头紧紧裹住脑袋，挡住嗖嗖的冷风钻进被窝。直到下半日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风势略略小了些，才提起小小的面袋，顺着风势，斜着身子慢慢蹭进附近的一家农户，求这家一位农妇，烙了一张死面干饼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这位农妇还用大锅烧了些开水舀在碗里给他喝，从门窗缝里吹进的沙子先是浮在开水上，一刹那就沉到了碗底，高仲君也顾不得这些，啃着死面干饼子喝混浊的开水，只觉得胃肠里十分舒坦。

三四天后，走散了的难友们才陆陆续续回到一站，无一散失，没有人乘机回家看看，包括家在安西的难友。在号称世界风库的安西，我的难友们已多次经历风暴的肆虐，他们已有了在风暴的肆虐中保护自己的经验，所以他们得以一个个安全返回。

在这段日子里，我和女伴们的日子还算过得平静。场部食堂虽没有了麸子面，油水并不多，我们的粮食定量又低，仍常常觉得腹内空虚。

一天中午，在排队打饭时，有个场部干部不慎把面条倒在了取饭的窗台上，炊事员立即为他重新盛了面条，倒在窗台上的面条，便成为后面两三个“职工”争夺的对象。有个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小潘遭到了炊事员的叱骂。在打好了饭，往回走的路上，小潘有些自嘲，气愤地对我说：“真是丢人现眼，谁愿意嘛！以前谁又这样丢人现眼过，躲还躲不及呢！”虽然是几句气话，他仍谨慎地避开了“如果不是肚子饿”几个字。在那个年代，谁要说“肚子饿”，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就是反党。小潘在劳改农场几年早受好了教育，所以在气愤不已时，仍懂得谨慎用语，以免招来更多的麻烦。小潘愿意同我搭话，还由于他同我们有着类似的遭遇，小徐在下车间劳动时，同他攀谈过。原来，小潘是个技校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河西一个工厂干车工，技艺甚好。1957年搞“阳谋”，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时，小潘受到鼓舞，也对领导提了些意见，谁知到反右派斗争时，小潘所提意见被作为右派言论进行批判，火力很猛。小潘刚参加工作不久，只有十七八岁，哪见过这阵势，就吓得带了些衣物不辞而别，坐了火车向西安的家中逃跑，想一走了之。这就背了更大的罪名。他前脚到家，后面一纸逮捕令就将他逮捕归案，然后就判了刑。在劫难逃。现在我们认识的小潘，已是一名刑满就业人员了。他黄黄瘦瘦，个头不高，身体很单薄，所幸有一手娴熟的车工好技艺，所以在机修厂仍当着车工。实话说，他一直肚子饿，自从被判刑到了劳改农场，到服刑期满成为“职工”，他毫无人身自由。如果由着他自己，他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一个能吃饱饭的好去处，凭他的车工技艺，他知道施展本事的天地还广阔着呐。然而，这里的干部虽称他为“职工”，作为人的一切他已完全丧失，争夺打翻在窗台上的面条并不算啥，他却要受到炊事员的叱骂，而自己不能回嘴。他比我们更不幸，判刑时还不到十八岁。

〖一九〇〗

过了些天，我们同场部的“职工”们一起，在离场部不远处的医院门口开了个会，由场部某个干部宣布逮捕了医院的一名医生。这名医生我以前也见过，大约有二十八九岁，可能是由于当医生的关系，平日里穿着干净整齐，仍像个当医生的样子。此人犯了什么罪，并未向大家宣布，我们只被告知，他也是个刑满就业人员，此次是二次犯罪，用现代民间的语言，就是“二进宫”。犯人抓走后，教育科的李科长讲话，其中特别强调：“你们应有高度的自尊心！”所述事例，主要还是指不要搞小偷小摸，偷吃农场的东西。他口气平和，说得头头是道，倒是有几分说服力。我来到场部，杨振英同我也有过一次谈话，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说“职工”们都是犯了法的地主、反革命，大部分都是判了十年八年刑释放不久，跟你们不同，你要跟他们划清界限。二是他们仍然不服改造，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一有机会就偷偷摸摸，偷吃的。李科长用“高度的自尊心”来要求大家不要偷吃，比杨振英棋高一着，对我来说要中听一点。后来，我竟糊里糊涂地把他关于“高度自尊心”的话，在写给景超的信中也说了一遍，说我们应“严格要求自己”。半年后，我才省悟到自己的这段话铸成了大错！错在我当时还未意识到我们已面临生存危机，景超同我们离别后一直挨饿，他早就该为生存而斗争！倔强的他两年来信守的就是所谓的“自尊心”，我还以对他的爱心要求他有“高度的自尊心”，这真是雪里添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那些经常偷吃的“职工”才是当时我们应认真学习的榜样，天赋人权，当大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那个奢谈“高度自尊心”的李科长的话竟然打动了我，而我又愚蠢地把他的鬼话写给景超，使景超把他的鬼话当成了我的意思，这是我一生中所铸成的最大的过错！

后来才听说，那个被捕医生所犯的罪行，是由于同三站或四站的干部家属犯了奸情。在这个营垒高筑、阶级阵线分明得不能再分明的地方，刑满就业人员和干部家属犯了奸情，是我所始料不及的。但想想《红与黑》中的于连敢于当着市长的面，在暗夜的同一张桌子旁和市长夫人勾勾搭搭，也就不奇怪了。况且，作为人，他也需要女性的温情。释放后，他虽当了农场的医生，但毫无自由可言，他不能回家另谋职业，从而也就无法娶妻生子，他对爱情的需求走了邪路似属必然。“职工”中性饥渴普遍存在，这是农场领导也清楚的。

补种小麦后，过了些日子，大田里就出现了如烟似雾的无际的茵茵绿色，麦子逐渐拔节长高，又到了浇孕穗水的时节了。这一向没大风，一站却出现了渠水冲破渠岸的事故，冲破渠岸的大水向岸边四处横流，浇水的一二十个我的难友们吓得惊慌失色，在急忙中推出一辆架子车，在架子车上铲满了土，把架子车快速推向决口，再用铁锹飞快地铲土去堵，仍没堵住。此时，过路的靳清义见此情景也急忙走来，想为堵住决口做点事，只是由于他不是派来浇水的，手中没有工具干着急也没法。谁也没想

到，从大田的那一边，又来了骑马的×副场长，他身背一杆长枪，威风凛凛，见到渠被冲破，渠水横流，立即怒不可遏。当见到靳清义手里没有工具，竟然也“混”在众人堆里手足无措，不知该干什么时，×副场长的愤怒和仇恨便都倾倒在了靳清义的身上，一面大骂：“狗日的，你不带工具你到这里干啥子来了，你！”靳清义说：“我不是派来浇水的，我另有任务。”×副场长更气了，喝骂道：“你还嘴硬，不是派来浇水的，你就看着让渠水乱流嘛，你就是用手抓土也要堵水口子，你到农场是干啥子的？你就不知道了？”一面大骂，一面举起长枪，用枪探条在靳清义的胸前狠戳一气。

靳清义是武威步校的原政治教员。十工农场的领导们对这些部队里来的原军官们另眼看待，当作一支生力军，派他们到处冲锋陷阵。大跃进时深翻地一丈余的是他们，在场部附近的马家庄建起农场惟一的小高炉大炼钢铁的也是他们。靳清义原是军官，也是一介书生，人有些瘦弱，高个子，文质彬彬。当了右派分子后依然十分清高。在十工农场三大队时，靳清义有时也同徐保安、曾芳煜等人一起，到我们的宿舍坐一坐，聊一阵子天，所以石天爱、老殷也和他熟识。有一次，老姑娘的石天爱在他们走了之后，言谈间对靳清义还表现出颇有好感。这是很自然的，靳清义一表人才，文质彬彬，他俩年龄也相当，都是河北人，独身的她喜欢上他顺理成章。但是，清高自大的靳清义绝不会看上石天爱，这是肯定的。凭她那长相，整天吞云吐雾，手指都被烟气熏黄了的做派，靳清义如若一旦想到石天爱喜欢上了自己，兴许还会非常反感呢。再说靳清义出身贫苦农民的家庭，虽当了右派，对大汉奸、军阀石友三的女儿，在情感上也仍然有距离，自认为自己跟她不是一个营垒里的人。好在石天爱也有自知之明，对靳清义的好感只在几个女伴面前略有流露也就止步了。其实她也心存疑虑，自己是右派，再找个右派当朋友——在政治上不是自己又给自己抹黑了吗？

到了四工农场，靳清义已到了而立之年。十八年前，他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时，就已是一名儿童团成员，后又成为八路军战士，同日本鬼子在战场上拼杀过。×副场长现如今用枪探条狠戳他的胸腔的长枪，也是他当年亲密的伙伴，还是孩子的他就曾用长枪熟稔地射出复仇的子弹，放倒过日本鬼子。然而，斗转星移，×副场长现在竟然让他挨上了枪探条的狠狠的戳刺，殷红的鲜血从衬衣里涔涔渗出……此时的靳清义心中怒火燃烧！可是，他已是个被解除了武器的右派分子、阶级敌人，骑在马上用枪探条狠戳他的这个×副场长，是改造他的人，他只能默默地忍受。此时，他若略有不恭或说出什么话来，狂怒的×副场长会毫不手软地将他打倒在地，然后再逮捕他，给他判重刑。没有人会为他说话，替他辩护，只要场里出一纸公文，先抓了他再说。就说那个“二进宫”的医生，谁知是不是有上级批下的逮捕令。

这个副场长正是发下话来要用绳子把我捆到场部的人。此时的靳清义只能忍着枪探条戳下的伤痛，听任鲜血涔涔渗出……把委屈与仇恨埋在心底。他的“清高”早已

烟消云散，毫无踪影。

对我们的“改造”又升级了。

副场长的凶残霸道，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对待右派分子并不为过。只是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是在十工农场那样的特殊环境里劳动了一年多，才转换了环境，从头开始适应这一切的，许多人不堪凌辱，都觉得痛苦万分。

在此次放水期间，二站的难友也出了事。这天，一向劳动很泼辣的王杰生带了几个人去放水，不料一处水口子没堵住，水流得到处都是。第二天，梁队长带人送饭来了，看见水口子没堵住，在水渠那边破口大骂：“日你妈去，水口子没堵住，还吃饭?”王杰生在渠这边还嘴说：“骂人是你的权利，我妈没犯错误，你不能骂!”

梁队长暴怒地又骂道：“我就骂你，我还要打你哩！我就不能打你吗?”王杰生在这边仍不退让，说：“我妈你就不能骂，她没犯错误!”因隔着一条宽水渠，梁队长无法跳过来打王杰生，王杰生身边的难友拉住他，让他压住火气，再不要出声。梁队长才一路骂着回站上去了。送的饭里有二两煮干菜被梁队长扣下，没让王杰生吃。

王杰生浇完了地，回到站上，看见梁队长在搭在房顶上的一架梯子下边坐着，就问他：“你为啥把二两干菜扣下不给我。”梁队长说：“就不给你!”王杰生说：“伙食我是交了钱的，你为啥扣下不给我!”梁队长说：“把钱退给你!”第二天就宣布让王杰生进了严管队。宣布其罪行是纵容老婆开饭馆，跑自由市场。王杰生一听，就觉得头涨得有斗大。张露玲为难友们帮过忙，设法为挨饿的难友用衣物换过吃的，这怎么是“开饭馆，跑自由市场”呢？进了严管队，还怎么摘帽子呢?

在严管队，上下工都排队，吃饭不能和大伙一起随便吃，也要另排队，晚上不能回家，住的房门上锁，不许出门大小便，房子当地放个尿桶。行动进一步失去了自由。

王杰生思前想后，想到梁队长是管劳改犯的，多年来就是这么个做法，习惯成自然。“在人屋檐下，焉能不低头?”到第三天，主动找梁队长认错，表示自己确实没改造好，才有了几天前不好的表现，向梁队长赔情道歉。张露玲为了使丈夫少吃些苦，更是多次向梁队长求情下话。这样，到第四天，梁队长才发下话来，宣布让王杰生出了严管队。

少数地位特殊，在这里当了小队长，或手中多少有了点权，如当了炊事班长之类的右派分子们，也在急速地转换角色，敏感地适应这里的一切，使其更有利于自己地位的进一步改变。1959年国庆节对少数人摘帽子的事实，也是他们所企盼巴望的，处在阶级敌人——即人下人的地位，同样也是他们所力争要摆脱的。来到四工农场后，他们看见×副场长可以暴怒地把枪探条凶狠地戳向无辜者靳清义的胸部，而靳清义只能默默地承受，忍气吞声地承受。管教干部动辄向他们认为不顺眼，有“过错”的右

派分子动手打去，或耳光，或猛踢几脚，更是司空见惯。我的这些手中有了点小权的右派小领导们便很快地接受了这种对自己难友升了级的改造方式，在一旦有机会可以表现自己的时候，对同派难友也拳脚相加。挨了拳脚的难友也只能将愤怒埋在心底，敢怒而不敢言。在饥饿难耐中受此凌辱，使很多人的精神状态濒于崩溃，绝望至极，这就进一步又加重了他们的生存危机。

财务科的张振英文化低，说话粗鲁，属于有点大大咧咧的那种类型，对右派总看不惯，几次在办公室张口就骂："叚右派表现还不如'职工'。"我听了觉得难堪，难以入耳。在报社，在十工农场，谁也未曾用这样的脏话骂过我们。他用这样的脏话骂我的难友，习惯成自然，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但我不能为我的难友作任何辩解，而只能保持缄默。

有一次，张振英从二站转悠回来，说是："二站的叚右派把指头粗的长蛆（陕西土话，读còu，指一种吃庄稼的害虫）也抓来煮着吃，叫站上把煮蛆的茶缸子给没收了。这些叚右派咋真不讲卫生，吃死了咋办？"这些饱汉们作出悲天悯人的姿态，好像是为了挽救"叚右派"于死地，才有了没收茶缸子、制止吃蛆的举措。可我的难友如不是饥饿难耐，谁会到麦地里抓绿蛆吃呢？这种指头粗的浅绿色长蛆，我在十工农场的地里也见过，那时，大家肚子都吃得饱饱的，谁会想到去吃它，就是想到吃它都会恶心，然而，在目前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想出吃这种虫子，实际上也是出于自救的一种智慧，这智慧竟被粗暴地扼杀，连同茶缸也被没收。如今我们都已清楚，许多昆虫的身体都具有丰富的蛋白质，我的难友在吃麸子面肚子饥饿的时候，想到煮虫子吃来补充瘦弱的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这一奇想是多么正确！应该说是一种可贵的智慧，这智慧如若不被"悲天悯人"的饱汉们粗暴地扼杀，在当时还真是一种自救的好举措，补充蛋白质对饿极了的难友没有坏处，而且简便易行。

有一天，韩书谦等人突然由站上通知，去场部有事要办。韩书谦他们到了场部，才得知，原来场部成立了个临时法庭，要审理他们的离婚案件。离婚申请当然都是由女方提出的，他们的妻子都是工作干部，在丈夫当右派两三年后，经济上承担了养活全家人的重负，她们已觉无奈，特别是从四面八方扑来的政治压力，更难以承受。作为阶级敌人的妻子，同事、邻居都向她们投来鄙夷的目光，悄悄议论："她就是右派分子××的老婆，看那个倒霉样！"这些议论常会传进她们的耳朵。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后，她们惊魂甫定，丈夫送去劳动改造去了，她们自己依然背着骂名，处处抬不起头来。有的人，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就直截了当地要她离婚："你自己又没啥问题，你替他背黑锅图了个啥，离了婚就啥事都没有了，你是你，他是他，各走各的路。"就这样，犹豫再三，踌躇再三，她们终于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就这样，四工农场便成立临时法庭，审理他们的离婚案件。因为离婚的当事人是男女双方，韩书

谦他们便被传唤到了场部临时法庭前。韩书谦态度坦然，当法庭指出他妻子已提出离婚，他的回答是："同意。"别人并不都像他那样痛快，有的人就不同意离婚。有个酒泉银行的干部，从临时法庭回来，就对王杰生说："我们原来感情一直好，划为右派是政治上的问题，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坚决不同意离婚，我在法庭上就这样说的。"因为已是近四十年前的事，王杰生只记得这位难友说过的话，没记住这位难友的名字。

过了十天，临时法庭的判决就下达了，无论男方同意或不同意，法庭的行文一律判决为离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敌人的表态不顶啥用。

这个判决又使我想起了1958年在十工农场经历过的一桩离婚案。那是当年秋后发生的事，曾学过园艺在三大队务瓜菜的张经国，一次拿出一个"可可齐"瓜请我和陈明品尝的他，在婚姻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他妻子从张掖长途跋涉找到安西十工农场提出要和他离婚，说是办完了离婚手续，就要到柴达木去找工作。当时柴达木油田建设甫始，正在大量吸收工作人员。这事惊动了场领导，记得邹士杰亲自出面和小张的妻子谈话，介绍了小张工作和劳动上的种种优点，还谈到摘帽后的前程，左说右劝，要小张妻子不要离婚。当时，记得领导上还要我也去劝她打消离婚的念头。小张妻子的模样，至今我还有个印象。她，中等个儿，圆圆的脸，梳着小辫。小张妻子最终还是去了柴达木，是否办了离婚手续我已印象模糊。

同样是离婚案，两个农场也是两样对待。

小张作为园艺方面的人才，十工农场在迁场时未向四工农场交名单，他在玉门黄花农场顺利地渡过了大饥馑的难关。

在十工农场已摘了右派帽子的彭镜辉，原共青团员、省供销社干部，毕业于东北财经学院的高才生，现任一站管理员兼站部财务，对站上右派分子打右派分子的行径极为不满，他愤怒地说："右派打右派，这是以毒攻毒。不管怎么着，动手打人，开口骂人，是野蛮的土匪行为，是人性不纯的表现。"

从十工农场二大队来的沈潮，在1959年春节的舞会上，他曾和我跳过两场舞。当时我们的处境不错，我们只是愉快地跳着舞，并未深谈什么。以后，我们再一直没见过面。沈潮来到了四工农场一站，面对强权，面对升了级的改造。他内心的烈焰并未熄灭，他对挚友高仲君说："整风运动中，我说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普通公民该说的话，就被卷入右派的泥坑，成了阶级敌人。他们早有预谋，撒下了大网，'引蛇出洞'，我们才落到了今天的下场。但我坚信，历史总有一天会作出公正无情的裁决！"他语气坚决，面对强权，面对野蛮凶狠的管教干部，面对急速转换角色的右派小队长，他胸中怒火燃烧，仍坚信真理和正义不在那些人一边，历史最终会作出无情公正的裁决！他是1954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原金塔县人民银行的副行长，一个铮铮铁骨的

男子汉，此时年仅28岁。

我在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难友方正儒，此时和妻子王月英及两个孩子全家也都来到了四工农场。在四工农场期间，他以另一种战术为生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方正儒原是高台县委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老家就在高台县黑泉。1957年开春，方正儒回到老家，发现村里的耕牛因为无料吃，乏得无法耕地播种，乡亲们饿着肚子，乏得也干不成活。关心群众疾苦的他到县上向县委书记汇报后，经县委书记批准，向他的家乡回销了几万斤粮食，解决了乡亲们的口粮困难。但到了当年十月中旬县上开党代会时，反右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当时叫做“加深加宽”，在党内又大抓右派，他为帮助乡亲们解决口粮困难向县委书记反映情况，经县委书记批准向黑泉回销了几万斤粮食的问题，竟成为他的“罪行”，说他主张“黑（泉）人治黑，高（台）人治高”，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开党代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党内抓出一批右派来，方正儒既被认定为目标，就当定了右派。他先是被送到十工农场劳动改造。老婆孩子在农村依旧挨饿，他的乡亲们再不可能享受回销粮。十工农场是一个特殊的农场，全体职工，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下放人员都能吃饱肚子，这样，他后来就把老婆孩子都从高台黑泉接到农场。我在四大队一中队当统计时，他老婆王月英在四大队食堂当炊事员，她相貌端正，圆圆的脸儿白里透红，透露出青春、健康、欢快的气韵，很讨人喜欢。1959年底农场的变迁，使方正儒全家又来到了四工农场二站。二站的炊事员都是刑满就业人员，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站上的领导对刑满就业人员更信任，王月英理所当然地不能再到食堂当炊事员。一到四工农场，方正儒全家就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方正儒从亲身经历中知道自己的乡亲们早就在挨饿，还不许声张，不许求援，援救挨饿的乡亲们使自己由农村工作部部长变成了阶级敌人。作为阶级敌人的现在的自己，为了全家人的生存，绝不能束手待毙，在困境中的他得自己救自己。为了自救，他最初采用的方式很简单，将一件新工作服私下偷偷送给一个炊事员，其意义是明白的，不用他多说。炊事员当时每月的工资收入只30多元，一件工作服得10多元才能买到，自然是一份重礼。此后，方正儒打饭时旁边无人，就可以不交饭票，旁边有人，就可以用两张票打两份饭。后来他们又商定，由炊事员在附近的树下偷偷放两个馍，打饭时，炊事员略有表示，如挤一下眼睛，方正儒打了饭到树下去看，就能拿到两个馍。有这些补贴，方正儒的肚子就略略比别人饱些。王月英在天气转暖时，就常带着孩子到地里挖各种野菜填充全家人已饿得瘪下来的肚子。这比没带家属的难友们又强多了，那些难友们采摘到了野菜，也无法把野菜煮熟。就说那位用茶缸煮绿蛆的难友，如果有妻子在身边，他有煮熟的野菜可吃，未必就会去抓绿蛆来煮。或者，抓了绿蛆也可以在家里煮食，而不至于因吃绿蛆被队上抓住，被没收茶缸。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

写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句话被广为流传引用。在四工农场的特殊境遇里，男人有妻子在身边，有了同妻儿相聚的权利，他便有了比别的难友多许多的自由，他的一大半的生命就有了保障。

随着季节的变迁，春种秋收，地里有了各种收成，麦子、糜谷、洋芋、糖萝卜、胡萝卜等等都渐次可吃之时，方正儒施展了浑身的解数，将这些收获物都设法弄回，使全家人的肚子都填得饱饱的，这样一直坚持到最后，全家人都活着回到故里——高台县黑泉。他为使全家人活命的故事，处处运用了胆略机智，似乎是阿凡提的灵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附上了身，才使他有了那种种举措。为了不打乱本书叙述的顺序，对他的故事我将顺着本书事件的发展在后面再细细地述及。

14. 第三次夏收时节

来农场的第三次夏收又来到了。

去年在十工农场四大队夏收时的艰辛，记忆犹新。此时，我和小徐脱离田间劳动已近半年了，自知这第三次的夏收，同我们关系已不太大，不会太吃苦。

夏收自然还是要参加的，因为场部的干部们都每人拿一把镰刀割麦去了。

一个大清早，我和小徐被指派到二站的一块地里参加夏收。我和小徐手提镰刀向二站走去时，遇到了正在收割的我的难友们，他们有一二十个，大部分都熟识，其中有原四大队一中队的关维智、叶得善等人。自从我和小徐调离二站后，大家已多日不见，这次在麦田偶遇，难友之情使我们都很高兴——场部的干部虽天天见面，谁又想对他们笑脸相迎呢，身份不同使我们对那些干部的感情决然不同。他们都放下镰刀，散漫地或蹲或坐在地里，笑呵呵地同我俩打招呼，我俩也同他们亲热地说了几句话。这块地里没有二站的干部，他们显得很自在，对于暂时放下手中的镰刀很无所谓的样子。这气氛，同在十工农场四大队已大不一样。去年此时，人们只要到了地里，便立即头也不回地挥镰猛割，很快便挥汗如雨，一个个比赛似的直往前抢割，无论谁来到地边，他们也不会放下镰刀聊几句闲天。

我和小徐同他们说了几句话，也不便多待，就直奔分给我俩的一块麦地而去。到农场已是第三个年头了，我俩能单独在一块地里收割麦子，倒也是头一遭。大概是出于表现自己，在两人之间有个比较的意思，我们并没有并肩收割，而是从一块地的两头，各干各的，并且立即开镰快速收割。这次，我们用的镰刀是陕西人惯用的一种，镰刃是约七八寸长、一寸多宽的直形刀片，把刀片安在一个轻巧的木架上，手握木架的把儿，就可以收割了。刀片可以自如地从木架上取下，需要磨时，就从木架上取下再在磨石上磨。下地前，小徐还跟机修厂的“职工”要了一小块油石，拿着小油石在

镰刀上摩擦，也能把镰刃磨得锋利一些。

我们紧干了一阵，就感到乏力，就又坐在一起，拔下才成熟的麦穗，揉去发硬的麦衣，放进嘴里咀嚼一阵，再慢慢咽下，觉得挺香。小时候，每到夏秋相交之际，兰州的小吃食摊上常有绿绿的青稞叫卖，大概是为了让城里人尝鲜，用极小的碗盛了卖，一碗也就是几个小钱。咬嚼籽粒饱满、绿绿的青稞，青稞粒儿柔柔的、筋筋的，满嘴香甜，是我儿时的一大乐事。在麦田里嚼生麦子，又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小徐说："有点甜味。"我说："挺香。"然后，我们就什么话也不说了，只是加快了各自手的动作，边摘麦穗，边在手中快快地揉麦粒，然后吹去手心里的麦衣，把光洁的麦粒放进嘴里认真地咀嚼，细细地品尝。因为夏收期间饭食略有改善，饥饿感不十分突出，吃生麦粒，在我俩主要是品尝它的味道，充饥的意思不很大。吃了会儿生麦粒，我们看到地畔的草里，有一种叫羊奶角的野草，状似豆荚的羊奶角已结了许多，这是我们在十工农场时就认得的一种野草。羊奶角细细的，约有两寸长。我俩摘下羊奶角，把它放在上下牙齿缝里一捋，羊奶角里小小的果实被挤碎，流出乳白色的水汁，还真有些奶味儿呢，单论味儿，比麦粒儿还略胜一筹！在无际的麦田里，时有微风掠过，麦浪滚滚。我俩坐在收割的这块地里，麦穗盖过了头顶，不必担心有人会来监视，找我们的麻烦。暂时，我们同大自然融为了一体，一会儿吃麦粒，一会儿吃羊奶角，品尝其各自独特的味儿。这比在场部坐办公室、干杂活自在多了，从自我意识上说也是一种放松，一次难得的放松。

然而，这毕竟是暂时的忘乎所以，约20分钟后，我们又从各自的地段挥镰收割。有了去年在四大队的收割经历，我已能自如地挥舞镰刀快速收割，这里没有难友友爱地帮我多割一两行麦，也没有哪个家属因为怜惜而帮我一把。但我争强好胜，自认为割麦也是表现自己的好机会，仍拼命地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冲天干劲"来表示自己"改造"的决心，同时，也来表明自己本来的真面目。在当时，这已成为我无可改变的行为准则。

在这只有两人的一方麦地里，我较劲的对象只有小徐一人，但我认为这种较量光明正大，无可厚非。所以硬是拼命也要较这股劲。像这样较劲，我已有过多次，至今记忆犹新。1959年开春，在大田里撒粪，人们都说，撒粪是苦活重活。这活就是把冬季按一定间距堆在地里不很大的粪堆，用铁锨一锨锨铲起，再用力一锨锨均匀地撒开在地里，使肥力均匀，到处都有肥料。这活重在粪堆不很大，铲时要弯腰，铲起一锨往地里撒时，要转身、展腰、扬开臂膀。到粪堆渐次小了时，弯腰更低，转身、展腰、扬开臂膀的幅度仍如既往，不能有改变，所以活动量很大，是苦活重活。对于这样的重活，我居然敢于和工人出身的张班长较劲。我俩当时挨个站在地头，我憋足了劲，从铲第一锨粪堆时就动作飞快，摆出了和张班长比赛的架势。张班长是个矬个儿

的壮劳力，绝非等闲之辈，看出我那势头，立即舞动铁锹，迈开他那男子汉有力的脚步，撒完一个又一个粪堆，就大步流星地直奔前方目标，勇往直前。我感到体力不支，嗓子眼干得冒火，胸腔阵阵作疼，但我是憋足了劲的，我很想在同张班长的较劲中，一试自己的意志和耐力，所以在拼命中毫不懈怠。终于，到了大田的尽头，瘦弱小小的我同张班长差不多同时撒完了最后一堆粪。我俩满头大汗地笑笑，满意高兴地结束了较量。内心得意的其实只是我自己。我认为自己在逆境中作出证明，自己比过去刚强了许多倍，只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会如此。现在，在这块麦浪翻滚的大田里，我信心十足，认为自个儿的实力绝对不是小徐所能赶上的。

我不顾汗滴不断落在黄土地上砸下一个个的小坑儿，也不顾眼镜片蒙上了厚厚的水气，在汗水的雾气蒙蒙中视野模糊，仍一个劲地舞动镰刀快速收割。有了去年夏收的经验，收割动作已规范化：右手先用镰刀钩住一大束麦子成半圆形，再用左手揽住麦束，接着把右手里的镰刀略略向外伸出，然后向怀里顺着地皮用劲一拉，麦束便顺顺当当地被割倒，割倒的麦束要就势放成整齐的一堆，过会儿等割下一片之后，再把它们捆成捆儿。在十工农场时，捆麦子的草要子，是用茏茏草在夏收前早就拧就的，夏收时把草要子运送到地里，捆麦子时只要拿一根草要子，捆紧捆牢就行。要防止把麦捆子捆得太大。茏茏草要子比较长，可以把麦捆子捆得很大，但麦捆子太大了，到把麦捆子运到场上往上摞时，用木杈举高不容易。所以麦捆子捆大了，队长就要喊叫。这里，捆麦子就用麦束拧成的要子，随拧随捆。拧时，要把两束麦子的穗子交叉在一起拧一下打成结，把要子平放在地上，要子麦穗与整捆麦穗同一方向，放一捆割倒的麦子，再把分开两束的麦秆束紧从根部拧两下扳倒就行。割麦子的人自己割倒的麦子自己捆。在十工农场，割麦子同捆麦子分工明确，各干各的，都很辛苦。我和小徐在十工农场四大队学会了割麦，在这里又学会了捆麦，尽量割得快，捆得好。这收割的规范化动作，就跟卓别林在电影上表现的那样，简直成了机械动作，根本不用看，也不用想，手变成了机械，只需动作就是了。这真神奇。我们被整成了“牛鬼”，我虽自认不是“牛鬼”，自知我确确实实是人，可我还得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自己，希冀将自己改变成一个新的我。但我确信，新的我将是一个更加坚强的革命者。

当然，我和小徐都不是机械，紧干上一两个小时，我们就得小憩一阵，嚼会儿生麦粒，再摘些羊奶角换换口味，我们都感到惬意愉快。小憩几次之后，我发现小徐收割的地块，分明比我收割的地块小，小徐当然也心中有数。再后来，小徐收割时就把她割的地块同我割的连成了一片。我苦苦较劲，被她几镰刀就抹平了。我自然什么话也不能说。她摸透了我的脾气。鬼精灵的小徐啊！

我们收工返回场部时，二站的难友们早没了踪影。

但，我们参加夏收，仅仅就这么一天。后来，听说我和小徐共割了二亩来地，也

算是高记录。

此时，天气炎热，无杂活可干。我和小徐都穿上了干净漂亮的衬衣。记得我穿的是1956年同学党贻从北京寄来的一件白泡泡纱的短袖衬衣。这件泡泡纱衬衣，式样别致，中式领子上镶了浅蓝色碎花布的边儿，领口直开在胸前，同样镶了浅蓝碎花布边，短袖袖口的边呈略弯的“V”字形，也镶了浅蓝碎花布边。在那个年代，用普通布设计缝制成这样的衬衣，应该说，是匠心独运。去年夏收后休闲的日子里，我在四大队就穿了这件衬衣，还和几位难友一起，在田间照了几张相片，是韩书谦提供的照相机。

过了一两天，生产科的马淦要我晚上到他办公室里帮他造向上级汇报的报表。自从我帮王会计记账以来，这类报表已造过一些。不过是按照既定的表格规格，用复写纸复写几份。所列项目用汉字填写，为了整齐美观，我都用仿宋字体书写，再填写上上报的数目字。马淦此人，我过去在财务科就见过，以后为别的事还和他说过话，我觉得他说话比较随便，面孔不是摆得那样森严，还将对他的观感向小徐交谈过。谁知小徐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你才不知道呢，马淦才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有一次，杨股长要我和场部的干部们去麦地里锄草，我和马淦挨着锄草，不小心锄掉了一根麦苗，马淦立刻变了脸，把我数说了一顿。咱们在十工农场也锄过草，可谁会为锄掉一棵禾苗批评人？从来没有嘛！”小徐的一席话，立即又改变了我对马淦的看法。现在，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他两人，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按照他的吩咐造生产报表。他拿来的报表底子，字写得歪歪扭扭，阿拉伯数字也极不规整，这使我立即想到，这大概就是他的笔迹，一个小学程度的人。也许，由他手写的报表送交上级很不像样子，他才想到了我，由我代为造报表送交上级。工作量并不大，有一两个小时就可完成。在我认真造报表的时候，他几次凑到我身旁，他也穿短袖衬衣，借机说一两句话，把手臂紧紧地挨在我裸露的手臂上，这种“亲昵”令我反感，因为不把手臂紧挨在我的手臂上，完全不影响他对工作的指示或检查。但我不敢有什么表示，他也不敢进一步有什么举动。我曾是女记者的身份，当了右派后还有工资拿——降了5级后的工资可能比他的现工资不少，这些对他有一定的威慑。造完报表，我庆幸工作量不算大，就匆匆回了宿舍。

在场部的干部中，我觉得最好的是教育科的梁干事。别的干部我们都要称其为“股长”，梁干事不知为什么，一开始大家就称他为梁干事。教育科在业务上同我的工作没啥联系，但我因事到教育科仍去过一两次，每次去办公室只有他一人，他会从抽屉里拿出几块奶糖，递给我。我不好意思拿，他会重复地说：“拿上，拿上，拿去吃。”安西县城里的商店难得有奶糖卖，我没钱，也无法买到奶糖，梁干事不知从哪里设法买来了奶糖，热情地送我几块，执意要我拿去吃，竟使我觉得有些不可理解，却又不得不有些猜想。也许，他对反右派斗争就有看法，特别是看到年轻可爱的女性，远离家人，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使他不禁产生了同情怜惜，所以他愿意把自

己设法买到手的奶糖送我几块，给我一点惊喜。因为他知道身居农场失去自由的我，根本无法买到奶糖，而像我这般年纪的女性都嘴馋。后来我得以知道，他给小徐也送过糖块。当时我俩都对此保密，那稀罕的糖块都是各自偷偷地吃了，既不向别人说起，也不给别人。也许，他只是出于一种人类的同情心，才慷慨地把不易弄到手的奶糖分送给我们一些。

此次夏收中，一、二站我的难友中还出现了悲剧。挨饿半年的难友，在麦田里都吃生麦子，站上的干部无法到每块地里监视，吃生麦子便成为不限量地补充食物的最好途径。难友们大喜过望，在收割过程中，即使在站上干部的监视下，也设法避开他们鹰隼似的眼睛，毫不懈怠地吃生麦子，谁还会去关心收割的进度呢。我和小徐路遇他们，看见他们散散慢慢或蹲或坐在地里，漫不经心，全然没有了在十工农场四大队时一个个抢先收割的情景。政治高压和饥饿，这双重的压力，已使他们的心境有了很大改变。夏收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是我的难友们补充食物的大好时机，时不我待，机不再来。这里的夏收不像在四大队时那样会延续到四十多天，因为播种面积要少得多。难友们仅仅是看到了机遇的难得，长久饥饿的胃肠只觉得总也填不饱，吃生麦子又无人为之限量。于是，为了让长期挨饿的胃肠也满足一下，人们吃生麦子的欲壑难填，吃了又吃，总也不停。许多人凭常识知道，吃生麦子不可过量，过量了会出事，特别是对饿久了的人。而个别人不知其厉害只一味地满足胃肠的需要，心理上的需要，毫无节制地吃麦子吃个不停。生麦子本来就难消化，在麦田里狼吞虎咽未经充分咀嚼的生麦子就更难消化。这些大量填塞在胃肠里的生麦子，经饮水和胃液的发酵膨胀后，体积胀大了几倍，正常的胃无法容纳，就出现疼痛非常的症状，如得不到及时抢救，最后胃被胀破，人只有一死。我在二站的一位难友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大田里吃生麦子，他是不管不顾，对别的难友的忠告毫不理睬，饿久了的胃肠总觉得填不饱。到第三或第四天的晚上，回到站上吃了些面条，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生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大喊大叫，此时，已回天无术。到他停止了喊叫时，人已到了另一个世界。他姓徐，上海人，原共产党员、复转军人，是兰州茶叶公司的干部。妻子叫唐迪凤。

胀死了的难友，又成为二站借题发挥，对右派分子进行教育的“活教材”。第二天，割麦前，就在站里的一块空地上，召集全体右派分子及家属开现场会。死难者隆起大肚皮的尸首就摆放在一旁的地上，让参加会的每个人一眼就能瞥见。站上的王智礼队长铁青着脸，大声训斥：“你们有些人不是叫喊肚子吃不饱吗?，右派分子徐××吃生麦子胀死了。现在大家都看见了，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王智礼冷酷无情的训话，重重地敲击在每个难友的心上。他们眼睁睁地看见躺在地上的死

难者头发散乱，脸色蜡黄，肚子高高隆起，肚皮泛起青白色，肚皮上的血管因为绷得太紧，甚或已经绷断了，颜色五抹六道的。这副惨状，使他们一个个瞥了一眼之后，便立即转过了头，不忍再继续看下去。

唐迪凤哭肿了眼睛耸动着肩膀啜泣不已……她来到农场是和受难的丈夫同甘共苦的，现在，可怜的亲人抛下她独自走了。已经进了另一个世界的亲人，听不见王智礼那残忍冷酷的训话，而她还得听着，因为亲人吃生麦子胀死了“犯法”。那沉重的政治压力，她还得承受。她本该号啕大哭，吐尽几年来心中的苦水，倾诉几年来她和丈夫积郁的愤怒和委屈，而她不能。作为一个右派分子的遗孀，她连放声大哭的权利都没有，她只能噎着气啜泣不已。

在一站，也出现了我的难友吃生麦子被胀死的事实，他的名字叫刘万民，是个大高个儿，其余不详。一站的做法要缓和一些，没有摆出他的尸体进行批判。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曾多次听到过胀死人的事件，其中还包括我的一位堂伯父。在我的父辈中，论大排行，他是老六，我的父亲是老七，按老家习俗，我叫他六爸。他在20世纪50年代被判了刑，过了几年劳改生涯，在劳改期间受尽饥饿之苦，刑满释放后回到会宁农村的老家，投奔到兄弟侄儿家，只给了他一碗野菜做的酸菜。后来，他早年的一位老知交接纳了他，这位老知交家中有一只羊，就杀了羊款待他，美味的羊肉他吃个没够，那位老知交告诫他，饿久了的人吃饭要有节制，特别是吃肉一定要有节制，不然要出危险。羊肉吃饱之后，两人就在热炕上睡了，而我六爸一直睡不着，心里一直惦记着锅里的羊肉，觉得没有吃够，未能尽兴。辗转反侧，思来想去，心想老知交杀了羊就是为了招待自己的，为什么不让自己吃够呢？后来，听见老知交已沉沉大睡，他就蹑手蹑脚地爬下炕来，摸黑来到灶头边，揭开锅盖，抓起羊肉又大吃大嚼，倒是吃了个尽兴，等老知交发现时，也已回天无术，一命归西。

从得知的几个胀死的事例，我得出结论：凡胀死的人都是由于长期饥饿，饥饿是原因，胀死是结果。这种因果的倒置，常常是由于在特殊的年代里，人长期挨饿，在一旦得到充足的食物时便出现了自己无法控制，一个劲地吃的愿望和行为，最后又导致死亡。

这里，我想把我的难友，原高台县方正儒以灵活机动的战术为全家人求生存的故事，再接着介绍下去。

方正儒是庄稼行里的里手。夏收前，站上派他去浇水，浇洋芋地时，他发现有些洋芋已长大可以吃了，就顺手把长大的洋芋从根茎上取下成为自己的收获物，而把未长大的小洋芋仍留在根茎上埋在地里，让它们在浇水后继续成长。这样，站上的干部在浇过水的洋芋地里走一趟，未发现任何破绽，就增加了对他的信任。

夏收后，打麦场上缺人手，他被理所当然地派到了场上干活。当时凡劳改系统的

农场，场上干活的人都偷粮食，方正儒也当仁不让，不断从场上偷粮食，把偷来的小麦装进大大小小的袋子里，分散埋在外人不得知的秘密地方。家里绝对不放。从开始打场的第一天起，他全家人就天天吃煮麦子。因为站上的干部会随时进门来转转，随时会受到查问，而煮麦子还会散发出一种气味。他家煮麦子先是把煮麦子的搪瓷盆子搭在做饭的灶火上用大火煮，刚煮时还没啥气味，等一开锅，便立即把盆子放进炕洞里，在炕洞里烧火继续煮。盆子里的麦子在炕洞里的灰堆中一直煮着，因为炕洞门被封闭得严严实实的，什么气味也出不来。即使有人进来也发现不了。到夜深人静，不会有任何人再闯进家里时，他们全家人围坐在热炕上，端起盛着煮熟了的麦子的碗，才开始了盛宴。煮得开了花的麦子，由他们全家人细细地咀嚼品尝，再慢慢地咽下，尽情享受着别的难友想象不到的饱餐之乐！此时，方正儒想到，同全家人坐在热炕上吃偷来的煮麦子，真乃人世间之极乐也！

此后，又有了少量糜谷上场——陕西籍的管教干部除了喜吃精粉，还喜欢吃小米，为了适应他们的喜好，站里种了少量糜谷。糜谷在场上还没开始打碾，方正儒的饭食就有了改变。先在簸箕里盛上糜谷用鞋底使劲搓来搓去，搓去糜糠或谷糠，簸去糠皮，便是黄灿灿的小米了。吃惯了煮麦子的他，也想换换口味。他在场上用砖块支起的小火上，用饭盆把小米放在下面煮，小米上再放些白菜。干部到场上来转悠，看见饭盆里煮的是白菜，等干部走了，揭起白菜，黄灿灿、香喷喷的小米饭已经熟了，可大饱口福！他坐在场上，吃着来之不易的香喷喷的小米饭，比站上干部还要得意！站上的干部吃小米，自然有他们信得过的“职工”送上门去，不掏分文，不用吹灰之力！方正儒吃上小米饭可是用了些心计，在干部的眼皮底下煮小米饭，还得有些胆量。

从四工农场不论用何种手段搞来的吃食，方正儒都觉得取之有理，他自己既然蒙受不白之冤来到这里劳动改造，他也为农场创造了财富，理该吃饱肚子。“粒粒皆辛苦”的粮食来之不易，有他的一份辛劳在内。他的老婆孩子原来留在老家就挨饿。全国解放好几年之后，当农民的老婆孩子却吃不饱肚子；作为一家之主的他要担当起责任，想方设法让全家人吃饱肚子。何况，老婆孩子跟随他到了农场，是跟他同甘共苦，有难共当哩！在四工农场，老婆参加劳动的机会很少，她已没钱到商店买些年轻女人喜欢的头巾、花布之类来打扮自己。方正儒记住了自己由于向县委书记反映家乡缺粮，县上虽给了自己的家乡几万斤回销粮，自己却当了右派分子、成了阶级敌人的惨痛教训。但面对全家人都吃不饱肚子的现实，他无法回避，他要尽责。食物的来源，有时也会有些意外的途径。一次，住在隔壁的一位姓郭的难友夜里从十来里路外的农民的羊圈里偷来一只羊，宰杀后送给他半只，他也欢天喜地地收下全家共享。在饥饿的年月里全家人能吃上肥肥的羊肉，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福分。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饥寒起盗心。”而他早已不是高台县委的农村工作部部长，作为县委农村

工作部部长的为人与办事原则，早已跟他没有了干系。

夏收后的日子里，还有件事可以追述一下。有一天，机磨坊缺个人手，贺嘉宝科长通知我去干半天。我这是第一次进机磨坊，进了机磨坊，看到整个作坊的布局，大致是这样的：在一个木板的平台上有两轮石磨上下合在一起，在隆隆声中转动着，石磨的转动由一台汽车的发动机带动。照管发动机的“职工”，看样子年纪已近四十岁，自己声称他曾是潘（自力）大使的司机，方脸老显得没洗净似的。就是这样的人，在我们几个女右派到来之前，据说还有些举动，把藏在箱子里的玻璃砖的镜子取出挂在了机房里，换上了比较干净整齐的工作服。据说，他人虽劳改了，还有两三千元的存款——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可能也是他自己放出来的风。在劳改农场多年不见异性，我们这些女右派的出现，竟然在他的心理上引起骚动，是我们谁也未曾预料到的。但别的“职工”们还是注意到了，所以将他们观察到的异常动静散播开来，又传进了我们的耳中。

我这半日的任务，是把磨盘已磨过的碎麦子——它们通过两条通道流到木板平台下面的木头仓里，用木头簸箕铲起倒进麻袋小半袋，背着这小半麻袋碎麦子，踩过四五个木头台阶上到木头的高平台上，倒进石磨上方中间的一个方斗，让碎麦子作再一次的加工，再磨一次。我不知麦子总共要磨几次，我这天下午的活，就是重复地把碎麦子背上木头平台，再倒进石磨盘上方的木斗里，下来上去，上去再下来，重复不已。活倒不重，不用赶速度，不紧不慢地干着就行。大概因为麦子不停地在石磨上磨着，摩擦生热，我只觉得磨坊里比室外的温度要高，有点闷热。石天爱、王桂芳，还有一两个家属——其中一人是财务科张振英的老婆，都也在不紧不慢地干着活。机磨坊还有两个就业“职工”，一个叫冼维汉，一个叫王益清，俩人都二十几岁，说是我的兰州老乡，估计都是刑事犯罪判了刑的。他俩的任务，主要是对机磨坊电路或机械上的问题进行处理，如无故障，也干些一般的杂活。

就在我们都不紧不慢地干着活的时候，竟然还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常在机磨坊打磨子的石匠——当然也是一名就业“职工”，突然出现在我身旁，用一个很脏的小布口袋在麦堆上匆忙地装麦子，但我开始并没意识到他在干什么。他，个子矬小，在我管理油料期间也常被指派来帮助干搬动汽油桶之类的杂活。在干活的间隙，他会蹲在地上，从裤腰带上拿出一个五六寸长、竹竿的旱烟锅，再从一个小小的布口袋里用手指捏出些碎旱烟叶子，塞进金属的烟锅子里，点上火，“叭叭”地抽起来，这一切动作都不急不忙，慢条斯理，好像一抽上旱烟，他便无忧无虑，别的什么都不在话下。这天，他突然出现在我身边并没引起我的注意，我更没意识到他是在偷麦子，因为他平常也在机磨坊干些杂活。但石天爱低声在我耳边机警地说道：“他在偷麦子，快抓！”我毫不犹豫，立即上前制止了他的偷窃。他偷麦子没有偷成。石匠平

日里帮我搬动汽油桶已经有些日子了，他觉得跟我有点熟悉，见我平常和他们说话和和气气，便错以为我对他偷小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他就偷成了。岂知，此时的我，对于偷农场的小麦还顽固地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主要原因是我的肚子饿得还不厉害，石天爱又让我去抓，我就听了她的话，没让他偷成。事后，石天爱又说："你是干部（真是天晓得），到机磨坊看到他在偷麦子，你就应该'表现'一下自己。"对这等事，我确实并没有表现自己的想法，而对石天爱的话言听计从，倒是完全做到了。我的行为是违心的，还是没有违心？到如今我也说不清楚。但是，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的出现，我一直记忆深刻，难以忘记。

近年，我认识了一位女大夫，名叫郝钟宇。攀谈中，她说，她姐夫赵宗普，原是兰州市税务局的干部，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夏收季节，她年近七旬的老母亲，风尘仆仆地从兰州长途跋涉，到一个小地名叫清水的地方，去看望她姐夫赵宗普，在那里住了十几天。

这时节，也正是我们第三次参加夏收期间。

老人从夹边沟回来，路过张掖，住在女儿郝钟宇家，告诉郝钟宇说，你姐夫瘦得不像样子了，全是这几年挨饿饿瘦的，走路摇摇晃晃，根本干不动活，整个站上的劳教人员都干不动活了。那里是盐碱地，麦秆细细的，麦穗子只有半寸长，这样的麦子凭劳教人员的体力无法收割，但总不能把麦子烂在地里不收割。农场就从劳改农场调了一批劳改犯帮助这里收割。这些劳改犯人个个身体健壮，收割很快。但只收割了一星期，带队的管教干部就不同意再干下去，带着原班劳改犯撤回原劳改农场去了。原因是，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嫌这里的伙食太差，犯人们吃不饱，怕再收割的时间长了，会把劳改犯的身体拖垮。

据郝大夫的老母亲亲眼所见，夏收期间，这里的劳教人员吃的是苜蓿捏的菜团子，苜蓿是从农场的地里采掐来，用少量包谷面掺和着苜蓿捏成团蒸熟，每人食用还限量，不能尽饱吃。有一次，一个管教干部不许一劳教人员吃午饭，说他拉肚子，不能吃菜团子，饥饿的劳教人员当即哭了起来。

劳改犯们在这里收割麦子吃不上白面，也吃苜蓿菜团子，这样粗劣的伙食，犯人们在劳改农场也没吃过，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怕把犯人们的身体拖垮。而夹边沟农场的管教干部不怕劳教分子的身体垮下来，甚或还要找出理由随便克扣劳教分子的饭食，让常年饥饿的劳教分子再饿上一顿！一个成年人因不许吃苜蓿菜团子而哭了起来，这个事实本身的惨无人道，令看望女婿的老母亲心灵战栗，几乎也落下泪来，而管教干部我行我素，不以为意。在他们的心目中，劳教分子饿死若干个，又算什么！

我一直为我的亲人在夹边沟忍饥挨饿痛苦不已，我也知道那里土地盐碱化严重，我的亲人曾皮开肉绽地为挖排碱沟吃尽苦头。每到夏收季节，他吃什么饭食，能不能

吃饱，他在来信中从未提及，在这第三次的夏收中，他是否也已衰弱得没有气力收割，我都无从知道。

郝大夫老母亲的叙述，确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反右派斗争之后，从省上到地区领导，他们对于在全省新出现的开除了公职的极右分子的惩罚与改造，是选择了一个在全省首屈一指严酷与艰苦的所在，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气候与生产条件，是否能让极右分子们凭靠劳动作到养活自己，并无人想及。夹边沟的极右分子从未吃饱过饭，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其收获物无法使终年劳动的人果腹。饥饿，成为对他们的主要惩罚手段。

劳改犯在帮助清水夏收时吃几天苜蓿菜团子，为他们的管教干部所不容，怕拖垮犯人的身体。清水的管教干部还要找岔子克扣劳教分子的一顿苜蓿菜团子。判了刑的犯人身体健壮，除了完成本农场的夏收任务，还支援清水夏收；清水的劳教分子衰弱的身体无法完成夏收，吃不饱苜蓿菜团子，还被任意克扣。同在甘肃的河西地区，同在劳改系统，劳教分子的地位在劳改犯之下。

为何形成如此的局面？只有省上和地区的决策者心里明白。

郝大夫的姐夫赵宗普在这年冬天也死于饥饿。

已大部分被拆除的夹边沟农场场部

15. 我的亲人迁移到了高台明水

早在1958年，甘肃省委就做出了要把河西走廊建设成为甘肃省的粮棉基地的重大决策，经过大跃进的年代，收效甚微。后来，一项新的重大决策又形成，甘肃省委决定在河西走廊的高台明水至骆驼城之间，垦荒建成一个50万亩土地的大农场。为此，高台县曾抽调数千民工把黑河水引往明水至骆驼城一带，未能成功。此工程最后只修到高台火车站南边就停工了。但垦荒修建大农场的决策未变，并决定抽调河西走廊劳改系统的劳动力参加。1960年初，在酒泉的城郊农场，召集下河清农场、饮马农场、高台碱泉子农场、新华农场等农场的场长开会，研究如何执行落实。开会期间，各农场场长反响强烈。如下河清农场的场长就提出，其农场属就业性质，就业人员都有老婆孩子，让就业人员带着全家老小到荒野里垦荒难以做到；城郊、饮马等劳改农场的场长则提出，劳改犯人驻地有高墙岗楼，出外劳动需武装警戒监视，而驻地没有高墙岗楼，出外劳动很难警戒监视，如何能管理好劳改犯人？以上的说法都在理，难以回绝。让这些农场执行上级迁移垦荒的决定，事实上无法做到。

夹边沟农场是劳教农场，没有家属问题，劳动时一般不需要武装警戒监视，执行上级关于垦荒迁场的决定理所当然。从夏季开始，农场领导先把在嘉峪关、清水两地出外搞副业的二百多人作为先遣人员，派赴高台明水打前站。这些人员身体尚好，到高台明水后还抢种了200亩蘼子，后来顶了大用。

除了少数老弱病残约数百人仍留在夹边沟外，全农场百分之八十的劳教人员于秋后都陆续迁移到了高台明水河，在明水建了东、中、西三个站。此决定事先并不向劳教人员宣布，只是在行前一两天，向大家念了名单，告诉大家精简行装，箱子之类不能带走，只能带上铺盖和随身穿的用的。劳教人员们先步行到酒泉火车站，然后坐敞篷货车或闷罐子车去高台明水。我的亲人正是秋后到达高台明水的。新添墩的劳教人员都分在西站。

明水河是河南移民逃离后留下的一片荒野，县上也曾在这里办过农场。所谓明水河只是一条宽十多米的干涸了的河床，河中有流水，已是久远了的历史年代的事了，现在河中无水。河床两边是经过多年冲刷留下的山水沟。岸上荒草一片，只有零零落落的几间土屋和少数地窝子。由夹边沟迁来的劳教人员就只能住在漫长的山水沟里。

迁来的当天，吃饭住宿立时都成了问题。

当了小队长的王志——原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导——把一个可以避风的牛圈略加清扫，和一起的人胡乱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想起这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按照惯例，应休息一至两天。但在吃住都大成问题的条件下，休息都免了，大家在各自的地段立即开始了挖窑洞、建造地窝子的劳动。挖窑洞要简单一些，只要注意安全，把挖出的土清理到外面就行了。但窑洞不能挖得很大，住几十个人有问题，对劳教分子管理不便，有些只作为住进地窝子前的过渡性住宿地，也有些保留下来继续住人。地窝子挖得比较大，每个大队只有三个，睡觉的地方只是挖就的土台，土台上睡三四十人，每人只占据约50厘米宽的位置，翻身很困难。作为地窝子，都是从地面上垂直挖下，属平面作业，无安全问题，在地平面上，还要用土坯砌起低墙，后高前低，在低墙上搭上椽子，再盖上筏子及骆驼蓬、酸刺之类的野草，然后盖上土，地窝子的顶盖就成了。地窝子没有门，出入的地方挂着草帘子。在这样的地窝子里，夜里睡觉拥挤不堪，难以挡住风雪，更挡不住严寒。

挖窑洞，建造地窝子，都使劳教分子们体力不支。须知，此时他们已在夹边沟农

夹边沟农场荒凉瘠薄的戈壁滩上的盐碱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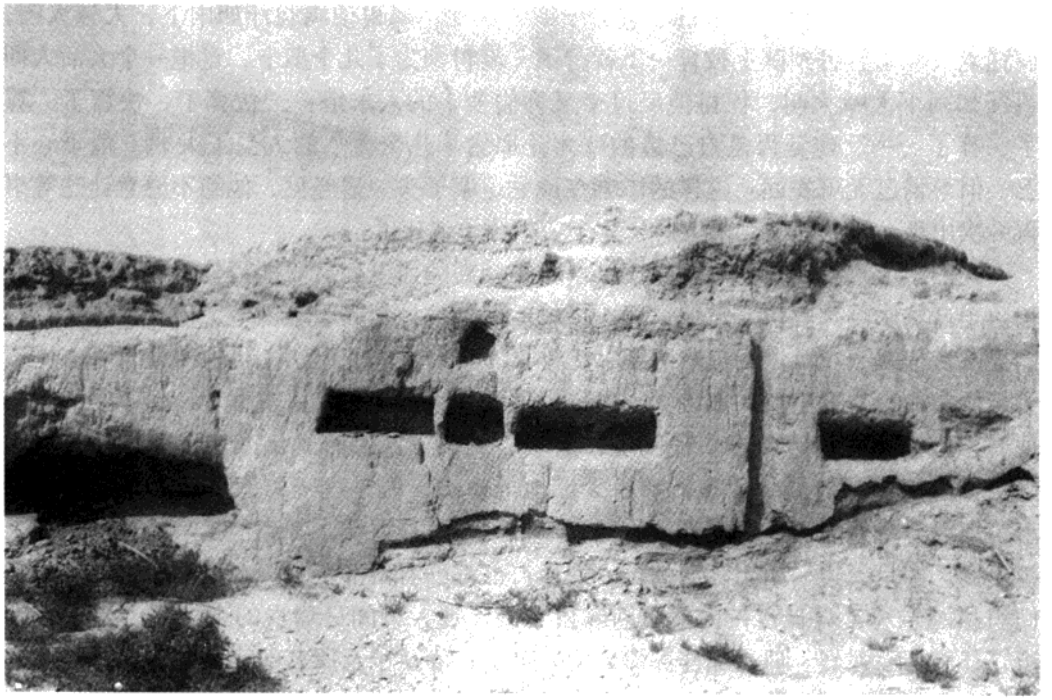
场经受饥饿的煎熬两三年了，大部分人由于长期饿馁已骨瘦如柴，走路摇摇晃晃的了。他们再也想不到，来到这一无所有的荒野，他们还得自己挖窑洞，修造地窝子。如若自己不动手，他们便只能露宿在无遮挡的荒野里。夹边沟作为老劳改农场，有矮小的土屋为他们遮挡风雨，避开霜雪，这个明水河却是个怎样的鬼地方啊！但是，这些已失去自由的劳教分子们只能服从管教干部的命令，在按照惯例可以休息的国庆节，开始挖窑洞、修造地窝子。

挖窑洞和地窝子都得挥锹铲土，有气无力的劳教分子们得尽力干，因为工作进度同他们住进窑洞及地窝子的时日是一致的。到一二里路外去背土坯就更费劲了，一尺多长又宽又厚的大土坯一块重在五公斤以上，一次背两块就要十多公斤，他们瘦弱无力的肩膀已不是两三年前在夹边沟抬土造田时的肩膀，背上十多公斤重的土坯走一二里路，只能摇摇晃晃地向前挪动着脚步，一步又一步……搭地窝子顶盖的椽子、筏子、野草，也得一样样地从他们的肩膀及手的运作中，按步就班地逐步完成。

这一艰难地挖窑洞、修地窝子的过程，使每个参与者胆战心惊，唏嘘不已，可当时他们还抱着希冀，总想着安稳地住下来，翻年会有一个较好的收成，肚子能吃得饱一点。有的人在地窝子的土壁上挖了整整齐齐的壁龛，以便把日常用的碗盆洗漱用具之类摆放得整齐有序些。有的人独出心裁在土壁上挖了小小的凹进去的圆形土台，恰足以放进一个用墨水瓶制作的小煤油灯。还有的人在土壁上挖了长长的月牙形的龛，下面的土台上放些零星的日用品。总之，这些奇巧的构思表现出初到明水河的劳教分子们对未来还有些向往，尽管前景迷惘又朦胧，他们还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把生活装点得好一点。

来到明水河后，人人更是饥肠辘辘，口粮一减再减，蔬菜主要从碱泉子劳改农场运来一些，数量就很有限。开始，还组织人采挖野菜，到深秋后荒野里已无野菜可采挖，这使每一个劳教分子都真正感到了威胁，这个冬天将怎样熬过？每个劳教分子都忧心忡忡。

我原在《甘肃日报》编辑部的顶头上司财贸组组长罗舒群，在张掖地委被定为极右分子后于1957年12月就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的亲人和他原都是西北大学的学生，西安解放后一同行军到兰州，又一同参与了《甘肃日报》的创办。我的亲人在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时，他们曾有数月同居一屋。这次，罗舒群也到了高台县明水河。他在夹边沟时，就把求生放到了第一位，他的外援力量也较强，家居老家临洮的姑母及在兰州的妹妹，都先后带着食物去夹边沟看过他。夹边沟农场不允许家属寄粮票给劳教人员，寄去就没收。他告诉妹妹在寄杂志时把粮票夹在夹缝里，管教人员随便翻一下杂志，查不出粮票，他在收到杂志时就将夹缝里藏着的粮票取出再想尽办法买饭吃。在夹边沟时，他曾在夜深人静时，独自走一二十里路，到那里的一个工地



没有顶盖的地窝子的土壁上当年受难者们挖的放置煤油灯及日常用品的壁龛

食堂买饭吃。到了明水河后，他发现在高台火车站旁边有个小饭馆，使他大喜过望。在一个休息日，他带着粮票和钱，在小饭馆买了四五碗面条填饱了肚子，然后就拿出纸笔在候车室写家信，打算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告诉家里人，向家里人紧急求救。车站旁边还有个小邮局，信写好后可直接寄走。可就在他动笔写信的时候，饭馆里来了个管教干部。此人并不认识罗舒群，但看到罗舒群衣着褴褛，戴着一副眼镜，急急写信的样子，就断定罗舒群是归他们管教的劳教分子，立即大声喝道："你在这里干什么?"罗舒群站了起来，回答："写信。"管教干部厉声说："你写信为什么不到队上写?"说时迟，那时快，一副冰冷的手铐已铐住了罗舒群的双手。管教干部带着罗舒群回到队上，罗舒群承认错误作了检查后，手铐方才被打开。罗舒群向家里人紧急求救的信一时未能寄走，他感到幸运的是管教干部迟来了一步，他已将四五碗面条吞下，填饱了肚子，如果在正吃饭时撞上管教干部，不仅无法继续吃饭填饱肚子，他还得交代粮票的来源，那就会更麻烦了。

大部分劳教分子只能在饥饿的煎熬中忍受痛苦，也有个别人在忍受不了饥饿的煎熬时设法找东西吃。有个劳教分子看到农民种的撞田里有些萝卜尚未挖完，就偷偷拔了几个塞进嘴里咬嚼，偏偏被看管撞田的瘸腿老汉看见告到了队上。队上的管教干部

拿了一根麻绳立马把偷萝卜的劳教分子捆翻在地，痛得他满脸汗如雨下，大喊大叫，瘸腿老汉原来想告到队上教育一下就行了，没料到为了几个萝卜，竟把一个大活人捆得汗如雨下大喊大叫，惊得他反过来又为偷萝卜的人求情："快算了，快算了，算了，算了……"他觉得是自己造的孽才让那偷了几个萝卜的人受了大罪，他于心不忍，但事情已无可挽回。这样的惨剧在他是这辈子头一遭经见，他绝不愿意让这等事再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两天后，这个劳教分子就死了。

我的亲人来到明水河一安顿下来，在得知新的通讯处后立即写信告诉了我，他深怕由于迁场影响到收信。自然，对于迁场后遇到种种新的艰难困苦，他只字未提，不能提及。他属于在饥饿的煎熬之中，无外援，自身又毫无办法，仍保持着自尊心，不去偷偷摸摸，自寻生路的那种人，所以，他的处境至为悲惨。支撑着他活下来的，是他对未来尚抱有一线希望。他知道，妻子、俩孩子及所有的亲人都在企盼他安全归来，都殷殷等待着同他团聚的那一天。他渴望的，就是这一天能早日到来。回首往事，那些曾令他痛心疾首痛不欲生的大小批判斗争会之类，都离他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像是天边一团团暗淡的云，连他自己都已看不清楚了。在他心中，只有亲人们炽热的亲情，日日夜夜向他不断发出召唤。那人世间最珍贵的亲情啊，虽远在天边，却清晰而强烈。他是那样深深地爱着妻子、俩孩子及所有的亲人的啊。在这年复一年自己身心都遭受着巨大磨难的日子里，他是苦于连倾诉内心这深深的爱的机会都没有啊，每封都要经过检查才能寄走的信，他哪能把内心想说的话写上一句半句呢。他沉默啊沉默，在沉默中守住孤独，守住内心的愤慨和怨怼。他觉得满天的乌云总有一天会一扫而净，阳光明媚，天空碧蓝如洗的日子会到来。

10月上旬，由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迁到高台的场部，来了个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入学不久的十九岁女大学生，名叫吴玉玲。她为什么来这里呢？原来，在国庆节后的一天，她突然接到定西县家中的电报，要她"速回"。她立即赶回定西县小北街72号家中，在提硝厂当工人的母亲马新民忧愁地告诉她，几天前接到劳教农场的电报："吴瑛已亡故"。吴瑛是吴玉玲的大哥，母亲不相信刚刚二十几岁的大儿子会突然亡故。就在三个月前，吴瑛曾到定西看望全家人，说他要出差，顺路看望大家。吴玉玲清楚地记得，英俊的大哥穿一身深蓝色条绒中山服，还笑着问她："你看哥的这身衣裳阔气不？"她高兴地回答："阔气。"不到三个月，突然接到劳教农场的电报，说大哥"已亡故"。母亲不相信大儿子"已亡故"，用电报把大女儿从兰州叫来，抹着眼泪对玉玲说："世上重名重姓的人很多，我不信你大哥好好的个人咋就殁了，你年纪最大，妈就打发你走一趟，看看这事是实是虚。"此前，有个邻居芮大妈已到高台看望丈夫芮杰三去了，走时带了许多吃食，说是那里吃的困难。玉玲母亲心想儿子还活着，就急忙准备了些用榆树叶和谷面做的熟面，还做了些包谷面和苜蓿蒸的"烀馍

馍”[①]，就打发女儿玉玲上路了。

吴玉玲在定西坐上火车十几小时后，清晨在高台站下车，问了路，在戈壁滩上一直向北走去。路上遇见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大嫂，这位大嫂一路走，一路从背着的包包里拿出黄纸钱随手撒出。吴玉玲问了问，原来大嫂的男人已死去，大嫂是从东北赶来祭奠亡灵的。走着走着，迎面蜂拥而来了几十个瘦骨嶙峋、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人，他们是收工回来的劳教分子。劳教分子们见到吴玉玲，就问她是来看谁的。吴玉玲说：“我大哥，叫吴瑛。”众人说：“已经死了好几天了，饿死了。”吴玉玲立即大哭起来……

此时，劳教分子们有些已经跪在地上，不停地作揖，向她讨要吃食。吴玉玲就伸手从背着的包包里抓出一把把的“烀馍馍”，分给大家。饿极了的人们，捧住“烀馍馍”就立即送入嘴里狼吞虎咽。“烀馍馍”分完，又分熟面。一阵风吹来，把有个人手里的熟面刮走了。众人就揭起衣襟，把分到的熟面包住，再慢慢吃。大家还七嘴八舌地说：“我们这是在生命线上挣扎，毛主席、党中央并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我们挨饿受苦的情况，你是干啥的，你能不能帮我们寄信，把我们的情况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救我们的命。”吴玉玲含着泪说：“我是西北民族学院的学生，我回到兰州后，一定帮你们把写好的信寄出去。”这些受难者老老少少都有，他们有些称她“大姐”，有些叫她“娃娃”。听到吴玉玲答应帮他们把信寄出去，他们又不停地作揖，连声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们回去这就写信，你回去时帮我们带上。”吴玉玲问：“我大哥埋在哪里？”众人指了指北面的远处说：“坟就在那里，那是一片坟滩，没有任何标记，你就是到了坟滩，也找不到你大哥的坟。”吴玉玲流着眼泪告别了他们，到场部说明了身份，然后到坟地看了看，果然只有一个个的坟堆，没有任何标记。吴玉玲连声哭喊：“大哥，大哥，你真的就这么走了吗？我回去咋给妈说，咋给妈说！”后来，她到先她已来到此处的芮家妈和芮家爸住的地窝子里。

吴玉玲的大哥，是西北大学地质系五三届毕业生，在校时品学兼优，担任班上的班主席。原为西北煤田地质勘探队采样队队长，为西北五省（区）勘探煤田出了大力。1959年庐山会议后，吴瑛对彭德怀蒙冤表示不满。后在单位“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作为“白旗”被拔掉。到1960年8月单位领导决定送他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三个月。吴瑛于赴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途中，顺路在定西看望了全家人，怕给家里人增加思想负担，佯说要出差几个月，心想劳教三个月很快就会回来。家里人没想到，他自己更没想到，此一去竟是永诀。

---

①烀馍馍：烀（hū）一种半蒸半煮的烹饪方法，甘肃方言读qūn。烀馍馍，指把面粉和上蔬菜、洋芋等半蒸半煮做成的饭食。

已经坍塌的当年右派们居住的地窝子群

吴玉玲来到芮家爸住的地窝子里，看到芮家爸睡在土台子上，已起不来了，他靠在被窝上半躺着，芮家妈用小勺舀着熟面糊糊一口一口地喂他吃。芮家爸有气无力，喘着气，断断续续地介绍吴瑛的情况说："你大哥才来的时候，人攒劲得很，那时候，我们都已干不动活了，你大哥和泥打土坯都抢着干，一个人顶我们几个。以后，就也干不动了，肚子里没吃上啥，饿得干不动了。后来，饿得没治，生吃院子里堆的红萝卜缨子，吃了拉肚子，拉了一夜，到天亮就咽了气了。你大哥来时说他的劳教期三个月，可不到三个月就把命送了，才是二十九岁的人哪……"吴玉玲抽抽噎噎地哭着，听了芮家爸的述说，心如刀绞。地窝子的土台子上睡了有三四十人，挖出的土壁上蒙了厚厚的一层白霜。吴玉玲就在芮家妈身边，靠在蒙着厚厚的白霜的土壁上半睡半醒地坐了一夜。

第二天，地窝子里就抬出去了死去的人。吴玉玲见到托她到兰州给毛主席、党中央寄信的人，问他们信写好了没有，他们说还没有，让吴玉玲再等一天。这天，场部把她大哥吴瑛的三件遗物给了她：一副眼镜、一个印章，还有一个用线衣缝成的布袋，布袋发出浓烈的蒿草气味，像是装过野草之类的袋子。下午收工后，受难者们送来了上百封的信件，信封上都写着"北京：毛主席、党中央"，或"北京：国务院、周总理"。这些受难者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兰州，可不敢把这些信件塞进一个邮

简，一定要多走几个邮局，把这些信件分散在各个邮局寄出，哪怕其中有一封信送到了毛主席、党中央那里，我们就有救了。不然的话，你大哥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我们是在生命线上挣扎，向你求救的啊！”

吴玉玲把这些信件装好，第三天早上就动身回兰州。那些受难者们正要上工，看见要离开的她，都把生的希望放在了她将要寄往北京的上百封信上。吴玉玲去火车站要朝南走，受难者们上工要朝北走。吴玉玲见到他们，就停下脚步，挥手向他们告别。这些受难者们离她已有一段距离，仍郑重地一一向她告别。有些人身体衰弱，已直不起腰来，仍费力地举起双手向她致意，有些人双手连连作揖向她致敬。他们凄楚的眼神令吴玉玲心酸非常，她心想，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的信寄出去。

到了兰州火车站，她没有回学校，而是一出火车站，就找邮局。到第一个邮局寄几封带来的信，再找另一个邮局再寄出几封信。就这样，从火车站，一直到西站，又到十里店一带，寄完了上百封信。然后，她徐缓地长出了一口气，觉得完成了受难者的重托，心里踏实了。这才在西站附近的表姐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才返校学习。

四十年后，吴玉玲已从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上退休。一天她在同我邂逅中说到这件往事，仍为英年早逝的大哥吴瑛悲痛不已，她感到安慰的是经自己的手她把受难者的心声传送到了毛主席、党中央那里。她不无自豪地说：“我当年立了大功了。”是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条件下，要把受难者们的心声传送到毛主席、党中央那里是很难很难的，她善良诚实的心使她完成了这一使命，她热情救人的人格力量使她义无反顾地圆满完成了这一使命。

就在此一时期，四工农场从一、二站的右派分子里，抽调了30多人也派往高台县办场。当时我人在场部，并不知此事。这30多个右派分子被派往高台县，其目的与夹边沟农场迁场不同。30多年后，我听一站站长王志玉说，当时四工农场的头头们已风闻农场要迁往新疆，右派分子们原在甘肃都有单位，不属就业性质，管理起来也不顺手，所以，他们在迁场前准备把全场的右派分子仍留在甘肃，派往高台的这部分人就是分流出去，先走一步，为以后把全场的右派分子都留在甘肃作些准备工作。

此次，派往高台的难友，我所熟识的有关维智、兰生玉、杨得春以及30年后才认识的阎廷梁等人。阎廷梁原本就是高台县的干部，据他说，此次他们被派往高台县，最初也说去明水河，后来又改变决定，全部去了碱泉子劳改农场。碱泉子劳改农场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设置的一个劳改农场，是个老劳改农场，各方面略有基础，便于管理。

说是碱泉子农场的地盘，我的难友所在的小地名叫骆驼城（曾为北凉古都），四周荒无人烟，一片草滩，同碱泉子农场的其他站、队都不连畔。

这三十多个难友，是由一个不到四十岁的张指导员领队到达骆驼城的，也是于9月底到达。到达的当天，大家先挖地窝子，挖半人深的长方形大坑，上面架上椽子，

盖上树枝、草席，用沙石一压就成。地上铺麦草，再铺上行李，住宿处就完备了。每个地窝子原则上住八人。用的椽子、树枝、草席、麦草等都是从四工农场准备好拉运去的。不分白天黑夜，什么时候挖好，什么时候休息。当然，这三十多个难友还为领导挖了较为宽敞高大的“公寓”，还挖了个伙房。

此时，每人每月还有24斤的粮食定量，从四工农场迁来时，还带了些洋芋、胡萝卜，每个人处于半饥饿状态。但是，第二天，大家就到无垠的戈壁滩上划线挖沟开荒，在挥锹平地中，人人汗流浃背，许多人只穿着背心干活。一周后，张指导员指定关维智为记工员，每天量方，检查质量，统计工作量，此外，也跑跑采购，在碱泉子总场场部为队上购买日常用品，在梧桐泉火车站办些事务性工作。伙房炊事员是个刑满就业人员。在三十多个右派分子里，独独带来一个刑满就业人员让当炊事员，由这也可以看出领导上对刑满就业人员情有独钟，也是为了方便自己。

到11月，口粮减为每人15斤，每天每人只有半斤，还从四工农场运来了代食品——碱菜子。高台县属重灾区，饥民大批死亡，骆驼城离农村远，想从农民那里买些或找些吃食绝无可能，这样，我的这些难友便陷入了绝境。在饥寒交迫中，已无法劳动，每天晒晒太阳，想法挖些野草树根以图保命。

我们在场部，炊事员根据领导指示，把碱菜子、麦草等代食品都作了精细加工，和在面粉里做成面条，还做成馍馍，其主要原因是场部的干部工人和我们同吃一个灶，炊事员不敢怠慢。这里山高皇帝远，炊事员只一人，他不去花费许多辛劳精细加工碱菜子，碱菜子只是随意地和在糊糊里。未经精细加工的碱菜子进入胃肠之后，非但消化不好，还造成便秘。为了排出黑黑的结成硬块的粪便，人人几乎都挣得肛门鲜血直流，痛苦莫名，大喊大叫！

再说，炊事员还肆无忌惮地做起了钱粮交易，在这生死关头，炊事员利用手中掌握的吃食，同个别手头略宽裕、同他敢于进行交易的右派分子进行交易，换取他手中的钱。

这样，吃到每个人嘴里的口粮，每天连半斤都不到。手中无钱，又无其他办法找来吃食的人，仅靠饭票维持生命的人，便只能坐以待毙，迎接死神的到来。很快，地窝子里便出现了死亡。

到了12月中旬，这里又增添了一支三十多人的右派分子的队伍。这是一支巡渠的队伍。在四工农场夏收扫尾之际，由一站、二站抽出，派出一辆大卡车，一个管教干部带队，一直向东出发，最东到达张掖县甘浚堡。任务是巡视昌马河、黑河等主干渠渠道，凡是遇到渠帮坍塌堵塞的地方，三十多人就修挖疏通。河西走廊的河流多为东西走向，他们就顺着干渠边修边向西前进。这支队伍有报社的杨骁、汪志英，还有我熟悉的周至德、王洪勤等人。

离开了四工农场，对于这支队伍可说是来到了自由天地。一到甘浚堡，农民的地

摊上摆满了各种瓜果，价钱非常便宜，可以随便买来吃，汪志英一次就买了20斤西瓜，吃了个满意痛快，边吃边松裤带，直吃到最后弯不下腰来，才算尽意。在四工农场饿了七八个月的胃肠，来到甘浚堡才算享上了福。有些农民看到他们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像是饿疯了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有时也施舍些吃的给他们。

此时，树叶儿正绿，他们只要见到榆树，都知道榆树叶儿可以充饥，便立即上前，抢着把榆树叶从树枝上捋下，立即送入嘴里大嚼，然后忙忙地吞咽下去，接着再飞快地捋树叶，再忙忙地咬嚼吞咽。这不花一分钱就能充饥的榆树叶，对他们是多么金贵，能够吃到榆树叶，又是多么可贵的机遇啊！在四工农场的农田周边，都是茫茫荒原，戈壁滩上没有一棵榆树，他们已经几年未见到榆树了。

修渠疏通的活没有定额，也无法规定定额，可以边走边干，活很轻，随意性也大。这三十多个难友能够随意买到吃食，填饱饿瘪了的肚皮，个个心花怒放。最初，他们还能从拮据的生活费里挤出钱买吃食，后来，钱花得分文不剩了，就拿出衣物，以物易物，换吃食，反正行李衣物都全部带着，解决肚子饿是头等大事。这一行三十多人边修渠，边向西转移，由张掖而临泽，最后才落脚到了高台县碱泉子农场所属的骆驼城。此时，已是严冬季节。

乍一到这里，住进了冰窟似的地窝子，他们便看见了死亡。

晚上，人们齐排排地睡在了作为通铺的土台上。天亮后，此时已没有了上工之类的事儿，而人们总得爬起来活动活动，晒晒太阳。而此时，通铺上总会有一两个一动不动的人，走过去摇动一下，才发现他们已悄无声息地死了。

大家心中都清楚，死亡正在向每个人逼近。

强烈的生存意识，使每个人都幻想找出一条生路来，但严酷的生存环境，又使人人陷于绝望。此时，杨得春找了个理由，请假回兰州的家探亲去了。

到12月下旬，四工农场终于指示，骆驼城的数十名右派分子们全部集结到碱泉子农场场部。碱泉子农场属老劳改农场，场部有住房，我的这些难友们便全部住进了土屋。

1月，我们在四工农场场部，每月的粮食定量已恢复到30斤，每天都有牛羊肉可吃。他们搬迁到碱泉子农场场部后，不仅住进了土屋，吃的也略有改善，据关维智回忆，1961年元旦这天，吃的馒头比平常要大一点。到场部后，难友们的死亡停止。

后来，回到兰州的杨得春来信说，省上有决定，下放农场的人员要全部回原单位。这不啻是晴空里的一声春雷，给每个受难者的心里点起了希望的火炬，绝望一扫而尽！

从此，每个难友都兴奋不已地等待着回原单位的一天，知道同妻儿亲人团聚的那一天即将到来。

他们得知此信息，至少比我早了十天。

16. 口粮一减再减

一天，我在财务科见到一站站长王志玉，他说："你和徐福莲那天到一站买瓜来。"一句话才提醒我：虽在农场，今年我们还没吃过瓜呢。前两年在十工农场，我自己就种过瓜，和大家一起，充分享受过安西瓜的甘甜。今年我已脱离了田间劳动，不知四工农场是否也种瓜，我不能打听，不可能到田间去买瓜，也没见到场部有卖瓜的，几乎已把吃瓜的事给忘了。现在，王志玉既然提出让我和小徐到一站去买瓜，这真让人高兴！回到宿舍我告诉了小徐，小徐自然也非常高兴。第二天，我们就各找了一条麻袋，带了些钱，到一站去买瓜。一站离场部也就是一二里路，在场部东边。到一站后，见到王志玉，他就带我们到旁边的一个装瓜的房子里让我们自己去装。我们见屋里没人，就先拣起瓜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吃进肚子里的瓜是无法算钱的，不吃白不吃。王志玉没有想到我们在吃瓜，一会儿，又进来问："怎么，还没装好？"我们不好再吃，才急忙各装了多半麻袋瓜，背出来过秤，付钱。

这时候，我们看见了原十工农场三大队的统计高仲君。他在一站仍当统计，日子比我们就好过多了，他可以随意买瓜，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一站往外拉运瓜时，趁赶车人不在，他和难友冯启英——当时也在一站担任了个什么职务——合伙从车上偷下几个瓜塞在草垛里，留下再慢慢吃。农场的瓜外运时不过秤，只要赶车的人没看见，就啥事没有，所以，他们早早地就吃上瓜了，吃瓜比我们多得多。

我和小徐背着瓜到了宿舍里，石天爱和王桂芳根本没机会去一站买瓜，王志玉没叫她俩去，她俩对我们很是羡慕。我和小徐各给了她俩一个瓜，她俩各有了两个瓜，便立即大嚼起来。

此时，胡萝卜、洋芋也陆续收获。大田里我的难友们在挖胡萝卜、洋芋时，不免要将这些可食之物送入口中充饥，生吃胡萝卜对于饥饿的人们无异于享受美餐，谁也

忍不住要将那又甜又脆的收获之物迅速在铁锹上刮几下泥土，并立即送进嘴里“咯嘣咯嘣”地咬嚼起来。设若他们都是自由人，一切该是多么美好啊！这一幅田园劳作图也许会进入诗人的笔下，经诗人的创意成为引人入胜的佳作。但，他们都不是。这样，他们的饥饿与狼吞虎咽胡萝卜的样子，便成为新的罪行而受到处置。一站的难友张汝云，兰州解放初期在“文协”的筹建活动中我们都积极参加而相识，他的妹妹也是兰州女中的学生，曾和当时甘肃文工团的武玉笑同台演出《兄妹开荒》。我在甘肃日报社工作后，很少再见到他。没想到，1958年我们在安西十工农场相遇时，彼此也都已成了右派分子，后来，又先后到了四工农场。在挖胡萝卜时，张汝云因饥饿忍不住吃了几个胡萝卜，被当小队长的右派看见。此人系原西北大学的学生，在省公安厅被定为右派分子后，老婆和他离了婚。来到四工农场后，原公安系统的右派分子只要表现“积极”，很容易受到干部们的赏识，而被委以重任，此人正是在此种情况下当上了小队长。说起来，在十工农场时我们也有过接触。1958年夏收时邹士杰组织巡回演出队，他也是成员之一。他是陕西人，会唱秦腔，曾和兰生玉同台演出秦腔折子戏《藏舟》，当时，演出队人员经过精简，在他俩演出《藏舟》时，无人打边鼓，我便临场充任了打边鼓的角色。乐队的符文虎教了教我，我听着乐曲，在过门中按要求每次敲两下，就完成了任务。他自从当上了小队长后，自认为摘帽有望，原来的难友，在他的眼里便成为他表现自己的目标。他个子高大，相貌堂堂。这天，他看见了张汝云吃胡萝卜，便怒不可遏地走过去，拿起张汝云手中正在吃的胡萝卜，猛戳进张汝云的嘴里，并使劲把胡萝卜在张汝云的嘴里摇动，使张汝云的嘴里立即鲜血流出，血污沾得满嘴都是，周遭的难友们惊愕得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出于自我保护，什么话也不说。这是右派之间的相残，一个是为了邀功，一个仅仅是忍受不了饥饿，吃了几个胡萝卜而已。邀功者做出此等情事，可恨之极，也可悲之极！如果不是头上那顶可恨的帽子压得他也喘不过气来，他怎么会为别人因饥饿吃了几个胡萝卜的小事，而将自己同类戳得满嘴鲜血淋淋！人格，良知，在他已是无所谓的了，只要把头上的帽子摘掉。

半年多来，我的这些担任了小队长之类职务的同派，大部分人自认为得到领导的赏识，摘帽有望，便不惜出卖灵魂，时时捉摸管教干部的意图，处处仿效，对原是难友的同派横眉怒目，由张口斥骂，逐渐发展到拳脚相加，完全是一副为虎作伥的架势。此人在胡萝卜地里的表现，只是其中的一例。

此人曾多次拳打脚踢右派难友，难友们当着他的面怕遭到报复，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也有人告到一站站长王志玉那里，声言：“王站长你管不管？你若不管，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制服他。都是右派，他有啥权打人？我们也会打他，可以打他。”但是，在这个改造不断升级，专政不断强化的地方，此人虽飞扬跋扈，激起众怒，但终究谁

也没敢打过他，他始终受到保护。

9月，赵秉仁终于病倒了。1947年，他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到上海求学期间，就发现有肺结核，曾认真治疗休养过。1949年到甘肃日报社工作后，报社医疗生活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肺结核逐渐痊愈。1960年到四工农场后，一直饥肠辘辘，在去上工的路上，他常常摔跤。春耕大忙过去，在换洗衣服时，他发现自己的全身活像在学校实验室里的骨骼标本，肌肉像是被用利刃削去，用“皮包骨头”四字形容真是最恰当不过。要命的是还常常浮肿，一旦肿起来，手就肿得像紫茄子，消了肿，手又干瘪得像鸡爪子。一场重感冒、高烧后，肺炎、肺结核全来了。此时，他是多么想念家中的亲人啊！他怕再也见不到亲人了，一封家书，立即把妻子秦淑才从迢迢千里之外的兰州召唤到了面前。

秦淑才走进病房时，赵秉仁是拄着拐杖从炕沿站起迎接妻子的。秦淑才立即迎上前去扶住了他：“秉仁！”“二姐！”二人的眼泪都像泉涌似的流了出来。同房的病友们劝解说：“别哭了，你来了他都好多了，前些天，他扶上双拐还站不起来呢！”病房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秦淑才扶着拄上拐杖走路颤颤巍巍的赵秉仁走到屋后，铺了件衣裳，两口子坐着说话。秦淑才从兰州家中设法带了些吃食，在火车上买了一碗米饭包在手帕里。秦淑才把手帕解开取出米饭，赵秉仁一见就用手抓着吃了几把，连连说：“香极了，香极了，总算吃到米饭了！”二人泪眼相对，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秦淑才是工人，此次只请准七天假，在四工农场只能待五天。她看见丈夫病成这样，就决定接他回兰州养病治疗。她向一站的领导提出要求，又跑到场部，向场部的领导一再提出要求，都被用各种理由回绝。

当时，兰州已是一座饥饿的城，他们家中还有三个幼小的孩子：和平、荷清、尕珍。秦淑才留在四工农场对赵秉仁已无力帮助，三个幼小的孩子需要照料，而且，假期已到。

这样，她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此次离别，竟成永诀。

就在此期间，我的难友已出现死亡。

郝治忠，山东人。他是在抗美援朝前线上甘岭战役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胜利归来的连长。武威步校领导上原曾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在反右斗争中栽了跟头。他，个头很高，脸颊上有着在上甘岭战役中被美国的汽油弹烧伤留下的伤疤。在凶恶的美国侵略者面前，他勇敢抗击，指挥战士抵挡了多于自己数十倍的顽敌，获取大胜。但是，在四工农场，他戴着镣铐，无法抵御饥饿对他的围攻。曾是勇士的他，在秋天就无言地倒下，告别了人世。

杨振英突然宣布：10月，我们的粮食定量减为24斤。什么原因？没有说明。这对长期以来一直吃不饱的我的难友及“职工”们，造成很大恐慌。但谁也不能说什么，

不许有什么抱怨，谁如若有任何不满的表示，便是反对党的粮食政策，必将招来更大的麻烦。人们都沉默着，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和我的女伴们立即就饥饿难耐。好在我和小徐不久前刚从一站买了些瓜。这些瓜便首当其冲地担当了充饥的重任，我俩每天都吃一个瓜，而吃瓜，已不是盛夏时节普通意义上的吃瓜——为了解暑、解馋、增加一种美味的品尝。只要把我俩吃瓜的程序作一番介绍，读者就会了解其真正的含义。每天午饭后，我俩都从各自的麻袋里拿出一个瓜一洗，拿出小刀切开就吃，同屋的石天爱、王桂芳已无瓜可吃，我们只自顾自地吃，不看她们，连句客气话也不说。瓜一切两半后，用小勺把瓜瓤带瓜子舀出，先吃瓜瓤，在咀嚼瓜瓤时把瓜子吐出，放在各自的窗口去晒。然后再把瓜切成牙，连瓜皮一并咀嚼咽进肚里，吃得干干净净，不留分毫。多年来，报纸上曾多次介绍用西瓜皮凉拌及做其他菜的小经验，此刻的我俩不需任何烹调，就直接经过咀嚼把瓜皮送进胃肠，也觉得十分美味。石天爱和王桂芳看见我俩吃瓜，自知已无分享的可能，就倒头睡觉去了，也许，她俩并未睡着，用耳朵听我俩吃瓜，滋味也不好受。唉，怪谁呢，那时的小徐和我，就只顾自个儿了。安西的秋阳仍十分炽烈，晒在各自窗口的瓜子一两天就晒干了，我和小徐就取回瓜子，再嗑瓜子吃。须知，此时我们吃的都是白兰瓜或其他称作甜瓜一类的瓜。瓜子呈浅黄色，细细长长的，很小，瓜子仁也很小。在城市，这些瓜子连带瓜瓤都被当做垃圾倒掉了。在这大量生产瓜的农场，我们作为劳动者却把它珍贵地收集起来晒干，再耐心地嗑开它薄薄的硬皮，用舌尖细心地舔出小小的仁儿，细细咀嚼，像是在品尝人世间少见的美味。说它少见，还由于它数量极少，嗑一把瓜子儿，它的仁儿极少极少。可我和小徐把这极少极少的瓜子仁儿，认为是补充营养的珍品。除了吃瓜，我俩把吃瓜子儿也当做人世间最美好的享受，每天都极有耐心地不屈不挠地嗑瓜子吃。

饥饿，终于使我第一次开口向兰州的父母求援，请他们给我寄糕点来，我知道他们不会拒绝，但我怎么也料想不到，安安稳稳地居住在兰州的我的父母、妹妹和我的孩子们，一向凭粮本吃饭的他们，此时也处于食不果腹的困难境地。孩子们曾在附近的菜地里，拣拾菜农收获后残留在地里的白菜帮和其他烂菜叶……有时一面拣拾，一面就将可吃的菜叶随时塞进小嘴。此时，我如若知道他们在兰州的境况，就不忍心向父母求援了，而我当时想也想不到这些情形。

我在财务科记账时，几次都遇到来向王会计报销的干部，有站上的，也有场部的，说起报销的事由，都是出差抓逃跑的“职工”的，大部分的“职工”都是刚到家一两天，就被抓获又押解回到了农场。10月的减粮，使很多“职工”都意识到难以活下去，他们既已刑满释放，就以为回到自己的家乡总会有一碗饱饭吃，强烈的生存意识，使他们略作准备，便下定决心逃跑，坐上火车，直奔自己的家乡而去。久别了的

家乡的山山水水，多美啊！家乡有热炕头，有日夜思念的亲人，有热烘烘的亲情，更有多年没吃过的好吃的饭菜，香香地饱饱地吃上亲人做好端在手边的饭菜，真像梦一样遥远而又美好。这使他们望眼欲穿勇气倍增信心十足地在通往家乡的路上搭车飞奔，超越一切障碍，打破所有的障碍，哪怕是爬也要爬回家门，死也要死在家乡。但是，他们的好梦未能成真，家里的炕头还没焐热，好饭没吃上几顿，腰里别着手枪的农场干部就追到了，他们只能规规矩矩地跟着走，坐在返回农场的火车上，在飞驰的火车的隆隆声中，他们的肚子又饿了，没有家人再递上热汤热饭……我想，为了防止再次逃跑，他们一定是戴着手铐被抓回来的。干部们抓回了逃跑的“职工”就跟抓回了逃犯一样得意，他们随意谈笑，述说着抓回“职工”的种种情景及细节。任务完成了，他们能不得意吗？这中间，我也听到家属们的议论：“抓回来的‘职工’，一个个瘦成了一把骨头，一把就能提起来，把这些人抓回来又能做个啥？”女人们心软，她们没有当干部的自己男人的那些对阶级斗争的考虑。

其实，我初到四工农场不久，就遇到过一次“职工”的逃跑，而那是一次成功的逃跑，胜利的逃跑。那个“职工”好像姓王，听口音像是江浙人，犯了什么罪被判刑我无从知道。他最初在机修厂干活。当得知我家在兰州，曾瞅空和我攀谈过几次。他说，他妻子原来也是兰州女中的学生，现在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他们有两个孩子。我对他妻子在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的职业内心很羡慕，表示：“她的工作不错！”这位“职工”也接上说：“是不错！”我的潜台词实际上内容很多：她多自由呀，她下了班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节假日还可以和孩子们一起玩玩，他们母子是多么幸福啊！这位“职工”看到我这个从兰州来的女性，或许也是想到了他的妻子，从而有了些亲切感。后来，他被派去开汽车了，原来他也是司机出身。一次外出回来，同他一起开车的平凉人杨师傅，满意地对杨股长说：“咻盘子转得漂亮得很！”我相信这位“职工”开车的技艺绝对地超过了杨师傅，所以，他才获得了这样的赞誉。以后他再开车出外时，还问过我：“带什么东西不？”我那有限的几个钱，拿在手中要紧抠着花，哪能托人从外地买东西，就谢绝了。

再后来，他在一次外出后未回来。听汽车队的司机们说，他是在柴达木建设基地冷湖一带找到了新工作——冷湖有个炼油厂，汽车队的司机常开车去那里拉汽油。四工农场肯定给那边的单位去函去人索要此人，那边的单位用人正急，严正回绝，不予理睬。这样，我这位“职工”朋友便得到有力的庇护，不再归来。

我深深地为这位朋友获得自由、获得新工作而祝福。我想，他现在可以开车到兰州同妻子儿女团聚。冷湖那边的单位既收留了他，也会给他相应的工资。他又可以寄钱给兰州的妻子儿女，使他们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他为了能在冷湖找到新的工作，一定经过精心策划，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一切一切的努力，都值得。因为，他胜利

了。当然，说得再远一些，以后的大饥馑到来时，他肯定也会幸免于难，没有哪一个司机会在那个年代挨饿。

有天下午，我回到宿舍，王桂芳、石天爱都不在，小徐满脸惊慌，小声告诉我："今天x副场长到办公室来了，说是冼维汉偷面粉，叫杨股长把冼维汉叫来，冼维汉一进办公室，x副场长就拍桌子大骂，叫他交代偷面粉的事。冼维汉开始一口咬定没偷，态度坚决。x副场长说：'你还嘴硬，把龟儿子吊起来，看你还嘴硬不硬！'一声令下，杨股长找来麻绳，先用细麻绳把冼维汉手上的两个大拇指捆到背后，再用粗麻绳从背后绑住手，利索地把粗麻绳往房梁上一搭，再往下拉粗麻绳，冼维汉就被高高地吊上了房梁，疼得大喊大叫，头上的汗大滴大滴地掉在了地上，马上哭着承认：'我偷了，我偷了！'这时我吓得跑出了办公室。"杨振英看起来是个严肃正派的公安干部，平日在同我和小徐的接触中，说话极有分寸，政策性强，我再也想象不到，他会很利索地一下子就把冼维汉吊上了办公室的房梁。小徐余悸未止，我也被发生在身边的这幕惨剧吓糊涂了，按照平时对很多事我们都应保持缄默的习惯，连连对小徐叮咛说："千万不敢说，千万不敢说，自己知道就行了。"小徐作为目击者，倒像是自己做错了事，听我一说，吓得对石天爱、王桂芳都没敢再说。可我们都错了，x副场长和杨振英光天化日在办公室房梁上吊冼维汉施以酷刑，其目的就是为了将此事张扬出去，收到"吊"一儆百的效果！这天晚上，冼维汉被吊在房梁上惨叫的声音，几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我的难友们长期以来经受饥饿的折磨，在10月份减粮以来，日子就更难过了。为了求生，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增添口中一点吃的，而苦苦挣扎着。邹映南，原武威步校的军官，拿出精致的毛毯、毛料衣服，请王杰生的妻子张露玲夜里带到一二十里外的农户那里，换回有限的一点面粉。这种交换活动要避开站上的管教干部，也要尽可能地避开难友们——怕有人打小报告，只能极秘密地进行。张露玲要再邀上一两个家属在夜里进行，往往出去一次，就得胆战心惊地在戈壁滩上奔波一夜，此时，有粮的农户并不多，走村串户地打听，还得避开村上的干部。当然如果遇上村干部家里有粮而且愿意交换衣物，交换就顺当多了。作为自由人的家属，在这危难关头，不仅在每个家庭里撑起了多半个天，而且也为救助难友尽力。

有一天，赵秉仁设法搞到些菜，在伙房后边添煤的灶膛上用茶缸去煮，被管教干部高队长看见，就大骂道："你还是个记者，还是个编辑哩，你就这么特殊，跑到伙房后边偷偷煮菜，你就不知道你是个啥球东西了。"一阵臭骂，立即制止了赵秉仁继续煮菜。赵秉仁只能乖乖地把茶缸从灶膛里取出端走。这些政治饱汉们断人活路的举动，在站上已司空见惯，高队长只是表现突出的典型。

我和小徐离开黄花农场时，当管理员的陈明曾送给我们几斤粮票——他是武威步

校原军官中最幸运的，他不曾来四工农场；还有牙医丁志远，我们平日里都开玩笑叫他丁医官，他也不曾来四工农场。这些粮票在我们由黄花农场来四工农场的路上，到饭馆吃饭用了些，还没用完。这天，我和小徐商量好，干脆请假到县城去买些东西，还可用粮票饱餐一顿。来到四工农场后，我们还没进过城，我们需要添置些东西，是请假进城的正当理由，假准了。第二天一早，我们穿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一起上路了。县城离四工农场约15公里，作这样的远行，正当青春的我们并不觉得辛苦。在十工农场四大队时我们都几次步行到县城去逛，顺便也买些日用品，四大队到县城的距离同这儿也差不多。不过，以前我们去县城，都是邀上本中队关系比较好的小伙子。同小伙子一起进城有许多方便，有些事我们可以不必自己动手，他就会替我们做了。在四大队，我曾先后同王昭、王永、李佐亭一起进过城，路途虽遥远，一路上，我们会有许多有趣的话题说个没完。

这次进县城，我们不能到站上邀小伙子，注定只能是小徐和我。这才是无可指摘的。

记得从十工农场四大队到县城，有相当一段路程是在茫茫戈壁滩上，没有男伴，我们就会迷路。一次进城，在茫茫戈壁滩上，我看到到处有一丛丛被粉红色花雾笼罩着的不知名的植物，十分好看，同行的王昭介绍说："那是罗布麻，正在开花呢！"这随风摇曳的粉红色花雾笼罩在丛丛的绿色中，既陌生又亲切，像是要引人进入一个美丽的梦。再看周围或成片或三三两两成丛的沙柳，舞姿婆娑，沙柳细细的绿叶子像柏树的，枝干却是深红色，我忽然悟到上小学时老师用来吓唬人的教鞭，当时叫做红柳条子，其实正是沙柳的枝条，想必那时兰州城周边一定也有许多沙柳生长。在十工农场，芨芨草有许多用场，扫地的大扫帚用芨芨草扎成，夏收时捆麦子的草要子用芨芨草拧就，地窝子门上的草帘子是用芨芨草编织，房顶上的草笆子也还是用芨芨草编成，下地时也常会遇到一丛丛的芨芨草，但并不太多，不引人注意。在浩瀚的戈壁滩上，有了绿色生命的芨芨草随处可见，它们招招摇摇聚成一堆堆、一丛丛，柔韧的腰身微微摆动，高傲地向你致意，却无低头哈腰之嫌。有小小的蜥蜴，在丛丛的绿色中间飞蹿。

我最喜爱的还是粉红色的罗布麻花，轻轻地跑过去，从粉红色花雾中摘下几枝细细观赏。罗布麻的花朵细细小小，像一个个的小酒盅，串成串，在枝条上如伞一般铺开。这未曾谋面的罗布麻的花朵，激起我对大自然之美的热情。我在细细观赏中还似乎闻到了它微微的馨香。来到农场之后，我再未见到过喜爱的花卉，农场的人没有养花的。安西的风暴，使这里无法种植果树，所以我也无缘见到兰州的春季盛开在果园的杏花、梨花、桃花、苹果花等等。那万紫千红的景象，在安西就从未出现过。我未曾料想，在浩瀚的戈壁滩上会出现粉红色的花雾，我的惊喜之情便可想而知了。在粉

红色花雾的点缀下，沙柳、芨芨草及别的不知名的野草都显得精精神神，有了魅力。

我手拿几枝罗布麻花，同王昭又一起上路了。心里还有几分得意：远在兰州的年轻姑娘，你们可曾见到过戈壁滩上罗布麻开花的景观！

同王永进城时，记得他从地里买了一个大哈密瓜，我们走在中途，便坐在沙柳丛边吃了。哈密瓜的美味，我在头年已领略过了，安西离哈密仅300多公里，土质气候同哈密相差无几，所以栽培的哈密瓜，堪与真正的哈密瓜相媲美。在安西放开肚子吃哈密瓜，真是我们的福分呢！从县城回来，天已擦黑，进入四大队的地界后，看到地边采摘的哈密瓜堆得像小山似的，我们只是匆匆走过，并不去碰它。

同李佐亭进城回来的路上，天色已暗，我们在戈壁滩上迷路了，走了几个小时也找不到四大队，直到后来看到东边县林业站的灯光，才弄清方向折转回来。回到队部，已是夜里11点多钟。隔壁三组的人说："刚才赵队长还过来查问，问你们怎么还没有回来。"我说是迷路了，三组的人就笑了一阵。作为男子汉的李佐亭居然在戈壁滩上迷了路，他们觉得很好笑。

从四工农场到县城，不经过戈壁滩，只消顺着农场旁边一条沙石的公路往前走，就会到达县城，这对我和小徐就方便多了，走15公里路，在我们是无所谓的。

到了县城，我们先到小饭馆饱餐了一顿，也就是各吃了一大碗臊子面。初到安西在县城住着等农场车来接我们的时候，我和报社的难友们就在这个小饭馆吃过饭，当时觉得这里的饭菜既贵又不好吃，在农场待了几年再吃饭馆的臊子面，就觉得既美味，也很值得一吃。在农场，即便有粮票有钱，从食堂也买不到这样的臊子面，何况，10月份粮食定量减为24斤后，我们每天只有8两的主食，饥饿的胃肠能吃上臊子面，真也是一次大改善呢。

饭后，我们在街上几家商店转了转，随便买了几样日用品，看到一家小小的照相馆，还走进去合了个影。到下午三四点钟时，我们就动身回农场了。

回到农场没几天，县城里的照相馆把我们的合影寄来了。半年多食不果腹，我觉得我的脸已有些瘦削。平日里，由于紧张忙碌，作为年轻女性，我们都很少照镜子，也没心照镜子。这张照片，把真实的我让我自己看到了，但我也顾不上多想，只是立即决定，写信时要把这张照片寄给景超。小徐在照片里显得特别的美，笑得特别的甜，完全是一派美人儿的风韵。我相信，她一定也是把照片寄给了兰州的他。感谢她寄走了照片，这张照片才得以保存到现在，成为珍贵的纪念。

为了挽救我急速加剧的近视，我曾问及医院里的一个"职工"，医院有没有鱼肝油。他是武山县人，我在《甘肃农民报》采访时蹲点就在武山县。我最后一次采访，被领导上的一封信召回，随后不久就成为批判对象，也是从武山县回来的。对这位武山的"职工"，我觉得有些亲切感，曾和他攀谈过几次。说到鱼肝油，我估计他也无

开处方的权利，只是试探性地问一问，想从他的回答中寻求开处方的途径。谁知，他的回答很干脆："有，你要吗，我给你一瓶。"说完，转身进了药房，回来时手里就拿着一瓶鱼肝油丸给了我。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而我不伸手接下这瓶鱼肝油丸，从别的医生那儿是不可能得到一瓶鱼肝油丸的；再想想，我现在还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自然也享受公费医疗，拿一瓶鱼肝油丸又算什么。我为夜里加班近视加深而要一瓶鱼肝油丸并不为过，就接过了他递来的鱼肝油丸。没想到，这事被告发到场部财务科贺嘉宝科长那里。两三天后，贺嘉宝找我谈话，说话很难听："他给你鱼肝油当时就被发现了，你们勾结一起，拿医院的鱼肝油，这是啥行为！俗话说：吃了人的口软，你这样下去，还会出啥事，都很难说！"拿了瓶鱼肝油丸竟被认为是"勾结一起"，"吃了人的口软"等等，这简直太难听了，从来没有人用这种口气同我说过话。难道为了一瓶鱼肝油丸，我还会和一个刑满就业人员再干出什么吗？太侮辱人了，但我拿了瓶鱼肝油丸毕竟是事实，这侮辱，在此时此地，以我的身份，我只能默默地吞咽下来。后来我想，我拿鱼肝油丸，未必当时就被发现，如果当时被发现，这瓶鱼肝油丸我就拿不回来，很可能还是同室的女伴打了小报告。多年后我才得知，四工农场医务所有的工作人员把乳白鱼肝油拿回家炸油饼全家人共享，也并没有被追究。当年贺嘉宝对我的侮辱，使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1961年，我们被"抢救"回到兰州后，我很快就到医院眼科查了近视的度数，右眼由3年前的600度整翻了一番已加深到1200度，左眼也加深到800度，高度近视已使我的眼底发生病变，我立即重新配了眼镜。到1963年，出现眼睛玻璃体混浊，并发中心视网膜炎，我病休近一年，几乎失明。就在我写本书进入定稿阶段时，由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病变再度出现，且比30多年前更严重，玻璃体混浊再一次出现，眼前出现悬浮物，右眼玻璃体后部脱离，而且视网膜出现裂孔，再发展就是视网膜脱离，完全失明。孩子们担心我会失明，劝我少用目力，少写，可本书已近尾声，我能搁下笔吗？我用整个生命在写的这本书，我只能不顾一切地继续写下去。尽管视力退步已影响写作，但我不能辍笔。我同时还得坚持治疗，每天治疗，这样，在本书的结尾阶段我分外地付出了更多的辛劳！

当年那个贺嘉宝为一瓶鱼肝油丸，不问青红皂白，大肆问罪，他根本不会想到，我在那样严酷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几乎断送了我的一双眼睛。

×副场长的凶狠霸道终于有一天也落到了我的头上。他要到酒泉去开会，当时农场的条件尚未能为书记、场长配备专车，哪怕是一辆吉普车也没有。去酒泉，从场里上车比较便捷，坐上大卡车可直抵酒泉，当然，是坐在司机旁边的座椅上，座舱里仍然是很舒适的，还可以和司机一路闲谝，路上也不寂寞。按照当时场里的规定，大卡车出外一定要有运输任务，不能空车去。这天，他突发奇想，想坐拉汽油的车去酒泉，而拉汽油的车必须先拉上空汽油桶，才能把汽油运回。下午饭后，突然通知我清

点一车空汽油桶，准备好第二天要出车，并且把装空汽油桶的几个“职工”也打发来了，立等装空汽油桶上车。这时，×副场长也大摇大摆地赶来问情况，以便督促装车。我说：“现在只有十一二个空汽油桶，装不满一车。”能不能腾出空汽油桶，这要根据司机们用油的数量来决定。司机们去拉运汽油，一般也是在有一车的空汽油桶后，才安排出车。这个×副场长想去酒泉坐农场的大卡车，命令我立即准备一卡车的空汽油桶，这是我根本无法办到的事。而他竟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大骂：“妈那个巴子，你为啥准备不好一车汽油桶，你是干啥子吃的！”骂着，走上前来，抬起脚就要踢，伸出巴掌要打我的耳光。此时，幸好我的身边有几个家属——其中一个正是杨振英的老婆马玲芳。她们为了庇护我，上前急忙拦住了他，他的手脚才未能施展开。他又乱骂了一通，才恶狠狠地走了。

后来我再见到马玲芳，她同情地说：“你们几个（指我和我的女伴）在家里自己的妈妈跟前，妈妈都亲得很，和别人家的女孩儿一样亲，到了这里……”她含蓄地再没说下去。她是以女人的善良，对我要挨打看不过眼，才庇护了我。我听到她这番话，眼泪不禁滚落下来。

我没想到，就这个凶残霸道的×副场长，还是个好色之徒。机修厂的难友赵贵春的妻子黎淑莲，年轻，容貌姣好，跟他又同是四川人。他作为副场长，一次在召集右派分子的家属们开会后，听到叽叽喳喳的家属们之中，有一个竟然说话是四川乡音。他一眼瞅过去，见这位家属长得很漂亮，细高挑个儿，十分惹人爱，就立即迷恋上了她，并起了歹心。

黎淑莲在赵贵春当了右派分子之后，于1958年初回到老家——四川岳池县农村，在4月生了个男孩。她哪里知道，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的老家，此时农民已食不果腹。她一回到老家就挨饿。作了年轻母亲的她，奶水少，小男孩也挨饿，更使她心如刀绞。再说赵贵春到安西十工农场后，根据他的专长分在机耕队工作。十工农场生活虽艰苦，无挨饿之虞，她就带着孩子来到十工农场。

在十工农场一年，她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到3月又该分娩了，当时她和丈夫住在四工农场的一个窑洞里，窑洞连门都没有，门上只挂着一张烂帆布片。到临盆时，是丈夫赵贵春接的生。没有消毒的剪刀，就用打破的瓷器片割断了孩子的脐带。才刚打破的瓷器片茬口既锋利又无菌，割初生儿的脐带，是一种既原始又科学的方法。第二个孩子又是个男孩。

黎淑莲生完第二个孩子不久，在开家属会时，同×副场长邂逅而遇。

×副场长自从认识了黎淑莲这位老乡后，便不断上门，送给她一些糖块、饼干，还介绍她认识了自己的老婆。他的老婆以女人的同情心，认识她之时就说：“你以后有啥困难就来找我。”后来果然送给她一些胡萝卜之类，在蔬菜奇缺的农场，也就算

是佳肴了。该副场长作威作福，没多少正事可干，性喜打猎，还有个骑着骆驼打猎的癖好。当他兴致勃勃地在戈壁荒原上打完了猎，常会顺路拐进黎淑莲的家里，问长问短，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说是打猎回来，奇怪的是他似乎从未打着过什么猎物，来到黎淑莲家，总是两手空空。贫苦农民出身的他，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右派们倒是有着深仇大恨，动不动就在黎淑莲面前流露："右派分子一个个都是棺材瓤子！"我的难友方正儒的老婆生了个男孩，全家人正为在四工农场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如何把孩子抓养大发愁。×副场长听说后带着怪笑，嘲讽地对黎淑莲说："右派分子还兴风作浪，方正儒的老婆还生了个男孩！"方正儒两口子在无奈中后来把生下的男孩送给了四工农场的理发员，理发员以后去了陕西，方正儒至今也未能找到自己的亲骨肉。

再说黎淑莲从他那嘲讽的笑容里，意识到，他认为右派分子就不该生育，该断子绝孙才是。不久后，他又提出"场部的王干事没男孩，把你的小儿子送他算了。"黎淑莲见他心怀叵测，还没顾上回答，他又加了一句："把大男孩也送人算了，要孩子干什么！"黎淑莲一口回绝，再难，也不能把亲骨肉送人！

后来，他干脆下了命令，不许当丈夫的赵贵春回家住宿，在机修厂"职工"的集体宿舍给他安排了个铺位。赵贵春只能顺从，不能跟他对抗，更不能说什么。刀把子攥在他手里，如若对他略有不敬，他知道该怎样处置一个阶级敌人。几年来，苦难中的赵贵春一直庆幸自己有家的幸福，可是，副场长的一次又一次的光顾，不安和愁闷便笼罩了这个家。妻子对他仍一如既往地体贴温柔。对那只老狼他不能不怨恨在心，作为丈夫的尴尬地位他无法忍受。在10月份口粮减为24斤后的严峻日子里，赵贵春和妻子最后作出决断，由妻子和俩孩子回赵贵春的长春老家。此时，妻子已将全家4口人当月的口粮买来，她将全家人省下的面粉全留给了丈夫，这有限的面粉，在11月的非常时刻，保住了丈夫宝贵的生命。黎淑莲手里拉着不到三岁的大孩子，背上背着七个月的小男孩，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又跋涉在数千公里的返家途中。这次去的目的地是长春。

父母寄给我的糕点来了，我到场部的小邮局去拿，看到包裹的布很旧很薄，下面已露出个小洞，邮局的小伙子把包裹用秤称了一下，表示分量是够的，其实这就不言而喻了。他的粮食定量肯定也减了，食品对于他很需要，从包裹下面的小洞里肯定有些糕点渣儿进了他的嘴，而他未把糕点全部私吞，我还应感激他。把糕点拿回宿舍后，我给女伴各分了一块，也就是意思了一下，这数量极少的糕点，有油又有糖，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无异于天国来的珍馐。父母从兰州给我寄来糕点很不易。当时，兰州的糕点已按人口定量供应，他们已吃不饱饭，这寄来的一斤左右糕点是从大家的嘴里抠出来的。父亲在寄给我的信中还附了伐夏的一封信，伐夏的信说，他们现在都在

食堂吃饭——城市也实行了食堂化，今天他们在食堂吃了油饼稀饭，他吃得很饱。这些话完全是为了安慰我，而我竟信以为真。

有一天，王桂芳的爱人赵振荣来看她，下班时，我看见他俩并排坐在王桂芳的床上说话，过了会儿，赵振荣就走了，他走后，我注意到王桂芳的床上多了个一尺多长的小木箱子。过了几天，我们才得知：赵振荣失踪了。石天爱、小徐和我心里都明白，是严峻的粮食形势，逼得他逃跑了。他逃跑绝不会像那些“职工”一样，留在安西的家里，而是远走高飞了，农场的干部要追捕也是无法。王桂芳的嘴自然是闭得紧紧的，纹丝儿口风不露，他们两口子在关键时刻头脑很清醒。

我们再也想不到，过了几天，杨振英又宣布：11月粮食定量减为15斤。干部家属也一样，一律减为15斤。理由很简单，农民的口粮都是15斤，我们不能特殊。而且讲明，场里要抽调一部分人去搞代食品，安西有一种野生的碱菜子，产量很多，可以代替粮食补充不足的口粮。杨振英并立即作了安排，从场部的“职工”中抽调一二十人，第二天就宣布了名单，出外搞碱菜子去。

我和女伴们心头都罩满了乌云。我们身处戈壁深处，与外界完全隔绝，真不知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又不敢议论。但我还是把这里农场一再减粮，11月减为15斤的消息写信告诉了景超。我知道，他的景况肯定更差，而减粮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我不能不告诉他。

搞碱菜子的队伍庞大，尽管碱菜子在安西产量也大，因为系野生，饥饿的农民也在收割，农场队伍庞大，也有抢收、争取多收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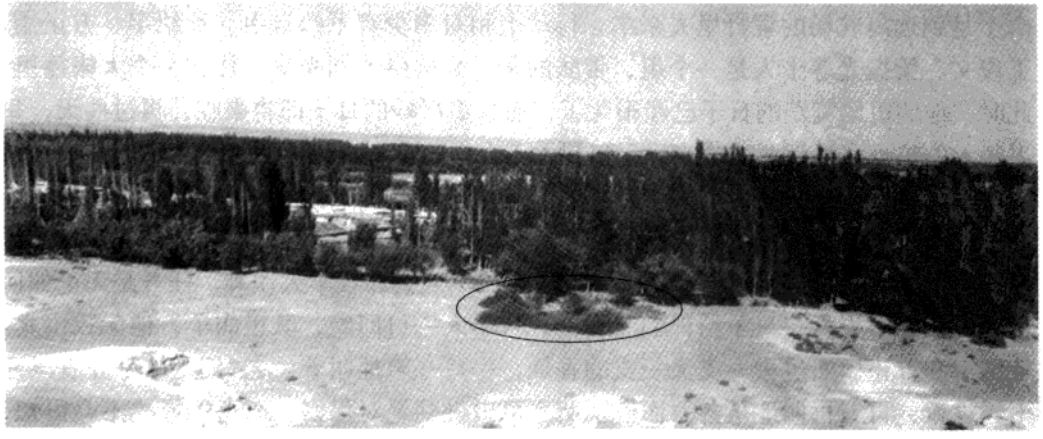
我的难友一部分也被派去搞碱菜子。巧的是，他们采集碱菜子的地方，正是十工农场前年种撞田的西湖。1958年，仅三大队种撞田就收了20多万斤小麦，而今四工农场派大队人马去抢收的却是一种野生的碱菜子，只能在大灾之年充当代食品的草籽。由于是到远离农场的荒野里去采集，行动上相对多少有了些自由。杜绍宇、方正儒、王俊文、梁振光等十人是一个组，带队的是个武威民工刘光华，住在一个大帐篷里。此时，他们饥肠辘辘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而且更严峻的日子即将来临，再过些天，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就要减成半斤，鬼门关正在向每个人逼近。每个人都忧心忡忡，谁也不愿意等死！

白天在采集碱菜子时，他们发现附近有生产队的羊群，有个牧羊人在活动，到了夜间，大家凑足了钱，便派出杜绍宇、方正儒二人去和牧羊人谈判，任务是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牧羊人卖一只羊给他们。开头，牧羊人一口回绝，队里的羊，他无权出卖。杜绍宇和方正儒送过去一支又一支的香烟，一口一声地叫着“老哥”，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再三再四地从各方面说明此事可以做到绝对保密，队上领导绝不会得知，吃到肚子里消化了的羊肉，队上领导怎么会看见？翻年开春母羊又要下羔，羊的总数

目不会少，老哥大风大雪天在荒野地受苦放羊，队长在家里的热炕上吃香的喝辣的，工分不比老哥你记的少，挣的比你只多不少。你卖给我们一只羊，手头宽便些，扯几尺布，给娃娃买几块糖吃一下，就不犯难了，救了我们的急也救了我们的命，两相方便的事，求到你门上了，你又何苦不答应，请行个方便嘛！这些近似苦苦哀求的话语，终于打动了牧羊人的心，何况，除了绝对安全保密，牧羊人还会得到实实在在的一笔钱，双方议定一只羊卖20元。牧羊人虽放着队上的一群羊，自己真正一贫如洗，20元也算个不小的贴补。生产队里的人此刻虽然也饥肠辘辘，但没有人会同他做这样的交易，首先是没有人能付起这笔钱，再则就是有人能付起这笔钱，他们之间也不敢做。没有不透风的墙。在那个年代，谁家宰了一只羊，全家人吃上了羊肉，会立即被左邻右舍知道，然后传遍全村，成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不说人们传播，就是交易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吃了羊肉的人嘴里喷出的膻腥气，也会使秘密暴露无遗。这样，至少放羊的美差就得丢了，队长会换上对此差事觊觎已久的别人，或是换上队长更加信任，能够给自己更多好处的人。在那饥饿的年代，牧羊人偷喝羊奶，偷吃羊肉——哪怕是吃死羊肉，都是常事，队上一般都不管，也无法管。所以，放羊的活是别人羡慕不已，无法争到的美差，牧羊人对这一切心中都似明镜般亮清。最后交易做成，他心里安然熨帖，喜不自胜。这意外的财路真是如同天上掉下来的，还十分保险。

杜绍宇、方正儒赶着羊往回走时，大喜过望。一路走着，两人又动起了脑筋，我们费尽心机磨破嘴皮子买来的羊，理应自己先享受多享受一点。他们找到一处避风的低洼地，决定先杀了羊，把羊的心肝肺先自己吃了，背回羊肉大家再分而食之。

荒野里枯败了的野草、草根随处都是，一会儿，他们俩便烧起一堆篝火，用一把小刀剖开羊的胸膛，从中取出热热的心肝肺，抛入篝火中烧烤。等烧得没有了血腥



图中所标植物即碱菜子

气，先从最容易熟的羊肝吃起，二人分食，然后再吃心肺。多日来没见过荤腥，胃肠有了羊下水的滋润，浑身都觉得分外的舒坦惬意。

眼巴巴等着他俩买羊归来的难友们，终于看见他俩背着已经宰杀了的羊回来，都兴奋极了。杜绍宇笑着说："羊买回来了，也杀了，我们把心肝肺先吃了！"激动不已的难友们对他们能想方设法买回一只羊感激不尽，谁还会怪罪他们吃了羊的心肝肺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连声说："吃了就吃了，买来就好，买来就好！"有的还说："该犒劳犒劳你们，吃了心肝肺算个啥，你们买来羊是立了大功啊！"羊被麻利地剥了皮、剁成小块，在他们外出时带来的大锅里煮了一锅。十个人坐的坐，蹲的蹲，睁大了眼睛，全都盯着锅里翻滚着的肥羊肉，闻着肥羊肉不时散发出的香香的气味，久违了的香香的气味！"垂涎三尺"，正符合此时的情景。羊肉煮得能咬嚼得动时，大家就递上饭盆，在每个饭盆里舀上几块肉、一两勺肉汤。每个人立即都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口腹的享受达到了极致，内心的满足与幸福感，也是达到了顶峰！留在农场的难友们就是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会在荒野里吃上肥羊肉，而且是十个人吃一只整羊！

杜绍宇、方正儒由于有了这次交易的成功，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功臣、英雄。当强权者用饥饿欲置众人于死地之时，是他俩冒着极大的风险，极其机智地买回一只羊，在大家的心中展示出希望。仅仅是一只羊，就驱除了几天前还厚重地蒙在每个人心头的阴霾，而向每个人心中展示了活下去的希望。在渺无人迹的荒原上，没有热烈的鼓掌，也无高声的吹呼。这些自认为有了生之希望的受难者，从此便每日里筹划着如何再做下次的交易，再来一次饱餐羊肉的幸福。

他们都是取消了工资，只靠30元左右的生活费过日子的人，买了几次羊后，便手中拮据，无法再掏钱买羊了。为了活命，他们胆大包天，开始偷窃牛羊。一次，方正儒和杜绍宇注意到有个牛圈里圈了二三十头牛，牛圈靠外只有低低的矮墙。到了半夜，他二人偷偷摸进牛圈。此时，圈里还住着放牛的牧人。方正儒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靠矮墙的一头牛犊身后，小声对杜绍宇说："你从牛屁股上抬一下！"杜绍宇从牛屁股上使劲一抬，说时迟，那时快，方正儒已把牛犊从矮墙上翻到了圈外面，二人快速轻轻地跑到外面，用半截麻绳把牛犊拉上就往驻地走。离牛圈已有了一二百米距离，在一个僻背处，方正儒拿出麻绳，把牛犊的前后蹄子捆绑住，取出一把剃头刀，利索地割断牛犊的喉管，剥了牛皮，割下牛头，打开牛的颅骨，先生吃牛脑，说："这是最养人的东西，你也吃上些！"但杜绍宇心里恶心，无法生吃牛脑。方正儒一人吃完了牛脑，又用剃头刀割下牛脊椎上的里脊肉，说："里脊肉最嫩，咱们都吃上些。"他二人生吃里脊肉，果然觉得鲜嫩非常，略带咸味，十分可口。吃完里脊肉，他们把牛头、牛皮埋下，把牛肉放进一个背篼，背回帐篷，和难友们共享。

再一次的进攻目标，是一个骑驴人放的一群羊。杜绍宇曾向放羊人买过一条羊

腿。一次，杜绍宇上前和放羊人搭讪着说了一阵话，放羊人高兴了，敞开衣襟取出羊腿，把羊腿卖给了杜绍宇，也认识了杜绍宇。

我的难友们注意到，放羊人每天下午赶羊群回圈前，都要赶羊到疏勒河边饮水，和疏勒河平行的有一条不很深的土沟，羊群去河边饮水，先要穿过土沟，才能到河边，土沟两边的塄坎会遮挡住放羊人的视线，使他无法看到沟底里发生的事情。这样，一个大胆的行动方案就形成了。为了保险起见，决定让杜绍宇找放羊人缠住说话，他们已是老相识了，缠住拉一阵家常顺理成章。同时，派出王俊文、梁振光各提一个麻袋，到沟底里捉羊。

杜绍宇和放羊人拉够了家常，放羊人骑着毛驴走了，他只好一个人往驻地返回，可前后左右看了一阵，不见王俊文、梁振光的影子，他二人偷羊得手了没有？看不见人，就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回到帐篷里又过了一会，才见王俊文、梁振光麻袋里各背着一只羊，兴冲冲地胜利归来。原来，他俩在羊群过土沟的时候，出手麻利，两人合捉一只，很快就捉到两只羊装进麻袋，担心放羊人看见，一直在沟底里躲着不敢出来，直到最后觉得万无一失了，才顺着沟底匆匆返回。

两只羊立即被宰杀，剥了皮，就在帐篷中间的地上用大锅煮了起来。十个人把煮羊肉的大锅团团围住，羊肉煮了一夜，他们吃了一夜，到天亮，两只羊吃了个光净，骨头一大堆，把骨头找了个地方挖坑埋了，把两张羊皮藏到被子后面。然后，他们才心满意足地大睡其觉。过了两三天，也没见放羊人找来。王俊文又很内行地把两张羊皮鞣制了一番，晒到帐篷外面的荒滩上。

11月即将来到，每人每天吃半斤粮的日子马上就要开始，碱菜子不久将派上用场，抓紧采收，不得有误。

这十位难友，在西湖采集碱菜子自由行动的一月左右的时日里，用买来及偷来的牛羊肉养壮了身体。回农场时，他们仍用安西特有的木轮大车拉着铺盖帐篷、碱菜子，如期回到站上。

11月1日终于来临

11月1日终于来临了。

每日三餐自然改成了两餐。上午的饭改在十点开饭。我和小徐忐忑不安地端着饭盆子去打饭时，食堂里已有十来八个机修厂的“职工”在我们前面排着队打饭。打饭的程序很简单，炊事员用铁制的大瓢——也叫马勺，在大饭盆里舀上一瓢倒入打饭人盛饭的食具里就行，打饭者从炊事员手里接过饭盆，转身就走。然后是下一个。机修厂的“职工”用的打饭食具，相当一部分都是镔铁做的半尺多高的大缸子。这是因为机修厂有个小车间就在我们的宿舍隔壁，专门供镔铁匠做活，从车间里取点边角碎料，做个大缸子很方便，可以省下买饭盆的钱。我和小徐用的饭盆都是搪瓷的，是从商店买的。我的饭盆直径有26厘米，是先买的；小徐后来去买时，没有了我买的那种，她买来的比我的更大。有了这样的大饭盆，可以一次性地把应打给我们的饭菜一次打回。记得在夏季伙食还过得去的时候，我和小徐在吃完面条之后，还一块儿端着饭盆同去伙房，向炊事员讨要下过面条的面汤，面汤既是下过面条的，里面就有面气子，我们讨要面汤，主要是为了在定量的饭食之外，再增加一点面气子。食堂的炊事员共有两人，一个是正规的工人，一个是刑满释放后留场的“职工”，听说原来是个资本家，可能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犯了事的。这两个炊事员大约看见我和小徐还顺眼，每次见我们讨要面汤，总是爽快地在每个饭盆里舀半盆面汤，让我们心满意足地走出伙房。石天爱和王桂芳就没有这种机会，她俩从未去伙房要过面汤，可能是考虑到两个炊事员未必会给她俩这点面子。可我们也遇到过难堪。一次，我和小徐刚走进伙房，就被场部一个干部大声喝问：“你们进伙房做啥，做啥?”我们只好默默地退出伙房，根本没有回嘴的余地。这使我立即想起机修厂车工小潘的话：“真够丢人现眼的！以前，谁会这样丢人现眼!”小潘是在食堂排队打饭时，为抢一干部

倒在了打饭的窗台上的面条，被炊事员一顿叱骂后，聊以解嘲地说了那番话。为了一点面汤，我和小徐也被人家大声喝问，我们却连聊以解嘲地说几句让自己下台的话都没有权利，当着那个干部和炊事员们的面，我们什么话也不能说，在匆匆走出伙房门后，我们仍然什么话也不说。小潘是“职工”，他刑满释放后已没啥了，也许，正是因为当着两个女性的面为抢几根面条挨了骂，他觉得脸上下不来，才解嘲似的说了那样几句话。我们也觉得脸上很下不来，当着那个干部和炊事员们的面，我们不敢说什么。走出伙房门后对自个儿又觉得无话可说，自己心里的委屈自己知道，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样，我想了想小潘说过的话，也就给自己解了围。现在，我端着饭盆打饭，不知道和了碱菜子的面是什么样，吃着是什么味道，吃不饱是肯定的了，因为我们已挨饿很久了，每天半斤粮加上代食品，又怎能吃饱呢？

轮到给我打饭了，一马勺倒进饭盆里的，竟然也是将近一满盆的饭，只见汤是黑糊糊的，里面的“面条”有手指粗，也是黑的，横七竖八地堆在黑糊糊的饭汤里，竟然还很多，堆得差不多漫出了饭汤，这到底算是怎样的饭？我心里琢磨着，和小徐一道匆匆回了宿舍。

一进宿舍，我们立即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吞嚼起来。指头粗的碱菜子“面条”咬下去还有点嚼头，硬硬的，没什么怪味；饭汤稠稠的，也没怪味。在煮“面条”的过程中，粮的面气子及碱菜子都煮在了汤中，所以汤很稠。

这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好。一饭盆的“面条”好像也能把胃填得差不多饱了，但是，两三个小时后，尿了几次尿，胃里仿佛就空空如也，比以往饿得更厉害，我才立即意识到每月15斤的定量比上个月的24斤是差多了。这天没有人来领油料，很闲，越是闲，越觉得肚子饿得难受。记得过去在报社时有人把肚子饿开玩笑地说成是“肚子闹革命了”，如今我们当右派分子已两三年了，作为阶级敌人，“革命”已同我们无关，“肚子闹革命”这样的语句这样的幽默已无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想起它来心里只有悲哀，而饥饿是再真实不过地折磨着我。折磨着我身边所有的难友及每个“职工”。

安西的冬天来得早，所有的人都早穿上了棉衣，由于饥饿，我觉得身上有一种透心凉的感觉，一阵阵地发冷……来四工农场后，我进一步地学会了对各种磨难的承受和忍耐。我意识到，对于面临的饥饿，我仍然只能默默地承受和忍耐，我们已饿得很久了，除了默默地继续承受和忍耐下去，我又能怎样？我别无选择。

在闲待中，我一直注意着窗外的阳光，看阳光慢慢西斜，一会儿看一次，注意阳光移动时留下的阴影，心烦意乱。

下午打来的饭，跟上午一模一样，我们仍大口大口地吞咽咬嚼着，因为这是我们惟一的食物来源。除了食堂供应的两顿饭，我们绝无其他食物来源。

晚上，我仍去财务科记账，工作一如既往。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不断加深的近视，使我不得不低低地勾着头，拿出一张又一张的凭单，分门别类地记在各种账本上，仍不敢有一点马虎，一点懈怠。这样倒也好，由于思想紧张，饥饿感倒不十分突出了，不像中午后干干地等着吃饭，分分秒秒都觉得饿得难受。

王会计一边工作，一边和才出差回来的王股长聊天。他轻松地说："我老婆人家主意很正，说走就走，门一锁，领上两个娃娃就回了陕西，到老家住去了。"下面的话他再没说下去，我意识到他是在庆幸老婆孩子都回了陕西老家，如果还留在农场，就要同别的家属一样，也吃每月15斤的口粮，全家人就都要受苦了。在目前严峻的粮食形势下，干部家属都失去了原先可能有的优待。老婆孩子都在身边，不仅是全家人受苦的事，作为一家之主的男子汉、身为干部的他，也得操许多原来可以不操的心，得操碎了心。王会计老家在陕西，粮食状况比甘肃要好，老婆孩子当时尚无挨饿之虞，所以，王会计说起老婆孩子回了陕西老家，心中还有几分安然和得意。

几天后，我们还吃上了麦草和着面粉做的小小的馍馍，这种小小的馍馍很瓷实——麦草当然发不起来，颜色像麦草，只是灰暗一点。这顿饭每人有两个小馍馍，另有半饭盆的菜汤，也算是变了个花样。我原以为，每天半斤口粮，我们不可能再吃上馍馍了，因为原来吃的半斤一个的麸子馍也没有多大，如今全天的口粮只有半斤，哪还能吃上馍馍呢。真是想也想不到，我们居然还吃上了馍馍，只不过是麦草和着面粉做的，虽说小，每人还有两个！

这时，我身边有个采集碱菜子回来的原来当裁缝的"职工"，人长得白白净净的，是个上海人。他说，加工麦草，正是他们干的。他们采集碱菜子回来后，先是把碱菜子作进一步的加工。那时，我见到场部的空地上到处都是堆成小山似的绿绿的碱菜子堆，碱菜子长在细细的枝条上，采集时是连着枝条装运回来的。把堆成小山似的碱菜子翻晒一两天，然后像打场一样，把籽儿敲打下来，除去枝条，再装进麻袋交给伙房，有些一时还不能立即用的，还要装进仓库，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虽然曾经是熟悉农村的记者，对于麦草怎样加工再做成馍，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在排队打饭中就顺便向他问起。吃麦草馍是生平第一次，麦草如何做成馍真也是个新奇的事儿。他见我问起，就详细介绍了起来，其过程大概如下：把麦草先铡短，在大锅里炒干，再在石碾子上碾碎，用筛子筛了，把未筛下去的部分在石碾子上再碾再筛，这样经过反复的碾和筛，麦草都加工成了碎末，送到伙房，再用清水泡几次，换几次水，洗去麦草的碱气，最后再和上面粉，才能做成馍馍。

我一边挪动着脚步向打饭的窗口走，一边听完了他的介绍。心里十分纳闷，用麦草作为代食品，比种麦子麻烦多了，工序太多，花的力气也更多，最终加工出来的仅仅只是少量的代食品，而不是粮食。农场与其费很多人力花大力气制作代食品，为什

么不在种粮食上下工夫呢？难道农场的粮食真已山穷水尽，不花费很多人力制作代食品，就难以度日？我听说，碱菜子交给伙房后，也要在大缸里用水泡几天，要不断地换水，洗净碱气，才能食用。我们吃的黑黑的“面条”没啥怪味，就是由于碱气已被不断地换水洗净了，如若洗不净碱气，“面条”就会苦得难以下咽。顾名思义，碱菜子如若碱气不重，又为啥起了这么个名呢。总之，为加工代食品花费大量的劳力，我独自默默地思考，却怎么也想不清楚是咋回事。我回想起在十工农场三大队派一部分人种撞田，随便就收回20多万斤小麦，大家的肚子吃得饱饱的，种撞田的人在辛苦中更是放开肚子吃饭的情况；两年多后的当今，四工农场土地不少，我在夏收中亲眼目睹，地里的小麦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估计农场大概怕“职工”逃跑并没有考虑派人种撞田的举措，而现在却花费更多的劳力去加工代食品，这到底是咋回事啊？由于这一切种种的情况都牵涉到粮食政策，我只能在心中向自己发出诘问，而不敢在言语中透露出一丁点儿的口风。

麦草馍馍的确很好吃，我们由原来根本不指望吃馍馍而今意外地又吃到了馍馍，真是觉得麦草馍馍已成为了人世间最好吃的美味，可惜太少太小，以我们当时能吞下几斤食物的胃口，两个小小的麦草馍馍，只不过像是塞了牙缝的什么小玩意儿，使我们在回味中留下了遗憾。以后还吃过一两次麦草馍馍。由于加工它太费劳力和时间，我们还想再吃到它而最终未能如愿。

大约在十天后，机修厂的“职工”中出现了第一个死亡者。此人个儿高高的，平时就形容枯槁，面黄肌瘦。杨振英在办公室对我和小徐说，那人得的是心脏病，死前全身浮肿。我们原来都知道这个“职工”，对于他的死因只能听杨振英说的，没有心思去多关心。又过了几天，我在场部办公室附近，碰见了二站的家属黄宫桂，只见她两眼哭得红肿，流着眼泪，悲伤不已。我心里一沉立即意识到她的丈夫钟贵祥一定是不幸去世了。我在十工农场畜牧组喂鸡兔时，黄宫桂作为家属曾来临时帮过忙。她，个儿高挑，人长得俊气，干活麻利，在“咯咯”的笑声中，很利索地就把清理饲草的活干完了。她的丈夫钟贵祥来四工农场后，在春节场部的晚会上，还和小徐一起演出过黄梅戏，是个很棒的小伙子。他俩都是河南人，有两个小女儿。当时，场部的干部正和黄宫桂说着什么，我无法上前和她搭话。在四工农场，右派分子的身份不允许我有正常的人际交往，我为钟贵祥的不幸悲伤——他是我曾经熟识的难友，而不同于那个“职工”，更为黄宫桂今后的日子难过。一个没有工作的寡妇带着两个小女儿将怎样活下去。右派分子的丈夫就是已经死去，她和两个小女儿仍将在乌黑的阴云下抬不起头来。可怕的政治阴云，无处无时不在！我想对黄宫桂说几句劝慰的话，可我没有权利在干部们跟她说话的时候搭话。再想想，我那想说出的劝慰话，苍白无力，说了跟不说也一样，心里真想说的话又不能说。这样，我只是无言地驻足看了看她，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她。

以后，几位女伴从不同的渠道传来了一、二站我的难友们不幸的死讯。最先传来的是曾是我们的演出伙伴的韩书谦，他是男中音独唱家："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惟有你最可爱……"他那雄浑嘹亮动听的歌声，在乍一听到他的噩耗时，竟意外地又突然出现在我的耳际……他是那么棒的小伙子，黑红的脸膛，强壮高大的身躯迈出的步子总是那么有力，他那儒雅的风度很招人喜欢。记得去年在十工农场四大队夏收后的一个星期日，他还拿出珍藏的照相机，找小徐、我，还有六七个难友一起，给我们照了相。这是多么珍贵的留影，终身难忘的留影！当时，他手头也十分拮据，胶卷冲好以后，只给小徐送了一套共5张照片，其中还有我和小徐的一张合影，所幸这5张照片后来由小徐带回了兰州的家中。三十年后，小徐已成了老徐，将这5张照片拿出给我看，我把它们翻拍放大后，送给小徐一套，留给自己一套，又加洗了许多张，送给幸存并尚有联系的难友们。民勤县税务局工作的张全国接到我寄去的照片，回信时特附一七绝，不堪回首话当年，感慨万端，并说，当年我们这些人一个个风华正茂，光彩照人，可恨却都在受苦受难中。据张露玲回忆，在韩书谦最后的日子里，他曾拿来一斤粮票，求张露玲为他从干部灶上买些吃的，当时，正是中午饭尚未开饭的时候，张露玲拿了一个钢精锅去打饭，用一斤粮票买了将近一锅的面条，这面条是灶上打剩的面条，泡得胀乎乎的，炊事员给的比较多。韩书谦看见买来了面条，立即在张露玲家

1959年夏收后，和难友们在安西县十工农场留影。照片中带草帽者为提供照相机的韩书谦

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快就将一锅面条吃完，然后转身走了。一锅面条也未能留住他的生命。过了一个多星期，张露玲就听说，韩书谦死了。那个常亲热地叫她“弟妹”的人走了，她再也听不到他叫她“弟妹”的声音了。

我看着翻印后的照片上他含笑看着这个世界的面庞，心里不禁涌动起无限的悲伤，他是个多好多有才气的人啊。我们这个世界到底给予了他什么，这不公正的世道！人的生命为什么就如草芥一般，被任意践踏，任其消亡。

接着又听到的噩耗是靳清义之死。他没有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枪口下，也没有牺牲在解放战争前线，而是在蒙冤受屈之后，来到四工农场又受尽精神和肉体的各种凌辱，长期无奈的饥饿，终于使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没有等到冤情大白的一天。和他一同来自武威步校的邹映南，原来和我不算熟，也是从战场上摸爬滚打过来的人，也是从抗美援朝前线经过上甘岭战役胜利归来的。他为了求生，曾委托张露玲用毛料衣服、毛毯之类，设法从农民那里换过食物，这种事毕竟太艰难，换来的食物数量非常之少，终于未能维持住他生存的极限，他也跨进了另一个世界。听到他俩的死讯，我们在宿舍里什么话都没说。我听见石天爱沉重地叹了两次气，也许，她心里还深埋着对靳清义的缕缕柔情。后来听说，靳清义为了活命，在死前曾抓吃老鼠。我心里很是凄凉，就在日本鬼子侵占他的家乡，实行“三光”政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卑怯地去抓老鼠果腹，少年的他就勇敢地拿起了反抗的刀枪，向敌人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靳清义和邹映南身后都留下了几千元的存款及精细高档的衣物，靳清义还有一辆自行车，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产，这些财物都可以换取食品，挽救生命。而他们是戴着镣铐忍饥挨饿，毫无人身自由，所以，他们就死定了。靳清义死后，家中尚有八十高龄的老母亲在企盼独子的归来，她的生命的延续，就是为了等待独子的归来。谁也不敢把靳清义的死讯告诉老人，只好欺骗老人，说靳清义到外国打仗去了，一时半时回不来，也无法写信给她老人家。

我的演出小伙伴武威人李熙元，当我们于年前同去小宛，最后一次演出眉户剧《雌雄花》，同坐一辆马车，在途中闲聊的时候，他曾流露出怅惘迷茫，问我：“咱们今后怎么办，日子还长着呢！”我当时还背诵了普希金的一段诗：“假若生活欺骗了你……”自欺欺人地安慰开导他。来四工农场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当他的噩耗也传进了我的耳中时，在我眼前仍不断浮动出现他那年轻的胖胖的圆脸，他那怅惘迷茫的神情仿佛凝固了似的依然向着我，倏尔又幻化作愤怒的质问：“我的日子已经到了尽头，快乐的日子在哪里？”向我质问似乎又使他感到愧怍，毕竟我也是受害者啊，只见他惨然一笑，隐去了。向他背诵普希金的诗时，我心情尚好，我们都没有挨饿，演出结束后，还美美地吃了顿羊肉。谁能想到，一年后，他竟因饥饿而撒手人寰！

那个自认为“人”才是最伟大的，有了人，才有了这个世界的高天人老人，以七十开外的高龄，在11月的大饥馑中，首当其冲地告别了人世。他也是“最伟大的人”当中伟大的一员，而在那个年代，他所尊崇的人本主义思想恰恰被理所当然地践踏在地，不值一文。他哪会想到历史又倒退了回去。他告别人世顺乎自然，更不被人提起。

沈潮，那个坚定地认为历史总有一天会对反右派斗争作出公正的裁决的原共产党员，没有等到历史作出公正裁决的那一天。他为人老实正派，没有任何外援。在酒泉开饭馆的丈母娘，在沈潮政治上走红时，认为女婿年轻有为，很是得意，在女婿面前好听的话说个没完。沈潮成为右派后，丈母娘就变了脸，一直撺掇女儿和沈潮离婚，自然不会在困难时刻帮助他。如她心地善良，对女婿抱有同情心，当最有能力帮女婿一把，开饭馆的她给女婿送些吃食来，完全有条件。而沈潮遇上的丈母娘恰恰是个势利小人，沈潮便死定了，在11月最初的日子里，他便无言地辞世了。

一站还有两个在十工农场就摘了右派帽子的我的难友，也死于大饥馑中。一个叫韩万恒，一个叫张大贵。韩万恒死得较早，站上为了表示区别，还钉了个薄木板棺材抬埋了，张大贵死得迟了些，农场已大量死人，已无法为他准备薄木板棺材，也只是用他自己的铺盖裹了裹，抬出去钻了沙包。没摘右派帽子及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大饥馑的日子里都难免一死。在死神面前，他们是平等的。

有的人在饿死之前，还挨过管教干部的耳光。在一站，有个原省法院的我的难友、大学生（可惜不知其姓名），在伙房前不知有什么事转悠，被管教干部高队长看见训斥，因回嘴，高队长上去就是几个耳光。身体已极度衰弱的他，当即被打得蹲到了地上，两三天后死去。残暴的凌辱加速了他的死亡。

此时，四工农场把死人就叫做“钻沙包”。这也算做是一种语言上的创新，它来自生活。面临每天出现的大批死亡，死了的人只能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一裹，用架子车拉出，埋到较远的沙包里。农场地处戈壁深处，荒野里沙丘连着沙丘，死人只能埋在沙包里。把死人叫作“钻沙包”，它真实形象地概括出了在大饥馑的年代里四工农场抬埋死人的方式，生活的发展变化使人们有了如此的创新。

就在农场已开始大量死人的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待在宿舍里。忽然，杜博智推门进来，见屋里别无他人，便对我说：“我有事来场部，给你带了几斤蒸好的洋芋，你快收下吃了。”从他的背包里倒出的洋芋也就三四斤吧，我大喜过望。他还说：“在这个困难的时刻要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此时，杜博智当炊事员已半年多了。当炊事员，任何时候都是尽饱吃，所以，他根本不存在饥饿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他想到了我。他知道，正如农场别的难友一样，食物的短缺，在我肯定也已经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因而在得知有机会来场部时，便用自己家中寄来的粮票从灶上买了些洋芋送给我。我收了洋芋，心情自然十分高兴，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将他送出门外，分别时说：“过

两天我去看你。”然后立即回屋，狼吞虎咽地迅速吃完了全部的洋芋。

那天晚上，杜博智和另一个炊事员受命于一站站长王志玉，各自背了多半麻袋洋芋和多半麻袋糖萝卜，给农场的书记刘生贵送去。王志玉打发他们两人去送洋芋和糖萝卜，也有互相监督的意思。在农场天天饿死人，吃食极为金贵的时候，王志玉担心一个人去送，麻袋里的洋芋、糖萝卜会在半路上流失，不能全部送到刘生贵家中，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安排。洋芋、糖萝卜是一站的右派分子及“职工”生产的，非人民币所买来，刘生贵收到自然是白拿，一分钱不给。前些天，我用三四元才买了一斤干萝卜缨，还是求人帮忙才买到的。刘生贵根本不用打招呼，就会有人在夜晚把洋芋、糖萝卜各多半麻袋送到家中，供他全家人享用。这就是书记与贱民的区别。一站送去了洋芋、糖萝卜，那么，别的站呢？全农场四个站其实都有自己的粮食储备，这在农场是公开的，各站的干部清楚，刘生贵也清楚，所以，他们之间心照不宣。其他站送到刘生贵家中的，也许会是白面，甚或是一只整羊——各站都有自己的羊群。刘生贵的下属们在这个困难时刻，不会忘记向他表示忠诚与关怀。

刘生贵是个慈眉善目的人，平日里说话和颜悦色，四十岁左右。场部干部见了他都毕恭毕敬，他如外出归来，干部们一个个都要趋前问候。他和干部们相处很好，听到“职工”和我等犯了事也从不恶语相加，显得极有涵养。当然，他也从未和我闲聊过一次，从不向我问一句话。我在财务科记账时，他常来财务科走一走，和贺科长、王会计等人闲聊一阵，谈工作，也谈些生活琐事。他说话一点不拿架子，不打官腔，但我仍然感到他作为书记的威严，干部们对他的话常常只是唯唯称是。

1949年，我刚到报社不久，在一次采访中和省委书记张德生打过交道。张德生带一副黑边眼镜，沉稳严肃，是个学者风度的人，但十七岁的我和他说话，一点也不觉得拘束。过了些天，省上成立革命人民大学，对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留用人员组织短期的理论政策教育，我作为记者参加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采访时坐在省委宣传部赵守攻部长的近旁。赵部长常来报社指导工作，向全体编辑人员讲话，说话幽默风趣，很有水平，报社的人都认识他。作为少数女同志中的我，他也是认识的。参加革命前，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山西人。当时，我拿着一支铅笔匆忙记录着典礼上一位领导人的讲话——我自己没有钢笔，报社发的采访用笔就是铅笔，采访本是用印报时裁下来的小块纸装钉后发给我的。赵部长看到我紧张记录的情形，大概是想看看我能不能把讲话记录下来。在讲话结束后，他笑着说：“把你的采访本给我看看！”他是部长啊，我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服从地把本子递给了他。他仔细地翻着看了一阵，才又笑眯眯地把采访本还给了我。我感到他对我的记录是满意的。以后，他每见到我，总是亲切地喊我：“小鬼！”当时，我和省委书记、部长的接触亲切自然，我不觉得有威严的成分。后来，我经常下乡采访，同县委书记、区委书记、

乡上的书记们都常打交道，我觉得这些书记们认真工作，上下级关系一般都不错，就是和农民相处也都融洽自如。

刘生贵的和善与威严，使我深深地感到经过反右派斗争之后，基层党的书记具有了绝对的权威。得罪了书记，他要给你扣个反党的帽子置你于死地，易如反掌。场部的干部们赔着笑脸，小心翼翼地和刘生贵说这说那，看起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他们内心的活动其实是很复杂的，对刘生贵非常敬畏。

当时，农场每天死人的数字都要向刘生贵汇报。不管怎么着，上级把数百名专政对象交给四工农场改造，是为了叫这些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样大批的急速死亡，在他也是未曾经见过的。那年，由于有200多名急于改造急于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回到人民行列中去的右派分子的到来——十工农场两年艰苦的劳动，已使他们熟稔于各种农活，他们在忍饥挨饿中仍卖命劳动，对四工农场的丰收，起了重要作用。场部和各站的库房都是充实的。而且，原劳改系统有个传统习惯，即对劳改犯或释放后就业的“职工”的口粮每月都要节约几斤，并不按标准让吃光，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来四工农场后，也是照此办理。如此节约下来的粮食，忍饥挨饿的我们及“职工”们并不知其究竟——怪不得我们才到四工农场时，听说每月的粮食定量40多斤，比原来在十工农场时的标准还高，却是立即就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但场里的干部们都知道这件事，账目上记着各站每月节约下来的粮食数量，这些粮食就存放在各站仓库里，此时，每个站节约的粮食都已达三四千斤。

农场丰收了，粮仓殷实，面对的却是每天急剧增加的死人的现实，如此严峻，如此惨烈，也曾使刘生贵几经踌躇，一筹莫展。但是，他最后做出的决定，仍然是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绝不做违犯党的粮食政策的事。当时，如果由书记做主，把农场生产的粮食每月给全场人员每人加几斤，就意味着对党的粮食政策的违犯。这样的事他绝对不做。因为，一方面是与日俱增的死人，即将饿毙的人们的垂死挣扎；一方面是仓库里满满当当的粮食——每人每月15斤的粮食定量，再加不断死人，使粮食的消费量大为减少。而那些由饿死的及尚在死亡线上挣扎不已的人们节约下来的一万多斤粮食，依然原封不动地存放在仓库里。从全农场几百名专政对象的嘴里硬抠出来的这一万多斤粮食，其存放仓库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否可以动用来抢救那些濒临饿死的人，制止死亡？对这，全农场从书记、场长——刘生贵其实就兼任场长，副场长，直到每一个普通干部，没有人去想它，更没有一个人说及它。从专政对象的嘴里强制节约粮食的目的被刘生贵忘记了，更准确地说是不敢去想了。此时，遵守粮食政策，严格地把住每人每月15斤粮食定量的关口，被省上和地区领导强调到了吓人的高度，已是政治立场的问题。当河西走廊所有农民的粮食定量都已三令五申减少到15斤时，许多村庄事实上已断炊很久了，农民早就无粮可吃。在如此的情况下，这些专政对象的

口粮怎么能考虑增加呢？农场干部都同农民一个供应标准，也不敢随意更改。刘生贵认定了这个死理，农场作为生产粮食的单位，更应模范地执行党的粮食政策，即便是过去节约下来的库存粮食，也不可随便动用。况且，他心里也清楚，如今能够制止死亡的书记又有几个？死亡已广泛蔓延在河西走廊，以至在全省、全国也已出现，所有的书记都在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那个命令杨振英将偷了面粉的冼维汉吊在办公室房梁上使冼维汉大哭大叫，后来又威风凛凛地找岔子要打我踢我的副场长，此时又如何呢？他肯定不会饿着。多年后我再见到当时在机磨坊劳动的我的女伴王桂芳时，王桂芳称他为“魔鬼”，说：“魔鬼就在机磨坊公开拿面粉。”

以往，从春种到秋收，他喜欢巡视于田间地头，腰里别着手枪，或背着长枪，耍够了威风。他决不允许他所管辖的农场里的“职工”及右派们劳动上有怠慢，对大小的“长”们发布的各种大小命令有任何违抗。从他的粗鲁霸道、凶残成性、文化低、少教养的种种举动来看，当年或许是个在饥寒交迫中辗转挣扎的穷苦人，正因为受不了那种痛苦生活才投奔了革命。如今，他已理所当然地擢升为一个管着几百“职工”及右派分子们的农场副场长，农场大量死人的情况，他当然也是清楚的。他曾经饱受饥饿之苦，而他也知道，全场几百名专政对象作为自己的同类，他们没犯死罪。但是，面对这一切，他也沉默无语，在和善的刘生贵面前，多余的话他一句不说，凶暴的“山大王”又变成了胆小驯顺的绵羊。

其实，凶暴的“山大王”色厉内荏。他也有过一段惨痛的经历，使他在严峻的粮食形势面前守口如瓶。

事情是这样的：1960年春节期间，多年没有回过老家的他，决定回四川老家看看，他的姐姐和妹妹家分属两个公社。姐姐和妹妹见到多年没见面的他，都亲热得不得了。此时，农村公社已实现食堂化，姐姐和妹妹家，一家的食堂办得好，大家尚能吃饱，一家的食堂办得不好，大家吃得就差，去探亲的他自然也就吃不好。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此时有钱也买不到食品，当副场长的他回家自然是带了一笔钱的，可是他无法从商店里买到可供同亲人们相聚时丰富饭桌的食品，这使他很扫兴，不快。回到安西四工农场后，他把回老家见到姐姐妹妹家生活有差别的情况，见到一站站长王志玉时简单说了一下，后面还加了一句：“就说到你这里！”意思是不要外传。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洗礼，他也懂得以言定罪的厉害，说话慎之又慎。可是，他没管住自己，酒后又把同样的话告诉了别人，而此人一向有向上级打小报告的爱好，便向安西县委告了状。当时，四工农场作为基层的党组织，党员直接由安西县委管理。此人的状告上去后，他便由安西县委着令到县上检查交代问题。

经过若干次的批斗会后，“山大王”也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罪行”，表示了低

头悔改之意。可他的文化程度太低，无法用连贯的话句把会上批判他上纲上线的内容，写成一篇交代检查材料。这样，他捎话叫王志玉到县委帮助他写交代材料。王志玉奉命来到安西县委，只见他住在隔离室里，脸瘦了一圈，面容发灰，看见王志玉进门，立时泪流满面。稍微平静了一下，才对王志玉说："还是我对你说过的那些话，你就尽量上纲上线，帮助我把它写成一份交代检查材料。"说时，已上气不接下气，又是要哭出来的样子。王志玉不敢说安慰宽心的话，匆匆帮他写完材料就回了农场。

过了几天，×副场长又让汽车队队长刘星汉带回来几斤盐，让王志玉转交他老婆。王志玉心想："几斤盐何必要转来转去才交给他老婆？"一天，他看见×副场长老婆在场部走过，就叫住她把盐交到手里。只见她打开包包看盐时，发现里面还有封信，信上说，我可能回不来了，望你带好孩子，有困难可找王站长，我那笔复转费你和孩子能用上几年，你们就好好过吧！老婆大惊失色，拿着信的手抖个不住，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连声追问王志玉："你说他真的回不来了吗？他真的回不来了吗？他到底犯的什么事？"王志玉对她只能连声安慰。

×副场长的这次经历，最后以有惊无险而告终。原因是县委书记张树春，因为考虑到×副场长是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副团级，资历比自己还老，出身又好，用一句毛泽东的名言给他解了围，救了急。张树春说："毛主席说，一万年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差别的。现在我们的桥湾公社，比起三爱公社来，也是有差别的。他说他姐姐的公社同妹妹的公社有差别，我看这没有啥错误，不能说他就是反党。"这样，他才又平安地回到四工农场还当他的副场长，回到了老婆孩子身边。

有了这番惨痛的经历，对粮食问题他自然什么话也不说了。"山大王"毕竟只是一山之王，在全国严峻的政治形势之下，他也得汲取教训。但他的凶残暴虐并没有由于自己的惨痛经历而有任何收敛或改变，他并没有由己及彼，想到在他管制下的"职工"及我等右派也会有冤屈，也会有错案，应该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我等。他秉性难移，仍然只是一味地充分施展手中"专政"的权力于我等，只要他自己痛快，任使用什么样的手段他认为于我等都不过分。如：用枪探条戳刺靳清义的胸膛直到戳得鲜血淋漓，他毫不手软。命令杨振英把冼维汉吊在办公室的房梁上，让冼维汉招认偷面之事，他得意非凡。

农场的专政对象，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任人宰割的奴隶，他说一不二，专政对象只能无言地顺从服从。所以，到粮食定量减为每月15斤之后，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机磨坊，明目张胆地把农场的面粉装进面袋里拿走。机磨坊的右派分子、"职工"无人敢吭声。王桂芳心里骂他"魔鬼"，对魔鬼的行为痛恨之极，面子上装得不动声色。因为偷了点面粉被吊上房梁的冼维汉，看到他用面袋子公开装面粉，一次装得比自己偷了几次的还多，但他敢吭声吗？除非他想再次被吊到房梁上。

18. 派我去“医院”烧炕

财务科的张振英突然通知我，要我暂时放下其他工作，第二天到“医院”里去帮助烧炕，那里住了一批病号，没人烧炕。

“医院”的位置就在场部西边，介于二站、场部中间，只有十来分钟的路程。第二天上午吃过饭后，我去“医院”烧炕。一路上，只见一派冬天凄凉的景色，光秃秃的田地一直伸展到远方。小块枯黄的芦草点缀在连片的田地之间凸起的地方，沿着水渠边生长的芦草像是长长的带子延伸而去。初冬的寒风刮来，远远近近的小块芦草生出波浪，闪着黄黄的光，像是一方方小水塘，水渠边带状的芦草似一条条流动的黄色小溪向前方奔涌。天依然湛蓝、明净、高远，但很扎眼。初升的太阳失去了往昔的温暖，发出浅浅的白光。一切仿佛都预示着某种不祥。我踽踽而行，心里有着无尽的惆怅，天地之间仿佛只有孤独的我……我忽然猜测起那些病号会是什么样，烦乱，悲伤。每月15斤的粮食定量将会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我无法去想，也不敢想。我肚子饥饿，已自顾不暇，但我不能忘怀我可怜的亲人，此刻的他肯定已处于更为悲惨的境地，他的状况怎样，我更不敢进一步去想。

“医院”的小院里，只有几间破旧的房子。当然，农场的干部和工人不会住这样的病房，这是为“职工”及右派们准备的。我走进迎面的大房子看了看，只见房内墙皮剥落，肮脏不堪，同我一贯在概念上认为的“医院”完全是两码事。长长的土炕通铺上，已躺着八九个病号，里间屋小些，炕上也有四五个病号。这些病号全是从三、四站来的“职工”。他们一个个蓬首垢面，面黄肌瘦，目光呆滞。他们立即全都看到了我，但全像没看见一样，面部无任何表情，没有人同我打招呼。他们互相间也不作任何议论，没有一句话。作为病号，他们没有呻吟声，只是不知是谁，发出了几声沉闷的叹气声。这就是囚犯生活在他们身上形成的一切。如今，他们虽已成为“职工”，

但农场对他们的要求并无改变，所以他们依然故我，保留了做囚犯时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和他们也不打招呼，我也懂得用这里的标准约束自己。何况，这里没有一个病号是从十工农场来的难友。我明白，我只是被派来烧炕的。

病房里还有三个干杂活的年轻“职工”，他们一个个红光满面，神采飞扬，正在用旧报纸糊窗子，在新砌的泥炉子里添煤砖、烧水，他们不慌不忙地干这干那，同炕上的那些“职工”相比之下，俨然是另一种人。他们都二十出头，身体健壮，看来肚子一点也不饿，其中有两个是河南口音。

我的任务不算重，烧好五个炕洞就算完事。烧炕用的芦草，要到“医院”对面二三十米处的一片芦草地里去割。我走到芦草地里，用镰刀连连砍去，干透了的芦草发出清脆的响声，很快就割了一捆，用绳子捆紧，就往回背。这时，起风了，风不算大，一捆芦草也不重，回“医院”要逆风而行，却连脚步都迈不开。我只能侧转身让身子和芦草捆减少风的阻力，慢慢地斜着身子吃力地前进。五个炕洞都在院子外面。我把芦草放在炕洞口，解开绳子，一面趴在芦草上防备风把芦草吹走，一面抽出些芦草塞进炕洞，尽量把炕洞塞满。我来“医院”时带了一小瓶汽油，把一根芦草蘸点汽油放到炕洞里背风的地方，用火柴一点，满炕洞的芦草立时就燃起了大火。一捆芦草最多能烧两个炕洞，我又割了两次芦草，才烧完了5个炕洞。

我小时候也睡过热炕，三四十年代兰州人大都睡炕，用马粪、煤末烧的热炕。我睡在妈妈烧热的大炕上，浑身暖暖的，享受着母爱的温馨，并不懂得那就是幸福。现在，我生平第一次烧炕，远在兰州的妈妈会想到其中的艰难吗？我在给什么人烧炕，妈妈怕是再也想不到。

因为时间还早，我又回到了大病房里，想帮助做些事。高中毕业时一位同学写在纪念册上的临别赠言，此时回响在耳边，赠言说：“向受苦受难的人们，伸出你援助的手！”参加革命后，纪念册之类的玩意儿，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羞于向别人道及，纪念册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此时，这段话却不知怎的又回响在耳边，重现在脑际。服刑期间长年累月的饥饿，已使这些“职工”一个个瘦骨嶙峋，最近的大减粮已超过人的身体能以承受的极限，他们成为病号，完全由于饥饿。这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的事，只是没有人把它说出来。为什么生产粮食，获得好收成的农场，却把人饿成这样？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因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现在，种田者无粮吃又是怎么回事？我相信，这样的疑问在每个人的心里都反复出现，但每个人都不把它往下想。我自然也没有胆子把它想下去。当时所处的封闭的环境，也使我无法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但是，对这些受苦受难的人，我想，我既被派到了这里，就应为他们做些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的开篇语，此刻又撞击着我的心。这段话

说："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我还想起小说里卡嘉[①]在红军医院里服务的情景。"职工"也是人，我再一次肯定，我为病号们做些事是完全应该的。我自己已被饥饿折磨得难以支撑，想的还是浸泡、蒸煮自身，让灵魂无比纯净的事。当时我崇拜伟大的作家，一种使自己的灵魂更为纯净的强烈愿望使我仍真诚地相信阿·托尔斯泰的这些话，在这种自我宽慰的梦幻里浮沉，精神上似暂时地获得了一些宁静。当然，几年后，我就认识到，阿·托尔斯泰编造的故事，在苏联根本实现不了，斯大林的肃反能不杀掉小说中的主人公吗？在中国，这样的主人公也难以存身。我把阿·托尔斯泰的这段名言当作自己在逆境中生活的信念和信条，一直信守维护着它，只是说明我对未来仍抱有坚定的信念，我认定了自己跌倒自己爬的死理。我确信，重新爬起来并站起来了的我，一定会比原来的自己更完美、更纯净，也更坚强。

我提起笤帚把地扫了扫。一只肮脏的手哆嗦着举起搪瓷茶缸想喝水，我立即接过茶缸，从搭在新砌的泥炉子上的水壶里倒开水给他；有个穿蓝平布对襟"职工"棉袄的人，棉袄前面剐破了一大块，露出烂棉花——他是个中年人，倒像个年迈的老人似的，力不能支地磨磨蹭蹭、慢慢腾腾地下了炕，看样子要去解手，却找不到鞋，我帮他从东边墙脚下的一堆鞋里找到了他的鞋提了过去；还有人抬起身子，递过来两毛钱，让我代买邮票、信封明天给他带过来……做这些事一点也不费劲，我确实在尽心尽力地服务于这些病号。当时我也并不知道，我为他们做的这些事，对有些人来说，竟成为他们在人世间逗留时最后享受到的一丁点儿可怜的温暖。

有一阵子，我靠在门上，注视着炕上那些盖着五颜六色的破旧被窝蜷缩着瘦弱的身子，恓恓惶惶，听天由命，不知所以的人们，内心也十分压抑、沉重。我的命运比他们又强多少呢？一个满脸胡茬、脸盘特别大、面色难看的人——他大概浮肿了，从被窝里拉出一条深蓝的破旧绒裤，要我拿出去，晾在外面。我立即也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悬悬地提着他刚从腿上脱下来带着体温的绒裤，走出房门，放到对面房间的窗台上，低头随意一看，只见上面滚动着不计其数又肥又大的虱子。我心里真腻歪，也不禁有些难过，这饥饿的人的鲜血不知被虱子吃去了多少？如果不是我的帮助，这小小的、万恶不赦的虱子们不知还要猖獗到何时。我知道，经过一夜的严寒，虱子们非全部毙命不可。

就在我准备走回房间时，大个子河南"职工"从旁边的一间屋里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报纸包，看到我，他打开报纸包，里面是糊窗子用剩的糨糊。他问我："你吃不吃？"用剩的糨糊很不洁净，颜色五抹六道的，虽说肚子饿，这样的东西我也

①《苦难的历程》中白军军官罗欣的妻子，曾在红军医院服务。

无法下咽，就摇了摇头。他笑了笑走了。当然，他是出于一种友好的关心才问及我。他是不能把同样的问题向那些病号们提出的，如果他问那些病号：“谁吃?”肮脏的糨糊一定会被手脚麻利的人抢去吃个精光。而他那样做就违犯了纪律，会被告发的。

这一天，我没有见到医生进病房，也没见到给哪个病号吃药，病号们的真正需要是吃饭而不是吃药。

饥饿，已使全农场的工作节奏迟滞了下来。下午，太阳挂在天上还很高，我就拖着软弱无力的腿回场部。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眼巴巴地等待吃下午饭的时刻到来。

我真佩服食堂炊事员的本事，每人不到二两半的面粉，由他们和上经过复杂加工的碱菜子，竟能做成稠稠的面条，能打满我直径26厘米的饭盆。颜色发黑，又粗又硬，比筷子还粗的碱菜子面条，能暂时把胃填塞得有些饱胀感。我想，饥饿的人吸收和消化能力特别强，从碱菜子里一定能吸收到若干营养成分。那些“医院”里的病号，领导上说是怕吸收不了，不许在馍馍、面条里掺和碱菜子之类的代食品，粮食定量又未增加，他们实际还不如我们，比我们还饿得厉害。他们任人摆布，实在凄惨可叹。

到睡觉时，我就又饿了。我们几人说话都很少。我在忍饥挨饿中睡去。好像是为了补偿白天清醒时挨饿的痛苦，梦中，我一直在吃着几年来从没碰过的好吃的东西……梦中的饕餮，将我推入更为甜美的睡乡。我沉沉大睡直到天亮，醒转来十分费劲。

次日，我仍赶往“医院”。

我提着镰刀正要去割芦草，只见大路上来了一辆马车，从斜对面奔驰而来，车上拉着人。在“医院”前，车停了，跳下来的赶车人，正是那个瘸子“职工”。车一停下，他就吆喝着叫车上的人下来，那几个形容枯槁的人肯定就是送来的病号了。他们动作迟缓，半天也下不了车。只见瘸子生气地一把就拉下一个人来，那人猛不防被拉下车来，也许身体的什么部位被弄痛了，他大叫一声，踉跄了一下，几乎要摔倒，又被骂骂咧咧的瘸子一把拉住。瘸子粗暴地抓住这病号向“医院”门口走去，只见他身体左右晃荡，每抬一次脚步都挺艰难。瘸子把他送到墙边，让他靠墙站住，又去吆喝别的人，那几个病号有的还在背行李，有的把行李放在地上拖着慢慢挪动脚步，向前走去。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当车把式的瘸子对于同自己一样服过刑如今饿成了这般模样的病号，竟如同对待猪狗一般。人类的同情心，在他的身上已不存在。那么，是谁给了他摧残自己同类的权利？我不忍心看下去，更不愿和那瘸子打招呼，就转身割芦草去了。

当我割来第一捆芦草，坐在靠大路一边的炕洞口，正准备烧炕时，一个人来到了我的身后，问我：“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一回头，看到他是欧阳夏，原省劳改局的

干部。来四工农场后，他曾在二站当小队长，我在二站劳动时才和他熟悉的。我简单地说了说来“医院”的情况，也问及二站的难友们。他严肃地说：“现在，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我不禁心里一惊，又一沉，这种话可是说得的吗？继而又一想，我们如果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面临的就是不能生存。我深深感谢他说的这句话。欧阳夏好像也正是为了说这句话才找的我。凭感觉，凭本能，他觉得不能把这句话深藏在自己的心里。他是有事路过这里，看到我一个人在这种时候还坐在“医院”的炕洞前，既感到有些奇怪，也是为我的生命担忧，为我的不幸动了恻隐之心，所以走过来看看。毕竟，我不同于别人的，是个女性，还是个年轻的妈妈。作为小队长，他并不能把同样的话讲给每个人听。他再没多说什么就走了。

我沉思了一会儿，又默默地继续烧炕。“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此时此地，这句话真是太正确了！原来，我在思想上还没产生过生存不下去的精神准备。我只是想，情况即使再恶劣，我也要活下去。“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斗争”，这迟到的意识需要行动，我却依旧茫然，不知该怎么办。但总算有点开窍吧。我开始想到，难耐的饥饿一直继续下去，我的身体也会被整垮，像“医院”里的病号一样倒下来。到那时，一切就真晚了。我无辜被整治到目前这种地步，我于心不甘。我绝不能倒在这里，我还想重新获得我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一切。我作为一个一心向党的人，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一切。党抛弃了我，世人抛弃了我。但是，我还得为我所有的亲人活着，为我自己活着，我的一切不能就这样结束。我一定要活下去，以我本来的面目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我确信，总有一天，党的阳光会照耀到我的身上。我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烧完最后一个炕洞，我正待起身走回病房，看见那三个年轻“职工”都走过来了。这里，正是那间大病房的后面，平时没人来。他们来干什么呢？只见其中一个脸颊特红，小个子，说河南话的“职工”，从棉衣里掏出一个小布袋，给那两人都倒了些炒好的麦子，那两人旁若无人地立时大嚼起来。小个子河南“职工”招呼我说：“你也吃些！”往我的上衣口袋里也放了几大把炒麦子，然后自己也吃起了炒麦子。这可是求之不得的佳肴，我也大嚼起来，只觉得满口生香，每粒麦子都喷放出难以言喻的、令人迷醉不已的滋味。我几乎是在舍不得咽下去的状态中匆匆吞咽了经过反复咀嚼的炒麦子，然后用舌尖搜括粘在牙齿、牙龈、上腭及满口腔留下来的炒麦子的残渣，和着唾液再仔细咽下。

本来，这是不该问的。我在大嚼炒麦子的喜悦与兴奋中——在这种时候能在无意间吃上炒麦子真是幸运——忍不住地问道：“你们哪儿来的麦子？”小个子河南“职工”回答说：“我们都在场上干活！”原来如此。他们不同于那些病号，活得健康自在，只是由于他们有着比别人优越的生存条件。

这三个年轻“职工”，看样子都是略有文化的农民，不知他们犯了什么案子。三人中的另一个是甘肃人，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在生产队劳动时不慎把队里的架子车掉下山崖，以破坏生产的罪名判了3年刑。当时，我细细嚼咽着炒麦子，充分享受着这种从未体验过的人生之幸福，脑际无端地又闪过了阿·托尔斯泰的话：“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忽然间，觉得对这段话又有些不甚了然了。但是，管它呢，我继续心安理得、仔细认真地品味炒麦子无与伦比的美味，真觉得其乐无穷。那令人心醉神迷、回味无穷的咀嚼吞咽活动终于都结束了，而胃肠的舒适感仍使我心情愉快。须知，这是11月以来我吃上的一次最香、最好的美餐，小个子河南“职工”给我的几大把炒麦子，兴许能顶上我们全天的粮食定量呢。这粒粒金贵，无比美味，能救人一命的炒麦子啊！

那个甘肃人和大个子河南“职工”吃完炒麦子，立即转身走了，几年的劳改犯生活，训练了他们的警觉性，他们知道这儿不是多待的地方。

小个子河南“职工”还和我闲聊了一阵。他说，他常去一个家属家里，给送去麦子。这个家属有个两三岁的小孩，男人是右派，去高台了，那个家属对他挺好。显然，饥饿的女人用温情和肉体为她和孩子换来了粮食以维持娘儿俩可怜的生存。我平静地听他说着这些，无以答对。他还说：“那娘儿俩怪可怜的，我每次去，她都给我做吃的，她对我挺好，她确实好！”他找到了我这个可以倾吐私情的对象，大约十分兴奋，尽管拙口笨舌，仍不能自已地絮絮地说着。他眼睛明亮，流露出憨厚、真诚的情态。大概，他并未想及他的行为是对他人的侵犯。他俨然以那女人的保护神的架势向我诉说着这一切。我能谴责他吗？从内心里说，我也不想怪罪他。欧阳夏的话还回响在耳边：“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应该说，威胁我们大家生存的那一切才是最大的犯罪。

小个子河南“职工”的谈兴一告终，我们就各自走了。我走进大病房，看见里间屋里的炕上坐着机耕队的小张，他原是张掖航校的工作人员，是从十工农场来的难友。他来四工农场不久，脸就瘦削下去了。我们原来常见面，他开的拖拉机领柴油都要经我的手。论说，他工作各方面的条件都还可以，我们吃麸子馍、水煮干萝卜缨的时候，由于工作条件的关系，他一直和干部工人吃一个灶，没受太大的罪。但他个头高，身体棒，饭量也大，在十工农场放开肚子吃惯了，一到四工农场就受不了。他大概也是取消了工资的人，没钱再买其他吃食。我和他第一次在场部相遇，他就叫苦不迭地说：“这儿叫人吃不饱饭，真受不了，受不了！”由他的坦率，我又联想到，十工农场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他在习惯的轨道上行进得久了，已忘了他自己的右派身份。情况变了，他的应变能力跟不上，不能低三下四，说话又随便，这儿的干部工人能容得下他吗？机耕队丁队长也常到我们办公室来坐坐，我是以语言的谨慎，绝对的

谦逊和礼貌，工作上的勤勤恳恳，来获得他和颜悦色的对待，小张除了工作上没话说以外，其他方面恐怕都差一筹。这样，人家对他这个“阶级敌人”起码也是疏远的，有了为难之处得不到原本可以争取到的帮助。他是我在“医院”里见到的惟一的右派难友。

小张一见到我就高兴地问：“咦，你怎么在这儿?”我问：“你怎么来了?”他说：“身体垮了，他们就送我来这儿了。”说话间，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还向我打听：“这儿的条件怎么样?”我只好安慰他：“还可以吧，你就在这儿养着吧!”这样回答，我不禁有些黯然，也有点为他担心。不过，看起来他的状况比同屋的“职工”病号要好一些。

在大病房里忙了一阵，我走出大病房，只见旁边小病房的门口斜放着一辆架子车，门大开着，两个“职工”男护士和干杂活的大个子河南“职工”，正从病房里往外抬人。两个护士中，一个是上海人，前两天曾和我攀谈过几句，对于三年的刑期满了以后仍然有家归不得，含蓄地流露过他无法诉说的苦衷；另一个就是曾给过我一瓶鱼肝油丸的武山人。上海人也很年轻，看见我，他紧皱眉头，连连摆手，示意我快到一边去，不要过来。我立即也就明白了，他们抬出来的是一具尸体，他怕吓着了我——一个出现在“医院”里的惟一女性。但我不想躲开，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已知农场天天死人。我想，我已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如今又面临着无法逆料、不允许诉诸语言的大灾大难，我能躲得开吗?看看死人又怎样呢?苦难已使我无所畏惧，我不必躲避一个死人，要来的一切总归会来临。我忽然觉得我、这些正在抬死人的“职工”，同死人之间并未拉下太大的距离。死亡，不也很平常吗?就在今天这个时刻之前，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有人要永远地离去，而眼下死神却已悄然来临。一个“职工”的死去，没有人为他流泪，也没有任何送别的仪式……因为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的留场割断了亲人们对他的记挂，对他的悲伤。现在，一切都已终结。不过，我还是站在原地，不再往前走了。就这样，一切还是看得清清楚楚：抬出来的尸体毫无遮拦，几乎是被扔到了架子车上，只见他一头又黑又乱的头发，瘦棱棱的脸细成了长条，从脸面直到脖子都是难看的蜡黄色，双颊不干不净，眼睛紧闭，一只蜡黄色的瘦手还搭在了架子车栏杆上。大个子河南“职工”拉起架子车，两个护士在后面紧紧跟随，一起往外走，蜡黄的瘦手跳动了一下，掉到了车里。他们很快地走出了小院，车上的人是安静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还是含恨离开了人间?我相信，这些为他送行的人没有谁会跟这寂寞的灵魂进行交流……他们干这种事已不是第一次，尽管无奈。近来这种例行公事大约干得比较频繁，已使他们自己麻木不仁。话说回来，我自己又怎样呢?我自己就不同于这些“职工”了吗?事实是，看着这一切，我也只是呆滞地站在那里，麻木不仁，沉默无语。我闭住了自己的嘴，让

所有的感叹、思绪都深深地埋在心底。我只能这样。那个上海人居然还想到我是个女人，试图阻止我看见死人，他的这份人的感情，想一想，也还有点可贵，要使人性完全泯灭似乎也难以做到，即使在这种严峻的时刻。以后，像这种在大白天往出抬死人的事我还遇到过。

当天晚上，我没敢向同屋的女伴们说及我看到死人的事。欧阳夏说了的话：“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我知道是个最正确的行动口号，但说出来挺吓人，我更不敢给她们说。记得在反右斗争的批判会上，常有人左分析右分析，受到批判的右派在鸣放时如果说过“斗争”二字，比如，说过要向某种不良的社会现象作斗争，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作斗争，等等，都成了问题。在批判发言中，不良的社会现象是不存在的，党的整风报告中提出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经个人用事实说出，便成为子虚乌有，这样，右派分子所谓的“斗争”究竟是把矛头指向谁，就不言而喻，从而受到严厉的批判，或不断被喝问，要求老实交代。那些斗争会的场面已经过去了两三年，在我仍余悸犹存。我绝对不敢说出欧阳夏的原话，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现成的问题就摆在眼前，为了自己的生存，你要跟“谁”斗争啊？当然，我还不能牵连欧阳夏。这样，那句话便只能深深地藏在心里。但是，我还是用我自己的话，反复地告诫女伴们：“我们一定得想想办法，我们得活下去。”由于我已在医院待了两天，从我严峻的神情，低沉的语调中，她们想到的一定比我说了的要多得多。

其实，她们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都已经紧张地思考了好些天了，只是都还鼓不起勇气说，心里还都有些顾虑。是石天爱第一个打破了沉默，她沉稳地说：“我们其实早就该商量商量了，像现在这样下去，我们一个个都得玩完！”小徐接着说：“那我们就商量嘛，依我看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说：“原来我一直想着头上的帽子，心想总得争取先把帽子摘掉再说，现在……”不等我说完，她们对我的这种呆气都来了气，争先恐后地一顿痛击。石天爱说：“你现在还只想摘帽子，就别想活了。”小徐原来也一直念叨摘帽子的事，此刻却说：“都什么时候了，只想摘帽子也太没意思了。现在谁还管摘帽子的事，那些干部们对每天死人的事还制止不住呢！”我一想，真也是的，同死人相比，摘帽子又算什么事，何况那些干部们本来就对给我们摘帽子没多少热情，我们如果头顶上没有了那顶“桂冠”，他们还能管得了我们吗？一贯专别人政的人，一旦失去了专政的权力，会不好受的。王桂芳大概因为蹲过监狱，一向对摘帽子的事不很热心，此刻，她最关心的也还是怎么活下去。我们心里都清楚，为了活下去，她已经聪明地把丈夫送到能够活下去的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她催促大家说：“咱们就好好商量一下嘛！”这时，大家都饥饿难耐，下午饭早已消化得精光，就像没吃过似的，不仅胃肠空得阵阵作疼，脑袋木愣愣的，昏昏沉沉，浑身疲软无

力，就更不待说了。11月以来，我们愈来愈觉得晚上的时间特别难熬，饥饿对生命的威胁似在步步进逼。

我们议论了一阵怎样活下去。平时耻于说出的“偷”，竟成为当晚非干不可的惟一的大事。我们都知道，财务科后面的院子里堆放着用帐篷布盖着的一大堆棉籽，大家都说先拿点棉籽来吃，棉籽有油，吃点也顶用，即使被发现问题也不大，反正是肚子饿，又没偷粮食，当时偷粮食可是罪莫大焉，看得挺严重。谁去呢？都认为我应去，因为原来我每天晚上都到财务科记账去——只是近来去医院烧炕才暂停，要路过那儿，遇见人也不显眼，再就是场部干部一般对我印象还可以，如被发现也不会出大问题。这样，进行冒险行为的第一人便非我莫属。

天还未黑，我带了一方包棉籽用的大手绢，就动身了。走进小院，院子里正好没人，一眼就看见棉籽堆，从哪里动手呢，只见帆布篷布到处都用木板等物压得很严实，我第一次蹲下去就没能揭起来，后来，瞅见有个篷布角没压住，就急忙蹲下去揭，谁知一只手刚抓住篷布角，就听见一声喝问：“谁？”吓得我一回头，再也没想到，问话的竟是和我一起演《梁秋燕》，同我一起争取婚姻自由的小生春生——庆阳人王全禄。我知道他不会把我怎样，虽说十分紧张，我仍在大手绢里胡乱包了些棉花籽，才急急地往回走。王全禄看着我，再什么话也没说。我甚至也没有回头再看他一眼。他当时可能已摘了帽子，在场部值班守夜，我们虽同在场部，平时极少见面，偶尔在办公室遇见几次，也像不认识似的，并不说话打招呼。这样做，符合了场部那些干部们的要求，只是我就无法知道他在干这种差事。我们这一对在舞台上谈情说爱争取婚姻自由的人，现在竟然见了面连话都不能说，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想当初我们受那些干部们摆布，在舞台上认真演戏以娱他们少数人的耳目，真是愧对自己的人格和灵魂！

第一次行动出师不利，偷回的棉花籽吃着也不顶什么用。我们又一起商量再三，还是决定由石天爱和王桂芳从机磨坊偷面粉出来。石天爱说：“最好的东西还是精面，碱菜子有什么营养？屁用不顶。我们还是想办法吃面粉，上个月粮减成24斤，我就自己想办法了，每天上工时偷空从机磨坊带点精面出来，说是上厕所，到木工房要一缸子才开的开水，回到房间用开水一冲就吃。我那时候就想到不能再硬扛下去了，身体缺了粮食哪能一直支撑下去？”我们同住一个屋，石天爱从上月就自己独个儿想办法了，我们竟毫无所知。现在，形势十分严峻，我们相互间再提防，再避讳，就什么也干不成。为了大家都活下去，我们得同舟共济，共同走出困境。

偷面粉出来的大原则定下来以后，我们进一步讨论，偷回来的面粉怎么个吃法。石天爱说，她在家时和面就有绝招，她怕手上多沾面，只用一个食指搅拌，就能把半盆面粉和成团，过后只要洗去食指上的面粉就行了。可是面团又怎么处理？用屋里半

死不灭的炉子烙饼，烙饼的味道会从破门缝、窗子缝里散发出去；我们的宿舍就在机修厂车间旁边，门口经常有人走动，饥饿的人对食物的嗅觉特别敏锐，一旦被别人发现，随时都会有人冲进来查看；做成面条或面片之类在炉子上煮，只要有人进屋一眼也会看见。而且，只要查出我们宿舍有人偷面粉，王桂芳和石天爱就会立即从机磨坊调出，我们的面粉来源就会断绝，我们大家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唉，唉，偷回面粉要吃进肚子也还这么难！

第二天上午，在场部路遇杜绍宇，我心事重重，立即就想到，他人在站上，或许可以搞到粮食，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问问他，向他求助。因为我知道，他胆子大，头脑灵活，绝不会在这个危难时刻坐以待毙。来农场后，我们在十工相处就不错，只要他真有些办法，我相信他不会拒绝我的求助。看见旁边无人，我就直言不讳地小声问他：“能不能偷到麦子！”他没有回答“能”或“不能”，却告诉我：“你在这等一下，我就来。”刚一会儿，他就返身回来，把一小坨牛油给了我，这对于我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饥饿与多日来未见荤腥的我，抓起牛油就咬嚼着吃了起来。杜绍宇看见我咬嚼牛油的情形，觉得一点也不奇怪，转身就走了。多年后，杜绍宇才告诉我，他后来回到一站后，又被站上派去出外买肉，因而他自己也搞到了肉。那坨牛油原本是他送给场部邮局的小伙子的，为给兰州的家中寄牛肉，作为贿赂已给了小伙子，因为意外地遇见了我，他又跑到邮局从小伙子手里取回给了我，答应以后再给小伙子另一坨。在四工农场，我们已没有原先在十工农场随意往来的自由。他是在场部意外地遇见了我，我又张口向他求援，所以我就意外地得到了这坨牛油。

我仍继续去烧炕。烧完炕，就进大病房看看，小张一看见我，就大声说：“哎呀，你烧的炕到天快亮时就冰凉了，冷得我都发抖，你能不能把炕烧得再热一点！”他形容惨淡，语气急躁，一副难以忍受的样子。我没有想到，烧过的炕竟然还把他冻成那样，前几天我遇见张股长，张股长还高兴地说：“那些灰职工几天没烧热个炕，你去了，那些病号都说才睡上热炕了。”这显然是在表扬我，可我弄不懂那些“职工”为什么会烧不热个炕。如今，小张又说因为炕冰凉冷得他发抖，这肯定也是事实。再一想，炕洞里芦草虽填得很满，干透了的芦草一点就着，很快也就烧光了，到天快亮时炕洞里已无余热，炕冰凉是肯定的。要使炕一直热下去，到晚上再烧一次就行，那三个干杂活的“职工”就可以做这件工作。我把这些情况向小张做了解释，告诉他，下午回去，我可以向领导建议，争取晚上再烧一次炕。

这天烧完炕，三个年轻“职工”再一次来到屋后，三人分吃炒麦子，仍给了我几把，我贪婪地享受着这份幸福。就在阴森的地狱门口，生之欢乐也并不忙于退走。

下午回到场部，我找到张股长，说及小张的情况，我说：“让医院的职工晚上再烧一次炕，炕就能一直热到早上。”谁知张股长竟一口拒绝：“不是炕没烧热的问题，

是那些病号身上没一点热量了，才发抖，你把炕烧得再热，他还会发抖，甭管！”他的回答使我心里直打颤。小张他怎能禁得住天亮前的冰冷？颤抖不已的他，身上已没有了多少热量的他，这样下去怎么能行？我将怎样回答他？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宿舍，从食堂打回一饭盆的碱菜子面条。没想到，这顿饭竟大有改善。原因是王桂芳有行动，她大胆地从机磨坊包了一手绢的面粉带回来，分给大家。熟食有困难，经大家商议，干脆把生面倒进自己刚打来饭的饭盆里，搅和在热汤里，立即吃将起来。饥饿的我们吃着这顿搅和了不少生面的晚饭，竟也认为是一顿美餐哩！这种吃法，绝不会露出任何破绽，即使别人有什么怀疑，我们已吃进肚子里的面粉，谁也没办法把它检查出来，而且，既然有了这个开头，我们就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为了自己的生存，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原先凝聚在每个人心头的恐慌、烦乱、忧虑，大半都冰释了。有了这一步，我们每个人活下来的保险系数就有了保证，好像每人都吃了一丸定心丸。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每个人的生存更重大、更紧迫的事呢？这顿晚饭的重要深远的意义，绝不是几把美味的炒麦子所能代替得了的。

这天晚上，我们一个个心情愉快，竟然还谈天说地一番。我说到小个子河南“职工”这两天天天送给我炒麦子，石天爱问：“炒麦子好吃吗？”我说：“当然好吃。”石天爱又着急地说：“我还没吃过炒麦子呢，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有，找出来给我几个，我尝尝！”她的馋劲儿又来了，可饥饿的我每次吃炒麦子都要在口袋里仔细搜寻几次，怎么会把那金贵的炒麦子留下一粒半粒？我们都是徘徊在地狱门口的游魂，自个儿都只顾自个儿了。

命运冷酷无情地将我们推向另一个营垒，但我们每个人又都是一座火山。我们内心深处的岩浆在翻滚，在沸腾，尽管十分渺茫，我们仍等待着一次喷发，人人都巴望着伸冤雪耻之日的到来。最近期的向往，也是希望挥洒着眼泪和自己的亲人们会面团聚，得到亲人们的理解，获得亲人们的爱心和抚慰，一颗冤屈受苦的心是多么需要亲人的爱与温暖啊，而实现这一切的首要条件是我们自己必须活着。四工农场把我们当作劳改犯，对右派分子们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要求我们相互之间经常揭发告状，我们在十工农场时形成的友爱互助的精神被一扫而光。石天爱原来和我相处不错，来四工农场后竟向领导告密，使我一度处境艰难，她肯定也是得到领导上的鼓励，也许还是有谁指名要她揭发我。这样，大家作生之挣扎，为了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作旷日持久的斗争——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斗争，一般只能是自个儿顾自个儿，“人自为战”。冷漠自私，成为人们为保护自己采取的最审慎的处世原则。我们的性格、心灵再一次被重新铸造。所以，我在吃炒麦子时并未想及同屋的女伴，说什么“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才真真是骗人的鬼话！我们的灵魂都够肮脏的了，这里的一切已严

重扭曲了我们原来正直纯净的灵魂！

我的心情终究又不同她们。我吃了一顿饱饭，今后每天都吃上这样的饭没啥问题。可远在高台受难的景超，他的境况怎样呢，他能吃上这样的一顿饭吗？肯定，他没这样的条件。几个月前，我还把这里的教育科长对我们训话时说过的话转告他：“一个人要有高度的自尊心！”教育科长所说的自尊心，意思是要求“职工”和我的难友们在饥饿时绝不要偷窃，我深怕出现一次不光彩的行窃影响到摘帽子，所以，写信时还把这句话转告给他。唉，我这不识时务的劝告，害人性命的劝告！头上那顶帽子已使我呆钝如此。景超本来就是个自尊心极强、极要面子的人，现在我们同屋的人全都吃上了偷来的生面，洁身自好的他就是想偷也偷不来。他难以有这样的机会，而我还向他要求“高度的自尊心”！古人因拒食“嗟来之食”而最终走向死亡，我向被饥饿折磨了几年的亲人要求“高度的自尊心”，竟根本没想到这会使他有一天失掉生存的机会。我已在“医院”见到了死人，那蜡黄色的瘦棱棱的细长脸面，还有搭在架子车栏杆上的蜡黄色的瘦手，一次次地又在我眼前闪过……这仅仅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一个死人。我知道，更多的死亡我都无法见到。难道说，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就这样毫无救药了吗？难道我们永别的时刻也要来临？我拉紧厚厚的被窝，把头深深地埋进去，不禁痛哭失声。

我照旧去烧炕。我先烧完了五个炕洞。和三个“职工”一起吃了炒麦子，他们对我的照顾我感激在心。然后，才进屋去看小张。我想，把炕烧热再转告张振英的话，我也好张口些。小张见了我，阴沉着脸说：“今天天亮前，我又抖了好半天。”这时，我忽然相信了张振英的话，看来他的身体确实没热量了，天亮前正是最饥饿难耐的时候，如果他肚子不饿是不会发抖的。当然，炕如果是热的……然后，我又为自己难以自圆其说、自欺欺人的想法吃惊，曾几何时，我的脑袋也变成了张振英他们的？我讷讷而婉转地向小张说了说张振英的意见，再烧一次炕的建议未被接受。小张只冷淡地鼻子里“哼”了一声，再什么话也不说了。同屋别的病号们木然地听着我们说话，没有一个人搭话，也没有任何别的表示。病房里仍像往日一样沉寂。天亮前的冰冷严寒，就没有使他们同样热量很少的身体痛苦地发抖吗？他们无言，只是因为凭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包括刚才我的答复，都已告诉他们，不说更好。

又过了一天，我又去看望小张，炕上没有小张。我问：“小张呢？”回答我的人毫无表情，缓慢迟钝地说：“他天亮前没有了！”我一下子靠在了墙上，半天喘不过气来。他到底在天亮前痛苦的瑟瑟发抖中离开了这个不需要他停留的人世，他那可怜而有限的请求——把炕烧得热一点，被冷酷地回绝才一两天，而这回绝，分明冰冷了他身体里残留的一点余热，也冰冷了他还在跳动的心。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没有了”，前两天他的状况比别的病号还要好。我不负责任地转达了他的请求，却再没作

更多的努力，而现在，他确乎没有了，在他昨天还躺着的炕上留下了一块空白……他悄无声息地走了，留下的是无言的抱恨，和那一块空白。我知道，炕上的空白今天可能就会被填补，还会再一次又“没有了”……而他的抱恨会是绵绵无期的。我不知他是否有妻子儿女、高堂老母。我们熟悉在“医院”，这里按劳改单位的规定不许聊天，我又哪有心绪问及他的这些，因为知道了又能怎样呢？可我们毕竟难友一场，他的死跟我又不无干系……我欲哭无泪。但我悲泣的灵魂似已离开了躯壳，冲出门外，飘荡在苍茫寂寥的长空！多年后我才得知，他叫张亚萍，山西交城县人，家庭贫农出身，原在部队任练习团战车队车长、文化教员，极有才华，写得一笔好字，生前是武威干校的干部，“鸣放”中无言论，只是查看日记找出了一些牢骚话，将他打为右派。尚未婚娶。

死一般沉寂的病房，活着也如同已经死亡的众病号！

不知过了多久，我默默地从里间屋走出来。听到有人喊了我一声：“和同志！”我吃了一惊，来四工农场以来，“同志”二字已跟我们绝了缘分，何以今天这里竟出现了这个称呼？循声望去，喊我的是一个三十几岁、面容苍白消瘦的病号。他不同于别人，着几乎全新的深蓝色咔叽布中山服，显得比别人整洁，整洁得多，说普通话，从眉宇间透出几分儒雅。他头顶后墙脚朝炕外面睡着，见我已听到他的喊声，又冲口说：“和同志，保重，保重啊！”我猜想，他称我“和同志”，大约是由于听说我是个有工资的右派——小张肯定就知道，他认为比自己要高一个等级，为了和我说上话，便贸然喊了一声。他郑重地大胆和我说话，要我这素昧平生的女人“保重”，又使我的心头涌起无限凄楚……我不知他的姓名，也不知他是何许人，什么案犯，但我得回答他，便说：“你也保重，咱们都保重！”这互致保重的情形，又使我的心情更为沉重，伤感不已。也许，我是他当劳改犯以来见到的惟一的女性，我在这个平常人难以支撑的环境里主动为他们这些特殊的病号服务，使他产生了特殊的感受，感激，担心，同情，悲叹……种种复杂的思绪，使他无法沉默，所以才大胆地说出了他心中的祝愿；也许，他还是个不幸的判了刑的右派，自己落到这般境地，他希望与他同样受到命运之酷劣对待的我不要倒下来，他担心我也会出现不测……也许，他只是因为见到了太多的死亡，所以才急切地关照我。人啊，人，人对自己的同类并不都是冷酷无情、干戈相加的。在这生存危机正在威胁着每个人的地方，爱，依然在人与人之间生发，即使一个身陷困境绝望已极的病号，也在试图温暖一颗被认为是弱者的心，在急切地关照一个存在着生存危机的女人。

我忽然想起，第一天来“医院”时晾在外面窗台上的蓝绒裤一直忘了没拿进来，那个大脸盘的病号怎么没吭声？他也许要穿呢？我手提虱子已全部冻死的蓝绒裤，送到大脸盘原来躺的地方，却认不出绒裤的主人，我问：“谁的绒裤？”回答的声音很

苍老：“他几天前就没有了！”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没有了”！我和这些病号原来都不认识，没想去记住他们。几天来炕上的病号人员的更换我也不曾注意，今天我所见到的一次再次的“没有了”，说明还有更多的“没有了”尚未为我所知。我仅仅为“大脸盘”晾过一条旧绒裤，我想过没有了虱子的绒裤他穿上会舒服些，却万万没有想到他走得匆忙，也许在脱下绒裤的当晚就匆匆走了。这倏忽间轻易失去的生命，几天来我竟一点不知。不是有谁要有意隐瞒，而是炕上的病号从死者预见到了自己不可抗拒的黑暗悲惨的前景，他们自认为命贱如蚁，只是沉默地等待将要来到的厄运，说及死亡已成为大忌讳。我把没有了主人的蓝绒裤又扔回到窗台上，有好一阵子，心如死灰。但，一种强烈的欲望，如烈焰般迅即又在心中腾腾升起。我不是一只蚂蚁。我绝不能死！俩孩子需要我，生命垂危的景超需要我的救助，我所有的亲人都在眼巴巴地盼着和我团聚，我要活着见到我所有的亲人。当然，我坚强地活下去，更是要证明自己的一切，我还是原来的我，我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这天下午回场部前，有几个病号拿出写好的家信要我代发。我刚接到手里，病房里走进油光满面的“医院”炊事员，当然也是个“职工”。他客气地称我“老和”，急忙拦挡说：“老和，你不能给他们发信，这种事你不能管！”我已替他们发了几次信，从未想过不能替他们发信。但是，他是这儿的老资格，出面阻挡，我还只能听他的。这油光满面的家伙，能混上目前这份差事，自然有他一套混的本事。他同那三个干杂活的年轻“职工”一样，都是“职工”中的特殊人物。他那油光光的脸面，那份精神劲儿，还有神气十足的架势，都说明他从病号们的伙食里随心所欲地攫取了他自己的需要。他，衣着干净整齐，麻利干散，大约三十几岁。有一次，我去伙房，看到他正在利索地做锅贴——一种既烙又蒸的发面饼，他兴致极好地欣赏着自己的手艺，和我闲聊了几句，还得意地把场部派到“医院”工作的王股长嘲笑一番：“王股长吶人咋也成了吶相，到伙房说是给病号端饭呢，看见蒸笼布上粘的馍馍渣急忙收揽起来自己吃了。嗨，当股长的咋啥啥都不顾了！”这个侵吞病号伙食肚子吃得饱饱的炊事员趾高气扬如此，居然对一个奉公守纪、饥肠辘辘的干部刻薄地指责不已，我当时就十分反感。现在，他又串到病房说三道四，管到了我头上，认为我违犯了这里的规矩。而我只能把接到手中的几封信又退了回去，心里实在窝囊。他发家信难道也要经过检查吗？转念又想，管它呢，不让我代发信，不发不就完了吗？对这里的一切，我只能适应，遵守，接受，用我在报社工作时形成的观念指导当今的言行已是绝对行不通了。多年后我回忆起这件事仍自责不已。那几封信一定是几个濒临死亡的人向家人发出的求救信，我竟受一个吃饱肚子的“职工”的摆布，冷酷地拒绝为他们寄出。寄出这几封信，他们的家人收到后未必就有能力救援，而拒绝为他们寄出，却是无疑地将他们推进了绝望的深渊。我心里时常念叨阿·托尔斯泰的那段名言，要使自己的灵魂“纯

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四工农场要求于我的，这个混蛋“职工”不许我做的，我被迫接受了的一切，同灵魂的纯净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几天后，我在“医院”干活时，突然恶心、头昏、出冷汗。这是要倒下来的症状。尽管我已经有了生面粉、炒麦子的补充，身体还是支持不下来了。我扶着墙，勉强走到“医院”大夫的诊室，这位大夫名叫王希仁，原是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因四工农场缺大夫所以从那边调来，我们已简单交谈过。他见到我，听我说了感觉，立即取了些药片，热情地拿来水杯要我喝下，并要我在他的床上躺下休息。他的床就在诊室，作为大夫，自然是干净整洁的。但此时的我，竟自认为低人一等，觉得那样干净整洁的床不该由我去躺。何况诊室里常有干部出进，我更认为不是我该待的地方，所以我没听他的话，竟摸到隔壁那几个年轻“职工”的炕上，躺了下去。王希仁又找到我，执意要我去他床上休息，我坚辞未去。此时的我，把自己摆到了这样卑微低下的地位，实在可悲可叹。这是一年来的遭遇所造成的。王希仁见此，心境一定是悲凉、难过的，而我除了身体不适急需休息，头脑里一片空白。饥饿使思维迟滞，我已顾不得去想什么了。大约是为了安慰我，王希仁一再说：“农场对你这样的人一定要关心照顾，你放心！你不会有啥事！”但我不明白，我“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农场为什么会关心照顾我。事实上直到我两月后离开四工农场，尽管我在这里一直做着额外繁重的工作，我始终没有得到任何额外的照顾。

19. 在最严峻的时刻（一）

此时，难以制止的饥饿已在全国广泛扩展，断炊逃荒，饿死人的事已不是在甘肃省或个别地方出现，“各地农民和干部反映饥饿的信件纷纷飞往中南海，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和甘肃为多。无为县的一个干部来信反映，有一个乡一个村的人已基本死绝！他在信中说：‘如有出入，甘愿杀头。’”①

在此情况下，中央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派出检查团，赴全国各地检查工作。派到甘肃的检查团，是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一行人，其中有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也有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就在其中。这一行人先到甘肃的重灾区河西走廊检查工作。在深秋的一天，他们来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场部。检查团先了解了场里的基本情况，作了指示。后来傅作义就问道：“有个叫傅作恭的没有？”此时，傅作恭在背草筏子时因病被折磨死去已半年了，有个姓吕的教育股长回答：“可能已经死了。”傅作义问：“请问他埋在哪里？”场长刘振宇还想推脱责任，回答说：“听说他可能跑了。”此话引得傅作义狠拍桌子，怒目圆睁，批评道：“你这哪是共产党做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他五十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他就是些右派言论，没有别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此次会议，为了了解情况，也吸收个别劳教分子参加，其中有个叫司继才的，劳教前为建工部第五建筑工程局宣传部长，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此人参加会议后，因为知道傅作恭生前的组长是原公安厅的刘文汉，就将上述情况告知了刘文汉。司继才后来回原单位，问题很快甄别平反，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且说傅作义发完了火，内心仍很不平静。手足情深，他内心悔恨不已，是觉得自己对弟弟的死负有责任。检查团来到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以

①引自《解放军文艺》1993年12期，徐志耕文。

后，他已了解到这是个死了很多人的农场。这里让很多人都无法活下去的严酷生存条件，弟弟作恭曾来信说起，并请求自己的支援，自己非但没有对他作任何帮助，还不相信他信上所说，对他严词训斥。现在弟弟肯定已经死了多日了，场长连他死了的事实都不肯承认。唉，唉，是自己一封又一封信地写信动员弟弟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又是自己让弟弟来甘肃发挥专长搞水利建设。现在弟弟就在这个平常人难以活下去的农场送了命，罪责在谁？罪责在谁？如果当年把弟弟留在身边，留在水利部工作，他也不致在这个鬼地方送命。此时的傅作义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心中的悲伤真是述说不尽……这是他一生中干过的最追悔莫及而又无法挽回的一大憾事。

再说我在“医院”因饥饿出现恶心头晕出冷汗各种症状，躺在那几个“职工”的炕上休息了好一阵以后，心事重重地回到宿舍。小徐告诉我，机修厂已基本停工，大家都起不了床了，场部的干部坚持正常上班的也不多了，全农场已经一片死气沉沉。

实行月定量15斤的粮食标准已近一月，全农场除了少数特殊人物以外，如“医院”干杂活的那几个“职工”，油光满面的炊事员，及有其他粮食来源的人，上上下下的人大都在无言地忍受着饥饿的熬煎。

以恪守职责的王股长来说，他在“医院”给病号打饭时乘机剥食蒸笼布上残留的馍馍渣，被“职工”炊事员嘲笑，说明饥饿已使他顾不得自己的威严和体面了。以往，他也很会嘲笑训斥那些饥饿的“职工”，嘴下毫不留情。现在，他肚里饥饿难耐，嘴里绝不说自己肚子饿。因为他知道说自己肚子饿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的不满，就会如我等而获罪。他是从管教刑满就业人员的站上调来场部的，原来每天和就业人员打交道。他深知，那些就业人员如因饥饿偷窃或出了什么事，斗争，批判，挨打之余，还要加个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罪名，才算是上纲上到了顶，才能了事。对这，他了如指掌，熟路旧辙，他就常常这样做，这是他的工作任务。如今，他自己也挨着饿，却只能紧紧地闭住嘴，什么也不说了。此时，场部的干部们大体上都是如此，勒紧饿瘪了肚皮的裤腰带，什么话也不说。

我头脑木木愣愣，空白一片。“医院”里那些病号的形象仍不时出现在眼前。那个关照我，用普通话说“和同志，保重，保重啊”的病号，着装整洁，崭新的蓝卡其布中山服上衣，使他不同于别的病号。他为什么穿得那么好呢？我突然想到，或许，他是想到自己的日子也已经不多了，他穿上崭新的蓝卡其布中山服，是想在“钻沙包”的时候，把他在人世间最好的衣服一并带入另一个世界。他原来也许就一贯着装整洁，他不愿以囚犯的模样走进另一个世界。他在家中一定有妻子儿女，而在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将孤独地走完他的人生之路。他一定知道，我家里还有俩孩子，孩子不能没有妈妈，所以当他看到我在危难之际还辛苦劳动，为病号服务的时候，他觉得于心不忍，才特别地关照我“保重”。这份情谊弥足

珍贵。

那些没有医药的服务、没有痛苦呻吟的病号们，他们不过是被集中起来等死。医治他们，救助他们，只消多给他们吃点饭食就行。但是，农场的领导只顾自己的官职地位，他们自私透顶，铁石心肠，硬是听着全农场死人数目的与日俱增的汇报，而丝毫不为之所动。

一年来，杨振英为了教育小徐和我，不止一次地说："我们同'职工'最尖锐的斗争，就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他们对抗改造，不服监管，就表现在对粮食政策不满，小偷小摸不断。"当然，杨振英在说这些话时，他全家人的肚子都吃得饱饱的，他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作为共产党员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用毛泽东教导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职工"们偷窃粮食的行为，似也不无道理。当×副场长命令他把偷了面粉的冼维汉吊起来时——冼维汉也只是小偷小摸吧，他毫不犹豫，动作敏捷，极其利索地就把冼维汉高高地吊到了自己办公室的房梁上。任冼维汉因全身剧烈的疼痛大喊大叫，他只是冷静地在一旁观看，毫不为之所动。他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场长的命令，他有责任这样做，"吊"一儆百，事关重大。

此时，每人每月15斤的粮食定量，使他全家人的胃肠也立即受了委屈，知道了挨饿的滋味。机修厂那个"职工"的死亡，他虽然对我和小徐宣布是由于心脏病，回到家中，向老婆马玲芳说的就不会是同样的话。他主管的机修厂、汽车队不生产粮食，机磨坊虽属他管辖，在粮食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一般人都不敢向他献殷勤。然而，在全家人忍饥挨饿痛苦不堪的日子里，也出现过一件令他惊喜不已，却只能回家向老婆一人告知的奇遇。一天，他到机磨坊打面，条子是总务科开好的，钱已交过了，而这天给他打面的不是别人，却正是他极为厌恶，劳动不怎么样的女右派石天爱。石天爱见到他不言不语，拿起铲面粉的木头簸箕，瓷瓷实实地给他的面袋子里装满了面粉，干脆连秤都不过，就让他扎住面袋子口，用自行车推走了面袋子。饥饿已使他没有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面对女右派石天爱，他心里只有感激，只有愧疚。平日里他对她批评甚多，毫不留情，这多半还因为作为女人她嘴上老叼着烟卷让他看不惯。而此时此刻，他直觉得石天爱是天底下第一个好人。谁会在这个关键时刻用木头簸箕往自己的面袋子里不言不语地额外地装进许多金贵的面粉呢？没有了，天底下再没有第二个人了。而他又不能当面对石天爱表示感激。他啥话都不能说。回到家中，老婆一见他打回的面粉比定量多了许多，问他是咋回事，他才激动地把这次奇遇原原本本地说给老婆，两人在一起又议论了好一阵。杨振英说："我收拾（批评）了她好几次，看着她就不顺眼，对她就没有个好态度，真想不到。"老婆说："看不出石天爱还真是个好人啊！人家没记恨你收拾她，在这节骨眼上知道你全家人也在挨饿帮了你，这就是人家的好！"杨振英真是再也想不到在这关键时刻倒是女右派石天爱帮助了自己。

当然，杨振英得到石天爱这次的帮助只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为了全家人的活命，他还在寻求更可靠的外援。他平时和一站站长王志玉相处不错。王站长一向待人热情，他略有表示，王站长便一口答应，慷慨相助。王站长让他和老婆晚上拿上麻袋来一站背些吃食。当晚，杨振英夫妇各拿了一条麻袋，由王站长带领，到一站的库房里打点着各装了多半麻袋的洋芋、胡萝卜。一站的洋芋、胡萝卜都储存在窖里，这些窖离站上还有一半里路。窖挖在地窝子里，日夜都有人看守，看守的人夜里就睡在地窝子里。库房就是这样的地窝子。这一切的措施，都是为了防止站上饥饿的人们偷窃。这天夜里，在地窝子里值班过夜的，正是我的难友高仲君。王志玉领着杨振英夫妇在地窝子里装洋芋、胡萝卜的过程，他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振英夫妇由王站长领去明打明地拿，他们自己无需任何担心。只是两个麻袋里各装了100多斤的洋芋、胡萝卜，可真够他们背的。两口子是拼上了命，在寒风中流着大汗挪动着脚步匆匆前行。在费尽了力气，实在背不动时，就把麻袋放到地上滚动着走一阵。他们又是极要面子的人，还害怕遇到熟人问起不好说，一路上那个胆战心惊，也是他们所未尝经历过的。等两麻袋的洋芋、胡萝卜背到家里，两个人都瘫了。当然，这两麻袋的洋芋、胡萝卜，也是一个钱不用给。此一行为，已大大超过了“职工”们小偷小摸的性质。杨振英当然用不着用评论“职工”们“对粮食政策不满”的话来回敬自己，饥饿的他既然已背叛了他原来坚决遵守的行为准则。一个共产党员在专政机构里多年养成的坚定的原则性，既然已被难熬的饥饿所摧毁，他还能说什么呢？不仅他和老婆在挨饿，他更见不得娃娃们饥饿时的可怜样儿。他和老婆的所作所为虽然违犯了共产党员遵纪守法的党性原则，那只是为了让全家人少挨点饿，不饿死人。在外面的世界里，他依然十分谨慎，不说一句出格的话。

在这当口，我也对杨振英帮过一次小忙。与其说是帮小忙，倒不如说成是一次小小的回报，对她老婆马玲芳的回报。我初到汽车队不久，队长刘星汉一次出车回来，要我开了汽油库房的门，把一麻袋的碱面放了进来，说是行车时在路上捡的。半年多过去了，这袋碱面谁也不曾动用过。到了11月，有一次刘星汉要我把库房门打开，用报纸包了一大包碱面拿走了。后来我才听说，街面上买不到碱面，家属们都无法蒸馍。这时，我就想到库房里的碱面，原本是刘星汉行车时从公路上捡来让我代管的。家属们蒸馍没碱，我何不送人一些，以解她们的急。我和家属最熟悉的就是马玲芳，从多次接触中，我觉得她人好，对我们几个女右派都以善心对待。×副场长那次要踢我打我，不是她拦住，我就挨上了。所以从内心里我是感激她的。这样，我就用报纸包了些碱面，趁天黑时送到了她家。自然，这是她家当时最缺的东西，她没有想到我会将这紧缺之物送到她家里。

一站离场部近，王志玉曾尽其力量，向场部的好友们支援了不少食品，王积义、

刘星汉都先后从一站的库房里获取过一站用特殊手段弄来的肉食。老中医张正德到二站去要胡萝卜、洋芋，被二站领导拒绝，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虽医术高超，可也是个就业人员。王志玉给他的是成块的羊肉，好在他自己有个小屋，每天晚上炖一小坨羊肉，也就解了饥荒。西医杨桐福，年事已高，原来也是个名医。他的兄弟杨英福，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已是兰州医学院院长。王志玉几次捎话让他到一站取些吃食，杨桐福都没来。后来，王志玉千脆托别人给他带去了些吃食。

王志玉向肚里匮乏食物的书记、好友们无偿地赠送一站的产品，也遵守一个原则，只赠送洋芋、胡萝卜、肉之类，库存的粮食绝不拿出。因为，那时候全国性的大饥荒的形势已十分严峻，“粮食是宝中之宝”的口号喊得山响，洋芋、萝卜之类都可以说成是蔬菜。他不敢把“宝中之宝”送人，也怕落个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罪名。他虽乐于在困难时刻解人之忧，仍然很注意政策，并防着一手，避免使自己陷入难于自拔的境地。

当饥饿的狂飙席卷了全中国，千万宝贵的生命因此而离开了人世，饥饿难耐等待救助的人们求告无门的时候，许多中国人竟连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都没有。唉，唉，你们算是怎样的人哪！

小徐说：“我们还上什么班呀，场部的干部们都支持不住了。”我立即同意了她的主张，休息几天再说。来到四工农场近一年来，我没请过一天假。有时，夜里在财务科记账到12点，睡下才两三个小时，又来了拉油料的汽车，我就得立即钻出热被窝，在凌晨的寒风中清点拉来的油桶。到早晨6点多钟时尽管疲劳已极，睡眼难睁，我也还得按时起床上工。小徐也一样，机修厂连夜检修农机具，有时半夜里需要零配件，就来喊她起床从库房里领取，第二天早晨，她也得按时起床，不能多睡会儿觉。在“医院”出现的症状，说明我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烧炕对体力的消耗，我已难以承受。我得尽力保命，保住对我自己及我的亲人们都十分宝贵的生命，保住每个人一生都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第二天早晨，石天爱和王桂芳照常上工去了，因为她们若不上班，我们的供给线就断了。这些天来，她俩每天都在手绢里包点面粉回来，我们4人分了，匆匆搅拌在打回的碱菜子面汤里，就是一盆稠稠的面疙瘩，尽管生面味很重，它却是农场绝大多数人无法享受到的美餐佳肴。如今的人们很难体会到我们在大口吞食这样的饭食时每人心中的安适与满足。那些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今簇拥在阴森森的“望乡台”上，向着自己的亲人伸长了手臂悲切呼号，却再也无法回到亲人身边的我的难友及那些可怜的“职工”们，他们如若有这样的饭食吃，就会被关闭在阎罗殿的大门之外，仍然留在这个虽然苦难连绵，也还存在希望的人世间。现在，他们只能在“望乡台”上绝望地哭号不已了。那些一只脚已踏进阎罗殿的黑暗大门，挣扎不已，还想退

回到人世间的人们，如若能吃到这样的饭食，他们就有力量退出那黑暗的大门，大步走回他该停留的地方。我们也只是由于机遇——有两个在机磨坊上工的伙伴，每天才能吃上这样的饭食。我们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就比绝大多数人有保障得多。我们那时心中的安适与满足，却也多么凄惨可怖，我们可以安慰自己的，仅仅是自己还活着。此种状态的苟活，对周围死去的，将要死去的难友无能为力，连感情上的支付也十分悭吝——死人的事越来越听得多了，我们麻木得连悲痛都不会了，实在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但这是真实的存在。此刻的我除了一心想着自己一定要活着，对别的什么都顾不得了，也没有精神劲儿去想及别的什么。

石天爱和王桂芳上工比以往也迟了些。她们走后，我和小徐仍自在地睡大觉，这在三年来可是破天荒头一遭。由于晚上无事可做，我们一般九点左右就都睡了，到早晨八九点钟也就睡不着了，因为这时肚子饿闹腾得也无法入睡。睁开眼睛，房间里仍一片昏暗。入冬后，为了防寒，我们在窗户上重新糊了旧报纸，风刮破了几道口子，就再用旧报纸补上，于是这层层叠叠的旧报纸糊住的窗户能透进的光线就很有限了。这昏暗的房间仿佛是我们蛰伏的洞窟，外面世界里的闲杂人等视为禁地一般都不进来。一旦有人推开门，就是在大白天也一下适应不了房间里的昏暗，一时间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们蛰伏其间，也有点小自由，睡得尿憋不住了，就爬起来在小徐的脚盆里大尿一通，也不管房门是否顶着——我们的房门夜里用木棒顶着，石天爱、王桂芳上工后就无法顶了——然后爬回热被窝再大睡。我和小徐睡在各自的被窝里知道彼此都已醒了，也并不说话。说什么呢？毫无希望的生活，已使我们没有了说话的兴致。苟且地活着的人，只是为了保命才存在着的人，会对什么感兴趣呢？

小徐有块表，九点半以后，就叫我起床，因为十点要开饭。我们爬了起来，都不叠被，被子里的余热很宝贵，得让它保留下来。我们胡乱梳洗一下，匆匆围上已破损了的厚厚的围巾，裹紧同样破旧的短大衣，小心翼翼地绕过房间中心火炉周围的灰堆——火炉里填充的煤很少，烧败的灰渣我们因没劲清扫都堆在了火炉旁，在“洞窟”里走路，得提防被灰堆绊倒，然后，出门向食堂出发。

一路上，不断遇到机修厂陆陆续续也去打饭的“职工”，他们沉默地蹒跚而行，一个个都显得苍老了许多，蓬乱的头发从破旧的棉帽里长长短短地露了出来，目光阴郁，胡须乱麦，勾着头，弓着腰，怀里抱着自制的外面沾满了陈旧的污垢及黑黑的煤烟的镔铁饭罐。肮脏的“职工”蓝棉袄上糊了许多面“刮刮”，这是顿顿吃碱菜子面条留下的痕迹。饥饿的人在狼吞虎咽之际根本顾不得饭罐里掉下的一星半点的面糊糊，何况他们早已未想及所谓的吃相及仪表之类了。他们也许已多日不上工了。但两顿饭都是自己去打，哪怕是举步维艰，也要自己挣扎着去打。饿急了的人都只知道自己顾自己了，如果让别人去打，代打饭的人就有可能不顾一切后果把打了的饭抢吃个

光净。哪怕是吃掉一两口也不行呀，因为这和了许多碱菜子的面条虽不值几个钱，许多奄奄一息的生命却全靠它来维持。每个挣扎在鬼门关上的可怜人，都绝不放弃能给他以生的希望的任何微乎其微的可能与条件，即便是碗边上的半根面条，即使是半口汤，即便是半片菜叶。我们同屋的四个伙伴，一向也都是自己打自己的饭。

打饭，吃饭，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生命的中心。

我和小徐进得食堂，看见打饭的人已排成了长队，便跟在后面，随队前进。快到打饭的窗口时，便翘首而望，旁顾左右，看前面人打了的饭量够不够，稠稀如何。炊事员拿一个大瓢，每人一瓢，倒进打饭人的食具，或饭盆，或镔铁罐。我们又仔细观察，看炊事员拿瓢的手功夫如何，是否公道。如果一瓢稠，一瓢又稀，一瓢满，一瓢稍浅，就由不得地又紧张捉摸，将要打给自己的一瓢是稠，还是稀？是满，还是浅？我们打饭不是如今在自由市场上买吃食，还不敢吭声，吭声就得罪了炊事员。尽管食堂炊事员除一人外也是“职工”，他们可是人上人。不敢吭声，还要仔细地观察不已，捉摸不已：我们这些被饥饿折磨得要死不活的人，仅打饭一事，也够凄惨难为的了。

最后，轮到我俩了，一瓢黑黑的碱菜子面条倒进了我的饭盆，一看，不错，还挺稠，几根硬橛橛的碱菜子面条露出在黑糊糊的汤面上，小徐打了的就不如我的稠，她把饭盆左右摇晃了一阵，想看清面汤下面的面条有多少，满脸的失望。我只好安慰她：“差不多，走吧！”

我们回到昏暗的洞窟，又蛰伏了起来。

石天爱、王桂芳打饭回来，分给我们一点面粉，真也是极可怜极少的面粉，也就是一两多一点吧，她们不敢多拿，怕拿多了被别人发现。当时，我们每人每天的定量只有半斤粮，每顿饭满打满算也只有二两半，且不说炊事员的大吃二喝，且不说在那个年代一定会有的通过其他黑暗渠道流走的粮食，都要从我们的半斤口粮里扣除。她俩每顿饭都带给我们的面粉数量虽少，同农场给我们的定量相比，也还有点可观，它真是救我们生命的，比黄金还要宝贵的珍宝啊！

我们吃搅拌着生面的碱菜子面条已有些日子了，难忍难熬的饥饿略有缓解，但每个人的心情并没有好转多少，因为农场每天死人的现实并没有同我们隔离开来。

在昏暗中，我们每人端着自己的饭盆，各自坐在自己的床铺边上或床前的小木凳上，急匆匆咬嚼着硬橛橛的碱菜子面条，吞咽着生面疙瘩。从口舌胃肠的感觉来说，都是一种享受，而且是每天的生活日程里惟一可称之为享受的享受。但我们都很少说话。难友们的死讯时有风闻，那些和我们无交往的“职工”的死亡，无需风闻也能想见得到，他们一直挨饿，羸弱得早已经不起眼前如此酷烈的饥饿了。他们在“医院”里走向死亡的种种情景，一个个瞪着忧郁木然的眼睛，须发杂乱，肮脏不堪的样子，还时常晃动在我眼前。我们女性易受感动的心经受了这些天来非同寻常的严酷经历，

虽已变得麻木不仁，而我们毕竟都是人；我们对周围的人虽已少有爱心，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不断地听到身边许多熟人的死亡，我们的心即使已经变作了石头，它沉重的分量仍然压迫着我们虚弱不堪的身躯，使我们随时都感到窒息般的痛苦。愤怒吗？呼号吗？哀哭吗？我们没有这权利，我们也没这份精神劲儿，更没这激情。我们只好不说话了。

饭后，石天爱和王桂芳休息了一会儿上工去了，我和小徐又上床睡觉，虽没怎么睡着，总是避免了体力的消耗。睡着睡着，我觉得眼皮沉重，睁眼很费劲，不知怎么的，两只手都攥不住了，手指又硬又粗，我问小徐是怎么回事。小徐说："怕是浮肿了。"她特意翻身起床，用手指在我的额头和脸上摁了摁，让我的脸对着透进阳光的明亮处——冬日午后安西的阳光十分强烈，有三几个小时，它透过窗户上层层叠叠的报纸能给我们的洞窟增加一点亮度，然后，她仔细地看了看，惊呼："哎呀，就是浮肿，一摁一个印儿。"我成了我们四人中第一个浮肿的。

下午吃过饭，我们得打点着把火炉生着，因为发的煤末极少，王桂芳以勤劳的安西人特有的细心和耐心，每天从烧过的灰渣里把指甲盖大的煤核都一一捡出再烧，或和上灰渣一起压火，发给我们的煤末仍只够晚上压压寒气。煤末当然是和成了煤饼来生火。这天，石天爱让我捡点柴生火。木工房离我们的房间不远，原来捡点柴不难，可这次，我搜寻了几个地方，找了好半天，只捡来细细的两根小柴，眼看晚上的火生不着了。石天爱大为光火，发脾气说："捡点柴你也干不了！"说罢，夺门而去。一会儿，她竟抱着一个机磨坊使用的做工细致，木质磨得溜光，完好无损的木头簸箕回到屋里，用穿着翻毛皮靴的脚几下踏得散了架，捡出一些碎片让我生火，一边还说："这东西不能生火吗？不拿来干什么？需要就拿来用不就得了！"我们三人先是大吃一惊，这么好的木头簸箕拿来生火不是破坏吗？但石天爱那种一不做、二不休的气魄震慑了我们，那些语气坚决的话让我们回过味儿以后，又觉得十分正确。是啊，我们这些徘徊在死亡线上的人，不是要为自己的生存积极斗争吗？农场领导既然畏畏缩缩，视数百人的生命若草芥，我们为了保卫自己宝贵的生命，就再不能处处循规蹈矩了。自己的命都快要丢了，不去积极为保命而奋争，还对同生命的价值没法比的某个工具也不敢侵犯，还想保留它，在这种特殊的时刻，我们的脑袋瓜真也显得太迟钝，太没用了。石天爱的这一大胆举动，又让我们开了点窍。

我想，在那个荒诞而又可怖的年代，如果人人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人人都为自己的生存努力奋争，而且人人都把自己同类的生命看得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宝贵，那荒诞可怖得如同古代童话中的故事能够在中国延续下来吗？

这天晚上，因为木柴充足，火很快就烧旺了。我们围炉而坐，还用我的饭盆煮了些干萝卜缨，煮熟后，大家分享。干萝卜缨是几天前小徐托人用高价买来的，每斤三

元多，我出的钱。这玩意哪是人吃的？入冬后食堂干脆断了蔬菜，再加肚子饥饿，煮熟的干萝卜缨吃进嘴里便也十分可口。石天爱一边从饭盆里用筷子捞萝卜缨吃，一边说："在萝卜缨下面一块儿再煮些麦子就好了，要是有人闯进来，只能看见萝卜缨，发现不了麦子。"我和小徐急忙说："是啊，是啊，一块儿煮些麦子就好了。"我和小徐急忙搭话，意思很清楚，就是鼓励她和王桂芳再拿些麦子回来煮了吃，可她俩都没表态。

吃着煮熟的萝卜缨，不禁又使我回想起在十工农场时的好日子。1958年秋收时，我们有一天去挖胡萝卜，我一点也没想到，安西的胡萝卜竟长得那么大，一般都六七寸长，很粗，要用铁锹深深地蹬下去，才能挖出来。好在那时我蹬铁锹已很熟练，干这种活得心应手，和一起干活的人说说笑笑，玩似的，一堆堆的胡萝卜就挖出来了。挖出了显得特别鲜嫩的胡萝卜，就学工人们的样儿，在明光闪亮的铁锹刃上刮去泥土，也刮去细细的毛根，放进嘴里嘎嘣一咬，脆生生、甜丝丝的，甘甜的汁液流了满嘴。我虽从小没少吃胡萝卜，兰州的胡萝卜哪有这般美味！安西的胡萝卜真比水果还好吃。我们挖了一天，吃了一天的胡萝卜，真是痛快极了。下午收工前，挖出的胡萝卜用架子车拉去全部送入窖中收藏，谁也没想留下一根半根。那个金色的秋天，我真正体会到丰收的喜悦。在漫长的冬季里，饭桌上胡萝卜一直非常丰盛，由演出队编的歌唱食堂化的数来宝里，记得其中还有一句是："萝卜丝萝卜片儿凉拌萝卜！"可如今，同样都是安西的农场，我们能够吃到干萝卜缨，还是托人花大价钱买的呢。我不胜今昔之感慨，面对的还是惨淡凄凉的苦境。

记得春上，有一天小徐和我同被派去和场部家属们一起切洋芋籽，场部的干部们准备种几亩洋芋，到冬季大家分食。我们和家属们用借来的钝刀在面前的小木板上切着洋芋，拉起了家常。这些家属们同场部那些面孔森严的干部不同，阶级斗争的观念比较淡漠，说话也都是一口陕西腔。她们认为我们同样都是女人，出于好奇心，和我们拉起了有关女人的话题。孩子啦，男人啦，家中还有什么人，岁数啦，等等，一一都向我们问到。她们对我俩"文化高"，还表示自叹莫如，真让我们哭笑不得。我们可宁愿自己是个文盲，文盲总不能打成右派吧。我们也非常愿意作她们那样的家属，每天在家操持家务，全家人一起乐乐呵呵地过日子，该有多幸福！如果是那样，我们哪会遭受如今的屈辱与痛苦？到切完了洋芋籽时，王股长来了——正是吃蒸笼布上的馍馍渣的王股长，他派定她们中的两个人明天去种洋芋，说是："这种活不能叫'职工'干，'职工'干连吃带偷，地里就种不上了。"他还让家属们找些草木灰来，把洋芋籽拌一下再种。有个家属笑着说："那些'职工'，你就是把屎尿拌上，他照样偷了吃！"快乐的家属们听了，笑成了一团。另一个家属好像自己亲眼见过似的，还绘声绘色地说道："你们没见过那些个'职工'，你头前种，他随后就偷偷地刨，把

刨出来的洋芋籽‘噗噗’两吹，在袖子、衣服前襟上擦上几下，就放进嘴里，连土带泥地吃开了，把他还吃得香的!”家属们又一阵哄笑。我和小徐心里凄凉，什么话也没说。以后地里长出洋芋就不怕“职工”们偷吃了吗？还有我那些饥饿的难友们。饥饿的根子扎得如此之深，他们挨饿已很久了。农场出现目前的情况，引起大量死人，是必然的结果。

这些天，我苦苦压抑着对处境险恶的我的亲人的思念。此刻，这思念如决堤的大潮奔涌而来……我正细细地嚼着的煮熟了的萝卜缨，饥饿的他是吃不到的；我每天两顿饭都有石天爱、王桂芳带来的面粉搅和在碱菜子面条里吃，没有谁会给他送面粉；他每天有的只是不到半斤粮的饭食，如碱菜子之类的代食品怕也是没有的。他那挨了几年饿的羸弱不堪的身体不会比这里的“职工”更好，他还会活着吗……这些天来，我只顾保自己的命，对于在死亡线上孤独地苦苦挣扎的可怜的他想得太少，我自知救援他已无能为力，竟冷酷地不去想他。每天苦苦地想他，除了苦了自己，又能怎样……我们曾共同肩起了苦难，可如今在苦难升级，大难临头，死神频频向他召唤的时候，我没有伸手给他，哪怕是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也都中断了，在11月初我写了封信之后，他再没来信，我也再未写信给他。我自己也已精殚力竭，写信又说些什么呢？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残忍！我恐怖地想着，他还活着吗？他还会活着吗？心里其实已经出现了不祥的答案。纷乱痛苦的思绪在我苍白冰冷的心田上翻滚不已……

作为可怜的妻子，被深重酷烈的苦难喂养到如今的我，在深深的痛苦中不禁喃喃地叹息道：“唉，不知他还活着没?”这原本不是说给别人听的话，谁知竟成为同屋人的忌讳，小徐急急地阻止道：“你再别说了，再别说了!”那么，让血和泪在我重创的心上悄悄地流淌，让我独个儿吞下这不能述说难以消受的巨大痛苦吧!

过了几天，有个司机师傅要领一桶汽油，我去油库发了汽油，在回来的路上，看见了一柄装在塑料盒子里的塑料牙刷躺在厚厚的尘埃里。我呆在了那里，心，像似被刺了一刀。因为我立刻断定这是一位难友的遗物。他，人已去，曾被珍爱过的牙刷，便被不经意地失落在路上的尘埃里，没有人会再捡起它。我们在离开兰州前，我也为景超选购过这样一柄牙刷。那时候，一般人使用的普通牙刷都是猪毛制就，两三毛一柄，很便宜的。带盒的塑料牙刷市场上刚刚出现，作为新品种价钱很贵，要一块五一柄，景超十分喜欢，我便立即为他买了一柄。我们将要动身了，心里都清楚景超劳动教养去的农场会是很艰苦的，所以为他准备行装，都比我高一个等级：我们每人带一只箱子，我的是十元一个的柳条箱，为他新买了结实耐用的帆布箱，他的皮大衣是从寄售店买的八成新的，我的是父亲穿过十多年的旧大衣改做的；两个脸盆，他拿了新的，我拿旧的。无论他或我，都不想让他以一败涂地、满脸晦气的形象去奔赴那个所在，所以，当我看到他仔细把玩，显出很喜欢的样子，就毫不犹豫地为他买下了那柄

带盒的塑料牙刷，尽管他已被开除，没有了工资。买下它，也还有为他壮行色的意味，而那悲壮的意味，只是到了此刻才有了体会，他会是一去不复返了吗？

到十工农场后，在多次外出的演出活动中，我发现徐保安也有同样的一柄塑料牙刷，他也十分珍爱。他曾高兴地说起这柄一般人都没有的牙刷是在北京买的，大概是在他担任射击比赛的国际裁判春风得意之时购买的吧！现在，这柄失落在尘埃里的塑料牙刷，肯定已永远地失去了它的主人，它的主人会是谁呢？我只能肯定不是徐保安，因为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玲从河南农村迢迢数千里地赶来农场，他有了作为自由人的妻子的照料，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极小。它的主人也不会是农场的干部或“职工”，因为当时安西的商店里尚无此种塑料牙刷。这柄牙刷的主人，看来只能是我的难友中经济充裕，有相当雅兴，舍得花钱的人，而这位难友已悲惨地永远离开了他无限热爱无限眷恋的这个世界，他珍爱过的牙刷便只能躺在尘埃里了，没有人会动它一动。我亲爱的人也有同样的一柄牙刷，它现在哪里？我的亲人还在用他珍爱的牙刷刷牙吗？还是……想到这里，我已无法自持……

但是我还得打起精神，挣扎着回宿舍。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但我流血流泪的心冰透冷彻。我踽踽而行，神色一定异常，迎面而来的电工吴家禄问了我一句：“怎么，病了吗？”他用目光追随着我又看了一阵。

电工吴家禄一直同我和小徐保持友好，小徐因为有时还要下车间劳动，同他更熟。杨振英对他很信任，有时，他会到办公室来坐坐，同我和小徐聊一会天。一次，他说，他犯事是因为和一个原战友开了个玩笑。他原在部队给一个司令员当勤务员，司令员每月的工资收入由他代为保管，各种花费开销，也都从他手里支出，司令员对他非常信任。后来，他觉得只是在司令员身边干些杂事服侍司令员没啥出息，想转业到地方上学点技术。给司令员说了以后，司令员就安排他转业，在工厂当了电工。转业后，同当年的战友仍常有来往。一个周末，一个战友在他那儿住了一夜，走后，他发现战友忘了把手表拿走。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个人来说，手表就是一笔重要财产，一般要积攒数月的工资才能买到手。战友把手表忘了没戴，他顺手就放进抽屉，心想战友会返回来取的。一个星期过去了，战友并没有来取。他心想，这位战友忘性也太大了，先放放再说。又过了几天，来找他的是派出所的，质问他为什么偷了某人的手表，他说，我没偷呀，手表就放在抽屉里。派出所的说，没偷，为什么一个多星期不把手表送还人家，也不吭声。原来，那位战友已把他告发到派出所。派出所的找到工厂见了他，人赃俱在，立即就把他逮捕法办了。此时，正是反右后期对刑事犯罪实行“严打”之时，不是窃贼的吴家禄有口难辩，只得服帖地蹲了几年监牢，尔后又成为四工农场机修厂的“职工”。杨振英平日里对他另眼看待，也许是由于对他自己口述的“犯罪”事实有所同情，当然，杨振英也可以翻阅他的档案。这个不是窃贼的

“盗窃犯”，在我的心目中也自有其特殊的位置。

奇怪的是，这些天来大家都经历了的严酷饥饿，并没把他怎样，他的身躯厚墩墩的，还有些发胖，黑红的脸膛亮光光的，显得十分健康。看来这些天对他和冼维汉几人的传闻不是没有根据。小徐前几天在宿舍里悄悄对我们几人说，听说吴家禄和冼维汉几个伙在一起，每天半夜里从机磨坊北墙上安装发动机的豁口钻进去偷面粉出来，掌管机磨坊门上大锁子的张振英老婆每天来上工时门锁得好好的，机磨坊里的面粉其实天天被偷，偷走了不少。石天爱听来的，则说机磨坊的“职工”王益清有把万能钥匙，开机磨坊的门锁非常容易，每天夜里开门偷了面粉再锁上，神不知，鬼不觉。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反正机磨坊的面粉每夜都被偷，如今，从吴家禄坦然安详的神色，黑红光亮的脸膛，厚墩墩的身躯，使我绝对地相信了对他们的传闻，不是窃贼的吴家禄今日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窃贼，而且干得十分大胆。用今天的语言来说，他们是个团伙，他们为保卫自己宝贵的生命，采取果断行动，勇敢地偷回应由他们自己享用的基本口粮。冼维汉被高高地吊在办公室的房梁上凄厉的叫喊声似乎还回响在我的耳边，他如今的偷窃，从规模和数量上都已大大超过以往。“饥寒起盗心”。被饥饿逼得走上盗窃之路的人们，除非有刀架在脖子上，他们决不会轻易住手。步步进逼，愈来愈甚的饥饿，既然已把许多人逼进了另一个世界，“窃贼们”只能扩大队伍，重新组合，采取新的更有成效的行动。吴家禄原是杨振英在机修厂“职工”中最信任的一个，冼维汉10月份被吊上房梁，我怀疑就是他汇报的结果。曾几何时，为了生存，他又成为冼维汉的同伙。

我的亲人如果早就具有他们这种保卫自己宝贵生命的强烈意识，一切就会好得多。唉，唉，我真后悔，几个月前，我还像个传声筒似的，把虚伪的教育科长大讲特讲的所谓“高度的自尊心”当作真经在信上转告他，暗示他洁身自好，不要因饥饿而偷窃。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自己才真正是个虚伪可鄙的小人，这些天来，偷来的炒麦子、生面粉我不是都吃了吗？我自己还去偷棉籽，我为什么还要向已被饥饿折磨得羸弱不堪的亲人告诫，要他不要偷窃，不要偷窃！

在这些日子里，有一天下午，张露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小三去荒野里捡柴火。在一个大沙窝旁，母子俩拣着拣着，小三突然喊道：“妈妈，你看，那是什么？”她抬头望去，才发现那是一具被沙子半掩盖着的尸体，头脸都黑黑的，露出的一只手也是黑黑的。她回头向周围张望了一下，又发现六七具未埋好的尸体，连本人的被子都没裹，就那样暴尸荒野。她怕吓着小三，就说：“咱今天不拣柴火了，回去吧！”就急急领了小三赶快回家。随着父母到四工农场的右派分子的孩子，早早地就见到了死亡，暴尸荒野的死亡！当妈妈的虽不愿意向孩子说明事实的真相，幼小的他耳朵里早就听到了“钻沙包”死人的事。他不会对刚才眼前的现象不动动脑子，还没走到家，

他就明白了一切。

这里，我要插入已迁场后的十工农场一位难友面临死亡的情景。这位难友叫刘学琨，我在第一章就曾述及，他是个被判了刑的极右分子。17岁那年，他就参加了甘南农民起义，为起义领导人、他的六叔刘鸣背着《矛盾论》、《实践论》手抄本，英勇奋战。在他被判刑迁入安西十工农场后，在大饥馑的日子里，面临死亡，他托人给幸存的难友马英送去了一个新笔记本，在首页写道：

> 马英同志，你如果能活着出去，请一定转告我的六叔刘鸣、省委副书记高健君，就说，我是被饿死的、冻死的、折磨死的，我是无罪的。这个笔记本，你留作纪念。同志，永别了！
>
> 学琨　1961年3月

此后不久，到4月27日，刘学琨死去，时年仅35岁。

一个矢志不渝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前，还对省委副书记高健君及六叔刘鸣——他的革命领路人表明心迹："我是无罪的"。他对党忠诚到死。

十八年后，张掖地区为刘学琨彻底平反昭雪，并为其子刘耀华安排工作，成为国家干部。

20. 在最严峻的时刻（二）

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一位老人的远途到来与死亡，惊动了全场的干部们。场部的“职工”及我等闻知此事，都觉愤愤然。他不应死，他原本可以在陕西农村安度晚年。但是，他死了。

死去的老人是财务科张振英的老父亲，已年近七旬。他是在接到儿子的求助信后，用自家的粮食换了一二百斤粮票，亲自给儿子送来，千里迢迢，既搭火车，又坐汽车，几次转车，一路打听，匆匆向四工农场赶来。在离四工农场几里之遥的地方，老人倒了下来，在暴风的寒夜里结束了自己老迈的生命。

老人此次的使命，用一封保价信就可完成，而他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张振英是个自私怯懦目光短浅之人，他既怕死，还要虚伪地冒充硬汉。跟家里要些粮票，以他的干部身份，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谁也不会干涉。但他还怕别人知道，不敢让老父亲用保价信寄来，因为保价信必须在信封上标明内寄何物。他害怕周围的人由此而得知他是掌握了一二百斤粮票的人，或许有人就会张口向他借粮票，他是借还是不借？他让年近七旬的老父亲远途跋涉，亲自送粮票来，其目的只是为了不让外人知晓自己掌握了粮票悄悄使用。老人心里只以为甘肃遭了如民国十八年的大饥荒，当干部的儿子全家人都在挨饿，生命危在旦夕，在接到儿子的求救信后，便立即把家中的存粮换了一二百斤粮票，按照儿子的叮咛，日夜兼程，向儿子的工作单位甘肃安西县四工农场赶来。

怯懦自私的张振英对于保自己的命想得太周全了些——其实，以场部干部各方面的优越条件，又何来生命之忧？这场大饥馑最后结束之时，干部们及其家属无一死亡就是明证。张振英太怕死，眼光短浅，所以才作出了冷酷自私、孤注一掷的选择。他根本没有想到正值隆冬季节，从未出过远门，作为老农的父亲从数千里外直奔大漠深

处的农场，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而加以安排解决——比如，他应让老人启程后发电报，他到火车站去接。他写给父亲的信上极简单的一句叮嘱，就可以使老人免于死难，而他却没有想及这一点。他心里只想着他需要粮票，必须尽快把粮票拿到手，仅此而已。

这样，老人心里只装着儿子全家人都在挨饿，在立等自己把粮票送到手，才能不再挨饿，解除饥荒的焦虑，不顾腹内空空，不了解狂虐的风暴及严寒的厉害，只是急急赶路，到了，快到了！但是，老人早已没有了热量的身躯怎能和严寒风暴抗争？何况，茫茫戈壁既无路标可辨，天黑后更找不到一个人影去问路。挣扎啊，前进啊，这个在戈壁滩上迷失了方向，冻馁不堪的老人，在挣扎前进中奉献出的是对儿子全家无私的爱，而最终失掉了自己虽已老迈却也同等宝贵的生命。

老人的意外死亡，在全农场引起震动，张振英两口子自然是悲伤的。石天爱、王桂芳和张振英老婆同在机磨坊工作，看到张振英老婆说起老公公的死，泪珠滚滚，伤心不已。我在财务科见到张振英，他正抹着眼泪，给场部管鸡兔的一个姓张的“职工”——他是兰州人，和我认老乡——安顿，要姓张的“职工”再叫上一个人，帮助他处理老人的后事。为了表示酬谢，张振英给姓张的“职工”送了几斤粮票。

前些天，张振英一口回绝我转述“医院”里小张提出把炕烧得热一点的要求，用“甭管”二字冷酷地使我无法再说出一个字，而他在“甭管”二字前面还有几句话：“那些病号身上都没有一点热量了，你把炕烧得再热，他还会发抖！”说这些话时，他并未料想到，他那从数千里外给他送粮票的老父亲，会在严冬酷寒的袭击下，身体也会失去热量，冻饿而死。

多年后我才得知，由于戈壁深处木材奇缺，张振英未能给远道而来死去的老父亲准备上一副薄薄的棺木，他让姓张的“职工”再叫上一个人为他父亲处理后事，只是找了些柴油和柴火，把老父亲的尸体草草烧了一下，把烧焦的尸骨收揽到一个麻袋里。过了一半年，找了个出差的机会，背上麻袋上了火车，打算把父亲的尸骨送到家乡掩埋。谁承想，那年月吃食奇缺，许多人都把吃食装在麻袋里运来运去，和张振英同一个车厢的人，有人注意到那鼓鼓囊囊的麻袋，还以为里面装着的是整块的肉或是其他什么吃食，趁张振英夜里熟睡，就背着那装着尸骨的麻袋偷偷下车了。结果，那以无私的爱心来救助儿子一家的老人，最后竟落了个尸骨无着。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里，有一天夜里，小徐一人在办公室，进来了生产科的马淦。马淦坐在小徐办公桌的对面，笑吟吟地说：“我想办法买了个羊，你吃不吃？”他用笔在纸上画了个简图，标明他宿舍的位置，接着又说：“你来，肉都煮好了，我今晚在宿舍里等你，不会有人发现。”这是小徐未曾料到的。这个在麦地里锄草时由于小徐不小心锄掉了一棵麦苗而当众对她喝斥之人，现在在人人饥饿之时，竟然在无人的

情况下，又涎着脸对她说出这等无耻的话，使小徐思想万分紧张。她满面通红，真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办公室又进来个人，这人是教育科的梁干事，看见办公室只有他们两人，同马淦只说了一两句话便转身走了。刚一会儿，就听见杨振英在屋外大声说："谁在这里干扰人家工作哩，是谁?"说着，已推开门，走了进来。只见马淦满脸的尴尬，立即站起身来，出门走了。杨振英满脸的正气，使马淦无言答对，只能转身出门走路。杨振英并不再向小徐问什么，他的到来，给小徐解了围，小徐感激在心。她也非常感激梁干事，肯定，是梁干事进办公室后觉察出有不对头的地方，徐福莲脸飞红是为啥来？为啥一见到他又变得煞白？所以立即去找杨振英说明情况，杨振英便立即赶来，徐福莲是他的属下，他不能让马淦在自己的办公室胡来。小徐不敢向杨振英说出马淦刚才说过的无耻的话，毕竟，马淦也是干部，她惹不起。杨振英的到来，制止了马淦对小徐的不轨行为。在农场天天饿死人的艰难境遇里，马淦想用饱餐羊肉引诱小徐上钩的企图破灭了，也使他吓破了胆。从徐福莲当时一会儿脸绯红，一会儿又变得煞白的表情，他也估计徐福莲不会上钩，她不会因为饱餐一顿羊肉而失身于自己。凭心而论，马淦也知道，她的丈夫英俊漂亮，年轻有为，已摘掉右派帽子，也是干部，所以才有资格迢迢数千里来看望自己的妻子。想到这里，马淦又觉得自惭形秽。总之，马淦胆战心惊，后怕了许多日子，此后就再也没敢踏进过那个办公室。

报社先后来安西十工农场的七个右派分子中，原文化部副主任杨康，迁场中受到十工农场领导的特别照顾，到了玉门的黄花农场，在大饥馑中安然无恙。其余六人先后都到了四工农场。杜博智先是挨饿，饿得骨瘦如柴。一次，同屋的难友在睡觉前把厚厚的绒裤脱下，凄凉地观察自己瘦削的双腿。杜博智也脱下绒裤看了看，才吃惊地发现，两个膝盖骨及大小腿骨连接处竟大得出奇，原来自己腿上坚实健壮的肌肉像似被利刃削去变了样子，而自己竟然未曾经意。到了5月份，站长王志玉念及是陕西省蒲城县老乡的情分，把杜博智调到了炊事班，就这样，他才大难不死。杜绍宇有他的特殊本领和机遇，前章已提及，所以，他根本没挨饿。杨骁和汪志英去了高台，在经历了艰难困苦后都幸免于难。我们六人中，只有赵秉仁惨死于四工农场一站。

11月，口粮减为15斤后，赵秉仁很快就病倒了，住进了一站的病号室。在饥饿的煎熬中，他思绪万千。

1947年秋季，他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入学不久，就发现自己染上了肺结核。在与病魔的搏斗中，他思维清晰，很快就与中共地下党在复旦的外围组织"力达社"建立了联系，积极参加上海市高涨的学生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中，他热情澎湃，情绪激昂。1948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于子三是甘肃籍学生，全国因而爆发了解放前夕规模最大的反迫害、争自由的"于子三运动"。上海的大学生以同乡好友的名义，在第二年的清明节，借春

游之机，到杭州开展祭扫于子三烈士的活动。赵秉仁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和同学们一起，齐声高唱上海学联为于子三烈士谱写的挽歌："你倒下去，但是我们都站起来了。……你光荣的牺牲，加强了中国学生的团结，加速了统治者的灭亡，更将提早实现人民的解放！"在高唱这迎接解放的歌声中，他激情昂扬……

1948年秋，复旦大学"力达社"创办了油印刊物《昆仑人》，以主要篇幅宣传解放战争发展形势，介绍京、津、沪、杭等地的学生运动，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西北家乡反动统治的罪恶，反映家乡人民遭受的苦难，等等。是复旦和同济大学的五位编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进行编写，赵秉仁是其中之一。他并为地下党传递信件，做了不少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他成为一名光荣的青年团员。在街头，他为解救一个新入学的历史系女生，勇斗歹徒，并到街道办事处报案。后查明此歹徒系国民党潜伏特务。街道办事处为此给他记了大功。复旦大学校党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表扬了他，学校团委评他为先进团员。

……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他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扪心自问，他在学生时代就紧紧追随党，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他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心中的委屈，使他痛苦莫名。

在妻子秦淑才9月份回兰州后，四工农场的口粮又一减再减，赵秉仁眼看病号室的难友们每天都在减员，自己已是久病之人，怎能熬过这一关呢。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还赋诗一首，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对他的关怀，据云诗大意是：窗外狂风在吼，大雪在飘，而他这个垂危的人却享受到了毛主席、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和温暖。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诗句。后来才悟到，他在临终前，仍为右派分子的罪名痛苦折磨，看到身边一个个死去的难友，在妻子走后，他知道自己已不可免，但想到兰州的妻子和孩子们还要继续为自己背黑锅、遭骂名，他极想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坦诚地表白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对妻子和孩子们会好一些。但是，批斗会上他无法表白的，在临终前仍无法表白，他只得用一些空洞的词语来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以表明自己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忠贞不渝，毫无二心。即使在他即将活活饿死时，他仍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这看似滑稽、矛盾之极的一幕，却包含了多少凄惨而令人痛断肝肠的内涵。一个冤屈至死的灵魂，他多么不甘心于去死，还要曲曲折折地违心地说自己享受到了关怀和温暖……

方正儒此时由二站也调到了一站。来四工农场一年来，他在饥饿与反饥饿的斗争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断偷窃农场的粮食，使全家人都没有挨饿。在农场天天死人的情况下，他们家已有了偷偷埋在几个地方的粮食储备，全家人都放开肚子吃

饭。也许是由于环境的影响引起思想紧张，有一次，他本人吃煮熟的麦子吃多了，肚子胀得难受，不得已也住进了一站的“病号室”，请医生为他灌肠。“病号室”里的病人，全都是饿得气息奄奄的人。他一眼瞅见原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陶杰也躺在铺上——说是铺，其实就是在靠墙的地上铺了厚厚的麦草，前面用一道不到一尺高的土坯墙围住麦草，不使麦草散落到外面地上的地铺。他们二人和我原来都同在四大队一中队劳动，那时，我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来四工农场后，由于不在一个站，农场对右派们的管制使大家失去了自由往来的权利，再加人人都在饥饿线上挣扎，彼此都很少见面。直到离开四工农场前，我一直没和他们遇过面。在“病号室”，方正儒见到陶杰形销骨立、面黄肌瘦的样子，不由心里也觉得凄惨，但自己也无法帮助他。他们彼此招呼了一声，便默默然什么话也不说了，能说什么呢？

整个“病号室”里，一片死寂。人人都有气无力，更没有了说话的心情。沉默，仿佛就是每个人的共同心声。很少有翻身的响动。偶尔，会有人挣扎着从地铺上翻身坐起，慢吞吞地穿上棉衣，再从铺底下找出鞋，抖抖索索地把脚伸进鞋里，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这是到门外去解手。尽管，病号们继续在挨饿，吃喝之后，必然还得拉撒。挨饿的人，在闭眼蹬腿之前，思维清楚，一般都是自己到厕所去解手。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自己不挣扎着去解手，会有谁来扶一把呢！

这天，方正儒因为肚子胀得厉害，倒是连续翻了几次身。一次，他刚翻了个身，就看到陶杰正坐起身穿棉衣，就知道陶杰要去上厕所。但看见他穿上鞋以后，往起来站很困难，摇晃着几次也没站起来。方正儒知道他已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厕所不上又不成，就急忙起来走过去将他扶了起来，陶杰还想自己走出去，不料身子又打了个趔趄。方正儒不由分说，干脆把陶杰背起来就向厕所走去，心里不胜感慨。陶杰原来劳动很泼，农场的各种活路都难不倒他，可叹如今竟被饥饿折磨得连自己上厕所解手都起不了身。陶杰趴在方正儒的背上，对自己不能上厕所惭愧不已，连声说：“老方哥，老方哥，真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方正儒听得心酸，也连声说：“我有力气背你是应该的，应该的！”像是个奇迹，陶杰竟然坚持到最后，活着回到了原单位，回到了家乡武威，直到打倒“四人帮”后，问题完全获得平反。

小徐再也没有想到，二站的队长王智礼竟来到场部找到她，要她帮二站造一份工资表。原来，二站的统计，那个陕南口音的刑满释放人员或正在服刑的犯人死了。我们在二站时，王智礼有时骂骂嗒嗒地说他是判了十年刑的犯人，所以我不知他究竟已被释放，还是正在服刑，反正已被释放或正在服刑，在这些管教干部的眼里没啥差别，对他本人也没啥差别，因为释放了也只能留在农场就业，而不准许回家。二站，原来没有农工，劳动的全都是我的难友。二站的管教干部执行政策同一站又大不一样，一站在我的难友们到来之后，伙食管理员、统计、财务等工作，陆续都让我的难

友担任。二站则相反，统计之类的工作，一律由就业人员担任，我的难友们被看得比前劳改犯又低了一等，以上那类工作，一律不得染指。那个陕南口音的统计，每天早出晚归，出外搞土地测量，这就不必和我的难友们一起出工参与重体力劳动，自由度相对就要大一些，工作量由他自己随意掌握。但他仍是专政对象，王智礼骂骂嗒嗒地在我们面前说他是判了十年徒刑的人，是显摆他作为管教干部的威风。在11月份全农场的粮食定量减为15斤后，这位统计肯定再无法出去测量土地了，一个判过十年徒刑的人大多已跟家里人没有多少联系了，在全民饥饿的日子里，家人也无法用粮食支援他。没有了外援，他只能活活饿死。

现在，他死了，每月由他造工资表的工作，王智礼仍认为在二站无相当的人继任，所以到场部找了小徐。我们在二站时，二站大约有百十名我的难友，这次，由于人员不断死亡，也有部分调走的，需要造表发工资的只有四十多人。小徐很快就把工资表造好，由王智礼取走。没有想到，没过多久，王智礼又将造好的工资表送来，要小徐重造一份。原来，上次造好的工资表上，又有许多人死去，活下来可以领工资的只有七八个人了，所以小徐又得重新造表。面对难友的遇难，小徐倒抽一口冷气，为自己活着而庆幸，为死难者迅速增加，心中无限惆怅，沉重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件事，对我们几个女伴，当时她一概都没有说，守口如瓶。

这里，我要对被甘肃团省委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定为坏分子的挚友王思曾，在大饥馑中的遭遇来追述一番。挚友王思曾被定为坏分子后，处分也是劳动教养。当时，酒泉夹边沟农场还没成为劳动教养的农场。团省委就把他送往银川附近的一个劳教农场进行改造。他的妻子许仲菊也随他到了银川，在商业部门当了一名营业员。在大饥馑的日子里，许仲菊设法搞到了六斤吃食，因当时交通不便，走了一二十里路，送到了王思曾劳动教养的农场。管教干部考虑到他们的夫妇关系，找出一间空屋让他们住了一夜。这一夜，他们几乎未曾闭眼，一直说着话。许仲菊带来的六斤吃食，被王思曾一边说话，一边吃，到天亮时吃了个光净。第二天一早，王思曾喝了一大碗稀糊糊，就和大伙儿上工去了。许仲菊经过一夜，看到自己的男人实在饿坏了，觉得带来的吃食太少，自己回去后，他吃什么呢？她快步找到场部的小卖部，此时中秋节即将到来，她看见小卖部有月饼出售，再一看，小卖部的营业员正好认识，就给营业员说了说，赶紧买了二斤月饼，追上上工去的队子，喊住男人，把二斤月饼递了过去。小卖部的月饼，原是给农场的干部家属准备的，许仲菊认识营业员，这才出于照顾卖给她二斤。这二斤月饼，王思曾在上工去的路上，又吃了个光净。不算早餐时的一大碗稀糊糊，从头天夜里到上工去的路上，他就吃了八斤吃食。如若不是多日来的饥饿已掏空了身体，八斤食品又如何在半日内吃得下？吃了，也全部消化吸收了，未出任何毛病。在全民饥饿的日子里，这似乎也是个奇迹。1979年后，挚友王思曾的问题也

彻底平反。当年整了他的团省委书记×××，在十年浩劫中作为走资派也被整得够呛。在王思曾来兰州时，×××特意在家中设宴热情接待，表示歉意。

在高台县明水河那边，死人的事在迁场不久就明显增多。管教干部无动于衷。因为早在1958年秋冬之际，夹边沟农场就出现过大量死人，场领导最初有些紧张，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劳改队死亡率突然增长也是不允许的。他们立即向张掖地委作了书面汇报，而地委书记安振的回答是："搞社会主义死几个人就尻子松了吗?"有此指示，场领导吃了定心丸，谁也不愿意为管辖之下劳教分子们的死活再说什么话了。到明水河后，生活条件显然比原来又差了许多，劳教分子死亡增加，是意料中事，有了地委书记安振两年前的指示，管教干部谁也不愿表现出自己"尻子松了"，死就由他们死去罢。到了11月，口粮一减再减，大部分人已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死亡，再向前踏一半步就是鬼门关，不管你自己愿意不愿意。

为了求生，人们按照各自的智慧及可能采取的方式，做着最后的努力。

罗舒群住的地窝子里，有个大个子四川人朱××，此人爱好文学，手边常有几本小说，颇有学者风度。有段日子罗舒群被派去拾粪，这算是美差了，而此时的他哪有心思拾粪，自个儿提了小粪筐慢慢转悠，目光四处搜寻，见到稀少的野菜、芦草根之类，便挖出拣来吃了；如果能抓到一两只蚂蚱，更是大喜过望，立即找些干草点着烧熟吃，觉得味美非常。在孤独愁闷中，也看从朱××那里借来的小说。朱××此时已骨瘦如柴，走路不稳，眼看有今日没明日的了。一天，朱××端着一盆像似心肝血淋淋的一堆肉走进地窝子。"同窝"的人都注意看，既不像羊的，也不像猪的，再说在这荒野里，又哪里来猪羊的心肝呢。问朱××，吞吞吐吐，似乎不敢说。队上领导得知后进行追问，朱××立即承认是从新近死了的劳教分子的胸腔里掏出的心肝，自己准备煮熟了吃，并带着队上领导去看了现场。已被草草掩埋了的新近饿死者的坟冢是被扒开了，胸腔被切得一塌糊涂，血肉模糊，没有了心肝。

于是，第二天在一处打麦场上全队开会批斗朱××。朱××站在中间，其他劳教分子围坐一圈，稀稀落落地坐在地上——大量死人已使队上的劳教分子减员不少。说是批斗，只有队上领导介绍了情况，把朱××数说一顿，口气倒是没有了往日的严厉，只是反复地说："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咱们这里再艰苦，每天还有饭吃嘛，还没有到没饭吃的地步，你怎么能这样!"管教干部的笨嘴笨舌，语言贫乏，但也足以说明他对大饥馑的真实看法：许多农村断炊已久，这里每天有两顿饭吃，比断炊了的农村要强，你怎么还干出这等事！围坐了一圈的劳教分子们经历了三年忍饥挨饿的痛苦，当然理解朱××为什么会去掏死人的心肝。大家都抱着头看地，不忍心抬头看一眼朱××，更无一人说话。他们一个个求生无望，离死亡都很近很近。面对为了求生鼓足勇气要吃死人心肝的人，他们能说什么呢。

〖二七八〗

一个极为沉闷的批斗会，在沉默中结束了。

散会，人们看见朱××站过的地方汪着一汪尿——为饥饿所逼要吃死人心肝的癫狂行为也吓坏了他自己。两天后，这个热爱文学，但在生命垂危的日子里，为严酷的饥饿所逼迫，企图吃死人心肝的人，最终还是撒手人寰，跟着许许多多在黄泉路上先行的幽灵们，匆匆赶路去了。

在此期间，还发生过当医生的邓××死后大腿被人煮食的事。

明水西站共有三个大队，三个大队先后都出现了企图吃人心肝及吃死人大腿的事件，也还发生过别的吃死人肉的事件。“士人”相食，就这样留在了历史中，留在了幸存者的记忆深处，永不泯灭。

王志在明水期间，认识了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来的画家毕可。此人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研究院，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胜过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在他们从夹边沟农场搬迁到明水河前，领导上布置，要大家精简行装，只许可带上铺盖及随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许带走。毕可违反规定，硬是把带到夹边沟农场的几大本世界名画册又带到明水河，硬是在狭窄的地窝子里为他心爱的画册找到了容身之地。尽管腹内空空，在有暇之时，毕可仍翻出大画册，神游在名画的艺术殿堂里，大享精神会餐，直至忘记了一切。毕可告诉王志，他当右派，是因为自己高傲，看不起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1957年以前已经入了党，毕可对×××常顶撞，出言不逊，说什么：“我参加革命时，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着呢！”到反右派斗争时，毕可反对党员领导×××，以反党反领导罗织罪名，早早地就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内心当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办公室里去，看见几个干部在火炉上搭锅煮着什么吃的，只见几个人从几本厚画册上不断撕下画页塞入炉膛充当燃料，王志一眼就认出撕扯的正是毕可心爱的画册，他立即断定毕可已不在人世。听见他们撕扯画页发出的清脆的“嘶嘶”声，王志的心被震颤了。他觉得那“嘶嘶”的声音是那样尖锐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几个干部冷漠无情地继续撕扯画页的手的动作，竟突然萌发了一种应把那几只手砍断的奇想。毕可是他内心非常敬重的难友。毕可在艰苦的劳教生涯中经历各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依然执著于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脱俗，可他的血肉之躯无法超越人类生命的极限，他依然只能饮恨离去。在他视为比自己生命更为珍贵的艺术瑰宝，在失去了他生命的卫护后，就成为了管教人员煮食羹汤时的燃料，灰飞烟灭，变作了灰烬。

二十多年后，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参观，见到了此时的所长段文杰。在此时期，全国经过拨乱反正，全国原划右派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记早已离世的难友毕可，便向段文杰问起他的情况，段文杰的回答使

他大为吃惊。段文杰沉重地说："毕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原来，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毕可定为右派分子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作为极右分子将他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也按规定将其材料报请省上有关领导部门批准。过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发还回来，批文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批文到达所里时，所里对毕可的处分决定早已宣布，毕可早已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多日了。为了维护所长×××的面子，所里将错就错，将批文压下，对毕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毕可历经磨难含冤离世，他自己并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给他平反昭雪。×××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创建者和缔造者，他早已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没。可当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后，就容不得一个对他出言不逊、态度不恭的后辈——论年龄、论艺术资历，毕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私欲膨胀的他有了充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作为所长，他又是党的领导的化身，按照当时的思维模式，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稍加引导，就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毕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资历比他更早的毕可成为阶级敌人，即使后来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将发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毕可钉死在那里，以至在三年后将其置之于死地。如果不是二十年后中国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对55万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甄别改正，省上未批准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沉睡在档案袋里，几经人事变动，一般人已不知有一纸对毕可的批文躺在档案袋里。此时的所长已更迭为段文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复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特别认真，所以才出现了毕可的沉冤大白。毕可，作为一个为敦煌献身的人，在段文杰所长的主持下，所里为他修建了坟墓，墓碑上写着："毕可墓"三个大字。下方写明："1920—1960"。

在死亡的阴影下，有个董坚毅的故事，惨绝人寰。董坚毅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硕士（或博士，因年代久远，介绍情况的人已记不清），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董坚毅毕业后在加州工作不到一年，在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归国的影响下，于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董坚毅为了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主动报名，只身来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此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小孩。鸣放中，董坚毅给领导提意见言辞激烈，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劳动教养。开始，董坚毅在农场还当他的医生，给难友们看病。到1960年9月底，他也坐着闷罐子车迁场到了高台明水，住在窑洞里。在他劳教的两三年里，妻子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迢迢数千公里，转车几次（当时兰新铁路尚未与上海接轨），到农场看望亲人。每次都带来很多吃的用的，对受难的亲人关怀体贴得无微不至。丈夫被冤屈的痛苦，令她心碎。到明水后，口粮一减再减，很快出现死亡。董坚毅的身体也垮了，11月上旬的一天，他对当组长的刘文汉安排了后事，说："按照

以往的经验，她每两三个月才能来一次。我是学医的，我知道我将不久于人世，这几天，我坐着就出现意识丧失、眩晕，这样结束生命，没有呻吟，没啥痛苦。我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再见到她。你为人忠诚，乐于助人，不同于别人，我信任你。”接着，又凄惨地说了说他死后，让刘文汉用衣被毛毯如何裹扎，使他的身体不要暴露在外。刘文汉听了，心里凄凉，对他说了些劝慰的话。三天后，董坚毅停止了呼吸，时年35岁。刘文汉按照他本人的吩咐，将他裹扎停当，由埋尸队的人将他抬埋到被雨水冲刷留下的一个地穴里。

刘文汉是原公安厅的干部。1948年11月在解放襄樊的战役中参军后，在抗美援朝前线英勇负伤，1951年回国后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主要从事改造罪犯的研究。1956年1月调甘肃省公安厅政治部工作。在鸣放中，他因发表了一篇讽刺领导道德败坏思想作风不正的小品文，他的顶头上司怀疑小品文所指是自己，就将他划成了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在反右派斗争中抄家时，还将他历年获得的七枚奖章和纪念章搜走没收。此时，他只有23岁。

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刘文汉和窑洞里的难友都已睡了，忽听得外面有人喊：“董坚毅，董坚毅!”原来是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赶来了，顾晓颖掀起窑洞的草帘子走进来，就着急地问：“老董在吗?”窝里的九个难友一阵慌乱，面面相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在黄昏的灯光下，她认出了刘文汉，说：“你是刘文汉吗？老董在信上说到你，老董他住在这里吗?”顾晓颖拉下头上围的绿丝巾，露出她秀美年轻的脸，完全是一派江南女性温柔贤淑的气质。刘文汉连忙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回答说：“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顾晓颖没听懂他的意思，别的难友也不敢说破。这样，大家都沉默无语，不知说什么才好，直直坐了一夜。

天亮后，刘文汉觉得一直瞒下去也不行，就告诉她：“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就是已经去世了。”一句话说出，只听得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一直号啕大哭不已，难友们见过的死亡太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后，她伏在带来的大格子提包上饮泣，眼泪不断地从手指缝中流出。后来，她终于镇定了下来，要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身。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老董的地穴，地穴里空空如也，尸身不知到哪里去了。经过查问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董坚毅的尸身被扔在荒野里。这真是惨不忍睹的一幕！原来，董坚毅身上裹扎的毛毯、鸭绒被已被难友们扒去，董坚毅尸身上的肉，已被饥饿的难友分几次切割吃完了，因为头上无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一眼认出心爱的丈夫死后成了这般模样，就扑到骷髅上，抱着丈夫的头颅又哭又亲，哭个没完，亲个没完……难友们一个个都难过地低下了头，连劝慰的话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就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后来，几人劝了又劝，硬是拉着扶着顾晓颖回到窑洞里，一起商量如何处理董坚毅的尸体。商量了半夜，提了几个方案，最后决定火化尸体，把骨灰由顾晓颖带走。在难友们的帮助下，从附近找了三个农民，顾晓颖付给每人一百元，外加一件毛衣（这原是带来给董坚毅的），由农民找来了些柴火、树枝，后来又买来一桶煤油，将尸体焚化。因燃料少，尸骨未能焚化成灰，头颅、骨头仍是原样。刘文汉拿出自己的一条在朝鲜前线带回的美军毛毯，把骨头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这则惨绝人寰的故事，就这样画了个句号。

有个13岁就参加了淮海战役，不到18岁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郜小五，在张掖水利局定为右派分子后，于1957年12月就来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最初在场部赶马车，身体尚好。农场迁移到高台明水后，很快出现大量死人。郜小五和其他九个难友被编在一个掩埋组，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挖墓坑掩埋饿死的难友。

郜小五当初被定为右派分子后，心里尽管万分委屈，但对于定为右派分子后会遇到的艰辛和苦难估计不足。他记得在部队时，有位团长因一次指挥战斗失误，被撤职，到炊事班当了炊事员，两个月后，又被调去指挥战斗，一炮打响，就又官复原职。他想自己的委屈不算什么，只要自己能经得住党的考验，过个一年半载，也许就能回到党的怀抱，重新进入人民的行列。到农场劳教后，赶马车有相当的自由度，他一心一意地赶好马车，规规矩矩，遵守农场的纪律，生活上一切的苦他都认了，总是以接受党的考验的心态平衡自己。

到高台明水后，每天大量死人，难友们挣扎在死亡线上，都干不了活，有力气走出地窝子或窑洞，能够在白天晒晒太阳就算好的了。掩埋组的活就很重很重，饿死的难友一个个码放在马车上，用马车拉去掩埋，到了掩埋的荒滩上，他们几个就分头挖墓坑，一般挖二三尺深，把尸体放进去后，填上土，用脚把土一层层踩实，以防狼发现后将尸体刨出吃掉，再堆个小坟堆，坟堆前插个写上死者姓名的窄窄的木头条子，就是"墓碑"了。做着这一切，他们内心很难过，很沉重，每次掩埋总要念叨着说上些话："你们的父兄妻子儿女都无法埋你们了，我们来埋你们，给你们当了孝子，你们就安心地走吧，一路走好！"说完这些话，大家跪在坟前磕个头，向难友作最后的告别。

当时，牲口缺料吃，也很乏，管教干部规定回去也不许坐马车，但掩埋组的人已出了大力，精疲力尽，一个个心都很乏，就不顾禁令，都坐在马车上回去。回到住地，每人可以领到一个菜团子，如果后半夜还去掩埋难友，就可以再领到一个菜团子。

死人与日俱增。掩埋组的十个人忧心忡忡。他们掩埋难友已觉得体力不支，内心

的恐慌也与日俱增。掩埋组有个大个子江浙人，爱哼哼越剧，也唱到《黛玉葬花》，《葬花词》中令黛玉断肠的一些词句，如："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被他唱得凄凄切切，令人心酸。到了面临大死亡，每人内心的恐慌与日俱增之时，掩埋组的人就由不得将这些词句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他们现在掩埋难友已体力不支，其实每个人都面临着死亡，一旦自己死去，又有谁来掩埋自己呢？难友中能有体力来掩埋死人的已经很少很少。他们自己对掩埋难友已尽了力，在当时可以说埋得很好。而当自己面临死亡之时，每个人不得不想到身后的事，他们不想暴尸荒野，不想死后让狼刨出去吃掉，都想死后能埋得深一点好一点，能够在坟头上有个标志，今后亲人一旦来到坟头前能找到自己。这一切的一切非常清晰地不断出现在每个人的心头，翻腾不已……

一天，掩埋组的十个人终于坐在了一起，议论起了大家思索的这些身后事。每个人都担心他们自己死后无人掩埋，掩埋不好，这是明摆着的事，怎么办？有人出了个点子："干脆，咱们自己动手先给自己挖好墓坑。现在就做好身后该做的一切，到闭眼蹬腿以后，光掩埋一下就省劲不费事了，就能把咱们埋好。咱们给难友挖了那么多的墓坑，给自己好好地挖个墓坑也是应该的，从今天起，咱们就抽空动手自己给自己先挖好墓坑，你们看行不行？"想出这个点子的人，说话一直沉重地喘着粗气，说出自己想出的这个点子，在他也很难很难。真的，有谁活得好好的会头脑清醒地想出自掘坟墓来掩埋自己呢？自古以来，谁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这些面临死亡的人，低头默默听完了他想出的点子，想了想，一致认为这是把自己的后事料理好的惟一途径，立即同意就照他说的去做。有个兰州人说："我会看风水，咱们这辈子受苦受难走到这一步，咱们的后代不能像咱们这样再受罪，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埋葬咱们，对家人和后代好。"其实十人中的郜小五还没结婚，有个康得生比他还小一两岁也是个单身小伙，还没有后代。挖墓坑埋葬自己是他们自己的事，找个风水好的墓地谁也没有理由反对，明水到处都是荒滩，最后由兰州人找了个地势较高的坡地，得到大家的认可作为十人的墓地。

十人又在一起，根据每人的身体状况，将谁先死谁后死大致排列了次序，一致认为郜小五多少有点外援，应排到最后。墓坑按此次序，将位置定好，每个人的墓坑都自己挖。挖好以后，互相都走过去看看，检查是否合格，虽是目测，大家一眼就看出唱越剧的大个子江浙人的墓坑挖得短了些，达不到身高，就让他自己又加长挖了一次。

坟头前插的木条，这是今后亲人来查找祭奠自己的重要标志，用队里原来准备的窄窄的木条写字少不结实，很容易丢失。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把沙枣树干锯下来，锯长一点，一劈两半，上面写上姓名、何方人氏及原工作单位等。沙枣树荒滩上到处都有，来源不缺，为了给自己准备后事，锯五段树干，劈成十个"墓碑"，虽然要费些力气，值。然后，

每个人将自己的姓名、何方人氏及原工作单位等，都写在“墓碑”上，按原先排好的次序，结结实实地插在各自的墓坑前。

这样，掩埋组十个人的后事就由各自准备完毕。

十人中年龄最小的是康得生，原来是喂牲口的，大家认为他身体状况尚好，将他排在第三个应死去的位置，但康得生此时只二十二三岁，见自己年纪轻轻，死期将临，而且自己已为自己挖好了墓坑，准备好了“墓碑”，心理负担特别重，竟第一个告别了人世。掩埋组的难友们含悲忍痛，将他埋葬在自己挖好的墓坑内、坟前插有他自己写好的沙枣木的“墓碑”。全组人自己挖就的墓坑按照预先设想的就这样派上了用场，他们在给小难友磕头作最后的告别时，心情很是沉重……有了第一个，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二个会是谁呢？

第二个就是会唱越剧的大个子江浙人，他们曾担心：“他年葬侬知是谁？”所以一起商量定为自己挖墓坑，对自己的后事做了一切准备，大个人江浙人的墓坑原来达不到身长，自己又挖了一次，现在，他终于被埋葬在他自己加长了的墓坑内安息了。

在连续埋葬了两位难友后，埋葬组的其余八人思想又起了变化，一致认为不能坐以待毙，自己身体状况尚可，为什么要在埋葬人的过程中，等待着有一天自己也死去，被埋葬在自己挖好的墓坑内？不！强烈的生命的意志力，对活下去的深深的眷恋，使他们又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后来，抗美援朝回来的张继明、柴星斗先后逃跑，孟招冬——原张掖粮食局干部及会看风水的兰州人也逃跑了，而且都获得成功。

郜小五原来对劳教的设想只是一个虚妄的梦，战场上团长因指挥失误被撤职后两月后可以官复原职，右派是阶级敌人，含冤受屈来劳教，是在生死线上挣扎，在炼狱里受磨难，每天面对大量死亡的难友，挖墓坑掩埋难友成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日程，有时还会被派去送死去难友的孤儿寡妇，一路哭哭啼啼去火车站回家，这样的生活算是怎样的生活？年纪轻轻的他每天就经历着这样的磨难，经受着这样严重的考验，这炼狱的磨难是他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但他经受了这一切。侥幸的是，后来各方面出现转机，他和掩埋组未逃跑的三位难友都活了下来。

有个姓宋的局长在明水饥饿难耐，他的一个部下也在劳教，部下的老婆来看男人，原局长向她要吃的，家属从包里拿出一个面包给他，他一把抢过来就狼吞虎咽，也不说个“谢谢”。后来，宋局长和他的部下作为幸存者都回到了武威。逢年过节，两家常走动，一起喝酒吃饭，无所不谈。宋局长对这位家属说：“当年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你给了我一个面包，我永生难忘。”这位家属笑着说：“当年我给你一个面包，你为啥一把就抢过去吃，连个谢字都不说？”宋局长说：“那时候只有人偷人、人抢人、人吃人，我就没见过把吃的给别人的，吃的那么金贵，你男人也在挨饿，我只害怕你说是要给个面包，念头一转又后悔不给了，所以我一把抢过来先吃进肚子再说。”这位家属说：“连个谢

字也不说?”宋局长说：“当时只顾狼吞虎咽，哪顾上说谢谢，我心里的感激就顾不上说嘛！我是永生不忘，永生不忘!”从明水的苦难中共同走过来的生死之交，真是到死也铭记着一个面包的故事，永志不忘。

有个县的正副县长都来劳教，正县长见了副县长就趴在地上磕头要吃的，副县长姓吴，当时有些吃的，看到当年威风凛凛原则性很强的县长为饥饿所逼跪伏在地还磕头，心里很不是滋味，就给了他一点吃的，这位县长立即狼吞虎咽吃完了吴副县长给的吃的，也是连个谢字都不说。很不幸，这位县长最终也未能逃脱死亡，葬身在戈壁荒滩，未能回还。吴副县长活得也很艰难，由于有妻子的全力支援，想方设法送吃的给他,全身心抢救丈夫,所以活了下来。还在夹边沟时,一次,妻子送来了几十斤油渍过的炒面,正好他要出外做工,就把这些炒面委托郜小五代为保管。后来,他们又先后到了高台明水。此时,口粮一减再减,生存维艰,但郜小五并未吃这些油渍过的炒面,将代为保管的炒面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吴副县长，吴副县长真是感激万分。后来妻子又带了吃的去明水看望他，抢救丈夫。吴副县长此时已衰弱不堪，气息奄奄。吴副县长去夹边沟劳教后，妻子在1959年生了个孩子，还有些奶水，为了救丈夫，她解开衣服让丈夫吮吸奶水，以增加营养，吴副县长感动地流泪说：“亲人就是救命恩人啊!”吴副县长经“抢救”回了原单位，两人恩恩爱爱过了一二十年。后来，妻子不幸病逝，吴副县长不胜悲痛，披麻戴孝厚葬了在危难时刻救了自己命的妻子。

为了解决吃菜难的问题，原长征干部官锦文到明水后，带了二百六七十人沿着三清渠以下义和、小海子等支渠沿渠岸挖野菜。这些地方是水浇地，土地湿润，野菜如苦苦菜之类长势很好。这些难友们乐于挖野菜，因为挖野菜除了完成规定的任务，每天还能自己留下一些野菜用搪瓷盆子煮了，填充饥饿的胃肠。大家挖的野菜集中在三个地方，由胶皮车拉走，每天能拉走两车野菜。到十月中旬以后，天寒地冻，无野菜可挖了。这些难友们不能挖野菜，自己也没有了可以填充胃肠的野菜，就进一步陷入困境。到“抢救人命”开始，制止死亡时，官锦文这个队幸存者只剩下了四五十人。官锦文手头有些钱，可以用高价买吃的，所以活着回到原部队，我回到兰州以后还见到他，他还帮助我取回了景超存留在夹边沟的箱子。

有位省粮食厅的刘均国于1961年被“抢救”回到原单位，在右派问题平反后，回忆当年劳教时的苦难和惨烈的种种情景，赋诗多首以抒胸怀，这里将其诗略作介绍：

一

夹边沟里聚阴魂，右派常囚噩梦跟。
一片丹心招惹罪，千言直谏变刑髡。
燃萁煮豆同戕戮，啮友诛朋互咬吞。

想起当年残酷事，心寒手抖眼眉昏。

二

人间地狱夹边沟，冻饿疲劳蹦藉蹂。
陷阱网罗情被揍，阴谋坑害意遭囚。
丹心一片戕横斫，白骨千堆乱野投。
右派当年捐命处，辛酸苦辣寄茨丘。

三

斫埋人性塑非人，诌白撒谎规口唇。
压抑真诚抟诡诈，张扬暴虐玩沉沦。
搓磨炼狱箍囚死，打骂驯奴捏伐频。
惨绝尘寰天地暗，青光乱绽滚浓磷。

四

一提往事血翻腾，心悸怦然怒塞膺。
举眼新天蓝莹莹，回眸旧地战兢兢。
不忘历史如扬楫，敲响警钟若亮灯。
民主论商掀美景，独裁自决遏鹞鹏。

刘均国是个才华横溢的夹边沟人，炼狱的苦难，众多的难友“冻饿疲劳蹦藉蹂”，“打骂驯奴捏伐频”，“惨绝尘寰天地暗”，以至造成“白骨千堆乱野投”。这是多么惨烈的景象啊！这一切就出现在他眼前，发生在他身边。所谓的劳动教养，只是“斫埋人性塑非人”。而这一切又都是由于“丹心一片招惹罪，千言直谏变刑髡”。以言定罪，使多少知识分子的精英含冤惨死，“惨绝尘寰天地暗，青光乱绽滚浓磷。”正是对当时天天死人、大量死人的真实写照。作为幸存者的刘均国，他“一提往事血翻腾，心悸怦然怒塞膺”。这是作为一个人必然的正常情感，他“举眼新天蓝莹莹，回眸旧地战兢兢。”他大声疾呼“不忘历史如扬楫，敲响警钟若亮灯。”这位夹边沟人的诗句，真是宝贵的警世之作啊！

也有极少数人在奋起抗争。有个目光犀利的小个子，由于曾是一名铁路员工——火车司炉，电影《铁道游击队》又刚看过不久，他迅即联想到要求生就应在擦身而过的铁路上想办法。日日夜夜疾驶而过的火车上运输着丰富的物资，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面粉也正是从这条生命线上运输着，东来西去。为了活下去，他认定应大胆地把着眼点放在火车上，从火车上取回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粮食。火车是一个源源不断的供应线，只要自己胆子大，信心足，这条供应线是会充分满足自己及伙伴们生存的需要的。他利用夜间及休息日沿着铁路线路仔细观察，不仅看到敞篷的货车上有时会整齐

地码着装满粮食的麻袋，也注意到离明水河车站不远处铁路拐弯，拐弯处车速减慢，如果此时从货车上将装了粮食的麻袋扔向路边的山坡，然后人再纵身跳下，一切都会很安全。此人是个思维严密，有多年铁路工作经验之人。他将这一思路反复考虑，认为万无一失之后，下一步再考虑应吸收三几个伙伴一起干。从火车上往下扔麻袋，起码得有两个人，麻袋扔到路边山坡上后，还得有接应的人立即将麻袋转移或放到隐蔽的地方。没有可靠的同伙，他一人将无能为力。可靠的同伙，首先要本人有胆有识，在这生命的危急关头，敢于挺身而出，为保卫自己及伙伴的生命，有《铁道游击队》里那些勇者的智慧和意志。其次，本人身体要健壮，有健康的体魄，麻利的手脚，才能完成此重任。经过三年饥饿的磨难，身体健壮的受难者已很有限了，而这有限的健壮者，或者原来一直有些外援，或者对劳动改造根本没看在眼里，他们一直把求生放在第一位，为生存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在明水河，劳教人员的生存条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路在何方？这有限的健壮的人，在愁绪百结之时，一旦被小个子铁路员工挑中，便很快结合成为一个小小的偷粮团伙，略作操练，便成为活跃在兰新线上高台县明水河路段的“铁道游击队”。这支小小的铁道游击队，原本也都是循规蹈矩的公民，有工作，有饭吃，是顺民。然而，反右派斗争硬是把他们扩大到阶级敌人的行列里，将他们发落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受苦受难，尔后又搬迁到更为艰苦难以生存的高台县明水河。但由于他们是属于觉悟最早的少数人，根本不相信所谓的劳动改造，而是非常正确地把自己的生存摆在了第一位，全力以赴地进行奋争。由他们三几个人组合而成的偷粮团伙，在一开始便以绝对的把握取得成功。

他们谨小慎微，每次行动，都以保证三几人的口粮来源为目的，绝不扩大队伍，对于身边那些濒临死亡的难友不动声色，不予任何救助，只是冷眼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继续走向死亡。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万无一失地把从火车上偷粮的活动继续下去，使有限的三几人的生命线不致被毁坏。在特定的艰难条件下，他们只能作出如此的抉择。在此团伙内，有一人名叫邹春生，他是河北人，“三八”式的原部队军官，我后来有幸与他结识，对他的情况在本书后面将作出介绍。

在明水河奋起抗争的劳教分子中，还有一名胜利的逃跑者。他的名字叫程时雨，来农场前是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教师，河南人。我与他相识在甘肃日报社，当时我们都是编辑，他同景超自然也是老相识了。1955年，他工作调离去了省委党校，我们之间就再没见过面。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到高台县明水河，虽然同在一个农场，他和景超一直未遇过面。三十年后，我和他再见面，才得知他也是从酒泉夹边沟农场搬迁到高台县明水河后，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逃亡活动，死里逃生，才成为幸存者而活了下来。

程时雨于1958年9月被省委党校发落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后，一开始就面临着生存维艰的局面。他已有五个儿女，被开除公职后，妻子一人担当起抚养五个儿女的重任，仅仅生活担子就够她受的。她怨尤非常，不考虑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认为是丈夫自找苦吃，罪有应得，才将全家人推入了困境。所以，在程时雨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后，她很少去信，对丈夫重创的心灵不去抚慰，更无经济和食物的接济。有时，程时雨在万般无奈中几次苦苦哀求，她才会寄去聊胜于无的三五元钱，以表示她这当妻子的存在。到了明水河后，死人大量增多。每天早晨，程时雨醒来一看，同一个地窝子里，总有难友已在夜里死去。到了12月下旬，他惊觉地想到，再不想办法，明天早晨，自己或许也只能含恨死去，不明不白地死去。对妻子不能有任何指望。他只能靠自己救自己，惟一的出路就是逃跑。每天下午六时左右，有一列自西向东的客运列车在明水站停车一分钟，他如能在这一分钟内挤上火车，便能直达兰州。无论如何，他的亲人都在兰州，在他已生活了几十年的省城。他相信那里的情况绝对同明水河大不相同，在那里绝不会像这里饿殍遍野而被视为正常，而无人过问。他要求得生路，只有直奔兰州而去，舍此，绝无他途。这天下午，喝完了杂粮做的稀糊糊，他便紧走慢赶地到了明水车站，看到由西奔驰而来的客车进了站，便立即在一个车门前抓住扶手登上了车，但脚只蹬上门前窄窄的一溜边，门就被列车员猛一下关闭了，车迅即开动。程时雨手抓车门旁的扶手，一只脚蹬在车门前窄窄的一溜边上，整个身子悬挂在车门外，在奔驰的火车上随车前进。求生的意志力，使他死死地紧抓扶手不放。在严冬夜风的呼啸声中，在火车轰隆隆的前进声中，他心中只有一个毫不动摇的信念："抓住，抓住，抓紧扶手！抓住就是胜利，前进就是胜利！"两三个小时后，火车到了临泽车站，行驶减速，一个铁路工人打着手电走了过来，看见悬挂在车门外的他，大声喝问："谁？谁？谁在车门外挂着呢，下来，快下来！"车一停稳，他松了一口气，立即下了车。铁路工人又骂骂咧咧地数说了几句，才转身走了。

这一下车，就再未能上车。当时的临泽车站连候车室都没有，只有一间出售车票的平房，他靠在屋外的墙角，在饥寒交迫中熬了一夜。第二天，从列车时刻表上看到上午八九点钟有一趟去兰州的车，他没钱买票，就混在别的旅客中又上了车。

火车开动后，他心中忐忑不安。昨晚挂在车门外，不存在查票的问题，现在挤在车厢里，一会儿查票怎么办？自己这辈子从未无票坐过火车，查票时该怎么说？后来，见戴着绿袖箍的列车长进了车厢，忽然灵机一动，主动向列车长说："刚才我上厕所没注意把车票丢了。"他这时忘了自己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不干不净的样子，根本就不是个能买起票的人，列车长自然不会相信他的谎话，回答说："没票下一站停车就下车。"后来，查票的来了，他没票，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谎话，人家的回答依然是："没票下一站就下车！"下一站是打柴沟，他被赶下了车。

打柴沟是大站，停车几分钟。这次，他变得聪明了，被赶下车后，就向车尾走去，在后面的车厢又上了车。车厢里人很多，过道里人挤人。他找了个地方，挤在人堆里蹲了下来。所幸列车员此后再未查票，他才未遭到再次被赶下车的厄运。

列车在寒风的呼啸声中前进。

蹲在人堆里，他觉得最难熬的时刻，是火车上叫喊卖饭的时刻。列车员一叫喊卖饭，所有的旅客，包括跟他挤在一堆或蹲或坐在地上的人，无一不掏出钱购买吃食，如面包，饼干，各取所需。这些吃食，他久违了已经两三年了，对他该有多大的诱惑力！而且，从前一天下午在站上喝了些杂粮稀糊糊，又经过一夜的奔波，他早已腹中空空，饥饿难耐，但他身无分文，无法买吃食。他只能吞咽着口水，体味着胃里因饥饿而翻腾的疼痛，竭力不向周围进餐的人们张望。就是闭眼不看，人们愉快地咬嚼吞咽饼干面包的声音，仍不断传进耳中……他已习惯于同饥饿的难友相处，当每个人都是腹中空空的时候，相互间有一种无言的理解和同情。在火车上，别人都在愉快和欢乐中进餐，有的人还剥几个熟鸡蛋大口大口地吃，有的人会拿出酒瓶，对着酒瓶抿几口。这一切，对他真是太刺激了，刺激得他脑门上隐隐作痛，只好把头埋在支起的膝盖上，什么也不看。但他毕竟因为心中升起的希望之光而欣慰，到底，他已逃离了明水河。

火车到达兰州地区的时候，他犯了个错误。他早在火车上就盘算好了，到兰州后先投奔西固区的一家亲戚。这家亲戚为人好，是农民，接纳他不成问题，他在这家亲戚家先歇口气，吃几顿饭，再进城。到达兰州河口区一个小站坡底下时，列车员在广播里喊道："下一站西固！"他误以为已经到了西固，就急忙下了车。下车后一看站名：坡底下！这才慌了神，因为是小站，停车仅一分钟，再要上车已不可能，到亲戚家这段路，只能徒步了。但他哪里还走得动？原来已羸弱不堪的身体经过两天的奔波，又一口饭也没吃，他已站立不稳了，抬起脚走上一两步，就摔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了，只得挣扎着爬行前进。好在这时已是夜里十点钟左右，冬天的夜里，路上已无行人，没有人会发现他。爬一阵，身上就冒出虚汗，冷得不行。他喘一会气，歇缓一会儿，挣扎着又站起来走，人毕竟不是爬行动物，爬行更吃力。可走上一两步，就又摔倒，站不起来，就又爬行。这样，走走爬爬，爬爬走走，浑身摔得生疼，虚汗把内衣都浸得湿透了。可他心中毕竟觉得活命有望，曙光在前，他得尽一切努力作最后的奋争！

平常人四五十分钟就能走到的路，他花费了三四个小时，才走到西固岸门村的亲戚家门口。此时，已是凌晨一两点了。一敲门，先听到门内的狗叫声。

亲戚家老两口听到"嘭嘭"的敲门声，起先很疑惑，谁会在半夜敲门？程时雨靠在大门上持续不断的敲门声，终于使老两口断定，是有人在敲自家的门，连忙穿衣开

门。但他们再也想不到，站在门外的会是衣裳破破烂烂，瘦骨嶙峋，同要饭的没啥两样的程时雨。程时雨事业有成的时候，曾在这家亲戚家走动过，几年不见，人就变成了这般模样，真使老两口吃惊不已。他们先把程时雨让上了热炕，问长问短。程时雨简单说及这次从明水河逃来兰州的经过，说自己已经一天多未进饮食，饿得前心贴住了后心。老两口以农民的善良和同情心，立即做饭给他吃，饭也很粗糙，是用包谷面做的像元宵似的圆团，煮熟后带汤盛在大碗里端来，让程时雨一人吃。饿极了的他，两三年也没吃过这么香的饭，狼吞虎咽，恨不得连碗也吞吃下去。老两口根据以往灾荒年的经验，知道饿极了的人不能一次吃得过饱，谆谆叮咛，并限制他进食。

这一夜，程时雨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他告诉亲戚决定先去找父亲。亲戚给了他进城坐公共汽车买票的钱，他便告别了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亲戚，坐车进了城，直奔父亲在华林山的家。

见到父亲时，两人悲喜交加。曾是原兰州造币厂职员的父亲，早已赋闲在家。程时雨生母早故，父亲同继母及后养的弟弟妹妹们住在一起，家境十分困难。父亲对共产党非常敬畏，认为共产党不会有错，错的只能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忧心忡忡，一再说："你不好好在那里守法，回来又咋办呢？回来又咋办呢？"当儿子向他介绍了明水河死人的情况，自己逃跑回来才拣了条命时，老人才默默地不言语了，并收留儿子住了下来。几个弟弟妹妹看见大哥像个要饭的，饿得皮包骨头，自然什么话也不说，都乖乖地听大人的话，从自己有限的口粮里匀出饭给大哥吃。

程时雨在父亲家安顿下来，第二天就直奔省委组织部，反映农场大批饿死人的事实。他心里牵挂着未能逃出的难友，知道能救他们性命的只有省委的领导，他确信农场执行的一套绝不能代表党的政策。接待他的组织部的干部耐心地听完了他的讲述，亲切地回答说："你们在农场受苦了，现在省委已经了解到下面死人的情况，西北局兰州会议已经开过了，会议决定对'抢救人命'采取重大措施。你来省委反映这些重要情况，我们很欢迎。"程时雨得到这样的回答，便满意放心地回了家。

再说四工农场搬迁到碱泉子劳改农场的我的数十位难友，在11月口粮减为15斤后，处境也极为悲惨。据关维智说，当时饿极了的几个难友也曾把死人的屁股割下来煮熟分食——在大饥荒的年代里，饿殍遍野，死人肉是最容易得到的。此外，凡是可以充饥的树皮、草根之类，早在地冻天寒之前就已被饥民们搜寻吃光了。虽然饥饿难耐，关维智坚决拒绝分食人肉。原省法院的难友李定国，感到活下来毫无希望，看到身边的人连死人肉都吃，在绝望之中，把被子撕破，把眼镜也砸碎，在砸碎手表之后的第二天，撒手人寰。关维智记得，他当时就埋葬过七八个难友。

21. 地狱之行

到12月下旬，形势略有松动，碱菜子不见了，粮食定量增加到24斤，饭菜里有了洋芋、胡萝卜，而且常有牛羊肉。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得知，四工农场领导早在10月就接到搬迁至新疆的通知决定，迁场的大前提已定，牛羊不能在迁场中赶往新疆，只能就地屠宰供全农场人员吃掉。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已下达。此时，场部的食堂同“职工”灶合并已久，我们便和场部的干部、工人吃上了同一个标准的伙食，而且价格也便宜。一月增加了九斤粮，副食大有提高，死亡在有些站立即停止。杜博智后来说：“定量一增加，灵得很，一站再没死人。”事实确实如此。

大约在12月20日后，甘肃日报社派来何玺、梁子润两同志，特意来看望报社送来的几个右派分子。他们先到场部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后，到一站和杜博智见了见面，得知赵秉仁已饿死，然后到场部找的我，说是从安西过去后，还要去看景超。和我谈话的是何玺，他显得有些神秘，以个别谈话的方式和我交谈，我记得是在办公室外一墩茏茏草的旁边，说是表示关心，其实完全是官样文章。我自知不能说四工农场的什么，说了也啥事不顶，他屁股一拍走了，我还得继续在这里受苦受难。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午饭时，他和我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就在打饭的食堂里吃的饭。这天的菜里有些羊杂碎，我吃得一干二净，他却说羊杂碎煮得不烂，他胃不好不敢吃，把有些羊杂碎剩在了碗底。他是外地来的客人，食具都是用食堂的，用完要归还食堂。我替他向打饭的窗口还碗时，看到他碗底里剩下的羊杂碎，真想放进自己的嘴里，碍于面子，终于没好意思。他虽从兰州来，可能还是没太饿着，所以才顾虑胃不消化。在那饥饿的年月，许多有胃病的人都不治而愈，他的胃病不知怎的却没有好。

他们走后没几天，我就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景超的处境很困难，很危险，兰州家中，老的老，小的小，都无法去高台看望，希望我向农场领导请假，就近去高

台看望，帮助他从困境中得到解救。

我一直没想过去高台看望景超，以我的处境，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农场领导不会准假让我去高台。在上个月，我自己也饿得几乎要倒下，我去看望他又能对他有什么帮助？现在，形势略有好转，报社还派专人来看望我们，尽管也是官样文章式地看了看我们，总算是看过了。父亲让我去高台看望景超，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兰州家中确实也无人能担当此重任。父亲有此要求，我当然更应该借此契机，先向农场领导请假。我拿着父亲的信，在当天下午就找到刘生贵书记，要求准假让我去高台看望我的亲人。父亲的这封信写得很详细，把家中无人可以去高台的情形都介绍得很具体，一目了然。他写这封信大概就考虑到了要拿去给农场领导看。刘生贵看了信，当即表示可以准假让我去高台。我激动不已，回到宿舍就把已获准假，准备去高台看望景超的家信写好，并在第二天寄走。

元旦前，场里又宣布：粮食定量提高到三十斤。从此，我们的伙食又有了大改善，差不多每天都能吃上牛羊肉。

此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于12月份已开过，此次会议主题是纠正这几年左倾蛮干的歪风，抢救人命。西北五省（区）饿死人的省份，以甘肃最为突出。三十七年后的1998年1月7日《甘肃经济日报》一版发表由副省长负小苏署名写的题为《正确认识甘肃粮食发展问题》的长篇文章，公开披露了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的事实，“时时警醒后人”。当时，甘肃全省总人口一千二三百万。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作出“抢救人命”的决策，因而甘肃日报社才派人来农场看望我们。农场的形势逐渐出现转机，刘生贵对我要求请假去看望景超立即批准，都是遵照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关于“抢救人命”的精神，才出现的新变化。

去看望景超，我得在经济上有所准备；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总得花钱。我每月的开销都是量入为出，没有节余。为了带上一笔钱，我想只能张口向杜博智借。他降级后的收入也是58.24元，但他是单身汉，开销少，当了炊事员后肚子吃饱了，更无其他花费。再加我们来农场后一贯友好，只要我张口，相信他一定会借的。这样，一天晚饭后，我就到一站去找杜博智借钱。我是在伙房找到杜博智的。他还正忙着呢，看见我到来，非常高兴，立即先招待我吃饭。此时，我的胃口像是个无底洞，虽刚刚吃过晚饭，吃的欲望仍然很强烈。他不断地劝我吃，我就不断地吃。吃饭中间，我说及准备去高台看望景超，想向他借一百元。他立即回宿舍拿来一百元，还送我五斤粮票。他说粮票是他家里寄来的，他当了炊事员已不需要，就送给我作为渡难关的补贴。当时粮票仍是紧缺之物，他一次送我五斤，我很感谢，说：“你真大方。”冬日天短，这时，天已黑尽。杜博智送我回场部。一路上，我们一直说着话。我忧心忡忡，深怕此次去凶多吉少。我们所在的四工农场死人不少，那边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这里差多

了，他能够等到我去吗？我絮絮地说着，心情仍十分沉重。杜博智说些宽慰我的话，敦促我快到景超那里去，尽到做妻子的责任。

去高台明水要坐火车，从四工农场去火车站，最方便的就是柳园车站，有四五十公里的路途，因汽车队的卡车常去柳园。

元旦过后，一连下了几天的大雪，到处一片白茫茫。

我焦灼万分地等待汽车队有车去红柳园，真是等得心都快从胸腔里跳出来了。早晨，起床时敲钢轨的“当当”声乍一响，我便会惊得吓一大跳，心狂跳不止，莫名地觉得新的一天不知又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或更大的不幸。悲伤，忧虑，焦急，迷惘。万般无奈中的等待，等待中的惊恐不安，使我几近麻木的心理平衡急剧倾斜，精神濒于崩溃……

我切望赶快成行，奔赴高台，去救助我可怜孤单的，也许已是奄奄一息的亲人。此时此刻，饥饿的他日思夜盼，惟一可指望来救他的，不就是做妻子的我吗？我已请准了假，我就要去了，就要去了！我无法想象如今的他因为饥饿已被折磨成了什么模样，我更不敢设想他会是“医院”里那些形销骨立、瘦骨嶙峋的病号的样儿。但我认定，我只要出现在他面前，哪怕他骨瘦如柴，昏厥在地，只要他一息尚存，还未跨出那最后的一步。我一定要把他救转过来，一定会把他救过来。他会躺在我的怀抱里微笑着睁开他无力睁开的眼睛，久久地望着我，望着曾让他撕心裂肺般地苦苦思念着的妻子，望着他以为已经再也见不到了的最亲爱的人……他会得救，我们都会得救。我们苦苦地等着这一天，已经直直等了三年，这一天眼看就要出现。可我，可我还在忧心如焚地继续等待……但是，身边众多的死难者傍着那黑暗的大门仿佛在低声告诉我：不容乐观，不容乐观，你亲人那儿是地狱！

我真不愿意他们絮叨。

准假以来，我每天都从打来的饭菜里挑出牛羊肉，放进一个装过奶粉的大玻璃瓶里，准备带到高台给我的亲人吃。我抵制了牛羊肉对我的诱惑，天天如此。只要饭菜中有肉，便顿顿如此。因为我知道，在如此严酷的大饥馑的日子里，外面一定很难买到肉，传说这里的一个难友用二十四块钱才设法买到一茶缸的羊肉，结果仍未能保住垂危的生命。我眼巴巴地吞咽着口水从自己的饭盆里省下肉要带给他，只是因为他比我更需要。况且，我只身去了高台，又哪有钱，哪有办法去为他弄到肉呢？玻璃瓶里的牛羊肉已攒了多半瓶，这很可观，是惟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我的一片心，为救助我的亲人正在奉献的心，远在高台的他会感知吗？会的，他一定会。亲人的感应，又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得住呢？

焦灼的等待，分分秒秒都难熬的等待！

1961年1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总算有了外出的汽车，通知我时已临近开车，三个

女伴匆匆忙忙地送我上车。我先爬上了车顶，她们把我随身带的衣物——里面裹着五六斤从食堂打来的饼子打成了小行李卷，给我递到了车顶上，我还提了个小帆布包，里面装了些洗漱用具，还有一两斤花卷。这些饼子、花卷，都是用当月发的粮票从食堂打来的，油嘴滑舌的“职工”炊事员再不给多打。石天爱在匆忙中说：“我应该偷些面粉给你爱人带上。”可惜早没想起，只成了遗憾。比起石天爱来，我参加工作早，当年曾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教导的一切奉若神明，在我们身陷绝境之后改变起来依然很难。从机磨坊设法搞点面粉去救自己的亲人，这也不是绝对办不到的啊，而我竟从未动过这样的念头！石天爱虽然想得迟了一点，她毕竟具有此种救助难友的英豪气概，她认定在这种特殊的时刻，救人比什么都要紧。小徐嘱咐我：“来信啊！”她内心里对我去高台是悲观的，只是没有说出来。王桂芳暗自为她远在新疆的丈夫祝祷，为我送别的不祥的阴影，骚扰着她原本已经宁静了的心。

农场离柳园车站四五十公里。我坐在车顶上，耳边一直响着呼啸而过的寒风，眼前闪过的是茫无尽头的雪原。起伏的荒野、蜿蜒的远山，为雪花作弄，变成了迎面奔涌而来的白色的汪洋波涛，又从汽车的两旁奔流而去。轰鸣前进的解放牌大卡车像是一叶颠簸着的小船。我为汽车队工作了近一年，受到的仍是贱民的对待，空落落的车顶上就坐着我一人，司机的驾驶室里坐着的是食堂炊事员年轻活泼的妻子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当然，在那个年代，司机也巴结炊事员。好在我有皮大衣包裹，围着厚厚的围巾，心事重重地想自己的事儿，心潮胜似眼前的白色浪涛，不知不觉间也就到了柳园车站，顺利地买到车票上了火车。

我的脸上没有刻“右派”二字——这要感谢我们这个年代毕竟没有把古时候在罪犯头脸上刻字作为标志的陋习保留下来。所以，尽管车厢里十分拥挤，旅客们仍用平等的态度接纳了我。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还帮助我把行李卷举起放到行李架上，我有了一个和别的旅客们同样的座位。四工农场的干部们从来没有人这样帮过我。我很感谢那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对全车厢的人突然感到都十分亲切，内心却又涌起无限的酸楚……我过去下乡采访时在旅途上十分熟悉的一切，此时却成为陌生的了。这列从乌鲁木齐开出的火车上，挤满了回老家过春节的内地人，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天津、上海等各种口音的人都有，他们热烈地谈论着同我丝毫无关只为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他们带的各种吃食似乎十分丰富，有些人随便地剥食着煮熟的鸡蛋，吃了一个又一个。安西三年，我们几乎没吃过鸡蛋，鸡蛋是什么味儿都要忘记了。唉，令人羡慕的吃饱肚子的新疆的来人啊！我呆呆地坐着，沉默无语，一直保持冷漠的态度，使别人无法和我搭话。我，一个为救援自己的亲人从农场请假外出的女右派，能和别人说什么呢？环境有了改变，我还得三缄其口，我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悲伤地不断想到，外面的世界和四工农场是多么不同，我们被人的世界所抛弃，是多么不

幸啊！回想三年前我们一行从兰州乘火车西去，在酒泉同景超分别后，杜博智还曾用他特具的陕西腔高声谈论，说三年后我们也许会乘同一趟车到兰州出席省上的劳动模范会议，兴高采烈。谁承想三年未到，我们在劳动上吃了大苦从未落后，却只落得像刑满释放人员一样的对待，甚至还不如，在严酷的大饥馑中庆幸自己总算死里逃生。和我们同一趟车到达农场的赵秉仁，上月已饿死在四工农场，匆匆告别了人世……现在我在茫茫雪原上匆匆赶路，也正是为了去救助我那生命危在旦夕的亲人。

明水到了，停车只一分钟。我匆忙背着行李卷从车上往下跳。这是个没有站台的小站，火车离地面的距离不是我轻易能跳下来的，我只怕摔倒在地，好在壮着胆子跳了下来竟也站住了。急忙走了几步，回头把前后左右都看了看，一片白茫茫中，下车的只有孤零零的我一人。火车长吼一声，在隆隆声中又前进了。道班工人也只一人，已转身走进铁道旁惟一的一间小屋里去了。

天已傍黑，寒风刺骨。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眼前只是望不到尽头的茫茫雪原，白茫茫的一片。我的亲人，你如今在哪里？我该怎样去找你啊？此刻，惟一可以询问的只有道班工人了。道班工人分明也看到了下车的我，当我探身进屋问路时，从我的衣着，背着行李卷的寒酸狼狈相，他至少也认为我是那些劳教的右派分子的家属。他走出小屋，很不情愿似的冷冷地用手指了指屋后，那是一条被许多脚印踩出的孤零零的向西北延伸出去的小路，说顺着那条小路一直向前走去，就到了景超所在的大队。我问："还有多远？"回答："八九里路。"我毫不犹豫，立即拔脚就走。

我踏着三四寸的厚雪奋力前行，除了脚下吱吱作响的声音伴我前进，茫茫雪原，万籁俱寂。天幕低垂，很快由灰变黑，天上连星星也没有。苍茫无际的雪原上，只有我孤独的黑影在孤零零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踽踽而行，不断向前移动。像那茫茫雪原，思维几乎也成为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坚定的声音反复出现在耳边："快走，快走，一定要赶到那儿，一定要见到我的亲人！"雪原模糊不清了，横亘在眼前的是黑黢黢的一片，只有踩在脚下的小路依然清晰可辨，间或发出白色的闪光。孤零零的小路引导着孤零零的我不断前行，走了一程又一程。

我不觉得背着的行李的沉重，手里提着的帆布包也觉不出它的分量。心里万分焦灼，只嫌脚步从积雪里拔起来不够轻快，走得太慢太慢。才到十工农场时，我就听冯士伟说过狼群在戈壁滩上追赶他和牛车的事，此时我也顾不得想及这些，不知道什么叫恐惧。我只求上苍保佑，让我快快赶到景超那里，他苦苦地等我，那痛苦难以为我所想象，他已难以承受，也许他已等不及了呢……

走了许久许久，按照常情会慢下来的脚步，却一阵紧似一阵。

走着走着，路上出现了几棵大树，树下脚印零乱，原来黑暗中清晰可辨的小路一下子看不清了，仿佛还有别的岔道，通往队上的小路究竟是哪一条？我急出了一身冷

汗。在这黑夜的茫茫雪原上，去问谁呢？踯躅良久，我只得弯下腰来，放下行李卷和手中的提包，焦灼地对杂乱的脚印仔细地反复辨认，看了好一阵才总算看清，然后又毅然前行。

走啊，走啊，忽然，前方传来了脚步声，迎面出现了一个黑影。我毫不惧怕，惊喜地迎上前去，向他打听。他吃惊在黑夜雪原的小路上竟会遇见一个女人，一个远道而来的女人，但也不多话，只是指给我看，前面闪着昏黄的灯光的所在便是，说完转身就匆匆走了。他行色匆忙，也是来看望亲人的吗？已经看望过亲人，见到亲人了吗？队上的干部没必要这么着忙地赶黑路……我一下子就想到这许多，由不得地由己及彼地推测来人的行踪目的。不过，还真得感谢他。如果不是他的指点，我只顾低头匆匆赶路竟没注意看到那昏黄幽微的灯光。到了，到了，灯光就在前面不远处。

我一脚踏进有灯光的队上时，煤油灯亮处，两三个干部模样的人都吃惊了。他们没有料到一个单身女人冬夜会在这个时刻从车站走八九里路闯进队上。当然，他们不用问也就知道了我的来意。这些天来，跌跌撞撞地闯进队上来看亲人的一定不少，他们已应付自如。其中的一人听我说了景超的名字略有表示，另一人就拿起一个像是名册样的本子一页页地翻看，也并不说话。我心中一喜，他们大概不清楚景超在哪个分队，住哪儿，想从花名册上查出来。我坐在长凳上正想知道个究竟，听到的竟是晴空里的一声霹雳：

“王景超死了，12月13日死的。”

“死了！”这猛烈地轰击在心头的重击，立时使我觉得天昏地转。我嘴里喃喃着：“他死了，他死了！”半天竟哭不出来。

啊，我的亲人，你到底也没能等住，没能等住我们见面的这一天！你不是没有等，你能支撑到那一天，等得不容易，等得苦。你苦苦支撑，苦苦等待，以全部的生命力等着我，用最后微弱的一息等着我，可我没能及早赶到你身旁，你终于没有看到我，你等得好苦啊！这个可恨的世界可以失去你，我不能没有你，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你。你撒手而去，把没有涯际的苦难留给了我，留给了你的“小娇娇”。你竟忍心离去……你就这样不管不顾地走了吗？三年前我们临离开兰州前，你曾用《战争与和平》中彼埃尔的话激励自己：“活着就是幸福。”你万分眷恋曾给了我们无边磨难、太多痛苦的世界，是因为你对未来仍有着憧憬。可是，严酷的饥饿不许你活，这个世界未能留住你，未能留住对你、对我们来说惟一可称之为幸福的是你活着的生命。

啊，我来了。我从茫茫雪原中走来，从漆黑的夜幕下走来，从漫长死寂孤零零的小路上走来，从苦难重重的另一处走来。我疾步如飞地走向你。我的亲人，你如今在哪里？啊，亲人，我哭你喊你寻觅你，你可听到我肝肠寸断的呼唤？你究竟在哪里？你失去的，我尚拥有，可它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你还在等我吗？我的亲人！

啊，我的亲人，可怜的冤魂！你一腔热血透彻揭露的弊端，你痛心疾首不能释然的忧患，在你受难时迅速扩展，无遮拦地汹涌起巨涛狂澜。不然，大饥馑何以能在全国蔓延扩展！我的亲人，你又怎会遽尔离去，被逼进另一个世界？啊，不屈的英灵！你已默默离去，但是，我知道，炼狱里的烈火喷发翻滚，也烧不尽你的冤屈和愤恨，烧不干你痛彻肝肠的血和泪！你不会安息，你永难瞑目！

孤儿寡妇们的悲哭声，在队上一定响起过多次，干部们听得多了，也听烦了。他们无动于衷，一声不吭。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一句劝慰的话，也没有一个人对我的亲人的故世做任何说明性的介绍。我的亲人只不过是死了，饿死了，仅此而已。我坐在一个条凳上哭。他们沉默了一阵之后，继续做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也听我哭。痛哭的我仿佛同他们毫无干系。我也未向他们做任何发问，我敢向他们问明一切，让他们说个清楚吗？我不敢。此时，队上干部同我这个右派分子之间，只有在景超及众多难友们的死因问题上的心照不宣而又讳莫如深，才是一致的。当然，他们的讳莫如深，还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一个个活泼年轻的生命被逼死的全过程，他们全部清清楚楚，他们是参与者。良知，负罪感，不能说在他们所有人的心灵深处就没有出现过。而残暴成性，作恶多端的人心底正涌出阵阵恐惧，毕竟，人命关天。他们害怕遭到惩处。

队上不是我可以待下去，一直哭下去的地方。不知过了多久，他们找来了人，说了些什么，让来人带我去睡觉。我走出有灯光的办公室，在黑暗中走了一阵，被带进了一个挂着草帘的所在，确切地说，这是一个长形的地窝子。在昏暗的墨水瓶制作的小煤油灯灯光的摇曳下，我看到睡觉的长长的土台子上——不是炕，更不是床，应该说是略高于地面，用铁锹挖就，只能叫做土台子的所在，堆放着许多被窝。领我进来的人是个年轻小伙子，他抱过两床被子放在土台的尽里头，用普通话客客气气地说："你就随便铺随便盖吧，如果不够就再拿一床。"我立即就明白了。这些被窝已没有了主人，它们的主人已悲惨地死去。在四工农场，我的难友们睡的地铺上都铺着厚厚的麦草。这里的土台子上没有一根麦草，说明他们连农场自产的麦草也没有带来，未能铺上。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里，他们肚中饥饿，又是在经受着怎样的酷寒啊！一个多月前，我在四工农场场部看见过一柄失落在路上尘埃里的塑料牙刷，当时判断一定是哪位难友的遗物，痛苦地想到我给景超也买过一柄同样的牙刷，不由得去推测我的亲人是否仍在用它刷牙，还是……路上尘埃里的一柄塑料牙刷，曾撕扯着我滴血的心，令我痛煞。如今，景超的塑料牙刷已不知失落在哪里，他生命的失落，也只是在我找上门来，才在花名册上翻来寻去……这里堆放着的一堆堆被窝，都各自有着多少生离死别、惨绝人寰的故事啊！在这凄苦漫长的冬夜里，死难者们会向我尽情倾诉，诉说他们已无法沉默地咽下的深深的怨恨，诉说那无情地吞噬了他们活泼泼的生命的

残忍罪愆……

地窝子里又进来了个小伙子。他俩用拣来的几根木柴，在土台中段几块土坯支起的炉灶上生了个小火，显然是准备做些吃食。他们神情自若，并没有因为我这个新寡的女人的出现而有所表示，没有人说一个字的宽心或安慰的话。我就是我，他俩是他俩，同在一个地窝子里，竟像路人似的，才刚进来的小伙子也不和我打招呼。那些成堆的死难者的被窝，以及与之相关的死难者们的事，在他们仿佛都无所谓，好像这一切与他们也都毫无关系，或干脆未曾发生似的。我呆呆地坐在长土台的另一头，愣愣怔怔的，陷入了一种新的麻木和迷惘。我在四工农场的“医院”曾目睹了死亡，听到过不少难友的死讯，从心灵到感情受到的巨大冲击，曾极大地改变了我自己。眼前，我是在这死人更多的地方，在堆放着许多死难者被窝的地窝子里——在四工农场我还未曾见到过如此的景象。俩小伙子——显然，他俩都是劳教的小右派，仍然很正常地做吃的，正常地安顿我睡觉，正常地说着他们自己的话，他俩同办公室那几个干部也没啥不同，这里的情景同那里何其相似乃尔，一切似乎都十分正常，这使我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原来，这个世道就是叫人们去饿死的，我的亲人死了，许许多多的人都已饿死了，一切的一切，依然还都在原来的轨道上继续运行。俩小右派的冷漠不在乎，更冰冷了我悲伤的心。四工农场的囚犯待遇，精神磨难，潜意识里已凝固了的比别人低一等的贱民意识，使我对失去亲人的悲苦也觉得只能在心底悄悄消融……

我愣愣怔怔地呆坐着，一路上茫茫无际的雪原又不断浮现在眼前，心头飘起了一支熟悉的歌：

草原大无边，
路途遥又远，
有个马车夫，
将死在路边。

车夫挣扎起，
转告同路人，
请你埋葬我，
不必记仇恨。

请把我的马，
交给我爸爸，
再向我妈妈，

安慰几句话。

转告我爱人，
不能再相见，
……

爱情我带走，
请她莫伤怀，
找个知心人，
结婚永相爱。

我在农场几十次、上百次唱过的歌，谁料想述说的竟是我自己的故事。是的，他带走了一切，带走了我俩的一切……

“来吃点吧，你大概没吃晚饭。”俩小伙子用搪瓷饭盆做好了饭，竟邀我一起吃。我已大半天没吃一点东西了。办公室的干部根本没问及我是否吃过晚饭，他们没有能力，也不屑于为我准备一顿晚饭。饭盆里冒着热气的是用米粉熬就的糊糊，一个小伙子的姑母从武汉寄来的米粉。在这种时刻尚能从外地寄来米粉，这宝贵的外援看来几年不曾间断，他们年轻可爱的生命因而才得以保住。在四工农场形成的吃饭已成为生命活动之第一需要的习惯性本能，使我稍作犹豫，便从帆布提包里拿出一个粗劣的搪瓷短把调匙，同他们一起从饭盆里舀米粉糊糊吃。当然，我吃得很有节制，并送给他们每人一个花卷，花卷是我用饭票打来装在帆布提包里的。看样子他们已许久没吃过白面花卷了——低劣的劳教待遇。整个河西走廊当时小麦是高产作物，我们在最饥饿的时候也只吃小麦，他们这里名为农场，特别是搬迁到高台以后，还没有过收获。天哪，这儿不死人才不正常。他们连连说：“花卷真好吃，好吃！”年轻的脸上透出吃了美食佳肴才会有的喜悦。这俩人长得都挺帅。交谈了几句，才知道他俩都是兰州大学的学生，他们都说不认识景超。领我来地窝子的小伙子定右派时才17岁，又一个王桂芳！他俩的父母各在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任教，应该说，他俩都是教养好，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他俩远在兰州的父母如果对这儿的情况有所知，一定都在感谢上苍，因为他们是这儿的幸存者而感谢上苍。我忽然一下子明白了，他俩艰难地活了下来，对这里的什么也不说，显得毫不在乎，习以为常。只是由于这里天天死人，死人属正常现象，说出死人的事实反倒不正常。他们总归是右派中的极右分子才被送到这里改造，他们一来到这里，一定和我的亲人一样，立即就尝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知道了接纳他们的所在是人间地狱。但是，此时，他们对于地狱里为他们安排的

一切只有承受了，说真话不是他们的事。这就是三年的劳动教养要求于他们的。除了在饭食上有外援外，他们规规矩矩，抑制了人性中所有宝贵的和应予发扬的东西，所以才有了如今的自己。为了生存，他们三年来怎样扭曲了自己，怎样紧张地绞尽脑汁应付一切，今天的我已无法用丰富的想象去加以描述，但肯定地说，那是男子汉们要以撕心裂肺般的痛楚才能说出来的复杂内容。我还想到，他们说不认识景超是向我撒了谎。因为他们如若说认识景超，我一定要问及景超的种种情况，而那是不允许说出的。他们无权说出，所以他们只能撒谎了。这里的干部一定早就向他们做过交代，不然，同在一个队上怎么会不认识呢？可叹俩小伙子虽活了下来，失落了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地狱就是只能把人变成非人，把活人变成鬼，而我们原先竟一点也没想到，一点也不知晓。我的亲人的悲剧正是如此造成，许许多多的难友正是因此而离开了人世……我们当时竟还那么执迷，错把地狱当成了通向人间正道的必经之途。我们的忠诚被无情地戏弄。我们作为阶级敌人被残暴地打倒在地之后，自己竟还那么执迷，真是可悲之至！

吃完了饭，我坐在小伙子抱过来的被窝旁又发愣。那俩小伙子在地窝子的另一头收拾被窝准备睡觉，已经和衣而卧了。可我怎么能和俩小伙子在同一个地窝子里过夜呢？尽管他们都很年轻。我愣怔着，不知该如何是好。那个领我进地窝子的小伙子看出了我的心事，他把脸转向我，亲切地说："大嫂，你也累了，只管睡吧，我们不会碰你的。"这一夜只能和俩小伙子一起睡地窝子了。人死多了，真正的"男女混杂"，那些管教干部倒很同意。

我只好脱去大衣，和衣而卧，下面铺一床死难者的被窝，上面盖一床死难者的被窝，再搭上我的皮大衣。假如死难者还会说话，他们一定会强烈抗议，抗议对他们的遗物如此处置。不，不，他们不会说话了，生前他们被封住了嘴已有几年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他们扭曲了自己，他们一个个被迫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从此说真话便有罪了。劳动教养后，更是动辄批判斗争，捆绑吊打，进严管班折磨，说肚子饿会成为新的罪行，还无任何行动的自由。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们便只能无言地活活饿死在这里了。

旅途的劳顿，雪原上的急急赶路，亲人的永别，地窝子里的情景——一天之内发生的这一切，足以摧毁一个人健全的神经和强壮的身体。我包裹着死难者的被窝躺在土台上，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在昏沉中睡了一阵。说不上是梦魇，是无可名状的惊恐，还是一种要压死人的沉重，又使我睁开了双眼。黑漆漆的地窝子里除了我粗重的喘气声，一片死寂，头顶上刮进阵阵阴风，还透进斑斑点点的亮光，难道是冤魂们还盘桓在此不愿离去，从地窝子顶上的缝隙里向下张望窥探，想说点什么？和人世间再沟通点什么？深沉巨大的痛苦使我在辗转反侧中战栗不已，悲泣不已……

一幕幕往事在眼前反复出现……

那已是遥远遥远的过去了，坚贞甜蜜的爱情将我们结合在一起……曾几何时，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双双被打倒在地，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我们在大难之中相依为命，又感受到一种未尝经验过的甜蜜，我们的情更深、爱更坚。我们勇敢地共同肩起了苦难，并坚信，用血和泪浇灌的爱情之花芳香美丽，它将把两个受难的灵魂永远联结在一起，引导我们在苦难中结伴而行。不管前面有着怎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会踏着苦难，相扶相携，走出苦难，奔向另一个新的人生起点。可如今，相扶相携的亲人已永远离去。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曾因害怕失去他伏在他的胸前哽咽不已。现在，他冰冷的躯体已不知埋葬在哪里，我想要抚摸他冰冷的躯体已不可能……在那不可抗拒的政治风暴中，他曾将我拥在怀里，我伏在他胸前清晰地听到他那有节奏的心跳声。现在，他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我永远也听不到他心跳的声音了。

啊，我的亲人，你的人生旅程已经终止，我新的人生起点又在何处？我还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新起点？我瘦弱的双肩还将怎样肩起你走后留下的巨大苦难？我流血流泪的心又如何承载你离去留下的无涯际的痛苦？我们的孩子已是孤儿，我将怎样向俩孩子说你的离去？

我的路在哪里？我的路将怎样走下去？前程茫茫，孤零零的我，右派分子的我，一夜之间，突然变得那样软弱，那样无奈，身单力薄，迷惘不已。心，沉重得要压死人。

有谁知道，我是怎样度过了这难熬的一夜。第二天一早，俩小伙子起来后，我立即翻身坐起下了土台，让他们告诉队上的干部，我要到景超的坟上去，带我来地窝子的小伙子一会儿就回来告诉我："你爱人埋的地方离这儿很远，埋得很好，你就放心吧！"我说："埋得再远我也要去。"小伙子说："埋得很好，你何必去呢？"小伙子当然是转达队上干部的意见，他阻拦我去，语言闪烁——埋得很好，我为什么就不必去呢？但他的回答又使我改变了主意。我的亲人长眠的地方一定是已经没有了标志，已经无法找到他的坟墓了，我流血破碎的心又被揉搓得痛楚不已。四工农场掩埋死人的混乱状况我早已听说，这里肯定更混乱，我不能爬在一个陌生者的坟冢前痛悼我的亲人，面对一片无名者的荒冢，我又将怎样？此刻，我该做的，也许只能是尽快离开这个地狱，我应该快快回到已经阔别了三年的兰州。我那已失去了爸爸的俩孩子还在等着我，我将怎样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没有了爸爸……还有我的父母、妹妹们，我将怎样向他们告知这一切啊！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一转念，竟成为终生的遗恨。我认为亲人的坟冢已难以找到，当时的我也太年轻，没有想得更多。谁又能知道，从此，我的亲人和别的死难者们一起陈尸荒野达数十年之久。1989年6月8日，《甘肃工人报》一位年轻记者告诉

我，夹边沟的死难者因为掩埋十分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当地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啊，我的亲人，你在明水的遗骨是不是就“埋得很好”？我怎么也难以设想，你的铮铮铁骨会落得如此下场！那绵延两里多路闪着寒光的累累白骨，哪个又不是忠魂铸就？数十年来，深沉的地火亲近着他们，祁连山的暴风雪追随着他们，轻柔的小草陪伴着他们，他们惟独得不到亲人的关怀和照拂，他们的亲人一个个远去了，远去了……不是他们的亲人无情又无义，历史在诉说，人民在诉说。逝去的岁月是几经劫难的岁月，浸透了血和泪，愁与苦，无奈又痛楚。他们的亲人又有哪个不是在大灾大难中挣扎浮沉，又有哪个活得像个人模人样，谁叫他们是你们的亲人呢？他们只能远远地去了，去了，远远地离开了数十年来魂牵梦绕，萦系心怀的你们，一个个又挣扎于各自的生存，奔忙于各自的寻觅、求索与选择。生活如此严酷，生存如此艰难，人生的寻觅、求索与选择，又岂能停顿？从这里走出去的求索者们——包括九死一生的受难者们，向历史发出种种诘问。当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制定之后，你们在这里经受了惨烈的饥饿和种种非人的磨难，直至死亡。宪法要保障的公民权，作为一个人应享有的一切权利，正是在这执法的所在受到了无情的践踏与嘲弄，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有多少人被无情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一腔悲愤，满怀冤屈，把遗恨留在人间，一无所有地走了，走了。

我在队上吃的午饭。用洋芋、胡萝卜之类和大米熬就的稠粥，由一个干部用饭勺舀起平均分给每个人吃，每人只分到三碗。大米显然是供应物资，饿久了的我吃这样的饭自然吃不饱。

饭后，我被领到分队，分队长拿出景超的手表和没用完的一元多钱，作为遗物交给了我。睹物思人，“物是人非事事休”，思悠悠，恨悠悠。我的亲人，你为什么要留下手表，你原该拿它换吃的，兴许它会留住你微弱的一息！对了，你连这样做的自由也是没有的啊！你宁死不屈，他们“改造”你，要你遵守的纪律，听从的训话，是置你于死命的屠刀啊！

你十三岁时在伤兵医院的饭篓子旁为抢口饭吃和小伙伴们打架的事，我记忆犹新；你上国立六中因饥饿难耐在学校附近的农田里偷挖地瓜吃的顽皮模样，历历如在我眼前。你从伤兵医院几次外逃，终于过上了“快乐的学生生活”；你上了中学以后不断跳级，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学习，终于又迈进了西北大学的大门，成了全家惟一的大学生。为什么，为什么“改造”你却要终止你的人生旅程？你原该有一个光明灿烂的前程，你为之奋力工作积极创造的前程。你已有了一个温馨幸福的家，为别人所艳羡所企盼的家。如今，你的逝去，粉碎了这一切，连遭难后我们相互间仅存的心灵上有限的交流和抚慰，从今往后都变成了空白。没有谁会再来抚慰我破碎了的心，没有谁能够缝合我血泪交织的心头巨创。风华正茂的你选择了去夹边沟改造，却被改造活

活虐杀；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你，又被更大的苦难所埋葬。孤独寂寞的你默默地走在黄泉路上，你未能带走你生命历程中的全部痛楚、全部磨难，而将一切一切的苦难又加倍地留给了我——留给了你可怜的妻子，命苦的“小娇娇”。

我决定回兰州去。我要求队上派人送我到车站，帮我买张火车票。当时听说火车票很紧张，已难以买到。他们答应了。几小时后，又通知，接到省上的指示，农场的劳教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各农场的下放人员不论情况如何全部回原单位，他们正在联系火车送他们农场的人回原单位，我也可以和他们一起乘火车回兰州，不必再买火车票了。

这太出人意料了。

三年来，我们每个人不都在盼着这一天吗？如今，这一天于不意间突然来临，却又是在如此凄苦，如此悲惨的时刻来临，是在付出了许多生命的巨大代价以后才来临。如果景超还在人世，这个消息会使我们欣喜若狂，感谢上苍。三年的劳苦，三年的精神重负，三年积累的苦苦思念，还有饥饿的磨难……这一切的一切，只要他人还在，都会变作相见时的欢情，倾诉不已的绵绵话语，在我们之间絮絮而出，滔滔不绝……可如今，我在悲愤中只有深深的怨恨！

昨晚地窝子土台上堆积的死难者的被窝，说明这个地窝子里的人已死光，两个小右派只不过是临时结伴在这儿住住而已。为什么，为什么在这儿的难友差不多快要死完的时候，省上才作出决定，让幸存者全部回原单位，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些因饥饿而被逼进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正当盛年，学有专长，是国家的有用之才，正如周总理所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同志五七年出了点事，是所谓‘右派’，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国家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正需要他们作出贡献，献出他们的光和热。再说，他们谁无妻子儿女，谁无高堂老母。他们一个个被活活饿死，造成多少个家庭残破不全，哭声连天。这究竟是谁之罪，谁之罪？在和平年代，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大悲剧？我作为死难者的妻子、年轻的母亲，又怎样向俩孩子说明我们的亲人的离去？右派分子的我，还怎样活人？亲人饿死的事实，无疑又在全家人的头上投下了浓重的政治阴影。

下午，在队上吃过饭出来，有两三个年轻人拿着粮票要我替他们到伙房代买馍，显然他们都是劳教人员，在四工农场我们有了粮票也不能从食堂买吃的，他们受到的一定也是这种对待。然而，此刻的我，竟冷酷地对他们不理不睬，竟扬长而去，对他们的苦苦要求不管不顾。后来回到兰州后，我还见到其中的一人，他是部队文工团的，在向我作自我介绍时，尖刻地说：“我就是在高台明水要你代买馍，你没给买的那个人。”我无言回答。但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我吃惊当时的我竟会那样

①引自《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第267页。

对待饥饿的难友，我一贯的为人行事也不是这样。它虽是小事一件，我的自私与冷酷确也达到了一生里的极点。在那个瞬间，旧日里的我又在进一步地失落，地狱里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对自己同类大批死亡的无动于衷，竟于不知不觉间也影响了我，改变了我。其实，这种改变在四工农场时就已出现，四工农场对我们的“管教”——农场设有教育科，要求被改造的人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与“我”无关的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才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我在“医院”为那些奄奄一息的病号们烧炕时，油光满面的“职工”炊事员阻拦我为病号们代发信件，我不是就顺从地拒绝了为他们发信吗，现在让我感到羞愧万分内疚不已的事，在当时竟认为理所当然。当时称之为“改造”的东西，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性的异化，人的精神的可耻堕落。改造愈甚，要求愈严——如四工、夹边沟农场所做的那样，异化愈甚，堕落愈甚。旧日的我的失落，对于我是另一种更为深沉的悲哀。

这天晚上，我住宿在另一处地窝子里。同住的有从天水远途来看望父亲的姐弟俩，姐姐大约十五六岁，弟弟十三四岁。他们的父亲是个教员，已悲惨地死去。还有一位省邮电局的年轻女职工，她是来看望丈夫的，丈夫也已死去。我们这些孤儿寡妇们相互简单地询问了各自的情况，都悲哭不已，谁也不劝谁。各自的悲苦都倾泻不尽，谁又能劝得了谁呢？地窝子里一片哭声。

姐弟俩抱头痛哭，更撕扯着我的心。我们的俩孩子如今也成了孤儿，失去了爸爸，他们年龄尚小，不懂得未来将会有着怎样巨大的不幸，更不懂得来安慰做妈妈的我。人生如此充满了难以尽述的悲苦与辛酸，身单影只，右派分子的我，在重重的政治压力下，今后又如何艰难地跋涉，把俩孩子抚养大？

那位省邮电局的年轻女职工，似仍被1957年的政治大风暴所威慑。她不多话，不说抱怨不满的话，只是低声饮泣，时不时地发出低低的长嚎，像是闭住了气挣扎不已……

我无法说出自己悲哭的情状。一个多月前，四工农场因饥饿开始死人的时候，我已恐惧地想到了会出现如今的结局，在内心深处，我已多次痛悼了我的亲人，悲哭了多次。知道自己的亲人面临死亡而无能为力，眼睁睁地望着远方的他一步步走向死亡而营救无方，这种从感情到心灵深处的巨大磨难，使我六神无主，痴痴呆呆，呆钝得像个小老太婆。我的心灵多日来被碾压、被挤碎所经历了的痛苦，他们三人都未尝经验过。当我获准来探望营救我的亲人时，新的希望又从心头升起。我总觉得亲人在等待着我，我们都在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临。而当一切的梦幻又全都迅即破灭了时，我仍无法承受我早已悲哭过的现实，我颤栗悲伤的心经历着巨大的震荡，使我痛不欲生……“我将怎样活下去？我怎么能孤单单地活下去？我没法活下去啊！”这个固定不变的思维在痛哭声中反复从心头出现。然而，迎面扑来，经过反复咀嚼，反复思索的痛苦，严酷又冷峻，我得默默地全部吞下。为了孩子，我还得活着，活着去迎

接新的苦难，去迎接无法逆料的明天的各种风暴。我不仅是新寡的年轻母亲，失去亲人的不幸，并未改变我的右派身份。含冤受屈受苦受难的苦日子将怎样继续下去？在反右斗争期间，我曾自私软弱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把一切的苦难留给他一人承受。而今，我只能勇敢地肩起所有的苦难。我知道，在他身后留给我的无涯际的苦难，就是泪水流成河也冲刷不掉一丝一毫！但，泪水在尽情地流，长哭当歌，在倾泻着心中无法言说的悲苦愤恨。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啊！为什么把一个个受难者都逼到了阴曹地府才算罢休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地窝子里的哭声一定传得很远，附近地窝子里的幸存者们无疑都听到了，但没有一个人进来问一声，他们都只关注着自己的生存。孤儿寡妇们的哭声，向来都不许他们过问，他们不必关心出现在他们身边的此等情事。干部们当然更无一人进来，他们只办例行公事，习惯地办完了例行公事，已经心安理得地休息去了。此时此刻，从地窝子里传出的哭声，又何止我们这一处！啊，无人理睬的孤儿寡妇们的哭声，地狱里的哭声！

这个地窝子里睡觉的长土台上，依然堆放着不少死难者的被窝，依然没有一根麦草。我们都哭得乏力了时，便胡乱地拉开那些被窝，胡乱地又铺又盖，在梦中去寻觅自己的亲人，继续那没完没了的痛苦与悲伤去了……

大约在第三天早上，就得到通知，吃过上午饭后去火车站搭车回兰州，那姐弟俩是途经兰州后回天水。那男孩子愤愤地说："多少人的牺牲，才换来了少数活着的人回去；人不死这么多，农场里别的人还不能回去，这也太惨了！"我只觉悲戚不已，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们已在这里吃了四五顿饭，今天吃最后一顿饭，要结算粮票饭钱了，姐弟俩不知从哪里听说，来这里探望亲人的家属凡是没见上亲人面的都不付饭钱和粮票，并表示："我们也绝不付粮票饭钱，我们哪有粮票饭钱给他们！"当时粮票极为珍贵，每个人都处于半饥饿状态，谁也愿意省下自己的粮票。何况在这夺去了自己亲人宝贵生命的所在，尽管大家不怎么敢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恨，对于管教过自己的亲人，又眼睁睁地把自己的亲人送往死亡的那些干部，谁心里都愤恨万分，不交粮票饭钱又算什么！我们忍气吞声负垢受辱，在临离开这个害人性命的地狱之前，也得有所表示。所以，四人一致决定，拒付粮票饭钱。

这天上午的饭依然是胡萝卜、洋芋丁熬稠粥，几天来的饭顿顿如此，毫无变化。我们按掌勺人分配的数量吃完了自己的一份，有个干部果然结算这几日的粮票、饭钱，依次向每个人收要。姐弟俩先表示粮票钱都丢了，交不出来；那位年轻的女职工也说丢了；最后问到我，我也说："丢了！"那干部说："你们怎么都丢了？"我说："人的命都能随随便便地丢了，丢了粮票饭钱算什么？"那个干部没有料到我会这样回答，气急败坏地说："你，你！你和他们还不一样，你怎么，怎么敢这样说话！"我

冷笑一声，并不理他。他想了想，好像也没了词。他当然清楚我的右派身份，在以往，依仗管教干部手中的权力，对付我这样一个女右派，他有的是招数。而现在，他知道不能把我怎样，所以便也不再说什么，闭住了他那惯于骂人的嘴。我们几人一起回到地窝子里，准备行装。

我离开四工农场时带的小行李卷，里面包裹着五六斤饼子，来到这里的当夜便放在了队上。第二天我转到现在的这个地窝子时，由队上派人送了过来，送来的人当然是劳教人员。我打开行李卷取饼子吃时，发现一半已不翼而飞。丢了的饼子无法再要回来，我只好什么也不说。我打点自己随手提的帆布提包，才发现那个装了大半瓶牛羊肉的玻璃瓶，因为走得匆忙，竟忘记带上，留在了四工农场的宿舍里了。这使我心疼不已，那是我每天从饭盆里一块块拣出，从自己的嘴里省下来的牛羊肉啊，景超已无法享用，带到兰州给孩子们吃也是很稀罕的。我相信兰州的供应一定也很紧张，孩子们一定很馋，而我在匆忙中竟没带上，我真恨自己的粗心。

我带的衣物不少，小行李卷有些分量，队上干部在上火车前还派了个难友帮我提行李卷到车站。我送了个花卷给提行李的难友，以表示感谢。他原来也是部队战斗文工团的。以后又几经沧桑，到1989年，听说他担任甘肃省歌剧团副团长，同另一位改正了右派问题的同志高平，共同创作了歌剧《咫尺天涯》，在北京调演后得奖。此人个头很高，身材魁梧，我们只简单交谈了几句，他的名字叫王志。王志后来对我的一位熟人说，他看到当时的我凄楚痛苦的神情心酸非常。三十多年后，我们再相遇时，他说，他一直记得，我曾给过他一个花卷。

大地仍一片白茫茫。我从白茫茫中来，又在白茫茫中离开了这个恐怖的地狱。

这次，我们向西边的高台县车站走去。

我一点也没想到，在去县火车站的大路上，竟然巧遇四工农场于前一年9月底派到高台的许多难友。他们大约有三四十人，报社的杨骁、汪志英、风琴手周至德、省委组织部的关维智，还有武威步校的王洪勤许多熟人都在其中。他们都亲热地走来和我打招呼，惊讶地问我怎么也在这里？我悲伤地说出了景超的噩耗及我来此的缘由，他们一个个便不再说什么了。他们已见过了太多的死亡，心肠铁硬，麻木不仁。

只有王洪勤走上前来，送给我装有一斤多炒胡麻的小布袋，也算是对孤苦无告的我的抚慰罢。我含泪接下了这珍贵的礼物。他们也是去火车站准备回兰州的。因为另有带队的人，走了一段路便分开了。

到了车站，西来的火车刚一停下，人们像是逃难的一拥而上，呼喊着，互相推搡、抢挤着爬上了火车。火车的停站时间被迫推迟了几分钟。在一个车厢门口，来自临洮的难友高仲英迈着浮肿的双腿刚踏上火车的脚踏，就被蜂拥而上的人挤倒，摔在了车下，在这最后的一刻，他没有能够再爬起来。

王志帮我挤上了车。

车厢里，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坐定以后，我才发现全车厢都是农场里的难友，也有少数像是家属模样的。火车启动前进了，这里已不再是死寂的活地狱，人们大声说话，像沸腾了的开锅水，暂时自由了的人们自由地述说起各自经历过的苦难，感喟不已……

王志没有上车来，他还有些事没办完，要停留几天。我身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难友们从我的神情相貌上有所猜测，有人试探着问："听说王景超的家属也来了？"我急忙回答："我就是。"这一应声，立即有三四个人凑过来和我搭话。这第一个试探着和我说话的人，穿一身黑棉布制服，三十多岁，名叫邹春生，河北口音。我问："你认识王景超？"他热情地说："认识，咋不认识呢，我们在一个小队，平常我们都叫他'眼镜'，他为人不卑不亢，我们挺合得来。他没有能够回来，真是……"他咽下了心中的遗憾。另一个原临洮供销社的干部告诉我，我的亲人临终时因水泻送了命，他在景超病倒时曾问过要不要给我发个电报，回答是："不要。"这个回答使我的心又流血不止……他明知自己将赴黄泉，却还在为他可怜的妻子着想，他知道妻子无能为力，他怕同样在挨饿的妻子精神上承受不了这打击，他怕处境危险的妻子会因此而出问题。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成全他可怜命苦的妻子……啊，我的亲人，那个电报你原该发的，只要收到电报，就是拼命我也要为营救你想尽一切办法，何况那时政策已有松动，抢救人命的呼声已开始受到上面的注意。但是，你已被禁锢得太久了的生命想不到这些，你已被摧残得太久的躯体支撑不了多久，你终于悲壮地倒下了，你可怜命苦的妻子未能见到你……现在，面对关心你、爱护你的难友，我只能垂泪相对，说什么也已经晚了。这位临洮的难友又问我："他的坟上你去了没有？"我说："没有。站上的干部说埋得很远，叫我不要去了，我觉得话说得支支吾吾，心想坟已经找不到了，就没有去。"这位难友生气地说："坟就在近处，很好找的，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去呢？"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些可恨的干部竟骗了我，他们一定是怕麻烦，就让传话的小右派也帮着骗我，而我竟相信了他们骗人的鬼话。我知道，我已无法再回到明水去寻觅亲人的坟茔。为这，我饮恨终生。由于那些干部的无人性，也由于我自己的过错——我没有坚持一定要找到亲人的坟茔。这位临洮难友的述说，又在我的心上插了一把尖刀。

邹春生是"三八"式的年轻老革命。他不是右派分子，他原来是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化科科长，因为狂热地爱上了他科里的一个女孩子，当军医的妻子坚决不同意和他离婚。他不顾一切地和女孩子厮混在一起，还生了个孩子，毫无悔改之意。领导上对他的多次教育，他视若耳旁风。在那个年代，像这样目无党纪国法的军人，自然要受到严厉的惩处。他被开除党籍军籍，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原配妻子这才果断地和他离了婚。他心爱的事实上的妻子，在他受处分之前就离开部队上大学

去了，以破坏军婚的罪名也受到处分。在他来夹边沟以后，她念完了大学，在宁夏的一个中学当了教员。在他受苦受难的三年里，她一直写信寄物给他，用滚烫的爱温暖着他的心，直到他爬上火车，离开炼狱。他正是传说中和小个子铁路员工一伙从火车上偷粮保卫自己宝贵生命的一个。

曾是军人的他，用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描述了农场里每天大批死人的惨状。他低沉地说："以前每次打仗也没死这么多人，死人也没这么快，像风卷落叶一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多次出生入死于战场上，他了解战争的残酷。当衔着绿色橄榄枝的和平鸽展翅于城市的各种公众场所，毕加索苍劲的笔勾勒的和平鸽大型复制品正召唤着世界人民保卫和平之时，在这没有战事荒凉寂寥的农场里，却让许许多多来"改造"思想的男子汉们永远地消失了。

邹春生和左近的几位难友都说，夹边沟农场原来有劳教人员两千八百多人，能够回来的只六七百人，是个零头。

这样大规模的死人事件，使夹边沟——包括明水分站，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狱。从此，夹边沟农场恶名远扬，甘肃人凡是知情者一说起夹边沟农场便不寒而栗，幸存者及死难者的亲属忍辱负重，多年来对此惨案只在亲友中诉说，谁也无权把此事件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曝光。就是这样，20世纪60年代凡在甘肃工作生活过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晓在夹边沟农场发生的这一惨案。

火车在向东奔驰。按照惯例，此时列车上仍向旅客们供应面包、饼干等食品，我们是早联系好集体上车的，列车上供应的面包、饼干并没有发给大家，让每个人都饿着。此时，我带来的花卷、饼子等，都已吃光。在等待发放食品中间——他们一再声言将把食品送到每个人手里，我饥饿难耐。后来，身旁一个好像是家属模样的男人，农民打扮，从一个小布袋里拿出炒面吃了起来。我找出半斤粮票，给了他三毛钱，那家属就舀出半碗炒面给了我，我这才解了饥荒。快到兰州车站时，大家讨要面包、饼干的呼声更加强烈，又传过话来，说是下了火车就发给大家，下车后大家先不要走，集合到一块儿就发。但是，等下车后，我们仍未领到食品。后来听说在回兰州的列车上仍有难友死亡。

在列车的奔驰中，虽说我就要回到兰州，那是生我养我，我工作过八年的地方，家里的亲人们都企盼着我回来团聚，俩可怜的孩子正眼巴巴地等着我。在地狱里走了一趟，永别了患难与共、情深爱笃的景超，让他寂寞地孤单单地永远留在了荒滩戈壁上，我的思绪无论如何也难以转换。我忧伤不已，一个不幸的女右派所遇到的各种复杂的感情遭际全都奔涌而来……

路漫漫，

路漫漫。

22. 回到兰州

两天后的下午五六点钟，我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兰州父母的家中——黄河沿前街32号。已是寒假，除了父亲到街道上的食堂打饭尚未回来，全家人都在。

大家看到我突然归来，都很高兴，但看到回来的只是我一人，心中已明白了大半。我哭着说出景超的噩耗，房子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已上了甘肃工业大学二年级的二妹凤翔低着头在桌子旁啜泣。她和大姐夫最亲，上兰州女中时，因离家远，中午就在报社食堂和我们一起吃午饭，由于学习上拔尖，景超曾多有鼓励。现在，大姐夫已永远地去了，她再也见不到大姐夫，听不到大姐夫和她说这说那，同我们再一起吃饭。当时报社食堂办得挺好，家里饭桌上吃不到的螃蟹，会在午饭的餐桌上吃到，她特别爱吃，而现在这一切已永远地成为过去……

这时，大家都愣怔住了。在我回来之前，街坊邻居对夹边沟农场饿死许多人已有传闻。妈妈的学生王秀莲的丈夫——上过延安大学的刘彦璋也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王秀莲在黄河沿小学任教，她家就住在黄河沿前街。刘彦璋老家在陕西白水县农村，他二哥几次从陕西农村赶来，背上吃食送往农场，来来往往的中间，王秀莲把她了解到农场的情况，经常向我的父母告知。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后，为贯彻会议关于抢救人命的决定，刘彦璋已由原单位接回，于1月5日回到自己家中。他，人浮肿得厉害，总算活着回来了。

景超劳动教养后，兰州家中给他寄过干馍片、饼干，数量都极有限。到1959年后半年，兰州已是一座饥饿的城，每到星期日，三妹凤琳带着上小学的小妹凤仪，徒步十数里，到雁滩拣胡萝卜缨，到了地边，还要等到农民收获完毕，铲下胡萝卜缨，她俩才能急急忙忙各装上半麻袋，再徒步十数里走回家中。胡萝卜缨以前在兰州人的家庭中都是丢弃物，当时，却要两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徒步跋涉二三十里路背回家中，当

作蔬菜补充口粮。在全家人饥肠辘辘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们明知景超饿得更厉害，又有多少力量去支援他呢。所以，景超基本上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苦熬苦度了两三年。他能够活着回来吗？全家人心存侥幸地要我去解救他，而父亲写信时对高台明水的严重情况尚估计不足。全家人商量定，如我到了高台明水，必要时可从兰州再派一两个人前往救助——如二妹和三妹。但是，这些设想和打算都晚了一个多月，一切都已不可挽救了。

俩孩子离开爸爸两三年，感情上和爸爸已有些疏远，他们都还小，伐夏不到十岁，小夏六岁多，不懂得没有了爸爸，生活上将会出现什么……他们看到哭着的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知在想些什么，我没顾上搂抱他们，亲亲他俩的脸蛋。我被悲哀所击倒的神情，失去了爸爸的这个事实，一定吓住了他俩，他俩都呆呆的，一句话也不说，不知该跟妈妈说些什么话。

我在哭泣中，耳畔只听得妈妈声音有些喑哑，低低地说："事情已是这样了，就要想开些，想开些……不然，又能怎么呢！"一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她，面对如此的家庭巨变，不知该怎样劝解我才好。

后来，父亲从食堂打饭回来，知道了一切，拿出他打回的饭拨出一些要我吃，记得他拨给我吃的，是黄豆和大米熬的稠粥，他一面拨饭给我，一面还说："我一个人能吃多少嘛！"

此时，妈妈和几个妹妹、伐夏、小夏都已出了食堂，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可父亲不跟全家人在家里吃，一个人仍在街道上办的食堂吃饭。我问："这是为啥？"妈妈说："他怕跟家里人一起吃饭吃亏。"为吃饭，看样子家里人已有了嫌隙。

我总算回到了兰州家中，而且将留在原单位不再去安西的农场，从此将和全家人团聚，这也算是可以欣慰的一件大事。

所以，这天晚上，全家人在悲痛中又觉得有了一线希望，一些宽慰。

二妹仍回工大宿舍住去了，我和父母、俩妹妹、俩孩子挤在一个炕上。一路劳顿，没睡成觉，这天晚上总算回到了自己家里，在亲人的拥挤中睡了个囫囵觉。屋内有煤球生的火炉，兰州的气温比河西要高。这一夜，直觉得非常暖和，三年来未曾享受过的暖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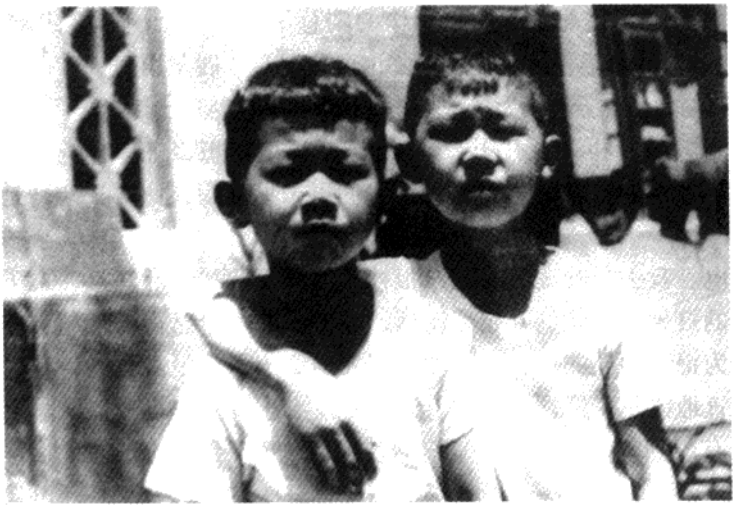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上午，我先到街上给杜博智发了个电报。我知道他不久也将回到报社，我的行李、柳条箱和所有的东西还留在四工农场，我要他回兰州时把我的这些东西一并带回兰州，不然，我还得返回安西专门去取。

在家里，妈妈絮絮叨叨地告诉我，原来，伐夏、小夏都跟父亲在一个食堂吃饭，但父亲吃饭尽沾两个孙子的，伐夏、小夏吃不够自己的定量，后来，妈妈的同事知道后怪怨她说："姑娘、女婿把俩孩子托靠给了你们，他爷爷这样沾两个孙子的，俩孩

子的身体垮了，你以后怎么给姑娘、女婿交代?”这样，妈妈才下决心把伐夏、小夏的粮食关系转到了学校，和她们一起上食堂。伐夏在一旁插嘴说：“就是，有一次食堂吃油饼、稀饭，爷爷吃得多，把我和小夏的多吃了，他还让我写信给你，说我们吃得很饱。”我确实收到过伐夏这样的来信，听到妈妈和伐夏对父亲的抱怨，我对父亲就很不满。俩孩子够可怜的了，他吃饭还要沾俩孩子的。

妈妈还说：“现在我们都在家里吃饭，调剂起来也方便些，可你大大（我们从小仍按原籍会宁的乡俗，称父亲‘大大’）说我们会克扣他，在家里他吃不够量，他相信街道上的食堂，就只好让他一人还在食堂打饭。每月的伙食费由我交给他。”我从小就认为父亲是个宽厚待人，对亲友乐于帮助，半生中养活了不少他原本可以不养活的人。在这大饥馑的年代，他变得让我感到陌生。而且，他一向和母亲感情非常好，在生活上对母亲体贴入微，当然，母亲善良真诚，他们彼此一直很信任。可现在，这是怎么啦？一家人竟然不能在一个锅里吃饭。

这天晚上，我带着俩孩子在兰园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我去安西后，父母家中经济拮据，他们看电影肯定很少，我既已回到了他俩的身边，就应让他俩高兴一点，让他俩感受到妈妈的爱。电影散场以后，走出电影院，小夏走到人少的地方，解开裤子站着就尿尿。当时的兰园还是沙石地面，厕所等设施都不齐备，一个6岁的男孩站在人少处尿尿，也无伤大雅。而在我的眼里，我的小夏已长大了，三年前，他要尿尿，一定要喊我：“妈妈，我要尿尿。”现在，这些话都免了，他只是随自己的方便完成此事就完了。以前，伐夏和小夏都喊我：“妈妈!”此次见面后，他们只喊我一个“妈”字，而不再喊我“妈妈”，童稚的他俩为什么改口了?



寄养在姥姥家的伐夏、小夏

第三天的晚上，我去小沟头看望外祖父母。我从小和外祖父母家最亲，走动最多。记得我和景超划定右派，准备去河西劳动时，我们还特意到外祖父家辞行。外祖母特意做了几个菜表示送行，记得有一道菜是蒜薹炒肉丝。

兰州当地不出蒜薹，蒜薹炒肉丝一向被认为是一道高档菜。外祖母在炒之前，把蒜薹在开锅水中烫一下，把一根蒜薹剖开成四条，再切短炒成，味道特别好。外祖父母对于我们去河西劳动深表忧虑，外祖母说："劳动苦得很呀，你咋吃下那么大的苦哩嘛！"我当时对迎接劳动毫无畏惧，安慰外祖母说："我们都还年轻，不怕劳动，劳动几年身体还能锻炼好，不怕，不怕！"这些话都发自内心。当时，谁又会想到今后会经历怎样的苦难呢。

这次去看望外祖父母，我身单影只，但也不能不去。我在晚上去，是考虑到外祖父家已无法为我准备一顿晚餐，我是吃了晚饭才过去的。我惟一的舅舅苏荫桓20世纪40年代农专毕业，解放后原在省农业厅工作，后被分配到敦煌棉花农场工作，他们全家都去了敦煌，只把上初中的大女儿留在了兰州。

我到了外祖父家，已是掌灯时候，外祖父家点着煤油灯。外祖父家也住大炕，我们坐在炕上说话。我说及这次回兰州的经过，先去高台，景超已在一个月前去世；现在，我们可以不再去河西的农场，农场死了很多人等种种的情况。外祖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共产党这些年干的这号事……"他极有节制地再没说下去。他当然清楚，景超是活活饿死的，在他的亲属中，还没有如此的先例。

外祖母此时耳朵已完全失聪，我们交谈的话，她老人家一句也没听见，所以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二位老人都是七十开外的人了，他们慈祥的面容依然和蔼可亲，只是显得有些瘦削苍白。我匆匆地向外祖父简单说及这几年的大概经历，便告辞回了家。

既然要回原单位，我想，我应该到报社谈谈我已回到了兰州家中。我决定到报社找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叶滨。在反右斗争中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张源于1958年甘肃、宁夏分省后又回了宁夏。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我去北京参观农业展览馆时，叶滨曾特意到西苑大旅社看望我和曲鹤云，还对我说："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参观完了，你多住些日子，就住在我岳母家里，再多玩几天。"可我当时心里只想着工作，觉得多玩几天不太好，就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当右派后，我们再未见过面，此次找他，是不找不行。

当时，兰州常划片停电。我去找叶滨的晚上，报社正停电。我找到叶滨家，桌子上点着蜡烛，在摇摇曳曳的灯光下，我们开始了谈话。当然，叶滨早已得知景超已在一个月前遇难。当时，作为报社领导的他，不可能赤裸裸地说出景超是饿死的，我也不敢这么说，我们心照不宣地说及景超。我哽咽着说："没有想到去农场改造，落了这么个结果，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叶滨神色黯然地说："下面劳动的条件太艰苦了，我们也没有想到。唉，劳动怎么会……"我仍没忘记自己的右派身份，一开口就说"改造"，但叶滨只说劳动，不提改造。我后来设想，他一定是对这种把人残酷地

改造到死的手段非常痛恨，所以绝口不提改造二字。这种残酷的改造手段，仅仅在报社，已有二人遇难：景超和赵秉仁。

他语重心长地抚慰我，说："事已如此，不可挽回了，你就要坚强些，前面的路还很长。"听到这里，我禁不住地哭出声来，说："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一个人怎么走啊！"叶滨又说："你是个坚强的人，这三年的劳动你一人在农场都挺过来了，现在回到了单位上，各方面的情况会好一点。"

叶滨又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有个当农民的弟弟。"叶滨说："那就该写信通知一下。"

1950年冬我第一次下乡采访前，叶滨曾在办公室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对一个年轻女记者下乡采访会遇到的种种问题作了周详细致的考虑，苦口婆心地谈了又谈。当时我和景超还没结婚，我走后，叶滨又给景超写了封短信，信上说：和桑走后，你会孤独寂寞，思念会使你很苦，但要耐心等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她下去采访，经受一些锻炼是不可少的。我相信，别离，只会使你们的感情更深更浓。祝你们幸福！景超当时把这封珍贵的信工整地全文抄写在日记上，在我回报社后拿给我看，这封信仿佛为我们甜蜜的爱情加了注脚，我们为叶滨如此细致入微地关心到我们的感情生活而感动。

叶滨此次和我谈话时，我不知他是否还记得他曾写给景超的那封短信。他对我们有过的祝福，由于一场政治灾难造成了景超的离去，已荡然无存。

我告辞时，叶滨手执蜡烛，在昏黄的烛光的摇曳下，将我送到了楼下。

过了几天，杜博智突然来访。原来，他已回到了报社。我着急地问，我发给他的电报收到了没有，他说，没有。

原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大饥馑中作出抢救人命的决定，已通知各地农场把受各类处分的右派分子一律由原单位接回。四工农场的领导接到通知后，心里清楚，一年来右派分子们在这个农场里受尽各种凌辱，积怨、愤恨已充斥了他们的每一根神经。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的每一滴血都会引发起复仇的火焰。所以，农场领导把此通知悄悄压了下来，对右派分子绝对保密。我发给杜博智的电报自然被截留。当送右派分子们的大卡车开到一站时，杜博智还正在伙房里忙活着。此时，站上的领导才通知他们，立即放下手中的活，捆绑好全部行李衣物，全体立即坐车回各自的原单位。此通知宛如一声炸雷，是我的难友们万万没有想到的。站上的领导选择在送他们上路的大卡车到来之际才宣告这一通知，是由于他们充分估计到，当送右派分子们回原单位的大卡车到来之际，就是有人想要闹事也来不及了，此时每个人都只顾捆行李上车了，谁还想在这千载难逢的当口，去为泄愤耽搁回原单位的机会？回原单位也就意味着同分别了三年的父母、妻子儿女及所有亲人的团聚，这是他们三年来在梦中都渴望不到的

啊！

徐福莲是我的女伴中最后一个离开场部，坐着大卡车来到一站的。她在大卡车上看见杜博智就大喊："和桑的行李、箱子都在场部呢，你给带回去吧！"可是，大卡车不会为我一人的行李、箱子再回场部，一站离场部虽一里多路，杜博智也没有时间去搬运，因为卡车司机不会为此而等待。这样，我的行李、箱子等所有的东西，都还留在四工农场，我得重返四工农场，把这些东西取回。

杜博智当然也已知道了景超的噩耗。下午，他把伐夏带回报社他的宿舍，给伐夏做了顿饭，让伐夏饱饱地吃了一顿，晚上再把伐夏送回。

重返安西四工农场，我想最好有个人搭伴而行，路上有个照应。很快就打听到省检察院的韩继祖正在兰州探亲，他妻子在省委医务所工作。我在他家里找到了他，他在探亲期间并不知农场的难友已全部回原单位，他的行李也全部留在农场。一两天后，我们一起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这次再返四工农场，我的行李、箱子都绑扎得好好的，只丢了农场发给我的那套工作服，可能是被哪个"职工"顺手牵羊拿走了。农场的难友几乎都已走光，我的三位女伴都已离场。一站的卢全福还没走，我邀他一同返兰，他同意了。在一站见到王志玉站长，他让卢全福剁下一块约四五斤的牛肉送给我，还送给杜博智一条羊腿，让我回兰州时带给他。

1961年，被"抢救"回到《甘肃日报》社后，同两个孩子合影

在场部，我还遇到了在眉户剧《梁秋燕》中扮演年轻妇女的那个眉清目秀的小"职工"，他还活着，这使我感到高兴。近一年未见，他脸上出现了皱纹，显得有点老相，那些年纪较大的群众演员呢，他们也还活着吗？我不知他们的姓

1973年，和凤鸣同母亲苏淑静、妹妹和凤翔、和凤琳、和凤仪在一起

名，就无法打听。三、四站的情况更糟，死人更多，我在“医院”里见到的“病号”就都是三、四站的。我相信小“职工”活下来很不易，我为他庆幸，他总还活着。他是到场部集中，然后坐火车去新疆的，迁场行动已开始了。新疆是个好地方，但愿这些幸存者到新疆后能过上好些的日子。

一两天后，我就和卢全福、韩继祖一同搭火车返兰。此次在柳园车站上火车，还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上火车的旅客很拥挤，我刚将一只脚踏进车门，多半个身子还吊在门外，火车就开动了，而且速度不慢，吓得我大声惊叫。不知车上是谁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才将我拉进车厢。这次回兰州的火车上，我们的食物很充足，因为有当炊事班长的卢全福与我们同行，他带了很多大饼。也许，是出于对新寡的我的同情，他不断地拿出大饼劝我吃，我虽也带了些饼子数量毕竟有限，老吃他的就不好意思，但他慷慨大度，一再拿出饼子劝我吃，对韩继祖就不像对我那样大方。

这次回到兰州，才得知我的外祖父在我去安西期间已去世，得病很快，一两天内就咽了气。我回到兰州时，后事早已料理完毕。我远在敦煌的姑姑——即我的舅母，她是我父亲的同父异母妹妹，嫁给了我的亲舅舅，这种婚姻叫做“换头亲”——接到外祖父病故的电报，就立即带着儿女回到了兰州家中。这时，外祖母又病重。

因为家中住处紧张，我到报社要求给个住宿的地方，管理科只在女工的集体宿舍给我安排了一张床的位置。在出进报社的路上，遇到一些熟人，他们都避而远之，装作没看见我。在大门口，我见到托儿所的阿姨王荷秀——伐夏和小夏她都带过，所以她也认识我。见到我，她笑着握住了我的手，亲热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的眼泪在眼眶内打转转，却并未流下。我知道，她说这话是从内心里庆幸我总算回来了，对于景超未能回来，仍谨慎地避而不谈。

在报社这个我极为熟悉而又陌生的所在，人们对我的疏远冷漠，使我的感情也只能是相应地对应之，麻木冷漠，难以外露。

我去看外祖母，只见她枯瘦如柴，穿着大红绸子的老衣围靠被子坐在炕上，外祖父过去可算是小康之家。外祖父的寿辰是阴历重阳节，外祖母的寿辰是阴历九月初七。过去，二位老人家的寿辰常合在一起，都在重阳节这一天过。我小时候去外祖父家贺寿，每次都要磕头的。他们的寿衣早在五十多岁就做好了压在箱子里，在这样的

大年馑里，需要时取出很方便。现在，外祖父已辞世，看见外祖母穿着大红绸子的老衣坐在炕上，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她已完全失聪，我无法宽慰她，也不知她心里在想些什么。看望她老人家，我提了一斤供应的饼干，坐在她身旁。一会儿，我看到她用手指着桌子上切开的萝卜，说是要吃。姑姑切了一片递到她手里，她抓起来就往嘴里送。我看见她满嘴上下牙一共也就五六个，可她硬是用残缺的牙使劲咬着脆生生的萝卜。她一定是肚中饥饿。

又过了几日，外祖母咽气了。二位老人的生日只差两天，先后咽气在一个月内。显然，是无法抗拒的饥饿，先后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我去外祖母家奔丧时，外祖母已穿好寿衣躺在一块木板上。我只流了眼泪，没有大哭。我见过的死亡太多，心灵情感都已麻木迟钝。任教于兰州大学地理系的表兄苏炳勋，年纪比我大得多，他跪在灵堂前，喊着："奶奶啊！"大哭不已，悲痛不已。给外祖母送葬，我没有去。抬埋老人，按兰州过去的规矩，主家都要准备酒菜，招待奔丧的所有亲友。现在，大家都饿着肚子，自然无法为亲友们准备饭，送葬的人就尽量减员。大家认为我连遭不幸，景超去世不久，身心的重负已难以承受，我便成为当然减员的对象之一。外祖父母都埋葬在兰州西郊的晏家坪。

父亲作为一家之主，过去家中一切祭祀天地祖先的大事，都由他操持。由于他没有子嗣，一切祭祀活动中，跟着他磕头的常常只有我这个长女。我的妹妹们都小我许多岁，那时还无法跟上我一块儿磕头。我从安西回来才两天就带着俩孩子去兰园看电影，父亲当时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很生气。有一次在我为别的事和他发生顶撞时，父亲就借机怒气冲冲地发泄说："你一回来就领上伐夏、小夏看电影，像啥样子嘛，谁家的人有像你这样的，狗东西！"父亲从来没有这样骂过我，他心里对失去景超的哀痛是很深很深的。我重返安西去取行李后，为了纪念景超，他重操原来的行当，在方桌上为景超设了灵位，上写："爱婿王景超之灵位"，并摆了几样祭品。三个妹妹从未经见过这种祭奠活动，心里都清楚大姐夫是个右派分子，就有些害怕。但父亲不管不顾，他按自己的方式纪念了爱婿。我只是在多年后才知道此事的。三妹提起时，还说："不知道大大那时怎么就敢！"父亲那时对于我没有对景超有任何的祭奠，一定内心非常不满。在我去安西后，他便按自己的心意作了补救，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作了他该做的事。可我在农场已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任何一个"钻沙包"的难友，没有谁会祭奠他，更无人悼念他。习惯成自然，我认为不祭奠，不作任何悼念，忘却一切，倒是正常的。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同正常人的心态反差就是如此之大。

事实上，在大饥馑的日子里，父亲有了很大改变，他的精神已有些失常，神志已不很清楚。一次，我的亲叔伯兄弟和良来看我们。我和景超还在报社工作时，他作为调干学生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上学，暑假期间回家，到报社看过我们。到1957年反右派

斗争中，他作为学生也被划为右派，也不知他的处分如何，他倒是主意很正地回到兰州家中自谋出路，找了份工作干上了。现在，他的生活还是安定的。他来到父母家中，我们闲话一阵，主要是说了说我和景超的情况，农场死人的情况，等等。在他告辞前，父亲竟然提出五六种报章杂志，要和良为他到邮局代订。父亲大半辈子都有阅读习惯，爱看杂书。可是，在大家都饿着肚子的日子里，他不提别的要求，却要和良为他代订五六种报章杂志，真让和良哭笑不得。就是替他代订了，那些日子里的他，饿着肚子又哪有精力去看。这已是他神志不清冒出的妄念。

妹妹们说，此时的父亲常将家里的衣物背着家人拿到街上卖了买吃的。景超的一件短皮大衣已很旧了，原来他一直穿着，因天气已暖，就拿到街上卖了不知多少钱，用十三元买了一斤高价水果糖拿回家来，只给了母亲一两块，别人一概不给，就一个人吃了。他脾气变得非常暴躁，而且不讲理，动不动和母亲、妹妹们大吵大闹，以至后来发展到向母亲、妹妹们寻衅闹事。母亲和妹妹们不胜其烦，在外祖母去世后，就干脆躲到了外祖母家，住在了外祖母的房子里，不回自己的家。

父亲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一向对中国共产党敬畏尊崇。就在我们去河西劳动之前，他对甘肃省委要把河西走廊建设成为全省的粮棉基地满怀信心，对我们去劳动的前景充满希望。他曾热情地说："你们先走一步，过几年河西建设好了，干脆我们全家都迁到河西安家落户。"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他仍然一片赤忱，曾狂热地写信给我，打算把俩孩子的名字改为超英、超美，被我拒绝。两三年过去，大跃进失败了，全民挨饿，人人长年累月吃不饱肚子。这一场灾难的出现，是他所始料未及的，他内心掀起的风暴雷霆，他的躯体神经都无法承受，他又不敢把愤怒怨恨用语言作丝毫的表示。他的爱婿、女儿正是由于因言获罪，爱婿又被活活饿死在劳动教养的农场。他不能，他什么话都不能说！这样，灵魂的车裂，饥饿的折磨，终于使他精神分裂，神志不清。

我从四工农场拿回的那块牛肉，家里人并没有立即煮熟吃了它，而是先放在了母亲的衣箱里，用一把老式的黄铜锁锁了起来。此时，母亲和妹妹们都在外祖母家住。只有伐夏、小夏和父亲仍住在一起。父亲知道箱子里有一块牛肉，就急不可耐地想把牛肉取出煮了吃。夜里，伐夏、小夏都已睡了。父亲就想方设法要把箱子打开。此时，衰弱的他已没有多少力气，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都使他摔倒在炕上。伐夏、小夏都醒着，都不敢说话，就看见他一次又一次摔倒在炕上。折腾了半夜，他到底也没把箱子打开。

伐夏第二天把父亲为取牛肉折腾了半夜的情况给大家一说，我们就为俩孩子担心，万一他在愤怒和神志不清中对俩孩子做出了什么，可怎么办。

后来，在报社的院子里路遇叶滨，我就要求报社分给我一间房子，我说："我三

年没管过孩子，现在回到报社，我要和孩子住在一起，照管教育孩子。孩子们需要我，住集体宿舍，孩子们见不到我，哪行呢?”叶滨应允。这样，我在报社附近力行新村56号的职工宿舍有了一间平房，把孩子们接来住在了一起。孩子们转学到酒泉路小学，伐夏上三年级，小夏一年级。

我们的这间小平房坐南朝北，非常阴冷。我们搬进去后向报社借了个铁皮小火炉，领煤还得找管理科的张炯。张炯就住在后院里，我向他说了说。他问：“你啥时候领?”我说：“明天行不行？房子阴冷，我想马上就把炉子生着。”张炯一口答应，说：“行，明天上午十点左右，你到炭场上来，我给你发。”第二天是个星期日，我借了个架子车去领煤。到了炭场上，张炯已等在那里，见了我说：“今天我本来不上班，见你要领，我才特意赶来。”话虽不多，我心里一热，几乎流下泪来。1949年，我初到报社的那个冬天，就是张炯发的煤。那时，作为城市女孩的我，毫无劳动能力，我的同室女伴也一样，张炯发煤，是他自己用筐挑着煤送到我们宿舍的。他也是同景超一起从西安行军到兰州的。听说行军途中，他打前站，给大家办理伙食住宿都很能吃苦。在报社共事的这些年里，我和景超成立了家庭，有了俩孩子。一场反右派斗争后，景超去农场劳教未能回来，我们孤儿寡母落得如今的下场，他心里既同情又难过，所以很乐意在星期日为我发煤。

同院还住有原《甘肃农民报》的马占海，他曾是我在二版编版时的助手，回民，现全家人都住在这里。我们原来相处就好，反右派斗争中，他对我的揭发批判，只是迫于形势作了作姿态。他如今也没有表现出和我划分政治界线。我去他家坐了坐，说起做饭无锅台，那时家家都自己起灶，无锅台就无法做饭。初次见面的他母亲看到我年纪轻轻拉扯俩孩子很惆惶，热情地说：“占海会泥锅台，叫他星期日帮你泥上一个，你和两个娃娃，在房门口小小地泥上一个就行了，用不了多少土坯，找些旧砖也行。”这样，找了些旧砖、土坯，马占海在星期日为我砌了个锅台，当下就生起了火。

我总算有了一个家，一个残破不全的家。

初到报社，党员干部汪星主动和我有来往。

反右斗争之前，我们一贯友好。我和景超结婚时，我们同住一排平房。他的前妻郭霜青和我同龄，在资料室工作。作为邻居，又是差不多先后作了年轻的母亲，我和郭霜青在一起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常有来往。后来，郭霜青不幸因病早逝。

汪星是从延安来的年轻干部，极有才华。他二胡拉得好，有一次报社办晚会，男女同志有个小合唱，他是我们的领唱，歌声嘹亮，且极有感情。报社举办舞会时，我去跳舞，他常是我的舞伴，舞也跳得好。但他性格耿直，在各种会议上总要直话直说，所以，20世纪50年代在编辑部处境不算好。

在反右后期，景超和报社别的右派分子已到小西湖的二厂劳动去了。有一天，汪

星说，他有事晚上要找我谈。晚上，他来到家中，第一句话就笑着说："尕老婆犯错误了！"这句话使我几乎流出了眼泪。因为我结婚时只有18岁，当时把结了婚的女同志叫"老婆"，我年纪小，有的人说我是"尕老婆"，有些熟人就都亲昵地叫我"尕老婆"，汪星也叫我"尕老婆"。后来，我有了孩子，叫"尕老婆"的现象自然消失。大家随后都叫我的笔名"和桑"。两个字的名字叫起来方便顺口，也亲切些。到反右开始后，大家为了和我划清政治界限，"和桑"没人叫了，无论会上会下，人们用"和凤鸣"呼来喝去。汪星一见我张口就亲昵地仍叫我"尕老婆"，使我立即想到了我们做邻居时亲密无间的岁月，他没有和我划什么政治界限，而且语气流露的完全是抚慰，我心里涌动着热流，眼泪差点掉下。

当时，汪星在记者部负点责。1955年我在天水农村田家庄、湾子一带采访时，记者部有个摄影记者也去那里采访，后来当地有人来信揭发，说这位摄影记者生活上不检点，同一位军属出了问题，并指出当时我也在那里采访。汪星找我谈话，其目的就是进一步落实一下，那位摄影记者是否真有此类问题。经我回忆，实在想不起那位摄影记者有那种问题，至少当时我毫无觉察。汪星听完我的回答，再没多说什么话就走了。他走后我还想，他为什么要专门登门问我呢？琢磨再三，我转而想到，汪星是个极聪明极正派的人，他对我的了解不谓不深。反右以来对我的批斗，他心里一定打了个问号，他没参加过对我的批斗会，在运动中什么话都不能说。多日来，我们一直未遇面，他想要对我有点抚慰也没机会。这次为了解那位摄影记者的问题，他就有机会同我单独见面了，别的话不能说，叫我一声"尕老婆"，我肯定会心领神会，我们之间的距离立即就拉近了。就这样，我铭记住了我们这次短暂的见面和谈话。

我身单影只地从安西的农场回到报社，有一天见到汪星，汪星说："小毛住在贤侯街，哪天我领你去找她，你就有说话的人了。"小毛原名陈雪鸥，是我在《甘肃农民报》编二版的伙伴，我们相处得好，工作上合作得也好。她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去了台湾，母亲是地主分子，离了婚的丈夫历史有问题。但她性格活泼，走路总是跳跳蹦蹦的，所以有人给她起名小猫，书写时为简便起见，便写小毛。当时全报社的人都叫她小毛，原名倒无人叫了。反右前，她已调到兰州报社，鸣放时没啥言论。但她在《甘肃农民报》和我编二版时，对不懂行的副总编辑×××有不尊重处。×××记恨在心。到反右开始后，×××数次到兰州报社，找兰州报的领导进行撺掇，以各种理由认为陈雪鸥是个够格的右派分子，最后就将她划成了右派。三年前，我和景超去河西劳动改造，兰州报属市级单位，陈雪鸥留在了兰州市。因她已调出甘肃日报社，我们之间三年断绝音讯。我回到兰州后，就不知她的住址，无法和她联系。小毛原来和郭霜青同在资料室工作过，和汪星也很熟。汪星一见到我就主动要领我去贤侯街找小毛，让我有个说话的人，这话正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在孤独中是多么需要有个有着相同

命运，可以互诉衷肠的人呵！汪星一见到我就想及此，并要领我到小毛家中去见她，这真是雪里送炭，这情谊真是太珍贵了。此时，我和小毛都还没有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是阶级敌人。汪星作为党员中层干部——此时他已调兰州电影制片厂工作，竟如此不避嫌，还一如既往地关心我，考虑到在我不幸和痛苦的生活中，最需要有个说话和来往的朋友，这只能用“人间真情”来说明。几天后，他就领我到了小毛家中，因小毛家中已有客人，他把我领到后就告辞了。从此，我和小毛相知很深的一对难友就有了来往，互相关心，互诉衷肠，在共度苦难的岁月里减轻了许多孤独寂寞，增添了许多慰藉。

夏天，汪星和他再婚的妻子余润珠带着女儿去五泉公园游玩，回来时路经我家，还进屋坐了坐，闲话一阵。在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前，汪星到我家看望我，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我和俩孩子住在一起后，常来看望我们的是杜博智。他在农场当过炊事员，现在又在报社食堂当了炊事员。由于当时副食供应仍短缺，报社食堂的副食来源较多，我们在报社食堂也打饭，去打饭的常是孩子。和杜博智一起的有个炊事员冯得贵，是我们去安西后才来的，杜博智和他对孩子们打饭多有照顾，主要是菜打得多，有时付一个菜的钱，打给两个菜的量，如菜有剩余，则打得更多。我有时因事去伙房，也会受到炊事员们的特殊优待，如王银福、范生荣，看到我进了伙房，就让我吃菜案上洗净了正在切的西红柿。我吃了一个又一个，在不好意思再吃时，范师傅仍热情地一再劝我：“吃，吃，再吃，再吃！”我就再吃上几个。他们对劫后余生的我非常同情，特别是想到我还要拉扯俩孩子，过日子难着呢，就伸出他们援助的手，在一旦有机会时就帮我一把。

杜博智在下班后常来我家聊天。在反右期间，我就听说他和食堂管理员张志杰的女儿张玉荣相好。在挨批判期间，他们仍一起逛马路，看电影，在双城门的小吃店一起吃八宝稀饭。这些情况当时是作为批判他的材料揭发出来的。我问起这些情况是否属实，他说：“有这事。”他还说：“咱们去安西时，荣她妈给我炒了几个菜，烙的馍，用菜盒子装了，我就是从她家动身上卡车去的火车站。”他总是把张玉荣亲切地叫“荣”或“荣荣”，几十年如一日。

我们到达安西县城的那天正是“五一”，杜博智和难友们在街上闲转，看到商店里有卖的条绒，不要布票，当时兰州无条绒可买，就和几个难友一起各买了几尺，后来托蒲廷珍带回兰州送到张玉荣家中和各自的家中。

回兰州后，杜博智已打听到张玉荣在青海湟源畜牧学校上学。有一天，他就在我家的桌子上给张玉荣写了封信，问她现在是否有男友，是否还愿意和他继续好下去？在安西的农场三年，他俩没啥联系。这封信使他俩中断了的关系又接续上了。

在此期间，有些难友陆续打听到我的地址，先后来家中看我。他们有：省劳改局的欧阳夏、公安厅的符文虎、李德寰、梁正光、李鸿元、谈宇波等，还有杨得春、赵芝贵等，徐福莲、梁富杰夫妇此时都住在兰州，也先后几次来看我。

公安厅、劳改局都有基层的劳改单位进贡，他们的副食供应就较充足。一次，我去公安厅他们的宿舍，符文虎虽已回到自己家中，这天也在场，他指着一位从夹边沟农场回来的难友介绍说："此人是高尔基的弟弟高尔泰。"他就是二十年后在美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高尔泰，其主要著作有《论美》，曾轰动一时。当时我已知道他的名字，而且知道他曾在新添墩劳动教养。他幸免于难，是由于公安厅办展览，他会画画，就被抽出来在兰州搞展览，他当然得吃饱肚子才画画。就说这次我在他们宿舍，难友们知道我平日里吃得不及他们，就留下我吃饭，一次再次地劝我吃，让我饱餐了一顿，饱得几乎弯不下腰来。这天，他们还分到猪肝等肉食，符文虎用报纸包了一包，当然，他们也让我沾了些光，送给我一些猪肝。只记得符文虎说："猪肝沾上了苦胆汁，吃以前要用水泡一泡。"符文虎有幸去了玉门黄花农场，没去四工农场，所以我们受过的苦他连边也没沾过。

赵芝贵只来过一次。他进门就数了二十六元钱给了我，我觉得数目太大，不好意思拿，因为我知道他也是降了几级工资的人，手头不宽裕。但他说："我老婆孩子都在天津，不要我负担，你就留着用。"仍态度坚决地把二十六元给了我。

杨得春买了五元一斤的高价点心留给我和孩子，情义可感，因为此时大家都手头拮据，一斤高价点心是很珍贵的礼物。我和杨得春相识在十工农场的演出队，当时我是演员，他是乐队的。我们都回到兰州后，他重操旧业，在五泉公园的露天舞场的乐队又当上了伴奏。五泉公园离我的住处很近，有时也会有难友邀我去那里的露天舞场跳舞。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我再次身处逆境之时，经卢全福指引，我在他母亲家里找到他，他又热情地帮助了我，为我家搭了个厨房小棚，砌了个做饭的锅台。可到20世纪80年代后，他母亲住的平房拆迁后不知去向，我再也找不到他了，只知道他在兰化公司，不知他在兰化哪个厂。我苦苦找他，还想从他那里了解他们在高台时受苦受难的情况，而最终未能找到他。现在高台的一章在全书中写得最简略，就是由于我无法了解得更多，而成为遗憾。

武威步校的原军官们，只有徐保安来看过我。他来到我家，看到我正好买到一卷可作卫生纸用的大张白纸——因为当时卫生纸脱销，就说："我老婆快生孩子了，买不到卫生纸，干脆，把你这些纸都送给我吧，你又用不了多少，自己再想办法去。"硬是把我才买来的一卷白纸拿走了。以后我也再没见到他。只是听张露玲说，杨爱珍生了个男孩，为了不忘记在安西四工农场经受的苦难，他们给孩子起名叫"记西"。

武威步校的原军官们后来都未安排工作，在招待所住了一年半载之后，都各回各

的家乡，自谋出路去了。此后，我和他们也就断了音讯。只有留在玉门黄花农场的陈明还和我有过来往，到打倒“四人帮”后，他调来兰州，在省人民政府任职，后来官至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在火车上认识的“三八”式老干部邹春生，以及后来在兰州认识了的参加过长征的官锦文，他俩都是在部队上犯了事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据说，官锦文在农场因忍受不了饥饿，曾大发牢骚，表示不满说：“长征时也没这么苦啊，长征时没啥吃时大家都挨饿，射杀一头野牛，大家就能饱饱地吃上几天，这里长年累月地挨饿，从来也吃不饱肚子，这种苦日子才真难熬得很呀！”管教干部对待他们这种人多少还有点区别，所以他俩作为幸存者后来都回到了兰州的部队上。据邹春生说，他们一回到部队，单位上就把他们每月的生活费增加到了一百元，这在当时就够宽裕的了。后来，官锦文还和几个年轻人重返夹边沟农场，去取回他们迁场到高台明水时留在夹边沟的东西，他们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我就委托他们去时把景超留在那里的箱子也捎回。

过了几天，他们就捎话说景超的箱子已取回，就放在他们住的甘肃军区招待所，要我设法取回。我只好写了封信，委托杜博智下班后去取。他大概是用绳子捆绑后把箱子背到我家里的。这天晚上又停电，二妹和三妹正好来看我，看到杜博智把箱子背回，二妹连忙说：“谢谢，谢谢你了！”帆布箱是上了锁的，自然是没有了钥匙。我们硬是用剪子把锁撬开，打开箱子，举着蜡烛，着急地翻看，看他有些什么遗物留给了我们。首先触入眼帘的，是两套叠得平平整整的深灰色卡其布中山服，还有两件漂亮的带条的府绸衬衣，这是他当年新做不久的衣服，衬衣也都很新，还有一件绸子棉背心，海蓝色的前襟，后背是黑绸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舅舅全家去了敦煌棉花农场，妈妈、几个妹妹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有个保姆魏嫂，针线活特别好，外祖母就从箱子里找出些零碎绸子，让她给我和景超各做了一个棉背心。这几件衣服都是景超心爱的，在农场一直没舍得穿，他是对未来充满期望，心想有一天解除劳教，走出农场，他将穿得体体面面，人模人样地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我回来了，可他永远地留在了戈壁的荒野里，长眠在那里了！箱子里有不少干辣椒，我一眼就认出，这些干辣椒正是我从四工农场寄给他的，他怕全部带在身边一时吃不完，就装进了箱子里，他一定是想到，我买干辣椒很不易，他要留下慢慢吃，存着吃。令我惊喜不已的，箱子里还有他在农场记的两本日记，这可是无价之宝！我不禁连声说道：“这是最可宝贵的，最可宝贵的！”他总算把在农场劳动受苦的印迹留了一些给我们，我将细细地读，刻骨铭心地咀嚼他受苦受难的岁月是怎样度过的。他再也想不到，这两本日记对我是多么贵重的一笔财富啊！想到他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竟然还坚持记日记，我的心灵就震颤不已。我亲爱的人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多年后我才得知，在新添墩时，因有人

揭发，他曾烧过一本日记，这两本日记肯定是以后又续写下来的，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他又是怎样继续把日记记了下来，至今仍是个谜。在十年浩劫中，我知道在劫难逃，竟把他所有的日记，他写过的小说底稿，他写给我的信、我在十工农场记过的日记，以及我回兰州后守着孤独和心灵对话所记的日记，全都付之一炬。造反派来抄家时，我没有留给他们可资利用的片纸只字。但是，景超宝贵的日记、信件等等，也都烟飞灰灭，全部消失了。看到张贤亮根据劳教时的日记写的《我的菩提树》，我则痛悔不已。景超劳教时的日记，比张贤亮写的要更详实一些，其中写到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如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美学理论家的高尔泰。其中还提到傅作恭。傅作恭是起义将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弟弟，早在1960年3月就已遇难。景超的日记里，还有对饥饿的人们各种不同表现的简略描述，以及他自己心路历程的简单提及。

不过话说回来，在十年浩劫期间，我是无论怎样也无法把这些材料保存下来的。在反右斗争期间，不仅我们在报社的家被抄了，连我父母家都受到搜查。十年浩劫期间，我能把这些材料藏到哪里去呢？谁会担风险把它们藏下来，谁又是靠得住的呢？我销毁它们是惟一的选择。我在十年浩劫中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读者由此就会想见到我艰难险恶的处境。

我和孩子们搬到力行新村56号，瞒住了父亲一人，他那时显得反复无常，常常寻衅闹事，我怕他干扰我和孩子们的生活，觉得远远离开更好。这期间，有一天，我回父母家中取一样生活用品，我推开房门，家中无人，只见满地都是垃圾，家中惟一的书架被拉开斜放在一边，像是常年无人住堆放杂物的所在。父亲的神志不清更严重了，他把家里几只老式箱子上的铜匙件全部拆卸下来拿到街上卖了，但是箱子里比铜匙件更值钱的衣物，他没有注意到，还留在箱子里。

有一天，他跑到在报社工作的我的堂叔和保鼎家里，打听到我住在力行新村56号，竟怀抱一个旧铝制痰盂，坐在人力车上，一直拉到了大门前。我住的小屋在院子的第一间，我一出房门，就见他正抱着痰盂从人力车上走下。他见到我，说："我从你九爸家里出来，他说你住在这里。"看到他这等模样，我当即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到这里来干啥，你看你像啥样子嘛，你赶快回去！"我向人力车工人付了车钱，他就坐上人力车又走了。他怀抱铝制旧痰盂大概也是为了卖几个钱，当时市场物资奇缺，什么东西都能卖出。也许，他在抱着痰盂在自由市场上兜售时，突然想起应该找到我，就坐上人力车找来了。

此后，我就再没见到他。

5月初的一天上午，小妹凤仪突然来到家里，告诉我："大大死了。"我大吃一惊。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死了。我随即和小妹一同来到黄河沿前街的家中。

我和小妹来到家中时，父亲已停放在地上的木板上。妈妈正用湿毛巾擦拭他脸上

和手上的污垢，看来，他已多日没洗脸了。已是5月，他上身穿着三妹的一件蓝底带黄色花朵的棉袄，外套一件深灰色他自己的中山服上衣，领口没系好，所以三妹的花棉袄从领口处就能看见。他自己的几件旧衣服都不见了，当时就有人说，他是把几件衣服送进了洗染店，这也是他神志不清的表现，几件旧衣服哪里值得送洗染店。

父亲的突然离世，大家心里自然是悲凉的，但都流不下眼泪来。父亲一生也历经苦难，尽管这两年的饥肠辘辘改变了他，他对这个世界依然有许多眷恋，对未来依然有憧憬有希冀，他还想好好活下去，但是，他病态的胡闹，他对全家人的不信任，他的自私，使全家人都离开了他，谁也受不了他。到他咽气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咽气时，从心灵到肉体肯定都很痛苦。是房东黄家的人，夜里听到他痰壅塞到喉间呼吸困难发出很大响声，到早晨发现他已停止了呼吸，就急忙到外祖母家找到母亲和妹妹们通知了此事。全家人流不下眼泪来，是觉得父亲自己总算解脱了，大家也都解脱了。

母亲和妹妹们赶进家门时，父亲躺在炕上，原来铺在炕上的旧栽绒毯斜放在当地——估计父亲是想把栽绒毯从炕上取下拿去卖掉，但他已没有力气把栽绒毯拿出房门，更不可能拿到街上去卖。满地都是垃圾，脏得不像样子。再看水缸里竟是他拉下几天的大便。院子里有厕所，而不知他为什么竟然把大便拉在水缸里。家里也还有别的可拉大便的家什，不知他怎么竟挑中水缸当作了便桶。这就给母亲和妹妹们造成了难题，水缸不能不用，买新的没钱也买不到。幸好当时兰州城里还有专门挑水沿街叫卖的下苦人，这些下苦人只要给钱也不嫌脏，就叫来个卖水的，挑了三担水，方才把水缸清洗干净。这事当时瞒住了所有的人，是怕别人知道水缸里拉过大便，吃饭喝水恶心。我也只是多年后才听说。

到下午，我们的几家主要亲属都来了，父亲的同父异母弟弟、当工人的和保中来了，我的亲叔伯兄弟和温、和良也都来了，还有父亲的亲外甥、我的表兄王原泰也来了。当即打发表兄王原泰去兰工坪甘肃工业大学把正在上课的二妹凤翔叫回了家。

大家在一起商量如何料理后事，主要是准备一副棺木，向何处埋葬的事。当时兰州尚无火葬场，听说棺木已脱销，在大饥馑的日子里，许多老人经受不住饥饿的熬煎纷纷辞世，造成了棺木的脱销，少数家庭因买不到棺木，不得已用水泥制作成棺材抬埋老人。好在我那位在西北大学当了右派分子的兄弟和良有熟关系，可以托靠人把棺木买来，他当时在市民政局的下属单位工作，决定由他联系在大沙坪公墓找个墓穴，办理一切手续。当时一副棺木一百多元，我和母亲拿不出这笔钱，和温、和良资助了一部分，才凑够棺材钱。

没有人为父亲设立灵位，也没有任何祭奠，一切都是简之又简。

到第二天下午，棺木就拉来了。

第三天早晨，入殓，准备起运抬埋。

父亲没有老衣，他就穿着三妹的花棉袄进了棺木，身体周围用报纸包着烧败的炉灰垫了垫，使身体放得稳当些，不致摇动。保中叔提出用一床被子把身体盖一盖，而那是一床家里人已盖了多年尚可称之为完好的被子，我说："这是全家最好的一床被子，还是先顾活着的人罢。"保中叔便再什么话也没说，依从了我。

父亲的灵柩抬到大门口时，妈妈随后送着，突然号啕大哭了起来，他们夫妻一场，同甘共苦，父亲最后的日子如此凄凉，如此悲苦，咽气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心里一定很内疚，很难过……

我内心也十分凄楚，一个念头清晰地浮现在脑际："妈妈和女儿先后都成了寡妇！"

妈妈一向身体衰弱，大家没让她送葬。二妹凤翔这天头疼得厉害，也没去。一个架子车工人拉着灵柩，我们都步行，去大沙坪公墓要走十多里路。

到了墓地，仍无任何祭奠，把灵柩放入墓穴，填进土，再堆起个坟头，一切便完成了。

然后，仍然是各回各的家。

此后不久，妈妈和妹妹们清扫了房子，便从外祖母的家里搬回自己的家。

我从1月份回到兰州，不到4个月，先后有三位亲人辞世，他们都没有得什么大病，这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如果像早些年那样大家都安居乐业，吃饱肚子，他们肯定都不会匆匆离去。尽管由于在农场见到了太多的死亡，我感情已麻木冷漠，三位亲人的相继离去，在我的生活中仍然投下了阴影。

在这些日子，省建工局出了个奇事。省建工局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共八人，经"抢救"回来的只二人，其余六人均死亡。到5月间，有个已报死亡的人，戴着个大口罩突然出现在办公楼里向单位上报到，吓得凡见到他的人都乱跑一气，急忙躲避。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此人叫曹德明，上海人，原是建工局的技术员。在大饥馑的日子里，他确曾"死"过一次，当时已报了死亡，在"抢救人命"时未能回来。他"死"后已被拉去埋葬，埋他的人发现他还活着，就只在他的脚上盖了些土，并用裹他的棉被把他盖好，然后回去了。第二天，他又慢慢缓过劲来。有个放羊的人路过，他见到后就翻身坐起，求放羊人救他。放羊人当时家中也无吃喝，问他是哪里的。他说出了农场的站名，放羊人就扶他回到了站上。此时，站上的劳教人员已被"抢救"回了原单位，形势已好转。站上见他身体很弱，就留他在站上多住了些日子，恢复健康后才让他回原单位，所以他迟至5月份才回到单位。

至于那个埋葬他的人为什么见他活着却不将他再拉回去，据推测可能的原因是，当时农场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馍，他如把活人再拉回去，两个馍就不会给他。为了

两个馍，他把未咽气的曹德明留到了荒野里，但并未用土埋葬，给了他一条活路。

这件奇事却也多么悲惨可怖！

此时期，我在报社也参加一些轻微劳动。先是在报社门前的一块农田里，同从农场回来的诸位右派难友翻地，后来，又在力行新村56号院子里的粉坊干点杂活。粉坊是报社在困难时期因地制宜地办起的一个作坊，由木匠葛德明负责，批来豆类——有时是蚕豆，有时是榨过油的大豆豆饼——做粉条，其下脚料则用来喂猪，目的是为了给报社食堂自产一些副食，改善职工的生活。粉坊同我的住房在一排，活不多，一般在上午我还有些活干，下午就没事了。有时是有事葛师傅才叫我，没事就不叫。葛师傅是匠人，他把和好水的粉芡倒入一个有许多圆孔的大瓢，大瓢用绳子挂在房梁上，对着下面的大锅。到下粉时，葛师傅一只手抓住瓢把，一只手用力拍打瓢里稀稀的粉芡浆，粉芡浆均匀地进入大锅，便煮成了粉条。我现在已忘记当时我干了什么杂活，只记得把煮好的粉条捞入旁边不高的凉水缸后，葛师傅便招呼我用手捞起才漂凉了的粉条大吃一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当时大家的口粮仍很紧张，大吃一顿才煮出的粉条也是个大贴补呢。当时一起干杂活的，还有个临时工辛师傅，他是炊事员辛炳南的哥哥。葛师傅是个个头不高的山东汉子，中年人，为人挺好。他后来探亲回老家，回来还把从老家带来的山药等土特产送了一点给我。

我的两个儿子真是性格各异，伐夏活泼好动，胆子大，能干；小夏文静，听话，喜欢在家里做点事看书。平常我在家里擀面条，都是在床上放个小案板擀，从来没想过教他们。有一次，我刚揉好了面正准备擀，葛师傅有事喊我，我就去了。干完了活，回到家里，只见十岁的伐夏已将面擀开擀好了。可见他平日里早就注意观察我怎样擀面，已无师自通地掌握擀面的窍道，一旦有机会就急不可耐地实践，一次成功。我非常高兴。

小夏不太出去玩，我买回韭菜，他就说："妈，我剥吧！"就一声不吭，安安静静地把韭菜剥完。他才是一年级小学生，识字不多，家里有一二十本小人书，他就反反复复地翻来翻去地看，显出其乐无穷的样子。有时，我也读点童话故事，给弟兄俩听。

同院的李惠风，原来在农民报和我共过事。抗日战争初起之时，他在北京是青年学生，经后来担任中央领导的一位同志的动员，作为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在河北、山西一带跟日本鬼子打游击战。他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吃了大苦。后来他离开战场，跑到了大后方的兰州，娶妻生子，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1955年肃反时，报社对李惠风脱离革命的这一段历史进行审查。景超是个一般群众，休息时，看到李惠风思想负担很重的样子，就递给了他一只烟。这事，景超也许早就忘了，但李惠风铭记在心。得知景超已在农场活活饿死，我和孩子们过上了孤儿寡妇的悲惨生活，李惠风全家对我们就表现出特别的同情和关怀。过"五一"节菜铺供应一些好菜凭菜本购买，

有此情况，买菜的人照例排队很长，他老婆就把我们的菜本要去，她和大女儿早晨早早地就去排队，帮我们把菜买来。李惠风还向他熟悉的西北师院的几个右派学生介绍了我的情况，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个数学系的学生叫傅大塔。这几个右派学生原来也在农村劳动，和农民有联系，他们后来还送给我一些炒大豆，在我农场打饭的盆子里盛了有大半盆，这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礼物。过去，炒大豆在兰州人是零食，我从小就爱吃，也常吃，在困难时期，炒大豆可以顶粮，地摊上一毛钱也只能买到四五个，这大半盆子大豆，用地摊上的售价计算也是很值钱的。伐夏、小夏看到大豆都非常高兴。俩孩子都知道家里经济困难，伐夏说："妈，大豆我们别吃了，干脆我和小夏一块儿拿出去卖掉，能挣不少钱呢！"当时，我认为让孩子从小学做买卖不是好事，就没让他们去卖，而是自己吃了，三人吃得非常尽意。那时，谁家能一次吃那么多的大豆？

李惠风对右派很同情，他说："这几个大学生在农村劳动，农民都说，娃们不懂事，说话不注意，把毛爷爷得罪了。娃们还是好娃们，有个啥哩嘛！农民根本没把右派大学生当作阶级敌人看待。"当然，这也是他本人的心声。

这期间，原十工农场副场长邹士杰带领全家人回陕北探亲，返回的路上，他让家里人先回了，自己到报社找到杨康。然后，杨康请他在南关十字的一家饭馆吃饭，邀我和杜博智作陪。杨康是从玉门黄花农场回来的，原来对黄花农场没饿死人的情况就向我们作过一些介绍。这次在吃饭中，邹士杰坦率地说："在迁场前，我们就意识到粮食形势严峻，怕我们的职工挨饿，就向上级瞒了产，种粮食的人挨饿还怎么办农场？"他还说："去年我到北京学习，发现一起学习的人就有浮肿的，休息的时候，煮的吃白菜，我心想，北京的人供应这么不好，人都浮肿，粮食问题已成了全国性的，我们在下面更不能不注意。"

我问："我们去年11月每人每月的口粮定量降到了15斤，你们呢？"

邹士杰说："都是一个标准。可我们每个站自己都有粮食库存，都有磨。场里统一规定，每人每月的定量控制在三十一二斤，由站上掌握。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们那儿每人每月还能吃上三十一二斤，所以全场没饿死人。"听到这里，我心里真是恨透了迁场。如若不是迁场，我那些死难的难友们不是都还活得好好的么，他们都是多么优秀的人！

原十工农场的场长心里装着自己的职工，惟恐自己的职工挨饿，早早就进行考虑，做出安排，哪怕是得罪上级也在所不顾。瞒产少报在当时也是大罪名。他们硬是不怕自己担待反对党的粮食政策，犯政治立场的错误，而把全场职工的生命安全放到了第一位。当时在河西、在全省，像这样把人的生命放在了第一位予以捍卫的领导并不多，他们的功绩将彪炳千秋！

2000年春，和杜博智夫妇在甘肃日报社花园内

再回头看四工农场的书记场长，相比之下，他们虽口口声声讲党的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粮食政策如何等情，其实他们本人不过是些个目光短浅的势利小人，全农场饿死数百人，他们每天听汇报而不为所动，心硬似铁，他们连劳改系统硬性规定，在平常年景从劳改犯、就业人员及我等右派每月口粮中节约下来存放库房的口粮，在天天饿死人的情况下也不敢拿出救人，他们还算人吗？他们只求保住自己的官职地位党票，右派分子及“职工”的生命又算什么！而他们自己及其家属的生命，他们又都是尽心尽力地在卫护，不然，为什么全农场在大饥馑的日子里饿死的都是我的右派难友及“职工”。我作为幸存者写到这里，仍感到愤慨万分！

当然，邹士杰已知道，景超也是死难者。他当年曾出力想把景超从夹边沟农场的活地狱里设法救出，未果。最后，景超未能回来。怕引起我伤心落泪，在座的人都避而不提及景超。

邹士杰全家在老家待了些日子，粮票充裕，他给我们每人都送了几斤。

1961年9月9日，杜博智和张玉荣宣布结婚。他俩的结婚海报是这样写的：

> 兹定于今日下午二时半，在二楼会议室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将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

当时，报社还没给我们摘右派帽子，我们尚未进入人民的行列。海报的底稿由杜博智自己拟就，交鸣放时他的《快报》记者唐荫民书写张贴。他这样写，就是表明自己根本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内中的深意，只有他自己清楚。报社虽是政治上极敏感的单位，对于他的这则结婚海报也不好挑毛病。他当然事前就通知了我，我按时去会议室参加他们的婚礼表示祝贺。由于我们都还没摘帽，到了婚礼现场，就感到十分尴尬。

唐荫民主持婚礼。人事科长史秀杰以证婚人身份宣读结婚证书后说：今天是杜博智和张玉荣结婚的大喜日子，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在杜博智之后未加“同志”二字，会场气氛就显得热烈不足。我旁顾左右，只见杨康等诸位右派朋友一个也未到场，心理上就觉得有些孤单。桌子上摆的葵花子、喜糖稀稀拉拉，我只顾自个儿吃，也没人让，没人和我搭话说什么。杜博智的父亲千里迢迢赶来参加儿子的婚礼，老人讲了话，祝小两口美满幸福，白头偕老。几个小孩跑进来抢瓜子、喜糖，杜博智训斥了他们几句。正是这几个小孩前几个月见了他还用反右时的侮辱性话语对待他。报社的张铃、王富邦等人参加了婚礼，会议室坐满了人。总之，杜博智和张玉荣二位新人容光焕发，特别是张玉荣一直满面笑容。应大家的要求，他们谈了恋爱经过。他俩对婚姻的满意、幸福之极的感情溢于言表。

婚礼过后，我见到杨康抱怨他们都没去，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挺难受，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杨康说：“我们去干啥嘛！”原来他们早就打定主意不去，早就想到了会出现的尴尬，可我只想到应去祝贺，没想及其他。

到9月下旬，报社领导在四楼会议室召开干部大会，突然宣布对幸存的我们绝大多数及死难者王景超、赵秉仁都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当时未摘帽者只有汪志英一人，他后来申请回原籍渭源县农村劳动去了，行前也摘了帽子。杜博智代表摘帽人员在大会上发了言，说：“我们将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步前进。”他委婉地否定了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们摘了右派帽子，但景超未能回来等到这一天，使我悲痛不已，流泪不止。

我们苦苦挣扎了三年，戴着镣铐忍饥挨饿，险些丢了性命，才落得如今的结果，景超和赵秉仁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领导上宣布摘帽，只是轻松的一纸指令。听到这个宣布，我心里只有沉重，高兴不起来。头上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也只是暂时被搁置了起来。

1962年元月，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政治形势进一步宽松。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此时期，原《甘肃日报》总编辑阮迪民，前几年在甘肃省委任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期间，对推行第一书记张仲良的“左倾”蛮干路线负有责任，而被免去了部长及常委的职务，回到报社还当他的总编辑。犯了错误的阮迪民此次回到报社，工作作风大有转变，他每天接待报社的同志，虚心听取大家的各种意见，走到哪里都向同志们赔礼道歉。报社成立的甄别办公室迅速开展工作，很快就解决了在我们去河西后编辑部又揪出的一个右派集团的问题，其头头为原政治理论部的主任于维民。于维民参加工作早，是个老干部，下面还有王明庸、贾明玉等，一律宣布一风吹。我本来对自己定为右派分子就不服，觉得自己的问题很简单，只要甄别查清问题并不难。杨康、牛华生此时也

都跃跃欲试要求甄别。我想找阮迪民面谈一次，当时要求和他谈话的人很多，我又住在报社外面，不容易排上队，后来就写了封信给阮迪民。阮迪民接到信，立即让勤务员来家里找到我，要我去报社和他谈话。

阮迪民过去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威严，高高在上，不好接近。这次见面，威严的感觉没有了，他还满面笑容地问我："抽不抽烟？"他接到信立即和我谈话，主要是我的那封信打动了他。我在信上描述了在农场劳动生活的种种艰苦情景，说到了忍饥挨饿的苦况。当然也提及了失去景超对我和孩子造成的痛苦，但我胸怀宽阔，还大度地讲到，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笔直的大道，会有曲折走弯路。不论怎样，我仍坚信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无往而不胜。我能压抑个人生活中的最大不幸与悲痛写出如此表明心迹的信，阮迪民大概觉得很不易，再则，对我的文笔他也有点吃惊，比他原来设想的要好。在这次谈话中，我主要介绍了鸣放中自己写过几张大字报，其内容如何，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后来，我又见到原农民报总编辑薛剑英，此时，他正具体负责甄别工作。当我谈到所写《向×××同志进一言》的大字报，在反右期间被上纲为破坏流萤、×××之间的团结时，薛剑英说："本来就不团结嘛！"

一天，通知我去政治理论部编稿，部主任高书杰每天分我几篇稿子。我已几年没编过稿子，对我熟悉了的这份工作很投入。高书杰说我完成得很快。

看来，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

但是，在1962年9月下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强调到了"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高度，大反"翻案风"。给右派分子甄别被指责为"猖狂之至"。阮迪民又被免去《甘肃日报》总编辑的职务，给右派分子搞甄别成为一大罪状。

我的甄别梦化为泡影。

1962年9月，我和牛华生被正式安排在资料室工作。杜博智从1961年国庆节后就去了校对科。杨康、杨骁、梁军、杜绍宇等人，先后都自找门路，到外单位工作去了。

此后，我建立了新的家庭。当时，他的右派分子帽子已经摘掉，原为西北民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名叫白惠宇。他原来独身，和我结婚后，我们都想再添一个孩子，我想再要个女儿，但农场的饥饿，挣扎于死亡线上，使我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出现习惯性流产，我未能再生育。他对俩儿子非常好，亲如已出。1979年右派问题平反。1983年，他患癌症又离我而去。

后来，我在甘肃日报社经受了"四清"的磨难，在十年浩劫中再遭浩劫。

23. 三十年后的祭奠

1991年8月21日晚，我和伐夏乘西去的243次列车，终于开始了准备已久的高台之行。这次，我是带着大儿子伐夏去祭奠我们的亲人的。三十年前，我从安西乘东行的列车在茫茫的雪原里于明水下火车后，暗夜里踏着三四寸厚的积雪，独自步行近十里路，直奔我丈夫王景超劳动教养的农场所在之地，原来想的是尽一切努力留住他垂危的生命。但他已在一个月前遇难，已经活活饿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三十年来，我们从未祭奠过他，严酷的政治逼迫我们隔绝同他的亲情。我很少对孩子们说起他们的父亲生前的事，怕的是因此而祸及孩子们，孩子们如果对他们曾是极右分子的父亲抱有同情，无论在学校或是社会上都极难立足。我们在尽量忘却他。在艰难的人生之旅的跋涉中，一天天、一年年地忘记他。然而，“不思量，自难忘”。这一切又怎能忘记？

1978至1979年，甘肃日报社在总编辑刘爱芝的领导下，不仅平反了文革浩劫中的冤假错案，而且也平反了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自然我们的错划右派问题也先后都得到“改正”。景超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形象，重新在人们的心头站立，他惹祸在身的三篇杂文重新得到评价。在四川阆中曾同他一起就读于国立四中的陈三省，在我于1979年调到西北民族学院工作后来家看我，犹不禁失声而哭。陈三省原也是错划右派，现错划右派问题“改正”了。他活着，景超却在二十年前，已离我们而去。陈三省是个不多话感情不外露的人，过去和景超的友谊不算很深，景超的惨死，拨动了他感情深处沉默了多年的心弦……多年来未能说出的话，在泪水的涌流中畅叙了一切。我压抑了多年，在心底深埋了多年的悲痛，又怎能消失？远在新疆的四弟景刚从甘肃日报社打听到我的住址，同伐夏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们又相对而哭……他走了，他是把无穷无尽的苦难留给了我，把人世间应有尽有的悲痛留给了我。我奋

力跋涉，苦苦挣扎，已付出了大半生的血和泪。年华在鬓边增添了的白发里悄悄流失，岁月在向一个无辜者随意抛掷过来的各种伤害和凌辱中不经意地走过。错划右派问题“改正”了，生活对我的蹂躏也并未终结。我好苦、好累哟！这一切，全因为他已离去，他没能扶我一把，对这一切他全然不知道，他只是默默地走了，走了。

三十年前，我离开他太匆忙，我未能找到他的坟茔，未能在他的坟茔前倾诉衷肠，倾倒苦水，他会怪罪我吗？也许，他曾等待倾听我的哭诉，等待倾听我凄凉的哭声里的情和爱，孤独寂寞的他又怎忍心起身呢？他对人世间还有着万千的留恋撕扯着他已不再跳动了的心。

正当英年的他被活活饿死。四十年杳无音讯的大哥景衡，突然在1988年从海峡彼岸给老家来了信。我写给大哥的第一封信只能是把景超的遇难告诉他。这对于大哥委实是太意外了，他说接到信后“如五雷击顶”，“不禁老泪直流，悲痛万分”。然后，大哥回到了老家河北省无极县苏村。他见到尚健在的舅母时，大哭：“我没有把景超照顾好。”9月下旬，大哥、三弟景凯、四弟景刚及景凯的女儿艳梅、女婿一行，来到了兰州我的家中。在吃第一餐团圆饭时，大哥举起酒杯站了起来，哽咽着想说几句

1984年，在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任教时的和凤鸣

话，从他的喉间却只挤出了几个字："今天，我同自己的家人团聚……"说着，泪如雨下，无法再说下去了。这泪水，这未能尽言的祝酒辞，正是最郑重地表达了大哥对此次团聚的拳拳之心。他心中的抱憾尽在不言中。大家都哭了。家宴上惟独少了在风华正茂的年岁就离开人世的景超，使整个宴席变得冷落了。此时，我的心在滴血，在哭喊。我多么想在家人们面前倾诉我多年来郁积的悲苦和委屈啊！但是，我不能也不愿大哥在乍到兰州的第一天过分悲伤，因为他已经是古稀的老人了。我尽量控制着眼泪，景刚向我递来了一张餐巾纸让我擦泪。擦吧，擦吧！在这充满了家人的亲情，充满了喜庆气氛的团聚时刻，我不能让眼泪任意涌流。

多年来，我极少放纵自己感情的奔涌，因为我没有权利任意地悲伤，更没有权利在忧伤中消磨时日。二十年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现实，只准许我接受命运的摆布，谁也没有给我权利，让我任意悲伤！在失去景超的最初的日子里，除了同情我的难友们曾给予我许多至今还让我感激在心、实实在在的关怀和帮助以外，那些曾和我共事多年、朝夕相处的领导和"同志"们（那时我还没"摘帽"，没有人认为我是他们的"同志"）有谁关心过我，安慰过我吗！那时候，谁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过景超。我心中最亲爱、占有最重要位置的人，在别人眼里是"十恶不赦"的极右分子，有谁敢再提起他呢！仿佛他是极自然地从地球上消失了，谁也无须再说及他，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在我是理所当然的。而我的身边尚依傍着两个不到十岁的孤儿，我该怎么办？我的路在哪里？那些曾是我的"同志"的许多人，此时都冷漠地疏远、回避着我，对我和两个孤儿视若未见，权当路人。那时候，正义、善良、热诚，对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都被"政治"湮没了。特别是在作为党的喉舌及驯服工具的甘肃日报社，为了自己的生存，人们都甘当驯服工具，服服帖帖，这就使我的境遇格外地增添了许多悲苦，许多凄凉。但是，景超留给我，要我做妻子的一人来承担的一切，我必须全部地担当下来。在这冷酷无情的世界上，我所要做的只能是苦苦挣扎，踏着苦难，踩着忧伤，走我自己的路。多年来，正是这苦苦的挣扎，重新铸造了我的性格，铁石心肠就是我，我变得很少动感情，很少流泪了。

大哥一行在兰州只住了三天，我们就开始了新疆之行。四弟景刚在石河子建设兵团的处境依然很糟。这次新疆之行的目的地，就是他在石河子的家。我们是抱着幻想，想借大哥的"东风"，争取让他恢复工作。几年前，他所在的单位143团精简了他，让因公负伤的四弟自谋生活，这种做法显然没道理。

我们的新疆之行，达到了当今中国人旅行的一流水平。我们有四个软卧铺位，也就是说独占软卧车厢的一个包间。不用说软卧车票是大哥掏钱买的，而且是凭大哥的台胞证才一次购得了四张。大哥的服役够长的了，"七七"事变后，他就是军人，跟日本鬼子在战场上拼杀过。但在解放战争初期，他被解放军俘虏过。这样，到退役

时，他才只是个中校衔。但是，他的“养老俸”却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景凯作为离休干部享受县级待遇，我作为副教授也行将退休，我们都希望手头宽裕一点。这一年失控的物价，却十分令人不安。

当晚近午夜时，我们各自就寝。

第二天一早，列车奔驰在河西走廊上，行程已很远了，窗外已是另一派景色。漫漫戈壁伸展到无边的天际，火车南侧的远处，一抹起伏的窄窄的山脉蜿蜒而去，始终又和列车的走向平行，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祁连山了。橙红色的太阳跳出地平线不久，但一点也不耀眼，它色彩鲜活，又大又圆。只有偶尔出现的排成了队的钻天杨尚未飘零的树叶闪着疏落的绿光。啊，我久违了的河西走廊！我梦魂里久已失落却又魅力无限的戈壁风光！你苍凉、辽阔的存在，证明了我的过去，我过去的存在！你是历史的见证人。重逢重重地撞击着我感情的闸门，我不平静的思绪被翻搅得如同滔滔巨浪中颠簸着的一叶扁舟。我知道，凝滞封闭了几十年的往事，将会一幕幕重现，沉重的幕布要拉开了。

列车在继续前进中。

窗外闪过大片草原。一团团、一簇簇的野草行将枯萎。我曾工作过的甘南把草原叫海子，如果这也是一片海，海面上出现的有红、黄相间的浪花，白白的羊只在浪花里悠闲地浮沉游弋。突然，似幻又似真，我分明地看见景超身着整洁的深灰色咔叽中山服，白皙瘦弱的面庞执拗地向着我。他热切地望着我们的车窗，急急地从羊群中迎面奔跑而来……他奔跑的速度赶不上车轮前进的速度，随着列车的前进，不见了他奔跑的身影。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草地里，羊群中，一次又一次顽强地向我，向着我们的车厢迎面跑来。

前面出现了白杨、沙枣树掩映着的村落，房顶一概是后高前低，如徐缓倾斜的小块坡地，一块又一块，高高低低，大小不一。院墙都不高。墙外，一墩墩发黄了的芨芨草错落地出现在路边，周遭夹着各种杂草。景超从那边后墙的拐角处出现，绕过芨芨草墩，又急急穿行在小径中，奔跑而来……飞驶的列车又越过了他。

在列车的隆隆前进中，一片无垠的新绿伸向远方，是才出土的冬麦给大地涂抹了这鲜艳的颜料。无垠绿色上镶嵌着条条阡陌，景超又从阡陌上向我奔跑而来。他一点也没老，他在用年轻强壮的双腿用力奔跑。他一次又一次地被列车超越，一次又一次地继续出现，继续拼命飞奔……啊，这无结果，却又永不休止的奔跑！

这情景勾走了我的魂魄。我痴痴地呆在了窗前。在火车的飞驶中，我一连几个钟头地望着窗外……三十多年来，梦里的他也从未这么清晰这么执拗地出现过。我觉得是他听到了我心灵的呼唤，才这样出现在面前……他跟前跟后，苦苦地追赶火车，追赶妻子，不断出现在车窗外面，是为了细细地瞅一瞅衰老了的命苦的妻子，也让我好

右派当年耕种的土地上生长的茂盛的芨芨草

好地瞅瞅他。也许，他知道在这列火车上不仅坐着我，近半个世纪杳无音讯的大哥从海峡彼岸归来，使家人都聚在了一起，他是想尝试着冲破另一个世界的门槛，也来参加这次聚会，这来之不易的聚会。然而，他的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无论怎样，他已是个悲惨的失败者。

我用力闭住了眼睛，让苦涩的眼泪流进心里，苦极了的心沉极了。我在默默中忍受着这不堪承受的重负，听到了泪水在心中倾轧激荡的声音。

我们在景刚家住了十天。用大哥的钱请客，周旋，费唇舌，写报告，也被请，得到各种以后一概未能实现的承诺。然后，在乌鲁木齐买了火车票东返。乌鲁木齐真是个具有民族特色的美丽城市，商店里出售的维族小花帽十分漂亮。

火车东返时，我们一路未作停留，因为天已寒冷，乌鲁木齐已开始飘雪，大哥得赶紧回台湾。

在行经高台明水站时，我不禁放声大哭了。

我哭得死去活来，全然不顾是在火车上。

三十年来，我苦熬苦度，从来没有和家人见过面，没有和这么多亲人团聚过，更没有在家人面前开怀痛哭过，让我哭个够吧！我靠在门上哭，趴在铺上哭。大哥替我脱去了鞋，将我的双腿挪到铺上。我依然大哭不已，在铺上翻滚着哭！我要把这辈子该流尽的泪水，畅快地流个够！不堪回首的往事，在痛哭声中，从记忆深处一幕幕走出……

景凯和景刚躺在上铺悄没声息。他们也在流泪吧，他们能说什么呢？

大哥声音颤抖，哽咽着说："弟妹，你这样哭，我以后还怎么回来……"他大约认为这是阻止我大哭的最恰当的理由。然而，不是大哥的归来，不是同家人团聚，几

十年来，我何曾畅快地哭过？几十年来，为活活饿死的亲人痛哭，会认为是跟党记仇而不被允许，为极右分子的丈夫死去而痛哭，更被认为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会影响到我的生存，孩子们的生存。悲痛有罪！生离死别的痛楚，我一直苦苦地压抑着强忍着。在自己家人面前，我还要忍耐还要沉默地咽下这一切吗？不要阻止我的恸哭，不要阻止！

……

我又一次经过了高台，经过了明水，我从他长眠的地方擦身而过，但我未能哭倒在他的坟茔前向他诉说一切，几十年的血和泪，凌辱与苦难，扭曲与抗争，这已是历史了，说也说不完！我要把全家人团聚的事告诉他，把分别了四十年的大哥从海峡彼岸返回故土同家人团聚的事告诉他，你知道吗，大哥返回故土和家人团聚时，最最伤心的，就是少了一个你！

大哥回台湾后，我急切地寻找当年在安西劳动时的难友。到1990年春节时，终于与在十工农场同台演出的侍峒山见了面。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使我们的难友情更醇更深。当时，本书的前几章已开始写了。侍峒山告诉了我许多难友的通讯地址。然后，

坟场边茂盛的植物默默无语

就有了我和在高台县国营南华林场工作的曹宗华的通信。

曹宗华当年不到十八岁就戴上了帽子。三十年一弹指，他也五十岁了，他在信中称我“尊敬的和大姐”，说，接到来信，“我高兴得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好”，问我：这些年“不知大姐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详情以后请大姐慢慢再谈谈”。我万万也没想到，他在这封信里竟告诉我：“前几年我被分配到明水河农场当小头儿，闲暇时带着家属孩子闲逛，看到这里的大片坟地。我曾听说你老伴的遗骨抛在这里，我一直记着这件事。但我不知他的姓名，请你告诉我一声，我将尽力帮这个忙，将他的坟墓找到。”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决定要做的事吗！我太感谢了，我感谢老天终于睁开了眼睛，让宗华来帮助我了却我多年未了的夙愿。这是宗华在1990年7月6日写的信，我当即决定略做准备到八九月天气稍凉，就奔赴高台。但心中仍有疑惑，当年未能见到的坟墓，三十年后还能找到吗？

8月下旬，景刚因事路过兰州，我说及去高台的打算，他决定和我一同前往。为了稳妥起见，先写信给宗华，请他先走一趟明水看看是否能找到景超的坟墓。宗华的复信尚未收到，我的颈椎病又复发，且症状严重，眩晕不已，血压也上升了。景刚只好一人回了新疆。后来，宗华回信说，他花了两天的时间，把每个坟头前的碑石都翻了一遍，可惜因年代久远，只有一个叫蒋吉生的名字还可以认清，别的一概看不清了。他对于我们联系太晚，深感抱恨，说：“如果在十年前接到你的信，此事一定能办好。因为十年前所有碑石上的名字还都能认清。”他还说：“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孩子们，更对不起死去的景超兄。”他的自疚完全是出于难友之间深厚的情谊，这又哪能怪罪于他呢！

当年11月28日，他还特意来兰州看望我们全家。

1991年8月22日下午，我和伐夏来到了高台县宗华家中。不料，从第二天起，便阴雨连绵。我们无法立即到明水去祭奠亲人，那里距县城还有近二十公里之遥，不通车。

高台少有阴雨。连续五天的阴雨，难道是明水的死难者及我的亲人在向我挥泪倾诉他们的冤屈苦衷？三十年了，他们含冤而死，受尽各种残酷的折磨被迫害致死，每个人都有着流不尽的血和泪。他们的阴灵会安静地回归大地吗？

高台有不少难友，此次，我同许登浩、陈增荣、阎廷梁、方正儒夫妇都见面了。三十年后的重逢，又使大家感慨万端。叙旧，使我们沉入到三十年前不堪回首的往事里。当年，我们个个都青春年少，少不更事的我们，哪里懂得中国的政治。这三十年来，我们每个人又都各有自己的一部苦难史，各有各的故事。1979年后，情况改善了些，但国事仍令人担忧，各地出现的严重的腐败现象，已危及了国计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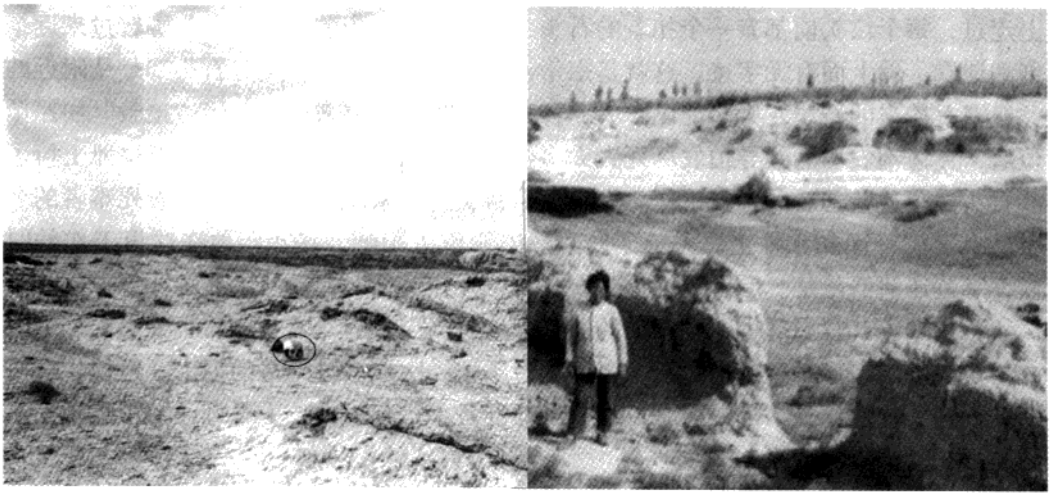
我同难友们一起对往事的辛酸追忆，丰富了本书的各个章节，使我坚定了把本书

写下去的信心。我认为，如实地写出我们的苦难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1991年8月30日，天终于放晴。我和伐夏由宗华带路向明水出发。宗华用自行车带着我（因为我不会骑车），伐夏也骑一辆自行车。宗华在前引导，用飞快的速度蹬车，伐夏紧紧跟上。车行到南华——即宗华工作的南华林场所在地，一直都是柏油路，而后拐入一条岔道向东南继续前行，便是沙砾的便道了。起先路边还有些树干扭曲枝条弯来弯去的沙枣树林，也有白杨树林，我们在树林中穿行了一阵，便进入移民基地。树林没有了，车走人行，已形成一条宽阔的戈壁石路。路两边，有着新栽的稀稀落落的小白杨树。再前行，路边的小白杨树没有了，移民的新房开始出现。房屋周围，都有绿树庄稼，对于移民来说，已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然而，三十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悲剧，移民们知道吗？我困惑，我不解，难道新的生活必须要累累白骨做铺垫而后才能出现？心情沉重的我坐在自行车后面，只觉颠簸得头疼。

到了，坟地就在戈壁石路南侧，翻过一道沙梁，再前行几百步，一大片荒冢便赫然眼前。

三十年岁月的风霜依然没有抹去裹尸的棉被上的颜色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亲人的坟冢今在何处？

我的亲人，你在哪里？

正深秋天气，坟地上一片沉寂，没有鸟飞，没有虫鸣，万籁无声。瓦灰色的天幕上高高挂着的太阳，此时惨白着个脸，把白色的光抛洒在沉默了三十年的每个坟头上。低低的坟头泛着惨淡的白光，憔悴委顿，依旧沉默不语，只有一丛丛伴着它们的小草在瑟缩的抖动中似乎想说些什么。极目望去，虽有一道道沙梁的阻隔，远远近近的坟头，在有些地块密密麻麻，有些地块疏疏落落。沙梁下，往往有一排低矮的坟头，看样子是为了便于从沙梁上取土掩埋，从上往下铲土要省劲得多。掩埋死难者的难友也有气无力，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是怎么方便，怎么省劲，便怎么掩埋。据说当年掩埋一个死难者就给两个馍，有些身体较好的人以掩埋死难者来补充可怜有限的口粮。

忽然，我觉得在这死寂的另一个世界里的灵魂们，都用企盼的眼睛，从黑暗的墓穴里盯着我们三人。三十年过去了，他们有多少话要说哟！苦难已成过去，他们沉默得已经太久了。据宗华说，前面河滩边的一处地方，每到夜深人静之时，聚集在一起的灵魂们便嘈嘈杂杂地说个不停。他们无法在人世间说的话，在另一个世界里得以自由地交谈，随便地说。躲在黑暗处偷听的人们虽听不真切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一旦有人咳嗽或说话发出了声音，倏忽间，聚谈的灵魂们便立即转移了，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低低的嘈杂声又重新响起。宗华说，他自己就曾在这里偷听过灵魂们的谈话，虽听得不真切，但他确实听到了。原来，他们只要躲开活着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言论完全自由，他们谈得兴起，无止无休……

当然，我们对找到自己的亲人，要作最大的努力。宗华领着我和伐夏从每个坟头上走过，每个坟头前都有一个扣着的石头，我们捡起坟头前扣着的石头翻转过来逐个细细地看，看上面有无字迹。这就是宗华信上所说的碑石了。这些石头都是从附近的戈壁滩上捡来的石块，大多如巴掌大，各种形状都有。原来，我们经“抢救”回原单位后，夹边沟农场的领导怕农场死人太多会办他们的罪，因为恐惧才从戈壁滩上捡了些石头做了这些善后的补救工作。宗华说，石头上原来用红漆或墨汁写着死难者的名字，有字的一面扣在地上，是为了防止风吹雨淋太阳晒。1979年他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字迹还清清楚楚。原省建工局党委书记也死在这里，他的儿子在东北某橡胶厂当厂长，1979年就曾来这里寻找父亲的遗骨。这位当厂长的儿子是拿着省委书记宋平的介绍信来的。宗华对于这里二百多名死难者不止一次地洒过同情的泪水，经他积极协助，找到了这位党委书记的遗骨，当儿子的准备了一副棺木，千恩万谢地用汽车把遗骨拉回故里。

唉，我的亲人，三十年前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哪里知道那些毫无人性的管教干部竟然会骗我，他们没有让队里掩埋了你、知道你的坟茔的难友带我去向你做最后的诀别……三十年后，我和儿子伐夏再次来到坟地，我们轻步走过一个个的荒冢，你能听到我们的脚步声，知道是我们在找你吗？

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坟地里，我们寻寻觅觅，觅觅寻寻，翻起每一个可能写着死难者姓名的石头，看了又看。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三十年岁月的剥蚀，已经消融了石头上的字迹，有些变得斑斑点点，有些踪迹全无。在一片低洼处，坟头密密麻麻，而每个坟的底部只有一二尺宽，稍稍隆起的坟头前，仍各放一块曾经写过死难者姓名的石头，如果不是宗华说，真认不出这儿也是坟地。三十年来，死难者的亲属们毫无疑问也一直是被株连的受害者，三十个清明节过去了，他们未能向自己的亲人凭吊祭奠，扫墓添土。正如李华在《吊古战场文》中所说：“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三十年前此处无战事，没有刀光剑影，更无炮声隆隆，而此情此景，竟与古战场之“伤心惨目”，何其相似乃尔。古战场上战死的将士，“无贵无贱，同为枯骨”，确也令人心寒，但战死的就他自己，朝廷不会向战死疆场的将领和士兵问罪，死去的将士一了百了。这里的死难者身后之事尚未了，他们的亲属受到的株连、迫害，至少又延续了二十年，且株连迫害一大片。胆战心惊的亲属们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往往便也不愿再去思念使自己惹祸在身的早已死在戈壁深处的亲人了。

我们还见到一个坟茔，周遭用小卵石围了一圈，标记明显，看来，三十年前，死难者的亲人曾找到了他的坟茔，作出明显的标记，准备将他的尸骨迁走。但三十年过去了，亲人们未能再来，不知是何种变故，使事与愿违，死难者仍然长眠在戈壁滩上的一片荒冢之中……三十年的沧桑，三十年的政治大动荡，谁又能逆料，死难者的亲

人就不会再遭劫难！

悼念有罪，吊祭有罪。

三十年来，我和伐夏不也是第一次来祭奠亲人吗！

我们仍逐个地翻看石头，仍然踪迹全无。

宗华又领我们来到一个无名的尸身前。这是宗华去年来寻找景超的坟冢时就看见了的。一年又过去了，尸身已挪了地方。这是一个只有上半身的男尸，他的黑发还覆盖在半个头颅上，半个头颅闪着瘆人的白光，他身着一件深红对襟绒衣，肩头上补着一块补丁，补丁平平整整地连在领子上，绒衣的深红色其实已被强烈的日光晒得完会褪了色，只有在侧身的背阴处才能分辨出来，破损的绒衣已无法遮盖住尸身，白白的肋骨排列整齐。从遥远的记忆里，我突然想起，我的亲人原来也有一件旧了的深红色对襟绒衣，临离开兰州前，为了迎接今后的艰苦岁月，我曾把前襟上的口袋撕下，帮他补到了肩头的破损处，他该不是……啊，他该不是我正寻找的亲人？宗华急忙解释："我去年来的时候，红绒衣里面穿的是一种红格的衬衣看得很清楚，我不是问过你，你说景超老哥没有这样的衬衣嘛。"伐夏也急忙说："那时候穿这种红绒衣的人很多。"我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此刻我心沉沉，思绪万千，不知道他们的话是可信还是不可信。也许，他只是一位陌生者，我很愿意相信他是一位陌生者。这位暴尸于荒野的陌生者其情状也太惨了。肯定，他也是一个无辜者！

在一个坟头上，露出了死难者龇着整整齐齐的上牙，大张着嘴，下牙只露出了四五个，下颌骨埋在土中。这位死难者在闭眼睛之前尚在痛苦地呼号，他向这个不公正的世道发出愤怒的控诉。掩埋他的难友力不从心，没能盖上足够的土。三十年来，他一直大张着嘴，向老天爷控诉他的苦难冤屈，他不甘心，不甘心啊！

偌大的坟地，还散落着白森森的骷髅和各种零散的人骨。我们走遍坟地的角角落落，仍只看到写着"蒋吉生"的石头，另发现了一块写着"梁庭明"的石头。他们的亲人又在何处？

满目凄凉，满腔悲愤。

我们选择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段，用带来的汾酒洒了个圆圈——我记得他当年爱喝汾酒，中间放了些麦草，还有宗华的女儿帮助印制的纸钱，早上才蒸好的花卷，几只才上市的桃子做了祭品。一切都随乡从俗。宗华点燃了纸钱、麦草，我们跪伏在地，开始了祭奠。

我和伐夏从兰州出发时，带来了挽联、挽幛及我填写的《水调歌头》。

伐夏先念了挽联，他喊了声："爸爸！"三十年来，他这是第一次呼唤爸爸，第一次和爸爸说话。挽联是我拟就：

少小逢战乱，坎坷辛酸，健笔成文章，狂狷无畏风骨坚。晴空霹雳，铮铮傲骨折摧，士人受辱，忠诚罹难，骨抛明水无着，白沙荒冢何惨惨。

英年恸早殇，劳役饥饿，无辜受惩罚，“三字”罪名不须活。亲人断肠，声声血泪呼唤，魂兮有知，梦里应归，子媳孙儿绕身，天伦共享亦融融。

我哭着喊道：“景超，景超，我们在和你说话，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此时，天色大晴，骄阳高照，微风徐来，纸钱和麦草在焚烧中呼呼作响，伐夏把用宣纸写就的挽联投向火中，火舌立即吞没了它。我觉得景超就在身边，他在仔细地听伐夏念挽联，字字句句都听得真切，他也听到了我的哭喊，在火舌的呼呼作响中，他仿佛回应着什么。

我觉得在众多死难者的坟冢前，祭奠自己的亲人，对更多的死难者也应献上自己的一片心，还拟就了献给景超及众难友的一副短联：

千古奇冤莫须有；
百代忠魂归去来。

杜博智和杨康是我们一同离开兰州，坐火车去河西受苦受难的好友，当时同行者六人，幸存者只留下了我们三人。他俩得知我要祭奠景超，也写就了一幅挽幛：

悼景超同志：

刚正不阿，针砭时弊；
雄文三篇，含冤廿载；
受尽磨难，宁死不屈；
奇耻已雪，望君安息。

杨康　杜博智敬挽

以上挽联、挽幛均由宗华代念。每一念完，都投向正在燃烧的火堆。

当伐夏把我填好的《水调歌头》拿出要我念时，我哭倒在地，无法念下去。我临行前填就的词，倾吐了我大半生的苦衷，语短情长，字字血，声声泪。我的亲人，我想要说给你听的，又岂止是一首词里所能包容得下的。如果能够留住时光，让我把30年来积蓄在心窝里的话都说给你听，长眠在黄泉之下的你还会沉默不语吗?

是了，这首只能由我来念的《水调歌头》，我得念下去。

泣血何人知，
肠断有谁怜！
茫茫瀚海无语，
与我共悲悯。
冤未平人已去，
此情痛煞凄绝，
惊破戈壁天！
同蹈苦和难，
良人不回还。

声喑噎，
心破碎，
恨绵绵。
沧桑巨变，
万般痛楚未稍减。
血泪往昔忍顾，
明水一别卅载，
尸骨未能见，
荒冢无觅处，
长哭问苍天！

宗华涕泪滂沱。为我们家的苦难，他已流泪多次了，为未能找到景超的坟墓，他去年一个人就曾在坟地边暗自流泪。在兰州我们的家里相聚时，他曾在酒后伏在桌子上，悔恨得用手捶打自己的膝头，一下又一下……伐夏拿来了卫生纸给他擦泪水鼻涕。此时，面对一片荒冢，他哭声说道："景超老哥，众位难友，你们的悲惨下场都是历史造成的，谁也无能为力，今天我们来祭奠你们，你们就把亲人见了。三十年来，我们是头一次来，你们要体谅……"

祭奠终了，伐夏拍下了应拍的场景。

穿过坟地时，多年前修起的地埂尚依稀可见。宗华说："现在这里的移民都是靠机井灌溉，先打好机井，再动员移民迁入，每个人都发二百元的安家费。那时，这里完全是一片干滩，就把那么多人开进来种田，人不饿死才怪，都是些大知识分子、高干！"当年，不知是哪个当权者喉咙里打了个呼噜，众多受难者便死定在这里了。

宗华带我们来到了当年难友们居住生活过的河沟里，河沟两岸的崖壁上，有不少

坍塌了的窑洞，洞连着洞，还有不少没有了顶盖的地窝子。有一个地窝子分里外间，外间很大，里间小，兴许是当年的伙房。里间是炊事员们居住的地方。《白毛女》中，喜儿还“半间草屋做新房”。这里因常年饥饿羸弱不堪的受难者们，从1960年秋后被驱赶到这里，自己动手挖窑洞，修地窝子，然后住进潮湿阴暗的地窝子和窑洞里，直到闭上他们很难闭合的双眼。人啊人，人把自己的同类不当人的时候，无论多么残忍的事情都会出现，当年这里的管教干部们又有谁认为他们自己住在有火炉暖烘烘的房子里，而让那些劳教分子们常年住窑洞地窝子有丝毫的不合理吗？没有，当时谁也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不然，结局便不会这么凄惨。

有个小窑洞颇有些奇特。这个窑洞挖得很细致，洞里两对面各挖一个似床的小土台，土台上方各有一个半圆形凹进去的小土台，看来是当年放小煤油灯的所在，小土台有二尺多长，还可以放些别的杂物，上方已被煤油灯的黑烟熏黑。门口还有一个挖就的小灶，可以做吃的。整齐的洞门完好无损，上面还有镂刻在土壁上的一个“求”字，肯定下面还有别的什么字，“求生”？“求实”？因风雨的剥蚀已毫无踪迹。这是什么人住过的窑洞呢？

我们穿过移民村。这里作为两西建设的移民基地，已从静宁、定西、永靖等县迁来不少移民在这里，定居四五年了。新房都已盖起，高高大大，周围的地埂上向日葵长得十分茂盛，已低垂着脑袋，就要向主人提供奉献了，小麦早已收割过，条田里正灌浆的玉米长得红红火火。宗华说，移民们把那一大片荒冢，叫做“乱葬岗”。死难者的长眠之地，被取的这个名字令人不寒而栗。至今，一般人白天也不敢从那里走过，他们害怕孤魂野鬼的骚扰。移民们是务实的，他们对身边的有些事并不深思。他们哪里知道，“乱葬岗”里的死难者正是开发这片热土的先行者。三十多年前，他们作为“有罪之人”被驱赶到这片难以生存的不毛之地，然后又陆续被埋葬。被埋葬的是他们的肉身，而这个事实本身向世人述说着的一切，中国人早已在做着进一步的思考。这些死难者会一直沉默不语吗？他们难道只是在等待，要让历史的烟尘将他们埋葬得无影无踪，灰飞烟灭？

宗华带着我在崎岖不平的田间小路上骑了一阵自行车，又走了一阵路，伐夏随后。又是一个干涸了的河沟。两辆自行车放在地边，我们从岸上走进谷底。宗华说：这里还有另一处坟地。我们沿着河谷上上下下走了一阵，却未找到。我走不动了，坐在从河岸的崖壁上跌落的大土块上休息，让他俩继续找。经过询问移民，原来坟地不在这道河沟里，爬上岸来，再找。

在一处麦场附近，找到了坟地。不远处，移民们正在打土坯，盖新房。宗华对这片坟地仍是熟悉的，去年他也来过这里，这里成形的坟冢只有十来个，我们仍在仔细地翻看了坟前的石头，仍然模糊不清，一无所获。宗华说：“为了平地，推土机已把

许多坟头推平了。”另有一片状似荒滩的坟地，岁月已将坟头全埋平了。因为早就知道这里有两处坟地，不知我们的亲人埋在何处。在兰州，凡挽联、挽幛，我填写的《水调歌头》，都誊写了两份，以便在两处祭奠时备用。此时，我心里认定景超不会埋葬在这里。三十年前我所到的大队，没有穿越过河谷低地，没有人会穿过河谷来埋葬他。

祭奠仍如仪进行。

一个闪着白森森的寒光的大腿骨就在近边……

亲人的悲恸会有停止的时候，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亲人已不再悲恸，因为，在中国，人生之旅的跋涉已耗尽了他们的精神劲儿，生存维艰，生离死别又算什么呢，该忘却的就忘却吧！

但是，历史老人不会忘记这一切。

9月初，我和伐夏回到了兰州的家里。去冲洗胶卷时，才发现在高台的底片全部报废，伐夏装胶卷时没把胶卷挂好，实际是一张也没照上。这使我大惊失色，寝食不安。

三十年来，我也许是惟一去祭奠自己的亲人，也祭奠众位难友的人，我见到了那里的凄惨景象。我的心里不仅装着自己亲人的苦难，把已经过去多年的苦难又重新温习了一遍，我心里更装满了众多死难者的共同苦难。酒泉夹边沟那边绵延二里多路暴露于荒野的累累白骨，不是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987年才被归总重新掩埋？

他们一个个地倒下了，由于饥饿，由于苦役，也由于各种惨不忍睹的非人折磨，逼迫他们共同走向死亡。这一事实简单些说就是如此。可是，他们作为单个的人，每个人又都有着自己个别的极难类同的痛苦。他们在告别人世时各自都有难以言说的痛苦，难以言说的苦衷。他们的遗恨，又有谁知道？有谁能说清楚呢？就说我的亲人，他一向自认有洁癖。我们家窗明几净，没有书架尚要摆置的书籍，桌上的文具，大人小孩的衣物等等，这一切归置得整整齐齐，都是因为他。他一向衣着整洁，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们一般都穿中山服，他的制服上衣总是平整洁净，没有折皱，夏天的衬衣更是一尘不染。到了农场，在饥饿难耐，苦重的劳动难以承受的情况下，每天收工回来，他仍坚持洗脸洗脚刷牙，完成例行的卫生大事。而且，他破旧的衣着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可是，按照那位临洮难友说的，他在死前出现了水泻，肯定，他没有力气挪动身子到地窝子外面去泻去拉。12月正是严冬，他的心脏停止跳动前，他的下半身一定是浸泡在他拉下的粪便里……他僵硬了的身躯是同结冰的粪便连结在一起的，没有谁会费劲去分开粪便。他就这样和粪便一起被拉出地窝子，然后，被盖了些土，草草掩埋了。他临终时思维清晰，不同意那位临洮难友拍电报给我，他内心的痛苦，真是比用刀剜割更甚。他难道不希望妻子来看望，不希望得到妻子的救助？他强迫自己

压下这惟一的一线希望，是想到了我的许多难处，他知道做妻子的我也早非自由之身，特别是转到四工农场以后。他不愿徒徒地给我增添痛苦，所以，他准备自个儿沉默地去死……他寂寞的心灵能够装得下这最后的重负吗？且不说那冰冻了的粪便，威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时肉体的痛苦……

再说那位在三十年后还呲着白森森的牙齿，无法闭住嘴的死难者，他在呼喊什么？他一定死不瞑目，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他的眼睛一定是大睁着的，直到肌肉腐烂烂光，两个眼眶变成了两只大空洞。

长眠在这里的众多死难者，他们躁动不安的灵魂真的就安息了吗？他们生前都具有敏锐的思维、超常的智力，反右派斗争之后，人们私下都说："当了右派的没笨蛋。"在他们永远地沉默以前，如果有谁能够把他们各自活跃丰富的思维如实地记载下来，把他们各自不同的情感遭际、肉体痛楚也如实地记载下来，将在彪炳千秋的史诗中增添光辉的一页。因为，我确信，在生生死死之际，这些被置诸死地万般无奈的灵魂，他们痛苦得不可名状的经历，逼迫他们不能不对身前身后的事反复思考，他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文化素养、思维方式都大不相同，思维的过程和结果千差万别，而事实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必定会大彻大悟，一个为这些垂死的人所向往的超前的伟大的思想体系，在他们的头脑里逐渐拼凑成熟——说拼凑，那是因为这些垂死的人没有条件和机会进行交流，这一思想体系只是成板块状凝固在他们各自的灵魂深处。它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对他们来说，无论想些什么都无法实现无以验证，他们总归都是垂死的劳教分子。他们毫无自由，他们美丽的梦也只是禁锢在那即将死亡的脑袋里，无人知晓，他们终于无声无息地死了，被草草掩埋。可谁又能说，他们在闭上眼睛前成熟了的思想也被一并埋葬了呢？思想犹如绿草，有衰败的时候，任人践踏，不值一文。然而，到了莺飞草长的季节，衰草中冒出的绿芽生命力更强大。沉默了的灵魂的梦浸润在绿色里，是埋葬不了的。

我决定再返高台，把坟场里该拍的场景重新拍照。这一荒凉凄惨的所在早已被许多人忘却，有些人把它当做历史的陈迹也早已不屑一顾。但是，它是一座纪念碑就镂刻在我的心版上，今生今世，它将与我共存。我人生的一切体验，似乎只是在这里才有了真正的开始。

二儿子霄夏劝我到明年四五月再去，届时他可陪我一同前往，目前，他工作不得脱身。但我去意已定，等不得。这样，9月25日，我独自又登上了西去的班车，早6时30分上车，迟至晚9时才到达南华，宗华接到我发去电报，一直在南华等待。我听兰州汽车东站问事处回答下午6时便可到达南华，谁知竟迟至9时，汽车东站问事处不负责的回答，使我在车上着急了几个小时，我深怕宗华未接到电报，到南华无人来接。南华是个小站，离高台县还有七八公里的路程。

重返高台，使朋友们非常意外。

因为各种耽搁，9月30日，我和宗华再次去坟地。仍然是我坐在自行车后面的架子上，宗华骑着车飞驰而去。

这次，我们先到坟地附近的移民老寿家稍坐。老寿是宗华的老熟人了。是从静宁山区迁来的，原来还是个党支部书记，迁到此处已四年了，他对这里的一切很满意，光是两个女儿在这里背着书包上了学，都使他够高兴的了。前次，我们在坟地上祭奠过后，也曾在他家小坐。老寿曾端上茶水、还做了荷包蛋招待我们。我坐在他铺了褥子的大炕上，止不住心中的悲伤，只吞咽眼泪。老寿见我不断落泪，同情地说："这种事情谁遇上也是不得了，你的难处我知道，吶难得就说不成。"老寿的妻子听说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已工作成家，说："噢，你的势力这么重，现如今就好得很，这一次你领上儿子把地方认了，以后常来看看，你的心也就尽到了。"

这次先到老寿家，是我的主意。上次见到的那个暴露在坟地上半身尚完整的尸身，我心里一直不安，一直心存疑窦，那深红对襟的绒衣，肩膀上缝补平整的补丁，还有那留存在半个头颅上的黑发——景超的头发特别黑，都使我放心不下，我仍然怀疑那就是我的亲人。如果他的阴魂有知，我和伐夏就从他的身边不理不睬地走过，那可是太让他伤心了。再则，如果是另一位难友，我们就不管不顾地走开，让他继续暴尸荒野，我觉得也于心不忍，不道德。所以，我向宗华说了我的意思，从老寿家借把铁锹，此次到坟地一定把他埋好。

老寿说起宗华去岁两次来坟地寻找景超坟冢的事，还说："老曹为这事也真费心了，去年到坟地里就找了个扎扎扎!"对宗华的感谢我已用不着在口头上去说什么了。

老寿和宗华又说了一阵在房前种果树的设想和打算，宗华教了教方法，说林场可给他优质树苗，还建议他在路边密密地栽上沙枣树，等沙枣树长到一定的高度，修剪去顶端，树身不再长高，旁枝继续生长，就长成了沙枣的围墙，沙枣树有刺，比打的围墙还结实，外人不得进来。

我们借了铁锹，穿过大路，翻过路边的沙梁，又来到了坟地。

这次，我们先去找那个尸身。因为雨水的冲刷，他又挪了地方，已被冲到了一个低凹的浅沟里。身上的深红绒衣由于朽烂破损大部分已不见踪影，只在肩头还堆着些碎片，原来连接着的脊椎骨断裂了一截，身边还有些别的掉落了的骨头，一根仿佛是小腿骨的长长的骨头搭在身边。黑黑的头发已从半个头颅上褪落，堆积在一处。这次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由于朽烂破损的绒衣已大部分失落，这位难友的衬衣醒目地显露了出来，衬衣的布料呈红白相间的小方块状，颜色鲜亮。这使我的疑窦顿消，我断定他不是景超。宗华用铁锹铲起尸身及所有脱落了的零散骨头，安放在他认为是原来的坟穴里，盖上了土。我心情依然沉重。从红白相间的小方块衬衣看，这位死难者非常

年轻，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年轻小伙子穿红衬衣的人也极少，衣着标志着性格。这位年轻人曾以火红的热情拥抱生活，三十年后在他的尸身上残留下来的红色碎片，惨红如血。他生前可能有过一些活泼的不合规范的想头，这些想头本来应关闭在他自己的头脑里，他竟幼稚地在某种场合有所流露，这使他付出的是血的代价、早殇的代价。他应该是个哑巴，是个白痴。他太年轻，他会有什么过错？他的父母如果还活着，如果得以知道他们的儿子在三十年后还暴尸荒野，他们将会发出怎样的诘问？向上苍，向历史。

在这片荒冢里，我仔细拍照，把应该留下来的场景一一摄入镜头，若干年后，这些镜头一旦有机会同世人见面，后人的评说会更有意义。

我们又一同到了窑洞密集的河沟里，拍了远景，也拍了那个特殊的只有两个土台可供两人居住的小窑洞，一月未见，洞门口已塌下一大块方方的土块，正掉在门口垒起的灶头上。

宗华告诉我，前些天，他乘工作之便，还找到了三十年前我曾居住过三两夜的地窝子，在那里走了一圈。同行的人问他去干什么，他说："过去办农场时在那儿圈过羊，我再去看一下。"宗华当头儿在这儿办农场时圈过羊的地方，确实是三十年前我

人去窝空，岁月俯视下的地窝子

来探望亲人时夜宿的地窝子。这里，地窝子一个连着一个，每个地窝子都很长很大，当年，为了便于监视管理，每个地窝子里都要挤满三四十人。那时我住了三夜的地窝子，尚有顶盖，没有门，长长的土台上堆满了死难者留下的被窝。头一夜，空落落的长土台上只住了我和两个男性的小右派。后来的两夜，换了个地窝子，我和几个孤儿寡妇住着一共也只4人。我们凄惨的哭声回荡在空落落的地窝子里，从没有门的门洞里传了出去，但无人过问，也无人走进来劝解。那男孩愤怒的指责又回响在我耳边："多少人死去了，才换来了少数活着的人回去。"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到了这曾经由少数人堂而皇之地充分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对作为自己同类的无辜者以常人无法承担的苦役加以惩罚，动辄施以令人发指的肉刑——捆绑吊打，无所不为，更残忍的是用饥饿逼迫他们一个个都去死——这比执行死刑要简单得多。直到最后留下了少数的幸存者，一场大剧才暂告收场。我也是个幸存者，只是我受难之地是在安西的四工农场。现如今，我站在已没有了顶盖，三十年前为死难者们居住，我也曾住过三夜的其中的一个地窝子里，三十年前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浓重的悲凉凄楚又涌上了心头。宗华用他男人的步子丈量了一下，这个废弃了的地窝子，长十六步，宽四步半。现在连圈羊也不用了的所在，三十年前就圈着被称之为极右分子的无辜者，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一个可以让月亮星星窥视窝内一切的顶盖。当然，最初地窝子里十分拥挤，后来逐渐逐渐变得不拥挤，又变得松松散散，以至完全腾空了。人已去，"窝"犹在。我孤零零地站在这个废弃了的地窝子的门洞边，让宗华为我拍了照。我愿意记住这个历史的时刻，把这个景象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也许，我是三十年后惟一重访故地，并在此留影的人。

有些地窝子光洁的土壁上，还整齐地挖有长方形如龛橱般的设置，中间还隔成几段，大约是为了便于放置各种生活用具，如脸盆、碗筷、水杯之类。唉，唉，我可怜的难友们，你们如果早知道死期不远，你们还会费劲地去细心挖就这样的龛橱吗？求生存的强烈意识，使你们一直奋力挣扎。你们从来也没有放弃生的希望，因为你们太善良了。你们只知道，只要一息尚存，一切就都还有希望。然而，旧时代的故事还在重演，有些当官的是用人民的鲜血来染红自己官帽上的红顶子步步高升的，劳教分子们的死活又算什么！所以，我可悲而不幸的难友们，你们一个个还是无望地倒下了，倒下了。那些在光洁的土壁上挖就的长方形龛橱进入了我的镜头，它们会向世人倾诉一切，说出我用笔墨难以尽述的许多话。

途中，有个年轻移民还和我们攀谈了几句。他以介绍情况的口气告诉我们，前边的荒地，原来都是"劳改犯"们耕种的，死了的都是"劳改犯"，有的"劳改犯"到如今尸骨还撇在野地里，没人管。他口口声声说的"劳改犯"，不就是我的那些难友们吗，所说死去的"劳改犯"，不就是那众多无辜的死难者吗，所谓撇在野地里的尸

1991年国庆节，和凤鸣在高台县难友及其中二位妻子的陪同下，凭吊高台县的烈士陵园

骨不就是使我心情沉重想了许多的那位最年轻的死难者吗，我们刚才郑重地掩埋了他。宗华为这分辩解释了几句。我直觉得心寒，一股冷气直入骨髓。众多纷纷倒下的无辜死难者们已无法为自己说话了。我不禁在心里呼喊："老天，老天睁眼！"

这一日，触目所及，坟地上的一切依旧"凄凄惨惨戚戚"，令人伤怀，思绪万千。但，我尚能自持，因为我是有所为而来。我不辞辛劳，带病两次奔波兰州高台之间——我重返兰州后就因为颈椎病复发而病倒了——行程千余公里，总算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我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第二天正是国庆节——10月1日，我和难友们约定，下午在烈士陵园合影留念。同时，一并凭吊牺牲的西路军英烈。

高台县烈士陵园是个颇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半个世纪前的1937年1月1日凌晨，执行中央军委命令浴血奋战在河西走廊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五军，在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率领下，一举攻克高台县城。红色政权在这里曾存在了二十天。当时，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挺进河西，打通由新疆至苏联的国际通道，以便取得国际上的支援，为我国的抗日战争建立巩固的西北后方。但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西北的地方军阀马家军和民团等以六倍于西路军的优势兵力，一路追杀。1月12日开始，

红五军与马家军在高台激战九天九夜，弹尽粮绝，寡不敌众，3000多将士几乎全军覆灭。董振堂军长、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城破之日都壮烈牺牲。残暴成性的马家军还将董振堂、杨克明的头颅割下，悬挂城门示众。

西路军最终失败了，西路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可是，在长时期里，历史的迷雾竟然也笼罩过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们也了解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毛泽东选集》1991年第2版第1卷第241页有个注释，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西路军问题。现抄录如下：

>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1988年5月3日，红军老战士、作家陈靖在《解放军报》第二版发表题为《英雄战死正路上》的回忆文章。他肃立在烈士头颅照片英容前，填了一首《满江红·祭英杰》，其中说："英雄战死正路上，为党洒尽满腔血。而今回首，扪心肃穆，祭英杰！"

我后来回到兰州，在翻阅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著的《西部悲歌——人类战争史上一页惨烈悲壮的实录》一书时，在附录《人物事件名词注释》里（第296页），看到曾担任西路军骑兵师师长的董俊彦、西路军骑兵师政治委员秦道贤，竟都是1937年1月，为支援高台战役，在部队行至明水地区与敌遭遇时，英勇战死。

英烈永垂不朽。

但英烈们对二十多年后在明水地区发生的一切，怕是难以想到的吧。戎马倥偬、壮烈牺牲在高台明水地区的红军将士，如果他们的英灵在牺牲之地游荡之时，同饿死在明水的死难者的灵魂相遇，他们之间会说些什么？

应该说，饿死明水的死难者们用自己的生命唤醒了党，告诉我们应同"左"的路线划清界限。他们同样是英雄，他们和西路军的将士具有同样的价值！是党所犯的错误，把这些优秀的儿女驱赶到了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使他们饮恨长眠在这里。但他们都是党的忠诚战士。他们同西路军将士一样，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同样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我同难友们的聚会，也算是幸存者们的相逢，此次，又增加了一位难友王培义，他才从老家酒泉归来。我们在烈士陵园选择了几个景点，照了一张又一张合影。我要求大家表情一定要欢快，在按下快门之前，我问："表情都好着没有？"这些经历了数十年不堪言状的苦难的老人们都愉快地回答："表情好着呢！""咔嚓"一声，镜头将他们愉快的一刹那凝固在底片之上。冲印后的彩照虽无法使他们青春再返，每个人的笑脸都光彩照人。

我们应该微笑。

24. 一次奇遇

1998年9月15日下午，杨康打来电话，说他的一位老乡陈群，四十年前曾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同景超生死与共。他20世纪50年代在《甘肃日报》文化部任副主任之时，发过陈群的两篇稿子，陈群很感激，并同陈群有一面之遇。近日，陈群打听到他还在报社，找到他家里，他们见了面。谈话中间，陈群说起他同景超生死与共的许多情况，并问到我。但陈群并不知我的姓名，也不知我原来也在报社工作。杨康认为此信息十分重要，就将陈群的电话及家庭住址告诉了我。

这太意外了，我十分兴奋。原来同景超共过患难相互比较熟悉的“三八式”老干部邹春生，听说在20世纪70年代已患癌症辞世，写本书时，我已无法从他那里获得有关景超生前的任何新的信息。这位难友的出现，无疑将会提供许多景超生前的、为我原来所不了解的新情况，这对于我真是太重要了。我真想立即见到他。

此时，孙子小亮还住在我这里上学，我还得照顾他的衣食起居。到星期五下午小亮要回父母家。我拨通了陈群的电话，告诉他，我将于19日下午去他家拜访。陈群说，他同景超有着生死友谊，欢迎我去他家长谈。

19日下午约4时许，我找到他家。开门的就是他，他热情地说：“我一直在恭候。”

他的妻子周大姐就坐在客厅里，她面容憔悴，靠在沙发上，两腿放在面前的木茶几上，腿上盖着毛巾被，看样子是久患重病。她没有说话，也没有露出笑容表示对我欢迎，显得有些冷淡。

但陈群说：“我老伴昨天听说你要来，就哭了。”原来作为患难夫妻，她对我这位难友内心还是很同情的，她感情丰富，也许，由于疾病，由于性格内向，她内心的感情未能显露出来。

这次，我和陈群长谈了约五个小时。我在他家吃的晚饭，周大姐没和我们一起吃饭。她只静静地听我们说话，没插话。在听我们谈话中间，她有一次用手抹眼泪。陈群立即注意到了，说："你看，你看，她又哭了！"到晚上八点过一点，小保姆扶着她去休息了，走出客厅前，她向我招手致意，仍没说话。

我后来要求和陈群再谈一次他与景超来往之间的事，因为各种耽搁，直到1999年8月18日上午，他才登门到我家。前几次通电话，他告诉我，周大姐的病情每况愈下。这次见面，我焦急地问到周大姐的病况，他说，已瘫痪在床4个月，话都不能说了，头脑呆钝，只有他说话时还能懂得，用点头或摇头表示个意思，现在每天只能喝点牛奶，别的什么都不能吃，医生已表示回天无术。我感到很难过。陈群曾一再告诉我："没有大姐就没有我这个家，大姐能多活一天，我都高兴。"现在，周大姐的日子不会很长了，这对患难夫妻永别的日子不会远了。陈群沉重地说："事情已是这样了，但这个情结我无法解开。"任何劝慰的语言都是苍白乏力的。我为他能在周大姐病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竟然登门应邀再一次向我述说他和景超之间的生死友谊，非常感激，非常感动！

这里，就把他几次对他和景超之间的生死友谊的讲述，作出追述：

我是1958年5月8日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的。1955年反胡风运动前，我正在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工作，地点在西安。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引起了猛烈的批判。我和魏钢焰谈起这部作品，不顾舆论如何，仍表示了对这部作品的赞赏。牛汉和杜鹏程也来找过我，谈过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到反胡风运动开始后，以上和魏钢焰、牛汉见面谈论过的问题就都成了问题，再加有人写黑信诬告我历史有问题，我就成为怀疑对象，被当作胡风分子审查了几个月。到后来审查结束，没把我定成胡风分子。复员后，我调到了省建工局工作。整风中动员鸣放的座谈会上，我没发言，也没写过一张大字报。但到运动后期，根据我在反胡风运动中的表现，给我重新下了结论，说是："老右派，思想反动，管制三年。"我就带着这样的结论，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

我一到新添墩，难友们就都知道了我是个"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当时的政策规定对右派分子不剥夺公民权，而我是个"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就引起难友们的议论，不知是怎么回事。

一天晚饭时，我看见景超吃得很慢，别人都吃完走了，他还在吃，有点难以下咽的样子。他说："这些天，大家都传开了，说你这个右派分子是管制三年，你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我当时对景超并不了解，所以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笑了笑。景超跟我说话，也只是投石问路。他很谨慎，也没指望我多说什么。

我当时觉得自己的问题最严重，别人没宣布管制，我是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家庭是地主成分，劳教没有定期限，我自己如要解除劳教，一定是全站最后一个。

一到新添墩，我就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对艰苦的劳教生涯感到苦不堪言。我就动起脑筋来，心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要设法找出一条生路来。站上有羊群，我注意到放羊的人随羊群活动，行动的自由相应就大得多，我就想争取把羊放上。主意拿定，我给兰州家中写信，要老婆寄些养羊的专业书籍来。收到后仔细阅读，然后找站上的管教干部，说我过去放过羊，放羊有经验，要求派我去放羊。我从接羔、分群等各个方面说了一套又一套。管教干部以为我真的放过羊，就同意我去放羊。从此，我住在饲养室里，随着羊群早出晚归，在广阔的草场上自由活动，比起在大田里劳动的人就轻松自在多了。到接羔时，有的母羊奶多，有的奶少，就要把奶多的母羊的奶挤出，配给奶少的羊羔吃，我也就乘机挤些羊奶自己喝。我把多挤出的羊奶烧开后，放在床下一个搪瓷盆子里，搪瓷盆子下面是沙子，我刨开个坑放上搪瓷盆，上面盖个木板，木板上再盖上草帘子。夜里，我睡在床上，想喝时就用茶缸舀一缸子喝。我羊奶喝多了，连饭都不想吃，身体非常强壮。后来，我还干上了赶大车的活，行动就更自由了。

当时，有些劳教分子积极靠拢政府，常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汇报劳教分子的各种情况。我从来不打小报告，因为我认为自己问题最严重，打别人的小报告不顶啥用，我一贯也没这个习惯。这还引起了管教干部的注意，有一次就问我："陈群，你为什么不向政府靠拢?"我回答说："我自己问题严重，我认为主要管好自己就行了，所以没有向政府反映别人的问题。"这样，我不汇报别人的名声就传出去了。管教干部认为我老实，以后我说些话，他们也愿意听。

景超在鸣放期间写的两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和《为"三脱"干部叫屈》，我都看了，文笔犀利，写出了别人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我很佩服。我的胡风分子的问题否定后，写了两篇文章，经过杨康的手刊登在《甘肃日报》上，我很感激，因为这两篇文章的先后见报，正是在政治上为我平了反。我见到杨康问及上面的两篇杂文，杨康说："作者王京是笔名，他的真实姓名是王景超。"所以，我在新添墩见到景超时，对他已有些了解。

景超平时显得沉默寡言，落落寡欢。下工后，常看到他记日记。有一次晚饭后，我和他都靠在一个大土堆的两边，周围再没人，他仍在记日记。一会儿，他走到我身边，笑了笑。我问："你在写什么呢?"他说："没写什么。"我说："我定为胡风分子就是根据一本日记和其他材料，你还记什么日记?"可是，第二天，我看到他还在记日记，我就说："你在为自己准备绳索。"他不说话，以后日记仍照记不误。终于有一天，在厕所里，他神色慌张地告诉我："我出事了，记日记的事有人揭发了，怎

么办?”我问：“日记还在不在?”他说：“还在。”我就在地上写了“丙丁”二字，他领会了我的意思，就设法把日记烧了。后来，管教干部训话时说：“王景超思想反动，现在还在记日记，你记日记想要干什么，你老实交代!”景超已把日记烧了，就坚决不承认记过日记。那时，右派分子互相揭发告密很厉害，景超坚决不承认记日记，又没有证据，管教干部没办法，还以为是诬告，就不了了之了。从此，我们之间就有了信任。

后来，我还当上了饲养组组长，羊圈需要干杂活的人，我就指名要景超来。羊圈的活轻，有随意性，常用胡萝卜当饲料喂羊，景超干活时就可以随便吃胡萝卜充饥。有一次，我还给了他半碗羊奶，佯称是家里寄来的奶粉冲的，但那时他身体已很虚弱，喝了半碗羊奶就拉肚子，以后我就再没敢给他喝羊奶。我能大量喝羊奶，肚子不饿，就常常避开别人，把灶上我的全份或半份饭给他吃。

一次放羊时遇到风暴，暴风卷起的石头，把附近放羊的农民砸死了，我早有准备挖了防暴风的洞，躲在洞里幸免于难。放羊的农民被砸死了，风暴过后，羊群乱跑一气，我就把有些羊收进了我的羊群，找了个地方，过几天“杀”一只。说“杀”，其实就是把羊脖子使劲一拧，羊断了气，再放血，然后剥了皮，开膛破肚，煮了吃。这样，我的食物来源越来越丰富。

后来，我赶上了大车，行动更自由了，有时车走得很远，我还帮景超买过红糖、水果糖等等，这些东西在夹边沟都买不到。

夏天，景超说他想吃西瓜。站上生产西瓜，但劳教分子吃不到。我赶大车会运西瓜到酒泉市或其他地方，一路上可以随意吃西瓜，可不能把西瓜带回站上。有一次，我拉西瓜到酒泉市去，就指名要景超同我一起去卸瓜、过秤，管教干部同意了。我和景超一路上就放开肚子吃西瓜，吃了个心满意足。瓜从地里装车不过秤，出售时才过秤。所以无论我们吃了多少都没关系，我们一路吃了多少西瓜真没个数。

夏收前，我就考虑到偷麦子的时机来了，我得有充分的粮食储备。就写信给家里，让老婆缝很多小布口袋，装在一个大布袋子里，用一件棉袄，把大布袋子裹在中间，作为包裹邮寄来。到割麦时，别人割完麦收工回去了，我赶着羊群到地边，就很快地揉搓麦穗除去麦衣，把麦子装进带来的小布口袋，每袋装十斤左右，埋进附近的沙枣树下，作出只有我自己认得的标记。夏收结束，我储存的小麦就很可观了。

有一天，我遇见一个农村妇女，手拿一把铁掀，说是刚刚埋掉了死去的小娃娃。我随便问她：“日子过得怎么样?”她就流下了眼泪，说：“差一点没叫枪毙，还怎么样!”我大吃一惊，一个农村妇女怎么会差一点没叫枪毙。详细问起来，这位妇女说，他们的生产队长很霸道，队里大家都挨饿，有的人家都断了顿，他多吃多占大吃二喝，队里的羊也随便宰了吃，还欺侮妇女，见她没男人，常上门欺侮，不和他睡觉

就不行。她气恨不过，和队里有血性的一个男子汉说了，这个男社员愤恨地说，这个坏蛋不除，就没有社员们的好日子过，大家都活不下去。后来，他又说通了另一个社员和他一起设计把队长杀了。他们觉得解了气和恨，可是杀人的血案是瞒不住的，那两个男社员被认为是阶级报复，很快被判了死刑枪毙了，她当时身怀有孕，被抓去审完案子就释放了。她生下娃娃，没吃的，娃娃活了几个月就饿死了。坏蛋被杀是罪有应得，两个男社员被枪毙是没有办法的事，而现在队里已无存粮，大多数人家已经断了顿，她回去后迟早也是饿死的。这个凄惨的故事震撼了我，不仅夹边沟的难友在挨饿，农民虽不是阶级敌人，他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掌权的生产队长鱼肉社员，被社员愤而杀之，受到惩罚，杀人者偿命，也下场悲惨。这一切发生之后，生产队还是没有粮食，大多数人家已经断了顿，这位妇女眼看也要饿死。我，一个劳教人员对此又能如何？我对天长叹，也是毫无办法。好在经过夏收后，我已储藏了一些麦子，我就将这位妇女领到我储藏麦子的几棵沙枣树下，指出记号，让她设法把麦子挖出拿去吃。我也只能尽这么一点心意了。

有一天，景超告诉我，说他想跑。我当面把他批评了一顿，说："我们来改造，就要靠拢政府，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怎么想要跑呢？"但我随后就向队上反映说：

夹边沟农场场部周围景超们当年栽种的杨树已蔚然成林

“王景超野菜挖得好，干脆叫他挖野菜去吧！”第二天，队上就派他挖野菜去了。我心想，挖野菜可以到处随意走动，有些地方离铁路很近，就可以扒上火车跑，就给他个逃命的机会吧。但他没反应过来，他的悲剧也正在这里。到了晚上，我看见他背着野菜回来了，心里干着急没办法。他就这样一连挖了七天野菜，把机会失掉了。后来，他也表示后悔失掉了机会。

景超因为一直挨饿，身体越来越差，面色憔悴，走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就让他装病，找医生看病。这个医生也是劳教分子，我曾给过他一坨羊油。我就让这个医生给他开病假条，他装作这儿那儿疼，医生说他有肾炎，让他休息了好些日子。

我到新添墩后，就知道站上对劳教人员家中寄来的粮票一律没收，寄来的钱如数量大就存放站上，不许自己掌握随意花用。存到站上的钱，再要取出用就很不方便。来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以前，我挣得的稿费已积存了28000多元，我全留在了家里。当时我母亲也住在我家里，我已有了三个小孩，老婆在菜铺子工作，每月只有23元的收入，我把这笔稿费放在家里是为了养家糊口。在农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我也需要花钱。花自己的钱，我就要摆脱站上的管制。我给老婆写信，让她找人把铁皮罐头设法取开，取掉所装的食品，把人民币放进罐头盒，里面再放些砂石之类，使罐头有一定的重量，再把罐头盖子重新焊好贴上标签，用邮包寄来。站上检查邮包时发现不了破绽，我手头就掌握了一笔钱可以随意花用。

1958年冬天，站上派出一批人去北大河工地挖沙子石料搞副业挣钱。当时传出一股风，说是到1959年5月1日，要给一部分人解除劳教，这次搞副业我也去了。大家对部分人解除劳教都抱着希冀。工地上给我们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8斤，带队的管教干部只让我们吃42斤。工地上供应的是白面，只给我们吃黑面，白面拉回站上去了。北大河工地有个好处，能随便买到注射用葡萄糖针剂，每支五毛。为了干活有力气，大家都买葡萄糖针剂每天每人注射一支，管教干部也鼓励大家注射。反正有随队的劳教分子大夫邓立之为我们注射。我随身带的有钱，买葡萄糖针剂很方便。有些没钱的就卖手表、卖皮袄。反正人人都打葡萄糖针剂，打了也真管用，干一天活就能坚持下来。到翻年3月该春播了，我们才全部回到了站上。到“五一”时，也没给哪个人解除劳教。景超听说我们在北大河工地每人都注射葡萄糖针剂，叹息说：“付出的代价也太沉重了。”

新添墩站有个劳教分子徐惠阳，是个工农干部出身，人很老实。他的身体也垮了，几次找我，说放羊的活轻一点，要求我给管教干部说一下，调他去放羊。我给管教干部说了以后，到1959年夏天，就把他调到了饲养组。我那时每天晚上喝羊奶，肚子不饿，就常把我的那份饭送给他吃。日子长了，徐惠阳看见我经常不吃饭，就向站上的管教干部打了小报告，怀疑我有其他食物来源。

秋天的一个晚上，徐惠阳就和站上的支部书记赵来苟及另一个管教干部，到饲养组来检查。羊圈里的小王看到来者不善，就把消息告诉了我。我立即把床下搪瓷盆子里的羊奶倒掉，盆子下面都是沙子，一下就渗光了，我还把盆子周围的沙子刨平。赵来苟和另一个管教干部在饲养组里里外外查看了一个多小时，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就来到了我住的饲养室。他们在床下检查，揭起草帘子，发现下面的沙子是湿的，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出门走了。可是，他们出门合计了一阵，又返回饲养室，用铁锹挖起湿的沙子，发现沙子里面有白色的羊奶。走出门外，就把我吊在对面一个库房旁边的梯子上，我浑身巨痛，头上大汗淋漓。赵来苟和那个管教干部站在一旁，像是在欣赏杂耍，抽着烟，谈笑自若。而我忍着浑身的巨痛，一声不吭，不叫喊，不讨饶，一直坚持了三个小时。后来，原建工局二十三岁的劳资科长蔡健走到我身旁，小声对我说："这又不是对付国民党，不要逞英雄。你要大喊大叫，叫爹叫娘都行，他们才会放你下来。你不吭声，他们是不会放你下来的。"这样，我才大喊大叫，又过了约一个小时，他们才解开绳子，放我下来。我这浑身的疼痛，几天后才缓解。我现在的心脏病，就是这次被吊四小时种下的病根。

饲养组长当不成了，我只能搞些打扫卫生的工作。我害怕因此而延长我的劳教期。两天后，我就去场部找场长刘振宇，诉说冤枉，说我没犯任何错误，就被赵干事吊了四个小时。这位刘场长不知因何故被开除了党籍，跟当支部书记的赵来苟有矛盾。他听了我的申诉，派干部去调查，这时，泼了羊奶的沙子早就干了，没找到赵来苟所说的证据，刘场长就恢复了我原来的工作，又让我放羊去了。

我被吊了四个小时，一声不吭，没有扯出别的人，也没承认自己有什么事，后来又恢复了原工作。难友们都认为我是硬骨头，对我的看法就全变了，看到我都亲得不得了。景超见到我更是极表同情，我们之间就更不隔心了。

这年冬天，我又被派去清水，为卫星发射基地铺设铁路挖沙子，先后干了半年。这里，农民有卖鸡蛋的，一般市价是两毛一个，可是看到我们穿"劳教服"的劳教分子，农民就提价到五毛一个，钱少了不卖。为了生存，为了活命，五毛一个，我们也得买。我身上带的有钱，就每天花一元买两个鸡蛋。清水有中药铺，我小时候学过一点中医，就自开药方，用枸杞、川芎、当归三种中药配成方子，引子甘草，抓来用搪瓷缸子熬好后，再打上两个鸡蛋，连药渣一并全吃了，很有滋补的效益。

在清水挖沙子半年，活重，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2斤白面，我每天吃一服滋补的中药，身体依然很好。临回来前，我又开了几个方子，抓了几服滋补药带回新添墩。

一天，景超来到饲养室，看见我在熬"药"，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熬药。"景超看了看搪瓷缸里的东西，说："不会吧，别的我不认识，枸杞我认得，是补药。"我笑了笑，没说什么。他又说："长夜漫漫。"他的意思很清楚，我心领神

会。此时，我们的心更靠得近了。

站上有个名叫贵戚的劳教分子，满族。此人是因学习时说了下流话被劳教的。他懂得公安系统的规矩，知道当时的劳教没有一定的期限，很会保存自己。那时，大家因为饥饿，腹内空空，都出现大肠头子脱垂的现象。贵戚在上工前，常脱下裤子，让管教干部看他的肛门，说他患有痔疮。管教干部一看，果然肛门上一堆肉，有时还有血迹，以为他真有痔疮。到了地里，他就睡在地边不劳动。这样混了几年，因为一直不劳动，体力消耗少，他就坚持到最后活着回到了兰州。右派分子们哪有他这本事？

1960年9月底迁场到高台明水，我们的处境就更艰难了，夹边沟农场是个老劳改农场，我们住的都是房子，冬天还生个小煤炉子，一切都比较正规。明水是河南移民逃离后留下的一片荒滩，一无所有。我们迁去后，第二天就挖地窝子、挖窑洞，这时，劳教分子们经过两三年的非人折磨，身体都很弱，伙食还不如新添墩，没有蔬菜，已是深秋，又挖不到野菜，真是生存维艰，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新的死亡。

我到明水时，原来在新添墩时埋在沙枣树下的小麦无法带来，生存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但难友们的死亡，却给我带来了生的转机。当时，身强力壮的人已不多，队上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馒头。我埋死人身体没问题，没想到，抬埋难友又使我有了新的食物来源。

景超的身体也垮了。我第一次去看他，他还能半坐着和我说话。我们已是知己了，我去看他，他很高兴，对我说："咱们国家需要再来一次革命，把全部右派分子都解放出来。这里对待我们的惨无人道，种种法西斯暴行，咱们都亲身体会到了。我是愧对妻儿，愧对妻儿，出不去了。"我问："你妻子会不会对你有些帮助？"景超说："她比我更艰难。"景超接着又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像苏联电影《幸福生活》中乌雅和毕百灵的爱情。"我说："你有什么话要写下来吗？"景超说："我的手指已握不住笔了，写不成了。"景超向我要点吃的。我当时背包里有一个半馒头，我那时也很小气，就只给了他四分之一个馒头，他津津有味地吃下去后，一会儿又要，我就又给了他另外的四分之一。这次，我们大约谈了有半个小时。

过了几天，他们同房的一个人找来向我要吃的，我说："没有。"他说："那天，我看见你给了王景超半个馒头，我是挣扎着爬到这儿才找到你的，我都无法走路了，你就给上点，给上点吧！"我看他可怜的样子，就给了他点。他走时说："王景超不行了。"这样，我就又去看景超，我看他身体状况尚无大的变化。这次，我们没说上几句话，就来了个管教干部，我只好退出门外。

第三次我去看望景超时带了点藕粉。当时，有个湖南难友的妻子来看丈夫，她丈

夫已经死了，是我埋的。我带她到了坟上，她号啕大哭，我劝了半天。后来她就送了我一小桶藕粉。我用五分之一小桶的藕粉冲好给景超喝，当时是无糖可放的，景超喝得非常高兴，认为喝到了天底下最好的东西，显出非常幸福、非常感激的样子。

后来，我还去过一次他们的房子。当时，他们房间里有个原兰州百货公司的财务科科长刘积开，此人很有理论水平，思维超前，认为当时的国营商业经济弊病很大，无发展前途，因而当了右派分子。刘积开此时已是临危之人了，他把我叫到身边，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用手指在身边的尿罐子里冻住了的尿上写了“坐以待毙”4个字。我看了，没说什么。同房的别人就问：“他写的什么?”我回答：“坐以待毙!”别的人就也什么话都不说了。景超示意要我过去。我走了过去，他要我伸出手来，在我的手心写了个“2”字，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他又重复地在我手心里写了个“2”字。我问：“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平方。”并用手指了指自己。当时，我真是恨透了这个逼人毙命的现实，但自己无可奈何，不能对此有任何作为，不能有任何的改变。景超我们相交相知已很深，他也面临“坐以待毙”，使我心酸非常。

第二天，刘积开就死了。

又过了几天，队上要我赶车过去，我知道就是埋死人的事。没想到，这次埋葬的除了我们队上的七人，另一人就是景超。原来，他们三大队埋死人的人也病了，我就亲手埋葬了我相交相识最深无话不谈的挚友景超。

有些难友在临终前都写个条子，写明家属的姓名、通讯地址，要我把他们的噩耗通知家里。而景超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告诉我你的情况，连你的姓名也没告诉我，所以，我直到1998年9月到甘肃日报社找到了杨康，从杨康那里才知道了你，同时才知道，你原来也在报社工作，唉，已经是近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的沧桑，我知道你这大半辈子过得很苦，如今依然孤独一人，这可不是景超在天之灵愿意看到的啊!

感谢生活，感谢上苍！在我写出本书之前，陈群终于来到了我的面前，让我了解到景超最后的日子里的情景，了解到他的遗愿、遗言，并让我知道了在新添墩的两三年里，景超许多为别人所不了解的生活景况、思想轨迹。我还知道了有一位相知甚深的挚友一直关心他，照顾他，对他有过许多帮助……

景超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姓名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告诉陈群？我思索再三，心想我的亲人在辞世前，一定从几方面作了考虑：

他嘱咐陈群出去后一定要把夹边沟劳教农场对待他们的法西斯暴行统统写出去，把他们所受的苦难统统写出去，他认定了陈群是惟一可以担当此重任之人，是能完成此重任之人。但，“长夜漫漫”，此后各种情况都难以逆料，陈群要完成此重任，说不定会冒杀头的危险。尽管陈群是生活的强者，政治上的事谁又会想到呢，聪明绝顶

的陈群并未逃脱堕入右派分子泥坑的命运，今后还会有怎样的厄运在等待着他，谁也难以预料。他没把我的姓名及各方面的情况透露给陈群，主要是出于保护我的目的。他知道我作为右派分子今后还要养育拉扯俩孩子，生活的道路上还有着万千的艰难险阻、坎坷不幸。陈群如果知道了我，一定会上门和我联系，说出景超生前对他的重托，甚至会把他如何完成此重托的过程和我交谈，向我说及他们在夹边沟的种种苦况，这就把危险惹到了我的身上。景超只希望我今后能平安无事地养育俩孩子，再不要有什么政治上的麻烦干扰我们母子的生活。所以，他未把我的任何情况透露给陈群。

陈群写此书，以景超当时对所处环境的考虑，他认为只能在秘密状态的地下情况中进行，接触人越少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实力，保护好陈群本人。陈群在秘密状态中写好了此书，今后发表的机会肯定会有。景超追随中国共产党投奔革命，对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有坚定的信心，他认定酒泉夹边沟农场对劳教分子实施的法西斯暴行，并以长时期的饥饿逼迫他们一个个走向死亡，这一切都不能代表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总有一天，党会纠正错误，到那时，这本书就会作为历史的见证，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而成为宝贵的文献。但是，“长夜漫漫”会有多长，谁也无法预料。为了让陈群独自安全地写好书，陈群忠心耿耿的妻子会全力帮助他，他还是隐蔽自己，“人自为战”，不要和我联系为好。

再说，我对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情况知之甚少，陈群同我有了来往，我对他的写作也不可能有什么帮助，不可能对他提供他需要了解的情况。

以上种种的考虑，我觉得都有些道理。

陈群来到了我的面前，真是一次奇遇。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作出“抢救人命”的重大决策，所有因各种问题送到农场劳动的全体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增加粮食定量，死亡制止了。我就是和高台明水的难友们坐同一列火车，回到兰州，回到甘肃日报社的。

十年浩劫使全国人民遭受浩劫。但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起步了。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在同年9月就发布了55号文件贯彻执行，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55万多人进行查证落实。文件明确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在这政治暖流的涌动下，全国反右派斗争中定为右派分子的55万多人中，有99.98%以上都平反了。中国共产党纠正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尽管许多人对于坚持“扩大化”了的“‘必要论”持异议，但景超的“咱们国家需要再来一次革命，把全部右派分子都解放

出来”的遗愿算是实现了。甘肃日报社错划了的11名右派分子已全部改正。景超在九泉之下，可以含笑瞑目了。

四十年来，陈群为生存而拼搏，他也在进行着一部巨著的写作。

我，在生死两茫茫中，仿佛听到了景超在冥冥之中的召唤，所以，在十年前我提起了笔，开始了本书的写作。追忆往事，使我清泪如注，笔尖上流着滴滴鲜血。但是，这一段沉重的历史，我经历其中，我心灵的创伤，感情的遭际，非平常人所能想见。我把这一切如实地描述奉献给读者，是为了以我特殊的经历，让读者对这段沉重的历史有个较为深刻真切的感受。警示后人，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是我最大的愿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作为人民的普通一员，我愿意在前进的历史中，以这本书作出我小小的奉献。

我万万没有想到，8月18日我和陈群的相见，竟是永诀。我把他讲述的以上的内容写完以后，想请他过一下目，在8月30日打电话请他再来一趟，他回答说：“我老伴病危，来不了。”这样，我只好将此事先搁置下来。10月25日，我估计周大姐辞世已多日了，想请他看一下文稿，或者我上门，或者请他来。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他女儿，我说：“我找老陈。”她说：“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我爸爸他去世了。”我大吃一惊，问：“不是你妈妈病得很重吗？你爸爸他怎么去世了？”那边女儿哭着说：“我妈妈是9月2号去世的，我爸爸51天后也去世了，是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的。”我和陈群的四个儿女都没见过面，在电话上我向她作着自我介绍，哽咽不已。我向她说起景超就是死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是她爸爸埋葬的。女儿哭着说：“我爸爸算是幸运的，多活了近四十年，他最近还去了一趟夹边沟，回来后说，他要为夹边沟农场的冤魂们写书。他的灵感来了，他要调整一下情绪，好好写书。”说到这里，我想起陈群在8月18日见面时说过的话，在明水时，他身体尚好，曾埋葬了许多死难者，埋一个死难者给两个馍，他当时就靠埋葬死难者活着回到兰州。他说：“我是踏着难友们的尸体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的。”言下不胜凄楚。为了众多的冤魂，他重访夹边沟，正想调整情绪大干一场，却倏尔离去，他的遗愿已无法实现了。我和他相识一年，他几次说到他和景超的“生死友谊”，他向我讲述到他和景超之间交往的故事，我万分珍贵。我还想在本书出版后有了闲暇，我们再多多交往，对于那段沉重的历史，我们会有许多话题要絮叨。我认为他博览群书才华出众，共同经历过的苦难，会使我们成为挚友，就是在写作问题上，我们也会有许多可探讨的地方。但是，这一切都已灰飞烟灭……

中午、晚上，我和他的儿子、儿媳又通话两次，问及他辞世前后的一些情况。10月21日，他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回来，一路劳顿，但情绪亢奋，说他将要为冤魂们大写特写了。当晚洗了澡就睡了。

第二天（22日），子女们都去上班了。下午两点多，他感到心脏不适，手发抖，准备去医院，没出门就倒下了。小保姆给急救中心及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打电话，但是，等医院来人后，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陈群曾说过，在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管教干部赵来苟曾将他吊了四个小时，他的心脏病正是那次被吊种下的病根。四十年过去了，当时种下的病根最终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不到七十岁就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八岁。

我的案头放着陈群赠送的《美育基础知识》一书，此书为陈群在1991年编写，同年8月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8月18日，《中国教育报》第四版头条发表消息，题目是：《一本书推动甘肃中专美育蓬勃发展》。消息介绍，《美育基础知识》出版后，推动甘肃在1991年秋季在全省中专学校开设了美育课。“由于教材冲着中专生感兴趣的热点展开，一发到学生手里就引发出种种共鸣，几个月内，全省校园沸腾了。”“省内许多中专都突破了原定开设美育班级的计划，一再扩大范围，使得兰大出版社不得不在1991年8月至12月四次重印《美育基础知识》，才基本满足了各类中专的要求。”消息还指出：“全国有910所中专、中师采用甘肃省编《美育基础知识》作为教材。”消息最后说：“一本书推动了甘肃中专美育蓬勃发展，正未有穷期。”陈群执笔编写的这本书，还得到著名美学家蒋孔阳的高度赞誉。几年前，陈群曾受聘于深圳市教育局，每年去深圳讲学，培训深圳市中专的美学教师。

此外，陈群说，他当时任职省商业学校，还写过一本《商业应用文》，由北京的商业出版社出版。此书也是教材，他没有送给我，我没见到，故无法作出评论。

1961年1月，陈群是和我同乘一列火车从高台明水回到兰州的。在右派分子问题未改正前，他一直在单位上干炊事员及食堂管理员之类杂七杂八的工作，浪费了宝贵的时光。右派问题改正后，他振作精神，教书干出了突出成绩，连续编写教材，在全国发行出版，这都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他的突然逝世，不仅使家人悲痛欲绝，也是教育战线的一大损失。

原甘肃省教委副主任马培芳送给他的挽联写道：“教苑老兵坎坷人生谈笑昨日今归去业绩永留人间，挚友长兄才华横溢辛勤耕耘五十载人格惠及后生。”这是对他坎坷一生的写照，也是对他拼搏奋斗一生伟大人格的最高赞誉。安息吧，难友！写到这里，我不禁清泪涌流，你真是走得太匆忙太匆忙了啊！这换了的人间，尚需要你来奉献，你壮志未酬人离去，怎不叫人痛煞恨煞！你不该走，不该走啊！

25. 尾 声

我的书写到这里已是尾声了，我还有些情况要作简略的交代，还有些话要说。

我的难友们，不论从安西四工农场、玉门黄花农场回来的，还是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包括高台明水分站）回来的，我熟识与不熟识的，他们的右派问题后来全部改正。他们度过了炼狱般的反右劫难，大难不死，幸存了下来，仍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矢志不渝。他们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回到人民的行列后，人人都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奋力拼搏，有的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新的贡献，有的则又在接踵而来的文革大革命中再次获罪，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的幸存者的难友中有些杰出的代表，他们在1957年的反右派中历经苦难，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坚持真理，不畏强暴，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坚决地进行揭露和斗争，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从酒泉夹边沟农场的人间地狱里幸存下来的毛应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成为当时甘肃的张志新！

原武威步校机要秘书、中尉军官陈明，在农场先后当了多年的食堂管理员，十年浩劫中再遭磨难，妻子陆明华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被迫自杀身亡。1979年陈明调甘肃省人民政府后，以其一贯勤奋苦干的工作作风赢得了领导及群众的信任，后擢升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成为我的难友中干得非常出色的人。他的经历正应了“愈挫愈坚”的老话。苦难与挫折，大大张扬了他作为共产党员的人格魅力，使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新的贡献。

原公安厅政治部干部刘文汉划为极右分子后，先后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高台明水劳教。原共产党员的他亲眼目睹众多难友因各种非人的对待受迫害致死。他死里逃生。作为幸存者的他，在1978年12月右派问题平反后，仍从事罪犯的改造工作。

在实践中，他深深体会到对罪犯的改造，必须有思想理论上的引导。在正确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拨乱反正，对罪犯的改造才能大踏步地前进。他结合工作实践，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1989年2月他的题为《浅析当前青少年吸毒犯罪的成因及其改造对策》在有关的刊物登载后，1990年由中国劳改学会推荐，在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举办的1990年优秀论文评奖活动中，荣获二等奖。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的论文《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的历史地位》受到公安部的重视，他应邀赴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冲，同国内的知名专家聚集一堂，共同对此专题进行研讨。1994年离休后，他仍参加全国关于犯罪与改造的各种研讨会。1994年，他的三篇论文都发表在上海劳改局所办《劳改劳教研究》，其中一篇题为《荧屏传真情，打动罪犯心》的论文，被改编为电视专题片，在全国播出。1995年，他的题为《少数民族罪犯的犯罪成因、特点及其在监狱里表现和改造对策》，在上海市公安局所办的《公安风云》刊出，后被西南政法大学选用为教材。1996年，他的论文《性凶杀的犯罪档案》，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在建国50周年大庆、公安部文件政策研究会汇集50年来的历史性文件，由公安部部长贾春旺作序，刘文汉的《当前甘肃女性犯罪的动因及特点成因探析》因获全国二等奖入选其中。1999年5月，他的另一篇论文《不断深化改革的兰州监狱》，发表在中国监狱学会的会刊上，2000年1月，被山东当代文化中心、中国当代社会研究文库收用。从1979年至今，刘文汉为了探讨《罪犯学》，先后共写出论文52篇，这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公安战士在思想理论战线所作出的特殊奉献。离休前后，在省劳改局领导下，他还主编了《兰州监狱劳改工作志》，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

我还愿意向本书读者透露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我的难友、挚友杜博智在《甘肃日报》工作期间创造了一个奇迹：1988年12月21日晚，新华社电稿《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十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文内将“闭幕”错为“开幕”。杜博智发现此错，找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值班领导共同研究，果断地将此错予以纠正。第二天上午十时许，新华社就此向全国发出更正，《甘肃日报》在22日见报前已改正，而全国与《甘肃日报》同日刊登人报社论的20多家省市级日报都未改。在对这条电讯稿《伟大的十年》中差错的改正方面，《甘肃日报》成为省市级日报的“全国第一”。他多年来在校对检查员的平凡岗位上爱岗敬业，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踩出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1982年7月中共甘肃省直属机关委员会授予他“优秀党员”称号；1990年1月，他荣获“甘肃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同年7月，他由编辑晋升为主任编辑。他被报人誉为“甘肃第一校”。

杜博智作为我多年患难与共的难友、挚友，对本书的校对当然是出了大力，特别是他对有关资料的查证与提供，更是费尽心血。我对他在本书的写作中提供的鼎力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也向积极为本书提供了各种宝贵素材，给予热情帮助的所有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再说我的三位女伴：石天爱、王桂芳、徐福莲，她们的右派问题也全都改正了。我退休后，曾于1991年、1993年，特意到安西、天津先后探望了王桂芳、石天爱，同她们畅叙别情，感叹各自不同的苦难经历。徐福莲和丈夫梁富杰（他的右派问题也改正了）多年来住在兰州，我们的交往就更频繁了，她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

值得一提的是石天爱在鸣放中无任何言论，她自称是“天生的右派”，是由于她有个当军阀、汉奸的父亲石友三。党的政策历来是子女不对父辈的事负责，反右斗争使石天爱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毁了她的一生。她一直戴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丢掉了工作，贫病交加。1971年，她和七十多岁的母亲程竹溪，被遣送到天津市远郊区的深树村，母女俩都已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穷困潦倒。她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分子，因而也被剥夺了去爱和被爱的权利，孤独到老，孤独到死——于1997年8月6日病故。王桂芳是我们中年龄最小的，亦于1996年9月22日病逝。她们都未能长寿。

至于我，虽曾两次戴过右派分子的“桂冠”，前后达十一年之久，我仍自认为我从十六七岁起就一心向党，坚信走社会主义道路，会将我国人民引向富裕幸福，会使我们的国家走向兴旺发达。我在1974年恢复了工作，于1975年调往甘南藏族自治州。在甘南民族学校任教的四年里，我热爱民族教育事业，除了兢兢业业尽最大努力做好教学工作，我对我的藏民学生在生活上也关怀备至，有些学生生病或家中有困难，我也从当时微薄的工资里予以经济上的帮助。到1979年4月，我离开甘南民族学校时，两个班的全体学生在依依不舍地向我告别时，特意送给我的镜框上书写有“严师慈母”四个字，礼物虽小，它是对我四年教学工作的最高奖赏。以后有些学生又到兰州深造，有的成为西北师范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有的到西北民族学院攻读藏语专业后成为研究生、博士生。他们在兰州学习期间，都来到我家里看望我，畅叙师生情谊。如，王者义就说：“当年和老师教语文课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我后来经过刻苦努力，才考上了西北师大中文系。”

我在甘南民族学校任教的四年间，藏民学生在作文中常动情地称我“慈母老师”，使我激动不已。

1979年，我调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教写作课后，在教学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八年的新闻写作实践经验，使我在批改和讲评学生的作文中，备受学生的欢迎。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不断更新有关写作方面的理论知识，使我的课堂教学常有新内容。我参加写作教材的编写，同时写了几篇论文。我的论文《试论理论思维的形象化表达》，于1987年获甘肃省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奖三等奖。我取得了副教授的职称。

我的这些成绩虽微不足道，但也是我历经坎坷和苦难后奋力拼搏的结果。我再重复一句，苦难重新铸造了我。我在大半生经历的重重苦难中，始终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心，对党会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抱有信心，从不低下我昂起的头，阔步前进！于是，我才拥有了我现在的一切。

书，已是尾声。我在安西十工农场、四工农场及玉门黄花农场当年的难友们，不论本书写及或未写及，经过四十年的沧桑，他们大都已散居全国各地，我希望他们能够读到本书，并提出宝贵意见。我用生命写就的这本书，用了十年的辛苦。我把当年的苦难和奋争展示给世人，是希望记述这深深埋藏在一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创伤、痛苦和拼搏，会成为一笔精神财富，对后人有些启示，在今后永远不要再出现曾经有过的悲剧。

为了纪念那些已在四十年前“钻沙包”的死难者，我心中更有着无尽的悲痛。原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的负责人，多年后曾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是众多的死难者救了活着的幸存者。为什么众多的死难者才救了少数幸存者，才有了少数幸存者被“抢救”？这已是历史陈迹，但是它很值得我们长久地深思。但愿这样的悲剧也永远不再出现。

同时，我希望通过此书，能够与当年的难友们取得联系。在安西十工农场和四工农场以及玉门黄花农场曾同我共过患难的朋友，不论当年他的问题是右派分子或其他的什么“罪名”，我都认为他们是我的难友。四十年后的今天，他们都已在安度晚年，本书也算作是我的一瓣心香，祝福他们全家安康如意，祝他们健康长寿。读本书必然会引起他们对往事的痛苦回忆。痛定思痛。我既然有勇气把它写出来，还望难友们忍住心头的悲痛，耐心地把本书读完，并把你们的感想及宝贵意见告诉我，谢谢！

告诉难友们不幸的噩耗，原安西十工农场场长吴玉璋、副场长邹士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给予我们最大的关怀及庇护的二位领导，都已先后辞世。我于1991年8月曾在酒泉邹士杰副场长的家里拜望过他们全家，追忆往事，心潮激荡。此次分别后，我们再没见过面。没料想，到1998年8月，他已病逝，享年69岁。我原想在本书出版后再去拜望他，把这本书呈送他，代表我本人和原在安西十工农场及玉门黄花农场劳动过的所有的难友，对农场所有的领导给予我们的庇护，表示最大的敬意及深深的感谢。但是，他已匆忙地走了。我未能把本书呈送给他，他未能读到本书，这成为我最大的遗憾。

最后，我要向我原来的老领导，原《甘肃日报》总编辑刘爱芝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最大的敬意。在本书完稿定稿之际，我即与远在北京、二十多年未曾谋面的刘爱芝同志电话联系，希望他帮助联系介绍出版，他当即热情应允。后来，我向他寄了部分书稿，请他阅后从政治上把关，提出宝贵意见。他在来兰州参加《甘肃日报》50周年大庆期间，同我几次见面，首先对本书予以肯定，使我受到极大鼓舞。同时，提出

了许多宝贵中肯的意见，有些是很具体的意见，让我继续修改。一位二十多年未曾谋面的老领导，在这二十多年里，我原本有机会去看望他，我却一次也未曾去看望他。他以出人意料的热情这样帮助我，使我感激在心。一次，在谈话中，我说："我没想到你这样帮助我。"他说："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我就干。"后来，我根据刘爱芝同志提出的宝贵意见，对书稿进行了认真修改，于1999年11月去北京，住在他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把书稿又修改了一遍。然后，他嘱我回到兰州家中再作修改最后定稿。我的书稿达到现在的水平，同这位老领导的热情帮助是分不开的。同时，对于本书的出版，他也帮了大忙。没有他的热情帮助，本书2001年版就不能面世。我这位老领导以他一贯的坦荡胸怀、助人之心对待我，我只能在本书的尾声中提上一笔，略表寸心！本书出版前，他就说："这本书将成为传世之作！"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本书出版后的2001年、2002年，我两次去北京看望他，继续向他讨教，对今后的写作征求他的意见。他热情地说："你不能只写这一本书，你还得继续写下去，再出成果！"以后在通信中，他仍一再鼓励我有新的成果。抱恨的是，我在2002年后再未去北京看望过他，他已于2005年6月17日乘鹤西去。他未能见到修订再版的《经历》，我悲痛不已！失去这位指导我写作、帮助我出版《经历》，改变了我一生命运的老领导，我心中的悲痛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述，就以修订再版的《经历》作为一瓣心香，献给他在天之灵！

我希望看了本书的难友同我联系，（我的通讯地址：甘肃兰州西北民族大学老干处，邮编：730030，电话：（0931）8152896）说出你们的感想和宝贵意见；同时，更希望敬爱的读者也向我提出宝贵意见。

附 录

纸中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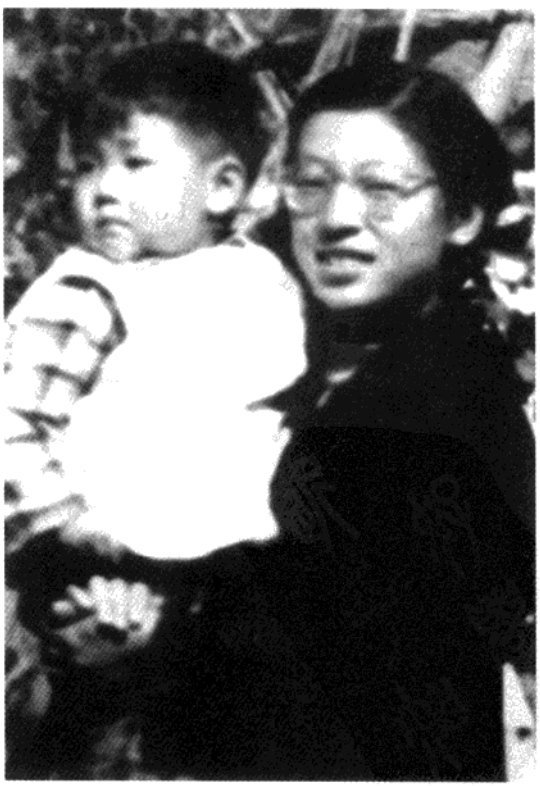
○霄 夏

人的一生有着太多的记忆。

可是即使是很亲近的人，和你共同走过了大半生的人，也很难有很多共同的记忆。

当我想起这些的时候，我正站在马年的门槛上。而我属马，1954年生，马上就要48周岁了。我的母亲今年整七十。大约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正当全人类都在欢呼着走进新世纪的时候，她出版了她的处女作，一本她用了十年心血却只写了她短短三年经历的纪实文学作品——《经历——我的1957年》。

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惨痛的记忆，紧随其后的三年大饥荒更是惨绝人寰。母亲的书就是对那段历史的回忆。尽管她选取的只是那个年代里的一个小小的画面，只是



和凤鸣与小儿子小夏

几亿中国人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可是她的书还是打动了许多读者的心，尤其是一些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或者没有她那种亲身经历的人，经常是边读边流泪，以至于泣不成声。

可作为间接参与者的我，回忆起那个年代只有三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记不得那年我几岁，也记不得那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好像是在一个夜晚，我站在外祖母家院子的门槛上，送爸爸妈妈出门。他们要去哪里，我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记忆最深的就是爸爸妈妈亲了亲我的脸蛋，爸爸还给我和哥哥一人一个五分的硬币，然后就走了。那枚硬币第二天就被我们花掉了，我们在广武门的小摊上一人喝了一碗醪糟。那是我记忆中最甜的一碗醪糟。可是从那个夜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爸爸，我永远地失去了他！如果人的生活中有很多如果的话，我想我的第一个如果就是——保留那枚硬币，直到我人生的尽头。

直到看了母亲的书，我才知道那是1958年4月。那时，我快四岁了。那是我对人生的第一个记忆。

全民大办食堂的时候，我也不例外地到食堂去吃饭。记得那个食堂在小北街附近，每天有很多人挤在一起吃饭，很是热闹，也让小小的我很是开心了一番。有一天，我坐在一张少了一条腿的凳子上，没坐稳磕了一下，就在我的眉际留下了一条伤痕。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条伤痕还隐约可见。也许正是因为它，我才对那个年代的那种荒唐事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记得那年冬天，有一天外祖母家买了煤球，我也在帮着往家里搬，我冻得红红的双手端着一个簸箕，一边哭一边往家里端煤。又冻又饿的我还时不时用沾着煤灰的黑手抹着眼泪，小脸被抹得脏脏的。可那时的我哪里知道那样很难看呀，我知道的就是：我饿，我冷，我不要干活！我要坐在热炕头上，捂着被子暖和。我要吃的。尽管在那个年代，由于在家里我最小，我已经受到了最大的照顾。但是，我还是很饿！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妈妈，我已经快不认识了的妈妈回来了。尽管她带给我们的是噩耗，但是，我毕竟又有妈妈了。从母亲的书中我得知，那是1961年1月。那以后，尽管我们母子一起或者分别都经受过许多坎坷，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细细一数，四十一年！

跋

《经历——我的1957年》出版已五个年头，在修订再版之际，由于受到读者的厚爱，我觉得有许多话要说。

首先，我众多的难友读了《经历》后认为说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那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已经成为过去，《经历》带领他们在苦难的岁月里又走了一遭，回顾当年经受的凌辱、苦难，使他们灵魂震颤。他们有过的抗争，他们忠实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赤诚，书中也在在出现，凸现出他们作为群体的伟大灵魂，使他们深受鼓舞，激动不已。远在广州的难友苑野写信说："你是强者，你有勇气回顾过去，你能平静地把辛酸变成细语，把枯藤变成鲜花来装点今后的日子，使自己迎来生命的春天！朋友，请接受我对你的祝福，希望你接着写下去，写出你生命的新篇章！"

湖南长沙的难友朱正，当年和我同行同派。他原是新湖南报社的，而且也是夫妇右派。2005年2月16日，《北京晚报》刊登了对他的专访，题目是：《扫除腻粉呈风骨——访作家、出版家、鲁迅研究专家、中国近代史专家朱正先生》，他笔耕不辍，著作多多，是难友中极有成就的一位。他来信说："这是一部令我惊心动魄的书，它带着我又回到了那一段苦难的岁月，你的书写得真好，好就好在写得细，再现了当年的场景。它不但写出了饥饿和劳累，而且写出了他人和自己在那种特殊情况下灵魂的扭曲。你这本书的历史地位，不会在《扬州十日记》等等之下。它不但是反右史，也是大跃进史，是后世史学家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必读书。"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位瑞士籍的女研究生关墨宁，在读了《经历》后，经导师高华教授建议，于2004年11月专程来兰州访问我，为她的毕业论文收集材料，主要了解当年女右派的苦难。一位瑞士籍的年轻女性不远万里来到兰州，关注当年女右派的苦难，这是多么难得而可贵的情愫！我在感动之中，觉得她很伟大。

2005年5月，关墨宁从南京大学打来电话，说她的论文答辩已通过，获得极大成功，她特意将这个喜讯告诉我，让我也分享她的快乐。她的声音很好听很激动，我更是激动不已，非常高兴。后来，她还将毕业论文寄来，让我过目留作纪念。我生平认识和接触的外国人就关墨宁一人，认识她我万万没有想到，而且也是以《经历》为媒介。

西安的文大家是位作家，他的胞弟文大业，正是作家杨显惠所写的《上海女人》中被草籽胀死的人。他来信说：

“这是一部史诗性的记述。”

“这是一纸血与泪飞迸的控诉。”

“这里是饿殍遍野、白骨磷磷的那个可诅咒岁月的历史见证。”

“这里真实地记录了被剥夺了人权的大量知识分子被侮辱、被损害、被苦役与饥饿扼杀的惨无人道、史无前例的惨烈景象。”

“这里难得地、罕见地记述了一位善良的知识分子被无辜迫害，在艰难的、漫长的岁月里，饮泣咽血的心灵历程。”

“这里无情地揭露了那些对孱弱的知识分子施暴的刽子手及其追随者灭绝人性的嘴脸。”

2004年11月，南京大学历史系瑞士籍女研究生关墨宁专程抵兰访问和凤鸣

“这是中国文明史上从未有的最残暴、最耻辱的一页记录……”

“读罢掩卷，痛定思痛，长歌当哭！”

他还说：“这几句话，只是记下了我读完你的著作时激动的心情，远远没有表明你的作品在人文历史这个层面的深刻内涵及其深远的意义。你呕心沥血十年，献给了中国后代人一幅触目惊心的历史画面，促使人们去认识那个未被认识的客观现实，而激发有识之士焕发忧患意识，去争取自由民主，去爱人、爱人类！”

我的会宁老乡何谊来信说：“您的著作，我读了之后深受感动，您是一位受人万分尊重和敬佩的巾帼英贤，您以常人难以承受的遭遇经历了家庭不幸以及个人的种种不白之冤……闯过了凌辱、改造、饥馑、文劫四大难关，用十年拼搏写成了41万字的纪实文学巨著，它对我们总结沉重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改革开放，是十分有好处的。拜读之后，写《水调歌头》奉和凤鸣同志原韵——

血泪平生事，忧患实堪怜；壮心赤诚献党，建言苦熬煎。坚韧大家闺秀，报业良才何辜，梦醒尚心寒。最是遭饥馑，魂断哭夹边。

敬风骨，钦艺德，感雅言。文章道义，经历诚可问苍天。天网莫欺疏漏，为善从来最乐，巾帼数英贤。回首莫惆怅，嘉业耀人间。

并感赠诗一首，以表敬意——

字字含情入眼来，一篇读罢动幽怀。
名门弱女夹边路，虎口羔羊生死牌。
史笔自能述道义，国殇信可慰高台。
戚而能恕宽宏量，陇上才人何壮哉。

作家杨显惠先生写了题为《一位坚强的女性》的评论，刊登在2001年6月4日的《都市天地报》上。评论说：甘肃当年的右派一直没有人写出一本有关夹边沟及右派的书，“我作为一个甘肃人感到极为悲哀！好在这个零的记录被和凤鸣打破了。我为和凤鸣高兴，此人乃甘肃右派中的真丈夫也！”他还说：“在作家的行列里她是个新人，但她的笔却不幼稚，语言流畅优美，叙事、抒情与议论融于一体，心灵的震颤和大自然的瑰丽共一幅画卷，真是叫人读起来心潮起伏，难以释卷。”

有位老司法工作者郑信，拿着他对《经历》的述评及感想，登门和我交谈。述评说：“本书虽以个人的血泪经历为主线而写出问世，但所涉及的视野宽广、内涵深

2005年1月，因《经历——我的1957年》所产生的影响，和凤鸣作为访问学者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问讲学时同该中心助理主任熊景明女士合影

透。书中全方位地对全国‘反右’的因果作了翔实、严肃、负责的剖析（有些史实是我首次从此书得悉）。全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对正义、公理、道义、法制的呼唤；是对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肯定与殷切期盼；是对祸国殃民的极左路线的控诉和清算；是站在党的立场向党的倾诉和呐喊！本书不仅是一部纪实性文学著作，也给后世留下了沉痛而珍贵的史料。”

云南思茅的谷青、代山夫妇原为“边纵”战士，为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一切，反右斗争又使他俩双双罹难成为右派。他们写给我的信中说，读《经历》，“我们陪着也淌了不少热泪！您呕心沥血，十年磨一剑，把心掏给读者，必将赢得广大读者的崇敬和尊重！您为难友们洗刷不白之冤，畅吐他们心中未能吐出的块垒，也是为党的历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建言。实实在在为国家社会办了一件大好事。我们也感激不尽。希望您到西南走一走，到思茅就住在我们家里，多住些日子，我们还有好多话没

谈呢。”

我的原甘肃日报社的同事宗敏，父母是老革命，小时候上过延安保育院，本书出版时，他已任《法制导报》总编辑，他在一封长信中说：“我一次又一次止不住流下热泪，用了近三天的时间读完了你用泪和血写就的书。这些天来，我逢人就说，我读了多少年来最令我震撼和感动的书。我激动不已，无法使我平静下来。写到这，我又止不住泪如泉涌……”“你就这么如实写成，这是感天动地《窦娥冤》哪！其实窦娥算什么，再冤无非是一斩了之，然而我那些精英难友们，他们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所蒙受的那种冤情，那种折磨，那种屈辱，饥饿、劳累的重重折磨，窦娥又算得了什么!!!”“你是生命的强者，你又用你那才女之笔记录下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你就更显其不凡与伟大。”

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曾任重庆国画院副院长的郭克先生，读《经历》后，寄来画集和墨宝向我致意。他的画集中的《硕果满藤》、《琼枝吐艳》、《雄鹰展翅》等作品，美不胜收，让我享受到了国画至美而令人陶醉的境界！先生的墨宝书写了何香凝的题梅诗句，诗云：“一树梅花伴水潭，北风强烈态亦然，冰霜雪压心犹壮，战胜寒冬骨更坚。”苍劲有力的笔墨，再加上诗句丰富的内涵，墨宝悬挂厅中，使蓬荜增辉。朋友们认真欣赏之后，都说：“郭先生题写何香凝的诗句，正是写出了你的风骨，你的人格！”我心中愧疚，但朋友们的话也是有道理的。

广东汕头市由民间集资1100多万元，在塔园创办了“文革博物馆”，也展出历次政治运动的著作。创建人为汕头市原常务副市长彭启安。得此讯息，我给彭启安写了封信，寄去两本《经历》，一本供“文革博物馆”展出，一本赠彭启安。收到书后，塔园建设委员会回赠《塔园留踪》作为纪念，并附信一封，来信全文如下：

“您好！赠书收到，已被我史鉴山屋收藏，并在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内展出，非常感谢。

“该书粗阅，来信细读，被您之坚强、学识所折服，‘严师慈母’所感动，让我们也叫一声老师，您用自己的经历，写出字字凝血泪的真史，人民是需要真史的，一切弄虚作假，都是亡国，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兴邦。”

巴金是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倡导者，直到他一百零一岁逝世，中央对此并未作出回应。而经民间集资，全国惟一的文革博物馆在塔园建立了，巴金画像就挂在博物馆中央，画像上写着“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倡导者”，两边书写着《随想录》中最著名的字句：“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唯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人民是需要真史的”，这话说得对极了，《经历》作为“字字凝血泪的真史”，

在文革博物馆展出，我感觉也非常荣耀。

《经历》也受到年轻读者的关注。甘肃省玉门市林业局的李小红来信说：

“我今年28岁，在尚属年轻的阅历中，多少能触摸到那个年代所留下的痕迹，它使我回想起那个年代在我童年留下的尾声，因此，我庆幸我能感受到书中的呼吸，这本书挺起胸膛直面了那段历史，直面了党的错误和知识分子的苦难，我相信并理解书中每一事件、每一感受的真实。

“随着阅读，我感到一种难以描述的心情在剧烈地冲撞回旋，以至于无法将它一口气读下去，我很想愤怒地斥问什么，却没有斥问的对象，流泪的冲动一次次鼓荡，却无泪可流。这本书像一块石头重重地跌进心里，像一面镜子，一面清晰无比的镜子，照着过去和现在。

“在我工作中遇到的委屈、不公平以及波折，曾令我一再地对我热爱的事业及信念产生动摇和怀疑。而您书中第504页结尾那段话：‘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不论个人有着什么样的遭遇都不能摧毁的。’使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心态，也许以此为比较，我太渺小，但我确实感到了一种力量。”

一位没署名的年轻读者寄来的贺卡上写道：“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您用心血写成的巨著将永存人心！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读者的厚爱和鼓励，使我激动不已。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自述性报告文学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一个受苦受难、名不见经传的女右派，由此而有了知名度。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为《经历》写了长篇评论，2004年第4期的《随笔》发表了钱先生的评论，题目是《和凤鸣与她的〈经历——我的1957年〉——“1957年学”研究笔记之二》。2005年9月17日，钱先生来兰州，我们晤面时，钱先生对我多有鼓励，同意将此评论作为《经历——我的1957年》修订再版时的代序。我对钱先生一直心存深深的感激。2003年，钱先生对《经历》的长篇评论《地狱里的歌声》在“五柳村”网站发表后，该网站随即要去了原著陆续发表，《经历》因而走向了世界。

《经历——我的1957年》，是我六十九岁那年才出版的处女作，我不敢说它达到了多么高的层次，但它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受到读者的厚爱是事实。我想，这是由于中国人民历经了反胡风、肃反、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磨难，生活教育了他们，使他们具有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正如巴金所说，“唯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我亲历的这段历史，真真切切、细腻地表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它是“字字凝血泪的真史”，正是它的真实打动了读者，企望做“‘未来’的主人”的读者给予它充分的肯定。我感谢读者的肯定。

有些夹边沟难友热情地向我补充了原书未写尽的故事，特别是迁移到高台明水后出现大饥饿大死亡，发生的一些故事，以及出现的种种凄惨景象，这样，使这次修订

再版更充实了一些内容。

认真负责的读者，也陆陆续续地向我提出指正，指出原书中出现的个别事实的出入，如人名、地名、时间的出入等，也有个别难友指出，由夹边沟迁移高台明水部分的背景及规模，原书都有较大的事实出入，借此修订再版的机会，我一一作了修正。对此，我也非常感谢读者。

[General Information 本信息由OnlyDown 1.21生成]
书名=经历：我的1957年
作者=和凤鸣著
页码=378
ISBN=378
SS号=11524174
dxNumber=000004335232
出版时间=2006
出版社=该引擎未能查询到
定价：29.00
试读地址=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4335232&d=DE0C0B0AE9FAF61538DAAF16B8D4DEBC&fenlei=110903050501&sw=%BE%AD%C0%FA%A3%BA%CE%D2%B5%C41957%C4%EA
全文地址=fb18ac442f7ab0be0752feb2cd08cc91/img15/372E5DF5FC0F623FFA74B2798C6D77D6B8FA3AC271FFCF713516092969E96ED942869E7F95282BBEDA180A9B77F35E43C4C5BCEE98C67EA22B8E210A87844B46EC33662F5EC1AE8CB4D36D6452B84AB3013280E4E915AB552CA3769A8BAA990EAD78A20D5C5FA206A94157561C2D9FAA749D/n29/qw/